

王小甫主编

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SHENGTANG SHIDAI YU DONGBEIYA ZHENGJU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

BEIJING DAXUE SHENGTANG YANJIU CONGSHU



上海辞书出版社




ISBN 7-5326-1280-5
9 787532 612802 >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王小甫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8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

ISBN 7-5326-1280-5

Ⅰ.盛… Ⅱ.王… Ⅲ.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亚—唐代 Ⅳ.D8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8807 号

责任编辑 王圣良
装帧设计 姜 明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李伟国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江杨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5 字数 472 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280-5/K·212
定价:45.00 元

本课题的研究
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基金资助

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

总序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的时代。盛唐为何兴盛?盛唐的兴盛局面表现在哪些方面?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如何?盛唐的辉煌对后世有何深远的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在唐代的研究方面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如向达、汪篯、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张广达、吴宗国等先生，都作出了富有开拓意义的贡献，目前也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角度从事唐代的政治、法律、地理、经济、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这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我们邀请了一批校内外、海内外在唐代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共同来参与实施“盛唐研究计划”，共同探讨这一伟大的时代，把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展现给世人，把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民族、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并希望在取得学术研究的进展的同时，也通过对盛唐经验教训的总结，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些教益和启迪。

现在，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盛唐研究计划”的第一批成果，即吴宗国教授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李孝聪教授主编的《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王小甫教授主编的《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邓小南教授

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册)、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共计五种六册,作为《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第一辑,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隆重推出。

这一批集体研究成果,从政治制度之整合、国际关系之协调、国家运作之效率、社会风貌之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并对盛唐缘何而盛给予了有力的说明,在一些国内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女性与社会、宗教信仰与社会、地域与空间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和总结。

我们希望以此为肇端,把《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继续编纂出版下去。

这项研究计划从启动到第一批研究成果出版,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代表本《丛书》的各位主编,向提供大作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学术贡献,也就没有这项集体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我们也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领导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历史学系的领导从道义到资金上的指导和大力支持,没有他们对这项研究计划的关怀和支持,我们也无法完成这项事业;我们还要感谢随叫随到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们,他们在学术上和事务上所提供的无偿劳动,不仅使我们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深受国内外学者称道,而且使我们的《丛书》编辑工作的质量得到切实的保证;最后,我们向我国最大的工具书出版基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李伟国社长和历史地理编辑室的许仲毅、余岚、张敏、王圣良、解永健等各位责任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不计成本,以推动学术研究、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是他们,最后以辛勤的劳动,把这套《丛书》奉献给了读者。

荣新江

2003年2月1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录

第一编 政治史



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唐书》四夷传总序曾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①。唐代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契丹、奚、室韦、黑水靺鞨、渤海等,在《新唐书》里被列为《北狄传》。可是,在上述四夷传总序里,北狄各族一个也没有提到,似乎“把奚、契丹看得比所谓东夷、西域都更不重要”②。《新唐书》列传的作者宋祁是北宋人,北宋王朝长久处于契丹辽朝的压力之下,当时史家却如此看待唐代北狄诸族的历史地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唐朝统治者及时采取措施,建立河北藩镇,则五代北宋时那么严重的东北边患很有可能提前在中唐时就出现。”③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吗?这些都是历史工作者所碰到的饶有兴味的问题。

其实,宋祁在《新唐书》四夷传总序里不提契丹等族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对唐代奚、契丹的情况尚如此隔膜”④。诚如史家陈寅恪先生所归纳:“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⑤而契丹勃兴却是一个长达五百年的历史过程,其在唐代的活动与其强邻的兴衰密切相关⑥,正式建国更在唐亡以后,这些情况显然不是《新唐书》四夷传总序的主旨所能涵盖的。加之李唐皇室奉行一贯之“关中本位政策”,西北在其战略中优于东北⑦,这恐怕也是《新唐



书》四夷传总序未能突出北狄一系的客观原因。唐代中国国势繁盛，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接触颇多，“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⑧。因此，单讲北狄、契丹的活动也不可能完全揭示唐代及后世东北边患产生和加剧的历史根源。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⑨我们注意到，被《新唐书》四夷传总序所忽略的所谓“北狄”诸族，正好就是唐以后历代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的先民：契丹（辽朝），室韦——蒙古（元朝），黑水靺鞨——女真（金朝）、满族（清朝）。换言之，唐代东北地区政治格局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了唐以后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隋唐时代的东北地区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其间关系如何？又怎样影响到地区政治格局和社会的演变？这些就成了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除了当地民族自身的发展之外，影响东北地区政治形势和社会变化方向的并不只是唐朝的东北消极政策，还有周边民族与国家的盛衰离合。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空间关照范围，不仅大陆及其滨海沿岸地区，也应包括地缘和历史上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我们的计划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本书是其初步成果之一⑩。本文作为全书总论，以下拟就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看法，以明全书旨趣。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尚德抑武与新罗拉动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关系，经常被用各种“体制”、“体系”、“秩序”，甚至“圈”来加以描述[11]。这些说法，由于所用概念本身的含义，多半都带有中心与边缘关系的特点。加上中国在东北亚地区传统的大国地位，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甚而以为被描述成“体制”、“体系”等等的这些关系状态，都是历史上中国人主动追求的目标或积极经营的结果。我认为，这方面恐怕有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与周边关系的描述，如“五服”[12]、“九服”、“入蕃”[13]、“绝域”之类，只是当时人对自己所处世界一种认识的反映，所用概念都只是整理自己知识的手段，并非是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或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况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历史上的国家及民族关系发展也不是完全由中国人的主观意愿来安排进行的。然而，由于受成见的影响，在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却形成了片面强调隋唐统一对周边形成威慑的倾向，很少注意周边国家及民族自身的主动性，我想这是首先应该予以廓清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与周边国家及民族关系时具备特有的尚德抑武、以德服人观点，如“舜舞干戚，荒服来王”、“舜歌南风，天下大治”[14]之类，这一点在隋唐时代也不例外。翻开记述唐朝初年太宗君臣论治的《贞观政要》，官僚士大夫反对战争、反对拓土开边的言论比比皆是[15]。如贞观四年(630)唐灭北突厥后又遣使招慰西突厥，负责招抚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略云：“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



备矣。"[16]所谓"近观隋室",即唐初修《隋书》所集中总结的隋亡教训,如其《东夷传》史臣曰引《兵志》:"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17]。贞观十四年平麹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太宗欲以其地为郡县,侍中魏徵、黄门侍郎褚遂良均反对,后者上疏略云:"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返;始皇远塞,中国分离。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岂得縻费中华,以事无用?"[18]至于唐太宗征伐高丽,更在朝廷内外遭到普遍反对,只有兵部尚书李勣主张讨伐[19]。

或许有人以为这是唐初继亡隋之后特殊的社会思想状况,其实不然。即使到了盛唐时期,这类思想及议论仍然随处可见。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减少远戍,屯田防边,多建友邦可说是武后得势初期的主要外务策略。三者相辅相成,并不彼此矛盾,但基调可同说是以和为贵。探讨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也应当从这方面去参考比较。"[20]而到了武周中期,神功元年(697)刚刚拜相的狄仁杰就上疏《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其文略云:"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业也。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则恒、代之镇重,而边州之备实矣。况绥抚夷狄,盖防其越逸,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计校长短哉!"[21]

史称"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房、杜为辅佐太宗成"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宋即辅佐玄宗创盛唐"开元之治"的姚崇、宋璟,而史载"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22]。开元四年(716)突厥内乱,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建议募关中兵往西域讨击余寇,将作大匠韦凑上疏谏曰:"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崇征伐,有占风覘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珍奇,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升平、君

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23]

“安史之乱”以后时代进入中唐，这类议论仍史不绝书。如元和元年(806)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亟请击之，宰相杜佑上疏论之略云：

> 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猃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诚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中国未静，白徒竞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并有匡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国家自天后已来，突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24]

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丰折臂翁》，题下就注明“戒边功也”。诗中的老翁简直就是一个反战英雄，“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锤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此始免征云南”。“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笺校者引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认为此诗“大意亦本之杜甫《兵车》、前后《出塞》等篇”[25]。陈寅恪先生指出：“然君卿(杜佑)上疏，在乐天(白居易)作此诗之前。杜氏之疏传诵一时，白氏此诗以宋璟防黩武事为言，与之符同，或受其影响”；“后来微之(元稹)作连昌宫词，恐亦依约摹仿此篇，盖连昌宫词假宫边老人之言，以抒写开元天宝之治乱系于宰相之贤不肖及深戒用兵之意，实与此篇无不相同也。”[26]

由上述引证可以看出，贯穿有唐一代的这些议论例证大同小异，逻



辑理论相通一致，可见唐人的“尚德抑武”观点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或个人行为，而应该是中国传统的“和为贵、和平共存”思想的反映。这种观点值得系统整理，专门研究，以彰扬我民族和平主义的精神，促进新世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并有利于国际合作。而本文在这里揭示这些，只是希望能够变换一个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隋唐五代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的性质。

其实，即如隋伐高句丽失败，也不尽因为“务广地者亡”。据史料记载：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亲征高句丽，“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既而城久不下”[27]。可见炀帝以百万大军亲征高句丽而不能取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隋军受战略目标的限制而屡屡坐失战机。显然，隋炀帝作战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臣而不纳”，即并没有想彻底兼并高句丽。唐朝也是如此。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被阻于辽东安市城(今辽宁海城营城子)，召诸将于驻跸山问计，“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28]。遂失战机，被迫班师。明年“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29]炀帝“不悟”，太宗“不忆”，其实都一样。显然，唐太宗也没有把彻底倾覆高句丽其国定为战略目标，他当年出兵的宣言便是明证：“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30]。

然而，隋、唐两代毕竟曾经大肆征伐高句丽，而且唐朝最终和新罗一道将高句丽攻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其间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之

外[31]，更重要的是新罗为了消灭竞争对手、实现半岛统一而对唐朝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我的较详细意见请读者参考本书所收的两篇拙文《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以及《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其实，隋、唐两代攻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不同的下场和结局，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对高句丽的战争或许只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及民族的关系问题；从东北亚地区史的角度，就不能不看到新罗的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就不能不重视新罗的统一在东北亚政治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隋朝没有新罗的拉动，战略目标不明，因而不可能取胜。即使唐朝，也是在先出兵跨海帮助新罗消灭了百济、打败了倭军之后才最后和新罗一道解决了高句丽问题，而百济和倭国此前并未与唐朝发生地缘冲突。由此可见，唐初介入半岛事务，完全是顺应新罗的意愿。因而，高句丽最终被消灭，新罗对统一的追求不仅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是主要的原因。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之灭标志着朝鲜半岛上统一新罗（668—935）的成立，这是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史中第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二、唐代周边盛衰连环

如前所述，唐朝一贯奉行"关中本位政策"，那为什么唐初还能多次大规模出兵攻伐东北方面的高句丽呢?其原因在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629—846）当时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32]；"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于乘高



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惟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33]咸亨元年(670)薛仁贵逻娑道行军讨吐蕃，却被吐蕃论钦陵率四十万军败之于青海大非川，吐蕃遂灭唐朝藩属吐谷浑而尽有其地[34]。此时距高句丽之灭才刚刚两年，东西形势遥相呼应，此伏彼起，若合符契！

高句丽破灭之后，唐曾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实行羁縻[35]。然而据研究，就在薛仁贵兵败大非川的同一年，唐朝的安东都护府也曾被迫撤回了辽东[36]。安东府后来撤离平壤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新罗统一过程必然带来的领土扩张，不仅蚕食百济故土，而且还积极支持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运动[37]。674年，新罗把高句丽王室后裔安胜(《新唐书·东夷高丽传》安舜)封为报德王，置于自己控制的百济旧地招集高句丽流亡，甚至还和世仇旧敌倭国恢复了邦交[38]。这些都表明，新罗为了自身利益甚至准备与唐朝为敌。然而唐朝此时的战略中心已经西移，在东北取退守之势[39]。675年双方发生冲突，唐军小胜即止；新罗惯于见机行事，此时便也采取低姿态，马上遣使入朝谢罪[40]。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扩展到了高句丽故地南境。唐朝本来就是应新罗邀请进入半岛作战的，对辽东以外半岛上的高句丽故土并没有领土野心，当然也不想为此大动干戈，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41]。新罗消除了大军压境的忧虑，于是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

然而，吐蕃的崛起又给了东突厥复兴之机。东突厥即唐初贞观四年(630)消灭北突厥后安置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灵武)沿边的突厥降部。过了五十年，他们竟然趁唐朝把军事力量投向西北与吐蕃激烈

对抗之机屡起反乱，终于在永淳元年（682）建立起了东突厥汗国（682—745，学界又称之为突厥第二汗国或后汗国）[42]。虽然东突厥牙帐建在漠北乌德鞬山（亦作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但却经常南下剽掠。尤其是默啜为可汗时（691—716），东西拓地万里，北狄诸族悉数受其控制[43]；控弦四十余万，连年侵袭唐境，并与吐蕃呼应，为东突厥汗国最强盛的时期[44]。

东突厥的复兴对唐朝边疆扰动极大，唐朝不得不进一步收缩东部防线，甚至调动东北边防营州（治今辽宁朝阳）的兵力投入平叛。《旧唐书·裴行俭传》："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单于管内二十四州并叛应之，众数十万。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反为所败。于是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45]同书《唐休璟传》："调授营府户曹。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其后奚、羯胡又与桑干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超拜丰州司马。"[46]营府即营州都督府，其地历来为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境内有奚、契丹等多个民族杂居，唐置平卢军，任务是镇抚室韦、靺鞨，进则可应接安东都护府[47]。武周延载元年（694）"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48]。营州被扰动，引起了东北亚政局巨大的连锁反应，从而开启了此后千余年世局演变的序幕。

三、契丹倔强及其历史影响

奚、契丹是历史上东部鲜卑的后裔，唐代称为两蕃[49]。《旧唐书·地理志》二"营州柳城"条："柳城　汉县，属辽西郡。室韦、靺鞨诸部，并在东北，远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西北与奚接界，北与契丹接界。"[50]万岁通



天元年(696),正当武周朝廷困于吐蕃、突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时候[51],“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先锋”[52]。这场大规模的反乱持续了一年多,其间李尽忠病死,孙万荣代领其众,后为突厥所偷袭,败死,其余众及奚、霫都投降了突厥[53]。反乱中契丹曾多次大败唐兵,攻掠河北诸州,造成极大破坏。当时武则天竟慌忙下令释放全国囚犯拉去抵抗契丹,被陈子昂谏阻才未实行。这场反乱造成了重大政治影响:

首先是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的废置。营府“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历二年(699)侨置渔阳(今天津蓟县)[54],开元五年(717)又还治柳城(今辽宁朝阳)”[55];安东府“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705),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714),移安东都护于平州(今河北卢龙)置。天宝二年(743),移于辽西故郡城(今辽宁义县)置”[56]。可见从公元696年至717年的二十年间,朝廷未能在营州地域设治[57];安东府先是孤悬辽东,改为都督府,后来也被迫撤退到了幽州境内[58]。河北道唐初以幽州、营州、安东三府防边[59],由于契丹之乱使边防后撤,东北防务只好完全倚仗幽州,这应当是盛唐时期幽州实力加强、地位提高并率先设立节度使的重要原因[60]。

其次是渤海的建国。唐朝塞外军政设施被迫撤离,营州陷入无政府状态。于是,高句丽灭亡以后被安置在营州地域达三十年的粟末靺鞨及高句丽余部趁机逃离监管,跑回粟末靺鞨故地即所谓“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割据自固。武后当时困于契丹,只得怀柔靺鞨,封其首领乞乞仲象为震(或作振)国公。然而部分靺鞨仍不受命。于是,契丹平定以后,武后即派兵追击背叛的靺鞨。但是追兵遇到了仲象之子大祚荣所率部众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契丹失败以后其余众及奚都投降了东突厥,突厥势力横亘其间阻绝了中原王朝讨击靺鞨之路。大祚荣遂得以建立国家,初用其父封号称震国,先天二年(713)受唐册封改称渤海[61]。我们注意到,虽然由于突厥的强大,契丹还不能自立(因而也不可能使北宋时代的东北

边患提前)[62],其活动却为渤海靺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第三是促使唐朝与新罗关系的解冻并恢复盟好。契丹首领孙万荣败亡前曾哀叹:"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63]可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影响到与东北亚各方的关系。突厥曾经袭击契丹,新罗显然也不会为了契丹而开罪唐朝。随着契丹败落和渤海建国,突厥势力进一步膨胀,使得新罗更可能靠拢唐朝以求共同对付扩张威胁。据研究,新罗在699年的遣华使就可能与此有关[64]。不过,尽管可能自703年起新罗就是派朝贡使到中国最频繁的国家[65],唐罗政治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却要到八世纪三十年代初[66]。开元二十一年(733)双方联兵南北夹击渤海,虽因冬深雪厚而退兵,新罗却从唐朝正式得到了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南岸之地[67]。唐朝为了发动新罗军队遏制渤海靺鞨,特别给新罗王加授宁海军使的军号,同时也有汲取登州(今山东蓬莱)遭渤海袭击的教训[68],谋求海上安宁的意义[69]。这一军号后来又加授给继任的几代新罗王,直到中唐以后在新罗南方出现张保皋的清海镇[70]。总之,自八世纪三十年代唐罗恢复盟好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这种关系十分有利于统一新罗的社会发展[71]。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北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都是有积极历史意义的。

然而,七世纪末的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只是契丹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事件。东突厥默啜可汗末年政治衰败,契丹、奚等部落又纷纷脱离突厥来投唐朝[72]。开元四年(716)默啜在漠北被人刺死,突厥从此一蹶不振,契丹诸部又活跃起来[73]。唐朝的营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复置的。营府复置的同时,唐朝在营州设置了平卢军使,开元七年升为平卢军节度使。次年唐朝规定:"幽州节度兼本军州经略大使,并节度河北诸军大使。"[74]可见新建的河北道边防体制是以幽州节度为中心的一个整体。由于默啜以后的东突厥汗国以及继之而兴的回纥汗国基本与



唐朝中央政府保持盟好[75]，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道边防体制实际上主要是防御北狄契丹的[76]。在这种情况下，契丹继续受到强大的外部压力，尽管多次努力且内部社会有所发展变化[77]，但仍未能建立国家。可这种形势却为安禄山积聚力量发动叛乱创造了机会[78]。

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力量，幽州也成了割据最严重的河朔三镇之一[79]。当然，在国内形势相对稳定的时候，藩镇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起到抵御两蕃的作用[80]。也有人论证安史乱后奚族大盛，契丹一度为所役属[81]。但更主要的是漠北继突厥而兴起强大的回纥汗国(744—840)，不仅又将周边部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还曾出兵帮助中央政权平定叛乱[82]。总之，契丹真正走向勃兴，是九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以后才开始的。除了外部政治压力的解除[83]之外，更重要的是回鹘汗国及其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84]。

耶律阿保机是907年当上契丹可汗的，称天皇帝(辽太祖)。这一年正好也就是朱温灭唐自立、中原五代时期开始的年头。晚唐五代中原陷入长期战乱，北方边镇自顾不暇，不仅不能控御塞外草原，后来反而连自身也被并入了契丹王朝的统治范围。过了九年，阿保机废除了契丹可汗的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正式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契丹国家建立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把中国的东北、华北整合到了同一个政治实体之内[85]，从而改变了东北民族的空间发展方向，开始了北狄诸族相继入主中原、进而融入中原社会的千年历史进程。

契丹建国后，其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虽然仍建在草原上，但它却不满足于只是像以前的草原帝国那样，仅仅到定居地区进行掠夺。它对定居农耕地区发动进攻，实行占领，用掠夺来的人口在草原上推行定居农耕(头下军州)，同时在两者之间进行大规模移民，使其联系越来越紧密[86]。后来契丹在各地建立五京[87]，以便加强控制和相互联系，就是推行这种占领、整合政策的产物。

据研究，从前统辖辽东的唐朝安东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就废除了[88]，周边部族即开始向辽东渗透[89]。然而，契丹人真正对辽东实行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却是在阿保机当政及契丹建国前后[90]。很难设想辽东广大地域在安史乱后的一百多年里在政治上会是一片"瓯脱"（空白区，禁地），因此，可以相信在契丹占领之前渤海曾经在这里设治[91]。然而，这段时期辽东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治理，契丹人又是怎样得到这片地区的，现在都很难确知了[92]。据史料记载，919年2月契丹"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93]，渤海户显然是掠夺而来，但却未见双方军队正面冲突。惟一见到双方在辽东发生军事冲突是在924年5月，契丹"徙蓟州民实辽州（今辽宁新民）地，渤海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94]。很可能就是这一事件促使耶律阿保机最终下决心吞并渤海国，因为就在下月他便宣布了他去世以前必须完成的所谓"两事"，其中之一就是消灭渤海[95]。明年12月，耶律阿保机亲征渤海，次年灭之，初设东丹国，后归并。

辽西营州以及平州（今河北卢龙）唐末仍在割据幽州的燕王刘守光手里。913年沙陀李存勖灭燕，营、平两州为所攻取[96]，不久陷于契丹[97]。以后虽小有反复[98]，但到936年石敬瑭割"幽蓟十六州"（北宋后习称"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换取"儿皇帝"之称时，北族王朝和中原王朝在河北北部对峙的格局基本上就确定下来了。

石敬瑭割幽蓟可说是唐朝东北消极防御政策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由于实行消极防御，唐朝在东北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退守紧缩边防；一项是"以夷制夷"，利用胡人蕃将防边。后一项措施在盛唐时期是普遍现象[99]，在东北最典型的就是安禄山身兼三镇（幽州、平卢、河东）节度使专权，反而发动叛乱。安史本身为来自中亚粟特的营州杂胡[100]，部下也多为蕃兵蕃将[101]，以致大乱之后由于安置安史部将，"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102]。据史料记载："故事，以范阳节度为押奚、契丹使，自至德后，藩镇



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103]朝廷因而继续姑息。如，大和五年(831)幽州逐帅，唐文宗召宰相议，“(牛)僧孺对曰：‘陛下以范阳得失系国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以土地归阙，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则今日志诚之得，犹前日载义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诚节钺，惜其土地，必自为力。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臣固曰不足烦圣虑。’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104]当时突厥早已灭亡，幽州所捍主要是回鹘及奚、契丹。只是，消极防御到了这种地步，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唐末更直接引沙陀等部族军队进入中原平定黄巢之乱，随即参与内战。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沙陀和契丹都是夷狄或胡人，只有内蕃、外蕃之别。所以，契丹勃兴之际，耶律阿保机也曾到云州(今山西大同)与沙陀李克用盟会[105]。从文化分野上看，作为中原边镇的幽州被沙陀攻取和落入契丹手中其实并无二致。沙陀石敬瑭割幽蓟给契丹，也可以说是这些边州在胡人部族之间倒手，所不同的只是内蕃和外蕃的不同，已入主的和待入主的不同而已。然而还有一点不同，即西北民族和东北民族的不同[106]。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以契丹为首的北狄诸族正在从现实地域和抽象文化两个层次向中原方向挺进。古代的中原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短暂的空间减缩换来的是长期的文化膨胀。这也就是唐以后千年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两种不同力量撞击与消长的指向性结果。

四、靺鞨、女真之递兴

如前所述，渤海国家是靺鞨人主要以粟末靺鞨为主的各部建立的[107]。渤海建国之初虽然交通突厥，甚至可能权且称臣于新罗[108]，但其国名却坚持采用中原王朝封号(震国、渤海)，这表明它仍然自认是中国的地方民族

政权，奉中原王朝为宗主[109]，因而很容易与中央政权改善关系。

然而据史料记载，靺鞨从北朝后期起就分为七部：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史书说其“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110]。白山部分布在以长白山为中心的地区，较早臣服了高句丽[111]，高句丽败亡，白山“其众多入唐”[112]。黑水部则分布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既没有臣服过高句丽[113]，也没有参与渤海建国，俨然自成势力：“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健，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部又以南北为称”[114]。简单说来，就是靺鞨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即建立渤海的各部，北支即黑水靺鞨[115]；黑水靺鞨又分为南北两部[116]。所以靺鞨族至少从隋唐时代起就形成了从南到北的三大族群，他们在历史上先后递兴：粟末靺鞨为首各部建立了渤海国，南黑水靺鞨即后来建立金朝的女真族[117]，而北黑水靺鞨应当就是后来建立清朝（后金）的满族的先民[118]。

渤海趁乱自立，中原王朝却迅速主动加以册封，显然有离强合弱、遏制突厥势力的战略意图[119]。然而形势很快有了变化，先是716年默啜遇刺后突厥转弱，接着是719年大祚荣去世、大武艺继位，渤海的内外政策发生改变[120]。

默啜遇刺的第二年，唐朝便在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恢复设置了经营东北的营州都督府。接着，开元“八年（720）九月遣左骁卫郎将摄郎中张越使于靺鞨，以奚及契丹背恩义，讨之也”[121]。此处称靺鞨而非渤海，有可能是指黑水靺鞨[122]。于是，开元十年（722）五月有黑水靺鞨首领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其为勃利州（今俄国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刺史[123]；“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靺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诸部刺史隶属焉。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124]。显然，唐朝既于东北采消极防御政略，只好尽可能利用政治手段，在不同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然而，这就和



渤海大武艺强化王权、"斥大土宇"[125]的政策形成了矛盾。大武艺不仅派兵征讨黑水，八世纪三十年代初还依仗与突厥及奚、契丹的同盟进攻唐朝辽西，甚至还裹挟黄海海贼跨海袭击山东半岛北缘的登州，迫使唐朝联络新罗共同出兵加以遏制[126]。

不过，大武艺时期与唐朝的冲突在整个两百余年的唐、渤关系中只是一段不和谐的插曲，而且多半可能与大武艺的个人性格有关[127]。因为东突厥毕竟已经在走下坡路，而契丹自身还在大国间首鼠两端，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渤海还不能不顾忌与新罗的对峙，因而大致到开元二十三年(735)左右，大武艺又主动派弟弟大茂庆入朝谢罪，并报告突厥的情况[128]。从此唐、渤关系就稳定下来了，交流不断，往来不绝。

无论如何，诞生于各大政治势力矛盾冲突之间的渤海国虽因后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曾被誉为"海东盛国"，但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军事强国。面对唐朝宗主国和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渤海国既不可能入主中原，也不可能征服草原。如前所述，渤海对于唐朝的辽东只是趁安史之乱及以后藩镇割据之机进行了偷偷的蚕食[129]，并未建立巩固的政治统治和强大的军事防御，以至于契丹后来能够"兵不血刃"进入这一地区[130]。渤海和统一新罗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相互敌对[131]，但后者在东北亚政治格局中曾长期是唐朝的忠实盟友，渤海也很难向半岛拓展空间[132]。这些就决定了渤海国只能向北方，主要是向地缘孤立的黑水靺鞨地区开拓发展[133]，另外就只好向东跨海，到同样孤立的日本列岛寻找交往机会[134]。渤海国的首都自天宝(742—756)中开始从旧国故都(今吉林敦化)迁显州(后改中京显德府，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贞元(785—805)中又一度迁到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八连城)[135]，这一移动轨迹大致显示出了渤海国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136]。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渤海国的东向通交与其北向拓展具有一致性。其实，渤海国并不像形式上所表现的那样是一个官僚制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五京以外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尤其是在新征服的黑水靺鞨地区，在表面的郡县制度下面，实际上仍然还是传统的部落组织及其

首领酋长制占绝对优势。为了解决这种发达的政治上层建筑与落后的社会基层组织之间的矛盾以避免爆发冲突，渤海政府便积极推动以部落首领为主体的对日本海路贸易，以满足北方渔猎民族对外交换的基本经济需要[137]。八、九世纪的环日本海交流基本上就是以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138]，尤其是八世纪中期以后，这种交流呈现出纯经济文化性质而很少带有政治目的[139]；同时，在新罗与日本交恶的情况下，渤海作为唐朝的属国与日本交通，为唐日通交、保持联系提供了一座有益的桥梁[140]。

然而，渤海国灭亡以后，失去了动力的环日本海交流很快就沉寂下去了，东北亚地区间的海上交通中心转到了黄海[141]。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所谓"海东盛国"的文化发达程度在当地社会到底深浅如何？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证明，新石器时代在黑龙江地区开始的年代几乎和中原一样早，但它的下限却要晚得多。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从中原传入黑龙江地区，但石器仍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唐代渤海政权出现之前[142]。到了辽金时代，虽然已经大量使用铁器，但落后的生产工具——石器在三江平原一带仍然存在，形制也类似新石器时代的同类器物[143]。在更北的俄国远东，"科里亚克人、堪察加人（伊特里门人），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还处在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技术正处于鼎盛状态。"[144]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之下，渤海国发达的文化很难在其政权崩溃后继续在当地传承下去。例如，位于现在俄国滨海州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从清代以来曾长期被认为是渤海国率宾（绥芬）府的遗址，近年考古工作者确认其为金代恤品（绥芬）府遗址，与渤海国毫无关系[145]。实际上，即使是渤海的五个京城，也很少为后代袭用。而金代的恤品府，就现在所见资料，至少到清初已经成了废墟[146]。

除了生产力水平低导致社会发育程度低下外，契丹的移民政策也是当地文化史中断的重要原因。契丹灭渤海以其旧地建东丹国，因屡遭反抗，遂大规模移民至辽东及西辽河契丹故地[147]，928 年将其都城迁至辽阳



称南京，后并入契丹称东京。契丹迁移渤海居民主要是为了根绝反抗，所谓“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148]。《辽史·太宗纪》上天显三年（928）十二月：“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149]由此可见，所迁者当多半是原渤海国的贵族、官僚及富民，即所谓文化的传承者。如同后来女真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作为其统治基础的猛安谋克“比屋连村、屯结而起”移居中原进行占领，东北其故乡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发育就又停顿下来了。

也有人提出，史书未见渤海国在黑水靺鞨设置的州府，“这至少可以说明，黑水部的命运，与那些夹在其与渤海中间，终于遭到吞并的靺鞨诸部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黑水靺鞨是拥有出海口的。一如古代东北地区历次历史性变动发生时被动部族的反应——迁移一样，黑水靺鞨的活动中心也在继续向北作战略撤退，移向黑龙江出海口附近。他们像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先民们一样，与海外的萨哈林地区、鄂霍茨克文化的人群集团发生着联系、交流，以保证本部的生存、繁衍，并伺机卷土重来”[150]。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黑水的主动北移和渤海的被迫南迁这两个反向运动造成了靺鞨故地的文化史断档，从而也就形成了靺鞨与女真先后递兴的时空间隔——这就是以契丹为主进行活动的历史空间。

不过，契丹走出草原向东发展，不仅拉动改变了东北民族的空间发展方向，也在大漠草原上留下了政治空档；继起的由女真建立的金朝在草原上修界濠，基本上就是以大兴安岭为界[151]，这就给欧亚草原上最东边的游牧民族——唐代北狄之一的室韦、后世的蒙古提供了崛兴的历史契机。蒙古是第一个统一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它在东北把中原文明一直引到了黑龙江下游入海口附近的奴儿干地方，明朝继之[152]。于是，唐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史千年演进的最后一幕——满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就成熟了。

五、日本转向内敛

日本古称倭国[153]，曾经积极介入东北亚地区政治[154]。然而，663年倭国派海军到韩半岛援助百济复国，在白江口之战被新罗和唐朝联军全部歼灭，史载联军"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155]。这次战败震动了日本全国，对其国家政治、文化、外交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这些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史学界就有很多研究[156]，此不赘述。1998年出版、1999年重印的日本史学新秀森公章的《"白村江"之后》颇具代表性，全书除序言外共三章，篇目分别是：走向白村江的历程，百济之战，律令国家"日本"的成立。第三章六个小节的题目是：1)流亡百济人的贡献；2)中央官制的整备；3)地方统治的发展；4)律令国家的成立；5)转向消极外交；6)两种对唐观。在第5节"转向消极外交"中作者谈了以下内容：放弃半岛外交，拒绝耽罗(今韩国济州岛)的援助请求，回避与唐朝通交，新罗的"朝贡"，唐风化的楷模，"小中华"观的形成。这些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总之，从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的角度来看，白江口战争之后，日本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首先是不再派兵外出作战，在我们关照的这一时期，尽管文献记载曾有几次征讨新罗，看来都未成行[157]。其次是对地区政局取退守防御态势，白江战后、安史乱时都是如此[158]。第三是实行保守外交：与新罗政治对峙减少交往自不待言；对唐朝主要是文化学习，因而是来的很多去的极少；同渤海的交往正与对唐朝相反，如前所述，主要是渤海方面希望发展海上贸易，日本方面则极力加以限制。尤其是八世纪中期以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呈现稳定态势，因而基本褪脱政治色彩，转为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大首领为主的渤海使团造访日本更勤了，但却经常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日本官僚经常以文书不合礼仪、贡期不到，甚至



疫情等借口，轻而易举地就把历经千辛万苦跨海而来的渤海贸易使团给打发了[159]。后来竟因此激起变乱，造成所谓“海贼”[160]。可见，所谓“小中华”的华丽外表之下掩盖着的是闭关锁国的实质。不过，虽然这样一来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降低、作用减小了[161]，却为本国换来了难得的长期和平发展。日本所谓的律令制国家及其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六、结　　论

总结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1）从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当时由于中国传统的尚德抑武精神，加上唐皇室奉行的“关陇本位政策”，遂产生了唐朝政府在东北的消极防御政略，包括紧缩边防、重用胡人蕃将以及册封渤海国为藩属等等。这一政略加上唐罗盟好的制衡，就造成并维持了中国东北与东亚近两百年的和平。然而，也是这一政略给了契丹最终勃兴的机会，由之整合东北、华北，影响了此后中国千年的历史面貌。

（2）就隋唐五代东北亚国际秩序而言，因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具有尚德抑武的传统，无意于向外做体制性经营，所以并不存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如果一定要说当时有所谓国际秩序的话，那就只能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由盛衰连环产生的相互制衡。迄今为止人们用不同名分构造出来的各种静态体制，恐怕并非当时本地区不同民族和国家间关系的实情，因而也很难藉之来理解历史发展的真实原因和动态趋势。

最后需要交待的是，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所收论文代表了各位作者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学界研究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非也，读者明鉴。

注释:

①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正史皆为此本),1975 年,6023、6027—6028 页。

② 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收在氏著《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中华书局,2000 年,291 页。

③ 同上引黄永年文,290 页。

④ 同上引黄永年文,291 页。

⑤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128 页。

⑥ 参(日)松井等著《契丹勃兴史》序言,刘凤翥译、邢复礼校汉译本收在《民族史译文集》第 10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 年,2 页。

⑦ 参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所举诸例,收在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 年,61 页以下。又如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西北沿边就有六个(安西、北庭、河西、朔方、陇右、剑南),东北经略却只有两个: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参(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1385—1389 页。

⑧ 同上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28 页。

⑨ 同上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3 页。

⑩ 本项研究属于北京大学 985 规划的文科重点项目"盛唐工程"子课题之一,同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 2000 年度的立项资助(批准号 00BZS007)。

⑪ 据宋成有介绍:"关于古代东亚或东北亚国际体系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大致看,至少有日本学者西岛定生的'册封关系体制说',堀敏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说',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滨下武志的'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系说',韩国学者全海宗的'朝贡制度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大陆学者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制说',台湾学者张启雄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说'等等。"以下宋先生还具体开列了有关参考资料和专著,见氏著《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变迁——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互动关系述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政治外交组,2002 年 6 月,2—3 页。

⑫ 参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畿服》,中华书局,1977 年。

⑬ 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赞曰:"然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驿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入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6264—6265 页)"入蕃",标点本原作"八蕃",恐因形近致误,此据百衲本(商务印书馆缩印,1958 年,1561 页上栏)改。

并请参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卷三十三，条14，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852页。

⑭（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1235页。

⑮ 参（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安边第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59—280页。

⑯ 同上引《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275—276页；并请参（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引《通鉴》均为此本），1982年，6081—6082页。

⑰（唐）魏徵等撰《隋书》卷八十一，1829页。

⑱ 同前引《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278页。

⑲ 参前引《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263—273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6188—6189页。

⑳ 同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7—68页。

㉑《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3889—3891页。该疏收入《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四，题作《言疏勒等凋弊书》，题下注：《（唐）文粹》作《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3579页上栏—3580页上栏。

㉒《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宋璟传》，4395页。宋璟不赏边功之事见本传：“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此事极具代表性，后被中唐诗人白居易写入其新乐府《新丰折臂翁》，见后。

㉓《旧唐书》卷一百三《郭虔瓘传》，3189页；参《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三《郭虔瓘传》，4543—4544页。

㉔《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3979—3980页。然所述郝灵佺事迹与《新唐书·宋璟传》略异，参前注22引新传。

㉕（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66—167页。

㉖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73、175页。

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八年“诸将之东下”条，5662—5663页。

㉘《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六月条，6225页。

㉙《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条，6234—6235页。

㉚《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6217—6218页。

㉛ 参叶自成等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204页以下。

㉜ 同前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39—140页。

㉝《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50页。

㉞ 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2页。

㉟ 参《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6197页。

㊱ 参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1页及74页注文2的考证。

㊲ 参上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

局》，61—63页；并请参同作者《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收在前引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101—102页。

㊳ 参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3页。关于报德国，亦请参（日）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中的渤海国》，收在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东亚史中的国家和地域》（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八集），东京刀水书房，1999年，433页。

㊴ 据黄约瑟研究，最早的几个安东都护及一些东北将领都被调往西边去同吐蕃作战；而张文瓘谏止高宗再讨新罗时就说："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参《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2—63页。

㊵ 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上元二年二月条，6375页；《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新罗传》，6204页。黄约瑟认为，是役唐军"草草收兵"，因为"刘仁轨在胜负未决时已收兵，留下李谨行继续作战"（《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5页、76页注文34），其说是。

㊶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上元三年二月条，6378—6379页。

㊷ 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81页。

㊸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契丹及奚自神功（697）之后，常受其征役"（5172页）。《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室韦传》："其国无君长，惟大酋，皆号'莫贺咄'，摄筦其部而附于突厥"（6176页）；同书《北狄渤海传》：黑水靺鞨"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6180页）。吐屯为突厥派往属国别部督收赋入的监统之官，参《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下《突厥传》下，6056页。

㊹ 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5172页；《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上，6046页。

㊺ 《旧唐书》卷八十四，2803页。

㊻ 《旧唐书》卷九十三，2978页。

㊼ 参《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平卢军节度使"条，1387页；同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柳城"条，1521页。有关营州在唐代东北边防的地位与作用，请读者参看本书所收《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一文。

㊽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6493页。

㊾ 参前引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265页。唐以前契丹的历史概况请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4页。

㊿ 《旧唐书》卷三十九，1521页。

51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神功元年"武懿宗军至赵州"条记载孙万荣灭亡前曾哀叹："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6521页）可见契丹起事对各方关系与时机都曾有所考虑。

52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6505、6506页。

53 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冬十月条，6510页；同书卷二百六，则天后神功元年"武懿宗军至赵州"条，6521—6522页。

54 参杨志玖《关于渔阳、范阳、蓟县的方位问题》，收在氏著《陋室文存》，中华书



局,2002年,176—180页。

55 《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1023页。

56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6页。

57 史料中惟见唐休璟曾于长安四年至神龙元年间兼幽、营两州都督,时值营州侨置渔阳。参郁贤皓《唐刺史考》(三)第七编《河北道》卷一百二十一《营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435页。

58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圣历元年(698),进授(高藏)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委其统摄安东旧户,事竟不行。二年,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5328页)圣历元年高藏之授很可能是对抗同年大祚荣建国的举措;高德武是否还蕃不详。《通典》卷一百八十六《边防》二《东夷》下"高句丽"条记狄仁杰曾于圣历二年上表"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中华书局校点本,1988年,5020页);据《旧唐书》卷九十三《薛讷传》:圣历元年九月武后下制升庐陵王(中宗)为皇储,讷"寻拜幽州都督兼安东都护"(2983页),可见当时安东府已经内撤由幽州兼领。参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72页。

59 唐初河北道羁縻府州多设置或寄治在这三府界内,参《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1125—1129页。

60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睿宗景云元年冬十月丁酉条:"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6656页)并请参本书所收《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

61 参《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渤海传》,6179—6180页;《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渤海靺鞨传》,5360页。

62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契丹传》:神功元年,"契丹不能立,遂附突厥"(6170页)。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8—9页。

63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神功元年"武懿宗军至赵州"条,6521页。

64 参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72—73页。

65 参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73页。

66 参本书所收拙文《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67 参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收在前引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95—102页。并请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50—151页。

68 参《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九月"勃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条,6798页。并请参两《唐书》新罗传。

69 参《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7页。然据《新唐书》同传:"渤海靺鞨掠登州,(新罗王)兴光击走之,帝进兴光宁海军大使,使攻靺鞨。"(6205页)是则新罗王先主动出兵,然后得军号。由于渤海袭登州利用的是黄海海贼,先与新罗发生冲突也是可能的。参(日)滨田耕策《新罗王权与海上势力——特别有关张保皋的清海镇与海贼》,收在前引《东亚史中的国家和地域》,454—455页。

70 参滨田耕策《新罗王权与海上势力——特别有关张保皋的清海镇与海贼》,455

—456 页。

㉑ 参本书所收拙文《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㉒ 参两《唐书》契丹传。

㉓ 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11—13页。

㉔ 《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3页。

㉕ 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5173—5178页;同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5198—5213页。并请参拙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华夏出版社,1996年;拙文《回纥的文化成就》,收在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50—265页。

㉖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1387页);《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1836页)。

㉗ 据研究,开元中期契丹内部发生了部落联盟领导权由大贺氏到遥辇氏的转换(参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50—53页)。与此同时,史料所见契丹人活动的中心也由营州地域转到了塞外饶乐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6年,1737—1740、1756—1761页)。显然,所谓领导权的转换实际是外蕃契丹崛兴的表现(参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第二节《可突于、涅里的变革与部落联盟的再建》,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它预示着将有更多的契丹部众将要卷入这一地域的文化整合运动。

㉘ 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12—16页;并请参本书所收《试论安史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及《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两文。

㉙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5—28页;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82—84页。

㉚ 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19—20页;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286—287页。

㉛ 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4—25页。

㉜ 《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下《突厥传》下:"始突厥国于后魏大统时,至是灭。后或朝贡,皆旧部九姓云,其地尽入回纥。"(6055页)同书卷二百十七上《回鹘传》上:怀仁可汗(?—747)"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6115页)以匈奴喻指突厥是唐人习惯。迄至中唐奚、契丹仍依附回鹘,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5—26页。

㉝ 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27页。

㉞ 历来都强调汉人教阿保机建立专制皇权(参松井等《契丹勃兴史》34—35页),这固然不错。但回鹘人及回鹘文化为契丹皇权建立所做的推动和铺垫同样重要。从阿保机佐命功臣的构成就可以知道,回鹘人在契丹建国过程中是与耶律氏及汉人三足鼎立的重要力量。本人拟另撰专文研



究这个问题。

㊑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结论《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335—341页。

㊒ 参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第四章第四节《汉人的北迁——辽帝国的强制开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58—265页；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第二章《农业生产萌生与农业人口的迁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3—34页。

㊓ 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为契丹故地，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在奚王牙帐，东京辽阳府（今属辽宁）统渤海故地，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西京大同府（今属山西）统原属中原王朝的幽蓟（燕云）十六州。

㊔ 两《唐书》地理志均说安东府"至德（756—758）后废"。据《续日本纪》卷二十一的记载，至德年间有安东都护王玄志斩参与叛乱的平卢节度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至德三载（758）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258页），这是载籍所见最后一任安东都护。参本书所收《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

㊕ 参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收在氏著《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255—256页；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收在氏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96—199、200—201页。

㊖ 参上引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252、259—261页；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198、201页。

㊗ 参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201页。

㊘ 现存史料没有提供契丹攻占辽东的细节（参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198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唐末和五代初契丹兵不血刃进入辽东"（参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255页以下）。

㊙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15页。

㊚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19页。

㊛ 参《辽史》卷二《太祖纪》下，19、21页。

㊜ 参《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均王乾化三年四月己亥条，8772页。

㊝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记载，平州917年已为契丹所据（8818页）。营州何时陷落不详，至迟到924年亦为契丹所据，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三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恃其强"条，8923—8924页。

㊞ 如（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三十九《后唐明宗纪》五记载天成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下引《旧五代史考异》指出："考平州自梁开平中刘守光以赂契丹，天成元年卢文进举其地以归于唐，至三年复为辽人所取，自是平州遂属于辽。宋人论石晋赂辽故地，兼及平州，盖未详考，今附识于此。"（534页）

㊟ 参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收在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64—276页。

㊠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31页；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收在《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7年6月，235页以下。

⑩ 参本书所收《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

⑩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25—44页。

⑩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契丹传》，6172页。

⑩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杨志诚传》，4675—4676页。

⑩ 参《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后唐武皇纪》下，360页。诸史记云州之会的年代不同，见《旧五代史》正文夹注，并请参前引松井等《契丹勃兴史》34页。

⑩ 除了沙陀之外，西北民族很少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这个问题需要另作专门研究。

⑩ 《旧唐书·北狄传》说："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5360页）《新唐书·北狄传》说："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6178页）新传的说法为旧传所谓"高丽别种"作了最好的注脚。国外有人借此妄说渤海为高句丽种或继高句丽国，其实均因不谙史实所致。大祚荣等亡奔旧国而非平壤，渤海建国很久以后高句丽旧地仍属唐朝辽东，都说明渤海为靺鞨所建而非高句丽复国。其实仔细考察渤海领地可知，其所据地主要仍是从前靺鞨诸部分布的范围，尽管有些地方曾在高句丽强大时被征服过。参《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渤海传》，6182页；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72—74页；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196—201页；（日）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16—17、22—23页。

⑩ 参本书所收拙文《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前引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14—15页。国外有因新罗曾称渤海"北国"而以为两者均继高句丽而南北分治。其实不称国名而以方位代称是一种蔑视的表示，新罗并不自称"南国"，日本史书中有渤海、靺鞨甚至高丽等多种名称，却没有以方位指代者。韩国史书《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曾遣使"北国"，据研究这是因为该书编成于王氏高丽（918—1392）时代，当时高丽以其宗主国金朝为北朝，基于这一立场，编书时就等而下之地把渤海写成了"北国"，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67页。

⑩ 参（日）金子修一《由唐朝看给与渤海名分的意义》，收在前引《东亚史中的国家和地域》，402—424页；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16—17页；马一虹《唐封大祚荣"渤海郡王"号考——兼及唐朝对渤海与高句丽关系的认识》，载《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⑩ （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3123—3124页。关于靺鞨七部的地域分布，参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收在氏著《探赜索隐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29—30页；张泰湘著《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收在氏著《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58—259页。

⑪ 参本书所收拙文《隋初与高句丽及

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

⑫《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黑水靺鞨传》,6178页。

⑬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世纪》说:黑水靺鞨"南接高丽,亦附于高丽,尝以兵十五万众助高丽拒唐太宗,败于安市。"(1页)显然是对《新唐书·靺鞨传》的误读,传云:"帝(唐太宗)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6178页)然而据两《唐书·高丽传》,所谓"北部"是指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与之相应的南部傉萨则是高惠真。靺鞨当时并无北部、南部之说,而且黑水靺鞨也不可能"南接高丽"。

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靺鞨传》,5358—5359页。

⑮ 干志耿认为:"实际上,靺鞨已形成两大集团,一为渤海都督府所辖,一为黑水都督府所辖。"见上引氏撰《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29页。

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室韦传》:望建河(今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又东经南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东流注于海。"(5385页)

⑰《金史》卷一《世纪》:"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太祖败辽兵于境上,获耶律谢十,乃使梁福、斡答剌招谕渤海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盖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1—2页)。女直即女真,避辽兴宗讳改。

⑱ 关于满族的发祥地学界意见不一致,参王钟翰《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收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4—35页。

⑲ 靺鞨刚自立,武后即封其首领为震国公等;中宗(705—710)即位又"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旧唐书·渤海靺鞨传》,5360页);玄宗先天二年(713)遣使崔忻"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新唐书·渤海传》,6180页)。崔忻出使凿井刻石发现于旅顺黄金山下,显示当时陆路仍有突厥、契丹作梗,唐朝出使渤海须走海路,参佟柱臣《张建章墓志考》,收人氏著《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73页。

⑳ 参前引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87页;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28—33页。

㉑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外臣部·征讨》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88年,11584页上栏。

㉒ 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28页。渤海国成立以后,中、日史料中单称"靺鞨"似多指黑水靺鞨,如日本《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渤海》上记载:"其国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在渤海国内将土人与靺鞨对举,土人为官,靺鞨为民,显然就是渤海与黑水的区分。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㉓ 参《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黑水

鞨传》,6178 页。

⑫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靺鞨传》,5359 页。

⑫⑤《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渤海传》,6180 页。

⑫⑥ 参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90—102 页;滨田耕策《新罗王权与海上势力——特别有关张保皋的清海镇与海贼》,454—455 页。

⑫⑦ 大武艺处理唐、渤关系的做法在渤海诸王中很反常。从他疑惧唐朝与黑水靺鞨交通是要对他作腹背夹攻,不听弟弟大门艺劝谏甚至派人入唐行刺门艺,不自量力进攻唐朝,乃至跨海偷袭山东登州等行径来看,很让人怀疑他心智健康有问题。

⑫⑧ 参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103—108 页;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38 页。

⑫⑨ 参前引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200 页。

⑬⓪ 参前引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255 页以下。

⑬① 据统计,自八世纪三十年代停战以后到九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八十余年间,新罗、渤海间的使者往来总共才三次。由于缺乏了解和恐惧,新罗人甚至把渤海人说成是长有长毛、锯齿、钩爪的食人生番,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137—140 页。

⑬②《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东京辽阳府兴辽县条下说:"唐元和中,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457—458 页)云云,据《新唐书·渤海传》的说法实际是"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国,开大土宇"(6181 页),并无南定新罗其事。

⑬③ 参马一虹《8 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载《文史哲》2001 年第 6 期,82—87 页。

⑬④ 参程尼娜《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⑬⑤ 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66 页。史料记载,东京龙原府为渤海通日本道的起点(《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渤海传》,6182 页),因而学界一般认为渤海迁都东京与发展同日本的联系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迁都东京也有利于改善与新罗的关系,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87—88 页。

⑬⑥ 参松井等著《契丹勃兴史》,13 页。

⑬⑦ 参(日)李成市《古代东北亚诸民族的对日本通交——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载《东亚的古代文化》1998 夏·96 号,大和书房,90—93 页;(日)铃木靖民《渤海国家的构造与特质——首领、生产、交易》,载《朝鲜学报》第 170 辑,日本奈良:朝鲜学会(天理大学内),1999 年 1 月,10—18 页;马一虹《渤海与唐朝的关系》,载《亚洲游学》1999 年第 6 期《渤海与古代东亚》特集,东京勉诚出版社,46—49 页;前引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中的渤海国》,425、438 页;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5—8、126、153 等页。

⑬⑧ 参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中的渤海国》,434—438 页。

⑬⑨ 参马一虹《八世纪中叶之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以 762 年渤海第六次遣日本

使为中心》,《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文学研究科)》第29辑抽印本,1998年3月。

⑭⓪ 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55、60—63、103—104、111、171、180等页。

⑭① 参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中的渤海国》,439—442页。

⑭② 参前引张泰湘著《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12、90页。

⑭③ 参张泰湘《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43页。

⑭④ (俄)奥克拉德尼科夫著,莫润先、田大畏译《滨海遥远的过去》,商务印书馆,1982年,218页。

⑭⑤ 参上引《滨海遥远的过去》,13—15、18—21、25—27、249—250、354—371等页;张泰湘《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16、50、73、327—330等页;林沄著《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440—445、452—473等页。

⑭⑥ 参张泰湘《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327页。

⑭⑦ 参前引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26—33页。

⑭⑧《辽史》卷七十五《耶律睹烈附弟羽之传》,1238页。

⑭⑨《辽史》卷三,30页。

⑮⓪ 见前引马一虹《8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87页。

⑮① 参本书所收拙文《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2000年暑期考察的初步报告》。

⑮② 参杨晹、袁闾琨、傅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

⑮③ 倭字在日语中与"大和"同音,训读作yamato,音译邪马台。参沈仁安《"倭"、"倭人"辨析》,收入氏著《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35—51页。

⑮④ 参沈仁安《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以及《早期日朝关系初探》,均收入上引《日本史研究序说》,192—217页。

⑮⑤《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2791—2792页。参本书所收拙文《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

⑮⑥ 如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东京校仓书房,1976年;同作者《白村江——东亚的动乱与日本》,东京教育社,1986年;西岛定生《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森公章《"白村江"以后》,东京讲谈社,1998年。

⑮⑦ 参马一虹《八世纪中叶之渤海与日本的关系——以762年渤海第六次遣日本使为中心》,261—281页;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49—53页。(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八记载,新罗圣德王三十年(731)夏四月有"日本国兵船三百艘越海袭我东边,王命将出师,大破之"(汉城景仁文化社,1994年,98页)。但日本史书对此却毫无记载,存疑。考虑到此时日本国情,对文献记载的这类战事有必要作认真分析。

⑮⑧ 参西岛定生《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120页以下;《(新订增补)续日本纪》卷二十一,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十二月戊申条,东京吉川弘文馆普及版,1997年,257—258页。

⑮⑨ 参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90—104、107—108、124—126、132—133、147—152、162—165、178—180、187—193等页;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

中的渤海国》，434—438页。

⑯ 古畑彻《环日本海诸"地域"间交流史中的渤海国》，439—440页；滨田耕策《新罗王权与海上势力——特别有关张保皋的清海镇与海贼》，464页。

⑯ 或许日本与新罗间的政治张力牵制了新罗向北越过大同江占据高句丽故地（唐朝安东府所领），但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论证。

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

——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陈寅恪先生在讲到唐朝周边诸族活动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时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安禄山之拥兵。——引者），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①唐蕃关系，影响可谓远矣！陈先生的论断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也看到，迄至唐高宗时期，同样是以关陇为本位的隋唐王朝，在经营西部的同时，也曾积极经营中国的北方和东北，其原因究竟何在？质言之，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古往今来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

传统的说法认为，高句丽与隋朝本来关系正常，只是589年隋平陈统一全国的形势对高句丽造成了威胁，双方才反目为仇。如《隋书·高丽传》："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高丽王）汤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同卷史臣曰："诸国朝正奉贡，无缺于岁时，二代（指隋文帝、炀帝父子。——引者）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②。《隋书》修于唐初，时论鉴于隋亡教训，所述未必客观公正。仅就"朝正奉贡"而言，即如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赐高句丽王汤玺书所说："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③此语信非虚妄。

近年的某些研究与传统说法有所不同。较早的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的《朝鲜通史》上卷第二章中说:“589年隋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高句丽还竭力维持与隋的和平友好关系,以避免战争。可是隋的统治阶层却热衷于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断对高句丽采取侵略行动。为反对隋的侵略行动,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有包括靺鞨族部队的一万余名高句丽骑兵进攻辽西,给敌人以重大打击。”④然而,迄至598年,所谓隋朝“不断对高句丽采取侵略行动”并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所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曾就《朝鲜通史》的上述说法批注道:是“高句丽先侵入辽西,如此提法未免太不公平”⑤。

日本学者在东亚史领域进行的各种“体制”研究(如所谓“册封体制”、“朝贡体制”、“羁縻体制”等)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⑥。香港学者黄枝连先生也认为:隋王朝“对高丽及其他半岛国家的征伐,显然是跟礼治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中,自亦掺杂着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⑦然而,要把对外战争与中国传统的礼治观念联系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传统的“大同观”认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⑧,两者完全是对立的。因此,人们在典籍中很容易找到诸如这样的反战议论:“且上古之时,大同之化,不独子子,不独亲亲,何隔华戎,务均安靖。洎皇道谢古,帝德惭皇,犹尚绥怀,不崇征伐,有占风觇雨之客,无越海逾山之师。其后汉武膺图,志恢土宇,西通绝域,北击匈奴。虽广获奇珍,多斩首级,而中国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号升平、君称盛德者,咸指唐尧之代,不归汉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复焉足比议?”⑨相反的说法却很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理论根据。况且隋唐两代均据关陇为本位,很难认为其东北之举为“体制”经营⑩。

也有人认为,隋唐伐高句丽与当时人主“好大喜功”有关⑪。可是,个人好恶毕竟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尽管君主可以决定开战与否,酿成战争的客观原因势必已然发生在先了。而且,如上所述,君主个人的这种品



质并不代表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恰恰相反，两者经常是矛盾对立的，例如唐太宗征伐高句丽，当时就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12]。无事生非、穷兵黩武成为一种时尚[13]的说法很难令人首肯。

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近比较趋于一致的是探讨隋唐与高句丽的政治利益冲突。如，韩国学者金荣焕认为："隋征伐高句丽的计划早已开始于文帝。它征伐高句丽表面上的理由是高句丽私下通使对隋朝造成的威胁。（然而）高句丽私下通使的真正目的乃是通过各种途径，阻挡中原统一，以图它本身的安全，所以引起了两国的战争"[14]。我国南京师范大学的刘进宝认为："唐太宗、高宗父子之征高丽，也和隋文帝、炀帝父子征高丽一样，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有多种原因，但贯穿始终的最主要一条原因，则是双方政治利益的冲突。不论是隋、唐政府，或者是北魏政府，都想以中原为根据地，实现全国统一。而高丽为了保持其政治利益，不被中原王朝政府所兼并、统一，总是千方百计地阻碍中原王朝统一全国。"[15]香港学者刘健明认为："及至隋平陈，天下一统，高丽恐怕隋朝行使宗主国的地位，不容许高丽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于是扩建军备，以谋反抗。"[16]

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普遍认为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始于隋平陈统一全国之后，而且几乎都认为正是隋统一全国的形势迫使高句丽图谋自保，很少有人在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冲突中考虑除半岛诸国以外其他东北部族的影响和作用。我认为，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其实是此前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矛盾冲突的继续；周隋之际，高句丽实际上已成为东北大国，是与突厥帝国和中原王朝鼎足而立的力量；在"高宝宁据营州"事件中，高句丽曾积极介入，力图进取，所以事定之后，它与隋朝的直接对抗便不可避免；唐继亡隋之业而灭高句丽所追求的仍然是一个"安全边界"，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17]。本文以下拟就这些观点展开论述，错误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隋以前高句丽拓展趋势概述

高句丽(亦作高句骊、高丽)族本为汉朝臣民,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次年设玄菟郡,下辖高句丽县(县治在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附近)[18]。公元前 37 年夫余王子朱蒙出逃高句丽之地,与汉廷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的侯国,由汉中央政府颁发印绶。然而,高句丽立国荒陬,南为半岛三韩,东限茫茫大海,只有向大陆拓展,尤其是富庶的中原王朝边疆是其最合适的发展方向。所以,自立国以后,历代高句丽王均奉行对外积极进取的政策,一有适当机会,即进击汉朝的辽东、乐浪郡,或出兵玄菟;遭到汉军的回击后,又再"乞属玄菟郡"。东汉末公孙度领有辽东,高句丽与之通好。238 年曹魏灭公孙氏后,高句丽东川王欲代之称雄,于曹魏正始(240—249)中遭到幽州刺史毌丘俭的毁灭性打击。西晋末年,中原大乱,高句丽趁此机会于 313 年攻取乐浪、带方两郡而复国。此后中国分裂,无暇四顾,又给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拓展提供了契机。

十六国时期,高句丽与兴起于辽西的鲜卑慕容氏所建诸燕为夺取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战。339 年,前燕(337—370)兵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山城),高句丽王钊(故国原王)被迫"乞盟",次年派"世子"朝燕。然而高句丽仍伺机进取,于是招致前燕的进一步打击。342 年,前燕徙都龙城(今辽宁朝阳),随即以两路大军出击高句丽,燕王慕容皝亲统四万大军出南道,攻破高句丽王城丸都(在今吉林集安通沟西),高句丽王钊单骑逃走,其母被掠为人质,宫室被毁。直到 355 年钊接受燕封官爵,才迎还其母。尽管这次打击使高句丽西向发展的努力再次受到重创,而且此后中国北方一度由前秦(350—394)统一,高句丽被迫转而南向,主要与半岛上的百济、新罗进行争夺,但却并未放弃其大陆拓展政策。

369 年,高句丽发兵二万南攻百济,反为百济军所败。371 年百济反



攻，倾全国兵力北上围攻平壤城，高句丽王钊战死，高句丽在南向发展中受挫。但是，383年秦王苻坚败于淝水之战，又使整个中国北方陷入严重混乱。正值此时，高句丽王伊连（故国壤王）于384年即位，第二年就又开始向大陆拓展，攻取辽东、玄菟两郡。后燕（384—407）慕容垂派其子率兵反击，将两郡收复[19]。可是后燕并非强国；而后来继位的高句丽王安（392—413）却是一代名王，高句丽史上称之为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他即位后凭借"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接连向邻近地区和部族进行大规模的拓展兼并。《朝鲜通史》上卷第二章写道：

> 391年（疑为392年之误。——引者）高句丽年轻的国王广开土王即位。如今尚留在辑安（今吉林集安。——引者）的广开土王碑（即《好太王碑》。——引者）对他的业迹有如下记载：他在位二十年间征服六十四个城和一千四百个村，西北过辽河，攻辽西；北方完全统一扶余的残存村落；在半岛（朝鲜）内攻打百济，接受一千名男女奴隶和一千匹细布的朝贡，并占领以汉江为界的百济领土；东南威胁新罗，以其王子为人质，并使其朝贡；还击退了侵犯洛东江下游伽耶族的倭贼。
>
> 在这些征服战争过程中，高句丽不仅扩张了领土，而且得到了很多胜利品、掠夺物和无数的牛、羊、马以及数万名俘虏。

据汉文史料记载，405年前后，高句丽大军跨过辽河，进击位于辽西的燕郡（今辽宁义县一带）。虽然后燕王慕容熙多次进行反攻，但王朝本身处于末年，已无力收复辽东失地[20]。从此，高句丽正式领有了辽东郡[21]。

战争也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交往形式。高句丽在大陆的拓展进取，极大地推动了高句丽人及其文化以各种形式向辽河流域甚至中原内地的流动和传播[22]。407年后燕鲜卑慕容氏被推翻，首先代之为王的竟然是高句丽人高云！据史料记载，高云的祖父高和为"高句骊之支庶"，因此，很可能属于高句丽王室的族人[23]；高云为"（慕容）宝之养子"[24]，据《晋书·慕容宝载记》："（慕容）会围龙城，侍御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余人袭会，败之"[25]，可见所谓"养子"关系不过是北方部族以亲兵为义儿的习俗

或制度[26]；高云称王以后，立即“复姓高氏”，表明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本民族意识。总之，高云得为燕王，反映出高句丽移民在当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不仅如此，据史料记载，率众拥戴高云而建立北燕（407—436）的冯跋，其“弟丕，先是因乱投于高句丽，跋迎致之，至龙城，以为左仆射、常山公”；冯跋死，“弟弘杀跋子翼自立，后为魏所伐，东奔高句丽”[27]。关系如此密切，十分耐人寻味。

427 年，广开土王的儿子长寿王（413—491）将都城移至平壤。一般认为，他这是“鉴于先世向西发展多次受重创的教训，时北魏又日益强大，统一朝鲜半岛成为其政策的重心”[28]。迁都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还可以继续讨论。如前所述，高句丽王钊（故国原王）已将争夺重点转向半岛，但却并未迁都；而如下所见，迁都以后，高句丽也没有放弃其大陆拓展政策。有利于战略防御的地理环境，也有可能是迁都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说高句丽迁都是“鉴于先世向西发展多次受重创的教训”，恐怕不确，此后发生的“冯弘事件”就是明证。

418 年，北魏征伐北燕，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灭北燕战争。据研究：“425 年高句丽始遣使入魏，显然于东北的局势有关。到了 30 年代，北魏的攻势加强。432 年，魏世祖（太武帝）亲伐北燕；435 年，派遣李敖到高句丽，册封长寿王，同时还负有告诫高句丽切勿介入战争的使命；翌年，再度遣使告谕高句丽。紧接着，魏军攻灭北燕。但高句丽并没有因为北魏的事先告诫而保持中立，反而派遣数万大军迎取燕王冯弘一行，并将燕都和龙大掠一空，从而形成与北魏正面对抗的局面。”[29]

此后尽管由于北魏的强大，高句丽很难涉足辽西，但却一直未能停止其在大陆的拓展和进取。如，398 年广开土王曾“遣偏师”进攻其东北的挹娄（即肃慎靺鞨系民族），迫使其“朝贡论事”[30]。五世纪下半叶，挹娄后裔勿吉兴起反抗，于北魏孝文帝延兴（471—476）中及太和（477—499）初两次遣使北魏：“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



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31]。据《魏书·百济传》记载，延兴二年(472)百济确曾遣使北魏请求派兵讨伐高句丽[32]，因而可以相信勿吉使者的说法属实。又据《北史·契丹传》："太和三年(479)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干(今内蒙古兴安盟一带)以分之。契丹旧怨其侵轶，其莫贺弗勿干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内附，止于白狼水(今辽宁大凌河)东。"此事发生在475年高句丽大败百济(陷其都，杀其王)[33]之后，可见高句丽的对外发展完全是相机而行，其在半岛和大陆的活动很难截然分开。494年，高句丽在同勿吉的激烈争夺中，又将从前的藩属之国夫余彻底归并，纳入自身统治之下，于是，存在长达六百余年的夫余国至此灭亡[34]。

论者有以统计史书记载中原王朝与半岛各方通使次数之多寡来比较其关系之亲疏[35]，不失为研究中获得参考指数的方法之一。但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毕竟是随机性很大的人而不是机械的物，通使多寡的原因很多，未必能直接反映各方关系的实质；况且，众所周知，流传至今的各种史料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许多偏见、谬误和缺漏不足，所以，用科学的方法考证史料(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换言之，能作定量研究固然不错，但在历史研究中，定性研究往往比定量研究更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定性。除了掌握基本史实之外，历史现象(制度、事件、人物等)的性质往往要在超出其直接发生范围的更长时间、更大空间中去考察才能判断。例如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就是如此，高句丽立国本身就与空间拓展密切相关，尽管其发展的侧重点可能因时而不同，但却从未停止积极进取，尤其是在大陆方面，几乎利用了所有可能的机会。以往在研究古代中原与东北的关系时往往忽视高句丽的主动性和进取性，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引起注意的。

二、高宝宁据营州始末

有的研究者认为：五世纪末叶，"北魏外求和平，内行改革与高句丽

弃西进转南下的政策，在国际关系上形成一致，给双方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于是，双方的关系进入了稳定友好的时期，并历经北齐，一直保持到隋朝建立为止”[36]。我们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南北朝（420—589）后期，中国北方相继有东魏（534—550）、北齐（550—577）和西魏（535—557）、北周（557—581）的对立，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东北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周边国家、部族更加活跃起来，在东北，主要有突厥、契丹、高句丽、靺鞨等。草原上的突厥汗国（552—630）倚仗其强盛，凌驾于分裂对立的北方各小王朝之上，并在对立各方之间上下其手，突厥可汗成了北部中国的太上皇。与此同时，地处东北的高句丽也进一步扩展势力，先是征服了邻近的白山靺鞨，既而又利用契丹与突厥的矛盾，役属契丹，从而成为在东北亚与突厥抗衡的力量。

然而，北周和隋朝（581—618）相继进行的统一北方事业，打破了东北亚的地区政治均衡。突厥力图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高句丽则意图借中原政治动荡之机介入辽西，于是双方捐弃前嫌，一起参与支持中原地方分立势力的活动。“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营州（今辽宁朝阳）即十六国诸燕所据龙城，又称柳城、和龙、黄龙[37]，其地位于辽西走廊，北通契丹、靺鞨，东接高句丽，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北齐书·高保宁传》不长，此录其全文如下：

> 高保宁，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武平（570—576）末，为营州刺史，镇黄龙，夷夏重其威信。周师将至邺，幽州行台潘子晃征黄龙兵，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羯万余骑将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发蓟，又闻邺都不守，便归营。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书。范阳王（高）绍义在突厥中，上表劝进，范阳署保宁为丞相。及卢昌期据范阳城起兵，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之。至潞河，知周将宇文神举已屠范阳，还据黄龙，竟不臣周。



本传高保宁即高宝宁[38]，传中"靺羯"即靺鞨[39]。问题在于，据《隋书·高祖纪》等史料，高宝宁最终败于开皇三年（583）隋军进讨，而本传止于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神举屠范阳，远不足以反映其生平事迹；而传文本身也过于简略，仍有若干晦昧不明之处。故有必要对本传略作笺疏补正，以明史实真相：

（一）所谓"夷夏重其威信"中的外夷，从本传上下文看是指契丹、靺鞨，其实并不这么简单。《北史·契丹传》略云：契丹自天保四年（553）九月遭北齐"文宣帝亲戎北讨，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584），率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而据同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木杆可汗"俟斤又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抗衡中国"，此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系于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换言之，自绍泰元年至开皇四年（584）的三十年间，契丹实际是高句丽藩属，主要听命于高句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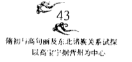
再看所谓"靺鞨"。《北史·勿吉传》略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以至于（北）齐，朝贡不绝。隋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关于靺鞨七部分布的具体地点，学界迄今尚无统一看法[40]，但粟末与白山两部距中原地区最近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其国南边东有高句丽，西有契丹，这种地理上的"悬隔"使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受到与高句丽、契丹关系的很大影响。

由于靺鞨七部"不相总一"，从各部的相对位置来看，隋初"与契丹接，每相劫掠"的只能是地处最南的粟末部；同时，史料记载该部又"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这表明当时它在政治上与高句丽也处于对立状态，从而使其与中原地区完全"悬隔"。这种状况也从另一侧

面显示出当时契丹与高句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白山部的情况却不同。由于粟末部既与西面的契丹又与东面的高句丽邻接，白山部在粟末东南，故仅与高句丽邻接。据《旧唐书·靺鞨传》：“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新唐书·黑水靺鞨传》略云：“白山本臣高丽。帝（指唐太宗。——引者）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今辽宁盖县。——引者），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41]那么，靺鞨白山部是什么时候臣附高句丽的呢？就笔者管窥所见，至少可以追溯到398年高句丽广开土王“遣偏师”进攻挹娄，挹娄部落被迫屈服，“朝贡论事”。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挹娄后裔勿吉、靺鞨仍经常受其调遣，随高句丽兵进攻新罗、征伐百济，并“侵辽西”[42]。当然，我们也看到，文献中记载公元五世纪下半叶挹娄后裔勿吉曾兴起反抗等等。由此可见，由于靺鞨诸部“不相总一”，对于有关靺鞨活动的各种史料应当具体分析。可以认为，那些与高句丽在政治上通谋联合的行动，多半属臣附高句丽的白山部所为，也只有他们能在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内通行无阻。

当然，除契丹、靺鞨外，营州相邻外夷还有突厥和高句丽。突厥与北方各小王朝关系的性质已如前述。北朝后期，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相当密切。《北史·高丽传》略云：“及齐受东魏禅之岁，遣使朝贡于齐。齐文宣加（高丽王）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如故。天保三年（552），文宣至营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成死，子汤立。乾明元年（560），齐废帝以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周建德六年（577），汤遣使至周，武帝以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受禅，汤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值得注意的是，建德六年为周灭齐之年，“辽东王”与“高丽王”的不同可能反映了某种关系变化[43]。另外，隋文帝受禅时，高句丽来使并非朝贡！而《隋书·阴寿传》说：“时有高宝宁者，齐



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可见在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发展中，高宝宁曾长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本人与高句丽的关系由此可想而知。本传说“夷夏重其威信”，《隋书·阴寿传》写作“甚得华夷之心”，良有以也。

（二）关于“周师将至邺，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如前所述，周隋之际，契丹实际是高句丽藩属，而能够跨越“悬隔”与契丹一道介入中原事务的靺鞨也非臣附高句丽的白山部莫属。因此，这里所谓“契丹、靺鞨万余骑”实际上都是高句丽兵力或受高句丽派遣的军队。考虑到高宝宁久镇黄龙的背景，他引高句丽势力为外援完全是有可能的。和我们讨论有关的是，此时中国北方尚处在统一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高句丽的压力和威胁，高句丽竟出动大军进入长城到了北平（今河北卢龙），这决不单是受高宝宁勾引所能解释的，当然也不可能说成是受到威胁时的防御性作战。我认为，问题的主要原因还在高句丽自身，在于其拓展势力的需要。隋代周以后，突厥沙钵略可汗曾借口自己“是北周的女婿，眼看隋帝篡周而不能惩罚，还有什么脸面见妻子！”而起兵和高句丽支持下的高宝宁一道进攻隋朝[44]，那显然是出于对中原强大起来的恐惧，企图以支持分裂势力来阻挠中国统一。而在周齐战争之际，高句丽未必能预见到经过长期分裂的中国即将统一，它不过是想趁中原内战混乱之机有所作为，扩展自己的势力。总之，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的还是高句丽的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防御。

（三）所谓“周帝遣使招慰，不受敕书”，“竟不臣周”。据《隋书·阴寿传》的说法是，高宝宁“及齐灭，周武帝拜为营州刺史，甚得华夷之心。高祖为丞相，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其中高祖指隋文帝杨坚，580年周宣帝死后矫诏任大丞相辅政。说高宝宁因杨坚篡政而造反，显然不实。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很重要，即高宝宁有可能在北齐灭亡后一度归降北周。据史料记载，自577年二月周灭齐，至同年十二月高宝宁自黄龙向逃到突厥的齐宗室高绍义劝进[45]，中间尚有十个月的时间。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高宝宁降而复叛呢？我以为就是前面提到的，周灭齐，高句丽王汤遣

使来，却受封辽东王而不是高丽王，影响了双方的关系。高句丽转而支持高宝宁降而复叛，这就是史料所谓“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的由来。

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高句丽军队本身还直接参与了与北周的对抗。朝鲜《三国史记·温达传》略云：“温达，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诸军乘胜奋击，大克。及论功，无不以温达为第一。王嘉叹之曰：‘是吾女婿也。’备礼迎之，赐爵为大兄。由此宠荣尤渥，威权日盛。”[46]平冈王即汉籍所谓“高丽王汤”。据研究，这段记载中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其实就是《周书·宇文神举传》所载宣政元年(578)周武帝亲征北伐，虽中道崩殂，而其部将宇文神举兵屠范阳之事[47]。此即《北齐书·高保宁传》中“卢昌期据范阳城起兵，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一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陈宣帝太建十年(578)“齐范阳王绍义闻周高祖殂”条作：“高宝宁帅夷、夏数万骑救范阳”。可见高宝宁所倚确为高句丽势力。

(四)关于高宝宁与突厥的关系。高宝宁据营州叛乱，主要有以下事实[48]：

1. 577年十二月，高宝宁自黄龙向在突厥的高绍义上表劝进，绍义遂称皇帝，改元武平，以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助之。

2. 578年闰六月，卢昌期起兵据范阳迎高绍义，周将宇文神举克之，绍义逃回突厥；高宝宁率夷、夏数万骑来救，至潞水(今北京通州附近)，闻昌期死，还据和龙。

3. 580年七月，北周与突厥和亲，遂得引渡高绍义；次年隋代周，突厥沙钵略可汗起兵和高宝宁一道进攻隋朝。

4. 582年五月，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今河北卢龙)，突厥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关于上述第一件事，《北齐书·范阳王绍义传》的说法是：“高宝宁在营州，表上尊号，绍义遂即皇帝位，称武平元年。以赵穆为天水王。佗钵闻



宝宁得平州，亦招诸部，各举兵南向，云共立范阳王作齐帝，为其报仇。”高宝宁起兵在先，突厥招诸部在后，显然，高宝宁并非突厥势力。由上述第二件事中的“夷、夏数万骑”可知，高句丽及其属部契丹和白山靺鞨的骑兵一直是高宝宁的主力。关于上述第三件事，《隋书·北狄突厥传》的说法是：“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今河北秦皇岛附近）。”仍是高宝宁作乱在先，高宝宁与突厥仍为两种不同的力量。

由此可见，高宝宁在这一时期东北亚的势力重新组合中仍然代表高句丽势力，他与突厥的关系反映出这一时期高句丽与突厥的合作，而不单是地方分立势力对突厥的投靠。所以高宝宁并未进入突厥治下，突厥与中原改善关系也未能改变其命运，如高绍义那样。高宝宁与突厥确实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以至于 580 年尉迟迥反抗杨坚时，“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49]。我认为这种特殊关系就在于他作为中原王朝的反叛势力，同时又是高句丽与突厥沟通的中介。高宝宁的这种地位是在周隋之际这种特殊时期形成的，他终归要被历史抛弃，因为他并非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东北亚的几大政治势力最终要直接相对。

（五）关于高宝宁之死。583 年夏四月，隋文帝派兵分八道出塞讨伐突厥，他在诏书中斥责突厥“将人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日之恨”[50]，指出隋朝对突厥战争的根本原因，可谓一针见血。依靠高句丽、勾结突厥而割据营州的高宝宁当然也在劫难逃。《隋书·阴寿传》详细记载了消灭高宝宁的经过：“至是，令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今河北卢龙）以讨之。宝宁求救于突厥。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宝宁弃城奔于碛北，黄龙诸县悉平。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遣其子僧伽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日乃退。寿患之，于是重购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模、王威等。月余，世模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高宝宁求援突厥而不得，“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说明他直到最后也是得到高句丽支持的。第二是他最后死在契丹

而不是逃往高句丽，为什么?如前所述，契丹此时为高句丽属部，死在契丹或高句丽本无不同。然而，与当年北魏灭北燕时高句丽以数万大军迎燕王冯弘的事件相比，高宝宁的结局还是有差别的。我认为，在面临灭顶之灾时，高宝宁未必不想逃亡高句丽，他最后仍“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就是明证。不过，他很可能受到了已被隋朝收买的亲信部下的阻挠。据《隋书》有关传记的记载，赵世模、王威归降后都受到了重用[51]。而当年冯弘奔高句丽后受尽屈辱，仅两年即被高句丽人所杀[52]；“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53]，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前车之鉴。最后，考虑到南北朝时期家族在北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怀疑杀死高宝宁的赵修罗很有可能就是已经投降隋朝的赵世模的族人。

本节最后，想就高宝宁的出身谈谈看法。如前所述，《北齐书》本传说他“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隋书·阴寿传》则说是“齐氏之疏属”。《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采用“齐之疏属”的说法。其实这两种说法差不多。高齐皇室所谓的“渤海高氏”出身本来就是伪托，作为其“疏属”当然就更“不知其所从来”了。但是，从其“久镇和龙，甚得夷、夏之心”的情况来看，我认为高宝宁本人倒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高句丽移民后裔。我们前面提到过，受冯跋等人拥戴取代后燕称王的高云就是一个高句丽人，由此可见当时高句丽移民在当地势力之大。而高宝宁之所以称为“代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出于他对高齐皇室的攀附，因为众所周知，高齐皇室起家代北怀朔镇，有所谓“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之说；另一种可能就是高句丽移民到了代北，这更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有必要另作研究。

三、隋平高宝宁的意义和影响

正如《隋书·阴寿传》所说，高宝宁被消灭以后，“北边遂安”。北部中国的统一完成了，这意味着东北亚的政治形势乃至整个中国的形势都将



发生巨大的变化。

先看契丹。据《隋书·高祖纪》，就在隋平高宝宁的第二年即开皇四年(584)，“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隋书·契丹传》又说：“(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总之，契丹开始逐步摆脱高句丽的控制。

再看靺鞨。如前所述，白山靺鞨至唐初仍臣附高句丽，故不在讨论之列。其他诸部，“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54]。从《隋书·高祖纪》的记载来看，靺鞨最早是开皇元年秋七月来贡方物，以后中断；而至开皇三年夏四月隋平高宝宁后，五月、八月及翌年八月连续有靺鞨贡方物[55]。显然，靺鞨与中原的关系受到了新形势的积极影响。《隋书·靺鞨传》说：“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靺鞨与契丹的关系应当也有所改善。

突厥的变化更大。与隋朝建立适在同年(581)，突厥前四汗[56]中的最后一位可汗佗钵病死，后继者互不相让，突厥汗国出现了五可汗并立的混乱局面。隋朝和亲使长孙晟侦知内情，遂献计对突厥诸部实行“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反间既行，果相猜贰”[57]，加上隋朝的军事打击，到583年末，突厥正式分裂成了东、西两个汗国。两个突厥汗国纷争不已，互相攻击，战火连绵不断。双方都派使者到长安向隋朝请和求援，被隋文帝一概拒绝[58]。

584年秋天，突厥沙钵略可汗屡遭兵败，转而向隋朝请求和亲。北周的千金公主也向隋文帝上书请改姓杨，愿意做隋文帝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才同意派使者去沙钵略处，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意思是赞许她能大义灭亲。585年七月，突厥沙钵略既为西边的达头可汗所困扰，又害怕东边的契丹乘机进逼，遣使向隋朝告急，请求把所属部落迁到漠南(泛指今内蒙古草原，因其地处大漠即大戈壁之南，故名)，寄居白

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南傍长城脚下,倚隋朝为后盾。隋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命当时驻守在太原的晋王杨广率兵接应支援,供给突厥衣服粮食,赐予沙钵略隋朝的官服仪仗。沙钵略大喜过望,于是约定和隋朝以大碛(即大漠,今中蒙边境一线)为界,还上表给隋文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并派儿子库合真入朝。同年八月,库合真到长安,隋文帝下诏宣布:"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家。"因而下令祭祀天地祖宗,向天下宣告这件大事;今后凡是颁赐给沙钵略的诏书,和隋朝其他大臣一样,不再称他的名字。沙钵略非常高兴,从此每逢年节贡献不断。586年正月,隋朝向突厥颁发历法,表明自己是突厥正统合法的统治者[59]。这种关系基本上保持到了隋朝后期。

我们看到,隋朝对突厥关系的变化是为了改变南北朝后期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受压迫状况的结果;隋朝平定高宝宁也只是要维护前朝已有的权益。隋朝并没有想兼并统一高句丽[60],所以,当文帝受禅高句丽来贺时,隋朝即进授其王为大将军,并将其由北周所封的"辽东王"改封为传统的"高丽王","自是,岁遣使朝贡不绝"[61]。但是,隋朝统一北方所引起的东北亚政治关系变化势必要影响高句丽的利益。除非高句丽舍弃其大国地位、停止进取努力,它与中原王朝的直接冲突便在所难免。历史发展的结果正是如此。例如:

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赐高句丽王玺书[62]略云:"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骋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63]可见当时高句丽仍竭力维持其在东北的大国地位;但隋与高句丽冲突的原因并不是统一形势,而是高句丽在东北(包括隋朝边疆)的拓展逞强。果然,第二年便有高句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64],



首先挑起了战端。请注意，这里高句丽王是“率靺鞨之众”，仍为大国无疑。

其实，在隋代并非尽如后来唐人总结隋亡教训时所谓因“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65]。还是有人看到了高句丽在东北拓展进取的严重性，如大臣陆知命就曾诣朝堂上表，指出当时“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66]。而且，尽管开皇十八年(598)由于隋朝大军压境，高句丽王元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从而使得隋朝罢兵[67]，其实他并未甘心。至炀帝时，高句丽王元甚至遣使已经臣服隋朝的突厥启民可汗，想建立新的反隋联盟[68]，这才引发了隋伐高句丽的大战。

四、结　语

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的变化，人们不难发现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进取性，这些特点过去由于过分强调中原王朝的作用而被忽视了或重视不够，从而影响了研究者对历史真相的认识。

以关陇为本位的杨隋王朝(李唐王朝也一样)之所以曾大力经营东北，既不是为兼并扩张，也不是要穷兵黩武，而是因为“高丽小竖，狼顾燕垂”，边疆不稳，社会难安。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这样记述说：“6世纪末、7世纪初，隋唐王朝先后统一了全国大部分疆土，对肆意扩张、不听劝解、进而向辽西拓地的高句骊，曾多次倾全国之师进行征讨，高句骊国终于在668年被唐与新罗联军所破灭。”[69]我认为，这种提法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注释：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33页。

②（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82年，1815、1829页。

③ 同上书，1815页。

④《朝鲜通史》上卷（贺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28—29页。

⑤ 见笔者获周一良先生赠所藏《朝鲜通史》上卷第29页批注。

⑥ 参《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收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21页注5;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同前引《唐研究》第一卷,227—244页

⑦ 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44页。

⑧《隋书》卷八十一,1829页。

⑨《旧唐书》卷一百三,3189页。

⑩ 不同的意见见前引韩昇文。

⑪ 参前引刘健明文223页注26;前引黄枝连书,53—54页。

⑫ 参(唐)吴兢《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63页以下;刘进宝《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39—40页。

⑬ 参前引刘健明文210—211、216、220页。

⑭ 见金荣焕《隋唐时期对外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唐代学会会刊》第五期(台北,1994年),23页。金本人为韩国明知大学校人文大学史学科讲师,又在读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所以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⑮ 同前引刘进宝文,40页。

⑯ 见前引刘健明文,219页。

⑰ 如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欲亲征高句丽,"群臣皆劝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以取下,释近而之远,三者为不祥,伐高丽是也。然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国之人延颈待救,议者顾未亮耳'"(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6189页)。其实恐怕是因为作为高句丽"西部大人"的盖苏文更桀骜不驯。

⑱ 参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66页。本文以下有关汉晋时期高句丽历史的叙述,除特别注明外,均参此书。

⑲《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3112页。

⑳《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熙载记》,3106页。

㉑ 同上注。并参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64页注2。

㉒ 例如,据《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盛载记》:"盛率众三万伐高句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余户于辽西。"(3103页)

㉓ 见《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云载记》,3108页。按史书惯例,以国名或族名名家者即其王室。

㉔ 同上。

㉕ 同上引《晋书》卷一百二十四,3096页。

㉖ 参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收在《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文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69—270页。

㉗《晋书》卷一百二十五《冯跋载记》,3132、3133页。

㉘ 同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64页。

㉙ 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㉚ 参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81页。

㉛《魏书》卷一百《勿吉传》,2220页。

㉜ 同上书,2217—2218页。

㉝ 参上引《朝鲜通史》上卷第二章,19—20页。

㉞《魏书》卷一百《高丽传》引其使者语:"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涉罗为百济所并,国王臣(高)云惟继绝之义,悉迁于境内。"(2216页)参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62页。

㉟ 例如前引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

㊱ 同上引文,40页。

㊲《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成帝咸康八年冬十月"燕王皝迁都龙城"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3049—3050页。

㊳ 见陈仲安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46页。

㊴ 前引《中国民族史》第四编第六章第一节《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中说:"靺鞨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写。"(409页)

㊵ 参同上注409页及同页注3。

㊶ 高惠真为白山部而非黑水部,参王承礼著《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3—14页。

㊷ 参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81页。

㊸ 从历史上看,辽东为中原王朝属地。所以,开皇十八年(598)隋朝大军压境,高句丽王元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见《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1816页。

㊹《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突厥佗钵可汗病且卒"条,5450页。

㊺《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5375、5383—5384页。

㊻(朝鲜)金富轼撰《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五,古典刊行会,昭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叶13—15。

㊼ 见韩昇《隋と高句丽の国际政治关系をめぐって》,收入《崛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3月31日发行,355页。不过,检查韩文所用史料,尚有可补充之处,如有关宇文神举屠范阳前后的事件,较详细的记载见于《北齐书·范阳王绍义传》而非《周书·宇文神举传》;又如研究高宝宁生平,不能不参考《隋书·阴寿传》,等等。

㊽ 此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五。

㊾《周书》卷二十一《尉迟迥传》,351页。

㊿《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1866页。参《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5463页。

(51) 参《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传》,1534页;同书卷七十《赵元淑传》,1621页。

(52)《晋书》卷一百二十五《冯跋载记》,3133页。参《魏书》卷九十七《海夷冯跋传附冯文通传》,2128—2129页。

(53)《魏书》卷一百《百济传》,2218页。

(54)《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靺鞨传》,1822页。

55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15、19—21页。

56 突厥汗国(552—630)建立早期保持着汗国统一的四位可汗,即:土门可汗(552—553)、乙息记可汗(553)、木杆可汗(553—572)和佗钵可汗(572—581)。

57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5451页。

58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五,5465页。东汗国在史书中仍被称作突厥(552—630),也常称作北突厥,与西突厥(583—657)相对,并与后来复兴的东突厥(682—745,学术界又称之为突厥第二汗国)相区别。

59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5475—5476、5482—5483页。

60 这应当是隋朝两代未能征服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深入研究。香港学者刘健明认为原因在于隋炀帝好大喜功,求"不战而胜"(见前引刘载《唐研究》文),恐有未谛。

61 《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3115页。

62 据《三国史记》卷十九,高句丽本纪第七平原王本纪,叶11:此事"是开皇十年。《隋书》及《通鉴》书高祖赐玺书于开皇十七年,误也。"然《三国史记》本身在纪年方面也不无问题,如据卷19叶7、9、11,平冈王实为阳冈王长子,后继其父为王,在位三十二年而薨;而卷45叶15却说阳冈继平冈为王。孰是孰非,尚须考证。

63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1815—1816页。

64 同上,1816页。

65 《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刘炫传》,1721页。

66 《隋书》卷六十六《陆知命传》,1560页。

67 同63。

68 《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1875页。

69 同前引《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167页。

隋、唐两代伐高句丽比较研究

于赓哲

（武汉大学历史系）

隋唐对高句丽进行了多次征伐，战况激烈，影响深远，藉陈寅恪先生之语则是“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倾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①。

关于这场战争，前人论著丰富，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岑仲勉《隋唐史》、金毓黻《东北通史》、金宝祥《隋史新探》、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朝鲜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黄约瑟《薛仁贵》、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潮《高句丽考古学研究》等著作，以及刘健明②、韩昇③、王小甫④、解如智⑤、刘进宝⑥、夏应元⑦、蔡靖夫⑧、铃木靖民⑨、菊池英夫⑩等人的论文，从各个角度对于这场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原王朝与半岛三国、日本、突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隋唐伐高句丽过程的比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唐朝是如何吸取隋朝教训的，又是如何走上了隋朝老路而碰壁的，然后又进行了怎样的调整，中原王朝与新罗的关系在此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不但与这场战争本身有关，同时也是未来数百年影响东北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隋唐军队在辽东的共同困境与对策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⑪

诚如陈先生所言，辽东地区有着与其他地区不同的地理状况和气候特点，隋唐对高句丽的战争多次失利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

（一）辽东地区特有的地理和气候

辽河流域分布着宽阔的沼泽。《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条记载太宗到达辽泽时的状况："泥沼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宋代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12]中比较具体地谈到了辽河沼泽的情况："第二十三程，自显州九十里至兔儿涡。第二十四程，自兔儿涡至梁鱼务……离兔儿涡东行，即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有河）名曰辽河，濒河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北辽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丽，路皆由此。夏秋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致行。"同书所载金人王成榷著《青宫译语》对同一地段也有记载："初七日过兔儿涡，初八日渡梁鱼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裳，地狱之苦无加于此。"

据岑仲勉考证，梁鱼务是辽金地名，位置接近隋唐之怀远镇（今辽宁北宁）[13]。我们知道，隋军大业八年（612）第一次伐高句丽就是从这里出发的[14]，所以《行程录》所云"隋唐征高丽路皆由此"是可信的。通过《行程录》、《青宫译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恶劣，以至于被称为"地狱之苦无加于此"，那么可以想见隋唐军队在其中跋涉的艰难。这样的地理势必严重影响行军和后勤补给。

另外，辽东地区的气候也是来自中原的军队难以适应的。辽宁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 5—10℃，秋季（9—10月）降温迅速，省内各地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由北向南先后见初霜，冬季则气候干冷，为期漫长，1 月平均气温除辽南沿海在 - 4— - 9℃外，其他各地均在 - 10— - 17℃。极端最低气温辽东山区一般为 - 35— - 41℃，大连地区最高，在 - 25℃左右；其他地区在 - 25— - 35℃之间[15]。而内地



呢?以长安所在陕西关中为例,年平均气温 11—13℃;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3—1℃。与辽宁比较起来明显温暖[16]。这是现时状况,而六世纪末到十世纪初的中国气候正处在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7]根据传世文献所载物候学特征做了论述。那时虽然辽东地区气温可能比今天为高,但是气温高低起伏全国应该大致同步,内地与辽东的温差大概如同今天一样大,那么对于来到辽东的内地人来说,不适感照样存在。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十九年九月条有这样的记载:

> 上(太宗)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从辽东撤退后),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陈寅恪先生在上揭《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以此指出唐军必须在冬季到来前结束战斗:"至太宗虽经寒暑不肯易弊褐一事传为美谈,实则太宗明知此役利在速战速决,若至秋季不能复衣褐袍之时,无论成败如何,断不能不班师归来,与太子相见。故不妨先作豪语,以收人心,斯亦英雄权谲之一端欤?"

正如陈先生所言,中原军队无法适应辽东的寒冷,必须要在冬季到来前结束战斗。我们来看看中原军队一旦滞留到冬季会发生什么情况: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在解释自己从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下撤退的原因时说:"安市不降,平壤尚远,我虑三军寒冻,已命班师"[18]。冬十月,当唐军从安市城下撤军时遭到低温袭击:"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19]。更印证了太宗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龙朔二年(662)正月,苏定方部队已经攻到平壤城外围,而沃沮道总管庞孝泰所部遭到盖苏文袭击,庞孝泰所部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和《册府元龟》卷三百七十三《将帅部·忠四》记载为岭南"水战之士",耐寒能力自然比其他部队为低,盖苏文亲自来战大概正是以其为唐军薄弱环节以求首先击破之。此役庞孝泰并十三子全军覆没,导致形

势急转直下，而且此时又开始降雪，苏定方不得不尽弃前功，撤离平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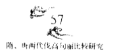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寒冷对于中原军队来说是个“劲敌”，它束缚了隋唐军队的手脚，导致作战周期缩短，主动权往往被高句丽掌握。他们只要能够把战争拖到冬季就等于赢得了胜利（下面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看到最后攻灭高句丽的战斗跨越了冬季⑳，但是那时候的高句丽内外交困，已经不复当年之勇，在它实力还比较强大时，“寒冷”自然是它抗御隋唐军队的得力“盟友”。

（二）高句丽三位一体的防守战略

以上我们看到，隋唐军队面临同样的困境，那就是沼泽导致的补给困难和早寒气候对作战时间的局限。高句丽则对此加以充分利用，采取了堡垒战加运动消耗战的战术，以求把中原军队拖入冬季，或者将粮食耗尽。这个战术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充分扬长避短，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高句丽对付中原军队的一贯方针。《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新大王》：

> （新大王）八年（公元172年，东汉熹平元年），汉以大兵向我。王问群臣战守孰便。众议曰：“汉兵恃众轻我，若不出战，彼以我为怯，数来。且我国山险而路隘，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当者也。汉兵虽众，无如我何，请出师御之。”答夫曰：“不然。汉国大民众，今以强兵远斗，其锋不可当也，而又兵众者宜战、兵少者宜守，兵家之常也。今汉人千里转粮，不能持久。若我深沟高垒，清野以待之，彼必不过旬月，饥困而归，我以劲卒薄之，可以得志。”王然之，婴城固守，汉人攻之不克，士卒饥饿引还，答夫帅数千骑追之，战于坐原，汉军大败，匹马不反。

此后数百年，辽东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军事要塞，一直沿用到隋唐时期。这一点已被考古勘察所证实。关于高句丽古堡的分布可以参看日人东潮著《高句丽考古学研究》相关内容㉑，此不赘言。我们重点看一下其内



部构造特点，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的构筑特点及其特殊规律》[22]介绍说："几乎所有的高句丽山城，都极少见规范的街肆、里坊布局或官署建筑，而多数为军队屯戍一类的半地穴式建筑或石砌的带火坑的简易住宅"，并且大多有储粮的窖址和人工凿就的、多与自然水源相连的蓄水池，大城周围多拱卫以众多小城。而大城的位置往往在交通线附近的山地上。

没有官署建筑、没有规范的街肆里坊、外围多有卫星城拱卫，而且还多数建筑在山地，说明这些古堡不是"城市"，只可能是军事要塞。里面平时大概没有多少居民，到了战时，周围居民临时入城聚守。例如《周书》卷四十九《异域·高丽传》记载平壤城规制："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这是我国北朝时期的平壤。该城在平原王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号称"长安"[23]，这种战术自然不可能继续沿用，但是辽东地区的山城呢？根据上揭王绵厚论文来看，到唐时仍然保留着军事要塞的原貌。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种"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的战术在这些地方依旧遵行。例如安市城，根据金毓黻先生实地踏勘，其城规模不大，"循山为垣，周不及十里"[24]，但是这座小城在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围攻时竟然有众十万[25]，其中必然有大量临时入城据守的周边居民。

这些要塞里还藏有大量粮食，贞观十九年(645)唐军攻克辽东(今辽宁辽阳附近)、盖牟(今辽宁抚顺劳动公园山)两城时缴获仓储多达六十万石[26]，必然是长年积累的结果。可见高句丽方面为堡垒战作了充分准备[27]。

要塞在对抗隋唐军队入侵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隋炀帝第一次伐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就困顿于辽东城下："上(炀帝)营于辽东城，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高丽率兵出拒，战多不利，于是皆婴城固守。帝令诸军攻之"[28]。攻打堡垒屡见失利后，隋军一部绕开坚城，由宇文述率领一度直逼平壤城。但是这个时候后勤补给不足的问题又凸显出来。

隋军从泸河(今辽宁义县附近)、怀远镇(今辽宁北宁附近)出发时已经开始由士兵自己担负粮械：

(宇文)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

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㉙

之所以由士兵自己担负粮械，估计是因为当时隋军规模过于庞大，运力不足，"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㉚，而沼泽地带牲畜更难通行，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六月，按照上揭《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记载，此地夏季牛虻众多，对牲畜形成很大威胁，"夏秋多蚊虻，不分昼夜，无牛马能致行。"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无法组织大规模的畜力运输，只能把粮械分担给士兵，导致士兵负担过重，粮食大量损失。

这个时候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前来诈降，敏锐地观察到隋军粮食短缺，并采取针对性战术，"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这样隋军补给线越拉越长。乙支文德又行诈降之术，趁宇文述麻痹之际发动突然袭击，隋军饥卒羸将大败而归，"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㉛

所以说，运输困难和高句丽的堡垒战术导致了隋军的失败。

（三）唐对隋军教训的吸取与对策

那么唐贞观十九年(645)伐高句丽的情况如何呢?和隋时比较起来，似乎有很大不同，比如军队规模比较小，损失也不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本质性问题——唐军与隋军遭受的是同样的困难，只是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唐太宗曾经这样总结隋军失败教训：

良由智略乖于远图，兵士疲于屡战，政令失度，上下离心，德泽不加于匹夫，刻薄弥穷于百姓。当此之时也，高丽之主，仁爱其民，



故百姓仰之如父母，炀帝残暴其下，故众庶视之如仇雠。以思乱之军击安乐之卒，务其功也，不亦难乎？[32]

在他看来，隋军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战略谋划不足；第二，士兵疲敝；第三，政治腐败，上下离心；第四，高句丽方面同仇敌忾，无懈可击。

贞观十九年(645)之役处处体现出太宗汲取隋朝教训的痕迹。第一点，相对于隋炀帝的“智略乖于远图”，太宗决策前的考虑就比较全面，一则关注山东民力的恢复[33]，二则做了战前侦察[34]，三则试图联合百济、新罗(后文有论述)，其战略谋划应该说比隋炀帝要全面而仔细。

对于第二点军队士气问题，太宗在行军时处处表现出对士兵的关怀，上揭《讨高丽诏》中提到此次行军携带大量食用牛羊：“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比较起隋军以士兵担负辎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还轻车简从、减轻过往州县负担、关怀患病士兵[35]，这些举动对于提高士气有不少帮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当时出现了数以千计号称“义征”的自愿参军者[36]，其中就有驻跸山一战成名的薛仁贵[37]。这和后来人民纷纷逃避兵役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对比。

对于第三点国内政治环境，太宗是充满自信的。贞观政治之清明在我国专制王朝中确实首屈一指，而且周边暂时没有可以威胁到内地安全的强大势力[38]，高句丽被看作最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39]。

对于第四点高句丽政局，唐太宗自认为等到了千载难逢的佳机。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政变，监修长城的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君并残杀大臣百余人，扶植高藏为王，自任莫离支[40]，给了太宗最好的借口：“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阱，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夫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41]，又说高句丽“一国之人延颈待救”[42]，所以自己出兵目的是“问罪辽碣”[43]，那么唐军自然就是“大刑甲兵”的王者之师了。但就后来战争进程来看，太宗的判断无疑有一定偏差，高句丽人把唐军看作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最

典型的是安市城，城主杨万春[44]在盖苏文政变后曾经起兵反抗，盖苏文来攻，"击不能下，因与之"[45]，既然如此，唐军到来，城主应该首先投降才是，而实际上安市城却坚决抵抗，没有丝毫认同唐军"吊民伐罪"者身分的意思。平壤方面也积极组织支援，上下可谓同仇敌忾。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太宗做了很大努力，竭力避免重蹈隋之覆辙。不过，隋炀帝留下的最可怕的教训并不是以上几点，而是"盛况空前"的战争造成了国内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亡国。关于这一点，前人论述颇多，此不赘言。而对于唐太宗来说，减轻国内民众负担最佳的解决办法莫过于把军队规模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我们来比较一下隋唐军队人数。大业八年(612)隋军出动了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46]。刘健明先生认为之所以要出动如此庞大的军队是因为隋炀帝骄横轻敌，试图以堂堂军容慑服高句丽[47]。如此庞大的规模势必使后勤成为人民的灾难，这是隋朝亡国的直接导火索，唐太宗自然会铭记在心，所以唐军兵力就尽可能地进行了压缩。

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出动了多少兵力呢?大致为十万人左右。对于人数的记载，史籍互有抵牾，《唐会要·高句丽》："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数百人。"[48]《册府元龟》卷一百十七《帝王部·亲征二》记载略同，但是文字与《唐会要》颇类似(战马数《册府元龟》作"万匹"，新书《高丽传》亦如是)，看来出处相同，只有鲁鱼之误，疑同本自苏冕之《会要》，所以只能视为同一史料。按它的记载，唐军当时一共十七万兵力。但是我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首先，两唐书《高丽传》及《资治通鉴》记载张亮水军为江淮一带兵募四万人，另有长安、洛阳一带募士三千，《册府元龟》卷一百十七亦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册府元龟》同一卷内就自相矛盾)，则可证实《会要》记载的水军七万之数不可靠。其次，陆军

人数应该是六万多人，《新唐书·高丽传》："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闼为行军总管隶之，帅骑士六万趋辽东。"《旧唐书·高丽传》："又以特进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而且太宗曾经说"士度辽十万，皆去家室"[49]云云，不合只指陆军，理应指全体将士，即六万陆军、四万水军。另外还有奚、契丹、兰·河降胡兵马，但是数目不会很多，因为整个战役期间，没有看到他们发挥很大作用。

唐军规模比之隋军自然已经缩小了许多，后方负担也随之减轻，但是又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兵力不足。例如驻跸山战役，当时唐军包围安市城，高句丽方面派来了援军，兵力多达十五万，而唐军用来应战的只有三万[50]。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诸如派兵驻守已被攻克的要塞[51]，一部分兵力被用作辎重运输[52]，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安市城以防敌人里外夹击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所在。唐陆军本身只有六万[53]，即便全体出动，在兵力上也是劣势。此战获胜可谓侥幸。

我们注意到，当年宇文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深入敌后、粮运不济，所以唐朝君臣在补给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格外小心。战争初期，太宗曾经萌生过绕开安市攻击南部建安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岭）的想法，长孙无忌表示反对："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驻跸山战役后，高句丽降将高延寿、高惠真建议绕道攻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长孙无忌再次表示反对："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54]。太宗每次都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可见他们对于粮道问题的关注。

一则兵力不足，二则担心补给线安全，那么唐军只能够采取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战术了，这样战争势必拖延亘久，唐军此战利在速战速

决，拖延只有利于敌人。这样，战略目的与具体战术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贞观十九年(645)之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隋唐从辽东方向正面进攻高句丽是难以奏效的。旱寒、沼泽、堡垒，三位一体地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第一次伐高句丽的战役可谓典型，庞大的军队受制于缺粮和堡垒战，遭受惨败。而唐太宗虽然吸取教训并采取了不少策略，但是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小心谨慎、兵力过于单薄。虽然乍看起来唐军没有遭到隋军那样惨重的损失，粮食也没有发生短缺，但是他们所遭受的困难和隋军是一样的，仅仅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隋出动兵力过多，造成补给困难。唐军补给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这是以牺牲总兵力为代价换来的。隋军绕道攻击平壤，补给线过长，造成宇文述全军覆没。唐军汲取这个教训，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伤亡虽然不大[55]，但是却无法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被敌人拖入冬季。所以说，辽东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和高句丽坚壁清野的战术使得隋唐军队左右为难。尽管战争进程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有理由说，那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沿袭隋军正面进攻战略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除非另辟蹊径，否则难获胜利。

二、隋唐伐高句丽时新罗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新罗在隋唐伐高句丽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它同前文所述隋唐军队在辽东的困境有密切关系。缺乏新罗的配合是隋朝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获得新罗支援则是唐朝胜利的重要保障。同时，这也是影响未来数百年朝鲜半岛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隋伐高句丽时新罗的作用

据有朝鲜半岛的三国,由于种族和地缘关系存在着极大矛盾。相互之间攻战不止,这个问题前人论述颇多。总而言之,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有几条明显的脉络:第一,新罗总是希冀以中原王朝为靠山;第二,百济由于种族、地缘关系,与新罗结成世仇;第三,高句丽本来与南部两国时有争战,但是为了对抗中原王朝,又往往拉拢百济,挑动它进攻新罗,使新罗无暇旁顾,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的后方。

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一文认为:

> 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56]。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惟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57]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惟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58]。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

高丽、靺鞨兵侵其(指新罗)北界,已没三十余城。”[59]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60],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正如王先生所指出的,新罗在与高句丽的抗争中必须以中原王朝为靠山。唐时如此,隋时也是如此,它盼望中原王朝进攻高句丽的心情只怕比中原王朝还急切。真平王三十年(隋大业四年),新罗已经请求隋朝讨伐高句丽。之所以只提高句丽,而没有提另外一个夙敌百济,大概是因为当时百济同样在请求隋朝进攻高句丽,例如开皇十八年(598)汉王谅讨伐高句丽时百济遣使“请为军导”[61]。“军导”的意思是“先锋”、“向导”[62],百济悬隔,不可能是请为陆军的先锋向导,颇怀疑这是主动邀请周罗睺之水军至百济南北夹击高句丽,如果成行,则此事可以被看作是中原军事力量第一次进入朝鲜半岛南部。大业三年(607)百济接连两次遣使朝贡,“兼请讨高句丽,炀帝许之,令觇高丽动静”[63]。既然如此,新罗自然不能同时请求隋朝讨伐百济。而且相对来说,高句丽是致命威胁,亟待解决。而百济实力稍弱,新罗尚可应对。

而后来战争进程表明,百济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一直请求隋朝攻打高句丽,到了大业八年(612)隋军果真出动时却站到高句丽阵营里,对新罗大打出手。这一幕在唐时又重演。

百济的问题另有专章论述,我们不准备继续展开讨论,只是以它为参照物,体现新罗在拉拢中原王朝时的一贯与主动。

不论隋唐,新罗在他们讨伐高句丽时都态度明确,那就是坚决支持,积极配合。但是我们看到,隋炀帝没有充分意识到新罗的潜在价值。当他以一百多万大军进攻辽东时,自认为高句丽将闻风而降[64],那么新罗的作用自然不会受到重视。而且这个时候百济已经成为高句丽事实上的盟友,对新罗展开进攻,起到了掣肘作用[65]。这种情况下,新罗纵然想帮助隋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隋军第二、三次伐高句丽，实际上都由于国内问题半途而废。而且炀帝个性偏执，一意孤行。似乎有一种赌徒心理，非要以正面进攻的方式消灭高句丽不可，三次伐高句丽的战略变动不大。同时，新罗依旧与隋军缺乏配合。《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关于这两年历史的记载十分贫乏，丝毫没有大战正在邻国进行的气氛，从侧面证实了我们的上述论点。

因此，虽然隋、新罗名义上是盟友，但是却缺乏应有的配合，没有实现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使得高句丽可以专心对付隋军。隋炀帝的失败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

（二）唐伐高句丽时新罗的作用

唐太宗讨伐高句丽前还是希望利用三国矛盾配合唐军行动的，并且计划派遣水军到朝鲜半岛南部开辟第二战场。《文馆词林》[66]卷六百六十四有《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和《贞观年中抚慰新罗王诏一首》。给百济的诏书中，太宗表示注意到了百济对于新罗指责其联合高句丽侵犯疆域的辩解，并且说“览王今表及问康信，王与高丽不为阿党，既能如此，良副所望”，然后预告将对高句丽展开进攻。并且希望在使者庄元表、段智君前往新罗途中派人船保护，以免被高句丽截获。

诏书提到的“新罗控告”指的是贞观十七年（643）新罗遣使入唐之事。百济此时的举动与隋时如出一辙——大搞两面派。它首先讨好唐朝，请求发兵讨伐高句丽[67]，但后来实际上又站到高句丽一方，担负起牵制新罗的使命。唐太宗对于百济的伎俩不可能没有察觉，但是仍然要求百济派兵配合唐军，并受水军统帅张亮节度。这大概是由于要想得到新罗援助，必须抚慰百济，至少在外交辞令上要客气、周全。

对于新罗，太宗是很希望获得其帮助的，但是他犯了关键性的外交错误。贞观十七年（643）新罗使者恳请唐军进攻高句丽时，太宗曾经提出三个方案：

> 帝曰：“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靺鞨直入辽东，而国自鲜（《三国史记》“鲜”作“解”），可缓尔一年之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

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我又能给而数千朱袍丹帜，二国兵至，逮尔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国恃海之险，不修兵械，男女纷杂相好宴聚。我以数十百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而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修宁。我遣一宗枝以为而国主，而自不可当独往，当遣兵营护，待而国安任尔自守，此为三策。尔宜思之，将从何事?"使人但唯而无对。[68]

这三个方案中，第一、二个都是权宜之计，使者当然不会满足。第三个方案应该说是最好的，但是唐太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竟然提出由唐朝宗室代理主持新罗政权，使者自然更不敢对。

我们可以想见善德王君臣听到太宗三策时的警觉，高句丽、百济自然可怕，但是如果把政权拱让于唐，岂不是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因此新罗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贞观十九年(645)三月，新罗王室寺庙皇龙寺建成一座新塔，其蕴含意义颇值得玩味。《三国遗事》[69]卷三引安弘《东都成立记》记载："新罗二十七代，女王为主。虽有道无威，九韩侵劳苦。龙宫南皇龙寺建九层塔，则邻国之灾可镇。第一层日本，第二层中华，第三层吴越，第四层托罗，第五层鹰游，第六层靺鞨，第七层丹国，第八层女狄，第九层秽貊"，虽然"九韩"是新罗固有之名词，但是新罗王室偏偏在唐提出代理国政后不久大张旗鼓地建塔镇压包括中华在内的"九韩"，不得不让人觉得该塔的建立反映出新罗方面的某种戒备心理。同时，新罗对与唐军的配合变得消极了，自贞观十八年(644)春入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音，太宗对此十分焦急："去年王使人金多遂还日，具有玺书，以水军方欲进路，令王遣大达官将领人船来相迎引迓，王比来绝无消息。"接着为新罗方面找了个台阶："为是被高丽断截，为是不遣使来，引领东顾，每劳虚想。"[70]

大概是察觉到新罗方面的犹疑，唐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前本欲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总统水军，今道宗别有任使，仍先令光禄大夫、刑



部尚书张亮总统舟舰。”[71]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原来计划中的水军统帅李道宗是太宗心目中的“名将”[72]，而新任水军统帅张亮性格懦弱，不是良将之才[73]，反映出太宗原本很看重水军的作用，但是新罗方面的消极使得太宗意识到开辟南线战场已不可能，所以转而倚重陆军，把道宗由水军统帅变成陆军统帅。人事的变动体现了太宗倚靠重点的转移。其次，前引文中已经提到原先计划唐水军和新罗配合行动，那么其目的地至少要接近新罗本土，或者新罗水军绕过百济前来接应（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可是后来实际情况是张亮直接开赴辽东半岛卑奢城[74]，唐、罗始终没有真正的联合作战。

这样唐军就由双管齐下改为专由辽东方向正面进攻，而原本计划与新罗会师的水军就变成一支配合陆军行动的偏师了。虽然前揭《抚慰新罗王诏》里仍旧要求新罗军队受张亮等处分，但是恐怕只具有象征意义了。战争中新罗方面提供的协助仅是派兵从陆路进攻高句丽，“诏率兵以披虏势，善德使兵五万人入高丽南鄙，拔水口城以闻”[75]。但是这个时候百济再次掣肘：“百济乘虚袭取国西七城”[76]，于是新罗的进攻再无新的进展，这样的帮助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幕与隋代何其相似。

因此可以说，唐太宗的错误导致与新罗配合计划流产，唐走上了隋军正面进攻的老路。

唐军贞观十九年（645）之败带来了唐、罗关系的迅速升温，我们有理由相信唐朝政府已经放弃了那种以宗室代理主持新罗国政的错误想法，因为此后再也没有看到唐朝方面提出过这个要求（尽管善德王之后的真德王也是女性）。在独立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新罗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与唐朝的关系。贞观二十二年（648）“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诏授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贞观二十三年（649）新罗开始“服中朝衣冠”，当年破百济军于道萨，第二年遣使入唐告捷，真德王还亲自织锦作《五言太平颂》赠予高宗，并且开始行中国永徽年号[77]。而唐朝方面除了多加抚慰赏赐以外，还赠送《晋书》一部。史家历来对赐《晋书》一事没有予以重视。须知我国古代对于赐史书予人是十

分谨慎的，因为其中多有合纵连横之诡计，不欲为外人所知。例如西汉东平思王刘宇曾经向皇帝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反对说："《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78]。唐开元时吐蕃以金城公主名义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遭到于休烈反对，理由是："且臣闻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79]而且根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记载，当时新修的《晋书》只赐给了太子和新罗，由此可见，赐《晋书》是唐罗关系良好的象征性举动。

唐罗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利益已经得到协调，即便有分歧，也暂时服从于消灭高句丽这个共同目标。新罗方面对于与唐军配合作战显得十分积极，于是消灭百济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隋唐历次教训证明：不消灭百济，新罗就无法全力支持唐朝。显庆五年(660)百济被消灭。日本势力又遭到唐军驱逐，由此唐朝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战略包围圈，高句丽腹背受敌，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第二年(龙朔元年，661年)唐高宗下令展开了对高句丽的总攻，三十五军水陆并进，同时也要求新罗出动配合，"龙朔元年，高宗召(金仁问)谓曰：'朕既灭百济，除尔国患，今高句丽负固，与秽貊同恶，违事之大礼，弃善邻之义，朕欲遣兵致讨，尔归告国王，出师同伐，以歼垂亡之虏。'仁问便归国以致帝命，国王使仁问与(金)庾信等练兵以待"[80]。虽然这场战役又告失利，但是新罗军队还是给予了充分配合[81]。后来在乾封元年(666)—总章元年(668)最后消灭高句丽的战争中，新罗军队深入高句丽境内与唐军并肩作战。按照新罗方面的说法，他们在蛇水战役和攻克平壤的战役中都是先锋，立有大功[82]。高句丽就在这样的南北夹击中宣告灭亡。



（三）小结

朝鲜半岛三国矛盾本来是中原王朝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但是隋炀帝自负的性格导致他对于新罗的作用没有予以充分重视，三次伐高句丽的战争中，我们没有看到双方有过真正的联合作战，一点点有限的合作也由于百济的掣肘而化为乌有。而仅从辽东方向正面进攻，获胜非常困难，隋炀帝的失败与此有很大关系。唐太宗注意汲取隋朝教训，很重视与新罗的合作，但是他错误地提出以唐宗室代理新罗国政，导致新罗方面的疑虑，在贞观十九年(645)战争中没有给予唐军有力的配合。当然，这其中还有百济掣肘的原因。贞观十九年(645)的失败证明开辟南线战场是十分必要的，这以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国由于共同的利益而更紧密地联合起来，最后并肩作战消灭了共同的敌人百济、高句丽。因此，我们可以说唐罗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升温的、渐进的、双方利益不断调整磨合的过程。

消灭高句丽的最大受益者是新罗。靠新罗一己之力是无法消灭高句丽和百济的，但是它倚靠唐朝的势力达到了这个目的。然后又逐步排挤唐朝的存在，最终将唐势力排挤出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大业。可以说，数十年的中原王朝与高句丽战争最大的赢家是新罗。唐朝政府对于这个结局恐怕不会完全没有预见。但是从辽东方向发起的进攻屡屡失利，教训惨痛，在朝鲜半岛南部开辟第二战场势在必行，这是客观条件使然，并非唐朝政府一时不明。

如果把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伐高句丽的战争算上[83]，隋唐对高句丽的战争陆陆续续进行了七十年(598—668)。我们可以唐罗合作为界限，将这七十年划分为正面进攻和南北夹击两个阶段。下面我们一一分析。

第一阶段是正面进攻阶段，从开皇十八年(598)到显庆五年(660)。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原军队都是从辽东方向正面进攻高句丽，水师是配合陆军行动的偏师。同时，新罗能够给予中原军队的帮助都十分有限。而中原军队受制于辽东早寒气候和沼泽、堡垒，往往遭受

失败或者战果甚微。

这个阶段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已经注意汲取隋炀帝教训，但是由于其基本战略沿袭隋朝，所以同样遭受失败。贞观十九年（645）之败是一个转折点，唐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战术。

首先，贞观二十一年（647）开始，唐朝转变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思想，开始对高句丽展开骚扰消耗战。当时，唐政府就高句丽问题进行讨论，有人提出对高句丽进行骚扰，消耗其国力：

> 中议以为："高丽城矬依山，攻之不可卒下。往前銮驾亲伐，废其耕稼，所陷之城，并收其谷韩，师旅、炎旱相继，夷人以猥众大半断粒。若得少兵番次躁其边场，彼疮痍之残，疲于奔命，耕夫释耒并皆入堡，岛夷之邑，千里荒芜。古人云：金城汤池，非粟不固，若再三如此，高丽必大窘迫，自然逃散，谁肯为莫离支婴城，鸭绿水以北可不战而取。"天子以为然。[34]

这个战术非常巧妙，它是对高句丽堡垒战术的反利用。前文已经提到，辽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要塞，周围居民一旦接到报警便坚壁清野，集中到要塞里固守。而新战术充分利用这个特点，不断骚扰，迫使居民放弃生业，疲于应付，农业生产自然会受到沉重打击。

我们看到，一直到显庆五年（660），唐军都在对高句丽进行骚扰，这些骚扰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采取了打了就跑的战术。

贞观二十一年（647）三月，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侯将军李海岸为副，发兵万余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李勣、孙二朗率三千人出新城，二十一年（647）九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一月，遣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击高丽。四月乌胡岛（今南隍城岛）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当晚，高丽万余



人夜袭神感舰队，神感设埋伏，破敌而还。薛万彻又渡鸭绿江，次泊灼城，大败高丽军。永徽六年(655)五月，程名振等率军渡辽水，杀高句丽千余人，焚其外郭城及村落而还。显庆三年(658)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显庆四年(659)末，薛仁贵与梁建方、契苾何力遇高丽大将温沙多门，战于横山，破之[85]。

这种战术的成果甚至在唐太宗在世时就已经显露，《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贞观二十二年(648)“帝与长孙无忌计曰：‘高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盖苏文筑城增陴，下饥，卧死沟壑，不胜弊矣。’”

这种消耗战中决定胜败的因素不是某次战斗的胜负，而是双方国力的较量，在这种较量中，高句丽无疑将处于下风。

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唐朝水师装备、战术发生了改变。贞观十九年(645)水师装备的是“吴船”[86]，具体规制不清楚，但是从名字判断，可能是一种适合吴越一带内河湖泊、近海的船只。到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已经换装成了楼船。隋朝楼船“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87]，唐代楼船规制不详，但是应该距此不远。大吨位的楼船是海战利器，后来唐朝水师泛海灭百济、逐倭军，装备的改善应该是胜因之一。贞观二十年(646)，唐军在前往朝鲜半岛的要冲乌胡(湖)岛(今南隍城岛)设立乌湖镇[88]，以此作为前沿基地，这样就可以缩短水军补给、休整、维修周期，也会使作战能力获得显著提高。

所以说，“正面进攻阶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贞观十九年(645)为界，此前的进攻一味从辽东方向发起，难以奏效，此后唐朝的战略战术发生以上改变，为第二阶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是南北夹击阶段。龙朔年间(661—663)唐朝水师泛海消灭百济、驱逐日本，标志着唐罗全面协同作战的开始。消灭百济，可以使新罗解脱，全力支援唐朝作战，同时也使唐朝水师获得一个陆上基地，其效能又非乌胡岛可比。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

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擅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89]所以说，消灭百济是消灭高句丽的前奏。

另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变化——这个阶段的唐军已经开始努力延长作战时间。贞观十九年(645)以前，隋唐军队都没有在冬季作战，而此后唐军已经开始努力克服困难，战事往往跨越冬季。例如龙朔元年(661)到二年(662)的作战、乾封元年(666)到总章元年(668)的作战都跨越了冬季。这样做一则可以延长作战时间，保持攻击的连续性，不给高句丽以喘息之机；二则冬季辽河沼泽、鸭绿江封冻，能给行军、补给带来便利，例如龙朔元年(661)契苾何力部队渡鸭绿江就受益于寒冻，“于时九月，水陆两军大会平壤。兵至鸭绿，波涛浩瀚，无舟可济，恐失王期，(契苾何力)仰天而□，具申忠志，寒风四起，流澌立合，军众才渡，冰随后销，高丽谓神”[90]。

当然，这样做危险性也是很大的，例如前文所述庞孝泰之惨败就极可能与不适应冬季作战有关。

与此同时，新罗军队也给予唐军以全力配合，南北夹击，气势宏大。而高句丽盖苏文死后，三子争权夺利，国力由于常年战争而凋敝，所以其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

后　记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看到辽东的军事困境是导致隋军失利和唐朝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唐太宗重视隋朝教训，亲征前曾经采取很多针对性措施，但是由于基本战略还是沿袭隋朝正面进攻的老路，所以难免失败。隋唐历次失利证明，与新罗合作开辟第二战场是十分必要的。而新罗方面一直在对中原王朝进行拉拢，唐太宗碰壁辽东更为其提供了契机，所以唐罗关系在贞观十九年(645)以后迅速升温，这种合作是利益契合



的结果。可以说，扶持新罗、消灭百济是唐朝必然的、不可回避的选择。对于唐朝来说，东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是屡屡用兵高句丽的目的。虽然新罗借势坐大，甚至与唐朝一度兵戎相向，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罗与高句丽有很大不同，新罗的志向在于统一朝鲜半岛，而高句丽的野心则威胁到唐本土以及其他藩属民族，所以，隋唐必须平定高句丽。如果另一个政权能够取代高句丽，并且对于辽东没有领土野心，那么中原王朝自然没有与之对抗的必要。而且新罗是吸收唐文化最积极的周边国家之一。唐玄宗曾经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91]因此，相比高句丽，新罗并不构成对唐朝的威胁。双方的关系在唐军撤离朝鲜半岛后相对来说比较平稳，说明双方已经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同时吐蕃又在西域和青海与唐朝展开了全面争夺，唐也无暇东顾了。于是安东都护府在新罗的压迫下不断内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意味着唐朝在这一地区势力的逐步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唐对这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控制力也在不断减弱，这样就为武则天时期契丹叛乱以及后来渤海国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这一切都肇始于旷日持久的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注释:

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136页。

② 《隋文帝征高句丽的因由》(《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等。

③ 《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 年第 2 期)、《隋与高句丽的国际政治关系之探讨》(《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日本汲古书院1995 年)，《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的演变》(《海交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唐朝对高句丽政策论析》(《海交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等。

④ 例如《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等。

⑤ 《试论隋唐时期对高丽的战争》，《社会科学(甘肃)》1989 年第 6 期。

⑥ 《"唐丽战争"初探》，《兰州学刊》1990 年第 5 期。

⑦ 《遣唐使初期中·日·韩关系及倭国对外政策》，《东亚的古代文化》1996 冬·

86 号，大和书房。

⑧ 《就〈三国史记〉评"唐丽战争"》，《北方论丛》1983 年第 6 期。

⑨ 《七世纪东亚的变乱与改革》（《从亚洲看古代日本》1992 年）。

⑩ 《隋对高句丽战争的发端》（《亚洲史研究》1992 年〈中央大〉一六）。

⑪ 该书 136—13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⑫ 载《靖康稗史笺证》，（宋）確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中华书局，1988 年。

⑬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 年，69 页。

⑭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大业八年六月条。

⑮ 资料来自辽宁省气象台网页，http://www.weather.ln.cn/

⑯ 资料来自新浪网"陕西档案"，http://mall-west-holiday.sina.com.cn/sheng/sx/da/climate.asp

⑰ 《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⑱ 《册府元龟》卷九十七《帝王部·奖善》及卷六百六十二《奉使部·请行》，中华书局本。

⑲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冬十月条，中华书局本。

⑳ 总章元年（668）唐军最终攻克平壤，此役从 666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668 年。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

㉑ 该书第 117 号附图及 578—583 页相关内容，东京吉川弘文馆 1997 年。

㉒ 载《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㉓ 参看朝鲜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上卷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

㉔ 该氏著《东北通史·上编》五十年代出版社，1941年，215 页。

㉕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长孙无忌云："安市众十万在吾后。"

㉖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李）勣攻盖牟城，拔之，得户二万，粮十万石，……（破辽东城后）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

㉗ 另外，高句丽还修建了长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传》："（贞观五年）建武惧伐其国，举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记载该工程"凡一十六年毕功"，也就是说一直到贞观十九年（645）时长城依旧没有竣工。在现有史籍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这道长城发挥了效力。综观历史，这种被动的线式防御战术很少能有实际效果。就如同中国的长城无法抵御满洲铁骑、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无法阻止德国坦克一样。

㉘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

㉙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八年六月条。

㉚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㉛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㉜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贞观十八年十月《讨高丽诏》。

㉝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一月条："亳州刺史裴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



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凋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㉞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八月条。贞观十五年，唐遣陈大德出使高句丽，名义上是慰劳高句丽之贡献，实际上是为了征伐高句丽而进行的一次侦察行动。陈大德时任职方郎中，"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大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大德到了高句丽后，"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

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

㊱《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条。

㊲ 参看两《唐书》本传。

㊳ 贞观四年(630)唐灭亡北突厥，十五年(641)击败薛延陀，北部稳定。贞观九年(635)破吐谷浑、十四年(640)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西部稳定。而吐蕃此时尚不为患。所以此时惟一不宾服的就是高句丽。

㊴《册府元龟》卷一百十七《帝王部·亲征》。

㊵ 见两《唐书》高丽传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十一月条。

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传》。

㊷《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

㊸《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贞观十八年十月《讨高丽诏》。

㊹ 城主姓名据《朝鲜通史》(朝鲜科学院历史所，汉译本)上卷第一册第155页。

㊺《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

㊻《隋书》卷四《炀帝纪》。

㊼《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载《唐研究》第一卷。

㊽《唐会要》卷九十五《高句丽》。

㊾《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

㊿ 李世勣的一万五千人、长孙无忌的一万一千人、太宗自将的四千人，共计三万人，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传》。

[51] 例如，破盖牟城后"诏(韦)挺统兵士镇盖牟，……挺城守去大军悬远，与高丽新城邻接，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旧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

[52]《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引《卫公兵法》云："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说明唐朝军队作战时分战斗队和辎重队，而且辎重队占到总数30%左右。

[53] 目前没有资料表明战役进行中张亮率领的四万水军曾经与陆军会师。围攻安市城、打驻跸山战役都是陆军。

[54]《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55] 根据《唐会要》卷九十五《高句丽》记载，唐军只阵亡了一千二百人。

[56] 参千宽宇《伽耶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

[57]《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

[5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百济传》。

5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新罗传》

60 《资治通鉴》卷二百。

61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百济传》及《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九月条。

62 例如《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此大概为向导之意。《北齐书》卷二十七《金祚传》："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骁雄，尚气任侠。魏正光中，陇右贼起，诏維州刺史元猛讨之，召募狼家，以为军导，祚应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贞观十三年十二月条："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这里"军导"应该是先锋之意。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军导都指在大部队之前的先头部队。百济请为军导，必要以隋军为后续大部队。另，《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百济本纪第五》268页记载此事时云"请为军道"，则意思变为请以百济为一行军道。但观《三国史记》此段文字，颇与《隋书》相同，则"军道"两字大概为金氏抄录《隋书》时不明百济何能为隋军之"导"而擅改之，或以"道"、"导"通假而用之。

63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百济传》、《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百济本纪·武王》。

64 参看前揭刘健明文。

65 参看《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真平王》真平王三十三年条。

66 (唐)许敬宗主编，罗国威整理，中华书局，2001年。

67 见《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

68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备御四》、《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善德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记载略同，但是有失简略。

69 高丽一然著，韩国明文堂，1993年。

70 《文馆词林》卷六百六十四《贞观年中抚慰新罗王诏一首》。

71 同上。

72 《旧唐书》卷六十九《薛万彻传》："太宗从容谓从臣曰：'当今名将，唯李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

73 参看两《唐书》本传。

74 又名卑沙城，传统看法认为在今大连金州附近，而王守春《卑奢城、沙卑城与金州城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载《东北亚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认为在鸭绿江口附近的辽东半岛东侧沿海。

75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善德王》兵力作"三万"。

76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善德王》。

77 《三国史记》卷五《新罗本纪·真德王》。

78 《汉书》卷八十《东平思王刘宇传》。

7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

80 《三国史记》卷四十四《金仁问传》。

81 《三国史记》卷二十二《高句丽本纪·宝藏王》、卷四十二《金庾信传中》。

82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文武王》。

83 这场战争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接触。见《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



传》及卷四十《王世积传》。

㉞《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五《外臣部·征讨四》、《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条记载略同。

㉟ 以上俱见两《唐书》高丽传并《资治通鉴》相关年月记载。

㊱《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高丽传》。

㊲《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条。

㊳ 按照《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高丽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才在乌胡岛上贮藏器械贮备伐辽，但是《太平寰宇记》卷二十《河南道·登州》"蓬莱县"条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就已经在乌胡(湖)岛设立"乌湖镇"了。

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37页。

㊵《唐代墓志汇编》开元314号《大唐故契苾公墓志铭》，志主契苾嵩是何力之孙。

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东夷·新罗传》。

从平百济之役看唐初海军

熊义民

（暨南大学历史系）

龙朔元年（661），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之后，遂出兵百济，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句丽对唐朝藩属盟邦新罗的进攻。唐军在新罗军的配合下速战速决，迅速攻克了百济的首都，俘虏其君臣。但唐军主力凯旋后，百济复国运动高涨。龙朔三年（663），唐军在白江之战中彻底打败百济的反唐势力和增援百济的倭国军队，完全平定了百济。此战役对当时东北亚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此战役的研究不少，但主要侧重于对此战役本身及其对东北亚政局和有关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影响上①，而对参加这次战役的唐军本身的研究则不多。对于唐朝来说，参战的虽然主要是陆军，但海军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因为要渡海作战，离开了海军卓有成效的配合和作战，陆军再强大，也无用武之地，平灭百济云云只能是空谈。然论者对当年海军的注意却因资料匮乏等原因而颇嫌不足。本文拟钩稽史料，略为阐述，以抛砖引玉，庶几阐明唐代海军当年战绩和强大之状。

一、海 军 规 模

中国海军（或称水军）历史悠久，曾创造过辉煌的战绩，甚至影响历史的进程，如赤壁之战。早在"秦汉时期，我国的舰船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船体庞大，雄伟坚固，甲板建有高楼栅寨，能在海上抗风斗



浪、设备齐全的楼船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时水军已经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独立军种，专门从事海上战斗”[②]。汉武帝在平南越和卫氏朝鲜的战争中都曾使用过海军，甚至其楼船军多达十万[③]。到隋唐时代，海军又有了新的发展，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曾多次使用海军，唐太宗为了东征高句丽也大建海军。据《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委任他“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之渡海东征辽东；《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记载宋州刺史王波利在贞观二十一年（647）受命“造大船数百艘”，卷一百九十九记载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为征辽东，“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舟舰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当然，唐初造船之地并不止这几处，高宗在平灭百济之后就解除了以前为东征百济应急而命三十六州造船以备东行之令[④]，不在此数之内的造船地当然还有很多。由此可见，唐初军用船舶制造业的发达，这也反映出唐初海军实力的强大。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张亮率“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从海道进攻高句丽。《唐会要》卷九十五《高句丽》说“张亮水军七万人”。故此劲卒四万，当是指舰船上的作战士兵，不包括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即平均每艘战船载战士八十人。一支舰队就有五百艘战舰，数万战士，唐初海军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显庆五年（660）唐军从山东半岛成山角渡海，迅速平灭百济，俘其君臣。此役，唐朝海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参战，史无明载，但唐朝参战军队的数量则有记载。按中国方面的史料，唐将苏定方所率的攻灭百济的唐军共计十万[⑤]；按朝鲜方面的史料，唐军是十三万[⑥]，双方数据相差三万人。按苏定方在东征百济之前，刚从西北战场得胜归来，其所率十万人当主要是调来的陆军和海军作战士兵，不包括海军水手。而朝鲜方面在统计东征百济的唐军数量时则包括陆、海军全部。若此论不虚，则参加东征的唐朝海军应有三万水手。十万大军从山东半岛海运到百济，所需舰船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按水手与乘客对半计算[⑦]，三万海军水手至少也对应三

万海军战士，按张亮舰队的船和战士比例，所需战舰也应五百艘；唐军水陆十万扣除三万海军战士，尚有七万陆军战士，需要用海船运送。唐代一般的海船"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8]，若撇开运输船上水手（或为临时征召）不计，按每船运送二百人及其武器装备计算，七万陆军至少也需三百五十艘海船运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十万大军渡海东征，所需粮草补给必然很多，虽有新罗接济，但在平定百济，与新罗会师之前也无法得到，由于补给线长且危险，为了确保战役顺利进行，出征时当携带至少一月之补给，所需运输船舰当为数不少。如此则总船队当有上千艘。

663年，由于日本先后几次派兵共四万人支援百济抗唐[9]，留守百济的一万唐军处境困难[10]，唐高宗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援"[11]。唐日矛盾尖锐化，当年八月，两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上）爆发了大战，唐军大胜。对于此战，唐朝方面记载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12]；日本方面记载说"贼将至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村江（即白江）。戊申，日本船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13]；朝鲜方面记载说"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14]。综合三国史料就可对当年参战的唐日双方的海军规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据研究当时日本船的载重量大约100吨，可乘一百四十人左右[15]，唐朝的海船则更大些。隋朝杨素所造楼船："五牙"能载八百名战士[16]，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战舰了。前面已提到唐代一般的海船"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刘仁轨所率唐海军一百七十艘舰船作为作战舰队，当由各种型号大小不同的舰船组成，大者楼船载兵很多，小者艨艟载兵不多。日本记载唐军舰船一百七十艘，当主要指其造型较大者，即使按每船百名战士计算，一百七十艘唐舰所载战士也多达一万七千人，另加掌舵、摇橹等辅助性人员，人数当更多。至于日本参战海军的数量，新



罗说其战船千艘，唐说焚其舟四百艘，或有夸大，但其参战舰船有数百艘当不虚。即使按其参战舰船总数四百艘，每艘战士五十人计算，其参战海军战士人数也多达两万人。白江之战，唐海军以少胜多，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

平百济之役，唐海军战绩卓著，这既是海军将领指挥得当、官兵作战英勇的功劳，还有赖于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

二、海 军 装 备

唐初海军规模巨大，装备也很先进。为适应作战需要，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的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

1. 楼船。历史悠久，早在西汉就有楼船将军。到隋初，杨素所造楼船可谓大矣，“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⑰。唐代的楼船，杜佑说“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成形势”。楼船乃当时海军装备最主要的作战舰船，武器配备齐全。

2. 艨艟。杜佑说：“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务于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则说“狭而长曰艨艟，以冲突敌船也”。这表明艨艟采用封闭型结构，外配装甲（生牛皮），造型小巧灵活，速度快，当主要用于突袭、侦察、通讯联络。

3. 斗舰。杜佑说：“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掣棹孔，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这表明斗舰是梯级复式结构，水兵可以梯级排列迎敌，划船者则隐蔽于船内，通过棹孔划船，是当时海军装备主

要的作战船只。

4. 走舸。杜佑说："走舸，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走舸速度快，战斗力强，当主要用于突袭和冲击，是海上进攻的利器。

5. 游艇。杜佑说："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这表明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

6. 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海鹘所配备的浮版是一种特殊的平衡装置，可使舰船在遇到大风浪时保持平稳，有此装置就可大大增强舰船的抗风浪性能，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由以上杜佑所记海军舰船，可见当年唐朝东征百济时海军装备舰船的大致情况。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砲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1. 绞车弩。中国古代使用弩历史悠久。据《周礼·夏官》记载，在战国时期弩就分为夹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种，时称"四弩"。汉唐时期，弩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种类增加，张力扩大。唐代的弩分为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18]。当时最著名的是绞车弩，《通典·兵二》记载"绞车弩，中七百步（约等于1000米），攻城垒用之。……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唐初名将李靖说绞车弩是将十二石之巨弩设在绞车上而成，能同时发射七支箭，绞车弩威力强大，射程远，甚至绞车弩发射的箭"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19]，是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但造型比较笨重，机动



性较差，陆军主要将其用于既设阵地的防守[20]，对于海军来说，则是进攻突击的利器，是最重要的舰载打击兵器。

2. 砲车。或称礮、抛车，抛石机也，与弩同为当时重型远射兵器。砲车的历史也非常悠久，相传战国时期就有了，《汉书·甘延寿传》引张宴注说："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三国时期，在官渡之战中，曹军使用砲车发石击毁袁军的橹楼，时称"霹雳车"[21]；为了提高砲的发射速度和效率，马钧还发明了车轮砲[22]。唐代抛车的造型比过去大，甚至有一个车用两百人操作的，又称"将军砲"或"擂石车"[23]。砲车在海军中的应用历史也很悠久，早在梁元帝时，大将徐世谱就将砲车装在战船上，在水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称装有砲车的战船叫"拍船"[24]。唐初，楼船上就装有砲车，它在海军中的应用更多，战绩也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更大。

3. 拍竿。东晋初出现，始称桔槔，到南北朝时已普遍用于在近战时袭击敌船，拍打敌人，是一种破坏力很强的重型近战兵器，主要装备大型战船[25]。隋代大型战舰如上引杨素所造的楼船"五牙"就装有六只拍竿，战绩不匪，唐初此技术当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应用。

唐初海军弹药除了与舰载武器弓、弩、砲车相配套的各种型号的箭和石弹之外，还有一些用于火攻的弹药。据《卫公兵法辑本》卷下，唐初名将李靖详细论述了当时的一些火攻战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游火；助燃物则有油，常以瓢、囊盛之。它们通过弓、弩或砲车发射，甚至投掷而用于火攻。另外，唐初海军当还装备有主要用于火攻的类似梁大将徐世谱的火舫一样的战船。

唐朝的文化、科技发达，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甚至比许多地区先进得多，其海军装备当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三、航 海 技 术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隋唐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已处于当时世界前

列，为当时军民航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首先，造船业十分发达。

《旧唐书·崔融传》记载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亦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这些都表明唐代航运业非常发达，而航运业是以航海技术和造船业为基础的，同时又推动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唐代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唐初就已颇具规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记载太宗就"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备东征，这既表明唐初造船业基础雄厚，规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战舰制造能力很强。对此问题，前人论述甚多[26]，此不赘述。

唐代不仅造船业发达，而且造船技术也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九个舱，船底部采用三块木料榫合相接，两弦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两弦船板用七根长木，上下叠合成人字缝，以铁钉成排打入；铁钉断面呈方形，每根直径 0.5 厘米，长 16.5 厘米，钉帽直径 1.5 厘米，隔 12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距 6 厘米；人字缝中间用石灰桐油填实，严密坚固，铁钉钉入舰体后，外面嵌油灰并涂上桐油或漆，以防止铁钉受到腐蚀。""1960 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弦榫接，船舷由四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穿钉工艺是先开 45 度斜孔，用长 17 厘米、帽径 2 厘米的铁钉沿孔洞打入，一穿两板，每隔 25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错布钉，底部也采用这种平接工艺。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



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27]。

唐朝造船技术高，造舰技术也高。前述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浪。楼船则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弦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砲，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28]，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9]。而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研究，日本当时的遣唐使船只“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30]，且多为单层船只。遣唐使船作为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其次，唐朝战船的动力装置也很先进。

在冷兵器时代，战船的动力主要来自风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冲力。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几种力，对提高战船的动力、加快航速至关重要。《通典·兵十三·水战具附》记载唐朝战船“其楫、棹、篙、橹、帆、席、絙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对风力的利用主要靠帆。中国使用帆的历史悠久，东汉刘熙《释名·释船》说：“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这表明在汉代人们就已能熟悉地使用帆了。到三国时期，一船多帆技术就已得到普遍的应用[31]。唐代不仅船帆的数量多，而且挂帆的技术也甚高，出现了多种帆形、装帆方式和驾风使帆技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自然风，通过调戗技术[32]甚至可以利用除强逆风外的一切自然风。高超的驾风使帆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战船航行的动力，而且可以提高战船航行的稳定性。在没有风或无法利用风力的时候，战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橹、棹和楫，浅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使用简单，橹的发明使用乃船舶动力的巨大进步。早在东汉，刘熙《释名·释船》就对橹作出了解释，它不仅省力而且效率高，有一橹三桨之说。唐代橹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一船多橹技术也广为应用。帆和橹、桨、篙配合，很好地解决了船舶航行的动力问题。明朝陈侃《使琉球录》卷一说“张帆施双橹，去势如脱箭”。

晋大将王镇恶自河入渭伐羌时，乘“艨艟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

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33];梁大将徐世谱与侯景战于荆州赤亭湖时"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34]。据研究,所谓水车当是在船内搬用了脚踏翻车的轮轴机构[35],这种动力装置既可避免风帆的局限,增加战船的灵活性,又可保护操船水手的安全。唐代艨艟、走舸等军船当亦广泛应用这种技术。

第三,唐代导航技术也非常先进。

据研究,在唐代天文导航术出现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1、某些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性质的文字记载已开始见于史乘,虽然从文献资料上看不到唐代海员拥有非常全面的航路指南,但其雏形则已开始出现;2、有较为精确的数学典籍,如《海岛算经》,能对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离与高度进行测量;3、对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辨认知识日益增多。天文导航技术也出现了新进展,天文定向导航技术普及而成熟,并开始由天文定向导航向天文定位导航发展。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在实践上大约只是一种较模糊的估计方法,但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颇具价值并使用便捷的导航手段[36]。

指南针导航在宋代已开始普及,但我国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车等的发明应用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汉代司南就很出名[37],晋代又有指南舟[38],唐初人们也没有忘记它们,用于航海的可能性极大[39]。

第四,唐代海洋气候知识也很丰富。

据研究,唐代对季风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应用到航海实践中,如《唐国史补》卷下就记载"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对台风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开始懂得按经验规避台风;另外对海洋潮汐的认识也提高了[40]。

总之,唐初航海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前列[41],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据王在晋《海防纂要》记载,直到明代,日本船还是"不用铁钉和麻舫、桐油,只联铁片,以草塞罅隙,费工多,费材大,布帆



悉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偏帕活……唯使顺风，不能使逆风”[42]。先进的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建设以及平百济之役和白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海军战术

对于海军来说，“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冲突，战舰的主要职能总是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即保护货船、运输船和所载运的人员货物，封锁或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达到这两个目的才能取得制海权（控制海洋）。而取得制海权通常是海军完成其战时职能的首要条件，这些战时职能包括抗击海上入侵以保卫国家，封锁敌人并通过海上向敌人进攻”[43]。海军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编成编制合理、训练有素、战略战术得宜的海军。恩格斯说：“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44]。海军是一国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唐初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为海军履行其职责、完成其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当时海军的编成编制和战略战术。

唐初海军的编成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比较合理，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具有大小多种，杜佑所记六种不虚，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武备志》卷一百十六《军资乘·战船》说：“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

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什伍、战士和将吏[45]，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厉[46]。

按唐代海军装备，战船远距离作战，兵器主要有大型绞车弩和砲车，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则还有弩、弓和拍竿。《通典·兵五》记载唐军陆战时建有弩台，台上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这与前述绞车弩必须放置高处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弩用于海战，装置在楼船上层，梯级分布，可既收集中使用而又充分利用之效；砲车，虽为远射兵器，但一般只需在平地安装，故用于海战，则可装置在下层甲板上，车轮砲亦然；用于近战的拍竿则装置在船舷周围。如此，则唐初主力战舰大型楼船的作战配置是：上层配置强弩兵，中层配置弓、弩兵，下层甲板配置砲车兵，船舷周围则配置拍竿兵和弓、弩兵，底层配置水手操船，所需战士员额当亦不匪。当然战船也会因其大小、层数多少、战舰性能、任务而对舰载武器和战士有所增减。

显庆五年(660)，唐大将苏定方率十万大军渡海东征百济。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对海军来说不仅要扫除海上障碍，掌握制海权，护送陆军渡海，确保海上后勤补给线的畅通，而且要配合陆军溯江进攻，克敌制胜。据史料记载大军平安到达白江两岸，而后海军“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鼓而课”[47]，配合陆军，速战速决，三日攻克其王城，俘虏其君臣[48]，月余凯旋，海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若无强大的实力、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这些都无法想像。

龙朔三年(663)的唐日白江之战，唐军大胜，从战术上来讲也有可得而述者。古战场在今锦江下游，距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49]。根据前引三国史料对此战的记载，唐军是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阻止日军从水路增援周留守军；日本海军为解周留之围迅速赶到，两军相遇时“日本船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这表明日本海军赶来后急于



解围，不等主力到来即投入战斗，但首战不利而退，等其主力赶到后，双方于翌日决战。史载“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50]，唐军“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51]。据此，我们可知当年海战的基本情形：唐海军配合陆军包围锦江下游的周留城，日本海军从外洋赶来解围，妄图凭借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不观气象，不加整顿部署，贸然以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朝海军则因势利导，在河口构筑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凭借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处于水流上游的有利地理位置以及河口水域不便于大规模舰队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乘日本海军大舰队一哄而上，拥挤于河口内狭窄水道，无法散开的有利时机，发挥唐舰技术优势，左右夹船绕战，运用火攻，速战速决，大获全胜。那么日本海军为何要涌入白江口内而不在口外迎战呢？当是其为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船少又不足以撼动唐军，故此致败。从双方装备和形势来看，双方战术当是：日本舰队企图以勇取胜，一拥而上；唐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砲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此战显示，唐朝海军不仅装备、航海技术比日本海军要先进，战术运用也更得宜，甚至对气象（当指天气、风向）的利用也比日军强。

海军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集中的体现，技术决定战术，先进的装备和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提供了较多而适宜的战术选择，这是其获得卓越战绩的根本保证。正如竺可桢先生所言“未有科学不兴而能精于战术者，亦未有战术不精而能操胜算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52]，自古如此。

注释:

① 如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余又荪《白江口之战》,《大陆杂志》第15卷第10期;黄约瑟《试论唐倭之役与七世纪的东亚——评〈白村江〉》,《食货月刊》(复刊)第12卷3期;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一卷,1995年;鬼头清明《白村江》,教育社,1986年;森公章《"白村江"以后》,讲谈社,1999年,等等。

② 马书珂《军事技术发展纵横史略》,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1988年,26页。

③《汉书》卷九十五《南粤传》,中华书局,1975年,3857页。

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百记载"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6320页。

⑥《三国史记》卷二十八百济义慈王二十年条记载:"高宗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公,统兵十三万以来征。"

⑦《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有一次从扬州东渡日本,"同行人僧祥彦……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这表明当时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木宫泰彦认为"半数以上是水手"(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79页)。

⑧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漕船"每船载一千石",杜佑《通典》兵十三水战具附说战船"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则每船亦载五百人左右。

⑨ 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⑩(韩)金富轼著,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十一年》,乙酉文化社,1983年。

⑪《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6201页。

⑫《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2791—2792页。

⑬(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八月》,东京吉川弘文馆,国史大系本。

⑭(韩)金富轼著,李丙焘译注《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十一年》,乙酉文化社,1983年。

⑮(日)茂在寅男《遣唐使船与日中间的航海》,江上波夫《遣唐使时代的日本和中国》,东京小学馆,1982年。

⑯《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中华书局,1973年,1283页。

⑰ 同上。

⑱(唐)李林甫著,陈仲夫点校《唐六

典》卷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461页。

⑲ 《卫公兵法辑本》卷下："作轴转车，车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铁钩绳连，车行轴转，引弩弓持满弦，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镞刃长七寸，广五寸，箭杆长三尺，围五寸，以铁叶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发，诸箭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谓之车弩"，"木弩，以黄连桑柘为之，弓长一丈二尺，径七寸，两弰三寸，绞车张之，大矢自副，发声如雷吼"（见《丛书集成》初编，社会科学类，第941册）。

⑳ 孙机《床弩考略》，《文物》1985年第5期。

㉑ 或因发出的石弹在空中飞行有声，故名。参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199页。

㉒ 即将石弹系上绳索，绳索依次缠于轮周，作战时激烈转动车轮，当石弹转到需要的角度时，以利刃断绳，使石弹连续地抛射出去。参见《三国志》卷二十九《杜夔传注》，807页。

㉓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卷一《兵器》，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43页。

㉔ 张铁牛、高晓星著《中国古代海军史》，八一出版社，1993年，42页。

㉕ 《武备志》卷一百十六《军资乘·战船》："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动架，将巨石系上绳索，套于横杆，一端挂石，另一端人拉绳索保持平衡。当与敌船靠近时，将巨石转到敌船上空，然后松开人拉的绳索，巨石便砸向敌船。巨石可反复使用，操作灵活。

㉖ 参见王赛时《论唐代的造船业》，《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冯汉镛《唐宋时代的造船业》，《历史教学》1957年10月号。

㉗ 张奎元、王常山编《中国全史·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163—164页。

㉘ 周世德《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㉙ 唐志拔编《中国舰船史》，海军出版社，1989年，76—77页。

㉚ （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79页。

㉛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南州异物志》云："外徼人随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后沓载之，张帆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能不避迅风激波，安而能疾也。"

㉜ 中国古代的一种驾风使帆技术，当船只在侧斜风向下行驶时，要使船只沿着既定方向航行，只要轮流调整航向，使船头方向与风向成一角度，使船能利用风力航行，这种调动船头的过程叫调戗；当遇到逆风时，通过调戗，使船走之字形，就可以将逆风变成侧斜风使船前进。参见周魁一、谭徐明《中华文化志·水利与交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80页。

㉝ 《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中华书局，1974年，1369页。

㉞ 《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中华书局，1972年，197页。

㉟ 戴念祖《中华文化志·物理与机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23页。

㊱ 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

洋出版社，1989年，336—345页；周魁一、谭徐明前引书252—257页。

㊲ 林文照《指南针和中国古代的磁学知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㊳《宋书》卷十八《礼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496页。

㊴ 望月信亨《佛教大事表》记载：乾封元年（666）"沙门智由携指南车至日本"（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147页），这表明唐初指南车并未失传。唐志拔前引书78页说：三至七世纪我国已出现指南针导航的萌芽。

㊵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337—344页。

㊶ 邱克《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船舶》，收入邱克《中国交通史论》，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

㊷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297页。

㊸（美）E.B.波特著，马炳忠等译《海上实力》，海洋出版社，1990年，2页。

㊹ 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182页。

㊺《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之比例将更大。

㊻《广东海防汇览》卷二十二《操练》记载有清乾隆年间水师操练情况及阵图，卷二十三《巡哨》记载有明清两代水师巡防情况，除火药用于军事，出现火炮（也称礮），并常以炮声代替鼓声发令外，余与唐初相比无质变，可予参考。

㊼《新唐书》卷一百十一《苏定方传》，中华书局，1975年，4139页。

㊽《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条引"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舟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条"覆我社稷，俘我君臣"。

㊾ 徐作生《古百济国400艘倭船遗踪查勘录》，《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

㊿（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二年八月》，东京吉川弘文馆，国史大系本。

51《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2791—2792页。

52 竺可桢《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

李松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唐前期，幽州在中国东北地区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唐六典》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河北道的北部边州，有安东都护府以及平、营、檀、妫等四州[①]。据此，唐政府在这一地区建立起了多层次的边疆防卫系统：最外边是加入作为中华帝国藩属的外族，如奚、契丹等；中间地带则是以羁縻州形式统治的内附的外族部落降户，如营州境内的各外族；内部则是唐朝驻有军队保护及文官管理的州县地方，如幽州[②]。唐朝的周边外蕃和羁縻都督府州都归边州管领[③]，幽州是唐朝东北防御体系的中心。

但是，这个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在武则天万岁通天（696—697）年间被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打破。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叛唐，占据了东北防御体系中的前沿阵地——营州。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奚、契丹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河北道南部的冀州。武则天虽然平定了这场叛乱，但是此后唐朝在东北地区的防御重点被迫从营州转移到了幽州地区。幽州继营州之后成为防御两蕃及其他东北诸族入侵的一道最主要防线，地位愈发重要。以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唐末五代形势的形成，莫不与此有关。而幽州东北的广大地区，则成了契丹族日后发展壮大的基地，其影响极为深远。

已经有学者对这次叛乱展开研究，日本学者松井等的《契丹勃兴史》详细论述了唐朝对契丹的政策和契丹逐渐兴起的外部原因，也指出了这次叛乱对营州、幽州两地防御形势的影响[④]；黄永年先生在《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一文中指出契丹的叛乱使得控制奚、契丹的第一线据点营

州失陷，第二线河北重镇幽州也岌岌可危，之后河北藩镇的出现也与奚、契丹的强大有关[⑤]；香港学者黄约瑟认为此次契丹之乱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局，唐朝对高句丽旧地的控制因此出现严重危机[⑥]。但是此次契丹叛乱对整个唐代东北防线，特别是对幽州防御地位的影响[⑦]，尚有待系统而深入地讨论。本文目的即是以李尽忠、孙万荣之乱为中心，探讨这次契丹叛乱造成的唐代东北防线之被迫调整以及幽州防御地位的提高和军事势力的坐大。

一、唐初的奚与契丹

隋文帝开皇五年（585）之后，契丹和奚相继内附于中国，此后部落渐众，实力益强，连突厥都对契丹畏惧三分[⑧]。隋炀帝大业（605—617）初年，契丹便曾入寇营州。大业元年八月："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⑨]到了唐朝，奚与契丹户口愈丰、占地愈广，逐渐成为唐在东北边境防御的主要外寇。《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略云：

> 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地方二千里，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619），入寇平州，贞观二年（628），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

同书同卷《奚传》略云：

> 奚国，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胜兵三万余人。万岁通天年，契丹叛后，奚众管属突厥，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

可见在高祖武德（618—626）初年，平州也遭到了契丹的侵扰。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亲征高句丽时，"至营州，会其（契丹）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



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10]。乃是采用怀柔的政策来安抚两蕃。

二、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前的东北防线

唐朝为了抵御突厥、高句丽、奚、契丹等这些蕃族，到高宗在位（650—683）时建立起了一种纵深的东北边境防御体系：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分别设有安东都护府以镇抚高句丽旧地；营州都督府以押两蕃和靺鞨；幽州都督府则防御突厥及两蕃。但是这一体系，到了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便被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打破。以后终唐之世再也未能完全恢复原貌。

关于安东都护府的设置及变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载：

> 总章元年(668)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上元三年(676)二月，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置。仪凤二年(677)，又移置于新城。圣历元年(698)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705)，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714)，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743)，移于辽西故郡城置。至德后废。

为统治高句丽旧地一百七十六城近七十万的被征服人口，高宗在总章元年只令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平壤城，而其余皆用“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明显是一种羁縻性质的统治，这是唐朝政府当时在东北地区势力所及的最远地方。但八年之后都护府治所便开始逐步向西北方向迁移，高宗上元三年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老城）；仪凤二年又北移置于新城（今辽宁抚顺城北高尔山）；到了玄宗开元二年（714）再南移治所于平州（今河北卢龙）。可见唐朝对高句丽旧地的统治不是很稳定[11]。

有隋一代及唐初，对东北边疆防线的经营，是以营州为前沿阵地展开的[12]。《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

营州上都督府隋柳城郡。武德元年(618),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万岁通天二年,为契丹李万荣所陷[案:应为万岁通天元年,为李尽忠所陷]。神龙元年(705),移府于幽州界置,仍领渔阳、玉田二县。开元四年[案:应为五年(717)],复移还柳城。八年,又往就渔阳。十一年,又还柳城旧治。天宝元年(742),改为柳城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营州。

直到玄宗天宝(742—756)年间,营州境内唐朝的编户齐民仍然不多,只有"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13]。在此地居住的多是内附的外族降户,营州也因此表现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如墓葬形式便"较多地保留了北朝的特征"[14]。

隋代,这一带有不同的民族聚居。"(隋)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靺鞨)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15]"(武德四年)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帅突地稽(度地稽)为燕州总管。"[16]此外"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度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17]。除了靺鞨族与契丹,贞观四年八月"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18]。而且早自北周(557—581)时期,营州地区的民族关系便相当复杂,高句丽、靺鞨、契丹等相继与中原王朝发生冲突[19]。因此要确保东北边境的安全,维持营州地区防御形势的稳定便十分重要。

为更好地统治内附之诸族降户,唐政府在营州地区设立了不少的羁縻州。《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



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根据《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和《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所记，安史乱前营州和幽州先后共管有二十二个羁縻州（见附表）[20]。计有契丹族十州，奚族四州，靺鞨族四州，突厥族两州，胡一州及海外新罗一州。其中又以契丹族户口最多。除了安置契丹的玄州、青山州；安置新罗的归义州和降胡的凛州这四个州外，其余各州在最初设置时均在营州界内，隶营州都督管辖。李尽忠、孙万荣乱后，营州陷于契丹，这些羁縻州多数暂时南迁于河南道徐、宋等州内[21]，中宗神龙（705—707）时虽然又北还，却并非还治于营州界内，而是悉数寄治于幽州内，改隶幽州都督。这就使得幽州成为继营州之后蕃族降户最多的一境。而且营州既陷，安东都护府与营州都督府均不能发挥其正常、稳定的防御作用，幽州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便不得不加强。

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契丹与奚也相继称臣，太宗曾在其故地设松漠和饶乐两都督府以安置各部。关于松漠都督府与饶乐都督府之设置，《唐会要》卷七十三营州都督府条略云："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丹酋长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府。各以其酋长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置饶乐都督府，拜可度著（者）为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府。二十三年，于营州兼置东夷都护，以统松漠饶乐之地。"与营州、幽州界内设置的羁縻州不同，由松漠、饶乐两都督府所领诸州均是在其部落故地，又一切依其旧俗，均以其本部酋长为刺史，并没有纳入唐朝的正式版籍之中。为管辖此两都督府，唐朝另设"东夷都护"以监理之。这些内属之部落，并非唐之编户齐民，只是名义上臣服唐廷而已，可以"外蕃"或"生番"视之；而前面所述侨治于河北道边界以内的羁縻州则可视为"内蕃"或"熟番"[22]。

以营州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防御体系，到高宗初年便已经发挥效用。史书载："永徽五年（654），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靺鞨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23]四年之后，即高宗显庆三年（658）"六

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峰镇，拔之，斩首四百余级，捕虏百余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㉔。可知在平定高句丽之前，营州与松漠、饶乐都督府牛角相犄，共拒高句丽以及靺鞨之侵边，出力颇多。同时，营州又可随时查知两蕃之动静，防其反叛。所以总章元年(668)高句丽被平定，营州及松漠、饶乐都督府应该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唐朝在幽州境内设置了府兵、军、镇城、戍等各级军事机构㉕，目的也是要担负防御、安抚北方诸族的任务。据《唐故颍州下蔡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墓志主人李信在贞观初年任昌平县令："县冲要壤，豪彦连镳；塞草缱衰，北藩多警。君扇以威福，示以宪章，令若风从，于是乎肃"㉖。而且幽州境内又户口殷实，《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

> 幽州大都督府　隋为涿郡。武德元年，改为幽州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旧领县十，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口十万二千七十九。天宝：县十，户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二，口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二。今领县九。

可见到了玄宗天宝(742—756)时幽州编户齐民已经有十七万多口，再加上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后，原营州界内羁縻州又悉寄治于幽州界内，蕃族户口也因而比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由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到了高宗总章(668—670)年间，唐朝东北边境已经较为安定。高句丽被平定，其故地由安东都护府统治㉗；契丹、奚、靺鞨等族内附之降户，被置于营州界内，由营州都督府管辖；营州西北的广阔地带，则有松漠、饶乐两都督府，共同为唐抵御高句丽、靺鞨、突厥等外族的侵边。有了外围这两道防线，幽州才可避免与入寇的东北外族直接冲突。可是这种边疆秩序，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668—696)的时间便被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打破，唐代东北的边防政策被迫进行调整：失去了安东和营州这两道外围防线的保护和协助，幽州遂成为



东北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州，军事地位随之提高。

二、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的经过和影响

关于李尽忠、孙万荣之乱，《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

万岁通天元年（696），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神功元年（697），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六月，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六月）甲午，孙万荣为奴所杀。[28]

李尽忠时为松漠都督，乃是唐初就内附的契丹君长窟哥的后裔[29]。而孙万荣则是羁縻州归诚州的刺史，其先辈也早在高祖武德初年便归附唐朝[30]，唐朝对两人俱授以官职。孙万荣更曾作为侍子入朝，因此熟知中原险易[31]。此次叛乱，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时间长。从696年五月直至697年六月，战争持续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唐朝军队两次大败于平州，主将或是被擒，或是阵亡，士兵更是伤亡惨重。

其次是范围广。此次契丹之入寇，不同于以往仅仅限于边境之抄略，

而是最南攻到了河北道的冀州，使得整个“河北震动”。李尽忠、孙万荣两人，在696年五月占领了营州之后，当年七月便“进围檀州”；八月又大败唐兵于平州西硖石谷，进而又围安东；十月攻陷冀州，“屠吏民数千人”；次年(697)三月，又大败王孝杰于平州东硖石谷，“(王)孝杰死之”；之后进寇幽州；六月“屠赵州”。可见李尽忠、孙万荣不但占领了辽西营州，而且攻掠了河北道北部的檀州、平州、幽州、定州[32]、易州[33]、冀州、赵州等多处州县。契丹、奚屠城掠货，造成了河北道这几个州县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如果不是突厥默啜从背后夹击契丹，单凭唐军之实力，想要一举扫平此次叛乱，恐怕很难成功。史书载：“(万岁通天元年)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34]及“(孙)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向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恟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35]

第三，这次契丹叛乱之后，东突厥默啜的崛起也对唐朝东北的防御体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两蕃又依附于突厥，从而成为此时中国东北方之大患。《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

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默啜



遣使上言:“请还河西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遂攻讨契丹,部众大溃,尽获其家口,默啜自此兵众渐盛。……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其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在平定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时,默啜曾立下大功,但在孙万荣被平定后一年,即圣历元年(698)八月,突厥便入寇河北,攻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九月)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36]此后两蕃臣服于突厥,俘虏了唐朝军将便献于默啜:“(孙)佺、(周)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37]。即使在平定契丹叛乱之后,逃散的奚、契丹也是降于默啜,而非向唐臣服。直至开元四年(716)六月突厥默啜败亡[38],奚、契丹暂时无所依附,才降于唐朝[39]。玄宗也是在此时才先后复置松漠、饶乐两都督府[40],复置营州于柳城旧址。东北边疆诸族政治关系和军事实力的改变,给了唐玄宗再次安定这一地区的机会[41]。

契丹乱时,渤海靺鞨也乘机兴起。高句丽被平定后九年即高宗仪凤二年(677),由于高句丽南境旧地被新罗所占,高句丽与百济的民众散入靺鞨及突厥境内,此后靺鞨户口渐众[42]。契丹的叛乱,恰好又给了靺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机会。《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渤海靺鞨传》: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

自高句丽灭亡到契丹叛乱,大祚荣在营州居住了近三十年,又借此次契丹叛乱之际“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武则天在平定李尽忠、孙万荣

之乱后，虽然派兵讨其余党，却大败而回。又"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大祚荣遂据地而王。到了玄宗朝，渤海靺鞨也入寇东北：开元二十年九月"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43]。可见渤海靺鞨与奚、契丹一样，都成了唐朝在东北要防御的边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唐朝多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东北边疆防线被打破：塞外营州与安东都护府这两道防御屏障失守，使得此后唐朝东北防线的重心被迫南移到了幽州一带，玄宗不得不在此地大力加强军事防御力量，以确保东北边疆防线的稳定。

营州在696年陷于契丹之后，幽州东北的广大地区，唐朝已经不能完全有效控制：中宗神龙元年(705)被迫"移(营州都督)府于幽州界治，仍领渔阳、玉田二县"[44]。而且幽州东北的属县也受到了蕃族的入侵。睿宗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奚、霫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45]。幽州都督此时直接负起了防御外蕃入侵的责任。睿宗时也曾令幽州都督主动出击讨伐两蕃，却失败而回：延和元年(712)六月"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46]。玄宗即位，努力想恢复营州这一前沿阵地，发挥其与幽州的犄角作用。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派兵击契丹，欲复置营州于旧地。《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

> 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是后寄治于幽州东渔阳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正月)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可是这次军事行动依然没有成功，唐军还是大败而回[47]。玄宗要直到开元五年，突厥政乱衰落，两蕃降服，才成功复置营州于柳城旧地。《旧唐书》



卷一百八十五《宋庆礼传》：

> 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

但玄宗辛苦恢复和经营的营州，不过三年即到了开元八年(720)再次被契丹攻占，得而复失，“又往就渔阳”[48]。营州都督府在696年到717年这二十多年间，没能起到唐朝初期那样的重要作用，而开元八年之后在东北边境中所起到的防御作用也不稳定。如在开元十一年营州曾经还柳城旧治[49]，但是到了开元十三年，契丹松漠郡王吐干因为与可突于不睦，“携公主来奔，便不敢还，改封辽阳郡王，因留宿卫。可突于立李尽忠弟邵固为主”[50]。可突于更是在开元十八年叛唐而降于突厥[51]，玄宗立即“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52]。可见此时防御奚与契丹入侵的重任需要幽州的直接参与了。玄宗因此加强了幽州地区的军事力量，以确保东北边疆之安全。史载：先天元年八月“乙巳，于鄚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53]；同年十一月“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54]。可见在幽州地区加强防御力量已经很有必要。

经过开天年间对幽州和营州的建设，安史乱前东北边境上范阳(幽州)节度使已经统兵九万一千四百人，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平卢(营州)节度统平卢、卢龙两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两州之境，兵三万七千五百人[55]。已经身兼两镇的安禄山又于天宝十载(751)求兼河东节度使，这样一人统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道兵马，唐朝本想用来防御突厥、两蕃以及渤海靺鞨等东北诸族的军队，反而被安禄山驱之为寇，入侵中原。《资治通鉴》在论述安禄山叛乱原因时，有这样的记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

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56]。其实，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后，东北两蕃的实力逐渐增强。到了玄宗朝更是时降时叛，对幽州甚至河北道其他诸州均威胁极大。玄宗为确保东北边界之安全，恢复东北防线上营州、幽州两地的犄角之势，在努力经营营州的同时，又加强幽州的军事力量，本乃不得已而为之，不料却给了安禄山专制河北精兵发动叛乱以倾天下的机会。

四、结　语

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之后，唐朝被迫在东北边境实行退守防御的政策。经过玄宗朝对河北幽州地区的建设，唐代东北边防体系中形成了幽州的军事中心地位，营州则成了幽州的从属配合力量。范阳节度常兼平卢军使因而十分强大，这便为安禄山发动叛乱，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万岁通天元年的契丹叛乱，犹如安史之乱的前奏。由于这场叛乱，使得唐朝前期辛苦经营多年的东北防御重镇——营州一度陷入契丹之手，唐朝被迫将东北经营的重心转移到了幽州一线，大力加强此地的军事防御力量，以确保东北边境乃至河北道的安全。孰料却养虎为患，最终导致了安禄山在幽州的坐大；随后又有"河朔割据"，遂开中晚唐直至五代之政治格局；松漠、辽西的广大地区，也逐渐为契丹所有，为契丹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



附表：安史乱前营州、幽州境内羁縻州表

（据《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和《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族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口
威州	契丹内稽部落	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自燕支城徙寄治营州城内。七年废总管府。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	威化，后契丹陷营州乃南迁，寄治于良乡县石窟堡，为威化县、州所治也。	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户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
玄州	契丹李去闾部落	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静蕃，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	天宝领县一，户六百一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青山州	契丹李去闾部落	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青山，寄治于范阳县界水门村。	领县一，户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一十五。
师州	契丹室韦部落	贞观三年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	阳师，贞观初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故号师州。神龙中，自青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为州治，县在焉。	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户三百一十四，口三千二百一十五。（案：此处户口数恐有误记）

续表

	族　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　口
带州	契丹乙失革部落	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孤竹，旧治营州界。州陷契丹后，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为州治。	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昌州	契丹松漠部落	贞观二年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龙山，贞观二年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静蕃戍。七年移治于三合镇。营州陷契丹，乃迁于安次县古常道城，为州治。	旧领县一，户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宝，户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
沃州	契丹松漠部落	载初中析昌州置，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于幽州，隶幽州都督。	滨海，沃州本寄治营州城内，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县东南回城，为治所。	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五十九，口六百一十九。
信州	契丹失活部落	万岁通天元年置，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黄龙，州所治，寄治范阳县。	天宝领县一，户四百一十四，口一千六百。



续表

	族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口
归顺州[57]	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	开元四年置。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	良乡之广阳城。	天宝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
归诚州[58]				
以上处契丹各部落,共十州。天宝时可考人口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九。				

	族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口
崇州	奚可汗部落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隶营州都督。	昌黎,贞观二年置北黎州,寄治营州东北废阳师镇。八年改为崇州置昌黎县。契丹陷营州,徙治于潞县之古潞城,为县。	旧领县一,户一百四十,口五百五十四。天宝,户二百,口七百十六。
鲜州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	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宾从,初置营州界,自青州还寄治潞县之古潞城。	天宝领县一,户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
顺化州[59]			怀远县	(待考)
归义州[60]	李诗琐高部		归义县	五千余帐
以上处奚部落,共四州。天宝时共有人口一千零八十三。				

	族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口
燕州[61]	粟皆鞅鞨别种（粟末鞅鞨）	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	辽西，州所治县也。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	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鞅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慎州	涑沫鞅鞨乌素固部落[62]	武德初置，隶营州。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逢龙，契丹陷营州后乃南迁，寄治于良乡县之都乡城，为逢龙县，州所治也。	天宝领县一，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
黎州	浮渝鞅鞨乌素固部落	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新黎，自宋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都乡城。	天宝领县一，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续表

	族　　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　　口
夷宾州	靺鞨愁思岭部落。	乾封中于营州界内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来苏，自徐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古广阳城。	领县一，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
以上处靺鞨族，共四州。天宝时共有人口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五。				

	族　　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　　口
瑞州	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	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来远，旧县在营州界。州陷契丹后，移治于良乡县之故广阳城。	旧领县一，户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顺州[63]	东突厥突利可汗部	贞观六年置，寄治营州南五柳城。天宝元年改为顺义郡。乾元元年复为顺州。	宾义。	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
以上处突厥，共二州。天宝时共有人口五千七百八十一。				

	族　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　口
归义州[64]	海外新罗	总章中置，隶幽州都督。	归义，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	旧领县一，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处海外新罗。州一。有人口六百二十四。				

	族　属	设置及变迁	治所及领县	户　口
瀼州	胡	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		领县一，户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处降胡。州一。有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注释：

①（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三秦出版社影印（日）广池千九郎本（本文引《六典》皆为此本），1991年，64页上栏。

②（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页。

③ 参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页。

④（日）松井等著、刘凤翥译、邢复礼校《契丹勃兴史》，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10辑（1981年），1—50页。

⑤ 收入氏著《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中华书局，2000年，263—291页。

⑥ 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收入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61—79页。

⑦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一书（79—80页）指出："这次叛乱迫使朝廷改变了对东北防御的态度。"但是他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

⑧《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73年，1869页。

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炀帝大业元年"契丹寇营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资治通鉴》均为此本），1982年，5621—5622页。

⑩《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5350页。

⑪ 关于安东都护府的迁移原因和详细情形，参看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1—72页。

⑫ 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已收入本书）：营州"其地位于辽西走廊，北通契丹、靺鞨，东接高句丽，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地位都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64页。

⑬《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1页。

⑭ 见本书所收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

⑮《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靺鞨传》，1822页。

⑯《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庚申条，5906页。

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5350页。

⑱《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贞观四年"突厥既亡"条，6082页。

⑲ 前引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163页以下。

⑳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第六章第四节《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的设置与迁徙》，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0—108页；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203页。

㉑《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1128页。

㉒ 关于“外蕃”、“内蕃”之定义，参看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一文，载氏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136—162 页。

㉓《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高宗永徽五年“高丽遣其将安固”条，6286 页。

㉔《资治通鉴》卷二百唐高宗显庆三年六月条，6309 页。

㉕《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1019 页。

㉖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永徽一〇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97 页。

㉗ 从总章元年至万岁通天元年，安东都护府的治所虽然有两次迁徙（见前引《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所载安东都护府条），但是其势力范围，仍然在营州之东北。

㉘ 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及卷二百六中有关李尽忠、孙万荣之乱的记载，6505—6522 页。

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载：“（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显庆初，又拜窟哥为左监门大将军。其曾孙祐莫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尽忠即窟哥之胤，历位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5350 页）然《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契丹传》记祐莫离和李尽忠俱为窟哥之孙：“窟哥死，与奚连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窟哥有二孙：曰祐莫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封归顺郡王；曰尽忠，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6168 页）而非《旧唐书》所载为曾孙，未详孰是。

㉚《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侵侮，二人遂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5350 页）而《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契丹传》则曰：“而敖曹有孙曰万荣，为归诚州刺史。”（6168 页）未详孰是。

㉛《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契丹传》，6168 页。

㉜《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定州博陵郡条”载：“义丰，万岁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立节，神龙元年复故名。北平，万岁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徇忠，神龙元年复故名。”（1018—1019 页）

㉝ 同上书同卷“易州上谷郡条”载：“容城，上，本遒。……圣历二年（案：应为万岁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全忠，神龙二年复故名，天宝元年又更名。”（1019 页）

㉞《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条，6510 页。

㉟《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神功元年“武懿宗军至赵州”条，6521—6522 页。

㊱ 同上书同卷则天后圣历元年九月癸未条，6535 页。

㊲《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玄宗先天元年六月庚申条，6673页。

㊳《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四年六月癸酉条，6719页。

㊴《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5351页；同书同卷《奚传》，5355页。

㊵《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四年七月辛未条，6720页。

㊶ 关于这段时期内突厥、两蕃、渤海、新罗之间的关系，可参看黄约瑟《读〈曲江集〉所收唐与渤海及新罗敕书》（《黄约瑟隋唐史论集》，81—113页）；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已收入本书），《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55—171页。

㊷《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仪凤二年"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条，6382—6383页。

㊸《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渤海靺鞨传》，5361页。

㊹《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1页。

㊺《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壬辰条，6659—6660页。

㊻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先天元年六月庚申条，6672页。

㊼《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薛讷与左监门卫杜宾客"条，6702—6703页。

㊽《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1页。又《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5352页。

㊾《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1页。

㊿《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5352页。

51《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初契丹王李邵固"条，6789页。

52 同上注。

53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条，6675页。

54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乙酉条，6678页

55 同上书卷二百十五唐玄宗天宝元年春正月壬子条，6847—6851页。

56《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己巳条，6888—6889页。

57《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所记大致与《旧唐书》同，惟《新唐书》记归顺州归化郡为处契丹之羁縻州，而《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将其划为幽州都督府辖下之一州。但据《旧唐书》载："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天宝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在京师二千六百里，至东都一千七百一十里。"（1520页）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载："其（窟哥）曾孙祐　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5350页）可见与前面十七州一样，均是为安置降蕃所设，故应为羁縻州。《新唐书》是。

58 案《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北狄·契丹传》载："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

刺史，封永乐县公。"（5350页）则"归诚州"也是安置内附契丹的羁縻州之一，与《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所载相合（1126—1127页）。

⑲《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载："开元二十九年，幽州节度副使领平卢军节度副使，治顺化州。"（1836页）又（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开元二十九年）"时（张）利贞归朝，盛称禄山之美，遂授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度支、营田、水利、陆运使副，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3页）

⑳《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载："归义州归德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1126页）然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载：（开元二十年三月）"信安王祎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己巳，祎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于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6797页）可知归义州此时为处奚李诗琐高部。

㉑《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记为非羁縻州。然据同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记载："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土贡：豹尾。是年，省泸河。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曰归德郡。户二千四十五，口万一千六百三。"（1019—1020页）可知燕州为羁縻州，《旧唐书》是。

㉒《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武德初以涑沫、乌素固部落置。"（1127页）

㉓ 同上书同卷："顺州顺义郡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营）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隶顺州；后皆省。祐、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岁贡麝香。县一：宾义。"（1125页）《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为："贞观六年置，寄治营州南五柳城。"（1520页）

㉔ 参看前注㉑。

试论安史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

李松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指出："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①同书又云："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②陈先生在此已经指出了唐代，特别是唐初在制定山东政策时采取的原则③：即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压抑歧视山东的豪门大族，并且在军事上采用消极防御的东北边疆政策，同时还要重点防范"山东豪杰"这一武装集团④。这样一方面可以集重兵于西北以确保长安地区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山东地区因为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危及关陇集团的统治，从而可以确保"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行。

有学者指出："我们也看到，迄至唐高宗时期，同样以关陇为本位的隋唐王朝，在经营西部的同时，也曾积极经营中国的北方和东北，其原因究竟何在？""唐继亡隋之业而灭高句丽所追求的仍然是一个'安全边界'，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⑤隋炀帝和唐太宗均曾亲征高句丽，除了想遏制高句丽在东北边境领土扩张的野心之外，也是要防止山东边境之人与高句丽勾结，威胁东北边境甚至中原地区的安全⑥。唐总章元年（668）平灭高句丽之后，唐朝东北的"安全边境"维持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但是在武则天万岁通天（696—697）年间，这条边境线被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的叛乱破坏。防御东北诸族入侵的前沿阵地——营州失陷，这就使得东

北边疆防线的重心被迫由原来的营州移到了幽州一线，幽州成了玄宗朝（713—756）东北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⑦]。

前辈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和文化层面着眼，探讨了唐代初期的统治者针对山东境内不同的社会集团，分别采取了压抑和歧视之政策，结果造成了山东地区百姓对关陇集团的离心力[⑧]。惜未能特别指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之后，东北边疆政策的被迫调整和幽州军事地位的加强，也正是促成安史之乱（755—763）的原因之一。本文的目的就是讨论武则天平定契丹叛乱之后至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近六十年间，唐代东北边疆秩序、军事形势的转变，以及安禄山又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叛乱的。

一

幽州在隋朝时便已经是东北的重要州郡，《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 “涿郡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改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九，户八万四千五十九。……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

此地人多勇侠、户口殷实，北部属县又多“连接边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基地。降至唐代，幽州的地位依然重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

> 幽州大都督府，隋为涿郡。武德元年（618），改为幽州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武德）六年，改总管为大总管，管三十九州。七年，改为大都督府，又改涿县为范阳。九年，改大都督为都督。幽、易、景、瀛、东盐、沧、蒲、蠡、北义、燕、营、辽、平、檀、玄、北燕等十七州。……开元十三年（725），升为大都督



府。……天宝元年(742),改范阳郡。……旧领县十……户二万一千六百九十八,口十万二千七十九。天宝,县十,户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二,口十七万一千三百一十二。

而且自高祖武德(618—626)时,幽州便是防御东北诸族入侵的一个重镇。史书载:"(武德六年五月)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9]八月"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10]。突厥也在此年屡屡入侵幽州[11]。故时人墓志中说幽州昌平县"县冲要壤,豪彦连甍;塞草才衰,北藩多警"[12]。实非虚语。到了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幽州地区的人口达到了十七万多,成为唐朝在东北的重要军事、行政基地。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之后,东北边境的前沿阵地——营州失陷,山东、河北的局势也变得不稳定[13]。营州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均暂时侨治于幽州境内,因此幽州逐渐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军事防御中心,地位变得异常重要。而且山东境内自唐初以来便潜伏着一股厌唐的反抗力量[14],因此加强幽州的军事力量,充分发挥其防御两蕃及东北诸族入侵的作用,也有利于稳定山东的局势。

营州失陷于契丹后,直至二十一年后即开元五年(717)才被玄宗复置于柳城旧址[15]。这段时期内,东北外族的入侵往往直接威胁幽州甚至河北道北部诸州的安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八月,突厥默啜"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16]。武则天在契丹叛乱之后立即加强了山东地区的军事建设。早在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便"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17]。接着在圣历二年十二月"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18]。在黄河以南地区也设置了"武骑团"[19]。长安二年(702)"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

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20]。可知此时山东地区还有“山东防御军大使”节度数州军马，而且幽州刺史更要“专知幽、平、妫、檀防御”，是幽州在东北边境上的防御地位比以前更加明确和重要了。中宗继位，也是务求稳定山东局势。《唐故云麾将军右金吾将军上柱国渔阳县开国子阎公墓志铭并序》中载：“公讳虔福，……今天子中兴之际，公自镇来朝，……又以山东空虚，虑有变故，转公为河北道诸军州防御大使。”[21]突厥的屡次侵边，迫使武则天和中宗均要加强山东地区的兵力，这样以幽州为重心的东北防御体系便逐渐形成。

睿宗景云元年（710）十月“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22]；“（十二月）壬辰，奚、霫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23]。此时幽州东北的属县，已经受到奚、霫等的侵扰，幽州都督直接负起了讨伐任务。延和元年（712）睿宗又令幽州都督孙佺率兵主动攻打两蕃：“（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酺战于冷陉，全军覆没。是时，佺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骑八千，分为三军，以袭奚、契丹……佺、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楷洛、可利脱归。”[24]可见此时幽州要同时防御突厥、奚、契丹、霫等的入侵，责任重大。

二

契丹叛乱之后，不仅两蕃频频侵扰唐朝的东北边州，而且突厥默啜的倔强，渤海靺鞨的兴起，都是对东北防线的重大威胁。由于安东都护府及营州的退守，使得幽州成了东北甚至整个中原地区的最后屏障，防御阵地已经不能再南移了，只有加强这一地区的军力，才能确保河北道的安全。然而唐朝的战略重点既然一直是西北地区[25]，在东北边境采取消极防御政策[26]，于是只好用“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长算”[27]的传统策略，镇



抚两蕃，力求稳定东北边境和山东局势。到了天宝(742—756)年间玄宗更将东北防御的重任，完全交给了“营州杂种胡”——安禄山[28]。安禄山便利用身兼范阳、平卢节度使的机会，率领东北边防之精兵反戈一击，起而叛唐。唐朝的东北边防重镇幽州，反而成为安史叛军的基地。

延和元年(712)八月庚子玄宗即位，登基后数日便于河北北部屯置重兵，其本意也是要防御两蕃及突厥的侵边。史书载：“(先天元年八月)乙巳，于鄚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29]玄宗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三个月后“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门不出，虏大掠而去”。[30]于是，玄宗在开元元年(713)于幽州“置防御大使”[31]，并于二年夏出兵讨伐两蕃。《旧唐书》卷九十三《薛讷传》：

时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薛)讷建议请出师讨之。开元二年夏，诏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吏崔宣道等率众二万，出檀州道以讨契丹等。杜宾客以为时属炎暑，将士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恐难为制胜。中书令姚元崇亦以为然。讷独曰：“夏月草茂，羔犊生息之际，不费粮储，亦可渐进。一举振国威灵，不可失也。”时议咸以为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六月，师至滦河，遇贼，时既蒸暑，诸将失计会，尽为契丹等所覆。讷脱身走免，归罪于崔宣道及蕃将李思敬等八人，诏尽令斩之，特免杜宾客之罪。

唐军在滦河大败于契丹，表明此时幽州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主动出击讨伐两蕃。于是玄宗在同年“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治幽州。置营平镇守，治太平州(案：应为平州)”。[32]进一步加强幽州的军力。之前设置了渤海军、恒阳军和怀柔军，此时又增置了营平镇守，可见东北近边诸州均加强了兵力。且原本在幽州境内设立的防御大使更是升为“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33]，统领六州之军队。时人孙逖在《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文贞张公遗爱颂并序》中写到：“开元六祀，宅于幽朔……先是，公之未至也，军实耗

敦，边储匮少。籓藏乏中人之产，革车无百驷之群。将欲丰之，不其难也。公问以谣俗，因而化之。……一年而财用肃给，二年而蓄聚饶羡。军声武备，百倍于往时矣。”[34]颂文虽不免有夸大不实之处，但从中也可得知幽州地区的武备军力在开元初期确实比较薄弱，有待近一步加强[35]。

开元四年(716)六月，屡为边患的突厥默啜在征伐拔曳固时被杀[36]，奚、契丹、拔曳固等相继内附。“(七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酺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37]在恢复松漠、饶乐两都督府之后，唐朝即利用这个时机，于开元五年恢复营州都督府于柳城旧址，且增设平卢军于营州境内。这样不但可以分担幽州单独防御东北边境的重任，而且还能加强营州地区的军力，恢复其经略东北的前沿阵地作用[38]。《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宋庆礼传》：

>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侍中宋璟固争以为不可，独庆礼甚陈其利。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

同年又于“营州置平卢军使。(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节度、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39]。可见当时平卢军节度使与幽州节度使权力范围一样，兼有军事、经济等多种职责。

唐朝更于开元五年四月，以固安公主嫁奚王李大酺；十二月以永乐公主妻契丹王李失活[40]，很明显是想利用和亲的方法，来安抚两蕃。但是到了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41]。突厥既强，契丹遂附之，复背叛唐朝。“契丹牙官可突于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



之。是岁，可突于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酺皆为可突于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于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于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42]营州在复置三年之后，又陷于契丹，治所也被迫西入渝关，营州都督复隶于幽州节度使[43]。而玄宗对契丹的反叛，并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讨伐行动，而是“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但也是在这一年，玄宗制“幽州节度兼本军州经略大使，并节度河北诸军大使”[44]。此后河北诸军皆由幽州节度使统领，幽州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开元十一年(723)，营州“又还柳城旧治”[45]，这恐怕是因为开元十年(722)唐朝与契丹和亲[46]，关系改善的缘故。十三年(725)“可突于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玄宗)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柝)军经略大使”[47]，次年玄宗又嫁公主于两蕃[48]，努力安抚奚与契丹。

由此可见，自开元五年(717)起唐朝在怀柔安抚两蕃的同时，也致力于经营幽州和营州，力求东北边境的稳定。此后数年间，继续对幽州的建设。开元十四年四月“辛丑，于定、恒、莫、易、沧等五州置军以备突厥”[49]。这五州所置军，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范阳节度使”条载：“……北平军，在定州西三里；恒阳军，恒州郭下；高阳军，本瀛州。开元二十年移在易州；唐兴军，在莫州；横海军，在沧州；并开元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置，各以刺史为使。”又《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其横海、高阳、唐兴、恒阳、北平等五军，皆本州刺史为使(注曰：其兵各一万人，十月已后募，分为三番教习。五千人置总管一人，以折冲充；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戍官充)。”由此可见这些州境内又当驻有府兵，而且府兵与此时设置的“军”，关系十分密切。府兵的折冲、果毅、别将等将领兼军内总管、子将、押官等职。又由前文可知，玄宗早在先天元年(712)八月，已经“于鄚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则是知“渤海军”此时称为“唐兴

军";"恒阳军"在恒州境内;定州境内又多了"北平军"。又据《唐六典》卷五记载开元年间幽州节度使所辖军镇:"幽州节度使,其统有经略、平卢、静塞、威武、清夷、横海、高阳、唐兴、恒阳、北平十军;安东镇守、渝关守捉、北平守捉三使属焉。"[50] 横海以下等五军虽然以本州刺史充军使,但是它们依然归幽州节度使统辖,可见这时的幽州节度使已经领有全部河北道北部缘边诸州的驻军。开元十五年(727),"幽州节度大使兼河北支度营田使"[51],从此河北财政大权亦归幽州节度使所有了。

唐朝的和亲安抚政策在此后的三年间似乎发挥了作用,两蕃和突厥均少为边患,东北边境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朝廷也得以在这期间集中专注于安辑西北,讨伐吐蕃。开元十八年(730)"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自是吐蕃复款附"[52]。然而这年五月,契丹又叛:"可突于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53]。可突于杀的契丹王邵固,是亲唐朝的大贺氏末主;而拥立的却是亲突厥的遥辇氏屈烈[54],故"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平卢军不知当时是否在营州境内,但从玄宗"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来分析,营州平卢军起到的作用似乎不是很直接。

对于契丹的这次叛唐,唐朝不再姑息,而是出动大军讨伐,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依仗幽州的力量。开元二十年(732)"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55]。"(二月)己巳,祎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于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祎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56],同



时，进一步增加幽州节度使的权力："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鄚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营州和河北道南部的数州也归幽州节度使管辖，节度使又兼"采访处置使"，显然是拥有了更大的民政权力。两年之后，幽州显示了它的军事作用：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壬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献捷"[57]。十二月"乙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于，传首"[58]。唐朝暂时平定了连年的东北边患。

设立于开元五年(717)的平卢军在这段时期内也多次参加了对奚、契丹的战争，如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契丹)可突于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59]。到了开元二十年(732)唐信安王祎大破奚、契丹，平卢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60]。且玄宗此时还委任了一些熟悉东北地区边疆地形，而又骁勇善战的蕃将，以求达到"以蛮夷攻蛮夷"的目的。如任用乌罗护人乌知义为幽州节度副使(开元十九年)、平卢节度使(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契丹李过折为幽州节度副使(开元二十三年)[61]。安禄山、史思明也正是此时崛起于平卢军中的。

三

开元二十三年(735)，"契丹王过折为其臣涅礼所杀，并其诸子，一子刺乾奔安东得免。……突厥寻引兵东侵奚、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共击破之"[62]。玄宗在《敕平卢使乌知义书》中说："两蕃既已归我，突厥仍敢犯边，此其不顺，诚可残灭。近闻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谋，同破凶丑，卿亦继进，相与成功。"[63]可见平卢军在此役击败突厥的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军事作用。这次胜利之后，张九龄以为"北虏震慑，从此气衰；东胡保边，永不携贰；宽徭罢柝，自此可期"[64]。君臣希望的都是在东北边境以夷制夷，息兵养民。可是一年之后，两蕃又叛，于是"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请斩之"[65]。安禄山从此在幽州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安禄山一家是在开元四年(716)默啜死后突厥势力减弱时,与族人一起逃出突厥归顺唐朝的[66]。此后逐步迁移至东北幽、营一带。《安禄山事迹》卷上:

> 开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将军安道買男孝节并波注男思顺文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之。禄山年十余岁,贞节与其兄孝节相携而至,遂与禄山及思顺并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禄山焉。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时,以安禄山、史思明为捉生将[67]。安禄山素习幽州、营州一带的山川、井泉[68],可见其在此地已经居住很久了。若据《安禄山事迹》一书记载,肃宗至德二载(757)安禄山被杀时五十五岁,则安禄山应该出生于公元703年,开元二十一年时为三十一岁。至于史思明"与安禄山共乡里,生先禄山一日,故长相善。……天宝初,累杝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入奏,帝赐坐与语,奇之,问年,曰:'四十矣。'抚其背曰:'尔贵在晚,勉之。'迁大将军、北平太守"[69]。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乘唐玄宗在东北边境委任骁勇善战之蕃将来安抚、钳制两蕃的机会,逐渐取得了朝廷的宠任。

玄宗在平灭可突于后继续对幽州和营州的建设,而且愈发依赖和信任安禄山。史书载:"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倾巧,善事人,人多誉之。上左右至平卢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曲事利贞,乃至左右皆有赂。利贞入奏,盛称禄山之美。(开元二十九年)八月,乙未,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70]安禄山首先取得了营州地区的军权,"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以禄山摄中丞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宠之。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71]。玄宗分平卢别为节度使,其管辖的地区已经不仅是营州一地,而且还包括了平州,权力也相应增大了。天宝二年(743),安禄山又奏置怀远军[72],隶范阳节度使;同年玄

宗置卢龙军，隶平卢节度使[73]。到了天宝九载(750)“五月，乙卯，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74]安禄山不仅领有了幽、营地区的军事大权，连河北道的行政权也被其掌握了。“(天宝)十载入朝，又求为任河东节度，因拜之。……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75]至此用来防御两蕃和东北诸族的精兵尽归安禄山所有，他已经有了起兵叛唐的充分实力和可能。

经过玄宗开天年间三十多年的努力经营，到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的军力已经是天下之冠。《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略云：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原注：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

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原注：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匹。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

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这两个东北边境最重要的节度使之职，统兵近十一万，约占了唐朝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

结　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东北边境形势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打破了唐朝本来的防御体系：营州一度失陷，使得幽州被迫负起抵抗东北诸蕃入侵的责任。奚、契丹的日益强大与时时扰边，迫使唐朝除了调整对两蕃的政策外，不

得不在河北，特别是在幽州地区强化军防。与此同时，唐朝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则不得不于东北边防采取消极防御之政略，避免西北与东北同时两线作战。安禄山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暗中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消极防御，积极囤积，凭借自己“杂种胡”人的身分取得当地诸蕃之信任[76]，终于在唐朝最为繁盛之时起兵作乱，化边防为内蕃，化汉为胡[77]、用夷变夏。

开天盛世，社会的繁荣稳定掩蔽了朝廷对河北——幽州政策作冷静思考。唐玄宗鉴于东北边境军事形势的变化，不得已改变了唐自立国以来对山东的态度，被迫全力倚仗地方社会力量尤其是胡人熟番来抗御东北诸族，特别是塞外两蕃之入侵。但孰料地方军事力量的加强，却给了蕃将安禄山手握重兵，一举而倾天下的机会，其间教训，谁谓不深。

注释:

①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6页。

② 同上书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30页。

③ 本文所指的“山东”地区，以唐代河北道河南道地区为主。史书中的河北、山东地区，所指其实为同一地区。本文为引用史料方便，故仍用其旧名。特此注明，以免误解。

④ 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说：“隋末唐初之史乘屡见‘山东豪杰’之语。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17页。

⑤ 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已收入本书），《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57—176页。

⑥ E.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77; 上引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一文。

⑦ 参本书所收拙文《论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

⑧ 如谷霁光先生指出此种政策造成了山东士民的积恨心理，安史之乱的爆发，



直接或间接都与这种心理有关(参《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第19期,197—209页。后收入《谷霁光史学文集》第四卷,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80—191页);外国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The Backgrou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pp.75—81);汪篯先生又从文化背景出发,论述了太宗、高宗、武后及玄宗等朝在用人方面对山东,特别是对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不同态度(参汪篯《唐太宗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收入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32—188页及196—208页)

⑨ (宋)司马光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高祖武德六年五月癸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资治通鉴》均用此本),1982年,5968页。

⑩ 同上书同卷唐高祖武德六年"高开道"条,5971页。

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高祖武德六年九月庚寅、壬寅条,5972页。

⑫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永徽一〇三《唐故颍州下蔡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97页。

⑬ 参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181—182页;《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75年,2891—2892页

⑭ 参《旧唐书》卷六十《宗室·庐江王瑗传》,2351页;《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附徐敬业传》,3823页。

⑮《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良吏·宋庆礼传》,4814页。

⑯《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戊子条,6531页。

⑰《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夏五月条,6507页。

⑱《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圣历二年"河南北"条,6539页。

⑲ 关于"团结兵",参看《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三秦出版社影印(日)广池千九郎本(本文引《六典》皆为此本),1991年,120页上栏。

⑳《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则天后长安二年"突厥寇盐夏二州"条,6558页。

㉑《唐代墓志汇编》,景龙〇〇二,1077—1078页。

㉒《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睿宗景云元年十月丁酉条,6656页。

㉓ 同上书同卷唐睿宗景云元年十二月壬辰条,6659—6660页。

㉔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先天元年六月庚申条,6672—6673页。

㉕ 参前引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30—136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一至第四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㉖ 上引陈寅恪文,136—147页。

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5171页。

㉘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页。

㉙《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玄宗先天元

年八月乙巳条,6675 页。

㉚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乙酉条,6678 页。

㉛《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幽州条,1832 页。

㉜ 同上。

㉝ 关于节度使的设立和权力演变,参看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 年,75—81 页;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氏著《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中华书局,2000 年,274—284 页。

㉞《全唐文》卷三百十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 年,3173页上栏。

㉟ 如 E.G.Pulleyblank 在 *The Backgrou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一书中(78页)指出:唐初因为在东北边境驻兵不足,造成了契丹及突厥的军队可长驱入侵河北北部,甚至直入腹地。

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突厥传》上,5173 页。

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唐玄宗开元四年七月辛未条,6720 页。

㊳(日)松井等著,刘凤翥译,邢复礼校《契丹勃兴史》,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第 10 辑。

㊴《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幽州条,1832—1833 页。

㊵《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五年夏四月条(6727 页)、十一月丙申条(6730 页)。

㊶《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条,6742—6743 页。

㊷《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八年"契丹牙官"条,6743 页。

㊸《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3 页。

㊹ 同上。

㊺《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河北道条,1521 页。

㊻《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十年闰五月乙丑条,6750 页。

㊼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条,6769 页。

㊽《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条,6770 页。

㊾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四月辛丑条,6772 页。

㊿(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范阳节度使条:"经略军,置在范阳城内,延载元年(694)置。渔阳军,在幽州北卢龙古塞,开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为静塞军。清夷军,垂拱二年,妫州刺史郑崇古奏置。威武军,大足元年,置在檀州。开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为威武军。"(169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本文引《唐会要》均据此本),1991 年。

51《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4 页。

52《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吐蕃兵数败而惧"条,6790—6791 页。

53 同上书同卷同年"初契丹王"条,6789—6790 页。

54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48—51 页。

55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春正月乙卯条,6797 页。

56 同上书同卷同年"信安王祎"条,6797 页。

57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壬辰条,6807 页。

58 同上书同卷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条,6808 页。

59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初契丹王李邵固"条,6790 页。

60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信安王祎"条,6797 页。

61 以上俱见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335 页。

62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是岁"条,6812—6813 页。

63 (唐)张九龄《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第九,四部丛刊本。

64 《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第十三《贺破突厥状》。

65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张守珪"条,6814 页。

66 E.G.Pulleyblank: *The Backgrou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p.19。

67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安禄山传》,6412 页。

68 《安禄山事迹》卷上,2 页。

69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逆臣·史思明传》,6426 页。

70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平卢兵马使"条,6844—6845 页。

71 《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5368 页。

72 《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范阳节度使"条,1692 页。

73 同上书同卷"平卢军节度使"条,1692 页。

74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玄宗天宝九载五月乙卯条、八月丁巳条,6899 页。

75 《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5368—5369 页。

76 关于安禄山利用其种族与宗教信仰,笼络东北胡族之问题研究,参看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原载《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7 年,231—241 页;后收入氏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222—237 页。

77 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25—44 页。

第二编　民族史

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
——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

齐东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隋唐时期环岛文化的提出，时机并不成熟，因为目前有一个奇怪现象，即山东半岛除了几座隋墓，没有唐墓发现，辽东半岛也无唐墓报道。山东半岛主要是莱州和登州，莱州开元时“户二万三千一百五”，登州开元时“户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三”[①]。辽东半岛唐属安东都护府，“户一千五百八十二。”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营州“户一千三十一……天宝，户九百九十七”[②]。与安东都护府基本持平，低于莱州和登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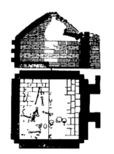
根据行政建制、人口规模和社会背景，两半岛应有隋唐或隋唐时期的墓葬存在。目前营州，即今朝阳地区有大量隋唐墓葬发现[③]，与相关地区比较，再缀合史料记录，会发现该地沿渤海湾连接两半岛的区域自北朝以来形成一个比较独立的文化圈，并由此放射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有密切的联系。以朝阳隋唐墓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古代文化传播交往的历史轨迹。

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

朝阳隋唐墓已发现一百五十余座，目前已经发表的几十座（见附表一），墓葬形制可以分三种类型（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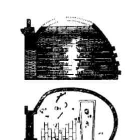
圆形或椭圆形砖室墓。平面圆形，墓门向南，墓门两侧多有翼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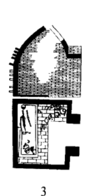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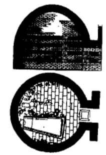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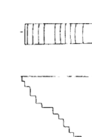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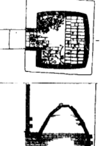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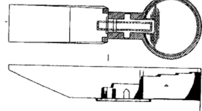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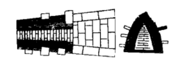




5



6



7

图一：

1. 西上台 M17 隋墓
2. 于家窝铺 M2 隋墓
3. 师范学校 M2 唐墓
4. 于家窝铺 M1 唐墓
5. 蔡须达墓
6. 黄河路唐墓
7. 师范学校 M3 唐墓

上有额墙，有的墓门砌成门楼式照壁。代表性墓葬有于家窝铺 M2 隋墓、贞观九年(635)张秀墓、咸亨三年(672)勾龙墓、咸亨四年(673)左才墓。垂拱三年(687)孙氏墓、属于七世纪末的中山营子唐墓和黄河路唐墓、天宝三载(744)韩贞墓。在具备以上特征的同时，黄河路唐墓的墓室中砌出仿木结构，中山营子唐墓用隔墙将墓室分割成几个小室，韩贞墓在主室外设有小室。这类墓葬多随葬陶、泥俑，瓷器或三彩器，一些墓还有漆器或铜器。

方形或弧方形墓。平面基本呈方形，墓门向南，墓门前多砌出翼墙和照壁，一般北部有棺床。代表性墓葬有西上台M17 隋墓、武德二年(619)蔡泽墓、贞观十七年(643)蔡须达墓、双塔区 3 号唐墓、师范学校M2。蔡泽、蔡须达都是略呈弧方形砖墓，墓门前砌出照壁。随葬品以陶瓷器和铜铁器为主，较大的墓有俑随葬。

长方形或呈梯形墓。砖室墓是先挖土圹，然后墓底铺砖、砌四壁，内置木棺。无木棺的也叫砖椁墓。还有简单的土坑竖穴墓。代表性墓葬有双塔区M1 和M2、师范学校M3、纺织厂M4。双塔区M1、师范学校M3 的墓葬尺寸仅能容纳木棺。纺织厂M4 是在长方形土坑内置木棺。此外还有瓦棺埋葬的婴孩墓。这类墓没有俑，一般只有几件陶器和装饰品，瓷器很少。

目前所知最大的一座是中山营子唐墓，圆形墓室直径达 12.88 米，有石门，墓内分割成十个小室。出土镇墓兽、武士俑、石雕头像、白瓷人头和其他泥俑残片，还有陶瓷器和各种质料的装饰品、生产工具等。墓志残块上有从五品下的散官官职“朝散大夫”的字样。黄河路唐墓也是砖筑的圆形墓，直径 7.1 米。出土成组的陶俑和象牙笏板，应是品官墓葬。左才墓是椭圆形，长 5.72 米，宽 3.92 米，墓中保存着随葬遗物共七十七件，其中泥俑四十八件，此外是厨房明器、家畜、家禽，还有陶、瓷、铜器。墓志载左才官职是“淯州司马”，为正六品职事官。韩贞墓也是砖筑圆形墓室，直径 4.8 米，东西各有一圆形的小室，出土三彩器、陶瓷器、铜铁器。韩贞官



职为八至九品的军中“戍主”。张秀墓圆形砖砌单室，直径 3 米，出了三十七件泥俑，另有一个陶碗，一个陶砚。张秀官职为“校尉”，属于下级武官。由上可知圆形通常规模较大，地位较高的人全是圆形墓。品官墓葬一般有俑随葬。韩贞墓没有俑可能是由于时代在天宝三载(744)，此时俑已不流行的缘故。

方形或弧方形墓也有的规模较大，蔡泽墓长 3 米，宽 2.88 米，蔡泽曾为“齐始平王府行参军”，隋大业十年(614)死，武德二年(619)改葬，出土陶俑二十六件。蔡须达无官职，贞观十七年(643)葬，墓长 2.52 米，宽 2.7 米，出土陶俑三十六件。稍小的长方形砖墓的随葬品比较丰富，多有瓷器和铜铁器皿，双塔区 3 号唐墓除了几件铜铁器，还出土金币、金戒指和金牌饰，应该是富有的庶人墓。长方形或呈梯形墓，无论是砖室还是土坑竖穴，尺寸都较小，随葬品也只有几件陶器、钱币类，应是平民墓。

黄河路唐墓、韩贞墓、于家窝铺 M3、纺织厂 M2、M3 都出土象牙笏板。笏或称手板[④]，《旧唐书》载“文武之官皆执笏，五品以上用象牙为之，六品以下用竹木”[⑤]。以往出土笏板实物的唐墓有吐鲁番久视元年(700)氾德达墓，根据出土墓志和告身，氾德达为上轻骑都尉(视正四品)，与拥有象牙笏板正合[⑥]。朝阳地区出土象牙笏板的几座墓只有韩贞的身分清楚，官职为“故前检校蛤□戍主赏绯鱼袋”，天宝时检校官成为表彰荣典的加官，亦可佩鱼袋[⑦]，戍主是镇守地方军队的下级官吏，戍的大小不同，官品为正八品下至正九品下[⑧]。韩贞有检校官和赏绯鱼袋，似可作为五品以上看待。黄河路唐墓、于家窝铺 M3、纺织厂 M2、M3 都是圆形砖砌单室墓，墓室直径都在 3 米以上，属当地较大的墓葬，随葬遗物也相对丰富，象笏通常作为判定墓主人身分的标识性物品。但是，未出象笏而随葬品丰富，墓室直径超过 3 米的圆形砖墓很多，墓主人的地位都在五品以上的可能性极小。正六品职事官“淯州司马”左才墓规模很大，椭圆形墓室尺寸为 5.72 × 3.92 米，超过上述墓葬，没有象笏。因此，象牙笏板可以作为地区随葬品的特色之一，未必能与身分对应。下级武官张秀有华丽的浮雕石棺，前面挡头浮雕一个门和两个守门者，石棺两边有青龙、白

虎，该墓为贞观九年(635)。西安洛阳隋和唐前期个别大型墓葬中出现石棺椁，多有特殊原因。[9] 当地北燕天王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合葬墓[10] 为同冢异穴，并列两具石椁。因此，张秀有石棺大约是因为丧葬制度不严格，唐中央对这一地区控制相对薄弱，当地传统延续等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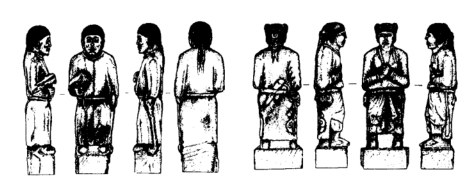
朝阳地区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纪年墓是天宝初年，墓葬变化的大致情况是隋代以方形、长方形墓为主，圆形墓较少。圆形墓在唐朝初年盛行，但较早的武德二年(619)蔡泽墓、贞观十七年(643)蔡须达墓却是方形，衔接了隋代特点，更多的是圆形墓。墓中随葬铜铁容器、带饰和家畜、家禽比较流行，天宝三载(744)韩贞墓出土铜盘七件、铁鼎、鐎斗各一件。中山营子唐墓出土鸡、犬、牛、马骨，八里堡屯唐墓垂拱三年(687)孙氏墓出土牛、鸡、犬骨。南大沟一号唐墓出土牛、马头骨。这是保留着当地两晋北朝以来的习俗。

朝阳隋唐墓的特征

与西安、洛阳隋唐墓进行比较，朝阳隋唐墓的特点是，较大的墓以圆形为主，小型墓砖椁较多。细部结构多在门外两侧砌翼墙，有的门上砌照壁，甬道两侧设小龛，墓壁开灯龛，墓底周边和甬道有排水设施。

朝阳黄河路唐墓甬道两侧的壁龛是专门设置的，里面放置形体高大的一男一女石俑。男俑头发向后梳理至脑后编辫，浓眉大眼，颧骨突出，身穿圆领右衽长袍。右手上立一只鹦鹉。左手提一曲棍状物，足蹬尖头靴。女俑头发在顶部向两侧各挽一髻，然后至脑后编辫，身着束袖、左翻领、右衽长袍，腰带悬挂物件，这是目前考古发掘中惟一的发现(见图二)[11]，在其他与西安、洛阳地区相似的男女俑中显得格外突出。朝阳隋唐墓彩绘泥俑较多，也有一部分造型服饰较独特，武士俑头戴虎头盔，有的头盔和铠甲绘出鱼鳞状甲叶。仪仗俑较多身穿右衽窄袖长袍，一些风帽俑的帽





图二：黄河路唐墓出土的石俑

前有三角形饰，肩围红色披膊系结于前。朝阳唐墓出土一套神煞，咸亨四年（673）左才墓、黄河路唐墓中的最为完整。包括人首鸟身、人首鱼身、双人头蛇身、单人头蛇身和其他似狮、似虎、似猪的怪兽和跪伏状的俑（见图三）。



图三：黄河路唐墓出土的神煞

西安、洛阳地区隋唐墓一般分为四期，高祖、太宗时为开创期，高宗、武则天时为形成期，玄宗时为繁荣期，以后是改变期[12]。但在朝阳地区直到唐初还较多地保留了北朝的特征，蔡泽和蔡须达父子墓都是带较长墓道的方形墓室，时代分别为武德二年（619）和贞观十七年（643），同一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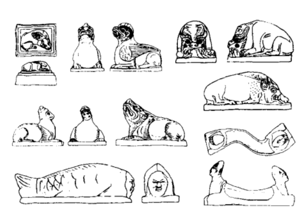
点发现北朝墓与蔡氏墓的样式相同，只是石室与砖室的区别。蔡氏墓的墓门前砌出门楼式的照壁。照壁是西北地区十六国和稍早些时候流行的做法⑬。文献记载宇文鲜卑居塞外，与东部慕容晃相攻，"为晃所破，死者万余人。建国八年，晃伐逸豆归，逸豆归拒之，为晃所败，杀其骁将涉亦干。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此散灭矣"⑭。前燕时"又大破宇文，开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⑮。436年北燕灭亡使大批人迁走，北魏设营州治所，从西北地区迁入人口。故朝阳隋唐墓带有西北十六国时期墓葬带照壁的传统，大约和这一背景有关。朝阳地区三燕时期的大型墓多是平面略呈梯形石室墓，小型墓是为梯形的土坑竖穴⑯，在唐代小型墓中也得到继承，不过改用砖砌建，称为砖椁墓。

朝阳隋唐墓与西安、洛阳的差异较多，却与临近北方即黄河以北地区相同点很多。这一地区墓葬形制略为复杂，仅举部分墓葬为例来进行比较（附表二）。

郭祥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墓室北半部设砖筑棺床，甬道东西两壁还各有一个拱形龛，做法与朝阳黄河路唐墓相同，但放置两件武士俑，似乎正好介于西安、洛阳与朝阳隋唐墓之间的做法。郭祥墓的陶俑中，两件镇墓兽一为猪形嘴，一为鸟形啄。武士俑头戴虎头盔，仪仗俑多身穿圆领或翻领右衽窄袖长袍，也与朝阳唐墓的俑基本相同。董满墓、定县唐墓均为圆形，更是构成两地相似性的主要方面。

最为相近的是北方唐墓也出土成套的神煞。郭祥墓出土的神煞包括两件人首鸟身俑、人首鱼身俑和两件"陶狮"，还有一件跪伏俑。董满墓还有人面蛇身俑和四件似虎、似猪的怪兽（见图四）。东贾郭唐墓、杨偘墓出土的神煞种类略同。这套神煞在报道时人面鸟身俑也叫"观风鸟"。单或双人头蛇身俑也叫"墓龙"。人首鱼身俑也叫"仪鱼"。其他怪兽叫狮、卧兽、虎、猪、异形兽等等。经常与之同出的"跪伏俑"，也叫伏听、稽





图四：董满墓出土的神煞

首俑、跪拜俑。

唐代关于丧葬明器的记载不多，《唐六典》、《唐会要》记述的随葬明器没有这些神煞，因此不属于政府规定的埋葬明器，西安、洛阳地区也极为罕见[17]。《永乐大典》收录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明器神煞篇》在记载公侯将相、大夫以下至庶人墓中的明器，提到有观风鸟、仪鱼、墓龙等。据考证该书是金元时期的著作，反映了山西及北方地区的葬俗[18]。依据目前的发现，朝阳和北方地区神煞更为流行，山西地区唐墓的神煞发现多不成套[19]，出现的年代也比朝阳和河北地区略晚，可能来自东部朝阳和河北地区的影响。

环半岛文化的形成

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舟船形陶器，出土大量海产品的贝壳，还有石、陶网坠，网坠形体和重量较大，应用于大型的渔网。属于小朱山中层文化的遗址出土的鼎、鬶、觚形器等，是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器类。属于小朱山上层文化遗址的蛋壳陶、三环足器等，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类，证明了两半岛间的联系[20]。战国时期的燕国破东胡后设辽东郡，大量中原人口涌入。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公孙度割据辽东，相对安定的环境又成为中原人士避乱之地，这批儒生名士传布了中原文化，管宁“乃因

山为庐，凿壤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王烈“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乐，东域之人，奉之若君”。国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人多推慕之，由是知名”㉑。

几次移民带来了汉族文化移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东汉以后辽东地区出现了延续一、二百年的大家族墓地㉒，其中单、双室墓和带耳室的石椁墓，似乎渊源于中原地区画像石墓，壁画中的车马出行、楼阙、宴居等图像也与中原画像石墓的内容相同。西晋后期鲜卑、高句丽等兴起，东晋咸和九年(334)前燕征服辽东，墓葬出现新的风貌。朝阳地区后燕建兴十年(395)崔遹墓㉓，以及田草沟、十二台乡砖厂较大的墓都是石室，平面多略梯形。随葬品置于木棺中，以陶器为主，金、银、铜饰品很丰富，还有纺织品、皮革、马具、铠甲、花树状金步摇饰。这些墓可能是慕容鲜卑初居辽西的早期文化遗存。其后的历史被《辽史·地理志》概括为：“元魏立营州，领昌黎、辽东、乐浪、冀阳、营丘六郡，后周为高宝宁所据，隋开皇置州，大业改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始入契丹，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改曰柳城郡，后唐复为营州。”㉔唐朝开国初年北方处在战乱之中，从武德初至贞观初唐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击败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梁师都等割据者，贞观三年(629)又大破突厥，在朝阳设营州都督府。

朝阳地区是中原通向东北的咽喉，也是连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陆路枢纽，自战国以后作为战略重镇聚集着各种势力，长期的民族杂处沉积下来的各种文化到隋唐时得到融合。但朝阳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地域，自身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文化系统，上述的历史背景表明始终以当地特色为主的朝阳隋唐墓葬形制，以及接近北方地区的随葬品，暗示出环渤海地区的墓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

从横向上看，圆形墓葬是环渤海地区唐墓重要的特点，从朝阳向南



的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河北大名县何弘敬墓、王元逵墓，天津刘家台子唐墓[25]，虽然年代比朝阳唐墓晚，但在墓葬的平面形状，某些细部都有相似之处。史思明墓为长斜坡墓道的方形石室墓，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半圆形小龛四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方形壁龛。何弘敬墓的墓室为砖砌圆形，直径约6米，墓中有石雕残块、八棱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刘家台子唐墓是由六块大理石合成的石椁墓。可见到与朝阳唐墓的共性更多，可能是地域特点延续。

从纵向上看，圆形墓的渊源又似乎与北朝时期山东地区有关。处在渤海湾东部的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大都是圆形的石室墓[26]。山东嘉祥隋代徐敏行、徐之范的墓是椭圆形墓[27]，徐之范墓的甬道一侧还有壁龛放置"石门吏"。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是一座半圆形的砖室墓[28]，都与朝阳唐墓的做法接近。朝阳和北方唐墓的仪仗俑多身穿圆领或翻领右衽窄袖长袍，武士头盔、铠甲戴鱼鳞状甲叶，也在临淄北朝墓中见到相似的形象。而最具特点的神煞，也能追溯到临淄北朝崔博墓发现的双头俑[29]。此外，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完整的十二生肖，也在北京薛府君墓、临淄北朝墓中发现。朝阳隋唐墓的各种构成因素，似乎承袭了北魏以来环渤海地区的传统，并在隋唐扩展为这一区域的普遍特点，呈现出与政治中心的西安、洛阳区别较大、自成系统的文化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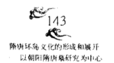
隋唐东亚文化圈

环渤海形成的文化区域有悠久的交通、移民和遗物传播的背景，也通过海洋与海东发生着联系。汉代武帝时曾命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师讨朝鲜，汉末儒生避地辽东多从齐鲁自登州浮海而去。如果再向前追溯，山东半岛史前遗址出土刻划平行线纹、叶脉纹、网格纹等直口筒形罐，也出现在朝鲜半岛，说明大陆、半岛之间以及海东很早已经有了交流[30]。山东半岛的登州下属的黄县，有"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

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31]曹魏时司马懿出征辽东，分水陆二路并进，一由幽州经今朝阳，一由登州航海至今旅顺[32]。环渤海地区的频繁交流之外，通过水陆与海东的交流也始终未断。高句丽及三燕时期大陆、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关系，已经从对马具、墓葬的研究中得到一些交流的线索[33]。

隋唐时期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残酷的战争，结果都使东亚地区整体文化日趋接近。隋朝建立后高句丽王派使前来和好，隋灭陈又引起高句丽的恐慌使关系破裂，隋文帝发兵三十万攻高句丽，隋炀帝又在大业八年（612）、大业九年（613）、大业十年（614）三次出征。唐初高句丽西部酋长盖苏文杀高建武，联合百济攻新罗，引起唐朝的不满。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亲赴前线督战，派张亮率战船五百艘渡海攻平壤，李勣率兵六万趋辽东。唐高宗时百济与高句丽通好，共讨新罗，新罗向唐求援，显庆五年（660）命苏定方率水陆大军十万渡海灭百济。乾封元年（666）又派李勣、薛仁贵征高句丽，取胜后薛仁贵为安东都护治平壤，后来由于新罗攻高句丽故地，上元三年（676）安东都护府迁辽东郡。

在以上征战中导致人员大规模流动，唐武德二年（619）高句丽王遣使来朝，双方决定相互遣返流亡人口，回归唐朝者“前后以万数”。太宗贞观时陈大德去高丽，在其境内仍看到不少华夏民众，他们“子孙盈室，与高丽错居”[34]。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派人去高句丽收葬战争中死者的骸骨。高宗“总章二年四月，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仪凤元年，……徙行军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35]这些流亡者与移民可能走海路迁徙，也会程度不同地充当文化传播的角色。到八世纪末贾耽所述唐朝通四夷之路最重要的七条路线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36]。还详载了两条路线的里程、其间岛屿的名称[37]。



隋唐与海东的关系突破了语言、民族、信仰、自然环境的限制，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均非前代可比。有关遣隋唐使，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佛教传入、儒家思想的推行、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汉字的传播等问题已经过仔细的研究，这些重大事件表明了在跨海联系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展出现了东亚文化圈。虽然文化传播的主要方面是直接与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交往，但在东亚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北朝隋唐时期环渤海地区起到了特殊作用。考古所见的朝鲜平安南道殷山郡北仓里“天王地神冢”、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武宁王墓、韩国庆州龙江洞古坟、日本奈良高松冢古坟、藤之木古坟的壁画、花纹砖、青瓷器、泥俑、铜镜、铜十二生肖、马具等文物上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这些遗迹、遗物与环渤海地区的关系值得认真而深入地探讨[38]。

附表一：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

墓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朝阳新荒地一号墓	隋大业八年(612)；韩暨	大都督	方形砖砌单室；2.30×2.60—3.40	棺床；木棺	青瓷罐一，陶罐五，陶砚一，墓志一	《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
朝阳新荒地二号墓	隋；韩氏族人		长方形砖砌单室；3.20×2.42—3.10		陶砚一，鹿角一，五铢钱一	同上
西上台M16	隋		土坑墓；2.0×0.55		铁刀一，铁镞五，铁带扣一	《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西上台M17	隋		方形砖砌单室；2.25×2.16+1.82		陶罐二，铜铊尾一，铜环一，铜杯一，银环一，钩形铁器一，骨杯头一，蚌壳一，五铢钱一	同上
西上台M19	隋		土坑墓；2.0×1.0		陶罐二，陶盆口沿一，陶豆残段	同上
西上台M20	隋		土坑墓；2.3×0.70		陶罐一，铁刀一，铁镞四，铁带扣一，条形铁器一，石管状饰一	同上
于家窝铺M2	隋		椭圆形砖砌单室；2.25×2.16+1.82	木制尸床	陶罐一，瓷罐一，泥俑四，泥马一，铁镞一，漆器四，银耳环一，蚌壳三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朝阳工程机械厂 91CGJ M2	唐武德二年(619)；蔡泽	参军	弧边方形砖砌单室；3×2.88	棺床	陶俑二十六，泥饼二十六，泥甑一，陶盆一，铜镜二，铜带銙二，铜环一，鎏金铜钱一，水晶珠一，墓志一	《文物》1998年第3期
于家窝铺 M1	唐贞观九年(635)；张秀	校尉	圆形砖砌单室；穹隆顶；直径3	浮雕石棺	陶碗一，陶砚一，泥俑三十七，铜带銙二，银环一，蚌壳二，墓志	《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朝阳工程机械厂 91CGJ M1	唐贞观十七年(643)；蔡须达		弧边方形砖砌单室；2.52×2.7+3.02	木棺	陶俑三十六，陶禽畜十三，陶器具六，瓷器二，铜带銙五，铜刀一，铁刀一，铁剪一，铜钱一，墓志一	《文物》1998年第3期
中山营子唐墓	唐咸亨三年(672)；勾龙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4.8	木棺	泥俑及泥塑动物九，三彩水盂一，车马器一，龟趺头一，墓志一	《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朝阳镇左才墓	唐咸亨四年(673)；左才	涓州司马	椭圆形砖砌单室；5.72×3.92	带座木棺	人物俑四十七，神煞俑五，男炊俑及灶一套，动物模型六，碾、磨模型各一，陶瓷器七，铜器七，铁券一，墓志一	《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八里堡屯唐墓	唐垂拱三年(687);孙氏		圆形砖砌单室;券顶;直径5;+3	尸床	人物俑、陶马多件,陶碗二,瓷罐一,铁锄一,瓦当一,骨制耳挖一,牛、鸡、犬骨,墓志	《文物》1959年第5期
朝阳镇韩贞墓	唐天宝三载(744);韩贞	戍主	圆形砖砌三室;券顶;主室直径4.8;东、西小室直径2.65、2.85;—2.6	三室均有棺床;木棺、瓷罐	瓷罐一,三彩罐一,彩绘陶罐六,三彩狗一,黄釉碗一,铜盘七,铜镜一,铁鼎、鐎斗各一,石子母狮一对,象笏一,墓志一	《考古》1973年第6期神煞俑
双塔区唐墓M1	武德四年至唐中期		棺形砖砌单室;2×0.45～0.24+1	木棺	陶壶一,铜钗四,铜镊子一,铜戒指五,玛瑙珠一,蚌壳饰一,漆器残迹,开元通宝八	《文物》1997年第11期
双塔区唐墓M2	同上		棺形砖砌单室;2.6×0.8～0.68+0.1		铜环一,铁剪一,银钗一,银琀一	同上
双塔区唐墓M3	同上		近方形砖砌单室;2.9×3.2～2.8	棺床	金币一,金戒指一,金牌饰一,铜带饰二,铁剪一,铁斧一,水晶珠一,残漆器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中山营子屯唐墓	唐中期或晚期	朝散大夫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12.88;室内砌隔墙分成五个小室	尸床	石雕头像一,镇墓兽二,瓷胡人一,铜镜二,陶碗一,琉璃珠二十多,泥俑残件,残木俑,镀金铜饰件,骨雕人物、鸟雁,陶罐,铁锅、锹、锄、锯、斧,铜铃,铜带扣,骨矛,鸡、犬、牛、马骨,墓志碎块	《文物》1959年第5期
南大沟一号唐墓	唐中期以前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1~2.3		青绿釉瓷片一,铜带扣一,铁器一,丝绸残迹一,牛、马头骨各一	《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南大沟二号唐墓	同上		长方形砖砌单室;2.3×2—3		陶盆口沿一,铜带扣、带饰各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南大沟三号唐墓	同上		棺形砖砌单室	木棺	铜饰件二	同上
南大沟四号唐墓	同上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2;—3	木棺	铜带饰三,开元通宝一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纺织厂一号唐墓	同上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4	棺床；木棺	小瓷瓶一，陶盘一，泥俑五件以上，泥马一，铁板一，织物和漆器残迹	同上
纺织厂二号唐墓	同上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1.58～1.98	棺床	铜饰二，银饰一	同上
木箱分厂唐墓	同上		椭圆形砖砌单室；东西径2.25，南北径1.92	棺床	陶罐形器四	同上
东三家村唐墓	唐早期		圆形砖砌单室	棺床	陶罐四，缠枝葡萄纹铜镜一	《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双塔小区唐墓	唐中期		长方形土坑竖穴		陶壶二，陶罐一，铜带銙二，铜铊尾一	同上
衬布厂唐墓	唐中晚期		棺形砖砌单室；2.16×0.64～0.56		瓷瓶一，瓷罐一，陶罐一，铜簪一，铁锥一，铁剪一，铁镜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西药厂一号唐墓	唐中晚期		棺形砖砌单室；2.35×0.68～0.47		陶壶一，铜环二，铜带扣一，铜铊尾三，铜带銙三，开元通宝一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西药厂二号唐墓	唐末期		棺形砖砌单室；1.9×0.68～0.47		陶壶一，铜带扣一，铜铊尾一，铁剪一，铁镜一，开元通宝	同上
黄河路M1	八世纪前叶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7.10	棺椁	陶俑五十一件，有人物、常见神煞、十二生肖等；陶禽畜十四，陶模型四，釉陶俑一，石俑二，泥俑三，铜镜二，象笏一	《考古》2000年第8期
朝阳地区印染厂唐墓	唐中期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8	尸床	泥俑，漆盒三，瓷罐一，瓷瓶一，陶罐一，开元通宝一	《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
朝阳县交通局唐墓	唐中期		圆形砖砌单室；券顶；直径约2		陶俑多件	同上
北票下仗子唐墓	唐中期以前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4		陶罐一，陶俑四，陶马一，铜带饰二，铜饰件一，银簪一，银戒指一	《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
双塔区环卫处唐墓	不晚于唐中期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94；—1.9	棺床	陶罐、瓷壶、铜带銙、骨器、漆器、开元通宝等	《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二三四医院M1	不晚于唐中期		弧边方形砖砌单室；2.94×2.98—2.52	棺床；木棺	陶罐一，瓷壶一，铜盒一，铜勺一，铜镜一，铁鼎一，漆器残片、开元通宝等	同上
二三四医院M2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75；—1.94	棺床；木棺	开元通宝	同上
二三四医院M4	唐		圆形砖砌单室；横径2.7，纵长3.15；—2.2	棺床；木棺	陶碗，开元通宝	同上
二三四医院家属楼M1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32；—3.3	棺床	瑞兽葡萄纹铜镜等	同上
南大街90CHM1	唐		棺形砖砌单室；2.5×0.78～0.57	木棺	陶罐二，另有零星小铜饰件	同上
朝阳大街M1	唐		椭圆形砖砌单室；长径1.55，短径1.4	棺床	无	《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
朝阳大街M2	唐初至唐中期		椭圆形砖砌单室；长径2.6，短径2.3	棺床	陶壶一，陶罐一	同上
朝阳大街M3	唐		长方形砖砌单室；2.4×0.9		无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朝阳大街 M4	唐初至唐中期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1.9	棺床	陶壶一，铁剪一	同上
朝阳大街 M5	唐初至唐中期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6	棺床；木棺	陶罐一，陶钵一，泥俑残块，铜勺一，铜镜一，铜带饰一组六件，银钗一，银珰一，玻璃纽一，漆器残迹，蚌壳	同上
朝阳工程机械厂 91CGJ M3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34	木棺	陶罐一，铁镜一，铁镞一，铜带具二，铜环一，铜钱二，玛瑙珠四，黑石珠三	《文物》1998年第3期
朝阳工程机械厂 91CGJ M6	唐		长方形土坑竖穴；2.4×1.6—2.3	木棺	陶壶二，铁刀一，铁镞一，铜带饰八，小铜铃一，铜钱二，玛瑙珠二	同上
西上台 M1	唐		棺形砖砌单室；1.43×0.3～0.14		陶罐一，琉璃珠一，蚌壳二十，开元通宝一	《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纺织厂 M4	唐		长方形土坑竖穴；2.5×1.4	木棺	陶罐二，瓷罐二	同上
师范学校 M3	唐		棺形砖砌单室；1.7×0.65～0.3+0.63		无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西上台M11	唐		长方形石砌单室；2×0.35		无	同上
师范学校M2	唐		方形砖砌单室；方锥形顶		陶罐三，陶碗二，瓷罐四，铜镜一，铁剪一，条形铁器一，金珠一，玉璜残片一，琉璃珠一，蚌壳一，贝饰一	同上
西上台M7	唐		弧方形砖砌单室；2.4×2.2	棺床	无	同上
西上台M13	唐；婴儿		瓦棺墓；0.90×0.45	瓦棺	银耳饰二，琉璃珠十二	同上
西上台M2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08		铜环，开元通宝一	同上
西上台M3	唐		弧方形砖砌单室；2.2×2.2		瓷罐，铁铊尾一，铁带銙十，金耳饰残段，开元通宝一	同上
西上台M4	唐		弧方形砖砌单室；2.78×2.7		铜带銙一，铁镞一，铁钩器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西上台M5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88		陶罐残片，鎏金铜饰片一	同上

续表

墓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西上台M6	唐		棺形砖砌单室;1.8×0.5~0.3		无	同上
西上台M8	唐		长方形砖砌单室;1.7×0.78		无	同上
西上台M9	唐		长方形砖砌单室;1.8×0.65		铜饰片一	同上
西上台M10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		陶罐三,铜带銙一,铁钩器二	同上
西上台M12	唐		长方形砖砌单室;1.8×0.4		无	同上
西上台M14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4		铜带饰五,铁镞一,铜环二,铁条形器一	同上
西上台M15	唐		棺形砖砌单室;2.10×0.65~0.36		陶罐二,铜指环一,铁剪一,银环一	同上
西上台M16	唐		长方形土坑竖穴;2.00×0.55		铁带扣一,铁镞五,铁刀一	同上
西上台M18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2.5		铜带銙二,泥俑一,泥马一	同上
于家窝铺M3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5		陶罐二,陶壶三,瓷罐二,铜带銙五,铜铊尾一,铁镜一,铁剑一,铁车马器一,象笏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纺织厂M1	唐		棺形砖砌单室；2.1×1.0~0.6		陶罐二	同上
纺织厂M2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14		陶罐四，陶碗一，瓷罐一，漆盒一，象笏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纺织厂M3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20		陶罐一，陶壶一，铜钗一，漆盒一，象笏一，开元通宝一	同上
综合厂M1	唐		棺形砖砌单室；2.45×1.0~0.6		铜带銙四，铁环二	同上
综合厂M2	唐		椭圆形砖砌单室；2.9×2.7		瓷罐一，三彩盂一，铜镜一	同上
饲养厂M1	唐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5		陶罐五，铜带扣一，铜带銙四，铜镜一，铁镞一，银耳环一	同上



附表二：河北、河南部分唐墓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河北沧县一号唐墓	咸通九年(868)；刘元政及两位夫人	后院军头	圆形砖砌带耳室单室；主室直径3;—4.1；耳室1.87×1.0	耳室有木棺	陶塔形罐二，陶五足洗一，陶三足炉二，陶水盂一，陶杵臼一套，铜镜二，铜钗一，墓志一	《考古》1991年第5期
河北南和郭祥墓	垂拱四年(688)；郭祥与夫人	县令	圆角长方形砖砌单室；2.85×3.32	棺床	陶人物俑十五，陶神煞六，动物模型五，磨等器具模型五，陶容器五，瓷碗二，墓志一	《文物》1993年第6期
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	年代约同上		圆角方形砖砌单室；3.5×3.4	棺床；木棺	陶人物俑九，陶神煞六，动物模型九，器具模型二，陶釜一	同上
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	咸亨三年(673)；董满	县令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5		陶文吏俑一，胡人俑三，侍仆俑六，昆仑奴俑一，侏儒俑一，女乐俑一，女执箕俑一，陶神煞六，陶异形兽二，动物模型十三，器具模型三，墓志一	《文物》1994年第1期
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	咸通五年(864)；孙少矩	易县录事	长方形砖砌单室；尺寸未报道		陶器十一，瓷器五，石碾一，铜钱八，墓志一	《文物》1988年第4期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M1	咸亨元年(670);孙建	县令	方形砖砌单室;3.4×3.4—4.75	棺床	彩绘陶俑十一,彩绘陶神煞四,彩绘陶动物模型七,陶磨一,砖雕文吏俑一,陶筒形器一,陶罐五,瓷罐一,铜镜一,铜带钩一,墓志一	《文物》1990年第7期
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M2	咸亨元年(670);孙建之子孙玄则	南康公国尉	方形砖砌单室;2.5×2.5	棺床	陶罐三,墓志一	同上
定县南关唐墓	武德四年至武则天时期(621—704)		圆形砖砌单室;直径3.48	棺床	陶人物俑十八,陶神煞五,动物模型十四,陶牛车一套,器具模型四,陶容器五,瓷容器七,铜钱二十四	《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
新乡市唐墓	麟德元年(664);张枚及夫人		正方形竖穴墓;约2.1×2.25	棺床	陶人物俑五,施釉人物俑十一,施釉镇墓兽二,陶动模型五,施釉动物模型二,器具模型三,白釉车轮二,陶罐二,陶釜一,酱釉碗一,白釉盂一,墓志一	同上

续表

墓　名	被葬者及年代	官　职	墓葬形制及墓室尺寸	葬　具	随葬品	资料来源
安阳市杨偘墓	上元二年(675)；杨偘及夫人		正方形砖砌单室；2.84×2.8—7		陶人物俑三十四，陶神煞五，动物模型十三，陶牛车一套，器具模型八，陶容器七，瓷唾壶一，铁剪一，铁镜一，墓志一	同上

注释：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河南道七》，中华书局，1983年。

②《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

③《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隋书》卷十一《礼仪六》载："百官朝服公服，皆执手板。尚书录令、仆射、吏部尚书，手板头复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曰笏。"《隋书》卷十二《礼仪七》载："晋、宋以来谓之手板，此乃不经，今还谓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以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中华书局，1999年。

⑤《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99年。

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⑦《唐会要》卷三十一《鱼袋》："苏氏记曰：自永徽以来，正员官始佩鱼，其离任及致仕，即去鱼袋。员外、判、试并检校等官，并不佩鱼。至开元九年九月十四日，中书令张嘉贞奏曰：致仕官及内外官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及内供奉官，见占阙者，听准正员例，许终身佩鱼，以为荣崇。以理去任，亦许佩鱼。自后恩制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中华书局，1990年。

⑧《旧唐书》卷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99年。

⑨《通典》卷八十五《棺椁制》载："大唐制，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椁及石室。"唐代出现少量有石棺椁的墓葬，多与墓主人的特殊地位或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参见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唐代的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

⑩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⑪ 西安韦顼石椁线刻上看到胡服人物手上有鹦鹉的线刻，也有执鹦鹉的俑，但形象完全不同。见陕西省博物馆《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0年。

⑫ 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

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⑬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⑭《魏书》卷一百三《宇文莫槐传》,中华书局,1997 年。

⑮《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传附子元真传》,中华书局,1997 年。

⑯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王子坟山墓群 1987、1990 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7 年第 11 期。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文物》1997 年第 11 期。

⑰ 洛阳唐墓中有一例,见刘洪淼、李玉荣《巩义市出土唐代人首蛇身交尾俑》,《中原文物》1998 年第 1 期。

⑱ 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 年 第 2 期。

⑲ 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 年第 6 期。长治市博物馆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 年第 8 期。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 年第 6 期。

⑳ 许玉林《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发现的舟形陶器谈我国古代舟船的起源和应用》,《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第 2 期。

㉑《三国志》卷十一《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82 年。

㉒ 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度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第 1 期。

㉓ 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 年 第 3 期。

㉔《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记载:"营州上都督府,隋柳城郡。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万岁通天二年,为契丹李万荣所陷。神龙元年,移府于幽州界置,仍领渔阳、玉田二县。开元四年,复移还柳城。八年,又往就渔阳。十一年,又还柳城旧治。天宝元年,改为柳城郡。乾元元年,复为营州。"中华书局,1999 年。

㉕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 年第 9 期。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 年第 8 期。刘友恒、樊子林、程纪中《唐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1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工作队《天津军粮城发现唐代墓葬》,《考古》1963 年第 3 期。

㉖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 年第 2 期。

㉗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 年第 4 期。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 年第 11 期。

㉘ 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㉙ 神煞的渊源复杂。安徽合肥开皇六

年(586)隋墓曾出土。相似的形象在南朝邓县画像砖上也出现，上面题字为“千秋”、“万岁”。北方地区的宁夏北魏漆棺、河北北齐湾漳墓壁画、陕西隋李和墓石棺盖上也发现类似者。西汉马王堆汉墓帛画、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王莽时期的墓葬壁画，以及汉代彩绘陶壶上，也有鸟身人面的形象。由此，汉代的鸟身人面形象与南北朝时代的“千秋”、“万岁”有一脉相承的意味，也似乎与唐代的“观风鸟”有关(参见王去非《隋墓出土的陶“千秋万岁”及其他》，《考古》1979年第3期。朱岩石《“千秋万岁”图像源流浅识》，《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㉚ 许玉林《从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发现的舟形陶器谈我国古代舟船的起源和应用》，《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㉛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河南道七》，中华书局，1983年。

㉜ 金毓黻《登州半岛与辽东半岛之交通》，《司马懿行军地理考》，《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107—114页。

㉝ 杨泓《新罗“天马冢”马具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齐东方《武宁王墓与南朝梁墓》，《武宁王陵与东亚文化》，纪念武宁王陵发掘三十周年论文集(韩国)，2001年。

㉞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总章二年；卷二百二仪凤元年，中华书局，1982年。

㊱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86年。

㊲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下；王锦厚《唐“营州至安东”陆路交通地理考实》，《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1986年。

㊳ “天王地神冢”墓室壁画上有人首鸟身形象，并且有“千秋”的题记。龙江洞古坟出土唐代风格的一组泥俑铜十二生肖。齐东方、张静《中国唐墓壁画与日本高松冢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

杨晓燕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汉末曹操击乌桓蹋顿到清代的满族入关，东北民族对中原王朝政局的影响既深且巨。唐王朝虽以关中为本位，但东北民族对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十世纪初崛起于北方的辽朝，其主体民族契丹的强盛在唐代已露端倪。唐代分布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有奚、契丹、霫、室韦、靺鞨以及高句丽等。唐代环渤海地区，在民族、文化等方面深受这些民族的影响。唐代河北地区的胡化、河朔藩镇的长期割据诸问题无不与此有关。

为控御东北，唐朝在辽西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先后设置有营州都督府、平卢军节度使，故史籍中也多以平卢指代营州。驻扎在营州的平卢军始设于开元五年（717），开元七年升为节度使。平卢节度使设置后常作为幽州节度使的附属，直至天宝元年（742）才正式脱离幽州节度使，成为独立的藩镇。自开元初，平卢就担负着控御两蕃（奚、契丹）的职责。至开元二十八年，为押两蕃和渤海、黑水等使。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平卢军的一小部分随史思明奔赴战场，大部分则留守营州。留守的平卢将士分为勤王和叛乱两派。经过激烈的斗争，逐渐统一于勤王一派①，平卢军从此转战各地。由于战事的进展，为形势所迫，平卢军分几番浮海到达山东半岛，建立了平卢淄青节度。进入山东后的平卢军，以元和十四年（819）为线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高丽人李正己的藩镇割据统治，后期则多为朝廷统治下顺服的方镇，直至唐末农民起义爆发。



平卢镇变动迁徙的整个历程都是在环渤海地域内进行的,深受这一地域的民族文化环境的影响。所以,研究平卢镇,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唐代环渤海地区特殊的民族和文化环境,了解唐代东北亚地区的蕃族与边疆地方政权以及内政的相互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和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史的视角对文献史料进行梳理,并利用石刻史料以及考古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对唐代东北的重要前沿阵地平卢镇给予重新关注。研究唐代东北蕃族对边疆以及中原政权的影响,对于深刻理解日后的契丹、女真入主中原以及满族入关等无疑会有着溯源和启发的作用。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对东北民族的发展、勃兴、南下以及与汉民族的融合进行对比和考察,可以看出其发展的整个脉络和趋势,而这在唐代已显示出日后发展的契机。当然,对平卢镇和环渤海地域文化关系的考察,也有助于加深对边疆民族史、东北亚地区关系史的认识。

一、唐营州地域多元文化的构成

位于边塞之地的营州历来就与东北诸民族有着不解之缘。汉末曹操在这片土地上大破乌桓蹋顿;东部鲜卑宇文氏、段氏、慕容氏在此区域展开拉锯战;鲜卑慕容氏与高句骊在辽东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北燕冯跋在位时,"抚纳契丹等部落,颇来附之"[2]。可以说,营州的历史,与东北民族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营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由鲜卑民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鲜卑化汉人冯跋所建的北燕都曾以其为都。至隋唐时代,营州仍然是东北边鄙的重镇和中原尤其是河北的屏障。

营州柳城之地很早就有汉民居住。汉在此设辽西郡。汉末乌桓乘天下乱,略有汉民十余万户[3]。曹操于柳城破乌桓蹋顿,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4]。十六国时北方战乱频仍,慕容氏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流民纷纷徙至。冀阳、成周、营丘、唐国诸郡均为统治中原冀州、豫州、青州、并州流人而设[5]。然而至北魏消灭北燕,为削弱北燕的势力,大批迁徙北燕民众[6]。

北魏孝昌(525—527)年间营州城人刘安定、就德兴据城反,营州陷,永熙二年(533)北魏设南营州(地点约为隋唐之遂城),收纳营州人口,所置郡县与原营州略同[7]。大批的迁徙使得以营州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人烟稀少。与这种趋势相反,大约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及东北的部分少数民族奚、契丹、靺鞨等陆续南迁,渐至边境营州等地,与边民杂居[8]。

唐代,营州作为中央王朝经营东北的前沿阵地,周围散布着多个蕃族部落或政权。《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柳城县条略云:

> 有龙山、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百里,未详孰是。其龙山,即慕容皝祭龙所也。有饶乐水、汉故徒河县城、和龙城。室韦、靺鞨诸部并在东北,远者六千里,近者二千余里,西北与奚接,北与契丹相接。

又柳城郡条:

> 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东南到安东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东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帐四百里。

除了上面提及的奚、契丹、室韦、靺鞨外,东边还有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西边为突厥,霫、乌罗护等并在北部。作为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中转站,位于辽西走廊的营州,其地理交通和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唐前期东北地区至少有三次内属高峰。第一次是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前后,第二次是贞观二十二年前后,第三次是开元四年(716)前后[9]。唐朝将内属的蕃族设置羁縻州治理,在东北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详见附表一。这些羁縻州皆处蕃族,无有汉民[10]。

(一)营州地域的契丹、奚人

武德四年(621),契丹酋帅孙敖曹内附,唐诏令于营州城旁安置,孙敖曹行辽州总管,至其孙为归诚州刺史。这是契丹大批入居营州的最早



记录[11]。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12]。除了辽州、玄州外,唐朝在营州地域还设置了威州、昌州、师州、带州、归顺州、信州等羁縻州[13]。在武则天载初年间(689),析处置契丹的昌州而设沃州,析处置靺鞨的慎州而设黎州,这恐怕与社会的稳定、人口的滋生有关。人口数量的增加为蕃族的活动提供了人员基础,数年之后,契丹据营州之地发动叛乱,靺鞨则趁机建立了渤海国,个中关系令人深思。营州的契丹与奚族对于整个东北的局势以及唐朝在东北边疆的建置影响很大,这集中体现在万岁通天(696—697)年间的叛乱上。契丹胁从奚、霫等叛乱,营州失守,使得唐对东北的经营政策大大改变,由积极经营变为一度听之任之。由于这场叛乱而造成唐对东北的民族变动无力插手,偌大的一个渤海国因之而诞生。也由于这场叛乱,契丹、奚等附于突厥,唐在东北的势力大大减小。因而,当开元(713—741)初两蕃有意降唐时,营州的复建马上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才有了东北边地政权从营州都督向平卢节度的转变。

(二)营州地域的靺鞨人

靺鞨人大批入居营州,史籍上最早见于隋朝。隋末,靺鞨酋帅突地稽,率其部千余家内属,处之于营州,隋以为辽西太守[14]。这是第一批以部落的方式迁徙到营州的靺鞨人。据《北蕃风俗记》记载,突地稽为阙稽部渠长,同来的还有忽使来部、窟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15]。唐武德四年(621),"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16]。营州人叛乱,居然以靺鞨酋帅为首领,足可说明营州地域靺鞨人之势力。同年,突地稽内附,唐以其部落设燕州,以其为总管。其子李谨行,"麟德(664—665)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17]。

第二批靺鞨人大量进入营州是在唐灭高句丽之后。靺鞨之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18]。而渤海国的建立者大祚荣,也是因高句丽被灭,率家徙居营州的[19]。有人认为,"在隋、唐时代,先

后逃往营州的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是创建渤海王国的两大靺鞨部落集团。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素附于高丽的白山靺鞨人，而不是和高丽对峙的粟末靺鞨人。”[20] 如是，则这些白山靺鞨在唐灭高丽后大多徙入营州。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尽忠据营州反，营州的靺鞨在首领大祚荣等人带领下趁机东奔。唐将李楷固讨伐大祚荣时，甚至抵达靺鞨故地，度天门岭而战，然而大败[21]。此时被唐朝击败的契丹和奚之众降于突厥，唐前往东北的道路因此阻绝，使得靺鞨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宽松的发展机会，于是，一个庞大的渤海国就在原靺鞨故地诞生。一场契丹及奚等族反唐的叛乱，造就了渤海这个国家的异军突起，而这个国家的核心力量则是来自营州的内附民族。这些靺鞨族徙民在营州这一唐朝边境之地沐浴了至少几十年的汉文化。渤海国的许多官僚制度模仿唐朝，文明程度较高，不能不说是与入居营州而深受汉文化的耳濡目染有关。

（三）营州地域的粟特人

前人已多论及中亚粟特人（又称昭武九姓胡、九姓胡）在营州柳城一带的聚落[22]。营州的胡人问题因唐代中叶安史之乱的叛乱核心为粟特胡人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粟特胡人在唐代以柳城为中心的营州地区大量存在。柳城向为突厥、高丽等诸蕃交易之地[23]，而诸蕃贸易经常少不了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参与，粟特人能够不远万里辗转来到营州，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武德四年（621）六月，“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24]，石为昭武九姓之一，可见唐初营州的粟特人就有一定的势力[25]。开元五年（717），营州复置，营州都督宋庆礼“招辑商胡，为立店肆”[26]，可知营州的许多粟特胡人仍以经商为业。著名的“营州杂胡”安禄山、史思明就曾为“互市牙郎”。墓志材料中河北的粟特胡人多称自己是柳城胡人。如 1998 年北京燕京汽车制造厂出土唐墓，墓主人为何氏，柳城人，开元九年（721）卒；女主人



康氏，卒于顺天元年(759)。该墓墓址为唐燕台乡[27]。唐对内徙蕃人设羁縻府州以处之，即其部落列置州县[28]，最低的地理区划为县[29]。唐前期粟特人在六胡州及柳城等周边地区大多以聚落的方式存在[30]。而由柳城迁徙而来的该墓主人生活于范阳燕台乡，可见到达范阳的粟特人已脱离了原来的聚落或者说聚落状态可能渐被打破[31]，唐已将其改作乡里，这有类于同时代西州的崇化乡、敦煌的从化乡。又如天宝元年内附的粟特人康阿义屈达干，墓志中称自己为柳城人[32]。两人皆在唐范阳管内活动，而称自己为柳城人，说明在河北，营州柳城是当时粟特人所乐于称道的本贯地[33]，从而显示出范阳杂胡来自柳城的迹象。

营州北部与之相接的契丹松漠府亦有不少胡人。"李怀仙，柳城胡人也。世事契丹，降将，守营州。禄山之叛，怀仙以裨将从陷河洛。"[34]李怀仙被怀疑应为粟特胡人，其姓李名怀仙是冒称的汉姓名[35]。李怀仙"世事契丹"，可见其家族在契丹部落中生活已不止一代。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时，契丹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游军前锋[36]。所谓别帅，则非契丹种类，而是粟特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唐契丹故地)一号墓出土了五件银器，为唐代粟特人在此地的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明。据判定，"这批器物的原产地应在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更大。其时代为七世纪后半叶到八世纪中叶"[37]。"出土银器说明这一阶段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沿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路一直进入到今辽宁、内蒙古一带。"[38]

至于粟特胡人深入到靺鞨居地聚居，则是在辽金时代的事了[39]。

(四)营州地域的高句丽人

关于营州地域的高句丽人，前人在此特别措意者不多。王小甫《隋初与高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曾论及十六国北朝时期高句丽在这一地域势力十分强大[40]。唐武德五年(622)，"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41]。说明唐

初高句丽人在中土者也为数不少。由于高句丽人的生活方式“种田养蚕，略同中国”[42]，故与周边游牧部落的安置不同。对于高句丽人，除了采用设安东都护府下辖羁縻州的方式管理之外，唐前期还曾多次大量地徙高句丽民至内地，与汉人杂居。

总章二年(669)迁徙高句丽降户三万余，是于唐东北的前沿营州以及山东半岛的莱州班次发遣。有许多迹象表明，营州地域有大量的高句丽人淹留。渤海王国的建立者大祚荣“尝逐句丽内徙”而至营州[43]，说明高句丽亡后，有不少高句丽人徙至营州。大祚荣在契丹李尽忠之乱时合高句丽、靺鞨之众以拒唐将李楷固，这些高句丽人就有来自营州一带。王思礼、侯希逸、李正己等高句丽将领出身于营州也可作为旁证。

唐朝对内徙的高句丽、百济人口常使其为兵。《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原注：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又同书卷三户部尚书条：“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鼓励其应征，是以当有不少高句丽人入伍为兵。唐朝徙降附的周边民族入内地，目的是使其渐渐接受汉文化，并可增强兵力。开元三年(715)，突厥默啜部降而复叛，王晙上疏曰：“请至农隙，令朔方军大陈兵，召酋豪，告以祸福，啖以金缯，且言南方麋鹿鱼米之饶，并迁置淮右、河南宽乡，给之程粮。虽一时之劳，然不二十年，渐服诸华，料以充兵，则皆劲卒。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旁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他还认为“悉其部落置内地，获精兵之实，闭黠虏之患”[44]为处置边族的上策，而唐朝对于高句丽旧俘和营州城旁就是采用的此种战略[45]。籍贯为营州的高句丽人王思礼可能就是在其先辈应征后成为朔方军将的。而随着唐代节度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边兵兵源当地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营州地域的高句丽人便部分地纳入平卢军的队伍之中。天宝末，高句丽血统的侯希逸以及继而代之的高句丽人李正己先后成为平



卢军的最高首领，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平卢所辖区域高句丽移民的势力之大。

（五）小结

唐代的营州地域是多民族杂处之地，蕃族的势力极为强大。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营州的各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互相交流，在种族上慢慢接纳、整合，使得营州地域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族与文化特点。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朝阳地区（唐营州都督府、平卢节度使治所）陆续发现了大批唐墓，已发表的有四十多座，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六座，分别是唐张秀墓、王德墓、韩贞墓、左才墓、勾龙墓、孙默墓。墓葬可大致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隋末唐初到武则天时期，墓葬中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两种文化因素共存；晚期为中宗到玄宗天宝末，北方少数民族的势力逐渐强大，早期流行的类似中原型的墓逐渐消失[46]。考古成果表明唐代营州地域蕃族从唐初至天宝末势力在不断增强，也为该地区在这一时期内的文化演变提供了证明。高适的《营州歌》对营州的民族风貌作了描述："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47]"胡儿"即"营州少年"。作者高适（700—765）对东北边陲军情颇多亲身体验[48]，这首诗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开天年间营州的民族特征和风俗文化。营州少年尽胡儿，这是对营州蕃族在此地数量居多的一个简单概括；胡儿十岁能骑马，则是对营州民族风俗的再现，也是这一带人们能征善战的体现。新近发表的《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的清理》再次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49]。出土坐俑一件，头戴尖顶锥帽，身穿蓝色翻领束袖长袍，腰束黑带，右腿屈立，左腿盘坐。从他的帽式和坐式上看应为胡人。出土的风帽俑为高鼻，八字胡，满脸浓须；文吏俑和B型男侍俑、跪伏俑、侏儒俑、骑骆驼男俑，甚至观风鸟都有络腮胡须、高鼻深目等特征，虽不能以此认定为胡人，出身胡族或受胡化影响的可能也很大。出土的两个石俑男女各一，皆编发，看其打扮动作似为仆人之类。肃慎系的靺鞨人"俗皆编发"[50]，乌洛侯与之相类，"绳发、皮服"[51]，即编发束辫，垂

于耳后。则这两个石俑可能为靺鞨族人或乌洛侯人。最有意思的是出土的泥俑，仅一泥人头，面施粉红彩，高鼻深目，是典型的西方人形象。出土器物是墓主人生前生活风貌的缩影，也是唐代营州地域多民族共同生活、交往与融合的写照。

二、营州平卢地域内的羁縻府州

营州作为经营东北的重镇，又是统治东北各族的中心，唐代在这一地域先后设置的羁縻府州达二十一个府，九十六个州，见附表一。

附表一所列为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有唐一代先后在东北设置的全部羁縻府州。由表中可知，东北蕃族内附多在唐前期。安史之乱平定后至唐末，河朔地区藩镇长期割据，原驻扎于营州的平卢军也到了山东半岛。河朔藩镇阻隔了中原王朝和东北诸族的交往，虽然后期诸蕃也有朝贡，但设置羁縻府州已不可能。

（一）内蕃与外蕃

关于唐代的羁縻府州的划分，谭其骧先生认为基本分为两种：一种设置于边外各国、部族原住地；一种设置于边外各族迁入内地后的侨居地[52]。本文沿用谭先生的分类标准，将东北羁縻府州分为两类：置于边外各国、部族原住地的，称之为外蕃；置于各族迁入边内的侨居地的，称之为内蕃。这样，营州都督府下有治所的州为内蕃，如燕州、威州、辽州等；而饶乐都督府、松漠都督府、忽汗州都督府、鸡林州都督府等为外蕃。

唐朝廷对内蕃与外蕃管理是不同的。内蕃要缴纳一定的税收。《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



一口。”初附之蕃胡，按户缴纳银钱，而附贯二年以上者，则按丁缴纳羊。下户第一年无需纳税，而二年以后则不能免，可见，优待只有一年。而上段文字的注中补充道：“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已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这段话说明内附蕃胡是要承担兵役的。内附的第二代蕃胡同普通百姓一样，那么，就要如普通百姓缴纳租庸调，则内蕃蕃胡第二代起就应当向户部上报户口。这就是为什么附表一所列的内蕃蕃州多是有户口数的原因。同书同卷还对新附蕃人的课役作了细部规定：“凡丁新附于籍帐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役，秋附则课役俱免。”有些内蕃蕃州还要定期缴纳土贡。如归顺州要上贡麝香，安东都护府要上贡人参，燕州要上贡墨豹尾[53]。而对于外蕃的管理和控制则远没有内蕃这样严密，外蕃需尽的最主要的义务是定期朝贡。《唐六典》卷四主客郎中员外郎条列举了开元时四方之朝贡的有七十余蕃。这其中就包括营州地域的外蕃奚、契丹、远蕃靺鞨（或即黑水靺鞨）、渤海靺鞨、室韦、乌罗护、新罗等。“七十国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对于多数外蕃，“常禀正朔，朝贡不绝”是最重要的[54]，此外，一般对中央履行入觐、充质、征讨、捍边等义务[55]。其中，奚、契丹两蕃与平卢节度使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在下面将有论述。唐对东北内蕃的控制明显要胜于外蕃。万岁通天年间契丹之乱中，营州都督府下辖的内蕃诸蕃州多被迁移至河南道，即使在营州被契丹占领的情况下，仍可如此，说明唐对这些蕃落的管理还是比较成功的。当然，内蕃与外蕃也并非是截然分开，仍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二）营州地域内蕃蕃州的变迁

附表一中的户口数目均采自《旧唐书·地理志》二。据前人考证认为，《旧唐书·地理志》中的“旧领”即贞观十三年（639）的户口数[56]，而“天宝领”即天宝十二载（753）所领户口[57]。又《旧唐书》卷三十九：

营州上都督府　隋柳城郡。武德元年（618），改为营州总管府，

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628)，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万岁通天二年(697)，为契丹李万荣所陷[58]。神龙元年(705)，移府于幽州界置，仍领渔阳、玉田二县。开元四年(716)，复移还柳城。八年，又往就渔阳。十一年，又还柳城旧治。天宝元年(742)，改为柳城郡。乾元元年(758)，复为营州。旧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天宝，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

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今督'之'今'，不能早过贞观十三年，亦不能迟于永徽元年(650)，正是《括地志》编纂之时代，非《旧志》编纂时代之'今'也。"[59]所以，"今督"与"旧领"实指代同一时间，即贞观十三年。此年营州都督府共领州八，其中正州一，即营州，羁縻州七。而《旧唐书》同卷同条下鲜州为武德五年(622)设，直至万岁通天年间(696—697)仍在营州境内，其间未有置废，而燕州于武德六年移至幽州，故贞观十三年营州都督府下的七羁縻州为：

蕃州	慎州	崇州	鲜州	威州	昌州	师州	顺州
蕃族	靺鞨	奚	奚	契丹	契丹	契丹、室韦	突厥
初设时间	武德初	武德五年	武德五年	武德二年	贞观二年	贞观三年	贞观六年
人口	待考	户一百四十，口五百五十四	待考	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	户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	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八十六	户八十一，口二百十九

武后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据营州作乱，使得唐朝一度失去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营州府治迁往渔阳。在契丹万岁通天年间作乱之前，营州境内的羁縻府州达到最多，此时控有羁縻州为十五个：



蕃州	威州	昌州	师州	带州	玄州	归顺州	沃州	信州	归诚州	崇州	鲜州	慎州	夷宾州	黎州	瑞州
蕃族	契丹	契丹	契丹室韦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奚	奚	靺鞨	靺鞨	靺鞨	突厥
初设时间	武德二年	贞观二年	贞观三年	贞观十九年	贞观二十二年	贞观二十二年	载初中	万岁通天元年	待考	武德五年	武德五年	武德初	乾封中	载初二年	贞观十年

贞观十三年营州都督府下辖的处契丹的内蕃蕃州仅有三个，占总数的 37%，而契丹之乱前夕达到九个之多，占内蕃蕃州总数的 60%，说明契丹此时势力增长十分迅猛。事实表明，在契丹之乱时，营州的内蕃蕃州是有参与叛乱的。除上文提到的归诚州之外，沃州万岁通天年间没于契丹李尽忠[60]；而在师州、崇州、昌州等有数据可考的蕃州人口数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威州天宝年间的人口却比贞观大为减少[61]，说明威州很有可能曾卷入叛乱。所以叛乱发生时，契丹能够迅速占领营州便无足为怪了。内迁之后的营州寄治在渔阳，仅领渔阳、玉田两县，营州都督府名存实亡，其与幽州都督府对外作战的犄角之势从此不存有二十余年。奚与契丹降于突厥，道路阻绝，唐对包括安东都护府在内的东北地区均无力经营。

契丹之乱，原营州都督府下的十一个羁縻州于万岁通天年间被迁往河南道的淄、青一带。直至神龙（705—707）初才北返至幽州。在迁移的过程中，这些蕃州无有更改废替，说明其在河南时，部落组织并没有被打散。幽州都督府境内陆续设置的羁縻府州见下表，至安史之乱前，河北的羁縻府州达到最多，且多为原营州地域的东北内蕃所置。

开元初，历经宫廷政变的唐王朝开始了君臣励精图治的新时期。而此时突厥帝国境内内忧外患此起彼伏，默啜虐用其他民族，葛罗禄等部、胡禄屋等原西突厥十姓部落，默啜之婿高句丽莫离支高文简部，跌跌都督思太部，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等部落前后纷纷脱离突厥降唐[65]，奚与契

蕃州	燕州	归义州	威州	顺州	崇州	慎州	玄州	夷宾州	师州	鲜州
蕃族	靺鞨	新罗	契丹	突厥	奚	靺鞨	契丹	靺鞨	契丹室韦	奚
置幽州时间	武德六年	总章中	万岁通天[62]	万岁通天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天宝户口	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63]	户六百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	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	户二百，口七百十六	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	户一百六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	户三百十四，口三千二百十五	户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

带州	黎州	昌州	瑞州	信州	青山州	沃州	归顺州	归义州[64]	凛州
契丹	靺鞨	契丹	突厥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奚	胡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神龙初	景云元年	开元	开元四年	开元二十年	天宝初
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	户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百十八	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户四百十四，口一千六百	户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十五	户一百五十九，口六百十九	户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	帐(户)五千	户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丹亦不例外[65]。于是，开元五年(717)，唐重置营州于柳城，并置平卢军，控御两蕃，恢复两蕃旧有都督府州之名，唐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开元五年)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



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邑浸繁”[67]。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史料说营州“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即恢复到万岁通天年南迁之前的州县列置。又“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68]，力图恢复营州之旧有州县人口。所谓“幽州”，即营州管内羁縻州南迁至幽州者，“渔阳”即原营州州治柳城迁往渔阳者，“淄青”即万岁通天年间迁往河南者。尽管南迁至河南的羁縻州于神龙初尽数还至幽州，可能原地还有剩存人口。以下是史料所见重置于营州的内蕃蕃州[69]：

师州：《新唐书·史思明传》：天宝初，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从禄山讨契丹，禄山败，单骑走师州，杀其下左贤哥解、鱼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阅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见禄山平卢，禄山喜，握手曰：“计而死矣，今故在，吾何忧。”思明语亲密曰：“吾闻进退在时，向蚤出，随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师州，守捉使刘客奴亡去，禄山使思明击走之，表平卢兵马使。

从上文看，天宝初，安禄山败走师州，而史思明追见于平卢，师州似在平卢之内。故此时师州可能早已迁至平卢（营州）一带[70]。

顺化州：两《唐书》地理志惟《新唐书·地理志》七河北道羁縻州下有顺化州，且记载简单，只称其处奚族，治所为怀远县。其设置时间兴废情况均无记载。《安禄山事迹》卷上，开元二十九年（741），安禄山被授以“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度支、营田、水利、陆运使副，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新唐书·安禄山传》此年授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安禄山在天宝二年（743）之前一直活动于平卢军，顺化州在平卢治内无疑。《新唐书·方镇表》三：“（开元）二十九年，幽州节度副使领平卢军节度副使，治顺化州”。[71]顺化州的治所为怀远县，燕州原有三县，其中之一便是怀远县，贞观元年（618）省；且顺化州于建中二年（781）与燕州同时并省。则顺化州可能是析原燕州的一部分而设。

燕州、辽州：《新唐书·方镇表》三：“开元七年，升平卢军使为平卢军

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又同书同卷天宝元年"更幽州节度使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归德二郡。"据《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普遍改州为郡，归德郡即燕州。则燕州于开元七年至天宝元年间在平卢节度使的治下[72]。辽州，武德二年于营州管内设置，贞观元年改名威州，后契丹陷营州，迁于幽州之境[73]。平卢节度设置之后，辽州又为平卢所领，其又由威州复名辽州恐怕亦在此时。

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74]《新唐书·方镇表》三记天宝元年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郡，检索两唐书地理志，未有归顺郡。又《旧唐书·契丹传》："其（窟哥）孙祜莫离，则天时历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汗州刺史，归顺郡王。"疑当为归化郡，即归顺州。归顺州的归附是与营州的复置发生在同一时期，天宝元年始为范阳所领，那么此前可能一直在平卢节度使治下。因归顺州在边州境内有治所，州治为怀柔，故所谓松漠府弹汗州部落，亦当为内附蕃部。

宁夷州：《旧唐书·史思明传》云，史思明为"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与安禄山同乡里"。据《安禄山事迹》，安禄山是开元初辗转到达营州的，可见宁夷州可能是开元初为胡人而设。

归义州：开元二十年，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降奚酋李诗琐高等部落五千帐，以其地为归义州，置其部幽州之偏[75]，《新唐书·地理志》七作"幽州良乡县古广阳城"。《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七《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中说契丹在开元二十一年"西连匈奴，东构渤海，收合余烬，窥我阿降奚。我是以有卢龙之师"[76]。战役在卢龙地区展开，在这场战争中，奚王李诗琐高率部参加了战役，俘获的契丹等四万众归内附奚族，"既以蛮夷出攻，亦以蛮夷入赏"。契丹人《李永定墓志》："（开元）二十七载，卢龙塞下奚内叛，节度使张守珪令公（李永定）张皇陆师，斩刈枭孽，流血色水，僵尸满原。天书



降临，改授右清道率。曩载骚扰余祲奔北。二十八载，节度使李适之差公领马骑讨袭，大破奚军，斩馘其君王，系虏其人众。”[77]《露布》和《墓志》均记李诗奚部在卢龙，可见开元二十一年归义州已迁徙到卢龙塞下。卢龙塞为平州的北部州界[78]，则归义州大部分时间是在平卢地域（平卢节度使下辖营平二州及安东都护府）内的。就其地理位置，应将其列为内蕃蕃州，而据《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年正月壬子，“奚归义王遣其首领细苏等来朝”[79]，似唐将其视为外蕃。《新唐书·奚传》：“李诗死，子延宠嗣，与契丹又叛，为幽州张守珪所困。延宠降，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80]，就是简述归义州叛乱之事。李诗琐高之子为饶乐都督，原归义州的部分部众回到故地[81]，又成为外蕃蕃部。《资治通鉴》亦叙此事：开元二十七年，平卢军使乌知义击叛奚余党一直到潢水之北，先胜后败，张守珪因隐其败状而坐贬[82]；二十八年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83]。李永定的墓志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归义州叛乱的过程，可补《唐书》和《资治通鉴》之不足。既然余党逃归奚、契丹故地，且李永定率马骑“斩馘其君王”，大概开元二十八年后归义州叛乱平息，就此废弃。由归义州的置废情况可以看出，外蕃与内蕃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三、营州平卢地域的蕃兵蕃将

（一）营州平卢地域的蕃人从军

唐朝对营州地域的蕃族羁縻统治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从唐初到武则天万岁通天（696—697）年间，主要由营州都督府管理[84]；后期自唐玄宗开元五年至唐肃宗上元二年（717—761），主要由平卢军节度使管理。营州地域的蕃兵蕃将从唐初开始就在唐的内部平叛及外部征讨中屡立战功。武德初，刘黑闼之叛，靺鞨内属突地稽率所部赴定州参与平叛；高开道引突厥来攻幽州，突地稽率兵邀击，大破之[85]。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征薛延陀，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其东境[86]；贞观十八年，太宗将征高句丽，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两都督兵及契丹、

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87]。同年，太宗亲征，又发契丹、奚、新罗、百济兵悉会。契丹、奚两部自辽河上游南下，新罗、百济自南向北，协同进攻高句丽[88]。由于营州都督府下的蕃部熟悉当地地理又加骁勇善战，故屡被充为先锋[89]。高宗时征高句丽、讨突厥阿史德温傅也都有营州所部兵冲锋陷阵[90]。武则天末，契丹据营州作乱，以辽东州为代表的安东都护府下辖的各蕃州都有参与同契丹作战[91]。

蕃兵作战分为两种：一种是部落兵，一种是降附的蕃族以个人的形式应募[92]。蕃兵作战多以部落兵的形式进行，这一点陈寅恪、张国刚等都有所论述[93]。外蕃参加作战，一般以部落的形式进行。如开元八年，契丹可突于反，征奚王李大酺及娑固合众讨可突于。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从征，仍保持其内部每一部落相对独立之状态。这从封赏按部落给之可以推断。比如，"开元二十年，礼部尚书、信安王祎受诏讨契丹，诏以耀卿为副。俄又令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给之"[94]。至于内蕃，则两种形式都有。《全唐文》卷七《命将征高丽诏》："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蕃长于勾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其众，绝其走伏。"这里的契丹蕃长、奚蕃长及燕州刺史皆应为营州都督府下有固定治所的蕃落。因为唐初契丹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分为八部，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95]。而此时契丹八部的蕃长是窟哥，所以此处的蕃长于勾折应为契丹营州都督府内蕃蕃州首领。与之相同，奚蕃长苏支亦应为营州都督府下的蕃州首领。李玄正则为武德时内属的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后。此为内属蕃族以部落形式作战之例。

《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记"碛西诸军兵募"从神龙元年(705)十月至景龙三年(709)十月服役获告身的蕃族兵士有玄州的屈去住，慎州的李噎塞等九人，夷宾州的莫失[96]。玄州为契丹人而设，慎州、夷宾州为靺鞨人而设，均为营州都督府下的内蕃蕃州[97]。这是内附的蕃族以个人的形式



应募的例子。

内属蕃族以个人形式入伍，对于蕃族酋长来说还有一种方式，即入朝为将。唐可利用蕃酋对原部族的影响力从而参与各种讨伐征战，故对入朝的蕃族首领总施以高官厚禄。

由外蕃向内蕃再向边地或朝中将士的转变，是唐帝国周边民族渐渐被中原的制度文化所吸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蕃族离开了它们的原居地，离开了部落组织，渐渐混同于中原将士，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方式，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由外蕃向内蕃的转变，从唐初就开始了：营州都督府下的鲜州、崇州乃武德五年(622)析奚饶乐都督府置[98]。《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略云："公讳永定，陇西人也。世有参边之贵。其曾祖延，皇朝本蕃大都督，兼赤山州刺史。祖大哥，云麾将军、左鹰扬大将军，兼玄州刺史。父仙礼，宁远将军、玄州昌利府折冲。公即宁远君之长子也。以开元五载(717)，袭父宁远将军、右卫昌利府折冲。六载仲夏，奏事玉阶，恩敕便留内供奉射生，更配左羽林上下。八载二月，令充两蕃使薛泰下总管。当时戎夷背叛，侵轶边垂。"[99]下文云其在边地累立战功先后授予安东卢龙府折冲都尉、范阳马军副使、上谷郡龙水府折冲都尉宣威将军、右率府郎将等升迁的历程。开元二十年被授予忠武将军、左率府中郎将，仍袭伯父青山州刺史。天宝十载(751)辞世时为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这条史料很好地说明了李永定家族由外蕃蕃州向内蕃蕃州再向边将的转化。其曾祖为赤山州刺史，祖为玄州刺史，父为玄州下昌利府折冲，其本人为范阳节度使下的军将并兼领青山州刺史。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赤山州为契丹松漠都督府统辖，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契丹伏部置。而玄州、青山州皆为在边地正州境内有治所的羁縻州。至于羁縻州玄州下的昌利府，正如张国刚先生指出的，这种军府反映了那些设立羁縻府州的部落和蕃国在形式上对唐朝的某种附属关系，以及在原则上向唐朝中央提供军队的义务[100]。

再如高句丽人高钦德，墓志称其为渤海人。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父千，唐左玉钤卫中郎。其父身死国事，钦德因拜陶

城府果毅。而后屡次升迁，官至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其祖为建安州都督，建安州乃总章元年(668)平高句丽之后，以高句丽酋长为都督而建立的蕃州[101]，则高钦德一家为高句丽人无疑。至钦德父亲时已成为朝中将士。高钦德则从边疆低级将士起家，进而入朝，又至阃外，终于柳城[102]。

上述的转化应是随着边地蕃族的不断内徙汉化，由于战争等原因渐进而行的，它反映了边州蕃族与中原民族不断融合的大趋势。本来这一过程可能还要漫长，然而安史之乱导致了这个过程的加速。在河北之地八年战乱频仍、疮痍遍野的情形下，原幽、营都督府下的内蕃蕃州逐渐被打散了部落，蕃州之名荡然无存[103]。大部分内蕃蕃族成员成为河北等藩镇的士兵，也有成为州县文职官员的，如《唐故行涿州司马金紫光禄大夫彭城郡刘公墓志铭并序》中刘建的先人刘瑰为故顺化州刺史兼侍御史[104]。顺化州处奚族，建中二年(781)省，则刘建乃奚人无疑。刘建与几个弟弟均善文辞，在幽州境内任州司马一类的文官。这与原部落里能征善战的蕃族民众颇有不同，从中可看出蕃族渐袭冠带接受中原文化的民族融合迹象。

(二)平卢地域的蕃将家族及地域文化

如前所述，蕃族的内徙融合大致上经历着由外蕃到内蕃再到朝中或边地将士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唐朝对周边内附民族的策略关系至密。唐对降附的蕃将优柔对待，以期在对外战争中发挥其能征善战的作用。在营州地域复杂的民族文化氛围下的平卢军，行伍中自然吸纳了数量众多的蕃兵蕃将。关于平卢镇的蕃兵蕃将及其影响，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平卢镇的统治集团是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105]。他还认为，种族和文化两问题是今人理解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106]，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于是河北之地自玄宗文治灿烂之世，转变为一胡化地



域[107]。这个脉络从平卢节度使一职上也有所体现，参后附表二。

从表中，可以看出：

1. 平卢节度使大约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乌知义的任命为界，前期多为朝廷从别处派遣而来，且任期时间较短；而后期节度使多出自平卢军中，且任期时间较长。《资治通鉴》对此有一很好的阐释："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108]自开元中后期，营州边地战事频繁，节度使长期率兵作战，任期长久有利于兵将熟悉，协同作战，这也是边地节度使渐渐掌握边区的军政、经济各种大权的原因之一。边地节度使一旦掌握了各种特权，即提拔其亲信及能征善战者，而唐政府更加倚重这些熟悉边地战事骁勇善战的将士，所以节度使由本镇或本军渐次提拔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2. 前期节度使多为汉人，后期节度使多为胡人或出自胡化集团。《资治通鉴》上论李唐任用胡人为边将是出于李林甫之嫉贤妒能，此议论之偏颇处已有多人论及[109]。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玄宗之用蕃将，除用其骑射之技外，更兼取其部落组织严整之长。这个时期边地战争形势和唐朝的用人策略以及蕃将高超的骑射技能使得开天年间边地节度使普遍任用胡人成为必然。

非但节度使任用蕃将，在节度使麾下的军队中，这一时期存在着大量的胡兵。我们选取大致自开元中至天宝末与平卢营州地域有关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制成附表三[110]：

分析该表可见：

1. 平卢军中胡人甚众。所统计人数共四十七位，其中张昊、士如珪、高尚分别为平卢节度判官、平卢军司马、平卢掌书记，为军镇文职官员，这类官员多为汉人担任。在武职官员中蕃人大量存在，有来自乌洛侯的乌氏、高句丽的李氏、高句丽的高氏等。显然，这与平卢军所在地营州的地域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

2. 将士当地化倾向。李休，为密云人；田延恽、田守义、田承嗣等田氏家族，为平州人；刘客奴，怀州武陟人，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王缙一族，为怀州温县人，后徙平州；田神功，冀州南宫人；杨惠元，平州人；陈利贞，幽州范阳人；邢君牙，瀛州乐寿人；周光济，平州卢龙人；这些平卢将士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来自河北道。

可见，血缘与地缘两种因素，在平卢军中皆有之。

下面探讨一下与平卢地域相关的蕃人家族[111]：

1. 乌罗护乌氏

韩愈《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乌氏著于《春秋》，谱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齐者有余、有支鸣，皆为大夫。秦有获，为大官，其后世之江南者，家鄱阳；处北者，家张掖。或入夷狄为君长。唐初，察为左武卫大将军，实张掖人。其子曰令望，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孙曰蒙，为中郎将军。是生赠尚书，讳承玼，字某。乌氏自莒、齐、秦大夫已来，皆以才力显。及武德以来，始以武功为名将家。开元中，尚书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二子：大夫为长，季曰重元，为某官。"

乌洛侯，唐也称之为乌罗护或乌罗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乌罗浑国，盖后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风俗与靺鞨同。贞观六年(632)，其君长遣使献貂皮焉。"

乌氏在开元年间有名将乌知义，其子乌承恩开元二十一年(733)曾为儒州都督[112]，疑儒州乃为降附的乌洛侯族所设。先天元年(712)幽州大都督麾下的将军乌可利，颇疑也是此族人[113]。另，乌承恩有子从则，见于《旧唐书·史思明传》。乌氏于唐可考的世系为：

察——令望——蒙——承玼——重胤——汉弘、汉贞、汉封、汉章

行专、行方、行思

重元



知义——承恩——从则

2. 高句丽高氏

辽东高氏，本高句丽族，以国为氏。《周书·高丽传》及《隋书·高丽传》皆云："其先出自夫余，始祖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上文提到的高钦德一家便是以国为姓的高句丽人。高句丽高氏常附会为渤海高氏，非但高钦德如此，就连总章年降附的高句丽王高藏之孙高震的碑志也毫不含糊地称自己为渤海人[114]。所以表三中的高崇文出身于幽州，自云渤海人，亦有出身高句丽之嫌疑。《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吴松弟推测，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平民分布在幽州一带[115]，则生于幽州的高崇文很有可能为高句丽人。

据其墓志，高钦德一家世系为：

瑗——怀——千——钦德——崇节

3. 高句丽李氏

高句丽李正己一族为人熟知。李正己本名李怀玉[116]，生于平卢。"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会有敕遣使来存问，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遂杀之，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117]侯希逸为李正己之外兄，李正己在军中十分得人心，先立其外兄为节度使，而几年后发动军变成为节度使。李正己的从父兄李洧，也在平卢军中，后被李正己任用为徐州刺史，李正己卒后，以徐州归顺。李澮，为徐州团练副使。总之，平卢军内的高句丽人是相当有势力的。高句丽李氏掌平卢镇的军政大权长达半个多世纪，曾为李唐中央政府之心腹大患，也是引人深思之问题。李正己一族世系为：

洧

澮

正己——纳——承务(又作成务)

　　　　经　　师古——明安

师道
师贤(师道堂弟)
师智(师道堂弟)

4. 安东王氏

“安东王氏,本阿布思之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曰五哥之,左武卫将军,生末怛活”[118]。平卢节度使设置初期即兼领安东都护府[119],后时而属于幽州节度,时而独立为镇,则安东都护府时而与平卢一起在幽州节度之下[120],时而归属平卢节度[121]。而安史之乱时平卢镇主要的勤王部队包含平卢军及安东都护府二军事力量之和[122]。突厥阿布思酋长李思摩因与安禄山有隙叛归漠北之后,安禄山诱其部落为己用,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123]。安东王氏世隶安东都护府,看来阿布思之族在安东都护府者为数不少。由于安东都护府在平卢镇南迁之前多属于平卢节度使治下,也属于平卢地域,故也将其列置于次。安东王氏的世系为:

末怛活——升朝——廷凑——元逵

5. 契丹李氏

表中李永定,曾祖延为赤山州刺史,祖大哥为玄州刺史,父仙礼为玄州昌利府折冲。李永定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卢士卒,然其曾祖至父三代都与营州地域下的羁縻州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他本人也长期在范阳、安东等处为军将,且袭为青山州刺史。而其任职的时间内,平卢与范阳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这在下文将论及,故也将其列置在表中。赤山州、玄州、青山州都是营州都督府下为契丹所置的羁縻州。据《旧唐书·地理志》二,玄州隋开皇(581—600)初设置过,唐贞观二十年(646)又重新设置,万岁通天二年(697)移于徐、宋两州,神龙元年(707)隶幽州。青山州乃景云元年(710)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李永定天宝十载(751)卒,年六十五。以二十年为一代向上推,其曾祖至李永定辈可能正好经历了上述转徙过程。

李永定家族的世系为：

延——大哥——仙礼——永定——奇俊
　　　　　　　　　　　　　奇□
　　　　　　　　　　　　　奇珍
　　　　　　　　　　　　　奇恩

出于柳城地域的另有契丹李光弼家族。光弼为玄宗时名将，其父李楷洛为契丹酋长，武后时入朝[124]。《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下云："柳城李氏，世为契丹酋长"，则其家族最初为活动在营州柳城一带的内蕃契丹部落，李楷洛之前皆为酋长。据杨炎《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李楷洛是久视(700)中解甲来朝[125]，此年有契丹将李楷固、骆务整等降唐[126]，故颇怀疑李楷洛是契丹之乱平定后降唐的。李光弼家族的世系为：

令节——重英——楷洛——光弼——义忠
　　　　　　　　　　光琰　　象
　　　　　　　　　　光彦　　彙——罕
　　　　　　　　　　光进
　　　　　　　　　　遵行(又作遵汴)
　　　　　　　　　　遵宜(又作遵直)

6. 奚族李氏

唐后期河朔成德镇的奚族李宝臣原出于柳城："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宝臣为张锁高养子，冒姓张氏，后赐姓李氏。"[127]其养父名"锁高"，两《唐书·李宝臣传》中均作"琐高"，而"琐高"是奚族常用的姓名。如前述归义州都督"李诗琐高"，又如《资治通鉴》载史思明曾以计骗得奚良将琐高，执送幽州，胡三省注此条认为，"琐高者，盖奚中酋豪之号"[128]，而《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十六则认为，"琐"为奚姓，"琐乃高之氏"。无论如何，"琐高"之号出自奚族，则李宝臣之养父为奚人也，因内附边地而改汉姓张氏。

来自平卢的李忠臣，其裨将有李重倩者，为奚人[129]。此人也应出自营州地域。

奚李宝臣家族的世系为：

素——越——佶——宝臣——惟诚

宝正　惟岳

惟简——元孙

元质

元立

元本

铢

7. 靺鞨李氏

李希烈，燕州辽西人，少籍平卢军，从李忠臣浮海战河北有劳。《旧唐书·地理志》二燕州条："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为粟末靺鞨之误）别种。辽西，州所治县也。"是以李希烈当为靺鞨人，唐对内附或有功的异民族将领常赐名或赐姓[130]，李希烈之李姓应为赐姓。燕州的靺鞨名将还有前述武德初附唐的突地稽，其子为李谨行亦为名将。岑仲勉在《金石论丛》一书中，还原了李谨行子李秀的碑文[131]。据此碑，靺鞨李谨行家族的世系为：

稽——谨行——秀——偃

8. 粟特胡人

众所周知，安禄山、史思明为粟特胡人，他们皆是在平卢军与他族的边地战争中逐渐拔自行伍的。两人开元中便在平卢军中，天宝三载（744）安禄山为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后便常驻范阳。而史思明直到安史之乱前夕仍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132]。另外，平卢军中还有"平卢骑将史定方"[133]，平卢司马许杲有将康自劝[134]，均为粟特人。

（三）平卢地域的文化特征

我们知道，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



河朔地域，其文化上已呈现出与中央统治核心不同的风貌，陈寅恪先生将其概括为“胡化”。陈先生认为，关于河朔藩镇之人可分为两类：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135]。正因为平卢军中容纳有大量的来自营州地域的蕃族兵将，而平卢军中的汉族将士几乎全部来自河北道，河北之人，生长边陲，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又长年生活战斗在营州这样一个戎夷交杂蕃汉汇聚的地区，在开天年间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地域文化特征。这种地域文化体现在民风和个人身上，就表现为骁勇善战、豪侠仗义、朴素无学，同时又有残虐野蛮的一面。

营州地域在隋时就是“人性劲悍，习于戎马”之地[136]，唐代更是边塞重镇常同外族作战之处，所以平卢地域的民众以能征善战而闻名。籍贯为营州柳城的张秀，墓志中说他“贯使弓马，性爱珪璋”[137]。“邹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许人也。万岁通天年，契丹贼李尽忠来寇平州，保英时任刺史，领兵讨击。既而城孤援寡，势将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贼退，所司以闻，优制封为诚节夫人”[138]。出身于营州地域的靺鞨将领李谨行之妻刘氏，高宗咸亨四年(673)，李谨行率兵击高句丽叛者，刘氏留伐奴城，高句丽引靺鞨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139]。女子勇武尚且如此，可见此区域民风是何等劲悍。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140]，所向披靡。同样，以平卢军为主体而在山东半岛割据的高句丽李氏，“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141]。因此，平卢军南迁至淄青一带后，终使当地风气为之大变。刘禹锡《平齐行》中有所描述：“胡尘昔起蓟北门，河南地属平卢军。貂裘代马绕东岳，峄阳孤桐削为角。地形十二虏意骄，恩泽含容历四朝。鲁人皆解带弓箭，齐人不复闻箫韶。”[142]

《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则展现了此地域人豪侠的一面，大致内容是：平卢书记韩翊在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中与妻子柳氏失散，而柳氏为蕃将沙吒利者所劫。乱平之后，韩翊偶遇柳氏，大不胜情。会众淄青将士合乐酒楼，平卢虞候许俊因知其事，径直至沙吒利之第，趁其出行，乃披衽

执辔，犯关排闼，使招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而归，四座皆惊。乃诣节度使侯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143]故事发生的时间为平卢军南迁淄青后不久，平卢节度使左右亲信和心腹皆为原来的部下，许俊"族本幽蓟"，来自平卢地域无疑。其为人处事颇为侠义，而节度使侯希逸也对其举止十分赞许，则平卢地域之民风可以从中窥其一端也。

《封氏闻见记》卷九《迁善》另有一则平卢将田神功的故事："田神功自平卢兵使授淄青节度，旧判官皆偏裨时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位，神功待之亦无降礼。后因围宋州，见李太尉与敕使打毬，闻判官张修至，太尉与之尽礼答拜，神功大惊，呼刘位问之，曰：'太尉今日见张郎中，与之尽礼答拜，是何礼也？'位曰：'判官是幕宾，使主无受拜之礼。'神功曰：'神功比来受判官拜，大是罪过，公何不早说。'遂令屈请诸判官谢之曰：'神功武将，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礼数，比来错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过，今还判官拜。'一一拜之，诸判官避而不敢当，远近闻之，莫不称其宏量。"

《太平广记》中还载有出自营州宁夷州的粟特人史思明的故事：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144]

平卢将田神功"不知朝廷礼数"，但闻过则改，显出其虽无学但朴素的一面。出身平卢的李惠登"朴素不知学，居官无枝叶"[145]。史思明欲作诗以附庸风雅，奈何打油诗也作不好，押韵都不具备。安禄山更是"目不知书"[146]，可知平卢地域人尤其是武将总体文化水平不高。

平卢军的残虐野蛮在安史之乱时期经常表现出来。《新唐书·史思明传》："思明兵所向，纵其下椎剽，淫夺人妻女，以是士最奋。"[147]而史思明



军队之精锐，多为平卢士卒。田神功平刘展，率平卢将士“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148]。至杭州，“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149]。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在记载侯希逸和李惠登的籍贯时只云，侯希逸，平卢人也。李惠登，平卢人也。营州地域在平卢军设立之后，才得以冠有平卢之号。而两位将士之所以以平卢指代自己的故乡，一则《旧唐书》的编纂者可能已失其真正的籍贯，而其常年在平卢作战，只好以此代称；二则，“平卢人”显示出平卢军将对籍贯的模糊，由于长期在边地为兵，已将军镇作为自己的出生之地。他们对于自己出于平卢军、出于平卢之地都有了很大的认同感，以至于南迁至山东半岛淄青一带后，仍冠以平卢之号。中古时期的籍贯郡望或附贯入籍问题，反映的是文化认同心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将士们对于平卢(营州)地域的文化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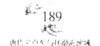
(四)平卢地域蕃将集团的变迁——试析安史之乱中平卢军不叛的原因

表三从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开天时期平卢与幽州(范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李休，“皇朝宁远将军守恒王府典军、赐金紫鱼袋、上柱国，充范阳节度使经略副使兼节度都虞候，转平卢节度副使兼都虞候。每有出师，皆知两节马步”[150]。再如董秦，始入行伍，一直身籍平卢军，事幽州节度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积劳至平卢军先锋使。董氏身为平卢将士却受幽州节度管辖，这是因为，在平卢军节度使开元初设立后，至开元末，平卢节度时与幽州节度并为一镇，时又分为两镇，虽或并入幽州，而以有节度之时为多[151]。从战略上讲，幽州与营州共为犄角之势，且一同经营控御东北诸蕃，所以幽州节度与平卢节度常常需要协同作战。正如张九龄《敕平卢诸将士书》中所云：“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152]所以幽州节度使经常兼领平卢军等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开元八年(720)，幽州节度兼本军州经略大使，并节度河北诸军大使。”薛楚玉为幽州、平卢两节度使；张守珪为平卢节度使后转幽州节度使，仍兼节度平卢的事务。如《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中“平卢信息，日夕往来，

数与筹宜，首尾相应。令彼丑虏，飞走无归”[153]。同样，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又兼范阳，后又兼河东，也是出于东北军事形势的需要。开元八年，契丹可突于乱，使得平卢使治西徙渔阳，直到开元十一年（723）才返回柳城[154]。开元八年至开元十一年，平卢节度使实未发挥多少作用，这一事实从开元十年为黑水靺鞨置黑水府，未归属于营州都督（平卢节度使），却隶于幽州都督也可以得到印证[155]。开元十二年（724），平卢为一独立的军镇[156]。开元十五年（727）夏五月癸西，以鄂王涓为幽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颖王澐为安东都护、平卢军节度大使[157]。可见至少开元十五年（727）时，平卢还是一个独立的军镇。开元二十年（732），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洺、贝、冀、魏、营等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158]。开元二十八年（740），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159]。则至迟到开元二十八年，平卢复为独立的军镇[160]，直至天宝元年（742）以后。

平卢镇的变动与两蕃关系密切，这在下文将有论述。细考平卢节度使的建置和废罢情况，可以看出，平卢军节度使设立之初便与幽州节度使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在平卢军中成长起来的粟特将领安禄山，在其掌握东北最大的军镇范阳节度使后，其集团活动重心渐向范阳转移。唐代开天年间营州柳城一带存在着大量粟特胡人，这些粟特人不少加入了平卢军。安禄山原为营州柳城杂种胡人[161]，史思明为营州宁夷州杂种胡，与安禄山同乡里[162]。《安禄山事迹》中天宝十载（751）还记录了粟特胡人、平卢骑将史定方的事迹。而安史之乱发生，史思明率部加入叛军后，平卢将士中即少有粟特人的踪影，而同时期在安史周围却活动着大量的粟特胡人将士，见附表四。

安史周围聚集着大量的粟特胡人，原因之一是乱军中有为数不少的六州胡[163]，原因之二是乱军中有不少来自柳城一带，如史思明者。安禄山将其大本营由营州柳城逐渐移至幽州后，至少在安史之乱前夕，平卢军内以粟特军将为核心的牙兵、牙将亦应逐渐聚集到安禄山的周围。身为



安禄山的亲信、假子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安忠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中追其本源为柳城奚人,《新唐书·李宝臣传》又称其为"范阳内属奚",其实就反映了这一变动。而史思明带走的大批平卢精锐,可能就有大量的粟特兵将及安史的亲信与中坚力量。例如曾在平卢军中号称"辕门二龙"之一的乌承玼,在安史之乱初为叛军冲锋陷阵[164];本属平卢镇出生柳城的胡人李怀仙也在安史之乱初就加入了叛军。

安史集团从平卢军的淡出,导致反叛力量的大大削弱,而平卢军中的勤王势力渐至上风,经过数次兵变之后,高句丽武人集团的势力渐渐在平卢军中崛起。以下简要列举有关重要史实: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使吕知诲守平卢。

天宝十五载(756)三月,吕知诲诱杀安东副大都护马灵督。平卢将刘客奴、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杀吕知诲。刘客奴为平卢节度,赐名正臣,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

至德元载(756)十二月,徐归道鸩杀刘正臣,被禄山任为节度[165]。

至德二载(757)正月,王玄志与平卢高句丽将领侯希逸杀徐归道,王玄志自称权知平卢节度。

乾元元年(758)二月,王玄志被朝廷任命为平卢节度使。

乾元元年十二月,王玄志薨,平卢高句丽将领李怀玉(后赐名正己)杀玄志子,推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

上元二年(761)十一月,侯希逸举二万余人,引兵南迁。

宝应元年(762)建寅月,侯希逸会田神功等于兖州。

宝应元年四月,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

永泰元年(765)五月,李怀玉逐侯希逸,朝廷以其知留后,赐名正己[166]。

安史乱初,吕知诲、徐归道与马灵督、刘正臣、王玄志之间递相杀戮,正是平卢内部从叛和平叛两种势力斗争的激烈表现。但吕、徐两人任节度使时间十分短暂,吕不足五个月,而徐则不足两个月,即被平叛势力清除,安史残余力量在平卢军中的势力之弱可见一斑。安史势力淡出后的

平卢镇，与安史集团在民族情感和政治利益上已没有多少一致性，其渐为勤王平叛势力所控制，成为安史乱军的重要牵制力量，实为其发展趋向中最可能途径之一。而安史之乱初期其后方极不稳定的局势，很可能就是促使平卢军中的勤王势力于此时与安史叛军断然决裂的诱因。就在吕知诲被杀前夕，安禄山范阳伪节度留后贾循等谋以归顺被杀[167]，而奚、契丹也正在觊觎着兵力空虚的范阳[168]。于是，在河北一度"十七郡皆归朝廷，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的形势下，安史势力吕知诲被杀，掌握平卢军权的刘正臣一系马上"请取范阳以自效"[169]，但被迅速回军的史思明击败[170]。到至德元载(756)十一月，河北皆为史思明所定[171]。在这种情势下，平卢镇内的安史势力又开始抬头。于是，十二月就发生了徐归道鸩杀刘正臣之事。但安史势力在平卢军中毕竟已很薄弱，所以不到两个月徐归道又为王玄志所杀。

在诛杀徐归道的事件中，平卢高句丽将领侯希逸积极参与，高句丽人开始进入平卢政治舞台的中心，年余后侯希逸便成为平卢节度使[172]。从侯希逸开始，节度使才由军中废立，此既为平卢节度又为整个唐后期节度使自立之始。兹可注意者，侯希逸之所以继任为节度使，乃为其姑表兄弟高句丽人李正己的鼎力推举。李正己以一平卢裨将，敢于公然杀害前任节度使之子，如此恣肆跋扈；且此后，尽管河北之地几乎尽为安史势力范围，安史的势力在平卢镇中再也没能抬头。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侯希逸和李正己等高句丽将领为核心的集团对平卢军控驭之严。而此集团中，尚有其他高句丽人占据要职，在平卢淄青节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除李正己及其后代长期把持平卢军政以外，如前文论及的李正己之族兄李洧，担任徐州刺史，在正己死后以徐州归顺。而李洧死后，其将高承宗代其职[173]，颇疑高承宗也是出生高句丽族的将领。在这里，以侯希逸、李正己等高句丽族人为中心，纠合其他民族而在平卢军中诞生的统治集团，我们姑且称之为"高句丽武人集团"。此集团以诛杀徐归道



之机在平卢军中崛起，又借王玄志之死正式夺取了平卢军的领导权。此后他们虽仍以平叛的面目出现，与安史集团对峙，但从其日后盘踞山东半岛，藐视朝廷，跋扈一方，“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来看[174]，其实是一政治利益上与安史集团截然不同之别一民族集团，对唐朝也并无多少忠顺之心。因此，他们之所以在动乱时期支持唐朝，只不过是以勤王之名，行扩张之实，以扩张平卢地方及本民族之势力，并试图取代安史集团在东北的地位。但在与安史集团的争夺中，虽然平卢军也取得过一定的胜利[175]，但终因“救援既绝，又为奚所侵”，难以继续支撑，被迫于上元二年（761）“悉举其军二万人袭李怀仙，破之，因引兵而南”[176]，“浮海入青州据之”[177]，开始了平卢军在山东半岛扩张势力的新时期。

可见，平卢军之所以在安史之乱中未从安禄山叛乱，是由于安史之乱之前安史集团势力淡出平卢，使得拥护叛乱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拥护朝廷的力量相对较为强大，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因。而平卢军被与安史集团利益不同的别一高句丽武人集团所统率后，又成为该集团对抗安史乱军，扩张自己势力的有力工具。他们先以范阳为军事目标，后又南下将目标转移到山东、河南一带，曾控据十五州，“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178]。平卢地域不同族群集团的利益关系导致各种力量的消解与分化，影响了平卢军在安史乱中乃至乱后的行动。

四、平卢镇与外蕃之关系

营州地域民族状况复杂，是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而平卢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边地军事力量。它的设置与外蕃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的重新设置密切相关，设置之后，也是由于经营东北外蕃，从而成为开天时期地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一）平卢军的设置与两蕃

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据营州作乱，使唐失掉营州，东北防线回撤到幽

州，遂失掉了原先的犄角之势。战争中契丹也伤亡甚众，其残部与胁从部落奚、霫等并降突厥。之后虽时常侵扰东北边境，但也因突厥的残虐征役而结怨。于是，作为东北边地的中间势力，在唐与突厥两大势力的对比中，产生倾向唐廷之意。唐朝廷中便有人建言恢复营州，促使其归化[179]。开元四年（716），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180]。此两族在唐太宗时期就已内附，曾在营州都督府下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两蕃降唐后，营州的复建立即被提上议程。《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四《置营州都督府制》："朕闻舞干戚者所以怀荒远，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我国家顷有营州，兹为肤障，使北戎不敢窥觎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自赵翙失于镇静蕃部，因此携离，颇有负途之睽，旋闻改邑之叹，高墉填堑，故里为墟。言念于此，每思开复。达奚饶乐郡王李大酺，赐婚来朝，已纳呼韩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弥嘉秺侯之节，咸申恳请，朕所难为。宜恢远图，用光旧业，其营州都督，宜依旧于柳城置。"

营州都督府是在奚、契丹的恳请下而复置的，两蕃藉此庇护自己的部落，而唐廷也因此用其捍蔽边疆，防御突厥，所谓"使北戎不敢窥觎东藩"也。镇抚两蕃的军队便于开元五年（717）营州复置时成立，这支军队就是平卢军，此为日后平卢节度使麾下的主体力量。唐朝为镇抚两蕃，还专门设置了捍蕃使，由安东都护薛泰兼领[181]。

（二）平卢军的进退兴废与两蕃

前文说过，平卢军在开元年间经常并入幽州节度使，接受幽州节度使（或长史）的管理。这也与两蕃的活动密切相关。第一，如前文所说，幽州节度要与平卢节度协同作战，共御两蕃；第二是平卢营州阵地的不稳定性。营州受到契丹和奚的强大进攻时，往往后撤，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本镇的作用，只好依附于幽州节度之下。

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契丹正处于由大贺氏部落联盟向遥辇氏部落联



盟的嬗代时期，内部很不稳定，亲唐的大贺氏与亲突厥的遥辇氏角逐的结果，使得契丹时而附唐，时而附于突厥[182]。从开元六年(718)松漠郡王李失活死后，契丹在八年之内(718—725)，先后四易其主。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所说，此一时期，契丹的局势高度动荡[183]。

外蕃局势的动荡对平卢镇造成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开元八年(720)，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与奚李大酺、契丹娑固以讨契丹可突于。兵败，许钦澹移军入渝关[184]。于是，营州州治又迁到渔阳，直到十一年(723)才还柳城。营州的后撤显示出在契丹的强势面前，单凭平卢军一军作战是远远不够的，开元八年夏发关中卒前来援助[185]，同年九月唐朝遣使至鞣鞨求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186]。所以，平卢与幽州的合势势在必然。开元八年，幽州节度一度节度河北诸军[187]。开元十八年(730)，可突于弑君胁奚众叛降突厥，制以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大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188]，制出未行。但当时平卢军与契丹交锋，契丹兵败于捺禄山[189]。开元二十年，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幽州节度和平卢军都参加了此次战役[190]。是岁，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平卢军受幽州直接节度。开元年间，平卢与外蕃的关系以开元十八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契丹君主分别为李失活、李娑固、李郁于、李吐于、李邵固，均出自亲唐的大贺氏[191]，与平卢的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但由于后四人均为契丹衙官可突于所立，政权总是处于动荡之中，所以与唐边军的关系也有冲突之时。开元十二年至十五年，两蕃一度朝贡频繁。十二年契丹和奚来朝贡四次，十三年两次，十四年三次，十五年两次[192]，这便是由于契丹君长权力岌岌可危而想寻求唐的庇护的缘故。然而，李吐于未能免于被逐，李邵固未能免于被杀。而开元十八年，最后一个大贺氏君长李邵固为可突于所杀，屈烈继立。屈烈是第一个遥辇氏的君长[193]。此后，虽有大贺氏势力李过折归唐，但即位不久即为遥辇氏涅礼所杀。开元十八年之后，契丹的态度基本上是亲突厥反唐朝的，东北边地幽州节度使、平卢军常与之频繁交战，所以这一阶段平卢与幽州大部分时间是合势对付两蕃尤其

是契丹的。天宝元年(742),分平卢别为节度,其原因盖在平卢这一阵地日见重要。天宝二年,平卢增置了怀远军和卢龙军两军[194]。也是由于平卢幽州要合势对付两蕃,安禄山才得以身兼数职,使他有发动叛乱的实力和可能。所以两蕃对唐朝边州军政建置乃至整个帝国政治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由于押蕃落使(或称捍蕃使、诸蕃经略处置使等)在薛泰开元八年末被可突于生擒后,大部分时间由平卢军节度使或平卢军使兼领[195]。所以,当安史之乱中平卢军倒戈时,唐仍封刘客奴为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196],故东北外蕃仍在平卢军首领的管领之下。奚、契丹随同平卢军参与平定叛乱[197],安禄山叛乱之初,范阳守备空虚,外蕃与平卢都有据范阳之意,两者相互合作,又相互利用。平卢节度使刘正臣曾与奚王阿笃孤联合袭击范阳[198],虽然未能实现,但足可说明两蕃和平卢军在战乱之中的联系。收复长安后,奚首领白越、契丹首领捺括还派使者前来朝贺,肃宗"赐食、金帛、锦绣、衣服等"[199]。而上元二年(761),当平卢军在东北日见局促时刻,却遭到外蕃奚族的侵扰[200]。平卢军失去了两蕃的援助,反而遭其进攻,来自北部的压力不断增大,这也是平卢军放弃营州南下的直接原因之一[201]。所谓设之者因两蕃,助之者两蕃,逐之者亦两蕃也。元代史家曾有言:"库莫奚、契丹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俱强为邻国,合并为君臣,历八百余年,相为终始。"[202]奚、契丹两蕃在唐代的盛衰适足从它们与边地重镇平卢的关系中反映出来。

(三)平卢节度军队的壮大与外蕃

据史料记载,平卢军的军队组成为[203]:

平卢镇:治营州,三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204]。

——平卢军:营州,一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匹,开元五年(717)置。

——卢龙军:平州,一万人,马三百匹,天宝二年(743)置。



——榆关守捉：营州城西，三千人，马一百匹。

——安东都护府（又作安东镇守）：怀远军、保定军[205]：营州东[206]，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

——燕郡守捉、汝罗守捉、巫闾守捉、襄平守捉等。

除了上面所列的定额军队外，外蕃的降附也使平卢节度使的军队力量大为壮大。如韩愈《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开元中，尚书（乌承玼）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于。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边威益张。"[207]平卢节度使在与两蕃作战中，吸纳了不少其他外蕃的力量。开元十四年，唐为黑水靺鞨置黑水府，是由安东都护薛泰所请[208]，可见外蕃的降附是通过平卢镇下的将领进行的。开天时东北外蕃蕃府普遍设军，大概表示诸外蕃在形式上对唐承担一定的兵役，可以受唐朝边地节度使的征发。至德元载（756），平卢留后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聘渤海，且征兵马[209]，可能即缘此。

外蕃普遍设军情况

羁縻府	所设军名	设置时间	出处
松漠都督府	静析军[210]	开元六年	《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
饶乐都督府	保塞军	开元六年	《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
黑水都督府	黑水军	开元十三年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
鸡林州大都督府	宁海军	开元二十一年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

开元之后，唐在外蕃设军，章群先生在《唐代蕃将研究》中曾有所论述[211]。唐在外蕃仿照边地节度使设军，加以名号，使得外蕃军事力量边军化，可能有将外蕃纳入边军体制的目的，试图使外蕃兵力在必要时为我所用。东北外蕃设军，是在几次战役中，因唐需要外蕃军事力量的援助而设置的。开元六年（718）二月，唐欲大举蕃汉兵北伐，因而契丹都督加静

柝军经略大使之号，奚都督有保塞军经略大使之号[212]。开元二十年，渤海靺鞨入寇登州，二十一年，“诏新罗王金兴光发兵讨之，仍加授兴光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213]，此为唐在新罗设宁海军之始。此后，新罗王一直加此称号，到唐文宗时仍有此号[214]。虽然外蕃设军，不一定改变蕃族内部的军事体制，但初设之时的确为唐所用，后来继袭军使者更多的是体现着对唐朝军事上的名义隶属和服从。外蕃设立军的官僚体制，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只知道每军设有军使，军使下还设有副使一职[215]。

（四）平卢节度使对诸蕃的镇抚制御

平卢节度使控御的外蕃府州，诸书记载各不相同：

出处	控御诸蕃	时间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新唐书》卷八十六	奚、契丹、渤海、黑水	开元二十八年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室韦、靺鞨	天宝元年（742）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两蕃、渤海、黑水	天宝元年
《新唐书》卷八十五	渤海、新罗	永泰元年（765）后

此表所列时间指的是本条史料所标注的时间。实则平卢军控御奚、契丹两蕃从其设置之初就已开始，随着外蕃的归附，所领蕃族逐渐增多；对于东北这些民族的镇抚是由平卢、幽州两节度使分工合作，共同承担，上文已有详论。《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河北道所控远夷为契丹、奚、靺鞨、室韦，也体现了这一点。当然，边州节度对于外蕃的控御是十分广泛的，范围几乎涵盖了东北地区大部分蕃族。同时，这种控御又是有限的，如对于契丹内部权力的争夺，唐廷只是听之任之，好加安抚。至于永泰元年之后监领蕃族的变化，是由于平卢镇南迁至山东半岛，监领隔海相望的渤海、新罗的任务当然非其莫属，奚、契丹两蕃则由幽



州、卢龙节度使镇抚。

五、平卢镇南迁与地域环境之关系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安史集团内部互相杀戮,已成苟延之势。而地处营州的平卢军与安史军队连年攻战,损耗很大。时平卢南有安史根据地范阳以及卢龙的李怀仙,西与北有两蕃,东临大海,处于腹背受敌之地。兵力不足、粮草困乏都使得平卢军难以维持这块唐朝势力在东北的最后阵地。开元年间,平卢军的军粮况且需要海上供给[216],安史乱初还曾受到地处平原的颜真卿的军资援助[217],而此时则面临着十分窘迫的境地。于是,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引兵南迁。南迁淄青的平卢军只是原有平卢镇军的一部分。安史之乱中,平卢镇的兵将多次分流,见附表五。但侯希逸所率的这批军队是平卢军的主体力量,日后"平卢淄青"之号为其专有。关于南迁原因,已有人做过探讨[218],但大都注意平卢镇南迁的具体的外部原因,而对于潜在的深层原因,即环渤海地域的民族环境与流动,却鲜有人给予关注。

(一)唐以前环渤海地域内的民族流动

十六国北朝时期,营州一带乃至整个环渤海地域都有大量的高句丽徙民。慕容鲜卑崛起后,与高句丽在辽东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在频繁的争战过程中,慕容氏诸燕曾多次迁徙高句丽民众。例如,342年,慕容皝征高句丽,大破之,遂入丸都,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219]。后燕慕容盛长乐二年(400),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高句丽,拔其新城、南苏两城,开境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220]。俘获的这些高句丽人散布在以龙城(隋唐营州)为中心的地域之内。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十二月,诏于青州立高句丽庙[221]。说明北魏时期的山东半岛一带已存在着不少高句丽徙民。在北朝任职的高姓官员,不少人出自高句丽。经姚薇元考证,高肇、高崇等均为高句丽人[222]。总之,唐以前环渤海地域内的民族流

动就已经有一定规模。

（二）唐代环渤海地域内的民族流动

唐前期的河北道（以营州地域为主）和河南道（以淄青徐兖等州为主）都曾容纳过大量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唐高宗平百济后，曾将百济民众徙至徐、兖诸州[223]。唐总章元年（668）平高句丽，仅凤中高句丽遗民叛乱，唐将其散向河南、陇右诸州[224]。

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的契丹叛乱时，河南道曾容纳了来自营州的十一个蕃州的内附胡人，历十余年至神龙（705—707）初而北返幽州。营州都督府内蕃蕃州南下的情况为：

蕃州	迁徙地	蕃州	迁徙地
慎州	淄州、青州	带州	青州
崇州	淄州、青州	黎州	宋州
玄州	徐州、宋州	昌州	青州
夷宾州	徐州	瑞州	宋州
师州	青州	信州	青州
鲜州	青州		

可见，唐前期的环渤海地域，无论是属于河北道的营州地域，还是河南道的山东半岛一隅，都有百济、高句丽移民以及营府下的契丹、奚等为数不少的蕃族存在的痕迹。虽或后来被迁徙回故地或他处，其产生并遗留下来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公元668年之后，新罗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朝鲜半岛上的民众被统称为“新罗人”。统一后的新罗与山东半岛乃至中原王朝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人口流动也更加活跃。考古工作者在现在的山东、河北等省，曾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址，据分析，这些矿洞的开采方法部



分是采用新罗的采掘方法。这反映了山东、河北之地可能曾经聚集过不少的新罗工匠，或者说这一带可能有不少的新罗移民[25]。长庆元年(821)三月，平卢军节度使薛平上奏，应禁断海贼诱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薛平说："先有制敕禁断，缘当管久陷贼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复以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26]。"当管久陷贼中"是指高句丽人侯希逸率平卢军南迁至淄青之后，尤其是高句丽李氏为节度使之后建立的割据统治。而"新罗人"的流徙可能要追溯到这之前，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人张保皋、郑年等投军于徐州武宁军，保皋发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27]，他的所见至少可以反映出沿海一带新罗人之众多。据刘希为、金文经、陈尚胜等人对日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的研究，新罗侨民散居在唐境大概有七个道和十九个州府[28]。在今山东省沿海到淮河、运河、长江口的地区，散布着许多新罗人的村落[29]。《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中有"敕平卢军节度同十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泳，勾当文登界新罗人户"，而张泳是位新罗人[30]。管理新罗人户的官员由平卢镇的新罗人将士担任，可见，新罗人的势力早已渗透到军队之中，而这与节度使为高句丽人（部分属于统一后的"新罗人"所涵盖的范围），且担任押渤海、新罗两蕃使，恐怕有很大关系。

（三）唐代环渤海地域各地区间的交流

唐代环渤海地域内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北部的营州至契丹衙帐、奚衙帐等东北诸蕃均有道路相通。唐贞元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边州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第一就是营州入安东道[31]，通过这条道路可以到达朝鲜半岛以及东北的渤海。不仅陆路交通发达，海路交通自古也十分便利和畅通，至唐代更是如此。顾炎武《海师》："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讨公孙渊；秦苻坚遣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右径袭和龙；唐太宗伐高句丽，命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趋平壤；薛万彻率甲士三万，自东莱渡海入鸭绿水，此山东下海至辽东之路。"又云"公孙度越海攻东

莱诸县，此又辽东下海而至山东也”[22]。《皇华四达记》记述的唐朝通四夷之路，其二就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新唐书·地理志》详细记载了这条道路：“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淤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得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23]开元二十年，渤海顺利地刺杀登州刺史韦俊[24]，从侧面反映了此条路线交通之方便。

陆路交通和海路交通的发达，大大推动了环渤海地域内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制度方面，渤海和新罗仿照唐朝制度，在京城建筑、职官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都深受唐朝的影响[25]。文化方面，渤海和新罗都深受汉文化的濡染。陈尚胜先生的《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一文，从汉字的使用和普及、儒学教育的推行、典章制度的完备和佛教的日益兴盛等方面考察了唐代汉文化对新罗文化的影响。他说：“唐代中国文化对新罗文化的影响巨深。从国家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制度，到社会伦理思想与宗教信仰，以及本文未及考察的文化内容，如科技、文学、艺术等，新罗文化无不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26]渤海和新罗制度文化方面的发展与这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提倡汉文化，努力学习唐朝密切相关，与长期以来环渤海地域内的交流和影响也不无关系。渤海国的统治者就来自营州一带，营州是唐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塞内外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大祚荣在建立渤海国之前，至少在营州生活了近三十年，深受汉文化的沐浴和影响[27]。经济方面，环渤海地域的民间贸易早已开始，唐中叶以后又有



了长足的发展。渤海曾将大批的熟铜运到淄青一带出卖[238]；李正己任平卢节度使时，“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239]。新罗张保皋还与在中国的新罗侨民势力取得联系，经营此一地域的国际贸易[240]。

环渤海地域内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地处营州的平卢军对同一地域南端的山东半岛并不陌生。平卢军镇兵轮番镇戍的足迹也曾到达山东半岛。《颜鲁公集·行状》就提到平卢镇兵三千五百人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前往平原镇的静塞屯执行镇戍任务，被颜真卿追回一事。在平卢大军南下之前，平卢的先遣部队已经在山东半岛创立了根据地，为其迁徙提供了条件[241]。南迁固然是平卢军在当时局势下惟一的求生之途[242]，但环渤海地域内的交通便利和文化吸引，以及历来人口流动、民族交流的传统，当也是平卢军南徙淄青的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背景和原因。平卢军虽然南迁，但在同属环渤海地域一直比较熟悉且又有着民族、文化、交通、经济联系的淄青地区如鱼得水，很快就能建立牢固的统治，并取得较大的发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兵十万，雄据东方”[243]，最终达到扩张势力的目标，信非偶然。同时，以高句丽武人集团为首领的平卢军在淄青的统治，也进一步促进了环渤海地域各方的交流活动。

结　论

唐代的环渤海地域是一个多种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因素共存的地域。北部是东北少数民族散布的地区，中部的营、平两州（平卢镇的重要辖区）是汉民族和诸蕃族杂处共居地带，南部的淄青等州又是汉族居大多数、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然而这一地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联系又是非常密切的。汉族民众入诸蕃，新罗民众徙山东都反映了这一地域内的交流和交往之一端。平卢镇作为唐代开天年间东北地区的军政机构，它的设置是为了镇抚奚、契丹两蕃，防御突厥，其位置的变动、权力机构的变更深受奚、契丹等外蕃活动的巨大影响，它的南迁与东北蕃族及环渤海地域内部的民族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平卢镇所处的营州地域，自古就是东北少数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处，又是唐王朝的东北边州和边塞重镇。隋唐时代的塞外民族南下中原，是魏晋南北朝胡族入华的继续，在这一过程中，华夏诸族逐渐融合，成为一体。但这个过程决非一蹴而就。在唐代东北营州一隅，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但尚未结束，因而造就了既不同于唐朝统治中心地区又不同于塞外野蛮蒙昧地区的特殊的民族和文化特征。长期驻扎在这一地域的平卢军，其军队民族构成、士兵风气习惯、人员的活动变更无不受到营州地域民族活动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带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征，打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

平卢军主体力量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不脱离环渤海这一地域，它作为这一地域极具代表性的实体，既是唐王朝与东北诸族政治关系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环渤海地域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环境的集中体现。



附表一：隋唐东北民族羁縻府州一览表[24]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顺州（顺义郡，天宝元年改）	突厥别部	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隶顺州。后皆省。祐、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宾义	贞观，户一百八十一，口二百十九；大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	幽州—营州五柳戍—幽州
		贞观四年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	《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瑞州	突厥别部	本威州，贞观十年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咸亨中更名。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来远	贞观，户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营州—宋州—幽州良乡县之故广阳城
鲜州	奚	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宾从	天宝，户一百七，口三百六十七	营州—青州—幽州潞县之古潞城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崇州	奚	武德五年析饶乐都督府之可汗部落置。贞观三年更名北黎州。八年复故名。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昌黎	天宝，户二百，口七百十六	营州废阳师镇—淄州、青州—幽州潞县之古潞城
顺化州	奚	处奚族，治怀远。建中二年省。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新唐书》方镇表三	怀远		营州—幽州—营州
		开元二十九年，安禄山被授以顺化州刺史。	《事迹》卷上			
	奚、霫、室韦	贞观四年八月，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喻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	《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归义州（归德郡）	奚、契丹	总章中以新罗户置，后废。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205]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归义	开元二十年，五千帐（户）	幽州良乡县古广阳城—卢龙塞下
		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帐来降。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通鉴》卷二百十三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明年(开元二十年),信安王祎降其酋李诗锁高等部落五千帐,以其地为归义州,因以王诗,拜左羽林军大将军、本州都督,赐帛十万,置其部幽州之偏。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			
		王武俊,本出于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善骑射,与张孝忠齐名,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	《新唐书》卷二百十一,《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			
	契丹	隋开皇五年,契丹悉其众款塞,帝纳之,听居其故地。	《册府》卷九百七十七			
	契丹别部	(开皇六年),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	《册府》卷九百七十七			
	契丹别部	隋开皇十九年,契丹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帝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	《册府》卷九百七十七			
	契丹	贞观二年四月,契丹太贺摩其会率部来降。	《册府》卷九百七十七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辽州[266]、归诚州	契丹	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267]万荣，垂拱初授归诚州刺史。按：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反，州废，后未有重置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			
		松漠都督府及归诚州，太宗以内属契丹部落置。	《通鉴》卷二百五，胡注引《郡国志》			
玄州	契丹	贞观二十年以纥主曲据部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静蕃	天宝，户六百十八，口一千三百三十三	营州—徐、宋州—范阳之鲁泊村
		隋开皇初[268]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	《旧唐书》卷三十九			
威州	契丹	本辽州，武德二年以内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后侨治营州城中。贞观元年更名。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威化	贞观，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户六百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	燕支城—营州城中—幽州良乡之石窟堡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昌州	契丹	贞观二年以松漠部落置，侨治营州之静蕃戍。七年徙于三合镇，后治安次之故常道城。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龙山	贞观，户一百三十二，口四百八十七；天宝，户二百八十一，口一千八十八	营州静蕃戍—营州三合镇—青州—幽州安次县古常道城
师州	契丹、室韦	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侨治营州之废阳师镇，后侨治良乡之东间城。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阳师	贞观，户一百三十八，口五百六十八；天宝，户三百十四，口三千二百十五	营州废阳师镇—青州—幽州良乡县之故东间城
带州	契丹	贞观十年以乙失革部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孤竹	天宝，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	营州—青州—幽州昌平县之清水店
归顺州	契丹	本弹汗州，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别帅析纥便部置。开元四年更名[29]。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怀柔	天宝，户一千三十七，口四千四百六十九	
沃州	契丹	载初中析昌州置。万岁通天元年没于李尽忠，开元二年复置。后侨治蓟之南回城。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滨海	天宝，户一百五十九，口六百十九	营州—幽州蓟县回城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信州	契丹	万岁通天元年以乙失活部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黄龙	天宝，户四百十四，口一千六百	营州—青州—范阳县
青山州	契丹	景云元年析玄州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青山	天宝，户六百二十二，口三千二百十五	幽州范阳县界水门村
隋辽西郡，唐燕州	靺鞨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阅中国风俗，请披冠带，帝嘉之，赐绮而褒崇之。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	《隋书》卷八十一			
		突地稽者，靺鞨渠长也，隋大业中与兄瞒咄率其部内属于营州。瞒咄死，代总其众，拜辽西太守，封扶余侯。	《册府》卷九百七十			
		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	《新唐书》卷三十九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战，不胜。厥稽部渠长突地稽首者，率忽赐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			
燕州	粟末靺鞨	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	《旧唐书》卷三十九	辽西	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营州—幽州昌平城—幽州北桃谷山
		武德六年五月癸卯，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	《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建中二年，归德郡为朱滔所灭。废州，为幽都县。	《新唐书》卷三十九			
	霫	贞观五年，以霫酋多滥葛末为燕都督。则燕州应有不少霫人。	《册府》卷九百七十四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慎州	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武德初以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逢龙	天宝,户二百五十,口九百八十四	营州—淄州、青州—幽州良乡县之故都乡城
夷宾州	靺鞨愁思岭部落	乾符中以愁思岭部落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来苏	天宝,户一百三十,口六百四十八	营州—徐州—幽州良乡之古广阳城
黎州	粟末靺鞨乌素固部[29]	载初二年析慎州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新黎	天宝,户五百六十九,口一千九百九十一	营州—宋州—幽州良乡县之故都乡城
乌蒙州都督府	靺鞨	曾祖、祖、父均为乌蒙州都督。	《补遗》6/383,《李多祚墓志》			
儒州	乌罗护	开元二十一年,乌承恩为儒州刺史。	《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七,三千三百三十二			
澟州	粟特	天宝初置,侨治范阳境。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天宝,户六百四十八,口二千一百八十七	幽州范阳县界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粟特	公讳阿义屈达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为北蕃十二姓贵种。曾祖颉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驸马、都知兵马使。父颉利发，默啜可汗卫衙官、知部落都督。……国中大乱，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右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持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朔方节度使王斛斯具以上闻。……属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潜怀异图，庶为己用，密奏公充部落都督，仍为先锋使。	《颜鲁公集》卷六《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			
宁夷州	粟特、突厥	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与安禄山同乡里。 安禄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人。	《旧唐书》卷二百上			营州
礼州		君讳勖，字大廉。麟德元年释褐带方州录事，俄转进礼州司马。徒分韩俗，境接燕垂，盛简贤才，寄深戎旅。	《全唐文补遗》3/444《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君墓志》			营州[251]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归义州	新罗	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旧唐书》卷三十九	归义	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	良乡县之古广阳城
奉诚都督府，领弱水等五州	奚	本饶乐都督府，唐初置，后废。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奚可度者部落更置，并以别帅五部置弱水等五州。开元二十三年更名。弱水州以阿会部置。祁黎州以处和部置。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太鲁州以度稽部置。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松漠都督府，领峭落州等八州	契丹	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窟哥部置，其别帅七部分置峭落等八州。李尽忠叛后废，开元二年复置。领州八。峭落州以达稽部置。无逢州以独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问部置。白连州以突便部置。徒何州以芮奚部置。万丹州以坠斤部置。匹黎州以伏部置。赤山州以伏部分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契丹故地
		于营州置东夷校尉官。	《册府》卷九百七十七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开元四年，诏复置松漠府，仍其府置静析军，以失活为都督兼经略大使。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			
	契丹鲁苏部落	开元十四年，改封鲁苏为奉诚王，后为可突干胁附突厥，鲁苏走投榆关，移其部落于幽州界安置。	《唐会要》卷九十六			松漠故地—幽州
	契丹	会昌二年，回鹘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			
渤海都督府	靺鞨	应为忽汗州都督府。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安静都督府	靺鞨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勃利州	黑水靺鞨	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曰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黑水州都督府	黑水靺鞨	开元十四年置。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是岁(开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见;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通鉴》卷二百十三			
安东都护府下辖蕃州	高丽	高宗灭高丽,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止十四。新城州都督府、辽城州都督府、哥勿州都督府、卫乐州都督府、舍利州都督府、居素州都督府、越喜州都督府、去旦州都督府、建安州都督府;南苏州、盖牟州、代那州、仓岩州、磨米州、积利州、黎山州、延津州、木底州、安市州、诸北州、识利州、拂涅州、拜汉州[22]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熊津等五都督府,带方州等七州	百济	初,显庆五年平百济,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并置带方州[23],麟德后废。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唐在百济置五都督府七州二百五十县。	苏定方《记功碑》(岑仲勉《隋唐使》下)			

续表

州名	种族	置废过程	出处	治县	领户	迁徙变动
鸡林州都督府	新罗	龙朔三年，唐高宗诏以新罗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王为鸡林州都督。总领新罗自设的九州[254]。自后新罗王相继袭鸡林州都督。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			

附表二：平卢镇节度使（军使）年表（717—819）[255]

时间	节度使（军使）	籍贯	升迁过程（略）	出处
开元五年（717）	*宋庆礼	洺州永年	卫县尉——岭南采访使——贝州刺史、河北度支营田使——御史中丞、营州都督、平卢军使	《通鉴》卷二百十一，《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新唐书》卷一百三十
开元七年（719）	张敬忠	待考	监察御史——吏部郎中——平卢节度使	《新唐书》方镇表，《唐会要》卷七十八
开元八年（720）至九年（721）	许钦澹	安陆		《唐会要》卷七十八，《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元和姓纂》卷六
开元十年（722）至十七年（729）	臧怀亮	东莞莒	左威卫大将军、兼胜州都督、东受降城大使以及朔方军副大使——右武卫大将军——朔方军副大使——平卢节度副使——安东都护、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海运大使	《金薤琳琅》卷十，《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并序》，《颜鲁公集》卷五《东莞臧氏纠宗碑铭》

续表

时间	节度使（军使）	籍贯	升迁过程（略）	出处
开元十八年（730）至二十年（732）	薛楚玉	待考		《唐会要》、《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薛嵩传》
开元二十一年（733）	张守珪	陕州河北	平乐府果毅——幽州良社府果毅左金吾员外将军、建康军使——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瓜州都督——鄯州都督、陇右节度——幽州长史建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大使	《旧唐书》卷一百三《张守珪传》
开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七年（739）	*乌知义	乌洛侯	平卢先锋使——平卢节度副使——平卢节度、营州都督——平卢军使[256]	《旧唐书》卷一百三《张守珪传》,《曲江集》卷九,《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文苑英华》卷八百八十《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
开元二十八年（740）至二十九年（741）	王斛斯	待考	北州刺史[257]——平卢节度使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新唐书》卷六十六
开元二十九年（741）至天宝十四载（755）	安禄山	粟特	诸蕃互市牙郎——平卢捉生将——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平卢节度使——范阳、平卢节度使、河北采访使——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	《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事迹》卷上
天宝十四载（755）	吕知海	待考	平卢节度副使——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

续表

时间	节度使（军使）	籍贯	升迁过程（略）	出处
至德元载（756）	刘正臣	怀州武陟（幽州昌平）	平卢游奕使——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	同上
至德元载	徐归道	待考	待考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
至德二载（757）至乾元元年（758）	王玄志	待考	安东将——安东都护——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
乾元二年（759）至永泰元年（765）	侯希逸	高句丽	平卢裨将——平卢军使——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
宝应元年（762）	田神功	冀州南宫	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汴宋等八州节度使——淄青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四《田神功传》
永泰元年（765）至建中二年（781）	李正己	高句丽	平卢折冲将军——平卢军候——平卢兵马使——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传》
建中三年（783）至贞元八年（792）	李纳	高句丽	淄州刺史——平卢节度观察留后——青州刺史——署行军司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后——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纳传》

续表

时间	节度使（军使）	籍贯	升迁过程（略）	出处
贞元八年（792）至元和元年（806）	李师古	高句丽	青州刺史——金吾大将军同正、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师古传》
元和元年（806）至元和十四年（819）	李师道	高句丽	知密州事——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郓州事淄青节度留后——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师道传》

附表三：史料所见平卢将士表

人物	籍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处
张昪	清河	开元中	公讳昪，字仙客。……初守怀州武德尉，次授河清尉，又拜贝州司士参军。寻改瀛州平舒县令，兼平芦节度判官，转魏州顿丘县令。……以开元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归人于私第，春秋五十有八。	《补遗》1/200《唐故河南府新安县令张公墓志》
高钦德	高句丽	开元中	自宁远将军，制兼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才可为裨副冠首。公讳钦德，字应休，勃海人也。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父千，唐左玉钤卫中郎。……伊先君身死王事，鸿泽酬汲，解褐拜陶城府果毅。……以开元廿一年九月十有九日，终于柳城郡公舍，春秋五十有七。夫人太原王氏，河南程氏，继公逝亡。	《补遗》1/192《唐右武卫将军高府君墓志铭并序》
臧怀恪	东莞莒	开元初	开元初，尝游平卢，属奚、室韦大下，公挺身与战，所向披靡。由是发名。玄宗闻而嘉之，拜胜州都督府长史。	《金薤琳琅》卷十《唐故右武卫将军赠工部尚书上柱国上蔡县开国侯臧公神道碑铭并序》
臧怀亮	东海东莞	开元	开元中先后任左羽林军大将军平卢副持节、平卢军节度大使等官。	同上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公讳怀亮，字时明，东莞莒人也。年廿，应穿叶附枝举登科，……（六胡州叛），以功最，拜左羽林大将军。复以本官兼安东大都护、营府都督，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大使、支度营田海运大使。奚、霫诸蕃，西属匈奴，南寇幽蓟，公以武辟武，以夷攻夷。……以开元十七年八月廿二日，薨于京师平康坊私地，春秋六十有八。	《李北海集》卷五《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补遗》5/355《羽林大将军臧公墓志铭》
乌可利	乌洛侯	先天	幽州大都督孙佺及将李楷洛、乌可利、周以悌袭击奚、契丹。全军覆没。佺、以悌亡，楷洛、可利脱归。	《通鉴》卷二百十
乌知义	张掖乌洛侯	开元	二十六年邀叛奚于潢水之北，初胜后败。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为平卢军节度使或平卢军使。	《旧唐书》卷一百三，《曲江集》卷九，《唐方镇年表》卷八
乌承玼	张掖乌洛侯		辕门二龙：乌承玼、乌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沉勇而决，号为辕门二龙。	《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五
			乌承玼，字德润，张掖人。开元中，与族兄承恩皆为平卢先锋，沉勇而决，号“辕门二龙”。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开元十八年	可突于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玼破之于捺禄山。	《通鉴》卷二百十三
乌承洽[29]	乌洛侯	至德二载	节度使王玄志使（董）秦率兵三千自佣奴浮苇绝海，击贼将石帝廷、乌承洽。	《旧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
乌承恩	乌洛侯	开元、天宝	承恩，乌知义之子。承恩为平卢先锋，"辕门二龙"之一。	《旧唐书》卷二百上，《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
柏善珍	待考	开元	开元间曾为平卢军摄副使遂城县折冲。	《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七《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
王斛斯	待考	开元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二月，除王斛斯又加押两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遂为定额。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
*李永定（多在范阳）	契丹	开元、天宝	公讳永定，陇西人也。……世有参边之贵。曾祖延，皇朝本蕃大都督，兼赤山州刺史。祖大哥，云麾将军、左鹰扬大将军、兼玄州刺史……父仙礼，宁远将军、玄州昌利府折冲。公即宁远君之长子也。以开元五载，袭父宁远将军、右卫昌利府折冲。八载二月，令充两蕃使薛泰下总管。当时戎夷背叛，侵轶边垂。……	《补遗》5/390《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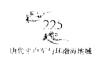
人物	籍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处
安禄山	粟特	开元、天宝	二十八年,为平卢兵马使。性巧黠,人多誉之。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玄宗益信响之。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以禄山摄中丞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宠之。	《旧唐书》卷二百上《安禄山传》
史思明	粟特	天宝	初事特进乌知义,每令骑觇贼,必生擒以归。又解六蕃语,与禄山同为互市郎。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奏为折冲。天宝初,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 十一载,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	《旧唐书》卷二百上、《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史思明传》
史定方	粟特	天宝十载	安禄山讨契丹,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三千赴之。	《事迹》卷上
士如珪	河内郡		……解褐授幽州临渠府别将,转拜潞州潞川府别将。……范阳郡节度使张守珪……别表授平卢军司马,赏绯鱼袋。……以天宝二年四月廿九日终于范阳郡蓟宁里,春秋五十有九。……夫人太原郭氏……遂终于平卢军公馆。	《汇编》天宝 047,1562 页《大唐故朝散郎试平卢军司马赏绯鱼袋士府君太原郭夫人墓志铭》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高　尚	幽州雍奴	天宝六载	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山卧内。禄山肥多睡，尚执笔在旁或通宵焉，由是浸亲厚之。遂与禄山解图谶，劝其反。 甄济，范阳郡节度掌书记。旧书卷一八七下	《旧唐书》卷二百上《高尚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高尚传》
李　休	密云	天宝	府君幼习群书，长精剑术，皇朝宁远将军守恒王府典军、赐金紫鱼袋、上柱国，充范阳节度使经略副使兼节度都虞候，转平卢节度副使兼都虞候。每有出师，皆知两节马步。……至天宝九载九月十一日遘疾，终于平卢官舍。……	《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六七《赠秘书少监赵郡李府君墓志铭并序》
田延恽	平州		魏博节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终安东都护府司马。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弘正传》
田守义	平州		田承嗣父，曾为安东副都护。	《文苑英华》卷九百十五《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
田承嗣	平州	开元末	开元末为军使、安禄山前锋兵马使，累俘斩奚、契丹功，补左清府道率，迁武卫将军。禄山构逆，承嗣与张忠志等为前锋，陷河洛。 《文》作“前平卢先锋使。”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传》，《文苑英华》卷九百十五《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	《通鉴》卷二百十六
杨文海	弘农华阴	天宝中	平卢衙前兵马使。为至特进，检校太子宾客，封弘农郡开国伯，世掌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	韩愈《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
贾　循	京兆华原		范阳节度使李适之荐为安东副大都护。安禄山兼平卢节度，表为副，迁博陵太守。禄山欲击奚、契丹，复奏循光禄卿自副，使知留后。九姓叛，禄山兼节度河东，而循亦兼雁门副之。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贾循传》
夫蒙灵詧	羌		天宝末为安东副都护。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刘全谅传》
刘客奴（刘正臣）	怀州武陟		客奴，由征行家于幽州之昌平。少有武艺，从平卢军。开元中，有室韦首领段普恪，恃骁勇，数苦边。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令抗普恪。客奴单骑袭之，斩首以献，自白身授左骁卫将军，充游奕使，……安禄山反，以吕知海为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十五载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摄御史大夫、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仍赐名正臣。	
徐归道	待考		安史之乱时曾被安史政权署为平卢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
张元涧	待考	至德元载	(至德)元载己卯,天子至于益州。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涧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	《续日本纪》卷二十一
王玄志	待考		刘正臣杀吕知诲,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天宝十五载,以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保定军及营田使。正臣仍领兵平卢来袭范阳,未至,为逆贼将史思明等大败之。正臣奔归,为王玄志所鸩而卒。逆贼署徐归道平卢节度,王玄志与平卢将侯希逸等又袭杀归道。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

续表

人物	籍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处
			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军人共推立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授节度使。	
杨涛	弘农		公讳涛，字执珪，弘农人也。少负节义，以身许国，杖剑游边，文武两兼，温恭自牧。日者爰命公为安东大都护府户曹参军兼平卢军司马。秩满，迁太子家令、充节度判官。属海内不龚，国步犹阻。丹旐未指途井邑，素灵权殡于营丘。时顺天三年岁次辛丑。	《汇编续集》顺天003，672页
王进义	待考	至德三载	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且通国故曰："天子归于西京，迎太上天皇于蜀，居于别宫。弥疑以弭字。灭贼徒。故遣下臣来告命矣。"渤海王为其事难信，且留进义，遣使详问。	《续日本纪》卷二十一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侯希逸	高句丽		侯希逸，平卢人也。少习武艺。天宝末，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希逸时为平卢裨将，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使以闻，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军人共推立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授节度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
王　缙	平州		太原王氏，世居祁县，后徙平州，至缙，从侯希逸南迁，遂居河内温县。子智兴，宣武节度使、守太傅、雁门郡王。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
王智兴	平　州，后徙怀州温县		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也。曾祖靖，左武卫将军。祖瓌，右金吾卫将军。父缙，太子詹事。智兴少骁锐，为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纳谋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归国。纳怒，以兵攻徐甚急。智兴健行，不四五日赍表京师求援。德宗发朔方军五千人随智兴赴之，淄青围解。自是，智兴常以徐军抗纳，累历滕、丰、沛、狄四镇将。自是二十余年为徐将。……太和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亳汴颍观察等使。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六《王智兴传》，《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

续表

人物	籍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处
董秦(李忠臣)	幽州蓟县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平卢人也,世家于幽州蓟县。自云曾祖文昱,棣州刺史;祖玄奖,安东都护府录事参军;父神峤,河内府折冲。忠臣少从军,在卒伍之中,材力冠异。事幽州节度薛楚玉、张守珪、安禄山等,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李忠臣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李忠臣传》
田神功	冀州南宫		天宝末,为县里胥,会河朔兵兴,从事幽、蓟。上元元年,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兼鸿胪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田神功传》
			天宝末,为县史。会天下兵兴,贼署为平卢兵马使,率众归朝,从李忠臣收沧、德,攻相州,拒杏园。……禽展送京师,迁淄青节度使。会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兖郓。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四《田神功传》
阳惠元	平州		以材力从军,隶平卢节度刘正臣。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略,称为名将。又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阳惠元传》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陈利贞	范阳	天宝	禄山之乱，自平卢越海归国，累建戎效，从太尉临淮王光弼军于河南，寇攻睢阳……	《文苑英华》卷九百五十三《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
			初为平卢将，安禄山乱，从光弼军河南。张巡被围睢阳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贞救之，轻骑出入，廷玉称为胜己，以子妻之。及归，荐于光弼，自行间累迁检校太子宾客，封静戎郡王。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附陈利贞传》
李惠登	平卢		少为平卢裨将。安禄山反，遂从兵马使董秦海转收沧、棣等州，轻师远斗，贼不能支。史思明反，复陷于贼，脱身投山南节度使来瑱，奏授试金吾卫将军。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镇随州。贞元初，举州归顺，授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李惠登传》
李希烈	辽西鞅鞨		父大定。希烈少从平卢军，后随李忠臣过海至河南。宝应初，忠臣为淮西节度，署希烈为偏裨，累授将军、试光禄卿、殿中监。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李希烈传》
			少籍平卢军，从李忠臣浮海战河北有劳。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中《李希烈传》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邢君牙	瀛州乐寿		少从军于幽蓟、平卢，以战功历果毅、折冲、郎将，充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反，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至青、徐间。田神功之讨刘展，君牙又从神功战伐有功，历将军、试光禄卿。神功既为兖郓节度使，令君牙领防秋兵入镇好畤。属吐蕃陵犯，代宗幸陕，君牙隶属禁军扈从。后又以战功加鸿胪卿，累封河间郡公。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邢君牙传》
周光济	平州卢龙		周宝，字上珪，平州卢龙人。曾祖待选，为鲁城令，安禄山反，率县人拒战，死之。祖光济，事平卢节度希逸为牙将，每战，得攻鲁城者，必手屠之。历左赞善大夫，从李洧以徐州归天子。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周宝传》
许杲	待考		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圆令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陈庄。贼陷舒州，圆又以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张万福传》



续表

人　物	籍　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　处
田悦继父	待考		悦,早孤,母更嫁平卢戍卒,悦随母转侧淄、青间。承嗣得魏,访获之,……承嗣爱其才,将死,顾诸子弱,乃命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帝因诏悦自中军兵马使、府左司马擢留后,俄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	《新唐书》卷二百十《田悦传》
高崇文	渤海		生幽州,朴厚寡言,少从平卢军。贞元中,随韩全义镇长武城,治军有声。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高崇文传》
			天宝末,胡夷之难,因投笔砚事平卢军偏裨。随镇淮右。	《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二《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
李正己(李怀玉)	高句丽	天宝—建中	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荐为折冲都尉。	《新唐书》卷二百十三《李正已传》
			本名怀玉,生于平卢。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会有敕遣使来存问,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遂杀之,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希逸母即怀玉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冲将军,骁健有勇力。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已传》

续表

人物	籍贯	活动时间	主要事迹	出处
李洧	高句丽		正己从父兄也。正己用为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纳犯宋州，洧以其州归顺，加御史大夫，封潮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充招谕使。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洧传》
李澮[29]	高句丽		徐州团练副使。	《新唐书》卷七十五下

附表四：安禄山麾下人物表[26]

人物	民族	出处
史思明	粟特	《旧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史定方	同上	《事迹》卷上
安守忠	同上	《事迹》卷下
安太清	同上	同上
安忠臣	同上	《事迹》卷上
安忠顺	同上	《通鉴》卷二百十八
安思义	同上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安雄俊	同上	同上
安神威	同上	同上
安武臣	同上	《通鉴》卷二百十九
何思德	同上	《事迹》卷上
何千年	同上	《事迹》卷中
石帝廷	同上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
康谦婿	同上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康没野波	同上	《旧唐书》卷二百
康　节	同上	《康公神道碑》
康阿义	同上	《康公神道碑》
曹闰国	同上	《曹闰国墓志》
李怀仙	同上	《通鉴》卷二百十七
安忠志	奚	《通鉴》卷二百十七
孙孝哲	契丹	《旧唐书》卷二百上
张孝忠	奚	《通鉴》卷二百十七
阿史那承庆	突厥	《旧唐书》卷二百上
阿史那从礼	同上	《通鉴》卷二百十七

续表

人　物	民　族	出　处
火拔归仁	突厥	《事迹》卷下
李猪儿	契丹	《事迹》卷下
尚可孤	鲜卑	《新唐书》卷一百十
乌承玼	乌洛侯	《通鉴》卷二百二十
乌承洽	同上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
李庭坚		《旧唐书》卷二百上
李立节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李钦湊		同上
张献诚		同上
吕知海		同上
谢元同		《通鉴》卷二百十七
段子光		同上
张通晤		同上
毕思琛		同上
张万顷		同上
贾　循		同上
杨朝宗		同上
刘道玄		同上
高　邈		同上
周　挚		《通鉴》卷二百二十一
袁知泰		《通鉴》卷二百十七
臧　均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续表

人　物	民　族	出　处
田承嗣		《旧唐书》卷二百上
高秀岩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
高　嵩		《通鉴》卷二百十八
高　尚		《事迹》卷上
严　庄		同上
独孤问俗		同上
平　冽		同上
张通儒		同上
李史鱼		同上
李庭望		同上
李归仁		同上
蔡希德		同上
牛廷玠		同上
向润客		同上
崔乾祐		同上
尹子奇		同上
武令珣		同上
能元皓		同上
田乾真		同上
达奚珣		《事迹》卷下
刘骆谷		《旧唐书》卷二百上

附表五：安史之乱中平卢镇士兵分流概览

分类	军队	跟随将领	简要事件及所领兵数	出处
从叛者	平卢军	史思明	思明将卒颇精锐，皆平卢战士。	《旧唐书》卷二百上
			禄山乃遣其党史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千攻常山，颜杲卿力屈而陷。	《事迹》卷中
从叛者	卢龙军	李怀仙	约一万人。	《通鉴》卷二百十七
	安东都护府[261]			
南下者	平卢军	侯希逸 李正己	上元二年，举其军二万余人，引兵而南。	《通鉴》卷二百二十二
南下者	平卢军	董秦	至德二载，节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苇绝海。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
南下者	平卢军	田神功	随董秦同时南下。	《通鉴》卷二百十九
南下者	平卢军	许杲	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淮南意。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
南下者	平卢军	颜真卿	禄山之发范阳也，时平原镇有静塞屯，平卢镇兵三千五百人并已发赴镇，在路未达，公（颜真卿）悉追回，更追诸县武举及猎射人兼招募精勇，旬日至万余人。	《颜鲁公集·行状》

附表六：安东都护府年表[262]

时　间	都　护	治　所	出　处
总章元年	高　藏	平　壤	《旧唐书》卷三十九
总章元年至三年	薛仁贵		《旧唐书》卷三十九《通鉴》卷二百一
约咸亨、上元间	高　侃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七十
上元三年		辽　东	《旧唐书》卷三十九
仪凤二年	高　藏	新　城	《旧唐书》卷三十九《通鉴》卷二百二
垂拱二年	高宝元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
嗣圣元年	薛　讷		《旧唐书》卷九十三
万岁通天元年	裴玄珪	平州[263]	《通鉴》卷二百五
圣历二年	高德武（都督）改为安东都督府		《旧唐书》卷三十九，一百九十九上
长安四年	唐休璟		《旧唐书》卷九十三
中宗神龙元年	复为安东都护府		《旧唐书》卷三十九
开元初	单思敬		《元和姓纂》卷四
开元二年	许钦凑	平　州	《会要》卷七十三
开元八年	薛　泰		《通鉴》卷二百十二
开元十三年	薛　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
开元十五年	李澐（遥领）		《旧唐书》卷八
约开元十五年	臧怀亮		《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
开元二十一年	裴　旻		《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七
天宝二年		辽西故郡城	《旧唐书》卷三十九
天宝十五载	夫蒙灵察（副都护）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
天宝末	王玄志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
至德中	废　置		《旧唐书》卷三十九

注释:

① (日)日野开三郎《安史の乱による唐の东北政策の后退と渤海の小高句丽国占领》,《史渊》91卷,1963年,2页。

②《魏书》卷九十七《冯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本文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2126页。

③《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八月条,2069页。

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八月条,2072页。

⑤《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条,2814页。

⑥《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纪》、卷三《太宗明元皇帝纪》、卷四上《高宗太武帝纪》: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32页);泰常三年(418)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58页);泰常三年五月,太宗明元帝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精骑二万袭冯跋,又命骁骑将军延普自幽州北趋辽西为声势,帝自突门岭待之。道生至龙城,徙其民万余家而还(59页);延和元年(432),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81页);延和三年六月甲辰,车驾还宫。辛亥,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司空、汝阴公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讨和龙。芟其禾稼,徙民而还。……秋七月,田于棝杨。己卯,丕等至于和龙,徙男女六千口而还(84、85页)。

⑦《魏书》卷一百六《地形志》上,2491页;《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遂城条,858页。

⑧《北史》卷九十四《奚传》,3126页。《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1881页;卷八十一《靺鞨传》,1822页。

⑨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太宗贞观三年十二月条,6069页,贞观四年八月条,6072页;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条,6253页;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四年七月条,6720页。

⑩ 如《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燕州条:"旧领县一,无实土户。"又:"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而这些州均有治所,可见,这些东北游牧民族各有自己的一片游牧区。

⑪《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5350页。

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条,6258页。

⑬《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2—1526页。

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5359页。

⑮ 见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所引文,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宋本,1980年,547页。

⑯《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高祖武德四年六月条,5920页。

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5350页,以及《靺鞨传》5359页。

⑱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5359 页。

⑲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 页。

⑳ 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㉑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 页。

㉒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第 2 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传统文化中心,1999 年,42—43 页。

㉓ 《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2631 页。

㉔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太祖武德四年六月条,5920 页。

㉕ 参见本书所收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㉖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宋庆礼传》,4814 页。

㉗ 《北京青年报》1998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㉘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1119 页。

㉙ 马驰《唐代蕃州的管理体制》,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1997 年,365 页。

㉚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胡人之迁徙及其聚落》,70 页。

㉛ 粟特人由柳城向范阳的迁徙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一团体行为,这在下文将有论述。

㉜ 颜真卿《颜鲁公集》卷六《特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赠开府仪同三司兼夏州都督康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㉝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68 页。

㉞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三《李怀仙传》,3895 页。

㉟ 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北京大学传统文化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764 页。

㊱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5351 页。

㊲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328—329 页。

㊳ 同上,332 页。

㊴ 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㊵ 见本书所收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

㊶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武德五年十二月条,5964 页。

㊷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5320 页。

㊸ 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韩国古代史资料集》引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 年,204 页。

㊹ 《旧唐书》卷九十三《王晙传》,2987—2988 页。

㊺ "城旁边夷"即指"营州城傍",见李

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262 页。

㊻ 辛岩《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 年第 2 期,385—386 页。

㊼ 彭定求、杨中讷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二百十四,中华书局,1960 年,2242 页。

㊽ 周祖譔主编《唐代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657 页。

㊾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 年第 8 期。

㊿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5358 页。

51 《北史》卷九十四《乌洛侯传》,3132 页。

52 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148 页。

53 (唐)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 年。

54 《唐会要》卷八十六《奴婢》,1571 页。

55 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州与中央关系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年第 1 期。

56 岑仲勉《〈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 年,563—588 页。

57 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18 页。

58 此处作"李万荣",实为李尽忠、孙万荣之误。

59 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府考——附唐初府州图》,《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155—192 页,115 页。

60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1127 页。

61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2—1525 页。

62 据《旧唐书·地理志》二,威州贞观元年隶幽州大都督(1522 页),与《新唐书·地理志》七的万岁通天年间不同(1128 页)。而《旧唐书》威州治所威化县:"后契丹陷营州乃南迁,寄治于良乡县石窟堡",又与《新唐书》同。故以《新唐书》为是。

63 此处非天宝所领数。归义州设后又废,开元年间领奚、契丹,此处所领户口数恐为总章中初设时之数目。

64 唐设归义州,总章年间处新罗,后废。开元中又处奚李诗部落等(《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1126 页)。故此表中出现了两个归义州。

65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十月条,6706 页;开元三年二月条,6709 页。

66 同上,开元二年正月条,6695 页。

67 同上,开元五年三月条,6727 页。

68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宋庆礼传》,4814 页。

69 下文师州、顺化州、宁夷州条参考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年,105—106 页。

⑩ 开元五年(717)营州复置,设平卢军,后升为平卢节度使,营州地域渐有平卢之号。

⑪《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6页。

⑫ 平卢节度使在这段时间内时而与范阳合为一镇,这在下文有所论述。

⑬《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1126页。

⑭《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归顺州条,1520页。

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正月、二月条,6797页;《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奚传》,6175页。

⑯ 开元二十年六月幽州长史赵含章因坐赃解职,薛楚玉继任幽州长史,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又继任幽州长史,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6798页以及《旧唐书》卷一百三《张守珪传》,3194页。战争发生在四月,可知是年为开元二十一年。

⑰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七三《唐故云麾将军左威卫将军兼青山州刺史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35页。

⑱ 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48—49页。

⑲《(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外臣部·朝贡》四,3850页。

⑳《新唐书》卷二百十九,6172页。

㉑ 归义州的奚人有未回故地者,如张孝忠家族,见《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张孝忠传》,3854页。

㉒《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六月条,6837—6838页。

㉓《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6842页。

㉔ 武德元年至七年为总管府,见《旧唐书》卷三十九,1520—1521页。

㉕《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5359页。

㉖《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一月条,6171页。

㉗《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七月条,6209页。

㉘《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一月条,6215页。

㉙《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四月条,6218页。

㉚《资治通鉴》卷二百唐高宗显庆三年六月条,6309页;卷二百二唐高宗调露元年十月条,6392页。

㉛ 陈子昂《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陈子昂著、徐鹏点校《陈子昂集》卷十《书启》,中华书局,1960年;又见同书同卷《为建安王与辽东书》,同书卷四《为建安王破贼表》。

㉜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12页。

㉝ 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68—270页;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97页。

㉞《旧唐书》卷九十八《裴耀卿传》,3080页。

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5349—5350页。

㊱ 朱雷《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兼论"勋告"制度渊源》,《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

版社，1982年；此据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241页。

⑰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1522、1523页。

⑱ 同上。

⑲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390页。

⑳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101页。

㉑ 《旧唐书》卷三十九，1526—1527页。

㉒ 徐察《唐右武卫将军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1辑，192页。

㉓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居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1527页）

㉔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贞元〇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899—1900页。

㉕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6页。

㉖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页。

㉗ 《唐代之蕃将与府兵》，276页。

㉘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玄宗天宝六载十二月条，6888—6889页。

㉙ 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269—270页；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45页。

㉚ 附表三所要展现的是平卢军的中层将士的民族状况，而附表二是平卢军节度使的任命情况，之所以有个别重复，是因开天后期方镇的节帅常拔自本军行伍。

⑪ 下面所列的蕃将世系参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以及个人墓志等。此处只想突出平卢地域的民族之众，蕃将之多，以及对边军乃至整个唐朝的影响，并没有作特别细节的考证。同辈人中也没有按照长幼次序排列。

⑫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百四十七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中华书局，1966年，3332页。儒州，《新唐书·地理志》七有此州名："儒州，本西盐州，贞观五年以拓拔部置，治故后魏洪和郡之蓝川县地，八年更名。开元中废，后为羁縻。"（1124页）此儒州属关内道，似与乌承恩所领之儒州无关。乌承恩为乌知义子，见《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5379页。但《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承恩为乌蒙之子，承玼（玭）之兄（3463—3464页），而据《新唐书·乌承玼传》，承恩乃承玼之族兄，《资治通鉴考异》考作族兄（《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唐肃宗至德元年七月条胡三省注引《考异》，6990页），此处从《通鉴考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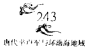
⑬ 乌可利见于《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唐玄宗先天元年六月条，6672页。

⑭ 《全唐文补遗》第6辑，100页。

⑮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3卷《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115页。

⑯ 以下本文除所引史料外，行文中皆作李正己。

⑰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



传》,3535 页。

⑱《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3457 页。

⑲《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3 页。

⑳ 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条,中华书局,1992 年。

㉑《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平卢节度使条及亲王遥领节度使条。

㉒《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刘全谅传》,4823 页。

㉓《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玄宗天宝十二载五月条,6918 页。

㉔《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4583 页。

㉕《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二,4310 页。

㉖《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久视元年六月条,6547 页。

㉗《新唐书》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五下柳城李氏条,3450 页。

㉘《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三月条,6817 页。

㉙《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十月条,7239 页。

㉚ 马驰《论侍唐蕃人之汉化》,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 7 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167—171 页。

㉛ 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289—295 页。

㉜《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5376 页。

㉝ 姚汝能著,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13 页。

㉞《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张万福传》,4075 页。

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8 页。

㊱《隋书》卷三十《地理志》,860 页。

㊲《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张秀墓志》,296 页。

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女传》,5145—5146 页。

㊴《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咸亨四年闰五月条,6371 页。

㊵《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5377 页。

㊶《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7250 页。

㊷ 彭定求、杨中讷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全二十五册)卷三五六,中华书局,1960 年,3998 页。

㊸ 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柳氏传》,中华书局,1961 年,3995—3996 页。

㊹《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史思明》,4064 页。

㊺《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李惠登传》,4828 页。

㊻《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正月条,6923 页。

㊼ 同上,6428 页。

㊽《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唐肃宗上元元年十二条,7102 页。

㊾《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上元二年正月条,7104 页。

㊿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大历〇六七《赠秘书少监赵郡李府君墓志铭并序》,1807 页。

(151)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八《平卢补表》表末吴氏附考;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卷二,37 页。

⑫ 张九龄《曲江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65 页

⑬ 同上,64 页。

⑭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营州上都督府"条,1521 页。

⑮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靺鞨传》,6178 页。

⑯ 见《(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五,4000 页。

⑰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191 页。

⑱ 《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表》三,1835 页。

⑲ 同上;又见《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4481 页。

⑳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卷二考开元二十六年,平卢已罢节度,37 页。

⑯ 《旧唐书》卷二百《安禄山传》,5367 页。

⑯ 同上,《史思明传》,5376 页。

⑯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条,7047 页。

⑯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乌承玼传》,4596—4597 页。

⑯ 日野开三郎在《安史の乱による唐の东北政策の后退と渤海の小高句丽国占领》一文中据《续日本纪》卷二十一考证得出中国旧史中杀刘正臣者误作王玄志,实为徐归道。

⑯ 以上诸条除至德元载、至德二载条出自《续日本纪》之外,其余分别出自《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6934、6960 页;卷二百十九,7017 页;卷二百二十,7052、7064 页;卷二百二十二,7118 页;卷二百二十三,7126、7175 页。

⑯ 姚汝能著,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下,31 页。

⑯ 同上:"(天宝十五载)五月,奚、契丹两蕃数出北山口至于范阳,俘劫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唯留后羸兵数千,不敌,(向)润客等计无所出,遂以乐人戴竿索者为矫捷可用,授兵出战。至城北清水河大败。"

⑯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四月条,6961 页。

⑰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六月条,6980 页。

⑰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一月条,7006 页。

⑰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二月条:"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句丽人李怀玉(即李正己)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7064 页)

⑰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洧传》,4779—4780 页。

⑰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7250 页。

⑰ 如侯希逸"素励将士,累破贼徒向润客、李怀仙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侯希逸传》,3534 页),直至南迁之前,侯希逸还"击史朝义范阳兵,破之"(《资治通

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条,7114页)。

⑯《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上元二年条,7118页。

⑰《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四《侯希逸传》,4703页。

⑱《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7250页。

⑲《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一唐玄宗开元二年正月条,6695页。

⑱同上,开元四年七月条,6720页。

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5351页;《(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五,3999页。

⑱王钟翰《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36—437页。

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46页。

⑱《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八年十一月条,6743页。

⑱《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1357页。

⑱《(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外臣部·征讨》五,3958页。

⑱《新唐书》卷八十六《方镇》三,1833页。

⑱《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六月条,6789页。

⑱同上,6790页。

⑲《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二月条,6797页。

⑲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论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48—51页。

⑲见《(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外臣部·朝贡》四,3848—3849页。

⑲陈述《契丹政治史论稿》,52—53页。

⑲《唐会要》卷七十八《节度使》,1430、1431页。

⑲如《曲江集》卷九《敕平卢使乌知义书》"委卿重镇,安辑两蕃"(65页);《敕平卢使乌知义书》"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67页);《唐会要》卷七十八《节度使》,开元二十八年"除王斛斯,又加押两蕃及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1430页);《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开元二十九年七月条"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214页)

⑲《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5939页。

⑲颜真卿《颜鲁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四《天下放生池碑》。

⑲《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李忠臣传》,3939页。

⑲(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外臣部·褒异》三,中华书局,1960年,11460页。

⑳《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条,7118页。

⑳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73页。

⑳《金史》卷六十七《回离保传赞》,1588页。

⑳《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平卢节度使条,1387页;《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条,6849页;《唐会

要》卷七十八，1430页；《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4481页等。

⑳④ 下面的马匹数目合为五千三百，非五千五百。

⑳⑤ 怀远军、保定军见于《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安东都护府条，1020页；保定军又见于《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中为范阳道所领（1328页），安东都护曾归属范阳管辖，所以保定军曾属范阳。保定军使，天宝末先后为安东副大都护马灵督、王玄志所领（《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全谅传》，3938、3939页），故列置于此。

⑳⑥ 安东都护府的驻地多次迁徙，见文后附表六。

⑳⑦ 韩愈著、屈守元、常思春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947页。

⑳⑧《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靺鞨传》，6178页。

⑳⑨《新定增补国史大系·续日本纪》卷二十一，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

㉑⓪ "静柝军"，《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中作"静析军"，5352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作"静拆军"（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五，11652页）、"静折军"（卷九百八十六《外臣部·征讨》五，11583页）；《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作"静折军"，6769页；《（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五作"静柝军"，3999页；《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作"静折军"，6769页，胡三省注云"（开元）四年，契丹来降，置静折军于松漠府，以其酋长为经略大使，言中国之兵不动而契丹自降，以静而折遐冲也。按，胡注谬也。应以"柝"字为是。"柝"，即"古代巡夜人敲以报更的木梆，引申凡巡夜所敲之器皆称柝"（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4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919页）。于是，"柝"又指军队巡夜报警之器，如李商隐《马嵬》二："空闻虎旅传宵柝"（彭定求、杨中讷等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全二十五册），中华书局，1960年卷五百三十九，6177页）。静柝，即静边，与奚饶乐府的"保塞军"实为同一义。

㉑① 138—139页。

㉑②《（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六《外臣部·征讨》五，3957页。《旧唐书·契丹传》和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主契丹静柝军为开元四年设置之说是不正确的。因为据《册府元龟》，开元四年封契丹李失活为松漠都督，并未有静柝军经略大使之号，开元六年始有之（11342页）。

㉑③《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外臣部·封册》二，11345页。

㉑④《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五《外臣部·封册》三，11354页。

㉑⑤ 如契丹可突于为"静柝军经略副大使"，见《（宋本）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二《外臣部·备御》五，3999页。

㉑⑥《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记开元十四年，1358页："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

㉑⑦《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肃宗至德元载四月条，6961页。

⑱ 例如,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侧重于战争形势,日野开三郎《安史の乱による唐の东北政策の后退と渤海の小高句丽国占领》则侧重于军粮供给方面。

⑲ 《魏书》卷九十五《徒何慕容廆传附子元真传》,2060页。

⑳ 《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晋安帝隆安四年二月条,3507页。

㉑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外臣部·褒异》一,11440页。

㉒ 《北朝胡姓考》外篇卷二《东夷诸姓》,272页。

㉓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高宗仪凤元年二月条,6379页:"其百姓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㉔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5328页。

㉕ 参见自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㉖ 《唐会要》卷八十六《奴婢》,1571页。

㉗ 杜牧《张保皋郑年传》,《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六,7844—7845页。

㉘ 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140页。

㉙ 金文经《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38页。

㉚ 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㉛ 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地理书》唐皇华四达记条,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325页。

㉜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九,岳麓书社,1994年,1011页。

㉝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1147页。

㉞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198页。

㉟ 前引王钟翰《中国民族史》,416—417页;以及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㊱ 陈尚胜《论唐朝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㊲ 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5360页。

㊳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互市》,11727页。

㊴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传》,3535页。

㊵ 上引陈尚胜文,165页。

㊶ 孙慧庆《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74页。

㊷ 同上,73—74页。

㊸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7250页。

㊹ 本表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以及各种石刻材料等,并参考章群《唐代蕃将研究》附表八《奚、契丹族安置地区表(附靺鞨、室韦)》所制作(176—185页)。内容雷同者,酌选其一入表。附表一至附表五中,《册府元龟》(全十二册)略作《册府》,《资治通鉴》略作《通鉴》,《全唐文补遗》略作《补遗》,《唐代墓志汇编》略作《汇

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略作《汇编续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略作《事迹》。

㉕ 此处应为奚。见《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奚传》,6175页;另《新唐书》卷二百十一《王武俊传》及《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武俊传》,开元中契丹怒皆部成员与奚李诗部落内附。《新唐书·地理志》误。

㉖ 辽州,武德年间为契丹设置,贞观元年改为威州。至贞观时太宗伐高句丽,得辽东城,又有辽东之名,但此时辽州的地理位置、所居民族都大不相同。

㉗ 《新唐书》作"敖曹孙"。

㉘ 《新唐书》作"贞观二十年"。按: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贞观时营州都督府还未领玄州,杨家骆《辽史世表长笺》(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考作"贞观二十二年"。

㉙ 《旧唐书》作"开元四年置",开元四年欲重建营州,抚纳契丹、奚部落,故此处并非更名,而是以原部落重新设置。

㉚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作"浮榆靺鞨乌素固部"。按:靺鞨七部无浮榆部,黎州既是析慎州置,所领靺鞨理应与慎州同。

㉛ 由"徒分韩俗,境接燕垂"的地理位置推测,礼州应隶于营州都督府下。

㉜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考订还有石城、北扶余城州、国内州(170—171页)。其中辽城州即辽州,盖牟州即盖州,仓岩州即岩州,此三州贞观十九年太宗伐辽时初设,二十年辽州都督及岩州废,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四月条(6221页)、卷一百九十八六月条(6223页)以及同书同卷贞观二十年三月条(6326页)。

㉝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考订还有支浔州、鲁山州、古四州、沙泮州、分嵯州(171—174页)。

㉞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考订为尚州、良州、康州、汉州、朔州、滇州、熊州、全州、武州(174—176页)。

㉟ 带"*"号者为军使。此表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增补而成。

㊱ 平卢节度使在开元年间时独立为一镇,时在幽州节度使之下。故乌知义为平卢节度使,后又为军使。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八后考异。

㊲ 岑仲勉考作营州,见《唐方镇年表》卷八开元二十九年条,1286页。

㊳ 司马光《考异》以为韩愈《河阳军节度使乌公先庙碑》中所记乌承洽与《新唐书》所记乌承玼事迹相同,当为一人(《资治通鉴》开元十八年六月条胡三省注引《考异》,6790页。李昉等《文苑英华》(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卷八百八十碑文亦作"承洽")。而据林宝著、岑仲勉点校《元和姓纂》(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卷三,乌承玼乃为乌洽(即乌承洽)从父弟(298页)。又,两《唐书》李忠臣传均载有李忠臣击乌承洽之事(《旧唐书》3940页,《新唐书》6387页)。"洽"、"玼"字音、字形差别明显,韩碑或新书当均非误字致混,且林宝著、岑仲勉点校《元和姓纂》(全三册),又将两名并列,似确别有乌承洽其人。或韩愈将承玼误为承洽?亦或承洽乃承玼之又名,诸书失载,而林宝著、岑仲勉

点校《元和姓纂》(全三册),又误为两人?证据不足,尚难确论。若果有承洽其人,作为承玼从兄,极有可能亦出生于平卢军,故此处仍将之列于表中,以备参考。

[259]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洧传》作"李淡",4780页。

[260] 此表部分内容参考了荣新江在《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一文中对安禄山部下粟特将领的研究。

[261] 安东都护府之兵卒似乎并未全部南下。天宝十五载,平卢将刘客奴、董秦,与安东将王玄志杀安伪节度使吕知诲,后刘正臣(客奴)与王玄志先后任平卢节度使,平卢军南迁的兵数为两万余人,远高于平卢军的总兵数,可见平卢军与安东都护府的军队应合并。然而,安东王氏(阿布思之族)世隶安东都护府,观其后代(王廷凑)的活动范围在河朔之成德,同样,田延恽(安东都护府司马)之子田弘正等也在成德镇,田守义(原为安东副都护)之子田承嗣在魏博镇,可见安东都护府的军队并未在宝应年间随着平卢军尽数南迁。

[262] 此表参考了郁贤皓《唐刺史考》卷一百二十二《安东都护府》,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647—1650页。

[263] 《唐会要》卷七十三安东都护府条:"开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改平州为安东都护府,以许钦凑为之。"《旧唐书》卷三十九安东都护府条下,移至平州的时间亦为开元二年。《通鉴胡注》卷二百五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条疑此时安东都护府治已徙平州。

靺鞨族属及渤海建国前的靺鞨与周边关系

范恩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一、靺鞨族属的考察

（一）从靺鞨族称的历史发展看靺鞨族属

靺鞨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根据汉文史书的记载，它是由我国远古民族肃慎发展而来的。此民族在先秦称肃慎，汉至三国两晋时期称挹娄，北魏时称勿吉，至隋唐名为靺鞨。揆诸历史，这一族系名称的历史演变过程是这样的：

其一，由肃慎到挹娄。肃慎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远古民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他的存在最早可以推定到商周时期，如《逸周书·王会篇》、《左传》等书就记录了肃慎的事迹。其最早的活动区域应当在今内蒙古赤峰地区古燕国的北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山戎、东胡的夹击以及燕的向北拓展，被迫离开故土而向东北方向迁移，到达今吉长地区。到了两汉时期，由于秽貊人的兴起和扩张、建国，肃慎再次北迁，到达今牡丹江流域及其以北直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①。秦汉时期，由于受秽貊人的阻隔，加之始终未能建立统一的部落组织，其与中原的联系中断了。

挹娄一名始见于三国时期鱼豢的《魏略》，原文为："挹娄，一名肃慎氏"②。以后《三国志·东夷传》、《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录了挹娄民族。此三者基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同时，史书



中又有了肃慎前来朝贡的记载，如魏明帝青龙四年(236)、魏陈留王景元三年(262)等，说明此时中原已经与肃慎重新取得了联系。但是挹娄之称只见于上述三传中，而所记朝贡者则专称肃慎，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可以从历史记载中作出推断。《三国志》卷三十《东夷挹娄传》"(挹娄)自汉以来，臣属夫余"，可见，从汉初夫余兴起以来，被称作肃慎之国的挹娄即附属于夫余而不能自立；同时，同书同传又载："(挹娄)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则此时之挹娄当未形成统一的部落组织。这样一个民族肯定无法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其后，"以黄初中叛之(夫余)，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③。黄初是魏文帝年号，时为220—226年，这一时期挹娄以族叛夫余，应该是基本形成了统一的部落组织，而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遂使之自立，于是到魏明帝青龙四年(236)，肃慎来贡。由此可断，肃慎一名是长期以来该族的自称，来朝贡时必依此名；而此前依与中原交往密切的夫余人的转译，则称之为挹娄。以后随着挹娄的独立及夫余的灭亡，挹娄一称也即湮没无闻了。

同时，挹娄这一名称决不是肃慎族的自称还可以由以下史实推知：首先，在史书上，挹娄名称所指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即专指附属于夫余的一个肃慎族群；广义是代称所有肃慎部族。狭义的挹娄族的活动范围不会很大，尽管《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东夷传》等书都称其"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但这一记载本身存在很多疑点。第一，从地理位置而言，上述两书皆称"(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夫余东北千余里(当今七百余里)，当位于今牡丹江流域。同时，《三国志·东夷传》又称"其(挹娄)人众虽少，所在山险……"，足见其土境并不广阔，自牡丹江以东，称山险者无外乎牡丹江上游滚兔岭地区，而决不会"东滨大海"。揆诸考古，滚兔岭文化应该就是挹娄人的遗迹，其年代碳-14测定为距今2140±7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75±85年④。第二，挹娄应在北沃沮之南而非其北。《三国志·东夷传》、《后汉书·东夷列传》皆称"挹娄南与北沃沮接"，但《后汉书·东夷列传》又称："东沃沮(即南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长白山)之东，……其地形东北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挹

娄、夫余，南与秽貊接”；“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界南接挹娄”。综合之，则挹娄应该位于南北沃沮之间，若言在北沃沮之北，则去今长白山北两千里与前言之牡丹江流域不符。同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确实仍存在着挹娄以外的称作肃慎的部族。《三国志·东夷传》载：正始（240－248）中，毌丘俭伐高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宫奔北沃沮”；同书卷二十八《毌丘俭传》“六年（245），复征之，宫遂奔买沟（即北沃沮），俭遣玄菟太守王欣追之，过沃沮（南沃沮）千里，至肃慎氏南界……”。前已述及，南（东）、北沃沮之间距离为八百里，则过南沃沮千里应在北沃沮之北，由此可断，北沃沮之北仍有肃慎人部落。而《三国志·东夷传》等书的记载则是混杂了所有的肃慎人部落，统一概称为挹娄的结果。最后，在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中以及《好太王碑》碑文中都只记录了肃慎（或息慎），并无挹娄一名[5]，亦可佐证肃慎为该民族的自称，挹娄为来自夫余的他称。

其二，勿吉名称的由来。前述的挹娄部于黄初（220－226）中脱离夫余而独立，并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以后即不断有其赴中原朝贡的记录，这些记录中一直以肃慎称之。到了北魏延兴五年（475），开始有了“勿吉朝献”的记录[6]，此后一直到东魏末，中原史书都只记录了勿吉而不再使用肃慎一名。同时，《魏书》卷一百《勿吉传》明确指出：“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即勿吉为肃慎的后裔。有关肃慎族名的这一变化，有许多学者作出过讨论，但主要是试图通过肃慎——挹娄——勿吉的音变来加以解释[7]；也有的学者称勿吉是与肃慎、挹娄并列的部落集团[8]。但这些论点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音转说有些牵强，而并列三部说又与史书记载太不相容。愚意以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名称的变化，肯定与北魏的建立有关，正是北魏人将肃慎改称勿吉。但为什么北魏时期要将原来的肃慎人改称作勿吉人呢？这还是要从整个历史发展中去寻求解答。回溯历史，尽管从魏明帝青龙四年（236）一直到北魏以前，史书记载的都是

肃慎来贡，但这期间实际上已经有了变化。《晋书》卷三《武帝纪》“（晋武帝）咸宁五年（279），肃慎（挹娄）献于洛阳”。第二年，肃慎（即前文所称挹娄）部落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古史《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纪五》作了记载：“（中川王）十一年（280）冬十月，肃慎来侵，……王于是遣达贾往伐之。……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家于夫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这条史料说明刚刚脱离夫余建立起部落联盟组织的肃慎部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重归解体了。此后汉文史书记录的肃慎朝贡，应该是那些附于高句丽的肃慎余部所为，较明显的如《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的记载，“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乌孤并献名马于勒。……（勒）因飨句丽、宇文乌孤使”。楛矢是肃慎人的标志性特产，此由高句丽与肃慎共献，而石勒所款待者只有高句丽使，可见肃慎使实际上未至中原，而是由其宗主国高句丽代其入贡的。综观这一时期的肃慎入贡的记录，包括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后赵石勒建平元年（330）、后赵石虎建武六年（340）、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9]，除前述之献于石勒以外，尚有太兴二年、大明三年是明记与高丽同来的。

到了北魏初期，前来朝献的被称作勿吉的肃慎人又与附于高句丽者不同。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的差异。《魏书》卷一百《勿吉传》“勿吉……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名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又同书同传载其使乙力支自述朝贡路线，“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路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有关这段记载，研究者较多，较早且较为可信的研究来自白鸟库吉，其在《东胡民族考》[10]一文中，推定和龙即今朝阳，如洛瓌水即今西剌木伦河，太鲁水（太沵河）即今洮儿河，速末水即今松花江，那河即今黑龙江。当然，其有关那河的推断是有偏差的，按池内宏《勿吉考》推断，古那河实际应指东流松花江及其并入后之黑龙江下游一段[11]。由此可见，这一支所谓勿吉人当在今松花江中下游及其并入后的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和今人的研究成

果，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就是以后所谓的靺鞨黑水部。中原人最初称其为“勿吉”，并进而对其后前来朝贡的与之言语、习俗接近的肃慎系各部族一律称之为“勿吉”。

有关勿吉一名的来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目前较为学界接受的是勿吉＝森林说，即认为勿吉同于满语“窝集”，为森林之意[12]。但仔细推敲，此一说法有很多疑点。尽管满族是勿吉人的后裔，但今天的满语与一千多年前的勿吉语必不尽同。那么，勿吉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张博泉主编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勿吉是北朝时鲜卑人对其称呼，并通过其语传到中原。勿读如‘没’，靺从末声，渤是其转音。鲜卑语称为没、没里，后来东胡系族，水言木、沐或沐涟、木伦。史载勿吉‘居山水’，故其部皆以山水名之。吉、羯、鞨为一音之转，即j，g互转字，转读如k，h。其意疑即‘人’。例如东胡的‘胡’，在蒙古、达斡尔语中是‘人’的意思。史书林胡亦称‘林人’。……发音为j的字可与真互转，如赫金、赫斤、赫锦，亦作赫真、赫哲。鲜卑语真即‘人’。勿吉、靺鞨系指在水边居住的人，即‘江人’、‘江民’。……到元犹称水韃韃，明称江夷”[13]。按乙力支来朝献时自称国有大水曰“速末水”，按照中原称呼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命其名为“江人”、“江民”是有可能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引白鸟库吉的观点：“在哥尔都与鄂尔察言语中，呼黑龙江为‘Mangu’江，而勿吉‘Mat-kat’、靺鞨‘Mat-hat’实此Mangu之译音，此民族为江畔之住民，故因江而得名（大学讲义摘要）”[14]。此说与前述张说相仿。综合以上论述，可以断定“勿吉”是鲜卑人对最早来朝贡的居住于“速末水”边的肃慎人部落的称呼，实际就是黑水部，并进而被用来概称所有肃慎人。

其三，勿吉到靺鞨的演变。从史书记载上看，北魏时期的中原人并不完全了解当时肃慎系民族的整体情况，因此其所记勿吉的内容更多的只是黑水部的情况，如言“其旁有大莫卢国、覆钟国、莫多回国、库娄国……”[15]。而到了唐初修《北史》、《隋书》时，对勿吉各部的分布情况则

已非常清楚，这是与北魏以后各代相继经营东北边疆，肃慎系各部纷纷前来朝贡分不开的。根据《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的记载，当时肃慎系民族有三种名称，即“勿吉国……，一曰靺鞨。……即古肃慎氏也”。“勿吉”是北魏政权赋予肃慎系民族的名称，而肃慎则是该民族由来已久的自称，包括其后出现的女真、珠申都是肃慎的同音异写。只有“靺鞨”是新出现的名称。既然“勿吉”、“一曰靺鞨”，则当时此两称为并列使用。从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来看，除非有周边其他民族传入新的名称，如靺鞨以后经契丹改称女真（直），是很少主动将一个民族以两种称谓加以记载的。更何况勿吉、靺鞨两者字形上相去甚远，繁简程度迥异。因此，靺鞨名称的出现应该是由周边某一民族带入中原的。

揆诸史籍，有关靺鞨的记载，始见于《三国史记》，即百济温祚王三年（前16）九月“靺鞨侵北境”[16]。其后多见于该书有关百济、新罗的记载中。这支靺鞨部落就是勿吉（靺鞨）白山部[17]。而在高句丽人的记载中，却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了肃慎这一名称[18]。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在399年白山部臣服高句丽以后[19]。当高句丽征服了他们以后，也就接受了百济、新罗人赋予他们的称呼，称其为“靺鞨”。因此，在其后的高句丽记载中便以靺鞨代替了肃慎。

将靺鞨名称传入中原的，正是白山靺鞨人。从历史上看，最初勿吉人的朝贡是比较有规律的，从延兴五年（475）开始，包括太和二年（478）、太和十年（486）、太和十二年（488）、太和十七年（493）、景明四年（503）。其间隔一般在两年以上，这是与黑水部“其国悬隔”的地理位置相符合的。同时，这些朝贡的时间大多在八月，规律性很强，更可以看作是同一部族所为。从正始四年（507）以后，有关勿吉的记载几乎年年皆有，时间也变得随意起来，说明肃慎系诸部开始相继与中原发生接触。就如同《北史·勿吉传》所记，“隋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所谓相率，就是指诸部相率而来。但最初所来诸部中，必不含白山部。因为周边民族入中原朝贡，悦中国风俗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周边关系中寻求大国的支持。如黑水部是因为要进攻高句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20]；粟

末部则是因为“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21]。与它们不同，白山部是附属于高句丽的，在对外方面缺乏自主权，也不存在寻求中原王朝支持的可能。其是否入贡中原是以高句丽与中原关系的变化为转移的。

从历史上看，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并不好。北魏强大以后，灭亡了北燕，并进一步向东逼近高句丽，迫使长寿王从公元42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遣使向北魏纳贡通好。但这种通好很明显是迫于无奈。太和十五年(491)，(高句丽王)琏死，孙云立，孝文帝“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帝)严责之”[22]，足见双方互不信任。但到了北魏末期，随着北魏国力的衰落，高句丽的地位开始上升。神龟元年(519)，高句丽王云死，“魏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23]。特别是到了东、西魏分立时期，高句丽开始加强与东魏、北齐的联系，“讫于武定已来，其贡使无岁不至”[24]。如此频繁地进入中原，决不是真的臣服，因为古代相对强大的周边民族政权入中原朝贡本身亦含有贸易、入窥中原虚实等多种目的。何况高句丽此时是东魏(北齐)、南梁并朝，亦曾有使至北周。实际上，此时高句丽执行的是一条积极的对外路线，意图利用中原的混乱局面有所作为，扩张自己的势力[25]。也只有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臣附部落靺鞨白山部一同入中原朝贡，感沐华风。

在史籍记载中，“靺鞨”入贡中原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北齐书》。其卷七《武成帝纪》：“河清二年(563)，是岁，室韦、库莫奚、靺羯(鞨)、契丹并遣使朝贡。”有的学者根据史籍的版本校刊，认为《北齐书》卷七、卷八系后来学者据《北史》所补，而《北史》的相关内容则是来自《隋书》，《隋书》的记载则又是取材于隋末的《北蕃风俗记》。因此，“靺鞨”一名的最初出现应在隋末，即《北蕃风俗记》的记载[26]。但该文的论述缺乏直接的证据，未能解释《北齐书》勿吉、靺鞨并见这一现象。而且《北齐书》中关于靺羯(鞨)的记载不只卷七、卷八，还包括卷四十一《高保宁传》。而卷七、卷八这两条记载均是朝贡记录，恐怕不是《北蕃风俗记》的内容。又卷七与卷

八在用字上也有不同，一为靺羯，一为靺鞨，明显不是同一来源。卷四十一《高保宁传》也是靺羯，而开元二年唐鸿胪卿、宣劳靺鞨使崔忻在旅顺黄金山麓留下的《井栏题名》亦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可见靺鞨最早是写作“靺羯”的，因此《北齐书》中所留下的有关靺羯的记载应该是该书的原有内容。而卷八出现关于靺鞨的记载，则可能是后人的补文。

关于“靺羯(鞨)”一词的含义，史书中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古代诸学者的相关记载中亦可窥其一斑。兹抄录相关记载如下：《唐宝记》：“靺鞨国产宝石，大如栗，中国谓之靺鞨。”《旧唐书》卷十《肃宗纪》：“红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樱桃。”明地志《辽东志》“生女直”条：“江口有石，名木化石，坚利，可锉矢镞，土人宝之。”《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女直土产石砮”条：“黑龙江口出，名水花石，坚利入铁，可锉矢镞，土人将取之，必先祈神。”吴振臣《宁古塔纪略》：“混同江，江中出石砮，相传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纹理，如木质，绀碧色[27]，坚过于铁。土人用以砺刃，名为昂威赫，即古肃慎氏所贡楛矢石砮是也。”[28]由上可见，“靺鞨”一词是指一种来自靺鞨族的宝石。亦即肃慎系民族之石砮。

关于“靺羯(鞨)”一词的读音，则要从最初的靺羯入手。案靺不见于《说文解字》，今则有 mo、wa 两音。而其中出现较早的读音为[wa]，如《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登殿不著靺。”靺通袜，音[wa]。另据王力先生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歌、麻同属一部[a]，到了隋唐时代，分化为歌、麻两部……唐代诗人用麻韵，不杂歌、戈韵字”[29]。又，“中古的 a 类包括开口歌韵……歌韵只有舌齿音的字变为 uo，其余都发展为[ə]了”[30]。因此，在南北朝末期以后靺改读作[wə]。至于靺字由[wə]读作[mə]，则是中原地区语音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即在中古音中，w、m 两个声母不作明确区分，多读作 m，如庑，中古音莫杜反。这种现象至今仍存在于粤语中。羯字，据《说文解字》：“从羊，曷声。”其下“居谒切”是徐铉据《唐韵》所加注文，并不反映其原始读音。而在古代译经过程中则多用羯字音译 ka，如羯磨(karma)，羯那陀(kanada)，羯陵伽(kalinga)。至于羯读 jie 指羯族则相对晚出。因此在靺羯一词中羯更应读 ka。又据劳乃

宣《等韵一得》声母分类表，k、h均是舌根音，只是一稍重，一稍轻，前者"如杖筑地"，后者"如杖曳地"[31]，在中古是可以通读的。由此，根据其后改用鞨字的读音，加之[a]与[ə]的通转，则羯字应读作he。即靺羯与昂威赫（an—vehe）同音。而vehe在现代满语中是"石头"之意。同时据金光平先生的研究，在女真语中石头为ve x e，音[wəhə][32]，与今满语同。由此可见，百济、新罗人最初称肃慎人为靺羯（wehe），是取材于其使用石镞这一民族特征。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入贡中原的所谓石镞已演变为一种红色的宝石，因此中原人也把这种宝石称作靺羯。到隋唐以后，声母之学正式产生，羯字的读音固定为"居谒切"，于是另造一"鞨"字代替he音字，靺羯一词在书写上就逐渐转变为靺鞨了。

综上所述，"靺羯（鞨）"一称是新罗、百济人对进入半岛地区的使用楛矢石砮的肃慎人的称呼。以后，这批肃慎人归附于高句丽，即中原史书所载之白山部，而其名称也即为高句丽所接受。到北齐时，随着高句丽与中原关系的加强，白山部入贡中原，其名称也开始为中原人所了解。而正因为高句丽在中原政权与东北地区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使得靺羯（鞨）这一名称逐渐代替勿吉，成为肃慎系民族的统称。

（二）从考古发现分析靺鞨族属

拙撰《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一文，已论述靺鞨先民肃慎从辽西地区向吉长地区的迁徙，并探讨两地考古文化上的联系。当肃慎人在吉长地区时，其北部的夫余人文化正在发展成熟，从考古学上讲，嫩江流域的白金堡文化就是早期夫余文化，根据碳-14的测定，其一号房址的年代为距今2790±65年，相当于西周中期。以后其文化范围不断扩大，"其三角形篦齿纹陶器一直可以分布到松花江中游（如肇源望海屯）"[33]，往东可以到张广才岭西坡。随着夫余人的南下东来，肃慎人再次向东北方向迁徙，如榆树老河深遗址，下层是西团山文化，中层就是夫余文化。肃慎

人迁徙到张广才岭以东以后，即与当地原始居民融合，在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基础上，也结合了当地的文化特征。其中最为中原文化熟知的是挹娄部。作者《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中已论及滚兔岭文化是挹娄文化，而滚兔岭文化与西团山文化除了时间上有先后性以外，在许多器物特征上也具有很大的继承性。如滚兔岭文化的陶器，可分为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黄褐陶两类，陶色多不纯正，常夹杂有红、黑斑驳，这与西团山晚期的陶器特征是基本一致的。此外，两种文化在居址的建造上也是一致的，都是半地穴式的居址，建屋于稍隆的岗地，基础以长方形为主，垣壁拍平，用火烧法烘干，房屋以木架顶，地面经过夯实[34]。同时，据贾伟明、魏国忠《论挹娄的考古学文化》[35]一文，"滚兔岭文化的陶器在器物类别上与蜿蜒河文化(黑龙江中下游)是相近的，即都有瓮、罐、碗、钵，而且同类器物的形态，或相近或相同"。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在张广才岭以东以北地区形成了肃慎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的新的文化类型——靺鞨文化[36]。

有的学者曾主张靺鞨文化是在今天的黑龙江、牡丹江流域逐渐发展起来的，从而否定肃慎文化迁入说，如戚玉箴、孙进已《肃慎和挹娄的考古文化》[37]一文，就认为莺哥岭文化是肃慎文化，以后的靺鞨文化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该文并不能解释莺哥岭文化上下两层发生很大变化这一事实，只是说"是否另有一种可能即原来居住在此一地区的古亚细亚族的氏族迁走了，又迁来了通古斯的肃慎部落，即莺哥岭下层是古亚细亚族的遗存，上层才是古肃慎族的遗存。此事尚未宜论定"。但是，如果比对莺哥岭下层文化、上层文化以及西团山文化，就可以发现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不同[38]。

因此，尽管仍不能完全判断莺哥岭文化的族属问题，但其上、下两层的差异是明显的，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上层文化与西团山文化间的联系也是有据可查的。同时，属于靺鞨文化发展系列的东康文化也并不是直接在莺哥岭上层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前者年代约为距今 1695 ± 85 年，比莺哥岭上层文化约晚一千年，其间插入了秽貊系的沃沮文化。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只是因为族源的近同所造成的。因此，

考古器物	莺哥岭下层	莺哥岭上层	西团山
陶器基本特征	夹砂红褐陶，带“人”字、“之”字纹	夹砂黑褐陶为主，红褐陶占一定比例，素面居多	早期陶器夹砂，多灰黑色；晚期以红、黄褐色陶居多
陶轮	无	有	有
陶猪	无	有	有
石镞	无	有	有
渔具	无	有	有
居址	半地穴式	半地穴式，四壁砌筑石墙	半地穴式，以四壁砌筑石墙者为主

莺哥岭上层文化更可能是肃慎系的西团山文化向东发展的结果。

到汉代夫余族南迁以后，“嫩江中下游被属于东胡系统的乌洛侯人所占领，呼兰河以东、松花江中游被勿吉—靺鞨人所占据”[39]。根据乔梁先生的研究[40]，在南北朝以后，随着勿吉—靺鞨人的南下、西迁，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大量靺鞨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如黄家崴子、乃伊费尔德、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杨屯、吉林永吉查里巴、榆树老河深上层等的器物（如鼓腹罐、筒形罐）、葬俗（如土圹墓、二次葬、火葬习俗）等基本文化特征是相似的[41]。南北朝以后的靺鞨诸部就分布在这一地区。

二、渤海建国前靺鞨与周边关系初探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三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

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不过三千”。另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记载，靺鞨“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可知靺鞨民族包括数十个部落，彼此不相统属，但主要是前面提及之七部。靺鞨诸部“在东夷为强国”[42]，在当时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其“酋各自治”，所以其各部的对外政策并不一致，进而使他们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下面就分别加以探讨。

（一）粟末靺鞨与周边关系

粟末部位于北流松花江流域，约当今安图、敦化、蛟河、桦甸、吉林等市县境内。按前文所述，勿吉一靺鞨族的先民挹娄人的居地本在今牡丹江流域及其以东、以北地区。因此，这支粟末部应为后来迁入者。实际上，在粟末靺鞨人入居以前，此地应为夫余、高句丽相互争夺的地区。公元280年，高句丽“迁（肃慎）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43]。夫余南乌川的具体位置史无确载，但夫余东南与高句丽相接的地区当在今辉发河流域。辉发河，满语为“辉发毕拉”，“辉发”汉译“淡青色的水”之意，“毕拉”汉译“河”之意，即指江水呈青黑色的江（河）[44]。因此，将乌川定在辉发河流域是基本可信的（乌川即黑水河）。则此六百余家应即为粟末靺鞨之先民。以后，随着周边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鲜卑人对高句丽的几次打击，粟末靺鞨得以脱离高句丽的统治而独立，并不断发展壮大，到南北朝时期，粟末部已发展到“胜兵数千”。其为摆脱高句丽人的威胁，沿辉发河向北进入松花江流域，并不断排挤共处于这一地区的夫余人。《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传》载：“正始（504—508）中，宣武于东堂引见其（高句丽）使芮悉弗，进曰：‘……黄金出夫余，……今夫余为勿吉所逐……”按夫余在晋太康六年（285）为慕容廆所破，子弟走保沃沮，以后复国。又据高句丽《好太王碑》，高句丽于410年（好太王二十年）发兵攻夫余，拔六十四城，一千四百余村，夫余完全为高句丽所控制。因此，部分夫余人生活在今朝鲜咸镜道以西到松花江流域地区（原沃沮人地区）是可信的。而这一地区在410年后即为高句丽控制。另据《吉林夹皮沟

金矿地质与成矿预测》一书认定，今吉林东部地区的古金矿惟有今桦甸市夹皮沟地区，并且“据有关史料，本区唐、宋时期已经开始采金(时间再向前移应该是可能的)”㊺。因此，所谓为勿吉所占之地就是今天松花江流域的桦甸市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地区周边的勿吉人惟有粟末部、白山部，而白山部久臣于高句丽，故所谓逐夫余人的勿吉人是粟末部无疑。

其部与周边民族关系并不友善。除前文提及之“逐夫余”外，又与高句丽之间存在世仇，故不断相互攻略，“每寇高丽”㊻。同时，又与契丹每相劫掠㊼。其与中原亦有往来，史书载有其到中原朝贡的记录，如《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载：“后因其使来，文帝诫之，使勿相攻击(指与契丹)”。以后，隋炀帝伐高句丽，其“渠帅度地稽帅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㊽㊾。唐高祖并为其置燕州于辽西，并以度地稽为燕州总管。但度地稽所帅之众并非粟末部之全部，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载：“帝(太宗)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此言北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决非黑水部或黑水部的北部，亦非前述度地稽部。因此，此所谓“北部”应为尚居于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部人。而前者降隋之众当对称为粟末部之南部。按粟末部的文化遗存，考古界有分歧意见，但一般认为杨屯三期文化应属粟末靺鞨文化，其时间大约起于公元六世纪初，止于公元七世纪。恰恰说明六世纪末部分粟末部人内附后，尚有部分人留在原地，直到七世纪初唐伐高丽时，这部分人与高句丽结盟㊿。随着高句丽的败亡，这些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亦被唐朝内迁至营州地区(今辽宁朝阳，也即前述之柳城附近)。

(二)黑水靺鞨与周边关系

黑水靺鞨部依东流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两岸而居。前文已述及北魏延兴五年(473)，勿吉使者乙力支来贡事。按勿吉诸部“不相总一”，则乙力支必非代表整个勿吉部，而是代表其一支。又据文献所记其往返路



程(详见前)，则应该为黑水部。因此可以认定黑水部于延兴五年(473)起与中原取得联系，并进而展开交流。又其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51]。可知黑水部与高句丽不睦，彼此攻伐。而走室韦、契丹路入中原，或即与契丹及其同类室韦关系密切之故。史书中有黑水部与契丹言语相通的记载，按两者一为东胡族系，一为通古斯族系，所以言语相类大概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同时，这一时期契丹与高句丽也处于敌对状态。《北史》卷九十四《契丹传》载:“太和三年(479)，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旧怨其侵轶……”足见双方积怨已久，也就更加说明黑水部之南下为何要走契丹路。此外，这一时期黑水部走契丹路入贡中原也是可能的。按《魏书》卷一百《契丹传》载契丹本与中原相攻掠，北魏“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献文帝，466—471)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众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即到467年前后，契丹北部的民族经契丹与中原王朝北魏通好已很频繁，因而与室韦、契丹言语相通的黑水部在这个时候走契丹路南下是有充足条件的。到六世纪中叶，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厥、高句丽两雄并起，契丹先败于突厥，既而役属于高句丽。黑水部南下的通路被封闭了，终因“其国悬隔”而与中原逐渐疏远了。

至于其与高句丽的关系，亦应为一种对立状态，但因两者中间隔着号室部、粟末部，所以直接的对抗并不多。《魏书》卷一百《勿吉传》载北魏延兴五年(375)乙力支所称“下高句丽十余落”，应该是指黑水部东南的原北沃沮人居住区。按“高句丽五部外沃沮与被征服部族，公元三世纪后也被同化于高句丽族，(但)多数仍居故地”[52]。因此勿吉人可能将这些沃沮地区概称为高句丽。若再与其同书同传后文“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综合分析，则前取十余落大约是进至海边，打通了从水道与百济共取高句丽的通路。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地区也应该是今绥芬河地区也即北沃沮人地区。实际上342年高句丽为慕容皝所破后，一度放弃了

向大陆的发展，而转向南与百济进行争夺，因而有可能失去了原沃沮人的地区。这一地区即转而落入勿吉黑水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黑水部的南下与百济人的北向争夺亦可能形成联盟，但黑水部明显不够积极，从相关历史记载看，375年前后百济与高句丽确有过激烈交锋，但未见黑水部参与的记录。由上可见，黑水部与高句丽之间虽不曾有友好的往来，但真正的冲突必也不多。

除以上两部外，其余主要的靺鞨部落白山（约当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地区）[53]、伯咄（约当今夫余、榆树市至双城县一带）、安居骨（约当今五常、阿城至哈尔滨市一带）、号室（约当今乌苏里江中游地区）、拂涅（约当今牡丹江下游两岸一带）等部：伯咄、安居骨大约与高句丽关系较近，特别是粟末部北部叛附高句丽以后，因此，"王师取平壤，汩（伯）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无闻焉"[54]。但根据文献记载，到开元时还有关于骨（汩）咄、拂涅朝贡的记载，或者他们的残余势力一直存在，直到渤海兴起，并入渤海。号室部不见于两《唐书》，且375年黑水部已能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高句丽，足见其势力已达到乌苏里江中游及兴凯湖地区，号室部应该已并入黑水部[55]。

注释：

① 详见拙文《肃慎起源及迁移地域略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魏略辑本》卷二十一《挹娄》。

③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挹娄传》。

④ 详参谭英杰等著《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7—59页。

⑤ 《三国史记》只有一处提及挹娄，但显然是抄汉文史书的结果。

⑥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九《外臣部·朝贡二》。

⑦ 如张博泉《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一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⑧ 如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⑨ 详见《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九《外臣部·朝贡二》。

⑩ 收入《塞外民族史研究》上，（日）岩波书店，1986年。

⑪ 收入《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一册，吉



川弘文馆，1933年。

⑫ 如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⑬《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72页。

⑭ 津田左右吉著，陈清泉译《渤海史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⑮《魏书》卷一百《勿吉传》。

⑯《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始祖温祚王》。

⑰ 详见拙文《白山靺鞨史考》，已收入本书。

⑱ 参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

⑲ 关于白山部臣服于高句丽的时间，详见拙文《白山靺鞨史考》。

⑳《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㉑ 同上。

㉒《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传》。

㉓ 同上。

㉔ 同上。

㉕ 详参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收入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㉖ 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㉗ 绀：深青带红的颜色。祢衡《鹦鹉赋》："绀趾丹嘴"。

㉘ 原文收入李兴盛、吕观仁主编《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49页。

㉙《王力文集》卷十，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61页。

㉚《王力文集》卷九，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189页。

㉛ 转引自吴宗济《补听缺斋语音杂记》，《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

㉜ 详见金光平《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

㉝ 张泰湘《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探》，《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㉞ 参照前引谭英杰《黑龙江区域考古学》；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等书。

㉟《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㊱ 当然，这些文化的主人最初并未被统一称作靺鞨，他们的名称包括挹娄、勿吉和靺鞨。

㊲《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5期。

㊳ 参照上引戚玉箴文、《榆树老河深》、刘景文《西团山文化经济形态初探》（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等。

㊴ 同上引张泰湘《嫩江流域原始文化初探》。

㊵ 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㊶ 关于从考古学上论证肃慎、靺鞨系民族发展史的问题将另著文作深入探讨。

㊷ 见《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靺鞨》。

㊸《三国史记·高句丽纪五》。

㊹ 参见杨锡春著《东北地名语源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11页。

㊺ 参沈保丰等著《吉林夹皮沟金矿地质与成矿预测》，地质出版社，1998年，2页。

㊻《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㊼ 有关与契丹相互劫掠者是粟末部的考证，详参前引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一文。

㊽《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靺鞨》。

㊾ 按史书中虽未明言度地稽之众系粟

末靺鞨，但据地理位置及与高句丽关系考察，其众必系粟末靺鞨无疑。

㊿ 关于粟末靺鞨北部集团与高句丽结盟的考证，详见本书所收拙文《渤海国的建立及其与周边政治关系》。

51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52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64页。

53 关于白山靺鞨与周边关系问题，详见拙文《白山靺鞨史考》。

54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

55 限于文献的缺乏，对这些靺鞨部落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白山靺鞨史考

范恩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在中国史籍中，白山靺鞨始见于《北史·勿吉传》，其文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①。《旧唐书》则进一步指出："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②根据这些记载，白山靺鞨作为靺鞨诸部中的重要成员，拥有精兵三千，实力非同一般；同时又与高句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然是当时东北亚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白山靺鞨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国内学者一般都主张白山靺鞨与靺鞨诸部一样，都是肃慎系民族的后裔，如《中国东北史》第二卷即这样认为③。关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中国东北史》认为在今延吉、图们市一带④；《东北历史地理》一书与之略同，认为"应在今敦化至延吉一带"⑤。而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津田左右吉认为白山靺鞨是涉人的后裔，生活在今天朝鲜的江原道附近⑥；而日野开三郎则认为白山靺鞨是沃沮人的后裔，其生活地域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向北到今天中国的敦化地区⑦。

由于有关白山靺鞨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因此前辈学者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长期未能消除的。而基于白山靺鞨的重要地位，不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就很难正确理解六至八世纪的东北亚政治关系。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供学者共同探讨。

一、白山靺鞨部的形成

白山靺鞨部的活动区域，据《北史·勿吉传》记载，"白山部，在粟末东南"；《隋书》与此同[8]。而粟末部的活动范围，一般学者都认为在今北流松花江两岸地区[9]。同时《新唐书》又称"粟末部，……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10]，案太白山或徒太山即今长白山，则粟末部的活动范围就应该从北流松花江两岸向南到达长白山西侧。这样位于粟末部东南的白山靺鞨部就应该在长白山另一侧的今朝鲜境内。同时，靺鞨诸部"所居多依山水"[11]，故因之得名，因此白山部的主要活动范围应该离长白山不远，即大体相当于今天朝鲜咸镜南北道地区。此外，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唐军伐高句丽，在进攻高句丽安市城的时候，高句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学界的观点普遍认为高惠真就是白山靺鞨人[12]，而其受封南部傉萨，足见白山部活动区域不会在高句丽东北部的今吉林延边地区，而应该在高句丽的南部地区即今朝鲜的咸镜南北道地区。从考古发现看，今吉林延边地区有着非常密集的高句丽古城址，如和龙县高句丽杨木顶子山城、和龙县高句丽八家子山城、和龙县高句丽松月山山城、和龙县崇善乡古城里村高句丽古城、延吉市兴安镇高句丽兴安古城、龙井市开山屯镇船口村高句丽山城址等二十余处城址[13]。并且在军事防御为主的山城的基础上，增加了修筑在平原地区的作为经济、文化用途的城镇。与此不同，白山靺鞨部尽管降附于高句丽，但他们仍然以一个独立部族的姿态进入中原史书，并且是"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14]，即不筑城郭的。这恰恰与咸镜南道北部和咸镜北道几乎没有发现重要的高句丽古城城址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这一方面说明高句丽势力没有真正大规模进入该地区(这也是与历史上高句丽的南北政策

相一致的，详见后文）；另一方面说明这一地区是由附属于高句丽的白山靺鞨部控制的。

历史上，这一地区曾是秽貊系民族的活动范围。《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秽貊接"；又称："秽北与高句丽、沃沮，南与辰韩接"。案盖马大山即长白山，所以在东汉或此前时期，秽貊系的东沃沮人就生活在今朝鲜境内的咸镜南北道地区。但其势力并不强大，"户五千，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15]。实际上是处于氏族社会或部落制社会的初期阶段。随后，又因"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16]。在这样情况下，沃沮人只是生活在这一地区，但并不能完全把它当作国土那样去控制。根据史书记载，沃沮人主要是"背山向海"而居，即生活在咸镜南北道靠近大海的平原地区，因此才能盛产"貊布、鱼、盐、海中食物"[17]，而更广阔的山区则不被沃沮人所重视。恰恰在这一时期，另外一支力量开始向这一地区迁徙，即肃慎人。肃慎民族是在其周边外族的压迫下离开传统居住区向东北方向迁徙的，他们的目的地主要在今吉林的西团山地区，但其向东已经到了今吉林的延边地区[18]。而从当时的地理条件角度考虑，长白山并不能构成天然的地域分水岭，肃慎人很早就曾在山上行走，如《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载："国南有从（徒）太山（长白山）者，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以物盛去"。因此肃慎人的一部得以越过长白山，进一步向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前进，也就进入了原住居民力量薄弱的沃沮地区，特别是今天咸镜南北道的山区。他们就成为了白山靺鞨人的最早的先民。根据考古发现，在今朝鲜咸镜北道存在着与吉林西团山文化非常相似的文化遗存。例如在朝鲜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遗址第一期层中发现的房址（依山坡所建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屋内经火烧而光滑平整，房址内有用鹅卵石围成的灶）是与西团山文化中的房址基本一致的[19]。

关于最早一批肃慎人进入沃沮地区的问题，中原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韩国古史《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可以得出一些线索。《三国史

记》中有关靺鞨[20]的最早记录是百济温祚王三年(前16)九月"靺鞨侵北境"[21]。随后双方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从相关记载可以推断,这里提到的靺鞨人绝不是秽貊系的沃沮人,而恰恰属于肃慎系民族。首先,这些早期的冲突[22]并不带有侵占土地的目的,特别是靺鞨一方,胜则掳掠,败则遁去,完全是一支游牧部族的作风。特别是温祚王二十二年的一次冲突更能说明这一点:"秋八月,……王帅骑兵一千猎斧岘东,遇靺鞨贼,一战破之,虏获生口,分赐将士"[23]。此处的"猎"应该是百济王与臣下行围狩猎,因此才可能巧"遇"靺鞨。而双方之所以巧遇,还在于这批靺鞨人属于一支游牧部落,这恰恰与靺鞨人的"夏则出随水草"[24]相一致,同时也是与沃沮人"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25]截然不同的。其次,沃沮人曾一度臣服于高句丽,如果是沃沮人与百济发生如此多次的冲突,高句丽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第三,在有关肖古王四十九年百济与靺鞨冲突的记载中,明确记录了"冬十月,靺鞨以劲骑来侵"[26],而沃沮人"便持矛步战"[27],肃慎系的靺鞨人则"其国无牛,有马"[28],并多次以"劲骑"作战,《满洲源流考》一书即指出沃沮人精于步战,靺鞨人精于骑射这一区别。

在靺鞨人进入沃沮地区一段时间以后,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沃沮的宗主国高句丽遭到中原王朝的毁灭性打击,沃沮也卷入其中。由于高句丽在东北地区的扩张行动,使它不可避免地与中原王朝发生了直接冲突,三国时期的魏国为了稳固北方的局势,在公元246年派将军"毋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29]。这场冲突使刚刚建立起雏形的沃沮政权土崩瓦解,也使沃沮人的居住区内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一形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晋太康元年(285)被鲜卑慕容廆击败的夫余残部即退保沃沮地区,并于太康七年(286),在晋军的支持下"还复旧国"。如此来去自由,正说明当地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这时另外一支肃慎后裔——挹娄人联合一度臣服于高句丽的梁貊部一同进攻高句丽,结果却遭到了高句丽的毁灭性打击,部落被离散[30]。一批挹



娄人即进入沃沮地区，与原来生活于当地的肃慎系部落逐渐融合，形成了新的更加强大的肃慎即靺鞨部族——白山部。

高句丽自遭受曹魏沉重打击以后，集中全力医治战争创伤，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发展，又渐渐强大起来，继续以武力争夺辽东及乐浪地区。而高句丽势力虽随周边势力的变化而几经消长，但到370年苻坚灭前燕后，客观形势还是朝着非常有利于高句丽的方向发展了，高句丽对周边的扩张重新开始了。其锋芒所向，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旧日的附属地——沃沮地区。两《唐书》都记录了白山部臣服于高句丽的事实，但有关白山部臣服于高句丽的时间却语焉不详。综合诸史所记，作如下推论：白山部臣服于高句丽是在前燕灭亡以后，亦即370年以后，同时应不早于377年。370年以前，高句丽虽几次试图扩张势力，但一方面屡遭中原王朝打击，地域时大时小，不可能长期控制一个异族直到唐初；另一方面，早期高句丽扩张的主要方向在于向东北内陆拓展，对半岛方向采取守势，因此也不大可能太多地关注白山部。只是在312年美川王占领乐浪郡以后，高句丽才开始关注半岛方向的发展，前燕的灭亡，使高句丽的北方进一步巩固，大规模的南向扩张开始了。但直到377年，白山靺鞨并没有臣服于高句丽，这一点可以从371年、377年百济两次派三万大军进攻高句丽的战争中看出来。因为在这两次战争中，并没有白山靺鞨人参加，特别是371年的冲突，高句丽故国原王战死疆场，如果白山靺鞨是其属部，是绝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考古发现的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为这一时间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碑文称"（好太王）八年（399）戊戌，教遣偏师观息慎土谷，因便抄得莫斯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31]。此所谓"息慎"即肃慎，也就是隋唐时期所称之靺鞨；"观息慎土谷"也就是指好太王耀兵于靺鞨族活动区；而最终"朝贡论事者"就应该指这一地区的靺鞨族。关于这一地区的位置，史学界有不同的主张，王钟翰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史》认为此处息慎即指挹娄，因此这一地区应在长白山北[32]；而津田左右吉先生所著《好太王征服地域考》一文则主张"息慎土谷"当在今朝鲜江原道附近[33]。实际上，根据此时高句丽的势力发展方

向，这一地区在今朝鲜境内应该是可信的；同时，399年还是好太王对外扩张的初期，能够在这个时候遣一支“偏师”令一个部族投诚，这个部族肯定不会处在临近强敌的地区，而恰恰应该在自己的后方，也就是今朝鲜咸镜道地区。综合以上论述，白山靺鞨部是在399年臣服于高句丽的。

二、臣服于高句丽时期白山靺鞨与周边关系

由于臣服于高句丽的现实情况，白山部与中原的交往一定是借助于高句丽的，并且与高句丽同中原关系的好坏有很大关系。根据汉文史书留下的朝贡记录[34]，东魏时期勿吉六次朝贡，均是与高句丽并来（包括前后相跟而来）。而在东魏以前，勿吉与高句丽并来朝贡的记录只有北魏神龟元年（519）一次，也即东魏以前勿吉的最后一次朝贡。揆诸历史，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并不好。北魏强大以后，灭亡了北燕，并进一步向东逼近高句丽，迫使长寿王从公元42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遣使向北魏纳贡通好，但这种通好很明显是迫于无奈。太和十五年（491）（高句丽王）琏死，孙云立，孝文帝“诏云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礼，云上书辞疾，遣其从叔升于随使诣阙。（帝）严责之”[35]，足见双方互不信任。且高句丽一直是南北朝并贡的。但到了北魏末期，随着北魏国力的衰落，高句丽的地位开始上升，神龟元年（519）高句丽王云死，“魏灵太后为举哀于东堂”[36]。特别是到了东、西魏分立时期，高句丽开始加强与东魏、北齐的联系，“讫于武定已来，其贡使无岁不至”[37]，如此频繁地进入中原，决不是真的臣服。因为古代的周边民族入中原朝贡本身亦含有贸易、入窥中原虚实等多种目的，何况高句丽此时是东魏（北齐）、南梁并朝，亦曾有使至北周。实际上，此时高句丽执行的是一条积极的对外路线，意图利用中原的混乱局面有所作为，扩展自己的势力[38]。也只有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臣附部落勿吉（靺鞨）白山部一同入中原朝贡，感沐华风。同时，这一时期



也正是粟末、黑水等部因周边局势的变化与中原失去联系的时期[39]，因此这时入贡中原的勿吉人必定是白山部。573年为白山部朝贡北齐的最后记录，此时，恰为高保宁据营州的时间。"高保宁，……武平（570—576）末为营州刺史，……夷夏重其威信"[40]。高保宁与高句丽关系密切，而北齐却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高句丽没有再遣使至北齐，相应之白山部亦不再遣使，但他们与高保宁的联系则一直较多[41]。此后虽有高句丽朝隋的记载，但高句丽与靺鞨并贡方物却直到开皇三年（583）才开始，"五月，高丽、靺鞨并贡方物"[42]。而此次朝贡或许应被看作承认隋霸主地位的象征，因为这一年的"夏四月……庚辰，行军总管阴寿破高保宁于黄龙"[43]，以强大的武力击溃了高句丽的盟友，并同时打击了高句丽的军事力量。一个月以后，高句丽即率白山部一同朝贡中原。以后，随着隋与高句丽关系的恶化，特别是在598年高句丽与白山部出兵万余侵辽西以后[44]，白山部与隋中断了交往。

白山部与新罗、百济之间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以399年归附高句丽作为分水岭，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是单独与新罗、百济为敌，不断侵扰，根据《三国史记》记载，曾先后十七次与百济发生冲突，时间分别为：BC16年（温祚王三年）；BC11年（温祚王八年）；BC9年（温祚王十年）；BC8年（温祚王十一年）；BC1年（温祚王十八年）；AD4年（温祚王二十二年）；AD22年（温祚王四十年）；AD30年（多娄王三年）；AD31年（多娄王四年）；AD34年（多娄王七年）；AD55年（多娄王二十八年）；AD108年（己娄王三十二年）；AD210年（肖古王四十五年）；AD214年（肖古王四十九年）；AD216年（仇首王三年）；AD220年（仇首王七年）；AD229年（仇首王十六年）。也曾与新罗发生四次冲突，时间分别为：AD125年（祇摩王十四年）；AD137年（逸圣王四年）；AD139年（逸圣王六年）；AD203年（奈解王八年）。这些冲突的主要特征是靺鞨人的不断侵扰和百济、新罗两国的不断反击，但始终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对三方的历史发展也未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自从白山靺鞨部臣服于高句丽以后，靺鞨与百济、新罗的关系就成

为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之间关系的附属品。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白山靺鞨在臣服于高句丽前最后入侵百济是在387年（百济辰斯王三年）和391年（百济辰斯王七年），此后直到五世纪下半叶没有再次发生冲突的记录。而这恰恰与高句丽与百济关系发展过程相一致：高句丽广开土王继位以后，将国家发展策略改为向南，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百济发生冲突，在广开土王二年（392）、三年（393）、四年（394）连续与百济交战，到广开土王六年（396），高句丽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攻取百济五十八城，并攻陷百济王都，百济阿莘王出降，从此百济附属于高句丽。这样，百济与399年归附高句丽的白山靺鞨就有了保持较长时期和平的基础。到了五世纪七十年代，随着高句丽势力的衰落，高句丽与百济间的和平关系开始动摇，当勿吉人（应为黑水靺鞨人）南下“先破高句丽十落”的时候，即有“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45]的打算。475年，高句丽长寿王更重兵进犯百济，攻下百济王都汉城，杀百济王扶余庆，迫使百济南迁，将高句丽势力发展到汉江流域。顺应这种形势，白山靺鞨部也开始了新的对百济的战争，即482年（百济东城王四年）进攻百济汉山城；503年（百济武宁王三年），进攻马首栅、高木城；506年（百济武宁王六年）进攻高木城；507年（百济武宁王七年），进攻横岳；548年（百济圣王二十六年）进攻汉北独山城。其中最后两次更是与高句丽共同行动。

同样，白山靺鞨与新罗的和战也是同高句丽与新罗的和战相一致的：白山部臣服于高句丽以前最后一次进攻新罗是在395年（新罗奈勿王四十年），随后臣服于高句丽。而此时高句丽与新罗的关系却比较好，高句丽故国壤王时期（384—391）就遣使与新罗修好，新罗王并遣侄实圣为质于高句丽，400年当倭人进攻新罗的时候，高句丽广开土王即遣步骑五万驰救新罗，击退倭人，帮助新罗收复失地。这种友好关系长期维持，到高句丽长寿王十二年（423）春，新罗尚“遣使修聘，王慰劳之特厚”[46]。因此白山靺鞨部也与新罗保持了相应的长期和平。但是到了长寿王三十八



年(449),“新罗入袭杀边将,王怒将举兵讨之,罗王遣使谢罪乃止”[47],双方关系已开始紧张。到长寿王四十二年(453),高句丽终于与新罗正式开战了。白山靺鞨也随之卷入冲突,先后五次进攻新罗,即:468年(新罗慈悲王十一年),进攻新罗北境悉直原;480年(新罗炤知王二年),进攻新罗北境;481年(新罗炤知王三年),进攻新罗北境狐鸣城、弥秩夫;501年(新罗照知王二年),进攻新罗北境;502年(新罗照知王三年),进攻新罗述川城、北汉山城。其中四次是与高句丽共同行动的。

白山靺鞨在高句丽的对外扩张过程中,始终是一个配角,但在高句丽的整体对外政策中,特别是在南向牵制百济、新罗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句丽控制了白山部以后,并没有完全进入其活动区域。根据考古发现,高句丽在白山靺鞨地区即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地区的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咸镜南道的北青郡,包括北青郡青海高句丽古城址、北青郡坪里高句丽居山山城址、北青郡高句丽龙田里山城址、北青郡南大川左岸高句丽安谷山城址等[48]。从这些城址看,高句丽在这一地区筑城主要是沿着南大川河及其附近山地分布,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为了防御南方的百济、新罗,明确自此一线以北是高句丽的领土。根据文献记载,争夺辽东是高句丽诸王的既定方针。因此,尽管不断遭到沉重打击,几度濒临绝地,仍然执著不舍。故国壤王时,刚刚从前燕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的高句丽即“出兵四万伐辽东,……虏男女一万口而还”[49];其后的广开土王也于“九年春正月,自将兵三万袭之(燕)”[50]。相反,在对南方的百济、新罗时,除几次决定性的大战役以外,行动规模皆不大,而且采取战和并用的手段,实际上更多的是想获得一个北进过程中的稳固后方。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两国拥有长期的威慑力量,这一点又是忙于北方行动的高句丽所力不从心的。因此,白山靺鞨就成为高句丽南方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几次小规模的对南用兵都是由靺鞨人在高句丽的指挥下独立完成的,如482年、503年、506年对百济的战争,480年对新罗的行动都是这样。甚至一些所谓的靺鞨与高句丽的共同行动,实际上也是靺鞨部独立完成的,如《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王》所载:“十一年春,高

句丽与靺鞨袭北边悉直城”，实际上，根据《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长寿王》的记载，这次行动是“王以靺鞨兵一万，攻取新罗悉直州城”，完全是靺鞨人在高句丽的指挥下独立完成的。

与南方政策不同，高句丽在与东北亚内陆各势力的争夺中，很少使用靺鞨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巩固后方同样重要，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山靺鞨势力还处于相对的弱势。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对白山靺鞨的长期不甚了解。只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白山靺鞨部势力的不断增强，才逐步参与到高句丽的中原行动中来，如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高句丽王元(婴阳王)“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51]。特别是到了唐朝时，高句丽即将在中原王朝强大力量的打击下走向覆亡，被迫动用其全部力量进行抵抗，白山靺鞨部才全面加入到抵抗行动中来。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唐军伐高句丽，一直打到安市城，高句丽存亡系于一线，高句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安市。这里所说的靺鞨包括新近投靠高句丽的粟末靺鞨的北部族群[52]和白山靺鞨部，而从当时的形势和作战决心来看，白山靺鞨人应该是抵抗更为坚决的一支力量。据《旧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但因为高句丽将领的指挥失误，最终集体战败投降。唐太宗痛恨其抵抗唐军，竟“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同时，这条材料也证明了这三千余靺鞨兵是高惠真率领的白山靺鞨人，《北史》所称白山部“胜兵并不过三千”[53]大概就来源于此。

二、渤海时期白山靺鞨与周边关系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朝灭亡了高句丽。有些学者根据《旧唐书》白山靺鞨“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54]，认为白山靺鞨在高句丽灭亡



后被迁到唐朝的营州地区(即今辽宁朝阳地区)[55]。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唐灭高句丽以后,"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渠帅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56],并未将高句丽遗民大规模内迁。只是到了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四月,才因其"多离叛者",而下令"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57]。既然最初连高句丽人尚且未作大的迁移,更何况处于更远地方的白山靺鞨人呢?实际上,内迁到营州的,只是那些进入高句丽境内,帮助抵抗唐军的部分白山靺鞨人,还有一部分白山靺鞨人是留居在故地的。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唐朝统治者为安抚高句丽遗民,对其故王"工部尚书高藏授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安辑高丽余众"[58]。高藏回到辽东以后,非但未能安辑高丽余众,反而勾结靺鞨人谋反。根据当时周边各靺鞨部族的分布情况:粟末部已内迁至营州地区(今辽宁朝阳);"汨(伯)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寖微无闻焉"[59];而黑水部是与高句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因此,高藏所"勾结"的靺鞨人,就是脱离了高句丽统治以后留居在原地的白山靺鞨人。此外,唐高宗咸亨四年(673),"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打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似在今朝鲜洛江中游之西)","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今平壤西北),高丽引靺鞨攻之"[60]。根据地理位置判断,为高丽所引进攻粟末靺鞨出身的李谨行的靺鞨人必属留居在原地的白山靺鞨部无疑。同时,这些白山靺鞨人迫于形势,有时也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如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唐将刘仁轨与新罗大战,"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61]。

唐朝攻灭高句丽以后,在东北地区设立安东都护府,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和平统治局面。但很快就引发了新的矛盾,外部新罗不断向北渗透,内部契丹族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发动了反抗唐朝地方官吏暴政的斗争,并进而引起了辽西地区的动乱。在契丹族反唐斗争掀起后,移居营州的粟末靺鞨人,在酋长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举部东归,"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62],实际上处于一种割据自保的

状态。根据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旧国本名奥娄，音鄂多理，称敖东，即牡丹江（唐代称忽汗河）上流两岸。"又云："（大祚荣）以其所统为呼尔罕州，应由今奉天渡东辽河至吉林鄂多理城，查鄂多理城在今牡丹江源两岸，牡丹即忽汗之转，忽汗，即呼尔罕之转，则所谓奥娄河者忽汗河之本名。"因此粟末部所到之处应为今牡丹江上游地区。唐朝在采用招安政策失败以后，命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等率兵进讨，一举击败乞四比羽，使靺鞨部受到重创。靺鞨部众在大祚荣的率领下继续抵抗，而唐兵则在李楷固的率领下越过天门岭，穷追不舍。这时，大祚荣得到了高句丽遗民和靺鞨兵的援助，使唐军大败而归。这批靺鞨援兵，就是白山靺鞨人[63]。击败唐军以后，大祚荣领导靺鞨部众（包括粟末靺鞨人和部分白山靺鞨人）以及高句丽遗民在东牟山（一般认为在今吉林敦化市西南二十五里处的城山子）安定下来，宣布建立震国，即后来的渤海国。

渤海国建立以后，因为白山部是最初参与建国的力量之一，因此必然受到重视。渤海在白山靺鞨故地设立南海府。金毓黻先生在其《渤海国志长编》中认为渤海南京南海府，是沃沮故地，而未提及白山靺鞨[64]。追本溯源，金先生是根据《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得出这一结论的。进一步讲，《新唐书》对渤海五京所统地域，是借用该地区较早为中原所知的古族名来叙述的，如龙泉府称肃慎故地，龙原府称秽貊故地。事实上，到唐朝时，这些地区的民族至少是族称早就发生变化了。据[韩]蔡泰亨《关于渤海南京南海府的位置》[65]一文提及：朝鲜《北青（在朝鲜咸镜道）都护府新增邑表》山川风土录中有"宝清寺土城，即肃慎故都，土筑，周三千四百九十七尺"；同时又称"大俗原寺下天山，……古称渤海故都"；此外，《增补文献备考》卷二十九《舆地考·城郭·咸镜道》，也把北青青海土城列为肃慎故都或渤海故都。由此可见，虽然秦汉时期朝鲜咸镜道这一地区是沃沮故地，但以后已经成为肃慎—靺鞨系民族的居住区，也即白山靺鞨人的居住区了[66]。



随着南海府的设立，白山靺鞨部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先进文化的交流，其文明化程度也进一步加强。在朝鲜咸镜道地区发现了大批渤海古城遗址：咸镜南道北青郡东南14公里大川江左岸渤海青海古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坪里渤海居山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南大川右岸龙田里渤海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南大川安谷渤海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凤兴里兴德洞白云山渤海山城址；咸镜北道镜城南山渤海城址；咸镜北道青津市清岩区富居里渤海古城址；咸镜北道会宁郡仁溪里渤海古城址；咸镜北道金策市城上里渤海古城址；咸镜北道渔郎郡芝坊里渤海山城址；咸镜北道渔郎郡芝坊里南甑山渤海山城址；咸镜北道渔郎郡芝坊里渤海古城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渤海强芋峰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长丞项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獐项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夕阳台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鬼岩台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八景台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渔郎川与明涧川流域内郊洞堡垒遗址；咸镜北道渔郎郡新德渤海古城址；咸镜南道兴市会上区德山洞渤海坪山城址；咸镜北道会宁郡城北里云头山渤海山城址；咸镜南道新浦市中兴里下天山渤海堡垒遗址；咸镜南道新浦市中兴里下川山下渤海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龙井里渤海龙井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郡坪里渤海山城址；咸镜南道北青均下户里渤海古城址[67]等。

李云铎、顾铭学编译的《关于渤海南京南海府遗址和遗物》[68]一文，根据朝鲜《朝鲜考古研究》1986年第1号上发表的李俊杰《关于咸镜南北道一带渤海遗物的调查报告》，对朝鲜发现的相关遗址进行了评介：认为这些古城特别是北青城的结构和规模，与中国东北地方发现的敖东城、八连城等相似；北青土城内的田字型里坊也与上京龙泉府的里坊相同；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装饰品、武器、车辅件、器皿、农具等；这些遗址显示当时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铁器时代，出土了铁辖、铁镞、铁短刀、铁铡刀、铁镰、铁锹、小刀、铁三足锅、铁坛子等制品。这些都表明渤海时期

白山靺鞨部已经进入了文明较发达时期，并已经融入到渤海人的整体中去，原来意义上的白山靺鞨人已不复存在了，只有地域意义上的白山靺鞨部还可以从渤海南京南海府找到一些昔日的影子。

白山靺鞨人必然也对渤海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对外交流方面，渤海与日本之间有着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从渤海到日本有三条通道，其中有两条（“筑紫线”、“南海府线”）是经过南海府的[69]，在双方较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其中转站不可避免地会发挥一定作用并受其一定影响。而渤海与新罗交流的所谓“新罗道”则是经过南海府而到新罗的。又如，在军事方面，白山靺鞨人也一定是渤海国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与新罗的争夺中。

渤海国最终亡于新崛起的契丹人。天显元年（926），契丹攻破渤海忽汗城，渤海末王请降。随后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使、刺史接受诏谕来朝，表示服从契丹统治，阿保机“慰劳遣之”。此后，辽于渤海故地建东丹国，以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但辽在渤海故地的统治并不稳固，渤海遗族不断发起反抗斗争：天显元年（926）“三月己巳，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叛……”；“五月辛酉，南海、定理二府复叛，……”；“七月丙辰，铁州刺史卫钧反。……”[70]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皇王耶律倍离开东丹以后，东丹国实际掌握权力的右次相耶律羽之便认为渤海“人心未安”，“遗种浸以潘息”，将来“恐为后患”，故建议“乘其微弱”，徙其民于距上京较近的梁水（今辽宁辽阳太子河）之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天显三年（928）十二月，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东平（今辽宁辽阳老城）。耶律羽之不仅“尽迁其民”，而且将原渤海地区的多数州县同时迁移，侨置于辽东地区。金毓黻先生对此作过考订：“东丹国都既徙，而渤海诸州亦随之具迁。上京、中京之民多迁于辽阳，东京之民迁于开州，即今凤城，南京之民迁于海州，即今海城，其所领诸州之名，或仍其旧，如开州所统之盐、穆、贺三州是也；或易其名，如海州所统之耀、嫔二州为椒、睛



二州之易名是也”[71]。由此可见，随着渤海人的南迁，其原属白山靺鞨部的渤海人也必随之南下，至此，地域意义上的所谓白山靺鞨部也不复存在了。当然，这些被迁的移民并非渤海民户的全部，其中还有一部分民户（包括部分白山靺鞨人），或慎于迁移，或起而反抗，因此流散在原地。以后，随着周边形势的变化，逐步融入新罗、高丽，或并入女真。

四、结　语

白山靺鞨人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可迁移性和定居趋向性。在古代东北地区，一方面人口较少，居住分散；另一方面整体区域以平原为主，没有天然的地域分界线。因此当一个民族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无法继续居住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在迁移中寻找出路。肃慎民族最早生活在更接近中原的今内蒙古与辽宁交界的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外来民族的排挤，被迫向东北地区迁移，进入今吉林西团山地区，并向东到达长白山麓。从地理条件上看，在长白山的另一侧，是自然生存条件更优越的朝鲜咸镜道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原住民又是并不强大的沃沮人，因此，一部分肃慎人进入这一地区，并安定下来，最终发展为白山靺鞨部。同时，也正是这一地区，限制了白山靺鞨人的进一步发展。朝鲜的咸镜南北道地区是一个多山的地区，根据地质学分析，朝鲜的山脉普遍形成较晚，是新生代造山运动的产物，这种山的基本特征是岩石风化程度较轻，大多比较坚硬，而且山势一般都比较陡峭。在这样的地区，比较有利于人数较少的小民族寻求生存，但同时也使其部族势力的发展、壮大成为不可能，因此尽管白山靺鞨人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部民英勇善战，但最终没能像大多数少数民族那样，走上由弱而强、由强而盛的道路。

白山靺鞨人很早就与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包括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各种交流。但因为长期被高句丽、沃沮势力所遮蔽，未能进入中原史家的视野，只是在臣服于高句丽以后，才在高句丽的转引下，为中原人

所了解。而这种接触，又受到高句丽与中原关系的影响而时断时续。同时，它虽然臣服于高句丽，但由于受战略重点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并未大规模进入白山靺鞨地区。这些虽然都延缓了白山靺鞨人文明化的步伐，相反却保证了其部族存在的完整性。反而是到了渤海时期，当它以盟友的身分完全融入到渤海社会中去以后，一方面使它获得了发达社会的文明，同时，也使它失去了部族的完整性，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注释：

①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

③ 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

④ 同上，62页。

⑤ 孙进己、冯永谦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243页。

⑥ 详见（日）津田左右吉著《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一卷，岩波书店，1965年。

⑦ 详见（日）日野开三郎著《东洋史学论集》第十五卷.《东北亚民族史》（中），三一书房，1988年。

⑧ 见《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靺鞨》。

⑨ 上文提到的《中国东北史》、《东北历史地理》都持此观点。

⑩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

⑪ 《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⑫ 如禹硕基等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2页。

⑬ 详见王禹浪编著《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

⑭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

⑮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⑯ 同上。

⑰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

⑱ 详见拙文《肃慎起源及迁移地域略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⑲ 详见杨昭全等著《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4—5页。

⑳ 《三国史记》成书时间较晚，书中将有关肃慎、挹娄、勿吉的记载统一记作靺鞨（惟一一处提及挹娄的记录，明显是抄自汉文史书，大概是抄写过程中漏改了）。

㉑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始祖温祚王》。

㉒ 此处指白山靺鞨臣服于高句丽以前。

㉓《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始祖温祚王》。

㉔《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

㉕《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㉖《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肖古王》。

㉗《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㉘《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㉙《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

㉚ 详见拙文《肃慎起源及迁移地域略考》。

㉛ 见《好太王碑碑文》,本文录自孙进己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卷二,辽沈书社,1989年。

㉜ 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81页。

㉝ 详见(日)津田左右吉著《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一卷,56页。

㉞ 勿吉入中原朝贡的记录较多,因记载较简略,很难推断具体某一次是哪一部朝贡。本文拟对相关记载中较有规律的一个时期即北魏建国到隋初进行探讨(包括以靺鞨名称所作的记载)。

㉟《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传》。

㊱ 同上。

㊲ 同上。

㊳ 详参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一文(已收入本书)。

㊴ 因为与契丹、高句丽的矛盾,粟末、黑水等部已不可能通过两国境内入唐朝贡。详见本书所收拙文《靺鞨族属及渤海建国前靺鞨与周边关系》。

㊵《北齐书》卷四十一《高保宁传》。

㊶ 详参前引王小甫文。

㊷《隋书》卷一《高祖本纪》。

㊸ 同上。

㊹ 事载《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八·婴阳王》。

㊺《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㊻《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六·长寿王》。

㊼ 同上。

㊽ 详见王禹浪、王宏北编著《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

㊾《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故国壤王》。

㊿《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广开土王》。

51《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52 关于粟末靺鞨部北部族群与高句丽合兵的考证,详见本书所收拙文《渤海国的建立及其与周边政治关系》。

53《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

54《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靺鞨传》。

55 如《渤海国与东亚细亚》一书,2页。

5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高丽传》。

57《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高宗总章二年夏四月条。

58《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

59《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

60《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咸亨四年闰五月条。

61 同上。

62《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

63 大祚荣打败唐军的地点史无确载,

但其部是在牡丹江上游遭到唐军打击的，其后撤路线必然是与唐军进军方向相反，而其后因契丹与突厥联合，共同与唐朝相抗，就切断了唐兵进讨大祚荣的通道，可见唐军的进军路线是从西北而来，所以大祚荣必然率部向东北方向撤退。至于唐军所渡之天门岭，学术界也没有定论，但其必然在牡丹江上游更东、更北方向；而从渤海建立后渤海与黑水靺鞨间的关系看，找不到任何黑水部曾助渤海建国的迹象。因此，在这样一个地区，得到高句丽遗民和靺鞨人的共同援助，则所指靺鞨人必是白山靺鞨无疑。

⑭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收入吕兴盛主编《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15页。

⑮ 文载前引顾铭学、李运铎译《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原文载朝鲜《历史科学》1991年第3期。

⑯ 这些记载也说明古代朝鲜学者也认为渤海国是肃慎后裔建立的。

⑰ 详见王禹浪、王宏北编著《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

⑱ 同上。

⑲ 尽管最常走的是另外一条即"北线"，但这两条线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渤海第五次赴日大使高南申走的是"筑紫线"，第九次赴日大使史都蒙走的是"南海府线"。

⑳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㉑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上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286页。

渤海国的建立及其与周边政治关系

范恩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渤海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靺鞨人联合一部分高句丽遗民建立的国家。它始建于公元698年，一直存在到926年，是一个以今牡丹江、图们江、松花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海东盛国"。渤海政权在维护东北地区内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唐王朝以及日本、新罗的联系，推动了中国东北乃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成为唐朝与日本等邻近国家和地区间文化传播的桥梁和纽带。

一、渤海国的建立

公元280年，肃慎与梁貊合兵攻高句丽，高句丽在安国君达贾的领导下，打败了肃慎与梁貊的联军，所谓"微安国君，民不能免肃慎、梁貊之难"[①]。获胜的高句丽"迁（肃慎民）六百余家于夫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②]。作者曾撰文考证此"夫余南乌川"当在今辉发河流域[③]，这样，肃慎人的一部分就在今辉发河流域居住下来。以后，随着高句丽势力的中衰，这一支肃慎人逐渐摆脱了高句丽的控制，向西北方向发展，即到达今北流松花江两岸地区，并且与北部东流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南下的肃慎人相结合。到南北朝时期，为中原史书记作勿吉之粟末部，后又称粟末靺鞨。从考古发现上看，在文献记载的粟末靺鞨人居住区内，存在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存，包括南部的今吉林省磐石县梨树上屯西山、吉昌小西山，桦甸西荒山屯、江西屯等；以及北部的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永吉杨

屯三期、永吉查里巴墓地。这些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共同性，如陶器、墓葬等方面，它们可能都是粟末靺鞨人的遗存[④]。从这些文化遗存看，粟末靺鞨部分作南北两个集团，南部形成于初期，因为与高句丽接壤，不断发生冲突，文化水平较低；北部是在不断排挤夫余势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远离战乱且吸收了高水平的夫余文化，因此水平较高。

粟末靺鞨人与高句丽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特别是其南部集团。因此在隋炀帝伐高句丽时，其南部"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今辽宁朝阳）"[⑤]。唐武德初，其部遣间使朝贡，唐以其部置燕州，仍以度地稽为总管。当然，度地稽所率之南部集团又分作若干小的部族[⑥]，它们之间的联合也是松散的。"突（度）地稽率所部赴定州，遣使诣太宗，请受节度，……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⑦]。而其他同来诸部则被安置在营州地区，即《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所载之慎州（处涑沫靺鞨乌素固部）、黎州（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夷宾州（处靺鞨愁思岭部落）。

营州，是唐初在隋柳城郡的基础上，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而设立的，因此它成为唐王朝与东北各族接触的前哨站。居住在这里的边疆民族，除隋时入居此地的粟末靺鞨人外，早在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即有契丹窟哥部内附，置于营州地区。契丹势力在这一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唐朝"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⑧]。相应内附靺鞨诸部即在名义上受契丹节制，因此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便有了契丹大舍利之职。同时，尽管名义上这些粟末靺鞨人已归附唐朝，但他们的离心倾向始终存在，甚至一度转附于突厥而进攻唐朝，如"武德间，处罗可汗……谋令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⑨]。

在南部集团内迁营州以后，粟末靺鞨北部集团仍留居故地，根据碳14测定，永吉杨屯上层遗址的时间约到公元645年，永吉查里巴遗址的时间约到公元643年[⑩]，其间并无中断，可见当地的粟末靺鞨人是一直生活在原地直到七世纪中叶高句丽灭亡以前。另据《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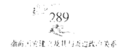


《感通篇中》:"辽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阶者。年十八时逃入高丽。……逢高丽捉获。具说我是北边靺鞨。不信谓是细作。"说明辽西柳城靺鞨与高句丽北边靺鞨种属相同,即都是粟末靺鞨,但北边靺鞨与高句丽关系密切,而柳城靺鞨则与中原关系密切。到永徽五年(654),高丽王"藏以靺鞨兵攻契丹"[11],表明高句丽势力已参与到粟末靺鞨部与契丹的冲突之中。其后,"帝(太宗)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12]。北部与高句丽合并的原因史未能详,但从唐兵大举进入东北,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角度考虑亦合情合理;特别是据《旧唐书》卷二百十九《契丹传》记载,太宗征高丽时,"悉发(契丹)酋长与奚首领从军",这不可能不使长期与契丹迭相攻伐的粟末靺鞨产生抵制心理。因此,北部粟末靺鞨与高句丽结盟抗唐。但是,由于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主要发生在辽东地区,所以粟末靺鞨对战争的参与是有限的[13]。从目前的史料看,最主要的参与是《资治通鉴》所记"及高丽败于驻跸山,莫离支使靺鞨说真珠(薛延陀),啗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14],从地理位置和周边关系考虑,高句丽所欲借以联络薛延陀的靺鞨必是粟末靺鞨无疑。唐朝灭亡高句丽之后,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以及充实内地荒疏空闲之地的户口,将高句丽大小官吏及强壮人口三万八千三百户迁往内地。在这场大迁移中,与高句丽合并的北部粟末靺鞨人亦部分被迁往营州地区[15]。当新的粟末靺鞨人入住后,两支同样具有离心倾向的势力,很自然地联合在一起。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地区的契丹人发动了反抗唐朝地方官吏暴政的斗争,引起了辽西地区动乱。靺鞨人及高句丽余种乘机而起,根据文献记载,粟末靺鞨人在酋长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举部东归,"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16]。起初,唐对靺鞨首领采取封赏、招安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但乞四比羽拒不受命。于是,唐派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等率兵进讨。乞四比羽战死,靺鞨部众受重创,唐兵越天门岭,穷追不舍。这时,乞乞仲象也已死去,由其子大祚荣率靺鞨部众[17]及高句丽遗民继续抵抗,并使唐兵大败而归。此时,契丹与东突厥联合,共同与唐朝对抗,切断了唐兵进讨

靺鞨的通路。大祚荣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后，迅速率部挺进，回到长白山下的故土，“祚荣遂率众东保挹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18]。今据考古推断，此言东牟山城很可能是今吉林省敦化市西南的城山子山城。以前，学者曾认为将东牟山城定在敦化与“挹娄之故地”（按挹娄原居地当在今黑龙江省滚兔岭地区）相矛盾，因此对此说表示怀疑，金毓黻先生就认为“挹娄”当为“虞娄”之误。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并没有错，敦化这一地区恰恰在挹娄人逐渐南下排挤沃沮人以后的势力范围之内[19]，因而此称“挹娄故地”是没有问题的。而大祚荣将其政权首先建立在这里，也恰好说明了其政权的核心是挹娄—粟末靺鞨人。

至于大祚荣，《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称其“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显然属于前文论及的粟末靺鞨之北部集团；但同书同传又称其为乞乞仲象之子，而乞乞仲象被称为“（契丹）舍利乞乞仲象”，正说明其为先附之粟末靺鞨人；而且，根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并无乞乞仲象这个人。其间矛盾不言而喻。究其原因，即在于大祚荣并非乞乞仲象之亲子。根据历史记载，渤海建国后，依中原王朝礼法，为诸王上谥号，但却从未追谥乞乞仲象，如果乞乞仲象是大祚荣的亲生父亲，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此外，从对待唐朝招安政策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乞乞仲象、乞四比羽、大祚荣三人的不同，当唐朝提出招安条件后，乞乞仲象立即表示响应，而乞四比羽则不受命，大祚荣的态度不见于记载，但从其后的行动上看，他也是反对接受招安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他们的不同经历相一致的：乞乞仲象是先迁营州的粟末靺鞨人，长期接受唐朝的管理，对于重新接受这样的管理并没有多少抵制情绪；而乞四比羽、大祚荣则是后迁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他们接受唐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一旦获得脱离这种管理的机会，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据此，其实际情况是大祚荣作为后迁营州的粟末靺鞨人，为了取得在营州地区



的有利地位，投靠先迁营州的乞乞仲象部，成为乞乞仲象的假子。也正是因为大祚荣的这种特殊身分，即后迁粟末靺鞨人、先迁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的假子、高丽旧将，因此在乞乞仲象、乞四比羽死后，可以统领其部，并得到高句丽遗民的支持。

在渤海政权中的高句丽遗民与其他并入渤海的民族一样都是渤海的属部，这从唐曾册封渤海两位太子大武艺、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中也可以看出。案，少数民族政权一贯有以太子统领境内主要属部的传统，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多以太子为大单于，统领属部；以后的契丹也曾封太子为东丹王管理渤海遗民。而桂娄部是高句丽王室所出，常被用来代表高句丽，因此渤海以太子为桂娄郡王就是任用太子管理国内以高句丽为主的属部[20]。当然，由于历史原因，高句丽人在渤海国内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属部而言要高些。

圣历元年（698），大祚荣率靺鞨部众及高句丽遗民，在东牟山一带安定下来后，根据唐朝对他父亲的封号，宣布建立震国，自称震国王。唐中宗复位以后，因忙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无力处理边疆事务，因此，对大祚荣称王一事，继续推行招抚政策，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去招慰。大祚荣为了早日消除来自中原的压力，亦欣然接受了招抚，停止与唐朝对抗，并遣其子大门艺入唐为侍，留作质子。同时，唐中宗准备对大祚荣进行正式册封，但由于契丹与突厥的梗阻，册命迟迟不能送达，延缓了对大祚荣的册封。开元元年（713），唐玄宗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充任持节宣劳靺鞨使，绕海路前往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大祚荣所领地域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21]。忽汗州是唐朝的羁縻州，始辖于营州都督府，后来转归幽州都督府、平卢军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管领。同时，自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以后，这种册封关系一直贯穿于整个渤海历史之中。因此，渤海是接受唐朝册封的藩属政权，这是没有疑义的[22]。

二、渤海族属考辨

渤海国是在高句丽灭亡三十年以后，在曾经被高句丽征服的靺鞨旧地建立起来的。由于其本身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载，周边国家的记载又比较模糊，所以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相关各国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渤海族属问题作了多种论述。中国学者主张渤海与高句丽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的，渤海是由中国东北少数民族靺鞨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韩国与朝鲜学者主张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是高句丽在东北统治的延续；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主张渤海是由靺鞨族建立的，但是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1945 年以后开始倾向于渤海是由高句丽民族与靺鞨民族共同建立的，但以高句丽为主；俄国学者则一方面主张靺鞨族建立渤海国，一方面将靺鞨族与前苏联境内的埃文基人联系起来，进而主张渤海独立于中国而与俄国联系紧密[23]。实际上，正像本文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靺鞨人国家。当然，部分高句丽遗民也参加进来，而且，由于高句丽遗民本身的文化素质较高，所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了渤海统治阶层。但从已知的渤海高门姓氏看，高句丽姓氏并不占主要部分。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从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渤海是由靺鞨人建立的国家。如陶器方面，根据胡秀杰、刘晓东《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24]一文，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渤海的陶器传承渊源的分析，认为"渤海建国前至渤海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主要是重唇筒形罐和敞口（或称盘口）鼓腹罐。前者无疑是粟末靺鞨系的典型器物，后者无疑是黑水靺鞨系的典型器物。尤其是重唇筒形罐贯穿于渤海建国的各个时期"。而"应承自东北土著民族夫余、高句丽的某种传统制陶作风"的横耳罐则并不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渤海国内占主导地位

的必然是靺鞨人特别是粟末靺鞨人。又如葬俗方面，通过对属于渤海的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在大量渤海墓葬中存在着“二次葬现象”，如吉林敦化六顶山遗迹、吉林和龙县河南屯墓葬、黑龙江东宁大城子墓葬等。这类“二次葬”习俗并不是渤海时期的首创，在属于靺鞨人的遗址中是比较常见的，如榆树老河深上层、永吉杨屯、特罗伊茨基等地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在这种“二次葬”中还残留着与火葬相联系的习俗，如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群等渤海遗址都发现类似的墓葬。此外，渤海墓葬中以土封顶的习俗也是与高句丽葬俗迥异的。

从以上分析看，渤海国的主体民族为靺鞨族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仍有部分外国学者在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抓住某些史料记载上的歧义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占渤海人口一小部分的高句丽是渤海国的统治者，进而主张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反复的驳斥，但仍未能消除歧义。其中最有争议的便是日本古史《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渤海上》的记载：“其国（渤海）延袤二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其百姓者，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百姓皆曰首领。”一些外国学者就此认为“土人”就是高句丽人，因为高句丽人作“村长”，所以渤海政权是掌握在高句丽人手中的。本人认为这样理解是极其牵强的。首先这条记载源于日本延历十五年（796）在唐学问僧永忠的渤海游历记录，此时渤海已处于稳定发展期，原属靺鞨七部的伯咄、拂涅、白山、号室等部都先后归入渤海，因此所谓“皆靺鞨部落”应该包括粟末部和以上诸部。而所谓“百姓”应该是指部落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首领”。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渤海统治阶层是以靺鞨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高句丽人、汉人参加的，这种情况正与“其百姓者，靺鞨多”相一致。而所谓“土人”，应该是指当地的原住民，渤海的领土虽占有了部分原高句丽的土地，但更多的是原靺鞨人特别是粟末靺鞨人生活的地区，因此“土人”更应该指粟末靺鞨人。这样，这条史料表达的情况就是：渤海国内都是靺鞨部落，这些部落是以村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担任“村长”的主要是粟末

靺鞨人，而具体统领本部靺鞨人的则是本部族的首领[25]，这是与其他史料记载相一致的。至于有些学者一定要认为"土人"是高句丽人，更是明显缺乏证据。僧永忠对于高句丽人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他为什么偏要把处在靺鞨人领土上的高句丽人称为"土人"而不直称高句丽呢？而且，在日本出土的天平宝字六年（762）由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所建的多贺城碑上，与距京、虾夷、常陆、下野的距离并列记有："去靺鞨国（渤海）界三千里"。对这样一条具体明确的记载避而不谈，却偏要拿一条记载相对模糊的史料来歪曲事实，某些学者的研究动机是很值得怀疑的。

三、渤海国与周边政治关系的探索期

高句丽亡国到渤海建国以前，东北亚的政治局势处于一种平稳状态。虽然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平静，内部包含着唐与新罗的矛盾，唐地方政权与当地少数民族如契丹的矛盾等不稳定因素，但由于唐自高宗中期开始，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加之在西北与吐蕃争夺，大规模用兵，无力积极处理东北边疆事务；新罗则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的统一事业，暂时没有余力作更大的开拓；而那些处于唐朝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也缺乏与唐对抗的实力。因此，给各种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创造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机遇。698年渤海国建立，随着渤海势力的不断发展，打破了原来的表面平静。唐、新罗、渤海、日本，加上开始阶段的突厥以及后来兴起的契丹，几大政治势力在东北亚这块广阔的舞台上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渤海建国的时候，中原的唐政权已转移到武周手中并开始趋于稳定，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仍很尖锐。北方草原上正是突厥（后突厥汗国）强大的时期，其军队经常深入中原地区抢掠人、物而去，同唐朝关系十分紧张。东北地区，契丹势力尽管遭到唐的打击而衰落，但它很快转附



突厥，势力有所恢复，仍是唐朝统治的隐患。半岛上，新罗乘高句丽灭亡的机会，大肆侵夺百济的土地，并尽力向北扩展，到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26]，此时新罗亦因实力有限不再向北扩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但是，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隔海之东邻日本，646年进行了大化改新，走上了封建道路，同时其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大国意识增强，并进而演化为所谓"小中华意识"，要以唐王朝为榜样，在东亚国际舞台上另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性政治圈。为此，它也开始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最终导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日军大败。尽管日本败于唐和新罗，但始终没有放弃使新罗臣服，把东亚的小国置于藩属国地位的企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一建立，立即引起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关注。唐朝因为内部政治局势的动荡，加之北部突厥的压力，对渤海采取了招抚政策，唐中宗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去招慰。大祚荣等渤海统治阶层经历了唐灭高句丽的战争，特别是大祚荣曾作为高丽旧将，对前车之鉴更有深刻认识。因此，他们为了早日消除来自中原的压力，亦欣然接受了招抚，停止与唐朝对抗，并遣其子大门艺入唐为侍，留作质子。当然，渤海对唐朝的招抚也心存疑虑，因此，为确保自身的安全，"遣使交突厥"[27]，突厥派"吐屯"到渤海，对它进行监控。这样，渤海利用大国对立的形势，采用双重属国身分保证自己的安全。到唐玄宗时期，新的年轻皇帝打算有所作为，因此开始重新考虑渤海问题。开元元年（713），唐玄宗遣崔忻至渤海，向大祚荣宣谕册封诏书，封其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地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这次册封实际是一次对渤海的试探，是中原传统的"先礼后兵"策略的实施。而此时渤海的势力尚不足以自立，使大祚荣乐得顺水推舟接受唐的册封，正式定国号为渤海，成为唐的属国、属州，相反与突厥的关系则日渐疏远。

719年，大武艺继任渤海国郡王。大武艺继位后，对外继续遵照先王

的方针：遣使朝唐，恪守藩属名分；请突厥吐屯以解后顾之忧。同时，随着渤海政权的稳固，势力的加强，大武艺开始推行"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28]的武力扩张政策，使渤海统治区域不断扩大，政权随之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由于当时渤海周边的黑水、拂涅、越喜、铁利诸部，都处在唐朝的册封体制之下，都与唐维持着臣属关系，至少在名义上都受到后者的保护，加之渤海对自己的扩张在唐政权中引起的反响并无把握，因此大武艺不得不重新考虑渤唐关系。为了使自己开疆拓土的行动更名正言顺，他在维持与唐的宗藩关系的同时，还通过私谥其父为"高王"，并自立年号"仁安"取代唐朝正朔，以突出其对唐王朝的独立形象。公元725年，在大武艺北进政策的威胁下，黑水靺鞨秘密遣使朝唐，要求内属，翌年唐王朝于其地设黑水州，并置长史。此事的发生，恰好印证了大武艺的担心，"黑水始假道于我与唐通。异时请吐屯于突厥，皆先告我。今请唐官不吾告，是必与唐腹背攻我也"[29]。于是先发制人，派兵击黑水。但又发生了领兵的其弟大门艺逃唐事件。大门艺曾作为质子入唐为宿卫，一方面对唐朝强大的实力有所了解，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亲唐派，因此违命入唐。大武艺坚请杀门艺，实际上一方面乘机打击国内的亲唐派，一方面试探唐的反应。

唐玄宗对大武艺的行为没有予以应有的打击，而恰在这时契丹可突于遣使渤海，联合渤海反唐[30]，于是大武艺准备与唐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较量。为此，渤海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寻求一支较强的支持力量。遍观渤海周边形势，新罗与渤海处于敌对状态，唐、罗联盟也为大武艺所忌讳，突厥势力日渐衰落，惟一可依靠的便是日本。而此时的日本，正极力试图插手东亚事务，并早已开始关注渤海，公元720年元正天皇就"遣渡岛津清司从七位诸君鞍男等六人于渤海国，观其风俗"[31]，只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大武艺的兴趣。公元727年，大武艺指派宁远将军、郎将高仁等出访日本，并于728年春天朝见天皇，呈递了国书。大武艺的



主动，在日本朝廷中得到良好的反应。为此，不但给使者以热情友好的接待，而且圣武天皇还派出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首的送渤海使，带着致武王的国书随使回访渤海国。渤日之间的正式交往从此开始了。大武艺肯定要利用新建立起来的渤日"联盟"来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在730年8月回访渤海的虫麻吕回到奈良，732年4月，"日本国兵船三百，越海袭我（新罗）东边"[32]的同年，大武艺即遣将张文休率兵越海攻唐登州，杀登州刺史韦俊；同时，又遣另一支人马攻至营州以西榆关附近的马都山，渤、唐战争爆发。渤、日的这一行动，促使本已处于僵化状态的唐、罗关系迅速复苏，双方共同出兵，加上黑水靺鞨、室韦的援助，很快迫使大武艺收兵，并上表悔过。唐玄宗给大武艺的复诏中称"卿往者误计，几于成祸。而失道未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计卿既尽诚节，永固东蕃，子孙百代，复何忧也！"[33]这样，唐朝一方重新使渤海遵守臣节以后，也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攻势。经此一役，渤海与唐朝始终维持了藩属关系，再无第二次冲突。

但是渤、唐战争的结果并未改变渤、罗关系，双方仍处于尖锐对抗的状态。这一形势也使当时东北亚地区的两大联盟得以维持：其一是唐、罗联盟[34]；其二是渤、日联盟。由于渤唐战争中新罗完全站在唐的一边，任其调遣，使渤海南部的局势更加紧张；同样，由于唐、罗关系的改善、加强，使新罗在对日交往中更加强硬，甚至双方互相驱逐来使。因此，渤、日之间联盟的基础依然存在。同时，因为唐、渤关系的一度紧张，渤海进一步文明化所需要的精神、物质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日本。因此，战后，渤、日关系进一步加强。与此相反，渤海与突厥的关系却发生了另一种变化。由于突厥内乱不断，国力衰落，不能在地区争衡中给予渤海有力的支持。因此，当734年突厥遣使渤海，要求渤海出兵同突厥联合攻打已归顺唐朝的契丹和奚时，遭到了大武艺的拒绝。渤海国扣留了突厥使节，正式断绝了与突厥的关系，并遣使到长安上表。

综观大武艺时期，尽管在对唐战争中失败，但经过"斥大土宇"之后，已使渤海"忝当列国，监总诸藩，复高丽之旧居，有夫余之遗俗"[35]。不仅

占有高句丽昔时鸭绿江南北两岸的地区，其东部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岸，北与黑水靺鞨部相接，西与契丹相邻，靺鞨族大部分归于统一。此时的渤海拥有"地方两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36]，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渤海在唐、日、罗间纵横捭阖

开元二十五年(737)大武艺死后，由其子大钦茂继位，唐玄宗立即遣内侍段守简充任吊祭兼册立使，册封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大将军、忽汗州都督。并在册书中再次重申了"永为藩屏，长保忠信，效节本朝，作范殊俗"[37]的期望。大钦茂即位后，一改大武艺的对外扩张政策，推行文治。在对外关系上，积极与唐朝修好，朝贡不绝。同时，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又派人入唐"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38]，促进了唐文化在渤海的传播，使渤海涌现出许多文士诗人。但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渤、唐关系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所以安禄山起兵反唐，给渤海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大钦茂采取了极为谨慎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将王都北移三百里，迁至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以避开战火；同时，坚决执行置身事外的路线，两次拒绝唐朝征兵的要求[39]，也未参与日本乘机进攻新罗的同盟，这一政策确保了渤海远离战乱，得以继续繁荣发展。当然，从总体上讲，渤海是希望唐朝获胜的，史籍中没有渤海交通安史的记录，但却见到了渤海与唐朝的联系，如759年渤海派遣杨承庆送日本遣唐使高元度入唐。到762年唐朝即将平定叛乱的时候，唐代宗下诏进封渤海为国，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更加说明安史之乱中渤海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

渤海与唐朝之间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常常是"一年数贡"，除了尽藩臣之礼外，主要是为了通过朝贡实现贸易任务，而这些贸易正是渤海



国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说："渤海僻处东北，其地濒海，气候严寒，故多产鸷禽、异兽、文石、鳞介、药材，饥不能常食，寒不能尽衣，而往往为中朝殊方之所贵。重释通使，轮蹄四达，即以所产之物辇之各国，以易米粟布帛，为国人日用之需。盖立国二百余年中，无一日不如是也。"[40]但是，因为唐、渤、罗三角关系的存在，渤、唐关系始终受限；加上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市被认为是一种恩赐，受到种种限制，如"建中元年（781）10月6日敕诸锦、罽、绫、罗，绣、织成细紬、丝布……，并不得与新罗、渤海、契丹诸藩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新罗、渤海外国人交通买卖"[41]，再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42]，都说明渤海与中原地区的贸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不是可以自由进行的。这样一种局面无法满足随着渤海国家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在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政局极度混乱，无暇顾及外部事务，因此其与各民族政权之间的往来明显减少，唐、渤关系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渤海基本失去了与唐交流的机会。而渤海国家发展对经济文化支持的需要却是迫不及待的。因此，渤海加强了与日本的交往。

渤海与日本的关系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从大武艺727年首次派使节出访日本开始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为第一个时期，在这近三十年中渤、日交聘仅五次，其中渤海遣使三次，日本回访两次。尽管这一时期双方结盟的基础牢固存在，但由于当时整个东亚形势处于表面静止状态，而且自734年以后渤、唐关系密切发展，因此使渤、日关系相形见绌。

到了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渤、日关系由于形势的变化而迅速走向高峰。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六年，双方互通使节就达八次，其中日方五次，渤海回报三次。日本由被动转为积极，是因为日本企图趁唐朝内乱无力外顾的机会入侵新罗，而一直与新罗处于对立关系的渤海恰是他们联合的最好对象。因此，渤海使臣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欢迎，有两次还受到日本朝中权倾一时并主持征讨新罗计划的大保惠美押胜的特别宴请。然

而，由于大钦茂此时采取了一条谨慎的外交策略，无意因新罗问题而结怨唐朝，因此对日本的热情并未给以过多的回应，渤、日联手征讨新罗的计划没有变成现实。

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渤、日关系进入了第三个时期。771年，大钦茂遣青绶大夫壹万福等三百二十五人出访日本，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开始。此时，前一阶段日本联合渤海的迫切要求已经没有了，其接待渤海来使的更多原因在于政治影响方面，即通过渤海使臣的到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所谓“小中华”精神需要。反观渤海，一方面仍与唐朝保持着良好的藩属关系，大钦茂还在762年受到唐朝渤海国王的加封；另一方面，新罗也已经不再对其构成威胁，特别是新罗元圣王时期，其于790年首先向渤海采取睦邻友好行动，“以一吉飡伯鱼使北国”[43]，开始与渤海通好。因此渤海出访的政治意味大为减少，而更多的则在于经济贸易方面[44]。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渤海亡国。正因为彼此价值取向发生了错位，因此双方在和平交往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矛盾。在日本方面，开始更多地注重一些形式的东西，因此当前文提及的771年的渤海使团到达日本王京后，即遭“责问渤海王表无礼于(其使)壹万福”[45]。以后，随着渤海贸易要求的扩大化，日本感觉得不偿失，极力限制渤海的朝贡次数。在桓武天皇延历十五年(796)渤海康王大嵩璘首先向日方提出隔年遣使一次作为定例的时候，桓武天皇即答复为“间以六岁，远近合宜”[46]。虽然在渤海的要求下，日本很快取消了时间限制，但不久，当淳和天皇天长元年(824)六月渤海宣王大仁秀遣高贞泰出使日本时，日方便单方面作出决定，“更改前例，告以一纪(十二年)。……永以为例”[47]。当然，渤海出于自身的需要，是不可能完全遵守这样的规定的。因此，在日方作出决定后，仅过了七个月，渤海便以受日本留唐高僧灵仙大师之托，代其向日本转送“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以“答谢国恩”[48]为由，再次遣使赴日。而日方尽管百般刁难，但为了达到政治文化的需要，对大部分渤海使团



还是给予正常的接待，特别是对那些所持国书较适合日本政治目的的使团，如桓武天皇延历十五年(796)渤海的访日使团，即因“今所上之启，首尾不失礼，诚款见于词”[49]，而获得格外优待。

渤海国到宣王大仁秀时期(818—830)，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重新走上扩张领土的道路，史称此时渤海“南定新罗”[50]，“讨伐海北诸部”[51]。前文已提及渤海与新罗关系在大钦茂时期一度得到改善，至新罗宪德王四年(812)，又“遣级湌崇正使北国”[52]，继续与渤海通好。但是，这次通好时间比较短。到817年，渤海宣王大仁秀即位时，双方关系又趋向紧张。虽不能详定渤海与新罗此次冲突的状况，但新罗宪德王十八年(825)，即渤海宣王建兴六年，“(新罗)命朱岑太守白永，征汉山北诸州郡人一万，筑浿江长城三百里”[53]，足见双方对峙的升级，而新罗在这次冲突中是处于守势的。所谓“海北诸部”，有的学者认为是今兴凯湖以北的部族[54]，实际就是指渤海国以北的拂涅、铁利、虞娄、越喜等部。大仁秀统治了这些部族以后，不可避免地与更北的黑水部处于直接的对立状态。前文已论及大武艺时期渤海与黑水靺鞨的关系，尽管双方一度兵戎相见，但随着大武艺与唐对抗的失败，渤海与黑水部之间很快迎来了一个和平交往的时期，特别是在大钦茂时期，其标志是渤海国使臣多次同黑水靺鞨使臣一起朝唐或贺正。渤、黑关系的正常化对双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对黑水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到大仁秀的时候，双方之间的和平被打破了，经过大仁秀时期的讨伐战争，南黑水靺鞨的一部分领土被纳入渤海国的版图，黑水部基本上退守黑龙江以北地区。

五、渤海后期的外交策略

渤海国后期，因战乱较少，渤海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超过了本地区的其他各族、各部落，以“海东盛国”的形象屹立在东北亚的大陆上。直到893年(唐昭宗乾宁三年)，渤海使臣还以新罗国小势衰而渤海强盛为理由要求改变长期实行的唐廷朝会座次，将渤海

排在新罗前面。但实际上，渤海表面的强盛已不能掩盖其事实上的衰弱。《辽史》卷七十五《耶律觌烈传附弟耶律羽之传》摘录羽之上奏辽太宗耶律德光的表文称："……先帝（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明白指出了契丹人是利用渤海王国内部的动荡，乘机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胜利。

就在渤海日渐衰落的时候，他的西邻契丹兴起了。渤海与契丹有着长期的交往，最早的渤海先民粟末靺鞨人即与契丹人每相劫掠。高句丽灭亡后，粟末部人内徙营州，与同处该地的契丹人发生了更多的联系，由于当时契丹势力较强，粟末靺鞨人一定程度上向契丹靠拢，甚至其首领乞乞仲象还获得了契丹"大舍利"的官号。但双方并未达成相互的信任。因此，696 年契丹起兵反唐的时候，粟末部并未参加，而是远离战场，"树壁自固"。渤海建国后，双方虽未有大的冲突，但互相敌视的态度没有改变，因此，渤海在与契丹接界的夫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到渤海后期，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势力不断扩大，开始加强对渤海的掠夺，《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称："时东北诸夷皆服属，惟渤海未服。太祖谋南征，恐渤海掎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到 918 年，契丹势力已据有辽东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渤海周边地区的形势也在朝着不利于渤海的方向发展。首先是渤海的宗主国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再也无力维护东北亚地区的既存格局。其次黑水靺鞨部逐渐摆脱渤海的控制，《三国史记》卷十一《新罗本纪》所载的 886 年"春，北镇奏，狄国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和通'"，表明这时宝露（勃利）、黑水等部已逐渐摆脱渤海的控制，而且试图与渤海的对手新罗联盟。第三，曾一度与渤海结为"唇齿国"的奚部在 911 年彻底被契丹征服。同时，渤海为抵御契丹，不惜与长期对立的新罗以及刚刚建立的高丽结援，但新罗人此时国力减弱，自身难保，表面上答应与渤海结援，



实际上不敢得罪契丹人，相反却极力讨好契丹，在915年阿保机巡视鸭绿江时，派使节向其“贡方物”[55]。同样，高丽政权也在讨好契丹，先后“遣使进宝剑”[56]和进贡。

内忧外患的渤海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方面煞费苦心地向契丹统治者摇尾乞怜，于918年遣使进贡。一方面被迫组织抵抗，在军事上采取反击行动，于辽天赞三年(924)进攻契丹辽州，“杀其刺史张秀实而掠其民”[57]。但是，颓势已成，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渤海灭亡的命运。辽天赞四年(925)，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阿保机终于下达了大举进攻渤海的命令，在“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58]的号召下，契丹几乎倾国而来，到926年3月，契丹攻破渤海上京忽汗城，渤海末代国王请降，渤海政权灭亡。接着，“安边、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使)、刺史”[59]也纷纷表示降附，渤海全境被契丹控制。自698年以来，前后存在了二百二十九年的渤海国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六、小　结

综上所论，渤海处理周边关系的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的生存，并不断扩大其势力。正因如此，面对实力强大的唐朝，接受其封赐，成为受其羁縻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就成为渤海的一项基本对外政策；而这一政策能够得以维持，又与唐朝在处理东北亚地区事务过程中所采取的不求领土，但求安抚远人的策略有着密切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不管周边形势如何变化，唐、渤之间的宗藩关系始终得以保持。同时，由于渤海势力的扩大，必然要威胁到东北亚的地区安全，打破原来唐朝势力覆盖下的平衡状态，因此也就必然受到唐朝的制约，加上唐与新罗特殊历史关系的存在，唐朝利用唐、罗联盟牵制渤海就显得顺理成章。而渤海为了自身安全，加上前文提到的经济原因，寻求日本作为其盟友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又恰恰与正在建设律令制国家，有意构造相应地区环境氛围的日本的需要不谋而合。从另一方面来讲，又是

因为唐朝的不求领土，但求安抚远人政策，使唐在利用与新罗的联盟牵制渤海的同时，并未做出进一步的举动对渤海实行干涉，始终停留在原来的羁縻水平上；而日本则终因实力有限，其大部分体制性构想都只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并无实质性进展，因此，渤、日关系就始终是渤海的经济实益与日方政治虚名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样一种地区互动关系的存在，使八、九世纪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地区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一稳定局面的存在，为中原先进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文明化的进程。渤海，在这个过程中，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注释：

① 《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本纪五·烽上王》。

② 《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本纪五·西川王》。

③ 见拙文《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这些文化的族属还有待进一步认证，但它们具有明显不同于高句丽、夫余文化，而恰恰与靺鞨文化相接近的特点，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文化的主人与肃慎系民族关系密切。本人将另篡文论证靺鞨考古遗存问题。

⑤ 《隋书》卷八十一《靺鞨传》。

⑥ 据《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燕州》引隋《北蕃风俗记》，度地稽所率粟末靺鞨人分作八部。

⑦ 同上。

⑧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契丹传》。

⑨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80—81页。

⑪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

⑫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黑水靺鞨传》。

⑬ 根据史书记载，参战的靺鞨主要是白山靺鞨人，详参本书所收拙文《白山靺鞨史考》。

⑭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八月条。

⑮ 见本书所收拙文《靺鞨族属及渤海建国前靺鞨与周边关系》。

⑯ 《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

⑰ 包括新来支援的白山靺鞨人，详见拙文《白山靺鞨史考》。

⑱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

⑲ 详见前引拙文《粟末靺鞨考》。



⑳（朝鲜）幺明洪《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朝）《历史科学》1991年第1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第1期）认为封渤海太子为桂娄王，就是在宣布作为继承高句丽国家的渤海国的性质。该文的论断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㉑《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

㉒ 参（日）金子修一《由唐朝看给与渤海名分的意义》，收在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东亚史中的国家和地域》（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八集），东京：刀水书房，1999年，402—424页。

㉓ 详见拙文《百年渤海族属研究综述》，待刊。

㉔《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㉕ 靺鞨部落由首领统辖，是贯穿靺鞨历史的。如《三国志》卷三十《挹娄传》载："（挹娄）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又如《契丹国志》："又次东南至熟女真国，不属契丹所管。……无君长，首领统押。"

㉖《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唐高宗仪凤元年二月条。

㉗《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

㉘ 同上。

㉙ 同上。

㉚ 战争中渤海军队攻打马都山（榆关附近）须经营州，未受到契丹军队的阻拦，可见渤海、契丹间确有共同反唐之约。

㉛《续日本纪》天平十五年四月。

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圣德王三十一年条。

㉝《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九《敕书》。

㉞ 有关唐、罗联盟的情况，可参考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㉟《续日本纪》卷十。

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渤海靺鞨传》。

㊲《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四《册封二》。

㊳《唐会要》卷二十六。

㊴ 事见《续日本纪》卷二十二天平宝字二年条。

㊵ 转引自禹硕基主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157页。

㊶《海东绎史》卷二十五。

㊷《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互市》。

㊸《三国史记》卷十《新罗元圣王纪》。

㊹ 有关渤海此时访日的主要目的在于贸易的论断，详参任鸿章《渤海与日本的关系》，见禹硕基主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

㊺《续日本纪》卷三十二光仁天皇宝龟三年条。

㊻《日本后记》卷五。

㊼《类聚三代格》卷十八《夷俘并外蕃人事》。

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㊾《类聚国史》卷一百九十三《渤海上》。

㊿《辽史·地理志》。

51《新唐书》卷二百十九《渤海传》。

52《三国史记》卷十《新罗宪德王纪》。

53 同上。

54 如朱国忱、魏国忠《渤海史稿》，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社，1984年，71页。

55《辽史》卷一《太祖纪》。

56. 同上。
57. 同上。
58. 同上。
59. 同上。



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

范恩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后晋天福元年(937)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敬瑭)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①。这记载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关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历史是非,千百年来有许多史家进行过评述,如古代的胡安国②、叶隆礼③,当代的郑学檬④、谭其骧⑤、孙祚民⑥等。但这些评价主要集中在石敬瑭的行为是否是卖国行为,以及十六州的割让是否成为以后中原汉人政权屡遭北方异族入侵的主要原因上,而各家观点自有不同的论述角度,以致历千百年来迄无定论。本文的研究并不是想重新挑起这场论争,而是试图从石敬瑭割让燕云的历史背景入手,探讨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它对以后的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探讨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与狩猎农耕民族间的互动关系。

一、燕云十六州与中国北部的文化分野

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即:幽州今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涿州今河北涿州、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沦为官厅水库、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蔚州今河北蔚县。这一地区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是重要的地域分水岭,即燕山山脉——阴山山脉一

线。在它的南边，是中华民族主体的发源地——黄河流域，那里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在其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草原上频繁更替的游牧民族；而在其东北边则是半定居的狩猎农耕民族。这条分界线特别是燕山山脉的幽蓟地区，成为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因此本文探讨的重点也就集中在幽蓟地区。

从先秦开始，中原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就占有传统的优势。夏代的中原农耕部族主要生活在今河南、河北两省的黄河两岸，但到了商代，他们就已经进入今河北省的平原地区。尽管这时期的史料记载很少，但通过考古资料的辅助，仍可以看出当时幽蓟地区的民族形势：商族到达今河北省南部地区；秽人“散居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及今北京市房山县以南，山西代县以东至海之地”⑦；孤竹“在今河北省东境的卢龙县、迁安县一带”⑧；山戎“在今大凌河流域”⑨；貊人在今山东半岛北部地区并逐渐向辽东地区迁徙；肃慎在今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靠近燕山山脉地区⑩。从这些民族的分布可以看出，农耕民族或半农耕的狩猎农耕民族占了主导地位，貊人之所以选择向辽东地区迁徙，也是因为前后两个地区的生产方式比较接近。周代商以后，随着商族势力的衰退，貊人进一步向东北地区迁徙⑪，作为新的华夏民族主体的周人势力逐步向燕山山脉地区靠近，《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索引》曰：“后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也。”《春秋经传集解》卷二十二《昭公九年传》记有周王自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古燕地在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和河北的北部”⑫，可见此时幽蓟地区已经完全进入中原农耕民族的统治范围。

但这种优势很快就被打破。居住在“燕之东端，其西为营、平、无终、檀、蓟”⑬的山戎逐渐强大，并吞周围的小部落，开始频频对中原用兵，与之相邻的燕国首当其冲。山戎最盛时，甚至越过燕国向中原用兵。当时的黄河流域正是周氏衰落、春秋争霸的时期，因此最初对山戎的进攻缺乏



团结御敌的决心，使山戎得以肆意出入中原，先后进攻过郑国、齐国、鲁国、晋国、邢国。但是，在山戎经济生活中，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成分，但狩猎和畜牧仍是其主要经济形式，因此，其进入中原后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游牧、狩猎民族的掠夺式入侵；这就与中原农耕民族间产生了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齐桓公顺应时代的要求，任用管仲为相，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燕庄公二十八年（前663），“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遂伐山戎”[14]。在齐的打击下，山戎的势力渐趋衰落。经此事件以后，“尊王攘夷”正式成为春秋霸主最重要的政治口号，而“严华夷之辨”也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孔子即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可见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心理抵触情绪是根深蒂固的。

如果说“严华夷之辨”是中原农耕民族抵御游牧民族或狩猎农耕民族的心理防线，那么幽蓟地区就是一条地理防线。正是由于这条地理防线的存在，经过山戎事件以后，相应的心理防线才逐渐确立并日渐牢固起来。但是，幽蓟地区尽管以燕山山脉界限南北，是绝好的天然分水岭，两侧气候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心理也不同，但如果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形成对峙，冲突就不可避免。而从军事角度讲，游牧民族以其马背民族特有的优势，一旦突袭幽蓟地区成功，越过燕山以后，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和以村落方式分散居住的农耕民族必将遭到灾难性的洗劫。因此，要想守住幽蓟地区，就必须将防线向前推进，建立足够的缓冲地带。这项工作，最早也是由燕国完成的。面对接续山戎不断犯边的东胡，“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15]。秦汉时，中原王朝经略东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不但延续了燕国在东北的传统势力，而且进一步在东北地区推行郡县制，使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在内的广大东北地区进入中原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消除了来自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狩猎民族的压力。

二、幽蓟营[16]地区的胡汉融合

前人研究中国中古史，一般都会涉及河北地区民族的汉化、胡化问题，陈寅恪先生就对这一问题有过精深的论述[17]。本文无意继续这样的探讨，而是将幽蓟地区与辽西的营州地区结合起来考察，分析这样一个地区范围内的胡汉融合：幽蓟地区汉化、胡化的交替演进以及营州地区的不断汉化，最终使幽、蓟、营地区形成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取向的特殊地域。

辽西地区的汉化，可以追溯到古燕国时期。在秦开破走东胡燕国设立辽西、辽东、右北平等郡以后，燕地居民不断迁入东北，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杂居相处，中原封建文化迅速在这里传播，使东北南部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观。据建国后的考古发现，东北地区南部属于战国燕时的古城遗址有二三十座。当然，这时期的汉化还很有限，先进的汉文化主要表现在城址的中心地区。如目前所见到最北的燕城址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城内分布着具有典型燕文化特征的遗物，但在城外及周邻地区则分布着一种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土著文化（研究者认为是秽貊文化）[18]。秦统一后，东北大部分地区进入其势力范围，中原汉族对东北地区的开发继续进行。特别是战国末、秦末中原地区几经战乱，很多汉人为避战火进入东北地区，这些人甚至到了古朝鲜地区，“汉兴……，燕王卢绾反，入匈奴，（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都王险”[19]。到了东汉时，营州地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人口，据《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五的记载，“右北平郡，……户九千一百七十，口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五”，“辽西郡……户万五千一百五十，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辽东郡……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中原农耕民族如此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不可避免地加快了这一地区朝先进的农

耕社会前进的步伐，以至于两汉时期居住在辽西地区以游牧为主的东胡、鲜卑人也有了相对发达的农业。如乌桓，《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者，……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而《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则增加了"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在考古发现的乌桓遗址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农具，而这些农具大多是来自中原汉族（其上铸有汉字），说明乌桓人的农业是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农业技术可能是从汉人那里传入的。又如鲜卑，其"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20]。当然，农业在乌桓、鲜卑经济生活中还不占主导地位，但这毕竟是辽西地区此前以汉人为代表的农耕定居文化的延续。

两汉时期，乌桓利用汉与匈奴的矛盾，两次南迁。第一次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从乌桓山及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第二次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率众入居塞内，分布缘边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由于乌桓入居塞内，其与汉政权已经开始发生冲突，但由于汉政权的强大，双方基本"保塞无事"。到东汉末，随着汉政权的衰落，双方冲突增多，乌桓经常入侵边郡，趁中原变化之际，曾攻破幽州，略去汉民十余万。三国时期，曹操灭乌桓，但"鲜卑……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21]。鲜卑也不断入侵中原，《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掠徙幽冀三万余户，皆分以土地安顿。"综合以上所述，这一时期营州地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游牧或狩猎民族统治下的农耕经济区。

西晋末年中原丧乱，中原地区的汉人为避战火，开始流徙。其主要的流动方向应该是南渡，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北出塞外。"永嘉初（307），（辽东）附塞鲜卑……攻陷诸县，杀掠士庶……百姓失业，流亡归附（慕容廆）者，日月相继"[22]。"时两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同时重用汉人，修习礼法，"于是路

有颂声，礼让兴矣”㉓。根据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因为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流向塞外，使长城两侧（包括幽、蓟、营地区）的人民具有了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就为幽、蓟、营地区特殊地域化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随着魏晋以来的历史冲刷，中原传统观念中的“华夷之辨”理念也已日趋淡漠。《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传》就记录了这样的情况：“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为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同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也称，“记事参军封裕进言：‘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下层民众是如此，上层的高门大族也是如此，在他们的眼中，像鲜卑这样的民族政权与汉人地方政权并无两样，如“征虏将军鲁昌说廆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天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不尊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㉔而且，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多推行汉化政策，行汉家治国之法，如慕容廆即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㉕。并且也多以匡复晋氏相号召，如慕容廆即多次通书与晋太尉陶侃，主张“志匡汉室”。这些措施进一步拉拢了北方汉人士子的心，高门如河东闻喜裴嶷、渤海蓨人高瞻㉖，寒门如王猛、张宾等人都归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且，此时在品评人物时，也不以曾经附虏而有所贬抑。如右北平无终人阳裕，曾先后附于段辽、石勒、慕容皝，而范阳卢谌每称之，“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㉗。陈寅恪先生对这一历史状况有过简要的论述，他引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哀帝兴宁二年八月：“燕太宰（慕容）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士民，远近诸坞皆归之”，证明“未曾南渡的北人，既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长期统治，民族意识和其他关系转趋模糊”㉘。华夷观念的淡漠又为幽、蓟、营地区特殊地域化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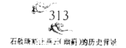
在十六国时期，幽、蓟、营地区的特殊地域化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历经北魏、北齐汉化、胡化的反复[29]，并未能有根本性变化。隋唐时期，中原王朝重新恢复大一统局面，并且收复了辽西、辽东地区，但是幽、蓟、营地区文化有异于中原的局面仍未有大的改变。武则天长安二年(702)，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成为唐代非汉族人士任幽州长官的第一人。长安四年(704)以夏官尚书唐休璟兼幽、营两州都督、安东都护。这两件事表明：一方面幽州地区胡汉界线进一步淡化；另一方面幽、蓟、营地区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已得到官方的认可。就唐代幽、蓟、营地区的特殊形势，谷霁光先生作出过精彩论述："从唐开国到安史之乱，差不多一百四十年光景，因为政变起伏，总与河北有关，以致双方隔膜，始终没有消弭；而河北的人民，也历受内患外忧的痛苦，无法过一种安定生活，自不免怨恨。固然在百四十年中，朝廷除嫉视与顾忌外，并未一贯地实施高压政策，大都还是怀柔；人民方面，也没有机会正式反抗，同时也可说没有反抗的基础。不过怨恨的痕迹，仍然存在，一遇着时机成熟，很足为祸乱爆发的推动力。至少在心理上，有了芥蒂，很可以促成事件的扩大。安史之乱，直接间接都与这种嫉恶的心理有关；如果要研究安史叛变的原因，便不能不注意这隐忧的远伏"[30]。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乱后，河朔藩镇形成割据之势，"邻道平居或相猜狠，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益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31]，以致朝廷屡次试图收复，而终不可得。"安史之乱后河朔地区的割据，一方面显示出中央与幽、蓟、营地区的联系在日益疏远；同时，也就表明幽州的割据、分裂倾向是在不断增强的"[32]。

五代时期中原再度崩析，黄河流域的统治权几度易手，甚至长期落入沙陀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原民族固有的"华夷"思想必然受到几近彻底的摧毁。代之而来的是地域观念的加强，而由地域相连，又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区域文化观念则更成为维系地区稳定的牢固纽带。幽、蓟、营地区就是这样。五代时期先后占据这一地区的刘仁恭、刘守光、周德威、赵德钧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独立状态，"卢龙诸州，自唐中世以来，自为一域，外而捍御两蕃，内而连兵河朔，其力常有余"[33]。这种独

立性不仅表现在当地的汉人势力有脱离中原王朝的倾向，同时也表现在当地的少数民族也有脱离北方塞外本部（外蕃）的倾向。例如赵德钧父子占据幽州的时候，在其军队中就有一支由数千契丹人组成的“契丹银鞍兵”，并且成为对抗契丹的劲旅。

三、再论契丹与征服王朝的成立

讨论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还必须分析作为入侵者的契丹的民族特点，也就是要分析契丹能够成为所谓第一个征服王朝的原因。“征服王朝”一词，最早是由魏特夫提出来的。最初是以这一名词总称辽、金、元、清时存在着的社会、文化上的二元性。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进一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王朝”的假说，将骑马民族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活在草原地带的所谓游牧民；另一类是生活在山林地带的狩猎民族演变而来的骑马民族。其中后一类原来是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但当成为骑马民族的时候，就已经过着半农耕、半狩猎的生活了，而正是后一类民族渐进式地从山林地带进入农耕地区，并在当地建立国家。同时，江上波夫还认为建立“征服王朝”的条件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骑马民族的机动能力，二是他们不仅仅发挥了军事上的优势，而且发挥了政治方面的力量㉞。森安孝夫则进一步分析了最早的征服王朝的建立者——契丹的发展史，深化了对建立征服王朝的北亚民族的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的认识：即想要直接统治南方农耕地带的意志和长期统治与自己生活方式殊异的农耕民族的能力㉟。综观这些论述，他们所提出的“骑马民族征服论”较好地概括了中国自隋唐五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冷兵器时代一个军事上占有优势地位的骑马民族征服农耕民族这一历史现象发生的深刻原因。但是，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来讲，他们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特别是割裂了征服民族两个必备条件的成熟过程与



中原农耕社会发展历程的联系。

森安孝夫认为：为什么只是到了契丹才产生了这样的意志和能力呢？主要就在于契丹社会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而阿保机统治下的农耕汉人又是怎样获得的呢？就是依靠对中国北方的掠夺。唐末五代的混乱这一历史条件与把据点建立在漠南这一地理条件，两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边境帝国的初期的契丹帝国便成立了。这两个条件（尤其是前者）长期地持续下去，它们便会成为促使王朝成立的重要因素[36]。揆诸历史，契丹民族逐步与农耕社会靠拢并不是如此简单的过程。在契丹族的早期，畜牧与狩猎是其主要生产手段，"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也"[37]。后来契丹不断南迁，开始接受农业社会的饮食、生活习惯，"献文时，使莫弗纥何辰来献，……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后告饥，孝文听其入关市籴"[38]。此外，契丹农耕文化的产生还受到了辽东另一个农耕民族的影响，即高句丽。"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句丽"[39]。隋唐时期契丹受突厥的袭扰，"贞观二年（628），其君摩会率其部来降"[40]，唐于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契丹族开始与农耕地区发生全面接触，特别是在营州地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入居营州的契丹人不堪营州都督赵文翙的侵辱，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等的带领下，起兵反叛。虽然唐朝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但其后幽州及其以北地区出现了许多契丹族的羁縻州县，暂时分散的契丹人更进一步获得了与农耕民族接触的机会。安史之乱以后，中原自顾不暇，河北割地自雄，更给了契丹族发展的良好时机；特别是唐末河北战乱时期，幽蓟地区大量人口循着前人的路线，到营州及其以北地区避乱，给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一时期契丹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与农耕地区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与营州地区农耕民族的融合，尽管也曾不断入侵塞内，掳掠人、畜，但掠夺的规模非常之小，取得的成果也非常之少。

在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以前，涅里、均德实、述澜等迭剌部首领都为在契丹社会中推行农耕业作出过贡献。根据《辽史》卷八十四《百官

志》的记载，“涅里教耕织”，这是契丹首领倡导农耕的最早记载，说明农业经济在契丹生活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至“皇祖均德实为迭刺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41]阿保机的伯父述澜以遥辇氏于越之官，继续“教民种桑麻，习织组”。[42]当然，“辽建国以前，契丹社会中虽然有过多次倡行农业的举措，但这并不意味契丹境内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43]。

契丹族农业经济大发展是在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以后。这一时期契丹农耕经济的发展则以军事掠夺汉人从事生产为主要特征。后唐天复二年(902)，阿保机一次就“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俘生口九万五千”[44]。此后，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契丹不断将中原北方人口迁回塞外。当然，除被俘汉人以外，还有不少是幽、涿等州的人民，因不堪北方藩镇割据势力的残酷迫害，而被迫逃亡到长城以外的契丹地区。此外，辽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天显三年(928)“迁东丹(渤海)民以实东平(今辽宁辽阳)”[45]，这些属于农耕社会的渤海人的内迁，也大量增加了契丹的农业人口数。正是由于契丹历史上与农耕文化的不断融合，当阿保机拥有大量农耕人口的时候，他就叫他们建筑城郭(投下军州)，在城郭内生产手工业品，在城郭外生产粮食。契丹族的农耕经济基本成熟了。

关于征服王朝成立的第二个条件：长期统治与自己生活方式殊异的农耕民族的能力，即政治上的二元体制的形成。魏特夫把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和契丹族作对比，认为两者在对待汉文化的态度上是不同的，一个完全被优秀的汉族文化所吸引；一个在被汉文化所吸引的同时，意识到游牧骑马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价值。结果一个本身崩溃了，一个建立了征服王朝。基于此，魏特夫进一步主张把北魏这一类的王朝命名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把辽朝这一类的王朝命名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46]。森安孝夫则认为辽的二元制来自汉人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对契丹的贡献，并认为这种二元体制的产生也受



到了渤海的影响，而渤海传统上就是一个具有对农耕者实行律令制和对狩猎者采用间接统治体制的“二元性”的国家[47]。这些论述都缺乏对历史延续性的认识。所谓二元体制的雏形，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十六国的建立者，不是早与中原汉地发生频繁接触，部分接受汉地农耕文化的近塞少数民族，如鲜卑；就是进入中原与汉人杂居共处的入塞少数民族，如匈奴。当他们趁晋末之乱建立政权时，胡汉分治的问题就早已出现了。他们的对策就是以中原汉制治理中原农耕民族，而设置单于台以胡俗治理少数民族。如《晋书》卷一百二《刘聪载记》：“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同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又《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专总六夷。这样的措施与所谓的二元体制是异曲同工之作。

至于魏特夫关于“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的划分，本文亦不敢苟同。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作为第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政权，它对中原农耕社会统治的成败得失，对“二元体制”的发展乃至成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北魏的失败，不能简单归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放弃。实际上，北魏政权的统治者是试图找到一条以鲜卑人为主的合二元体制为一的统治途径，它既要吸纳汉族势力特别是北方高门势力，又不容许他们的势力过度膨胀。《魏书》卷二十七《穆崇传》附《穆亮传》记载：“高祖（孝文帝）曰：‘世祖时，崔浩为冀州中正，长孙嵩为司州中正，可谓得人。”崔浩源出清河崔氏，是中原数一数二的高门，而长孙嵩是原鲜卑部酋的首领，两人各领一州，专司察举，正是北魏胡汉并重政策的鲜明写照。但是，由于鲜卑与汉人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两者共生的结果，是鲜卑人不可避免地走上汉化的道路，但这一点在政治上的表现又是鲜卑统治者所绝不容许发生的。所以当“崔浩想要建立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48]时，必然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要想利用单一体制稳固在黄河流域的统治，鲜卑人的汉化特别是国策上的汉化仍

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北魏的汉化政策,应当说是一贯的政策,非孝文帝所特创。不然,鲜卑部酋便在北方呆不下去,便须返回塞外。……从北魏前期崔浩与鲜卑贵族的冲突来看,似乎汉化与鲜卑不能相容,因此,孝文帝推行汉化,目光落到了如何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上,即如何使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合而为一,不仅使鲜卑贵族有政治地位,而且使鲜卑贵族有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统治,并进而并吞南朝。”[49]实际上,还是在追求一条合二元体制为一的新道路。但是,在总人口中处于绝对少数地位,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鲜卑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行使对占人口绝大多数,文化优越的汉人的统治权的,因此,当孝文帝的政策使少数鲜卑贵族与汉人高门结成新的统治势力的时候,那些本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普通鲜卑部民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许多原有的特权。于是,他们的反抗发生了。如《魏书》卷六十四《张彝传》所记:“(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此处所称原本可以“预在清品”的武人主要就是以鲜卑为主的少数民族下层部民。这样的反抗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北魏六镇的暴动,北魏政权也在这场动荡中倾覆了。

其后,高欢借六镇兵力建立北齐,大力推行胡化,但事实证明,面对文化积淀深厚的汉人,推行胡化的结局是必然失败的。与此不同,北周则从另一个角度继续了对合二元体制为一的道路的探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宇文泰和高欢都是承六镇鲜卑化集团反对魏孝文帝汉化政策而兴起的人物。只是宇文泰所凭藉的人才、地利,远在高欢之下。如果要与高欢抗争,一则须随顺当时鲜卑反对汉化的潮流,二则要有异于高齐的鲜卑化、西胡化,采取汉化的政策。而这种汉化又须有异于高氏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的二文化系统。……是要建立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50]实际上,所谓的建立“关陇集团”就是建立一支既不同于汉人也不同于胡族的新的统治力量。但在汉



人强大文化的冲击下,"关陇集团"同样不可避免地汉化了。最终北周政权也转入源出汉人的杨隋手中。

到了契丹势力强大以后,大量中原汉人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原因投附而来,他们为阿保机所重用,在阿保机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谋士集团。他们在契丹建国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建章立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如韩延徽,据《辽史》卷七十四《韩延徽传》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所创建的新的统治体制,必然是在总结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所得来的。因此可以说,契丹所推行的以南北面官制为核心的"二元体制"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经过长期实践所获得的成果。

四、石敬瑭割燕云(幽蓟)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历史舞台就上演了"石敬瑭割燕云"的一幕。石敬瑭为沙陀人[51],随后唐明宗征伐,有军功,明宗立,"拜敬瑭保义军节度使,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52]。时值五代华夷观念堕毁之际,这样一位靠武力起家的少数民族将领,企图利用后唐政权内部的变乱谋求帝位,这与自唐末以来形成的武人政治是一致的。考察当时的形势,对石敬瑭并不是十分有利:后唐方面,尽管李从珂(末帝)是弑逆上台,但武人出身的他仍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北方的契丹在太祖阿保机死后,尽管发生了耶律德光与东丹王突欲争位之事,但很快由耶律德光登位,即辽太宗,政局相当稳固。而且契丹利用中原军阀混战的时机,势力已接近幽州地区,"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53];同时,幽州地区的赵德钧父子虽表面上听从李从珂的调遣,实则别有异图,"欲倚契丹取中国,至团柏逾月,按兵不战,去晋安才百里,声问不能相通"[54]。而且,赵氏也向契丹派出了使臣,希望得到契丹的支持,"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指石敬瑭)常镇河东"[55]。

在这样的形势下，石敬瑭为了消灭政敌，取得帝位，于是开出了远比赵德钧丰厚的条件，去争取契丹的援助。

实际上，中原割据势力为了在与政敌斗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以卑词厚礼争取塞外少数民族势力的帮助是由来已久的。东汉末袁绍败亡，其子袁尚、袁熙就曾求助于乌桓。晋末丧乱，上至参与“八王之乱”的诸王，如成都王颖，下至割据一方的诸侯，如刘琨，都纷纷援引少数民族势力为助。到了北周、北齐时期，双方为了增加己方实力最终消灭对手，都积极讨好北方强大的突厥势力，“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各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竭生民之力，供其往来，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56]。以致突厥佗钵可汗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57]隋末各割据势力同样纷纷求助于突厥，如刘武周、梁师都。甚至李唐的建国，也获得了突厥的大力相助。在这些求助过程中，中原割据势力无不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如李渊在谋求突厥的援助时即曾向之称臣[58]。因此，当石敬瑭遇到强大的中原政敌的时候，自然也会想到向北方新兴的强大势力——契丹谋求援助。而其所列条件中，称儿源于胡族习俗，纳币源于长期的历史传统，割地是割让尚处于政敌之手并已半属契丹且有强大独立倾向的燕云地区，这些对于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统治者而言，都不构成难题。

当然，石敬瑭割燕云(幽蓟)这一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是深远的。纵观辽以下的中国历史，其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辽时代幽、蓟、营地区特殊化地位的稳固。辽太宗在获得了燕云地区以后，全面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和“因俗而治，得其宜矣”[59]的基本国策，经过长期的努力，燕京逐渐成为南北交汇的中心和连接南方农耕地区与北方牧区的支撑点。到辽末，“燕人——汉人，自上而下早已安于辽的统治了”[60]。“汉人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实行契丹化，其次是契丹人的大量南来汉人地区，实行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



一，汉人即‘契丹’、‘契丹’即汉人”[61]。但是，幽、蓟、营地区安于辽的统治并不表明这一地区特殊化地位的丧失，恰恰相反，经过一段稳定期以后，这种特殊化倾向反而加强了。如《金史·世宗纪下》记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帝称：“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流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即使是在农耕民族政权统治这一地区时，也不能清除这种地区心理。如明朝统一中国后，太祖利用“南北榜案”之机，大力拉拢北方士人，成祖进一步迁都燕京，并终生致力于恢复北方疆域，重新夺回作为幽蓟地区屏障的辽西、辽东地区。但这一切都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当吴三桂将山海关这一地理防线献于满人时，淮河以北的民族心理防线随之崩溃，满人轻易问鼎中华，而所谓的“坚决抵抗”大都发生在江南地区。

其二，南、北面官制的推行，标志着“二元体制”的基本成熟，为以后各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当然，它的具体操作形式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仍然在不断变化。例如，辽之所以不能进一步占据中原，即在于其推行二元体制的不彻底，当它越过燕云地区以后，就放弃了以汉法治汉人的政策，转而暴露出游牧民族的本性，实行野蛮的“打草谷”政策，从而引发了两种生产方式内在的冲突，最终使辽的势力限制在燕云地区。以后金、元、清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多有改易，但其核心思想即既要接受汉文化以统治汉民，又要维持本民族自身文化特点却始终没有改变。当然，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势文化面前，这种政治层面的顽抗必不能长久，而一旦丧失这种抵抗，所谓“征服民族”也就不可避免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三，争夺幽、蓟、营地区成为胡、汉政权据有黄河流域的关键所在，自辽以后，任何一个想稳固统治黄河流域的政权都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同时，真正的地域上的文化分水岭却长距离地南移到江淮一线。一方面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军事实力对比随着战线的延伸以及地域环境的变化，此消彼长而达到均势状态；另一方面，江淮以南是农耕经济长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地区，因而两种文化、两种生产方式上的根本冲突也

极大地限制了北方势力的南下。相反，由于地域防线的丧失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经营，整个黄河流域人民对北方民族入主的抵制心理却已大大消减了。当然，这条新的地域防线也并非不可逾越，当南北双方因各种原因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优势一方就会越过这条分界线而统一全国，元、明、清三代都是如此。

其四，周边少数民族迅速汉化，今天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逐渐形成。随着北方地域上的文化分水岭的打破，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错杂居；同时，由于幽、蓟、营地区这样的特殊地域形式的存在，消除了杂居共处民族间的心理隔阂。这种文化共生的结果，使落后民族融入先进的民族中来，这一点是传统社会各民族的统治者都不曾想到的，如“女真的改从汉姓出自民间，虽禁而不止”[62]。从这个角度讲，称华北地区为中华民族的大熔炉是绝不为过的。而且，正因为华北模式的存在，统一中原的王朝就有可能把它推广到周边各个民族地区[63]，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融合、扩大[64]。

注释: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天福元年十一月条。

② 见《契丹国志》卷二。

③ 见《契丹国志》卷三。

④ 见《关于石敬瑭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⑤ 见《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5期。

⑥ 见《石敬瑭的评价及有关民族关系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4期。

⑦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158页。

⑧ 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81页。

⑨ 同上，186页。

⑩ 关于肃慎早期居址，各家观点不一，此处为作者观点，详见拙文《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⑪ 关于貊人的分布问题争论颇多，本文采用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的观点，140页。



⑫ 见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分卷主编丛佩远，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162页。

⑬ 见苏轼《执掌春秋图》，转引自《东北历史地理》，187页。

⑭《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⑮《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⑯ 本文所称营州地区，实际包括了以营州为中心的辽西以及辽东地区的西南部。

⑰ 详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

⑱ 详见程妮娜主编《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28—29页。

⑲《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

⑳《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乌丸鲜卑传》。

㉑ 同上。

㉒《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传》。

㉓ 同上。

㉔ 同上。

㉕ 同上。

㉖ 当然，如高瞻，虽附于慕容廆，尚以“华夷之异”而不肯为官。

㉗《晋书》卷一百九《阳裕传》。

㉘ 同前引《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38页。

㉙ 同上。

㉚ 谷霁光《安史乱前的河北道》，收入《谷霁光史学文集》第四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90—191页。

㉛《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宪宗元和四年七月条。

㉜ 白燕生《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国书店，162页。

㉝《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贞明三年八月条下胡三省注。

㉞ 详见（日）佐佐克明著，斯华摘译《江上波夫教授谈“骑马民族征服王朝”》，《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

㉟ 详见（日）森安孝夫著，海兰译《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

㊱ 同上。

㊲《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

㊳《北史》卷九十四《契丹传》。

㊴《北史》卷九十四《契丹传》。

㊵《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

㊶《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

㊷《辽史》卷二《太祖纪·赞》。

㊸ 详见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6页。

㊹《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㊺《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㊻ 详见（日）村上正二《征服王朝论》，方广昌译，《民族译丛》1982年第4期。

㊼ 同前引森安孝夫著《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

㊽ 同前引《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52页。

㊾ 同上，254页。

㊿ 同上，308页。

(51) 石氏很可能是在沙陀中配为部落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参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收在《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335—346页。

(52) 同前引《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308页。

㊼《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天福元年十一月条下胡三省注。

㊽ 同上。

㊾ 同上。

㊿《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

㊵《周书》卷五十《突厥传》。

㊶ 参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突厥事》，收入氏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㊷《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㊸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153页。

㊹ 同上，158页。

㊺ 同前引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146页。

㊻ 明清两朝所进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就是通过将中原的统治方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存在方式相结合来完成的。

㊼ 详见贾敬颜《"汉人"考》，收入前引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



第三编　关系史

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
——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唐朝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①。因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联兵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本文拟择其大端就此略加阐述，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

实际上，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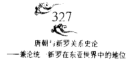
例如，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泉盖苏文之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击杀荣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

高句丽，太宗答以“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②。虽然泉盖苏文桀骜不驯，唐太宗还是觉得“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稍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③。明年六月，太常丞邓素从高句丽出使回来，请增怀远镇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④。仍遣使册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显然，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黩武之人。

然而正在这时候，新罗遣使者上书，告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⑤。但盖苏文已攻取新罗城池，并不听从唐朝命令。尽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犹豫，恐怕师出无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书李勣主张讨伐⑥。由于“新罗数请援”⑦，唐太宗才决定亲征高句丽。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⑧。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⑨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⑩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⑪ 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



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作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道与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道与平安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联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视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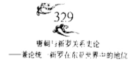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惟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

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惟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靺鞨兵侵其(指新罗)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曾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刘仁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高句丽兵蛇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



之。”[28]

新罗在受到高句丽、百济乃至日本夹击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拉动其介入半岛事务，先灭百济，再平高句丽；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国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传统意识，一方面对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另一方面又适时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丽那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达到了在韩半岛上实现统一的目的。显然，从地区政治或韩半岛的角度来看，唐初的介入不过是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丽、百济、新罗四角关系中，新罗后来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赢家。

二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以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飡入唐谢罪”[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致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战关系终于被渤海国的成立所打破。渤海

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作出积极反应。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一)政治关系

唐、罗双方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正常的封贡和使节往来㉜。每次新罗王薨逝，必遣使来华告哀，唐朝皇帝则为之辍朝举哀，并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吊慰，追赠故王官爵，赙赠锦彩等物。同时，新罗国新王登位，也必请加册命，唐朝皇帝则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册立，加封新罗王官爵，册新王之母为太妃，妻为妃，并赐王以旌节，赐重臣以门戟，赐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㉝。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㉞。

新罗所派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实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唐㉟。质子在唐遣使至其本国时，常充当副使。《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六载新罗质子金士信奏言云：“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常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藩，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诗，称赞新罗质子金少卿充副使归国的光彩，足为唐朝化纳质这一消极手段为加强双方情谊之积极手段的例证。



(二)经贸活动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进行的私人贸易两种。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后来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贸易也大大发展了。

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极为频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一百二十六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三十四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一百六十次之多[36]。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罗时亦如之。统一新罗成立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统一新罗时期，韩、中两国间的交通空前发达。《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朝的对外交通有七条大道，其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新罗。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信道共有五条。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降至九世纪，由于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两国的官方贸易也逐渐衰落了。于是，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37]，可见民间贸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当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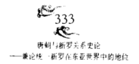
统一新罗方面，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保皋[38]。张保皋不仅官居要职，而且拥有庞大的商业船队。他的船队在新罗、唐、日本三国间进行大宗贸易，还从事客商的运载。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张保皋在山东半岛上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还拥有寺院和庄田。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

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唐朝为了接待众多的新罗商人和侨民，还在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立了勾当新罗押衙所，所内并设有通事，从事翻译。

(三)人员往来

新罗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罗关系密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对新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唐的对外开放政策及与新罗的友好关系，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众多的新罗学生、僧人、商人、农民、士兵纷纷来唐求学、求法、经商、务农、从军，其中有不少人定居于唐，终老唐土。在唐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学生最多。他们毕业后可参加宾贡科考试，考中的可任唐官。这些宾贡进士的归国，使得汉文化在新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新罗的文化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新罗的大文学家崔致远。崔致远，号孤云(或海云)，新罗京城沙梁部人，新罗景文王五年(857)生，家世无考。自小精明好学，十二岁渡海入唐自费求学[39]。乾符元年(874)于裴瓒榜下及第，时年十八岁。曾游历东都洛阳，寻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节度使高骈辟置幕府，专掌文翰。广明元年(880)高骈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以致远为巡官达四年之久。后奏除殿中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中和四年(884)充国信使东归，侍宪康王、定康王为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崔致远在唐颇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主要有《桂苑笔耕》一部二十卷，该书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另外还有骈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僧人的大批来华[40]，使得中国各大佛教宗派纷纷传入新罗。韩半岛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槃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禅宗分立于九迦智、宝相、桐里、阇堀、凤林、狮子、圣住、曦阳、须弥山)除了须弥山开创于高丽王朝初年，其余均开创于新罗时



期。在统一新罗赴华僧人中，著名的有义湘、慧超、地藏、无相等人。其余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罗法华院内的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罗人，他们中除四名禅僧外，其余全是法华僧。该院的念诵、讲说的仪式，同时兼有新罗和中国的寺院的特点，“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41]。

除了留学生和僧人，还有大量的新罗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总之，八、九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新罗人的身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来，为唐、罗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文化交流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发达的汉文化对新罗乃至韩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一新罗对汉文化的大力吸收，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罗学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双方政府间文化交流更直接促进了新罗的发展。史书上记载了大量政府间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42]。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43]。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圣德王兴光卒，唐“遣左赞善大夫邢琫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琫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琫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处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琫之副。琫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琫等金宝及药物等。”[44]此事足可为两国友好往来之佳话。

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中国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

时，新罗的国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唐中书门下设执事省，其下设六部。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在经济制度方面，新罗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新罗还仿唐建立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教育制度，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深浅来选拔官吏[45]。这自然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统一新罗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汉字，但汉文记录的毕竟不是新罗人自己的语言。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创造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的方法——吏读。吏读文字的创制，使新罗人民得以用本族语讲解大量汉文书籍，从而使新罗人学习汉文书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他们的作品达到了很高水平。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均有诗收于《全唐诗》中。当然，新罗最重要的诗人则是崔致远，千年以来他一直被韩国历代学者尊为韩国汉文文学的鼻祖。此外，统一新罗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同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46]。如唐都长安的建设布局，就为新罗都城建设所吸收。

其实，唐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有关地区流通体系。实际上，古代东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唐朝与新罗的交通也可以视为伟大的丝绸之路的东向延伸，外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经由此路传进新罗，再由新罗传到日本[47]。当然，韩



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经由此路传进亚洲内陆乃至更远的世界。这些还是较新的课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三

近年学界利用日本国史所记载的使节往来、国书、礼仪等内容，研究唐代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48]。尤其是东亚各国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的所谓“小中华”意识问题[49]，值得进一步讨论。

引起人们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条史料，《续日本纪》卷十九《孝谦天皇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癸卯朔[50]，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51]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52]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53]日本国史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其中不少疑点值得深究[54]，甚至其真实性也不无可疑之处[55]。然而这条史料在东邻却被一些学者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广泛引用，因而应当有所辨正：

首先，据《通典》所载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时，“设诸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于东方朝集使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异位”[56]。尽管蕃客等位与蕃国君长的品阶有关[57]，日本未受册封，无等级以寄言，但在唐朝国史《四夷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传》中[58]。所以，元正朝贺时，日本不可能与新罗分别位于东、西两朝列。同样，吐蕃与大食也不可能各分东、西。《续日本纪》的上述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争长事件，开元“十八年(730)，(突骑施)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

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59]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突厥使者的主张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旧一视同仁，东、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及百僚议"。像《续日本纪》所说由殿值将军察言观色随意调换班序，简直如同儿戏，在律令制国家礼仪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谓"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种美梦回味或由"小中华"意识导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说《隋书·东夷倭国传》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反映了韩半岛三国分立时期的对倭关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罗积极推行统一战略，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至（贞观）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龙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国势受到重挫，而刚刚成立的统一新罗却蒸蒸日上，国势日隆。据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罗遣使的保护下从唐朝回国的，他们回国时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罗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时也用新罗的送使船到唐朝，当时新罗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罗遣使唐朝[60]。只是从大宝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变了原来的入唐航路，由新罗道改走南岛路[61]。据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转换航路，就是想改变旧有的依存新罗的传统体制，直接与唐朝交往，吸取先进文化[62]。据《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至肃宗上元（760—761）中，还因"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可见，上述《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总之，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统一新罗与唐朝之关系密切，统一新罗



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

另一方面，就与唐朝的关系而言，统一新罗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三十五《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记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劦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63]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64]。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其文略云：

> 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65]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

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66]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九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67]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够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致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 主要是统一的韩民族从此开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鲜以及半岛三韩和以高句丽为代表的夫余涉貊系诸族究其渊源分属两大族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在檀君和东明两种始祖说。总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汉译本）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朝鲜部族的形成》，三联书店，1962年，50—53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资治通鉴》及正史皆为此本），6181页。



③ 同上，6202 页。

④ 同上卷一百九十七，6198 页。

⑤《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0 页。

⑥ 参《新唐书·东夷高丽传》，6188—6189 页。

⑦ 同上，6189 页。

⑧《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5 页。

⑨（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汉城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 年，77 页。

⑩《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6260 页。

⑪ 同上，6287 页。

⑫《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259 页。参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三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7 年，144 页以下。

⑬ 参《三国史记》卷三十四《杂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条，352—354、356—358 页；同书卷三十五《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条，359—363 页；同书卷三十六《杂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条，369—373 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 年，另附图。

⑭ 参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汉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47—49 页。

⑮ 主要是《昌宁碑》、《北汉山碑》、《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见《新罗：真兴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编《新订〈三国遗事〉附录》，9—15 页，附于氏编《（增补）三国遗事》，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 年。

⑯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 页地图。

⑰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49 页。其实百济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陆地上受到强烈排挤有关，其意图不外是便于凭借海路联络盟友以抵抗进攻，如后来在“白江口之战”中然。只不过圣王当时百济所遭受的陆上进攻不光来自新罗，还有高句丽，见《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武宁、圣王》，264—265 页。

⑱ 参千宽宇《伽耶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 年，44—52 页。

⑲ 见《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72 页。

⑳《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0 页。

㉑《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 页。

㉒《资治通鉴》卷二百，6329 页。

㉓ 同上。

㉔ 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的记载，当年唐将苏定方伐百济，曾于扶余扶苏山下以白马钓江中蛟龙平息风浪，故江曰白马，韩国人至今称之。汉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称为白村江，未知何故。东邻学界曾有大量论著论及“白村江之战”及其历史作用，其实许多人连什么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体位置都没有搞清楚（参郑孝云《古代韩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白江战斗”的问题点与对外关系》，汉城学研文化社，1995 年，177—185 页；森公章《“白村江”以后》，东京讲谈社，1998 年，105 页）。仔细研究有关地志的记载，可以肯定，白江（《三国史记》卷七作“白沙”，显为形近致误）或白马江专指锦江中从扶余扶苏山到江景拐弯处这一段；而所谓“白江口”也和“熊津江口”一样，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

而是指两段江水的连接处，那里往往有渡口作为分界的标志；扶余丰所据的周留城只能在他屯兵的白江口附近。对"白江口之战"相关问题，本人拟另撰专文考论。

㉕《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2页。

㉖《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69页。

㉗ 同上，71页。

㉘ 同上，71—72页。

㉙《隋书·东夷传》史臣曰，1829页。

㉚《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72页。

㉛《资治通鉴》卷二百二，6378—6379页。

㉜ 权德永《古代韩中关系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

㉝ 参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第四章第一节《统一新罗之繁荣与西海》，汉城三知院，1990年，290—305页。

㉞《三国史记》卷九《新罗本纪第九·景德王》，104页

㉟ 参上引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299页表8。

㊱ 见赫治清《历史悠久的中韩交往》，收入《韩国学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0页。

㊲ 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八外臣部互市门，开成元年六月条。

㊳ 参《新唐书·东夷新罗传》附张保皋传。

㊴《桂苑笔耕》序。

㊵ 见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190页。

㊷《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页。

㊸ 同上，5337页。

㊹ 同上。

㊺《三国史记》卷十。

㊻ 参蒋菲菲、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50—154页。

㊼ 参拙文《也谈所谓"黑貂之路"——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收入《中韩日文化交流与互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韩国全南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1999年，4—14页。

㊽ 如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汲古书院，1998年。

㊾ 参酒寄雅志《华夷思想的诸相》，收在《亚洲之中的日本史》5，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

㊿ 原文作"朔癸卯"，原编者指出《日本纪略》朔在卯下，是。

51 "大"字，原编者据《日本纪略》补，是。

52 "实"，原编者以为当作宝。

53 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前篇，吉川弘文馆，1997年，219—220页。

54 参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载《日本学》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页。

55 参沈仁安《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



⑯ 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二十三《开元礼纂类十八·嘉礼二》,中华书局点校本,3151页。

⑰ 参《大唐六典》卷十八"典客署令丞"条。

⑱ 参两《唐书》四夷传。

⑲《旧唐书·突厥传》下,5191—5192页。

⑳ 参福田忠之《古代日本华夷思想与东亚国际关系——以国书、仪礼问题为中心》第1节《日本与新罗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2000年,9页。

㉑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7页。

㉒ 参铃木靖民《对新罗关系与遣唐使》,见氏撰《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235页。

㉓ 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后篇,吉川弘文馆,1997年,448页。

㉔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4页。

㉕ 原文作"鞅羯",显为手写之误。

㉖ 转引自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韩国古代史资料集》,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年,204页。

㉗《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中京大定府有"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482页)。然据同志,中京大定府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才建成,而统一新罗早已于935年灭于王氏高丽。因此,中京朝天馆的接待任务很可能是从前契丹与新罗关系的遗存。

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显庆五年（660）初，因百济恃高句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唐朝求救。三月，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同时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同年八月，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然而不久，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复据周留城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在白江口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于彻底覆灭①。有关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国际学界尤其是韩、日学者已有许多讨论。可惜的是，实际上迄今为止对这一事件相关的史实认定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许多人甚至连什么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体位置都没有搞清楚②，这难免会对认识事件的真实意义有所影响。本文即想结合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经验，先就有关地理问题略作考证，再对此战的历史影响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一、地理问题考证

（一）关于白江

首先涉及到的是名称问题。唐罗联军歼灭倭、济联军的地点是在白江口，水名白江，中、韩史料记载相同（《三国史记》卷七作“白沙”，显为形



近致误）。日本史料中却称为白村江，未知何故[3]。白江的全名为白马江，韩国人至今称之。位于江边的扶余扶苏山顶有一座泗沘楼，其面江横匾上就写着“白马长江”四个大字。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记载，忠清右道公州镇扶余县有古迹名“钓龙台：自虎岩顺流而南至于扶苏山下，有一怖石跨于江渚，石上有龙攫之迹。谚传，苏定方伐百济，临江欲渡，忽风雨大作，以白马为饵，而钓得一龙，须臾开霁，遂渡师而伐之。故江曰白马，岩曰钓龙台”。钓龙之说固不可信，但传说至少表明这段江水本名白马而非白村，且得名早在白江口战役之前。1999 年 8 月我受韩国国际交流财团（Korea Foundation）资助到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访问研究，期间由东洋史研究生李永玉陪同前往百济故地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结识了那著名的钓龙台。我们乘船溯江而上去踏查扶余扶苏山城——古百济王国的最后都城。船靠岸后，为了观察当年作战的形势，我走到崖壁尽头并登上了江边突入水中的一块巨石，船夫见状便告诉我，那巨石名叫钓龙台。我当时并未在意，而且显然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传说了，因为当地并没有标出这个景点，参观路线也不经过那里，而是一下船便引导人们直接上山。后来阅读史料我才认识到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它显然是渡江作战攻打壁立山崖的一个重要立足点。东亚传统以龙喻天子或国王，古人又常以白马为祭祀的牺牲[4]，所以我推测上述传说是以钓龙喻灭国，所反映的史实很可能是唐将苏定方曾于江边杀白马誓师攻灭百济，江名就由此而来。

其次是有关白马江的地理位置或地域范围的问题。同上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扶余县山川有“白马江：在县西五里，良丹浦及金刚川与公州之锦江合流为此，江入林川郡界为古多津”。换言之，白马江只是锦江中游一部分江水的名称，今韩国地图对白马江的标识就是如此，只是涉及范围略有差异[5]。那么，白马江究竟是指锦江中游的哪一部分，或者说它的地域范围有多大呢？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百济复国运动中几次重要战事包括白江口之战地点的确定。从上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可知，白马江应由良丹浦及金刚川与公州之锦江三水合流

而成。同书同卷在扶余县山川条下还明确记载:"良丹浦,在县西七里,源出罗所岘。"在早年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那一带在恩山川东流汇入锦江的地方标着"白江"两个字。因此我认为,恩山川就是古代的良丹浦。可是同书同卷在扶余县山川条下又明确记着:"金刚川,在县北二十三里。"就是说,这段三水合流涉及到至少是南北二十三里的地段,白马江的上游起点应该在扶余县北二十三里的金刚川⑥汇入锦江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所记定山县山川也有"金刚川:在县西三十二里,源出青阳县于乙项川,入白马江,又见扶余县"。显然,金刚川是扶余和定山两县间的界河。不过,白马江却不止就这么一段,据上引文,它还应该包括向南流入林川郡直到古多津的一段。

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七记载,林川郡山川有"古多津:在郡东二十九里,水势险恶。江景津:在郡东三十里,恩津县界。菁浦津:在郡南二十二里。南堂津:一名龙渊浦,在郡南十四里古多津下流,岸北有舍人岩。上之浦津:在郡南三十里。以上六津皆公州熊津下流,入韩山郡为镇浦"。林川郡东、南两面的江水都叫古多津,可见古多津就是从郡东二十九里到郡南十四里这一段大约四十余里江水的名称。另一方面,古多津与江景津都在林川郡东,相差只有一里,显然是隔江两岸对同一条江的不同叫法。江景津应当就在今锦江下游大拐弯处的江景邑附近,古多津也应该在此附近。林川郡东南为恩津县,东北为石城县。《(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石城县山川也有"古多津:在县西十二里,详(见)林川"。显然,古多津于石城和林川为界河。从该书有关郡县四至的记载可知,石城"北至扶余县界十七里",林川"北至扶余县界十六里",两者大致处于同一纬度。那么,白马江流入林川郡境内至少也还有十六里长⑦。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扶余县"南至林川郡界二十里"。据此我们可以求得白马江的全长大致为:扶余县北二十三里+扶余县南二十里+林川郡内十六里=五十九里,其上游起点在金刚川汇入锦江处,下



游终点在林川郡(今扶余郡林川面)古多津。不过,这里应该声明,由于江水并非直流,文献记载的数字也不尽准确,我们推算的白马江长度只具有相对意义,仅供研究参考。

(二)关于白江口

《旧唐书·刘仁轨传》记白江口之战有这样一段:"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于是,很多人就把当年发生战争的白江口理解为锦江的入海口,其实不然。因为,白江既然是白马江的简称,白江口自然也应该与白马江有关。如前所述,白马江下游止于古多津,古多津以下至入海口的锦江下游则被称作镇浦。《(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九,舒川郡山川有"镇浦:在郡南二十六里,海浦也。自林川古多津至舒川浦通谓之镇浦,其间诸津、浦皆镇浦之渡涉处"。据此,古多津也应得名于当地的一个渡口,这也是汉语"津"字的本意。总之,锦江的入海口距白马江还很远,因而是不可能叫做白江口的。

那么,白江口究竟在哪里呢?白江口一名又从何而来呢?我认为,史料中所谓的白江口就是白马江的下游终点(即出口)古多津,当年的战事就发生在古多津、江景一带。所谓"白江口"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两段江水的连接处,那里往往有渡口作为分界的标志。除了上一节对白马江地域范围的讨论外,我作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还有两条:一是翻检《(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有关部分,没有把河水入海处称作口的例子,凡是与此有关的地方都是称作浦,这也正是汉字"浦"的本意。如该书卷十七,韩山郡山川有"瓦浦:在郡南十四里,即大海之别浦。芽浦:在郡南二十里舒川郡地界,镇浦下流;又曲岘之水及舒川郡金富县、庇仁县茅洞之水合流于此入海"。二是熊津江口的例子。熊津江即今锦江,在白江口之战以前,还发生过一次熊津江口之战。《资治通鉴》卷二百唐高宗龙朔元年三月条略云:"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余众。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故

将福信聚众据周留城，迎故王子丰于倭国而立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仁轨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百济立两栅于熊津江口，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余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粮尽，引还。”《旧唐书·东夷百济传》的记载是：“道琛等于熊津江口立两栅以拒官军，仁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之，贼众退走入栅，阻水桥狭，堕水及战死万余人。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所谓百济府城即扶余城。刘仁轨由熊津趋扶余，一路转斗而前，百济为抵御唐罗联军立两栅于熊津江口，其地必然在熊津、扶余之间而不会在下游入海口处。所以我认为，这个熊津江口应该就在白马江的上游起点附近，如前所述，那里金刚川汇入熊津江（锦江）的地方，也是熊津江与白马江两段江水的接合部。

那么，史料记载白江口之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中的“海水”如何理解呢？其实，这是由于海水内浸所致而并非因为地处海口。如前引《（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九所说，舒川郡“镇浦：在郡南二十六里，海浦也。自林川古多津至舒川浦通谓之镇浦，其间诸津、浦皆镇浦之渡涉处”。我们已经考证林川郡古多津就在恩津县江景津附近，而江景津即今天的江景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十八记载恩津县山川还有“江景山：在县西二十六里。江景浦：在江景山下，海浦也，详林川郡。市津浦：在市津县，商舶所集，连樯接桅，人物杂沓互市，故名”。据同书可知，市津为恩津旧名。可见海水内浸已经到了江景甚至古多津，在这一带看见海水是很正常的，不必一定要到江水入海口处。而且，所引资料也表明，江景一带可以停驻大批船舶，完全符合史料所述白江口之战倭军有船四百艘的条件。

（三）关于周留城

据史料记载，唐罗联军在战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精心的策划，“于是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



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8]。加林即后世的林川，白江口在其附近。唐水军想绕过作为水路要冲的加林城去攻周留，那么，周留城显然还在更下游更靠近海口的地方。

白江口的位置确定以后，周留城的具体位置值得讨论的主要是两处，它们都位于靠近海边的舒川郡境内：一处是位于东北的忠化面周峰麓山城，另一处是位于西南的韩山面乾芝山城[9]。简单说来，我倾向于肯定前一种意见，因为除了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之外，《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元年(662)还有一条史料有助于对周留城地理位置的判断：

> 冬十二月丙戌朔，百济王丰璋、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阙名]朴市田来津议曰："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桑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于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旦泾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衣食之源，则二仪之奥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与！"朴市田来津独进而谏曰："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后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隘，守易而难攻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遂不听谏，而都避城。

州柔即周留，避城即扶余。1999 年 8 月我野外踏查经过扶余和舒川郡南部，韩山面已经属于内浦平原边缘，比较起来，我以为忠化面那边地势更为险峻，更符合史料所描述的周留城的情况，也更像是从东北方向熊津出发的唐、罗联军水陆夹击的对象。况且，如果周留城在韩山，那么，不仅前来进攻水军需要绕开白江口附近的加林城，陆军也需要绕开正当其道的忠化面周峰麓山城，这种战略设计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历史影响问题

白江口之战消灭了新罗的宿敌百济，孤立了高句丽并最终导致其灭亡，从而使新罗得以实现自己的统一目标。如统一新罗的文武王金法敏所说："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⑩从东北亚全局战略来看，白江口之战是新罗以其连横击破了百济的合纵，新罗的统一是在沉重打击并彻底遏制倭国的军事干涉和政治扩张后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对白江口之战及其历史意义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东邻日本，更有大量著述论及，有人甚至认为这次战败对于日本国家发展的影响超过了此前的"大化改新"⑪。这些学者切入问题的视角颇有启发性，尽管其观点不无讨论的余地⑫。我这里想说的是，这场战争对于日本和唐朝中国双方来说，其历史影响完全不同。换言之，白江口之战的结果对于唐朝社会发展并没有产生对日本那样的影响。实际上，这场战争对于参战的唐军来说只是一场遭遇战，唐朝既然在战前没有计划与倭军在白江口进行战略决战，战后也不可能对倭国展开经略。

（一）唐初东北亚经营的重点在丽不在倭

本人曾在《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⑬一文中指出，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就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⑭。到太宗之子高宗临朝，唐朝



与高句丽于永徽六年(655)首次发生直接冲突,当时"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5]。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百济既平,唐军班师,留郎将刘仁愿、刘仁轨等分守百济府城与熊津城,安抚其余众。时苏定方奉诏伐高句丽,进围平壤,不克而还。高宗敕书与刘仁轨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金春秋之子,新罗文武王,661—681年在位)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可见,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

接到高宗的敕书后,唐军"将士咸欲西归"。在这种情况下,刘仁轨就唐朝的东北亚战略对唐军将士作了明确的陈述:

> 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当出师命将,声援才接,凶逆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拔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16]。

可见,无论是唐朝皇帝还是参战的唐军将士,都未曾以倭国、倭军为意。唐朝只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与高句丽发生冲突,才被新罗拉进了半岛事务之中。在唐初的东北亚战略中,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对倭国的军事经略,这一点在白江口战争的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

(二)白江口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

《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述白江口之战始末:

俄而余丰袭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浮海以为之援。仁师既与仁轨等相合，兵士大振。于是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以进。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从所引史料记载可知，唐罗联军经精心策划后，原本想绕过位居水路要冲的加林城去攻打作为百济复国运动中心的周留城，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在加林城附近的白江口与倭兵水军发生大战。显然，这场水战完全出乎唐水军的意料之外。对唐军而言，在白江口与倭军作战纯属不期而遇（这显然也是史料用"遇"字记述其事的本意）。

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可知，唐罗联军对百济往请高句丽及倭兵之事是了解的，战前对加林附近的情势也是清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最后却在加林附近的白江口发生了这样一场遭遇战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唐朝东北亚战略的重点在北不在南，在高句丽不在倭，上下均不以倭国倭兵为意。唐人的这种意识，只要对比一下《旧唐书·百济传》有关同一场战争的记载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扶余丰觉而率其亲信掩杀福信，又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遂与仁愿之众相合，兵势大振。于是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进，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降，百济诸



城皆复归顺，孙仁师与刘仁愿等振旅而还。

孙仁师兵发东莱，中路所破为高句丽之兵无疑，于是“兵势大振”，以为前无强敌。所以，白江口的倭兵在这里也成了“扶余丰之众”，即使战后料俘，也被视为百济的附庸。因而战争一结束，唐朝大队人马就凯旋班师了。

（三）所谓“战后唐朝对倭国的活动突然积极起来”等问题

《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记载，白江口战后的下一年，即664年“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此后665年、667年、669年、671年均有唐使使倭[17]。据此，日人西岛定生认为：事实上，以白江口的胜利为契机，唐朝方面对倭国的活动也突然积极起来；这些使团有的一次竟达船四十七只、人员两千，因而根本不是和平使者，而是全副武装前来威吓的使团。他甚至把666年唐高宗的泰山封禅也和白江口的战胜联系起来[18]。很显然，这些看法所据多出自战败一方倭国的感受，并不完全是客观事实。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这些唐人出使，决不见于汉文史籍。而且664年夏五月的所谓“百济镇将刘仁愿”也是不存在的。如前所述，白江口战后，刘仁愿和孙仁师就率大队唐军班师回国了，只留下刘仁轨镇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这都是龙朔三年（663）九月的事，而且，“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所以，刘仁愿已经回到国内是无可怀疑的。直到麟德元年（664）冬十月，因镇将刘仁轨上表陈情，“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可见，《日本书纪》的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史料明确记载，白江口战后，“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孙仁师与刘仁愿等振旅而还”，毫无乘胜追击直捣倭军黄龙之意。这一做法无论从唐

朝东北亚战略，还是从白江口战役的遭遇战性质来看，都是符合逻辑可以理解的。刘仁轨留镇百济故地的任务，据旧本传："初，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涂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如刘仁轨陈情表所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兵士）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19]当时高句丽尚"倔强边徼"，唐军疲兵镇守百济唯恐不及，岂能远至倭国无事生非？

最后，其实当时唐朝对倭国/日本[20]还很缺乏了解，因而也根本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的经略。请看《旧唐书·日本传》的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所以，《日本书纪》所提到的白江口战后频繁的唐人使团，即使真有其事，也只是表明战后人们对未知地域进行了解的迫切心情罢了。

注释：

① 参《旧唐书》刘仁轨传、东夷百济传。又检《资治通鉴》卷二百至二百一有关记载，几与《旧唐书·刘仁轨传》全同。

② 参郑孝云《古代韩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4章第2节《"白江战斗"的问题点与对外关系》，汉城学研文化社，1995年，177—185页；森公章《"白村江"以后》，东京讲谈社，1998年，105页。

③ 我很怀疑白村江一名只是白马江一名的讹传，因为日文里"村"字训读作mura，



"马"字也可读作 muma,音近易误。但白村江作为专名在日语中却读作 hakusukinoe。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今天已难于考知。

④ (俄)E. N. 杰烈维扬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曾提到古代民族中的一些例子:"由于契丹人企图强占阿骨打亡兄的赠马,几乎引起了一场冲突。死去的撒改也曾以白色御马陪葬。假如我们还记得中国人和那乃人均以白色志丧、通古斯人皆以白马祭献林神的话,那么,上述最后这一情节则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蒙古人那里,马在动物崇拜中占有重要位置。许多蒙古氏族和布里亚特族,正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都起源于赤马。南朝鲜也曾有个部落自称"马韩"。直到不久以前,在朝鲜还保留着这样一种习惯,送葬时在灵架上放有白马像。这是一种避邪符。在一些为开业举行的仪式中,马也是中心角色。马,特别是白马,也是一种祭祀用的动物[注 239 : U. V. 约诺娃《朝鲜人宗教仪式中的图腾崇拜残余》,155 页]。"(294 页)

⑤ 如经大韩测量协会审查,由 Dooroo Communications 编制出版,韩国文化观光部韩国观光公社发行的《忠清南道观光地图》(1998 年 11 月 5 日)就是如此,它把同一条河在扶余南、北的两段都标成了白马江,可是仍把更上游和下游海口附近标作锦江。

⑥ 在早年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那一带东流汇入锦江的河名为琴江川,我推测那就是古代的金刚川,不过是对同一条河名音译所用汉字不同罢了。

⑦ 这是最保守的算法,即古多津到扶余界的垂直距离,实际情况应有所不同。如果白马江是从林川正北入境的话,据现有数据测算,它在林川境内的直线长度可能增加一倍,最长达三十三里多。

⑧《旧唐书·刘仁轨传》。

⑨ 参郑孝云《古代韩日政治交涉史研究》,178 页。

⑩ 见(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汉城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 年,72 页。

⑪ 参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第二部第三章第四节《白村江战败的历史意义》,东京校仓书房,1976 年,172 页以下;同作者《白村江——东亚的动乱与日本》,东京教育社,1986 年,182 页以下;森公章《"白村江"以后》,14—15 页。

⑫ 参西岛定生《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年,120 页以下。

⑬ 载《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155—171 页。

⑭《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77 页。

⑮ 同上,6287 页。

⑯《旧唐书·刘仁轨传》。

⑰ 参田溶新译《(完译)日本书纪》,汉城一志社,1993 年,492—500 页。

⑱ 参西岛定生《日本历史的国际环境》,120 页以下。

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高宗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条。

⑳ 据《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倭国更号日本,自言近日所出。"(74 页)

围绕着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唐日外交

熊义民

（暨南大学历史系）

朝鲜半岛位于中日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与中日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其内部政局的因革变化自然也就不断地受到中日两国的影响和密切关注。公元四世纪以后，朝鲜半岛上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格局，三国互不相让，彼此攻掠不止。进入七世纪，三国的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不断升级，并且逐步形成了高句丽联合百济夹击新罗的新形势。为了打击对手，增强自己，三国均积极地寻求外援，协调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从而使半岛地区内部的争端逐步扩大为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纠纷。

一、唐日的介入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

六世纪中后期，新罗崛起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它先与百济联合北伐高句丽，得胜后又反戈一击，俘杀百济圣王，独占汉江流域，遂与高句丽、百济结下深仇。新罗在向北扩张的同时也在向南发展，并于公元 562 年消灭日本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任那官家”，驱逐其势力，以致日本钦明天皇临死时还执其太子之手说：“朕疾甚，以后事属汝。汝须打新罗，封建任那，更造夫妇，惟如旧日，死无恨之”①。隋时新罗曾结盟隋朝，共讨高句丽，并乘隋军东进之机，夺取高句丽五百里地②。唐初，新罗国力稍衰，高句丽、百济乘机反攻复仇，新罗势单不支，惟远交近攻，屡屡遣使唐朝，勤



修职贡，结好大唐。唐初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也很关注东北形势，尤其是高句丽日益倔强，唐朝更需要在东北结纳与国，于是自然就和新罗走到了一起，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

日本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海上，隔朝鲜海峡与大陆相望。在古代航海技术原始落后的时期，朝鲜半岛及其沿海是日本与大陆先进经济文化地区的最主要通道。对于日本来说，朝鲜半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自古以来日本就与朝鲜半岛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统治实力衰败以至崩溃时，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曾大为扩大。据高句丽《好太王碑》记载，日本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曾在朝鲜半岛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影响所及几达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碑文中说："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十年庚子(400)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十四年(404)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倭寇溃败，斩煞无数。"[③]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虽然失败了，但其势力并未被完全驱逐出去。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侵略扩张不可避免地要与朝鲜政权发生矛盾冲突，尤其是与半岛东南靠近日本的新罗矛盾冲突尖锐。另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统计，从公元前 50 年至公元 500 年，倭人进犯新罗三十次，其中十九次在公元 300—500 年间，曾四次(232年、346年、393年、444 年)围攻新罗都城金城(今庆州)，但皆不克而还[④]。进入六世纪，新罗利用矛盾北逐高句丽，西攻百济，独占汉江流域；南灭任那，驱逐日本在半岛的势力，从而与高句丽、百济、日本三国结下不解之仇。日本不甘心被逐出半岛，571 年钦明天皇临终前遗嘱皇太子要攻打新罗，600 年日本以境部臣为将军率军进攻新罗，攻陷五城，恢复任那一度取得了成功，但日军一退，任那又立即再度被新罗收复。日本恢复任那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但它恢复任那之心并未泯灭。

百济在半岛内部的纷争中，虽然先后与高句丽和新罗为敌，但它与日本的关系则一直处于相对友好的状态。史载"(百济)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腆支质倭八年，405 年"倭王以兵士百人卫送"腆支回国

即位[5]。腆支即位后，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前引《好太王碑》也记载"百残（济）违誓，与倭和通"。面对新罗的崛起和壮大，百济和日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贞观年间，百济与新罗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但百济进攻新罗为唐朝所不容，于是百济调整了与高句丽的关系。此时高句丽西北与唐朝尖锐对立，南与新罗为敌，处于唐朝和新罗的南北夹击之中，为了摆脱战略困境，解除后顾之忧，也极需要寻求盟国。于是高句丽和百济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很快就捐弃前嫌，结成同盟，双方还积极与日本沟通联系[6]。此时日本与唐朝虽没有直接地冲突和敌对，但由于日本与新罗的矛盾和对百济的传统友谊，很自然地使日本在东北亚战略格局中站在百济、高句丽一方反对新罗和唐朝。至此东北亚遂形成了以唐和新罗为一方，以百济、高句丽和日本为另一方的两大军政集团的对峙状态。

二、唐日白江之战和百济灭亡

公元623年，随日本遣隋使到大陆的惠日等人历经数年后回到日本，上奏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7]。但当时日本政局动荡未能及时派遣遣唐使，七年后当舒明天皇政权稳定之后，才于630年派遣第一次遣唐使，并于次年即贞观五年（631）到达长安。《旧唐书·倭国传》记载说：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在遣唐使回国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但高表仁此行"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返"。《日本书纪》卷二十三记载高表仁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八月到对马，十月到达难波津，日本"遣大伴连马养迎于江口，船卅二艘及鼓吹、旗帜，皆具整饰，便告高表仁等曰：'闻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时高表仁对曰：'风寒之日，饰整船艘以赐迎之，欢愧也。'于是令难波吉士小槻、大河内直矢伏为导者，到于馆前，乃遣伊岐史乙等、难波吉士八牛引客等入于馆，即日给神酒。五年春正月己卯朔，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



归国，送使吉士雄摩吕、黑麻吕等到对马而还之。"从日方记载可知高表仁在日本活动长达四个月，日方接待甚为隆重，虽无记载送行仪式，但将其送出国境亦符合礼仪，这与《唐书》的记载有所矛盾，原因何在呢?我以为应与唐日双方名分争执有关，日本不肯向唐朝称臣，唐朝也不能容忍日本分庭抗礼的对等原则。高表仁在日本四个月不得要领而还，故《唐书》说其"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返"，日本也就淡淡地将其送出国境而已。唐日之间第一次外交往还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但双方关系并未破裂，唐朝也仅推说高表仁"无绥远之才"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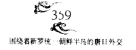
与唐日关系冷淡相对应的是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激化。百济与高句丽结盟后，双方不断地进攻新罗，新罗亦不断地向唐朝求救，唐朝在外交干涉无效后被迫作军事介入。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但因高句丽顽强抵抗而无功而返，唐军后又几度用兵均无所建树。唐军的无能致使百济更加有恃无恐地进攻新罗。此时日本也对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外交干涉。大化二年(646)日本遣使高向汉人玄理至新罗责令停止由新罗、百济取代任那对日本所作的有名无实的进贡，并要求新罗提供人质[8]。新罗面对百济、高句丽的联合进攻和日本的外交干涉，乃不断地遣使唐朝求救。唐太宗一方面对高句丽施加军事压力以牵制其对新罗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同意新罗改从唐朝正朔和衣冠制度，希望以唐朝的声望来吓阻百济等对其进攻。果然新罗为了对付日本的外交压力，乃与651年派使者着唐服赴日本，向日本暗示新罗有唐援可恃。日本朝廷对此极为震怒，史载"恶恣移俗，訶啧追还"，甚至"巨势大臣奏请之曰：'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9]，日罗关系更加紧张了。

唐高宗即位后，百济为了缓和与唐朝的紧张关系，了解唐朝新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乃于651年遣使朝贡唐朝。虽然太宗遗诏罢辽东之役，但高宗却未改变唐对东北的传统政策，这从高宗赐百济义慈王的玺书里也可看出。在这篇玺书里，高宗明确要求百济义慈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并威胁说"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悔"[10]。次年百济虽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无法改变唐朝的东北政策和唐罗关

系，遂对唐朝绝望，转而加强与高句丽的联盟，并于655年与高句丽和靺鞨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表称："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已没三十余城"⑪。

面对朝鲜半岛日益紧张激化的局势，日本为了了解大陆强权唐朝的东北政策及唐罗关系的紧密程度，乃打破二十多年的唐日冷淡，于653年五月派出第二次遣唐使。此次遣唐使分乘两船前往，有一船遇难，另一船使者到唐朝完成使命后于654年七月返抵日本。史载"西海使吉士长丹等共百济、新罗送使泊于筑紫。是月褒美西海使等奉对唐天子，多得文书宝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长丹以华下，赐封二百户，赐姓吴氏；授小乙上副使吉士驹以小山上"⑫。遣唐使吉士长丹等因"奉对唐天子，多得文书宝物"而受嘉奖，"多得文书宝物"放在后面说明此是其出使的一大收获，而非主旨。"奉对唐天子"史无明言，今已无法知其详，但作为其受嘉奖的首要原因，当说明此次遣唐使的首要使命是与政治外交密切相关，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从遣唐使有百济、新罗送使返国来看，实际情况应是百济刚刚对唐外交失败，希望其传统友邦日本予以协调，缓和其与大唐的紧张关系；新罗则因为备受高句丽、百济的进攻，损失惨重，虽然与日本有外交冲突，但关系尚未破裂，还希望日本能与唐朝一起协调半岛局势，缓和其压力。

另外，我们从日本朝廷对与唐联系的急迫心情上也可看出遣唐使所负的重要的政治外交使命。当日本朝廷接到第二次遣唐使有一船遇难的消息后，不等抵唐的遣唐使返国，就于654年二月派遣第三次遣唐使。第三次遣唐使"分乘二船，留连数月，取新罗道，泊于莱州，遂到于京，奉觐天子"⑬。永徽五年（655）十二月日本"遣使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升器，高宗降书慰抚之，仍云：'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⑭。第三次遣唐使河边臣麻吕回国后没有像第二次遣唐使吉士长丹那样受到嘉奖，显系其使命完成得



不如第二次好。吉士长丹在唐的活动，唐史无记载，今已不得其详，或许唐朝当时鉴于其西北形势危急而对吉士长丹的外交使命给予了某种友好的表示，故其回国后受到天皇的嘉奖。但河边臣麻吕所得到的却是高宗要其出兵救援新罗，这与日本在半岛的利益南辕北辙，故从其外交使命来说应是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当与唐朝西北局势缓和，注意力转向东北有关。

从唐朝方面来讲，高宗或者当时未察觉日本在半岛的战略取向，或者已知，但由于日罗关系尚未破裂，自诩为"万国之主"[15]的高宗以大国之尊要求日本也按其战略行事，正如唐太宗当年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明知高句丽与百济通和，共侵新罗，还要"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16]，无非是为了体现其天朝上国之尊罢了。日本朝廷并不甘心其遣唐使外交使命的失败，又于齐明天皇三年(657)"使使于新罗曰：欲将沙门智达、间人连御厩、依网连稚子等付汝国使，令送到大唐。新罗不肯听送，由是沙门智达等还归。西海使小花下阿昙连颊垂、小山下津臣傴偻自百济还，献骆驼一个、驴二个"[17]。有人认为"这显然是根据百济的请求所施展的一种外交战术，目的是对唐朝做工作，企图在唐与新罗之间打进一个楔子"[18]。实际情况当是日本在接到唐朝的玺书之后，感到唐朝的战略与其在半岛的利益相悖，在深知大唐实力，不便与其公开决裂的情况下，希望寻求一种有利于自己及百济的妥协。从百济赠送骆驼和驴来看，百济当已接受和支持其外交行动。但新罗在查知日本的战略意图后感到与其利益相悖，遂予以拒绝，由此导致两国关系正式破裂。

日本外交失败后，百济遂再次动用武力，于 659 年 4 月遣将进攻新罗独山、桐岑两城，新罗则又遣使入唐求救。面对半岛战火再起，为了阻止或延缓唐朝的干涉，日本于 659 年 7 月派出第四次遣唐使。《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五年条所引《伊吉连博德书》对此次遣唐使的行程作了详细的记载，他们走南路，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进京，于 10 月到洛阳觐见高宗。但"12 月 3 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

罪。事了之后，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逗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显然日本此次遣唐使的使命再次失败了，甚至在唐朝还因"谗言"而被判刑。"谗言"为何？史未明言，从其使命来看，当与他们收集唐朝出兵百济的政治军事情报有关，后经申诉获释，但唐朝依然将其扣留，幽置经年，才予以放还。可能唐朝得知日本意图，为了不影响唐罗联军进攻百济之役，遂不顾外交礼仪将日本遣唐使扣留。

百济在高句丽和日本的支持下数侵新罗，史载"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削新罗，破邑屠城，略无宁岁"[19]。于是，新罗向唐求救之使相望于道。唐朝原先采取的打击高句丽的迂回政策不能解决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唐高宗不得不调整战略，响应新罗要求，直接派兵渡海与之联合攻灭百济。660 年 3 月唐"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20]。关于此战，百济使者向日本报告说："今年 7 月 10 日，大唐苏定方率船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21]百济灭亡后，苏定方于 9 月 3 日留郎将刘仁愿率所部唐军一万人驻守百济，以新罗兵七千佐之，自统大军押解百济君臣返唐。

百济灭亡不符合日本利益，所以在唐军主力班师回国后，百济遗臣一面频频遣使向日本求救，一面起兵抗唐。660 年 9 月 5 日百济使者到日本求救，10 月又遣使献唐俘一百余人，并请求送回在日本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其表称"唐人率我蝥贼来荡摇我疆埸、覆我社稷、俘我君臣，而百济国遥赖天皇护念，更鸠集以成邦。方今谨愿迎百济国遣侍天朝王子丰璋（即扶余丰），将为国主"。日本齐明天皇不仅答应其请求，还出兵助其复国，为此下诏说："乞师请救，闻之古昔，扶危继绝，著自恒典。百济国穷来归我，以本邦丧乱，靡依靡告。枕戈尝胆，必存拯救，远



来表启，志有难夺。可分命将军百道具前……宜有司具为兴之，以礼发遣。”[22]甚至还“以织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23]。日本先后数次派兵支援百济，据考证总兵力多达四万人[24]。而且日本也应高句丽之请，命令支援百济的日军牵制在百济的唐军，阻止其从南方配合辽东的唐军夹击高句丽[25]。鉴于新形势，唐朝也先后两次派兵增援留守百济的刘仁愿。先是“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26]。但刘仁轨到百济后兵力太弱，不足以抗衡日本百济联军，乃继续向国内求援，于是唐高宗又“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27]，唐日矛盾迅速激化，终于走上了兵戎相见的道路。663 年 8 月双方联军在白江口爆发了大战[28]，唐罗联军大胜，日本扶持百济复国的希望破灭，百济遂平。

日本救援百济之役为时数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惨败而归，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惊慌。日本深恐唐军乘胜渡海进攻其本土，于是一方面接纳安置百济逃难而来的臣民，一方面增设国防设施，加强战备。自 664 年开始，日本花费巨额资财先后修筑了四道防线，即以对马、壹岐、筑紫为第一线，长门（今山口县）为第二线，赞岐的屋岛城（今香川县屋岛）为第三线，大和的高安城（今奈良县的高安山）为第四线[29]，于是对唐朝进入了惊恐万状的防御状态。

三、唐日关系的改善和高句丽的灭亡

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记载，天智天皇三年（664）“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冬十月乙亥朔，宣发遣郭务悰等敕。是日，中臣内臣遣沙门智祥赐物于郭务悰，戊寅，飨赐郭务悰等。……十二月甲戌朔乙酉，郭务悰等罢归”。郭务悰访日，两唐书不载，《日本书纪》记载简略，所进表函及礼物的内容今已无法知其详，惟《善邻国宝记》所引《海外国记》将郭务悰在日本的经过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现引述如下：

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三十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通信侣、僧智辩等来，唤客于别馆，于是智辩问曰："有表书并献以物否?"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辩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辩等称筑紫大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赍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30]

据此可知郭务悰到达对马岛呈递将军牒书后五个月日本才以太宰辞为名宣达日本天皇敕旨：以镇将私使为名拒绝其入京奏事。但郭务悰并没因此扬帆返回，到十二月日本才又以镇西将军的名义正式复函一封将其打发回去。日本为何迟至五个月后才拒绝其入京奏事?八个月后才复函打发其回国?史无明载，但从当时东亚的国际形势来看，当是日本朝廷对郭务悰此行的目的深具戒意使然。郭务悰此行究竟是来交好，还是别有所求，刺探日本的防务情况?这对刚从百济大败而还，深恐唐军进攻的日本来说自然感到疑心忡忡。但是如果将其严辞驱逐出境，不仅毫无缓和余地反而可能招致唐军的立即进攻，这对正在大力加强西部国防设施的日本来说也极为不利。因此日本朝廷既不愿其进京奏事，以免其了解更多的日本防务情况，又不敢将其驱逐出境，在这种矛盾的心理支配下，一时难觅良策，只得就地赠物赐宴，殷勤款待。当看到唐军并没采取什么新动作时才借口其为私使不允其进京，最后以镇西将军的名义回函一封礼送其回去。



那么唐朝为何要在唐日白江之战半年后，唐日隔朝鲜海峡紧张对峙之时派使访日？郭务悰真的是百济镇将私使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从当时东亚的形势来考察。660年唐军虽灭了百济，但对高句丽的战争却极不顺利。百济残军在日军支援下与高句丽遥相呼应，牵制新罗军和留守百济的唐军，使其不能北上进攻高句丽，使唐军无法充分发挥南北夹击高句丽之利，这是导致唐军661年进攻高句丽失败的重要原因。663年白江战役后，日军虽败退回国，百济平定，但唐日尚隔朝鲜海峡紧张对峙。且唐军留守百济的并不多，直接统治百济的政策难以为继，不得不日益依靠一些亲唐的百济旧贵族官僚，但他们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传统联系，如果不能切断来自日本的鼓动支持，很难保证他们不再次发动反唐复国运动。正如刘仁轨所言："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壤不胜，熊津又拔，则百济之烬复炎，高丽之灭无期。"[31]因此要稳定百济形势，尤其是在决定以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掌管百济旧地时，更需要调整唐日关系，缓和日本的反唐情绪，减少其对百济反唐势力的支持，以便唐朝能集中精力南北夹击高句丽；同时了解日本国内形势对于唐朝调整其东北亚政策也甚为必要。在此形势下，缓和唐日关系已经成了唐朝东北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遣使日本也就势在必然。但是，鉴于唐日外交上的名分礼仪之争和当时的敌对状况，直接由唐朝廷遣使，不便于打开紧张僵持的唐日关系，故以百济镇将私使的名义，绕开唐日外交上的名分礼仪之争，遣使访日就甚为必要。

郭务悰使日的目的虽然未能实现，但基本摸清了日本朝廷的矛盾心理，于是唐朝遂于翌年正式以朝廷的名义派遣刘德高使日。《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记载天智天皇四年(665)"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等(注曰：等谓右戎卫郎将上柱国百济祢军、朝散大夫柱国郭务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月廿八日至于对马，九月廿日至于筑紫，廿二日进表函焉)。冬十月己亥朔己酉，大阅于菟道，十一月己巳朔辛巳，飨赐刘德高等，十二月戊戌朔辛亥，赐物于刘德高等，是月，刘德高等罢归。是岁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云云(注曰：等谓小山坂合部连石

积、大乙吉士岐弥、吉士针间，盖送唐使人乎）。"由此可知刘德高是在郭务悰的陪同下访日的，其使团规模也比郭务悰的大将近一倍，且到达筑紫，但是否进京，史无明载。日方对刘德高的接待规格远不如当年对高表仁的接待，但也赐宴赠物，不失礼仪。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刘德高访日期间，日本在菟道（今京都府宇治市）举行大规模阅兵活动，其目的何在？显然是向唐使展示日本的实力，以威慑可能的唐军攻日行动，同时提高日本在日唐外交谈判中的地位。从刘德高返回时日本遣使相送并访唐来看，刘德高的使命基本完成了。虽然日本对唐军依然充满戒心，但也不希望继续恶化双方的关系，甚至也希望实际了解唐朝形势以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日使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在唐的活动情况，史书缺载，无法考察，但唐日之间总算由紧张激烈的军事对峙到通使往来了。

666 年 5 月正当唐日关系稍有缓和之时，高句丽政局发生变动，长期专权反唐的莫离支泉盖苏文死，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降唐，唐高宗遂利用此一时机，大举东征，唐军数道并举，经过两年多的征战，至 668 年 9 月攻破平壤，生擒高句丽王高藏及其大臣泉男建等人。

当唐丽战争正酣之际，667 年 11 月"百济镇将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己巳，司马法聪等罢归，以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大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翌年正月"送使博德等复命"[32]。唐日使者彼此送往不断，目的何在？从日本在筑紫设都督府，并在 667 年 11 月下诏修建国防工事来看，日本朝廷对唐朝戒心甚重，加强战备之意甚明，遣使显然是为了查明唐丽战争局势。唐朝则是在面对不断加强战备的日本，为免除遭受日军意外的背攻，乃以送使为名，既行交好又监视其军备情况。另外，刘仁愿在 666 年 12 月受任毕列道行军总管，参加进攻高句丽的战争，668 年 8 月在会攻平壤时"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33]。刘仁愿后期原因史无明载，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百济既要北攻高句丽，又要南防日本偷袭，不敢公开迅速将大



军北调,故经申诉得以免死。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唐日隔朝鲜海峡对峙戒防的情况。最终日军没有行动,高句丽也因内忧外患和孤立无援而亡国。

四、唐罗军事联盟的瓦解及东北亚新格局的形成

665年8月,在百济平定,高句丽尚存时,唐朝为减轻自身负担,调整对百济的政策,由直接统治改为间接统治,委任原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掌管百济旧地,并强令新罗与之会盟。然而,新罗却"盟会之事虽非所愿,不敢违敕"[34],至此唐罗关系出现裂痕。但此时高句丽尚存,双方联盟的基础尚在,故666年4月新罗遣使唐朝,请兵进攻高句丽。668年9月高句丽灭亡,双方联盟的基础随之消减。新罗原本就与百济、高句丽领土争执激烈,今唐灭高句丽,又裂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这就与新罗对百济、高句丽的战略发生了冲突。新罗不仅希望在战后收复被百济、高句丽夺去的土地,更希望灭掉竞争对手,独霸朝鲜半岛,这却与唐朝战后对百济、高句丽的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起初,鉴于唐朝实力强大,新罗采取悄悄地蚕食百济、高句丽旧地而不公开与唐朝为敌的政策,但唐朝并不容许,屡加切责。新罗为消除矛盾,于669年5月派角干(官名)钦纯、波珍飡(官名)良图入唐谢罪。唐朝为了惩戒新罗,许角干钦纯回国复命,却留囚良图,以至良图终死唐狱,双方关系紧张。670年3月双方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至此,双方由矛盾冲突发展为局部战争,直至676年唐朝退出朝鲜半岛为止。

鉴于与唐朝矛盾日益加深,新罗调整了对外政策。还在高句丽国都平壤被攻破前,新罗就遣使日本,主动恢复已断绝十几年的新罗日本关系。从日本迅速派使回访来看,日本与新罗的关系应该说是迅速得以恢复。新罗和日本在高句丽灭亡的当年迅速恢复外交关系的原因何在?从战略上讲,唐灭百济、高句丽后处于鼎盛时期,唐挟战胜之余威,自然构

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面对这一形势，日本、新罗为了抗衡唐朝，自然会相互接近，更何况此时新罗接到情报说："国家（指唐朝）修理船艘，外托征伐倭国，其实欲打新罗"[35]。这一消息无疑会给日本和新罗造成巨大的压力。或许正是由于新罗收到这一情报后，权衡利弊，为免除孤立被动挨打，迅速将其通报日本，使本来就对唐朝充满疑惧的日本迅速采取行动，一方面调整与新罗的关系，迅速派使回访新罗，加强联系[36]，另一方面派出遣唐使去实地了解唐朝的形势，同时在国内亦下诏加强战备。《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八年（669）条记载："是岁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新唐书·日本传》则记载："咸亨元年（670），遣使贺平高丽。"由此可知此次遣唐使河内直鲸应是669年底以"贺平高丽"为名，于670年到达唐朝。此时唐朝东与新罗矛盾日益加深，西与吐蕃争战不息，670年7月大非川之役，唐军大败，西北形势恶化。河内直鲸何时回国史无明载，相信他在唐朝不难了解到这些情报，毕竟当时长安外国留学生、商旅众多，消息来源甚广。

对于唐朝来说，由于西部形势恶化，东与新罗矛盾激化，即使有心讨伐日本也无力出征，因此缓和对日关系当为要务。671年正月"百济镇将刘仁愿[37]遣李守真等（到日本）上表。秋七月丙申朔丙午，唐人李守真等、百济使人等并罢归"[38]。李守真此行目的何在？为何有百济使人同归？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李守真应是去日本对其深以为戒的"征伐倭国"的消息予以解释，并带亲唐且原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百济新政府的使节一起去协调对日关系，以取得日本支持，对抗新罗的蚕食，否则唐朝当不会容许百济使节私访日本。当此之时，新罗于671年7月在百济旧地置所夫里州（今忠清南道夫余），10月新罗击唐漕船七十余艘，活捉郎将钳耳大侯及士卒百余人，唐军沦没者不可胜数[39]。唐与新罗在百济旧地的争夺日益激化了。在此形势下唐朝再次派郭务悰使日。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记载：671年11月"对马国司遣使于筑紫大宰府言：月生二日，沙门道



久、筑紫君萨野马、韩嶋胜娑婆、布师首磐四人从唐来曰：唐国使人郭务悰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卌七只，俱泊于比知嶋，相谓之曰：今吾辈人船数众，忽然到彼，恐彼防人惊骇射战，乃遣道久等预稍披陈来朝之意”。从郭务悰小心谨慎来看，他此行的目的绝非对日本实行威慑[40]，也不可能是去输送百济难民[41]。从当时的战略形势来看，他所带的众多的人船当是为了防止新罗从海上予以拦截。实际情况应是他从国内出发时使团及护卫共计六百人，但到百济后，由于新罗拦截唐朝漕船获胜，为了免于被新罗拦截，遂追加一千四百人护卫。

道久等四人何时到唐朝史无明言，但他们从唐朝随同而来，自然了解唐朝此时的形势，亦清楚郭务悰使团的情况，所以当他们提前说明后，日本就顺利地接待了郭务悰使团，不似七年前将其堵在对马岛。另外郭务悰到达日本时，正巧遇到日本天智天皇去世，当他接到这个消息后，“咸着丧服，三遍举哀，向东稽首。壬子，郭务悰等再拜，进书函与信物”。日本新天皇对其诚意也迅速作出了回应，“夏五月辛卯朔壬寅，以甲胄、弓矢赐郭务悰等，是日，赐郭务悰等物，总合絁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绵六百六十六斤。庚申，郭务悰等罢归”[42]。从日本对郭务悰的厚赐来看，郭务悰此行的目的基本达到，唐日关系也大为缓和。但赏赐之巨，且有甲胄、弓矢等兵器，亦让人感到郭务悰此行除了敦睦唐日邦交之外，还另有所求。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推测他可能还负有到日本就近采购军需物资的责任。此前，新罗拦截唐朝漕船成功，驻百济唐军当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补给困难，为防患于未然，遂迅速派出大船队到日本商洽采购，从郭务悰所率船数与人数之比也可看出这一点。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比较发达，隋朝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造“五牙”大舰，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一船可乘七八百兵士；隋炀帝巡游江南，建造各种船舶九千艘，其中最大的龙舟高 15 米，长 40 米，有一百二十个房间[43]；就算造船技术相对落后的日本的遣唐使乘坐的船只也“可以容纳一百二十人到一百六十人左右”[44]。我们即使按每船一百人的运载量计算，四十七艘船也与两千人不成比例，也就是说郭务悰船队有大量的空余载重量，

这也暗示出郭务悰到日本负有运输物资的任务，否则用不着如此庞大的易致误会的船队。对于日本来说，此时由于皇位继承矛盾而造成政局不稳，当然不希望再得罪本来就对之充满敬畏的大唐，以免引火烧身。日本与新罗的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双方由于地缘和历史结成的仇怨很难在短期内彻底解决，何况日本希望尽快缓和唐日矛盾甚至赢得唐朝的友谊，以便学习、输入先进的唐文化，故许唐使之请。于是，唐日关系开始转向缓和与友好发展。

随着中国西北吐蕃扩张的加剧，唐与吐蕃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670 年，唐军在青海大非川败于吐蕃之后，西北局势更趋紧张，唐朝已无力兼顾东北，遂于 676 年退出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故地南部，新罗则逐步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双方以大同江为界形成对峙。此后不久，唐朝由于内外局势的变化，与新罗也改善了关系，东北亚遂出现了唐、日、新罗三国鼎立的长期稳定新格局。

注释:

① 《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三十二年。

② 《新唐书·高丽传》记载盖苏文对唐使说："往隋见侵，新罗乘衅夺我地五百里，今非尽反地，兵不止。"

③ 碑文见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六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④ 参见沈仁安、林铁森《大化前代史史料述评》(下)，见《日本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⑤ 《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阿莘王条和腆支王条。

⑥ 参见韩昇《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一卷，1995 年，234 页。

⑦ 《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⑧ 《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二年九月条。

⑨ 《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白雉二年条。

⑩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5331 页。

⑪ 同上。

⑫ 《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白雉五年条。

⑬ 《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白雉五年条。



⑭《唐会要》卷九十九倭国条，1770页。

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5330页，唐高宗赐百济义慈王玺书。

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条，6215页。

⑰《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三年条。

⑱ 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92页。

⑲《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百济传》，5333页。

⑳《资治通鉴》卷二百唐高宗显庆五年条，6320页。

㉑《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条。

㉒《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六年条。

㉓《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元年条。

㉔ 石晓军《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2期。

㉕《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记载，齐明天皇七年(661)"日本救高丽军将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天智天皇元年(662)三月"唐人、新罗人伐高丽，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

㉖《资治通鉴》卷二百唐高宗龙朔元年条，6323页。

㉗《新唐书》卷二百二十《百济传》，6201页。

㉘《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2791—2792页。

㉙ 参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83—84页。

㉚《善邻国宝记》8页，见《殷礼在斯堂丛书》。

㉛《新唐书》卷一百八《刘仁轨传》，4082页。

㉜《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六年、七年条。

㉝《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6197页。

㉞《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

㉟《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

㊱ 参见古畑徹《七世紀末から八世紀初にかけての新羅·唐関係》，《朝鲜学报》第107辑，1983年4月。

㊲ 前述刘仁愿因后期，召还，流姚州，此当因百济形势紧张，又再度起用。

㊳《日本书纪》卷二十七天智天皇十年条。

㊴ 参见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

㊵ 或以为郭务悰此行的目的是威慑日本，参见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28页，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二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94页。

㊶ 关于郭务悰此行的目的，池内宏认为是去输送百济难民，参见池内宏《百濟滅亡後の動亂及び唐·羅·日三國の関係》，《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十四，132页，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昭和九年六月。除上述两种观点外，日本学者还提出

了几种说法，如威压说、支持近江朝廷说、送还俘虏说、用俘虏交换援助说等，对此直木孝次郎曾有详细的讨论，参见直木孝次郎《百済滅亡後の国際関係——とくに郭务宗の来日をめぐって》，《朝鲜学报》147辑，平成五年四月。

㊷《日本书纪》卷二十八天武天皇元年条。

㊸ 参见陈高华、吴泰、郭松义著《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23页。

㊹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77页。

唐朝之东北亚诸国观
及东北亚诸蕃国国际地位
——以唐代各国争长事件为中心

福田忠之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一、关于“君子国”、“礼仪国”

唐代环日本海诸国（主要是新罗、渤海、日本三国）的国际地位是与唐朝的诸国观及国际意识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唐朝的诸国观为考察的主要线索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换言之，如果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在长安城大明宫里为唐朝所承认，就意味着在整个东亚国际社会中其地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因而要考察唐代周边国家的国际地位如何，就不得不分析唐朝的诸国观。从有关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唐朝是怎么看待东北亚诸国的。

我们在探讨史籍记载中的唐朝给予统一新罗的评价时，不难找出唐朝视新罗为“君子国”的记载。《旧唐书》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新罗圣德王）卒，诏赠太子太保，仍遣左赞善大夫邢琫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琫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琫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①此记载表示唐朝知道新罗学问学术的水平类似于中国。因此唐进行对罗外交时也考虑此情况以选择具有相当学问水平的文人为遣新罗使，派到新罗去②。

玄宗致圣德王的敕书当中也载有“新罗遣其臣金志良来贺正，……降

书与新罗金兴光曰：所进牛黄及金银等物省表具知，卿二明庆祚，三韩善邻，时称仁义之乡，代著勋贤之业，文章礼乐、阐君子之风……”③。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有景德王听到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临时逗留在蜀地的消息之后，派出使者远到蜀国成都朝贡，玄宗接见新罗使者时，深深为之感动，赐之以诗，诗中有“兴言名义国”的说法④。

依据上述的“嘉新罗王岁修朝贡”的记载得知，唐罗双方在唐朝时期一直保持十分频繁的使节往来。据研究，在唐代的东北亚诸藩国当中（主要为罗、渤、日），唐王朝派遣使节最多者为新罗，有唐一代达十九次。十九次遣新罗使的目的分别为：“吊祭册立”为名者十二次，“宣谕”为名者两次，“告哀”为名者一次，余者目的不明⑤。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而且新罗派出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唐⑥。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探讨史籍记载中唐朝给予日本的评价时，也可以找出唐朝视日本为“君子国”的记载，当时日本虽然未受唐朝册封，但同样得到了“君子国”、“礼仪国”等高评价。比如大宝元年（701）遣唐使归朝报告里载有：“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高宗）崩，皇太后（则天武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语毕而去。”⑦

玄宗致日本圣武天皇的“敕日本国王书”的开头部分写为“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彼礼仪之国，神灵所扶，沧溟往来，未常为患，不知去岁，云云”⑧。关于天平胜宝四年（752）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遣唐使，在《东大寺要录》卷一所引《延历僧录》（唐僧思讫撰）有“唐主开元天地大宝圣武应道皇帝云：彼国有贤主君，观其使臣，赴揖有异。即加号日本，为有义礼仪君子之国”⑨



的记载。遣唐使执节使粟田真人[10]、大使藤原清河等在唐朝受到好评也反映了唐评价日本为君子国、礼仪国的事实。盛唐时期三大诗人之一王维有一篇诗作叫“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11]，其中有“海东诸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的说法。

由上述几个有关日本的记载，过去产生过一些强调并夸张唐代日本国际地位的说法[12]。无论如何，唐朝对日本与对新罗的评价看来是差不多的[13]。

上述“君子国”、“礼仪国”等说法是唐朝在与东方国家(新罗、日本)的关系上常用的词。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表现引进唐朝衣冠制，具有中国式文化、教养、制度(儒学、佛教、汉字、律令)的八世纪新罗、日本的实际情况。

但应该指出的是，此唐朝君子国观主要是与中国古籍中所载的中国传统的东方观密切相关的。在《山海经》、《后汉书》等古籍中载有在东方有礼仪敦厚的“君子国”、“君子不死之国”的传说。比如《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有“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熏华草，朝生夕死……”[14]《后汉书·东夷传》谓东夷民族“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后汉书》编撰者范晔又论曰：“……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西戎、北狄、南蛮)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15]直至唐代仍然存在汉族对东夷诸族的这种传统观念。这种传统东方观与当时东夷各国中，尤其是全面输入唐朝文物制度而名副其实成为律令制国家的八世纪日、罗两国实际状况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唐代有关史料中“君子国、礼仪国”的解释[16]。

因此，我们以上述唐朝针对日本与新罗所作的评价来考察唐朝的诸国观和日、罗两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局限性。换言之，仅仅依据这些史书记载中的唐朝“君子国观”，难以全面真实地考察诸藩国的国际地位。

二、唐代争长事件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考察以唐朝的眼光来看的周边诸国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

国际地位问题，我认为在唐朝所发生的几次蕃国使节之间的争长事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争长事件，对此进行比较与考证，以考察唐朝的诸国观以及唐代周边诸国国际地位的实情。

唐代的外国使节争长事件据史籍记载有如下几次：

（一）《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条》收录第十次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吕归国后的奏文，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而今到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17]

《东大寺要录》卷一所引《延历僧录》里有载"后元日拜朝贺正，敕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18]。

（二）《旧唐书·突厥下》里记载开元十八年（730）突厥使与苏禄使之间发生的争长事件："苏禄者，突骑施别种也。（中略）十八年（730）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寮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19]

（三）安鼎福编写的史书《东史纲目》里载有唐乾宁四年（894）渤海使与新罗使在唐朝贺正典礼所发生的争长事件："时渤海国，自谓国大兵强。而入唐朝献，使臣坐于新罗使之下。至是，其贺正使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帝诏以为，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当蕃宿卫院，奏其状于王。"[20]

依据《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正月丙寅条》的记载，胜宝五年（公元753年，同于唐天宝十二载）赴唐的遣唐使副使大伴古麻吕等日本使节与新罗使节之间在京师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所举行的朝贺大典礼上发生争



长事件。这则史料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被广泛引用。这天唐朝安排诸蕃座次时，日本使被安排在西畔第二（位于吐蕃之下），而新罗使被安排在东畔第一（位于大食国之上）。大伴古麻吕等遣唐使节对此不满。因为自己的座次比新罗使低而提出“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向唐朝将军吴怀实要求调换席次。结果，唐朝将军吴怀实看到古麻吕不肯让步的态度，就调换了日本使与新罗使之间的席次，把日本使列为东畔第一位（位于大食国之上），而把新罗使列为西畔第二位（位于吐蕃使之下）。

这个天宝争长事件在日本方面的史书里有记载，而中国史籍对此只字未提，在学术界也有不少争论。有人认为这次古麻吕的奏文是古麻吕为了在天皇前表功而夸大或编造了某些事实[21]。但通过本章的考察结果，可知否认此事件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

有些学者认为，八世纪日本奈良朝前后，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社会上日本的国际地位比新罗还要低[22]。但是，如果仔细看自古以来保持下来的日本与环日本海诸国的关系，就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在奈良时代存在新罗朝贡与日本回赐，以及作为这个日罗关系的背景存在视新罗为朝贡蕃国的对外意识是无可怀疑的[23]。新罗虽然也在日罗宗藩关系里含有很浓厚的政治意图，但基本上迎合日本的对新罗观与日本进行外交。在日罗之间的确存在这种特殊的宗藩关系，如果了解这个日罗关系的真相，古麻吕对吴怀实所表达的内容并非是无根据的。古麻吕所说的“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在日本朝廷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而且成为对新罗外交的基本思想。

那么，在天宝争长事件前，新罗被唐朝列在日本使席次之上的历史事实和日罗之间的确所存在的宗藩关系之间的差异怎么解释呢？

我认为，唐朝最初之所以把新罗使列为上座，是因为当时新罗仍然与唐朝之间保持宗藩关系，每年向唐朝不断遣使朝贡，唐帝也册封历代新罗国王。而日本遣使唐朝参加朝贺典礼是一种临时的行为，日本没有接受唐朝的册封而独立于东亚册封体制之外，被称为“不臣蕃客”[24]。因此在唐朝

朝贺典礼上，新罗的席次恐怕原来就有规定的。但在这次典礼上日本是临时的使人，因此在唐朝朝贺典礼席次规定下，可能没有明确确立下来有关日本的规定。

在文武百官、外国使节参加的朝贺新年的大典上，唐朝之所以调换日本使与新罗使之间的座次，恐怕是因为新罗使自身在大典礼上并不能否认新罗自古以来视日本为上国而不断朝贡日本的历史事实㉕。

发生天宝争长事件的约九个月前、天平胜宝四年(752)三月二十二日，新罗将以新罗王子金泰廉为首的朝贡使节团派到日本去拜朝，六月十四日金泰廉入朝后奏报日本孝谦天皇，曰："新罗国王言日本照临天皇朝廷，新罗国者，始自远朝世世不绝，舟楫并连，来奉国家。今欲国王亲来朝贡进御调，而顾念，一日无主，国政弛乱。是以，遣王子韩阿餐泰廉，代王为首。率使下三百七十余人入朝，兼令贡种种御调，谨以申闻。"孝谦天皇接见泰廉时诏报曰："新罗国始自远朝世世不绝供奉国家。今复遣王子泰廉入朝兼贡御调，王之勤诚，朕有嘉焉。自今长远当加抚存……。"㉖这次遣使日本者共有七百多人，其中入朝平城京者有三百七十余人。如此大规模的使节团在日罗关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从这次新罗使的奏报内容来看，它虽然含有浓厚的政治目的，但泰廉所奏报的内容表明，至少在表面上采取臣下之礼来入朝的。新罗确实有改善日罗关系恶化以备渤海的政治意图㉗，对新罗而言，与渤海间的政治紧张比日罗间的臣属朝贡关系更为现实而重要。从此也得知，侧重现实与实惠的新罗外交政策的一面。新罗王子金泰廉一行抵达日本后，日本朝廷大为惊喜，他们刚到大宰府后的三月二十八日，朝廷立即"遣使于大内(天武、持统两天皇陵)、山科(天智天皇陵)、惠我(应神天皇陵)、直山(元明、元正两天皇陵)等陵，以告新罗王子来朝之状"。

如此看来，天宝十二载正月(天平胜宝五年/753年)的新罗遣唐使应知道半年前金泰廉一行三百七十余人迎合日本朝廷的朝贡要求出使日本



的事实。古麻吕向唐朝要求调换席次的理论根据，就是自古以来新罗对日本的朝贡，即日罗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半年前派遣金泰廉一行向日本朝廷称臣纳贡的新罗，在外交舞台上无法否定古麻吕所提出的"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的主张，只能承认其日罗间的实际关系，因而日本使互换座次的要求也自然被唐朝廷所接受。我们将这次事件放到以大唐为中心的整个东亚国际秩序中进行考察的话，就可以了解，先在唐朝与日、罗各国之间存在君臣关系，同时在日、罗等其臣藩国之间也确实存在臣属关系，此事件表明日本为唐朝大藩而新罗为唐朝小藩的秩序存在。

当时东亚国际社会中，确有两属性质的政治实体存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前提下，有大藩、小藩、强藩、弱藩的不同存在。在大藩、强藩的势力范围内，那种第三、第四等的政治实体慑于大者、强者的威力，以进贡为条件求得支持保护的情况还是不少的[28]，新罗和以后的渤海是比较典型的例证。《隋书·倭国传》载："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这是日本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大国君临于朝鲜诸国的一种证实，因而也被广泛引用。

据研究，唐朝朝贺仪式中的席次上下之争，一般按藩国之间的臣属关系而得到解决[29]。席次之争的结果明显反映出当时唐朝的东北亚诸国观。

从这次席次的调换来看，日本虽然未受唐朝册封从而不受唐的政治束缚，但唐朝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日本对朝鲜关系上的优势地位及其与新罗之间所存在的地域性臣属关系。上述《隋书》(贞观十年写成)的内容也反映出此点。

其实从上述使者往来的次数或以新罗为君子国的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唐罗关系十分密切而重要，对唐而言，新罗在东北亚诸藩国当中也许是最重要的忠实藩附。从唐朝的东北亚外交战略而言，新罗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不可怀疑的。渤海国兴起后，在唐朝的东北地区扩展其势力。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30]。换言之，新罗被卷入唐朝的对渤海牵制策略(以夷制夷)当中。唐开元二十年(732)渤海越海进攻登州，唐朝与新罗一起出兵夹击渤海时，唐朝将"宁海

军使”的封号加授于新罗王。从此以后，新罗历代国王作为宁海军使进行了浿江镇典的经营任务，以忠实地牵制渤海[31]。唐朝只有使其两国（罗、渤）相互牵制，才能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宁的局面。从此意义而言，新罗在唐的对外策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在另一方面，日罗诸藩国之间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朝贡藩属关系是确实存在的。无论唐罗关系多么亲密，唐朝也在一方面不得不考虑到诸藩国间的上下之分以解决外交问题。从最为重视国际秩序的东方中心国唐朝的立场而言，它并不能随意否定日本君临于朝鲜诸国（主要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历史以及日罗之间的朝贡关系。

据研究，由于本国在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与唐朝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32]。其地位的确是七世纪朝鲜三国争霸战争时期无法比拟的。但应该指出的是，新罗统一半岛之后日罗间的外交形态基本上没有变化[33]。八世纪以后日罗间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两国断绝国交的779年。日本统治阶级对新罗始终持有这种宗主国意识，虽然在双方之间发生多次“违礼事件”，出现两国华夷意识之间的冲突，但新罗也基本上维持旧有的外交形态，迎合日本的要求以进行对日外交。

唐朝礼制中，外国朝贡之礼仪称宾礼[34]。《新唐书·百官志》鸿胪寺条有外国藩客参加朝礼时的席次规定，先由鸿胪寺“以蕃望高下为簿，辨其等位”，然后“以礼待之”[35]。从此也得知，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诸蕃国间所存在的“君臣之分”、“蕃望高下”，在此基础上采取各种对外措施。

因此如果考虑这一点，唐朝解决两国使者席次之争时，按当时华夷秩序不得不考虑日罗间的外交形态，唐朝尊重日本的“蕃望”，将日本使重新安排在新罗使之上。这种解释也适合于上述《隋书》里“以倭为大国”的记载。上述“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36]诗是天宝十二载（753）藤原清河、大伴古麻吕为首的遣唐使节扬帆东行、离开唐土前王维送给晁监（阿倍仲麻吕）



的。此诗中王维所说的“海东诸国、日本为大”一句明确表明当时东北亚诸藩国间的政治关系，也许就是天宝十二载“唐廷日罗席次之争”最后结局为王维得知后所写的。无论如何，从王维的诗中可知，在唐朝内部本来就存在有利于解决席次之争的积极而有力的因素。

然而，新罗好像对天宝争长事件的结果也有不满之处，下面的记载间接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景德王十二年条》：“十二年(753)秋八月日本国使至，慢而无礼，王不见之，乃回。”[37]

753年正月在唐朝贺正典礼上发生日罗遣唐使之间的席次之争，使新罗的国际地位位于日本之下，此结果深刻伤害了新罗的华夷意识。于是，同年八月日本遣新罗使小野田守到新罗后，因其态度傲慢无礼，挑起纠纷，新罗景德王盛怒之下，不予接见。换言之，由于753年正月在唐朝日罗两国使者之间所发生的席次之争，造成同年八月日本遣新罗使出使任务的失败[38]。此结果又引起日本奈良朝统治阶级的不满并伤害了他们的华夷意识，日罗之间外交关系恶化，最后是日本统治阶级决定征伐新罗。757年藤原仲麻吕掌权后，日本便与渤海联手企图征伐新罗[39]。

由此可见，从752年新罗王子入朝始，753年日本使与新罗使之间在唐朝的争长事件，同年8月景德王追却日本使的事件，一直到757年仲麻吕政权成立后征讨新罗计划及其受挫为止，此期间日罗外交上发生的这几次事件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有人主张唐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及百僚议”[40]。但据上述《东大寺要录》卷一所引《延历僧录》里记载：“后元日拜朝贺正，敕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这则史料是与鉴真一行来日的唐僧思托于延历七年(788)左右所撰写的。其成书年代比《续纪》(延历十六年写成)早十年左右，而且完成于唐僧之手。因此，应该说此史料可信程度高于《续纪》。从此史料中的“敕命”一词来看，《续纪》里虽无记载，但它(天宝争长)应该是经过唐方正式手续与朝廷合议而得到解决的。只有经过中书门下及百僚的合议，皇帝也才能“敕命”。据研究，朝见时的席次是由鸿胪寺具体安排的，所以外国使节如对班位安排有异议，也是直接向鸿胪寺提出交涉。天宝十

二载(753)争长事件时日本使团向掌客(即鸿胪寺所属典客署的官员)提出抗议[41],后来皇帝"敕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也就是说得到了唐方的最后同意。由此观之,以并未经唐朝官方的合议,从而怀疑此事件真实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据以上分析结果,天宝十二载争长事件的真实性是不可否定的。

考察唐朝解决朝廷礼仪之争的基准时,上述(二)与(三)两次争长事件很有参考价值[42],以下对此两次事件进行考察并分析唐朝分辨蕃客等位的基本秩序。

开元十八年(730)发生的争长事件,从争长的种类而言,类似于天宝十二载(753)的争长事件。这是玄宗宴请苏禄使时,后者与出席的突厥使引起的席次之争。这天,玄宗为了刚来到京师长安城的苏禄使(突骑施别种)而举办了宫中宴会(相当于欢迎慰劳入朝使者的宴会),前不久已经入朝了的突厥使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刚开宴会时苏禄使位于突厥使座次之上,突厥将苏禄所属的突骑施视为突厥臣属下的小国,因此其使者向唐玄宗表示不满,云"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此记载表明,突厥的使者也根据与突骑施之间的臣属朝贡关系向唐朝要求重新安排与苏禄使之间的席次,这一主张的根据与天宝争长事件一样,也在于藩国间的臣属朝贡关系。听到突厥使这个主张之后,苏禄使便回答说"今天的宴会主要是玄宗为我举办的,因此我使居下并不合适"("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但最后这次争长的结果也是与天宝争长事件一样,唐玄宗考虑诸藩国之间的藩属关系重新做了安排才得到解决。

通过对开元十八年争长事件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突厥与突骑施之间曾经存在过某种臣属关系,开元十八年的宫中宴会主要是玄宗为款待并慰劳刚入朝的苏禄使而特意举办的。换言之,只有苏禄使才是今日欢迎宴会的主客,但唐朝在此宴会上也并不能忽视两国间的政治臣属关系,在尊重突厥"蕃望"的基础上(默认突厥"蕃望"高于苏禄),解决这次礼仪之

争。从唐朝的立场而言，突厥是唐朝的大藩，而曾经臣属突厥的突骑施是唐朝的小藩，换言之，唐朝承认突厥的国际地位高于突骑施，突厥与突骑施两国间存在这样一种上下关系。

开元十八年(730)与天宝十二载(753)的两次争长事件都是自以为强藩、大藩的国家或民族向唐朝的席次安排提出意见而发生的，它们之所以成功调换与弱藩、小藩之间的席次，是因为这两国依据暂时在国际关系上被承认的“上国”地位及其“蕃望”而提出调换席次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按当时唐朝礼仪制度来说是有道理的。

通过这两次争长事件，我们可以了解唐朝仪式中的席次上下之争一般都是依据藩国之间的臣属关系而最后得到解决的。

唐乾宁四年(897)的争长事件是在上述两次争长事件约一百五十年后发生的。一看记载就可以得知，这次争长事件与上述两次争长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渤海使所提出的调换席次的要求没有被唐朝接受。

滨田耕策认为渤海使的要求之所以在乾宁四年争长事件当中遭到唐朝的拒绝，是因为渤海使要求调换席次的根据不充分。在朝贺之仪的大典礼上，渤海使大封裔以本国“国大兵强”(国力大小)为主要根据而向唐方要求把本国的席次安排在新罗使之上，而不是依据藩国间的大藩、小藩关系(藩属关系)调换席次，这一点与上述两次争长不同[43]。因为渤海建国(698)以来从来没有使新罗臣属于本国。渤海使把本国席次上升为新罗使之上的要求主要是依据当时两国国势“强弱”、“盛衰”，将本国与新罗国势进行比较后提出来的。因此，唐昭宗收到渤海使“进状”知道席次交换的要求之后，在赐渤海使的敕旨里指出：“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拒绝其要求(互换席次的要求)。对唐朝而言，贺正典礼之际的诸藩国等位规定并不是以诸藩国国势盛衰而随便更改的。在一般情况下，唐朝所尊重的是两国间传统的外交形态与蕃望高下，而不是一时性的国势的强弱盛衰。

《东史纲目》中的乾宁四年争长事件的记载后有一篇引人注目的记载，“王(新罗孝恭王)因遣使，又附表以谢曰：臣谨按渤海之源流，勾丽未灭

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略)……初建邑居来冯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后至先天二年(713)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略)……楛矢国毒痛愈盛。"

这则史料是九世纪末新罗文人崔致远为了感谢唐帝在乾宁争长事件中的最后决策而写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的一部分，这条史料也被收录在《东史纲目》中。崔致远在其表文当中仔细考察所谓"渤海之源流"，主张渤海原来只不过是弱小的"粟末小蕃(藩)"而已。而且新罗认为其酋长大祚荣曾经受到新罗第五品大阿餐的官位。在此表文当中，崔致远把渤海的国际地位定位于新罗之下。换言之，新罗向唐朝提出以本国为唐朝大藩而以渤海为唐朝小藩的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从上述乾宁争长事件的结果而言，唐朝也似乎基本上尊重新罗的国际意识与周边国家进行外交。乾宁争长事件是小藩渤海要求得到大藩新罗之上的席次，在这一点上，此事件与上述两次(天宝十二载与开元十八年)争长事件不能相提并论，其性质迥然不同。此争长事件中渤海使之所以要求位于新罗使之上，是与当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当时新罗已进入所谓"后三国时代"[44]，国内王权明显衰落；而渤海与唐朝的交流十分频繁，积极吸收唐朝文化，其国势十分强盛，曾被唐朝称赞为"海东盛国"[45]。

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渤海力图提高其国际地位以凌驾于新罗的这样一种外交意识。但即使渤海国力强大而被称为"海东盛国"，按当时的国际秩序，新罗与渤海的蕃国等位丝毫也未改变。乾宁争长事件表明唐朝比渤海更为尊重、重视新罗的"蕃望"，更重要的是，崔致远向唐朝主张过去罗渤两国间臣属关系存在，以它作为本国"蕃望"高于渤海的证据。

从上面对唐朝礼仪之争的分析结果得知，唐朝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周边诸蕃国间的政治臣属关系如何，以之判断其国等位高下，同时也可以了解唐朝东北亚诸国观的基本框架。

三、唐代"蕃望"规定

研究唐代诸蕃国国际地位时，考察唐朝究竟依何规定来分辨诸蕃客等位，研究判断蕃客等位的主要因素与基本标准，极为重要。

唐代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鸿胪寺的外交职掌相当广泛繁杂，外国蕃客进京后，则需要辨别其等位，这项辨别等位的工作是鸿胪寺的重要职掌之一。《新唐书·百官志三》有对外国使节的朝礼席次规定，四夷君长蕃客入朝后"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然后"以宾待之"[46]。这表明，辨蕃客等位的根据是其蕃望高下。从此得知唐朝尊重诸蕃国间所存在的"蕃望大小"，在此基础上分辨蕃客在朝廷典礼中的具体席次。"以蕃望高下，辨其等位"，然后"以宾待之"，这种唐朝蕃望规定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是决定其朝见时的蕃望席次，规定云："朝见辨其等位，第三等居武官三品之下，第四等居五品之下，第五等居六品之下，有官者居本班。"《唐六典·鸿胪寺典客令条》也有其蕃望与官品的基本对应。其具体待遇是："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其无官位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47]就是说第三等蕃客可享受三品以上官员的待遇，第四等蕃客可享受四、五品官员的待遇，第五等蕃客可享受六品以下官员的待遇。对没有官品的大酋长首领按第四等对待，小酋长首领按第五等对待。关于宾客在唐身亡后的丧事也有蕃望规定："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以上官奏闻。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欲还蕃者，则给舆递至境。首领第四等以下不奏闻，但差车、牛至墓所。"[48]就是说，如宾客死亡，如属主使、副使和第三等以上的宾客则须奏报皇帝，其丧事所须费用器物，有关的政府机构依制酌情供给；如想回其邦国，则提供车舆送至其国境。第四等首领以下的不奏报皇帝，但应派车和牛送至墓地。

《新唐书·百官志》礼部主客郎中条有蕃客进京后的有关"设会料、食料"的具体规定："供客食料，以四时输鸿胪，季终句会之。客初至及辞设会，第一等视三品，第二等视四品，第三等视五品，蕃望非高者，视散官而

减半，参日设食。”[49]《唐六典》又记载：“诸蕃使主、副五品以上给帐、毡、席，六品以下给幕及食料。”可见，甚至蕃客入朝后供给会料、食料及其所享受的供应待遇，也是依其蕃望及等级而有所区别的。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唐朝迎接诸蕃客礼仪待遇明显不同，而且所谓“蕃望”即是唐朝分辨蕃客等级的基本标准[50]。因此考察唐代“蕃望”规定的具体内容是研究唐代朝贡规定及国际秩序的关键问题。

唐朝对于来朝的蕃客，往往根据其蕃望高下而授予不同的官位。授予蕃客官位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外交问题。吐火罗（在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叶护那都泥利之弟仆罗，于神龙元年（705）入朝，留宿卫。他曾上书申诉鸿胪寺授官不当，将《诉授官不当上书》上呈给朝廷，《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载有其全文[51]。此史料虽不同于前述的席次礼仪之争，但对了解唐代分辨诸蕃国等位规定有一定参考价值，其全文如下：

> 仆罗兄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飓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罽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咄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石匿国王、悒达国王、护密国王、护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德建国王、勃特山王各领五万众，仆罗祖父已来，并是上件诸国之王，蕃望尊重。仆罗兄那都泥利承嫡继袭，先蒙恩敕差使持节就本国册立为王。然火罗叶护积代已来，于大唐忠赤，朝贡不绝；本国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西镇，仆罗兄每征发部落下兵马，讨击诸贼，与汉军相知，声援应接，在于边境所以免有侵渔。仆罗兄前后屡蒙圣泽，愧荷国恩，遂发遣仆罗入朝，侍卫玉阶，至愿献忠殉命，以为臣妾。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窃见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王子首领等，入朝元无功效，并缘蕃望授三品将军。况仆罗身特勤，本蕃位望与亲王一种，比类大小与诸国王子悬殊，却授仆罗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



弟婆罗门瞿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等，皆数改转，位至诸卫将军。唯仆罗最是大蕃，去神龙元年，蒙恩敕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至今经一十四年，久被沦屈，不蒙准例授职，不胜苦屈之甚。

在上书中前半部分，仆罗向唐朝申诉吐火罗之所以"蕃望尊重"，是因为吐火罗从仆罗祖父掌权时期以来，一直把谢飐国、罽宾国、骨咄国、石汗那国……等诸国臣属于本国(即"仆罗祖父已来，并是上件诸国之王")。他向唐朝主张本国"蕃望尊重"的最大根据之一即是本国与"上件诸国"间的臣属关系存在。然后仆罗在《上书》中继续说明与唐朝间的关系，仆罗兄那都泥利继承王位后，唐朝将他册立为吐火罗王。《上书》说明吐火罗世世代代效忠于唐，朝贡不绝，也涉及到其地理位置及与唐朝间的军事关系等。

《诉授官不当上书》谓"仆罗至此，为不解汉法，鸿胪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类流例，高下相悬，即奏拟授官"。此记载表示，唐朝授官的原则是根据"蕃望大小"。他在上书中列举了授官不当的具体情况，认为石国、龟兹与其余小国"蕃望"不如本国(吐火罗)，却被授予三品将军，并改转位至诸卫将军。仆罗自认只有吐火罗才是大蕃，而他却一直是正四品下左领将军卫翊府中郎将[52]。他的诉状上呈后，唐玄宗作了批示："敕鸿胪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称屈"[53]。玄宗考虑仆罗上书内容，就命令鸿胪卿不应使他(仆罗)感到委屈，以适当的官品授予给他。

在上述诉状中仆罗向唐解释吐火罗与"上件诸国"间的臣属关系存在，将它作为主张蕃望高于石国、龟兹并余小国的主要理由之一，而向唐要求授予更合适的官品。这意味着唐朝考虑诸蕃国国势之强弱大小及与唐朝间亲密程度等因素的同时，也把诸蕃国间的政治服属关系及其服属国多寡等问题考虑在内，以判断诸蕃国的蕃望高低。天宝、开元的两次礼仪之争又表明，如果两个蕃国间存在某种政治臣属关系而唐朝应分辨其两国等位时，唐朝在一般情况下尊重其原有的服属关系，以分辨其两国的蕃望等位高下。实际上，在争长事件中它尊重日本与突厥的蕃望，将其地域性臣属关系直接反映在等位规定(即席次安排)上，而最终调换原来的席次安排。《上书》内容表明，其地域性政治臣属关系能够成为诸蕃客主张

本国“蕃望尊重”的一个根据。换言之，对唐而言，诸蕃国间的地域性臣属关系可以成为分辨蕃客等位的因素之一。唐朝解决诸蕃客礼仪之争时按照具有这种性质的“蕃望”规定而处理。

四、唐朝的朝鲜观

下面我要考察一下八世纪唐朝对朝鲜半岛究竟持有何种意识。要了解八世纪以后唐朝的朝鲜半岛观(即对统一新罗观)，不得不追溯到七世纪后半期以来，唐朝对半岛的主要政策及其背后的意识问题。因此我在下面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七世纪中叶以来唐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由此推测八世纪新罗在东亚地区的定位。

我们考察七世纪朝鲜半岛的变动趋势及唐朝的对半岛政策，公元642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54]。618年唐朝建立以来，处于暂时平衡状态的朝鲜半岛以642年作为一大转折点，进入三国间争霸战争的新对抗时期。642年7月百济义慈王进攻新罗而夺取旧伽耶地区(伽耶诸国于562年被新罗兼并)，向新罗出兵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在642年7月的大耶之役后，派伊餐春秋出使高句丽请求出兵救援，春秋“便诣王(善德王)曰‘臣愿奉使高句丽，请兵以报怨于百济’，王许之。高句丽王高藏，素闻春秋之名，严兵卫而后见之，春秋进言曰：‘今百济无道，为长蛇封豕，以侵轶我封疆，寡君愿得大国兵马，以洗其耻，乃使下臣致命于下执事’，丽王(宝藏王)谓曰：‘竹岭本是我地分，汝若还竹岭西北之地，兵可出焉’，春秋对曰：‘臣奉君命乞师，大王无意救患以善邻，但威劫行人，以要归地，臣有死而已，不知其它’，藏怒其言之不逊，囚之别馆。春秋潜使人告本国王，王命大将军金庾信，领死士一万人赴地，庾信行军过汉江，入高句丽南境，丽王闻之，放春秋以还，拜庾信为押梁州军主”[55]。结果，新罗欲与高句丽结盟而对抗百济的战略受到严重挫折。反之，次年(643)冬



十一月百济与高句丽结盟又进攻新罗，以阻断新罗入唐朝进贡之路。春秋向高句丽出使任务的失败，及百济和高句丽的结盟在半岛上使新罗处于受到南北夹击的危险境地。

唐贞观十七年(643)九月新罗“遣使大唐上言高句丽百济侵凌臣国，累遭攻袭数十城，两国连兵期之必取，将以今兹九月大举，下国社稷必不获全，谨遣陪臣归命大国，愿乞偏师，以存救援”[56]。新罗遣使唐朝请求出兵救援，但此对策又一次在唐朝碰壁。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善德王十二年条》有载，唐太宗接见新罗使者时向新罗提出三种策略：“帝曰：‘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靺鞨，直入辽东，尔国自解，可缓尔一年之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我又能给尔数千朱袍丹帜，二国兵至，建而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国恃海之险，不修机械，男女纷杂，互相燕聚，我以数十百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休宁，我遣一宗支与为尔国主，而自不可独王，当遣兵营护，待尔国安，任尔自守，此为三策。尔宜思之，将从何事’。使人但唯而无对，帝叹其庸鄙，非乞师告急之才也。”[57]

以上史料比较明确地表示了唐朝对半岛的基本政策。分析起来，太宗所提三策的意义在于：第一策是让少数唐朝边兵率领契丹、靺鞨兵进攻辽东，以保证新罗得到一年左右的安全，这种“以夷制夷”的做法是中原王朝统御周边民族的传统政策。但契丹、靺鞨与朝鲜三国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可想而知，这种措施是难以持久的。第二策是唐朝将唐兵所使用的“朱袍”、“丹帜”借给新罗，待两国兵至，就将此丹帜竖起，以威吓两国联军。此做法也只能临时威吓敌军而已，不可能期待其实际效果。唐朝对半岛政策的重点在于第三策上，第三策是唐朝将妇人掌权(以妇人为主)作为新罗被邻国侮辱和轻视的主要理由，而提出废除善德女王，并将唐王室的一人派往新罗，使之成为新罗国王。唐朝以此作为派数十百唐朝军船，进攻百济并救援新罗危机的必需条件。

换言之，唐太宗利用新罗的亡国危机，要求废除今新罗王善德而派遣

唐朝的一名宗室作新罗国王，如此来使新罗成为唐朝属国。“使人但唯而无对”，表明对新罗而言，这次太宗乘人之危的建议是预想不到的。唐太宗看到新罗使沉默不应的样子，叹息谓“其庸鄙，非乞师、告急之才也”。从上述记载得知，唐朝此时似乎已有将半岛全土纳入国内州县制的意志[58]。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向新罗使者提出的三策，后来在新罗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即“毗昙之乱”[59]。一般认为，“毗昙之乱”的意义就是促成了新罗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即新罗王体现传统的政治权威，金庾信直接掌控战乱时代的军事，金春秋担负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的外交事务，这三者集结在一起，形成了新罗特有的三者分掌的权力集中方式[60]。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于高句丽，此次遣使是唐太宗作为攻伐高句丽的事先准备而窥探高句丽国内情况为主要目的的[61]。陈大德归国后“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62]。这里“馆候之勤，加于常数”，让我们看到高句丽统治者知道高昌国被唐所灭的消息后，多次前往陈大德逗留的馆舍探听唐朝的意图，这反映了高句丽当时国内的紧张状态。

听到陈大德的出使报告后，太宗曰：“高丽本四郡(汉武帝置临屯、真番、乐浪、玄菟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63]。《新唐书·高丽传》也记载：“帝曰‘高丽地止四郡，我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必救，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劳人耳。”[64]

唐太宗强调汉武帝曾经在半岛设四郡并进行统治的事实，以主张唐朝讨伐高句丽的正当性与简易性。七世纪唐朝全面救援新罗而敌对高句丽、百济的一系列半岛政策，其背后似乎就存在这种将高句丽领地视为中国疆域的传统意识。

真德王二年(648)春秋遣使唐朝谒见太宗，向太宗乞师，再三谓：“若陛下不借天兵，翦除凶恶，则敝邑人民尽为所虏，则梯航述职无复望矣”，终



于“太宗深然之，许以出师”[65]。金春秋（新罗亲唐自立派的代表）积极引进唐朝衣冠制度（649）及唐永徽年号（650）[66]，自禀典改为执事部（651）始，新罗改新官司制度全部的名称与组织结构，以唐官制作为榜样，将新罗固有的官制改为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机构[67]；654年，新罗又参酌唐律令制定理方府格六十余条[68]。新罗提倡并实践唐风化政策，向唐朝明确表示新罗作为唐外臣的政治立场，以此加强与唐朝间的关系。

660年百济灭亡与668年高句丽灭亡，明确表示唐罗联盟共同扑灭百济、高句丽政策的成功。但此后，在半岛整个形势变迁过程中，唐朝对半岛的基本政策及其意识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依据《三国史记》中的有关史料，可得知在唐罗连兵攻灭百济、高句丽两国的作战过程中，唐罗两国在解决战后半岛问题的基本策略上，即在战后政权归属的处理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唐朝打算战后在半岛上保留旧有的国家分治加以羁縻，而新罗则欲保持本国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半岛统一，两者之间发生严重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唐罗两国间的裂痕在对百济、高句丽的战争中就已看到，新罗武烈王七年（660）七月黄山之战（对百济的一次战役）结束后，新罗金庾信等至唐营，新罗军因黄山之战十分激烈而迟于约定时间到达，唐将苏定方批评新罗军迟到，以违反军律为由主张“斩新罗督军金文颖于军门”。庾信为文颖辩护，曰：“大将军不见黄山之役，将以后期为罪，吾不能无罪而受辱，必先与唐军决战，然后破百济。乃杖钺军门，怒发如植，其腰间宝剑，自跃出鞘。定方右将军董宝亮蹑足曰：新罗兵将有变也。定方乃释文颖之罪。”[69]这表明，在对百济战中，唐罗军营内部始终潜伏着矛盾，唐罗联盟并非坚如磐石。

660年百济灭亡后，唐在百济故地设都督府进行统治，《旧唐书·百济传》有载“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70]。

663年（新罗文武王三年）“夏四月，大唐以我国（新罗）为鸡林大都督府，以王为鸡林州大都督”[71]。唐朝在新罗也设置了羁縻州，在形式上把它

纳入本国支配体系。

668年唐朝攻灭高句丽后，将安东都护府设置在平壤。《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官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大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72]次年，唐朝为了统治高句丽故土便利而除去各种障碍，强制迁移有势力的高句丽人到中国内地安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总章二年(669)四月条记载："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73]至此，唐朝终于成功地将整个半岛纳入国内"羁縻州体制"当中，朝鲜半岛全土从形式上而言，成为唐帝国的一部分。

648年金春秋入朝，太宗答应救援新罗，约定讨平高句丽、百济两国后将平壤以南的高句丽故土及百济故土划给新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一年条有文武王所奉给唐将薛仁贵的报书，谓"先王(武烈王即金春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而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并乞(与)你新罗，永为安逸'"[74]。但这种约定后来并没有被唐朝主动履行。

高宗上元二年(675)"王(新罗文武王)乃遣使入贡，且谢罪，帝赦之，复王官爵"[75]。次年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76]。唐朝重新册封新罗国王，将原置于平壤的安东都护府迁移到辽东，至此，670年以来所持续的唐罗边疆战争终于结束。有些学者认为文武王十五年(675)唐对新罗王的再册封，意味着唐罗间对立关系的结束和唐认可新罗对朝鲜半岛的领有权[77]；也有学者认为安东都护府与熊津都督府的迁移是唐放弃统治半岛并承认新罗领有半岛大同江以南领土的一种标志[78]。其实，此时新罗王的再册封与安东都护府的迁移并不意味着唐朝放弃支配朝鲜半岛[79]。



《资治通鉴》记载：仪凤三年(678年/新罗文武王十八年)九月，“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80]。《旧唐书》本传的说法是：“其后，新罗外叛，高宗将发兵讨除，时文瓘疾病在家，乃舆疾请见，奏曰：‘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从之。”[81]

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两年后的678年，唐高宗仍然对半岛事务耿耿于怀，甚至还想征讨新罗以维持对半岛的控制和支配。此后，这种唐朝征伐新罗的实际计划不再见于史料，主要是与西边吐蕃逐渐强大成为唐朝新的威胁有关[82]。仪凤三年(678)李敬玄对吐蕃战败使唐朝廷的议论集中于对吐蕃政策上，“上以李敬玄初败，吐蕃为患转甚，召侍臣曰：‘吐蕃小丑，屡犯边境，置之则疆场日骇，图之则未闻上策，宜论其损失，各书所怀’”[83]。对唐而言，吐蕃成为当时最大的外事难题，唐本土直接受到侵扰。在这点上，朝鲜半岛问题的严重性与之相差甚远，不能相提并论。而且，到永淳元年(682)突厥复兴，又成为唐朝的另外一个外部压力。

由此可知，唐朝放弃征伐新罗并不是唐朝主动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结果，而是吐蕃等威胁成为唐朝的当务之急，使唐朝在半岛政策上采取消极态势，结果唐朝不得不放弃对半岛的进一步经营。虽然此时唐放弃了讨伐新罗，但它将半岛纳入国内州县制羁縻的意向到八世纪后也似乎一直存在。

羁縻政策是中原王朝向周边民族和诸国采取的重要的关系策略。栗原益男认为，八世纪渤海和新罗的事例说明，这样的一个国家整个被唐作为一大羁縻州来看待，与唐以前针对周边部族分而治之的羁縻政策不同。唐对渤海和新罗的羁縻政策的特征是，承认其作为独立王国的独立性[84]。其实唐对渤、罗的“一国一羁縻体制”是东亚世界中唐朝以前所不存在的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

但金子修一则认为，栗原所提出的“一国一羁縻制”确实存在，但其作用与他所说的不同，乃是唐朝以国内州县方式对待渤、罗的一种表现[85]。唐朝

确实有将渤、罗纳入国内州县体制的意向。当时鹰鹞是长安贵族狩猎时流行的宠物，渤、罗来唐朝贡时被要求进贡鹰鹞，而朝廷向国内诸州也要求进献此类鹰鹞。《旧唐书·德宗纪》上大历十四年（779）闰五月丙子条载："诏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皆停。"[86]《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八《帝王部·却贡献条》亦载："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闰五月丙子诏曰：天下州府及新罗、渤海岁贡鹰鹞者皆罢，既来者所在放之。"[87]此时，国内诸州府、新罗及渤海得到唐朝的同等对待。可见唐朝似乎对渤、罗以国内州县来看待。

据研究，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也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88]。但实际上八世纪新罗的事例也与渤海大同小异。

羁縻政策一般是承认其他民族的社会形态，不把它纳入唐朝直接支配体制中，而是使它成为唐朝外臣。百济为唐所灭后，唐设置五都督府和州县于其故地，主要任用百济人以对其地进行羁縻统治，因此唐对百济故土所持为一般的羁縻志向。但在朝鲜三国中，尤其对与唐土接壤的高句丽故土，唐朝对此地持有一般羁縻政策以上的强烈的支配志向，是毋庸置疑的[89]。

上述进贡鹰鹞的记载表明，到八世纪，唐朝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新罗仍然存在着这种羁縻意识。在八世纪初的一段时间，被使用的"乐浪郡王·新罗王"（从一品）或"乐浪郡公"（正二品）等郡王号也表示此点。郡王号一般是唐朝给一些内属于唐的酋长或向唐投降的异族首领的封号[90]。新罗统一半岛后，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但罗、渤两国在八世纪东北亚地区中不一定作为一大独立王国完全受到唐朝的承认。换言之，新罗、渤海在整个东亚国际关系中其独立色彩是较为淡薄的。唐罗关系十分密切，使节往来很频繁，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新罗在东北亚诸藩国中的



国际地位。

其实详加考察的话，渤海与新罗的地位又有所不同。唐朝确实有意将渤海定位于新罗之下。712年唐睿宗将大祚荣封为渤海郡王，同时以其地作为忽汗州并授予忽汗州都督的官职。渤海郡王这一封号一直被唐使用，后来直至798年大嵩璘为唐封为渤海国王以后，渤海君主才开始接受国王的封号[91]。渤海郡王的封号不仅在《旧唐书》中，而且在日本《续纪》里也有记载，据《续纪·神龟四年(729)九月条》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高齐德一行是自称为“渤海郡王使”出使日本入朝的。上述乾宁争长事件的结果也明确指出，在东北亚国际秩序中（在唐朝的国际意识下）新罗的国际地位高于渤海的事实。要言之，在唐朝“一国一羁縻州方式”下新罗的独立色彩较强，而渤海对唐朝更有从属色彩。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理解，除了渤海的事例之外，七世纪后半期以来唐朝对朝鲜半岛（新罗）也始终有一种“羁縻”指向，并且到八世纪初唐罗两国逐渐恢复友好关系后，唐朝的这种观念一直保留下来，而新罗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北亚世界中，日本的独立性究竟被唐朝承认并重视到什么程度，目前尚无明确证据。至于唐朝的日本观，此问题尚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五、结　　语

根据本文的考察结果，主要是依据有关“争长事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在唐代整个东北亚国际社会当中，日本的国际地位高于新罗，而新罗的国际地位高于渤海。据有关史料，唐代日本与新罗、渤海间存在以朝贡为媒介的某种政治臣属关系是不可怀疑的。问题的焦点在于唐朝是否承认此事实。天宝争长事件中唐朝接纳“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的日本使臣奏言后再次变换席次说明，唐代日罗宗藩关系正如日本朝廷所企图的那样，在东亚国际社会上得到了暂时而有限的承认[92]。此事

件中唐朝将日本位于唐朝大藩而新罗位于唐朝小藩，从而对此两者的国际地位作了明确的定义。同时，乾宁争长事件又表明新罗在对渤海关系上的优越地位也得到唐方的承认。

这些结论主要是依据上述争长事件中唐朝的最后决策而得出的，因此，还需要从其他角度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但上述几次争长事件所体现的唐朝对周边各国在礼仪待遇上的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唐朝的诸国观以及周边各国的外交地位。而且，据分析结果，唐朝分辨其外交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诸蕃国间的政治性服属关系而不是一时性的国势盛衰、国力大小。国力大小或与唐朝间的密切程度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如果两国间存在某种臣属关系，唐朝在一般情况下尊重其"蕃望"，并承认其原有的地域性臣属关系。唐朝的诸国观基本上反映诸蕃国间政治臣属关系，唐朝以此维护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

《续日本纪》里有宝龟九年(778)唐使孙兴进一行来日时的记载，从此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诸藩国不同的外交地位。宝龟八年(777)的日本遣唐使(第十五次)归朝时与唐使一起回来，当时在日本没有领送而迎接唐客的具体规定[93]，因此关于唐使入京时的仪礼，领客使特地举出粟田朝臣真人(第八次遣唐使)赴长安入京之际以及新罗王子泰廉与渤海使朝贡日本入京之际的例子向朝廷提问："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劢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敕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今领唐客准据何例者?"朝廷回答说："进退之礼，行列之次，具载别式。今下使所宜据此式勿以违矣。"[94]

由此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奈良平安朝日本朝廷的对新罗、渤海观：日本朝贡使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之礼；新罗朝贡使入京之际，面对日本礼仪官只作马上答谢；渤海朝贡使下马后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与地位[95]。



此记载里所反映的东北亚诸藩国的外交地位之差别，大体上符合前面所考察的唐朝诸国观，表现出当时在东北亚世界中日罗渤三国的上下之分。

诸藩国中的大藩往往把自己的华夷意识强加给小藩、弱藩，并力图使它臣属于本国，大藩的大国意识与小藩的国际意识（事大主义意识）相合时形成“蕃望”以及诸藩国外交地位上的差异。通过几次争长事件的分析结果得知，诸藩国间的上下之分（即臣属关系）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唐朝所知并且承认的。

总的来说，在古代东亚世界中，根据中华思想而形成的独有的天下观念及其秩序世界，必须与中原王朝之间具有一定的政治距离才能成立。七世纪中叶后，新罗出于求生目的，加强与唐朝间政治关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收敛了过去真兴王时代固有的那种以新罗王权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及其秩序世界，而一定程度上被吸收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性秩序之内，唐朝在半岛设置羁縻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96]。而当时僻在东方的日本却在国内随意使用固有的年号，构成并维持以天皇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同时贯彻其独立的支配秩序，甚至将其天下观推广到朝鲜诸国，企图把新罗、渤海也纳入本国支配秩序之下。在律令中日本又随意设定本国与周边诸国间的关系。国史将平城京称作“帝皇之邑”或“四海所归”，又云“帝王为居、万国所朝”。日本统治者认为，天皇之都城不仅是国内统治的中心、而且应是诸蕃朝贡国的中心、小帝国的国都——即第二个长安城。不言而喻，日本对中国的模仿并不仅仅是都城的形状，而更是帝国国家的结构[97]。至于东亚诸国采用律令制与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和中原王朝的政治的、国际的关系。日本采用了律令制，是因为对唐只有朝贡关系，而这在与中国有着长期册封关系、使用唐的年号、援用唐的衣冠制的新罗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新罗一直没有制定体系化的律令法（帝国法）[98]。日本和新罗的不同，也可以理解为朝贡关系和册封关系的不同。

但在另一方面，从有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七世纪中叶以来，新罗为维持新罗王权的权威及其自主性支配秩序而不断努力的痕迹。

唐罗战争刚结束的679年，新罗将原属于百济支配下的耽罗臣属于本国[99]，《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文武王二年(662)二月六日耽罗国主佐平徒冬音律来降，耽罗自武德以来，臣属百济，故以佐平为官号，至是降为属国"；"文武王十九年(679)二月发使略耽罗国"；"哀庄王二年冬十月，耽罗国遣使朝贡"[100]。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新罗将以王族安胜为首的高句丽遗民安置于金马渚(益山)，册立安胜为高句丽王，《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文武王十年，遣沙餐须弥山，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其册曰：维咸亨元年岁次庚午秋八月一日辛丑，新罗王致命高句丽嗣子安胜……"[101]，文武王十四年"封安胜为报德王"[102]。新罗王权将报德国视为新罗蕃属[103]。

后来新罗将为唐罗联军所灭的百济、高句丽的遗民及靺鞨人编入新罗固有的军团"九誓幢"，同时，对百济(673)、高句丽(686)旧臣各依其旧职授予相应的新罗官位，编入新罗官僚体制中[104]。

到八世纪初，新罗又将渤海定为自己的蕃属国，《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载"初建邑居来冯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这记载是否是历史事实，目前尚无明确证据，但从九世纪末新罗文人崔致远写的表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新罗始终视渤海为臣属国的华夷意识。

由此观之，新罗援用唐朝衣冠制并采用唐年号后，一方面自居为唐朝外臣，另一方面将耽罗、小高句丽国及渤海视为蕃属国、朝贡国，在有限的地区内构成并坚持一个新罗独有的华夷秩序，加强新罗王的权威，保持一种小中华意识。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后，随着唐罗关系正常化，新罗在对日关系上开始持有将原有朝贡外交形态改为平等外交的意图。而日本始终把自己的天下观念强加于新罗，并以传统朝贡国来看待之。此时期，随着新罗华夷意识及国内王权思想的加强，与日本华夷意识发生冲突，结果出现新罗的对日离反现象，这应该是大势所趋。

天平七年(735)新罗使金相贞改本国国号称为王城国，天平十五年



(743)新罗使把调物改称为土毛，景德王十二年(753)日本国使出使新罗时为景德王所遣放等事件，都是这种新罗华夷意识的一种表现。与日本断绝国交之后，新罗华夷意识更为明显。例如836年日本派遣遣唐使之际，为了请新罗提供海难之际的救助，先派遣了纪三津至新罗。纪三津抵达新罗时，新罗赐给纪三津执事省牌中有“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国宽弘之理”[105]等语，由此可以看出新罗统治阶级的大国意识[106]。在此，新罗毫不踌躇地对日本自称大国而将来自日本的使者称为小人，这意味着，八世纪中期以后，日本作为“小帝国”的支配秩序及其国际意识在国际关系上完全失去了其实际意义，并转变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更为观念性的对外意识。

如上所述，华夷观念是在东亚古代国家形成史上不可缺乏的、共有的一种政治观念。至晚到七世纪末八世纪初，日本甚至确实有自视为“中国”的意识[107]。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华夷秩序本来是以“文化”水平的高低或者体现“礼”的程度作为基本前提而形成的。换言之，中国传统华夷秩序下区分“华”与“夷”的基准之一就是所谓“文化”的水平。日本型华夷秩序在其性质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其特征可以举出的就是军事、武力的色彩特别浓厚。它问责蕃属国的主要方法并不是像中国那样利用文化高低之差而实行的说谕方式或论理上的说服，而是利用武力、暴力来把他国屈从于本国的强制性方式。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这种特征一直贯穿于日本与朝鲜诸国间的关系中(尤其是日罗关系)。

比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白雉二年(651)新罗使着用唐服事件。白雉二年新罗使穿着唐国服，泊于筑紫时，“巨势大臣奏请曰：‘方今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其伐之状不须举办，自难波津至于筑紫海里相接浮盈舻舳，召新罗问其罗者，可易得焉’”。就是说日本朝廷欲陈军船于海以武力手段来恐吓新罗使以责难其无礼行为。

到八世纪日罗关系逐渐疏远后，几次在朝廷里被提出的征伐新罗计划(包括藤原仲麻吕的征伐新罗计划)也明确表明，日本为了维持自己的华夷秩序和小帝国体系而以军事武力作为主要手段的事实。

在当时东北亚诸国中，日本不具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即不具备中原王朝那样作为“中华”的诸项条件，欲构成自己“华”的位置，恐怕依靠军事力量就是惟一手段。

《隋书·倭国传》有隋使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的记载，“其王（倭王）与清（隋使）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请就馆”[108]。此中国史料明确表示在根据“礼”形成的国际秩序之下，中华（隋）与夷狄（倭国）比较典型的关系，表明当时日本在东亚华夷秩序之下的客观位置。“僻在海隅，不闻礼仪”的倭国很早就吸收中国华夷之别的政治思想，而把此华夷之分的秩序设置在对朝鲜关系上（尤其是对新罗关系上），以企图使自己成为君临于朝鲜诸国的“华”。

日本型华夷秩序含有这种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是缺乏所谓“礼义”、“文化”的情况下，日本依靠武力手段来君临于朝鲜诸国的一种结果。这是古代日本华夷思想的一大特征。日本人的朝鲜观[109]最麻烦的问题也就在这里。这种日本古代的军国主义、小帝国主义主要是针对朝鲜关系，尤其是在与新罗的外交关系中形成而发展的。另一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唐代“新罗朝贡”对于以天皇权威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及日本型秩序世界的形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通过与新罗间宗藩关系，天皇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权威得到了空前强化，日本古代天皇制因之得到相当的巩固。

如本文所述，在日本国内，小中华、小帝国意识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一直延续下去。但面对作为东亚文明中心国的唐朝，日本的这种华夷思想就难以奏效，所以日本在对唐外交上则始终奉行事大主义政策，遵守东夷朝贡国的立场，采取“下国”的姿态。

注释:

①《旧唐书·东夷新罗传》,中华书局,5337页。

② 据古畑彻《渤海使的文化使节的侧面的再检讨》(《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第六辑,1995年),唐朝派到渤海的"吊祭册立使"主要由宦官当任。此情况与新罗不同,唐对其两国在外交接待上的区别就是唐王朝国际意识的一种反映。

③《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五《外臣部·褒异二》开元十九年二月条。

④《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景德王十五年条,188页:"十五年春二月,王闻玄宗在蜀,遣使入唐,溯江至成都朝贡。玄宗御制御书五言十韵诗,赐王曰,《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赐诗一首》,'四维分景纬,万象含中枢,玉帛遍天下,梯航归上都,缅怀阻青陆,岁月勤黄图,漫漫穷地际,苍苍连海隅,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诚矣天其监,贤哉德不孤,拥旄同作牧,厚贶比生刍,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帝幸蜀时,新罗能不远千里,朝聘行在所,故嘉其至诚,赐之以诗。"从上述唐玄宗赐景德王的诗中看出唐罗关系十分亲密,唐朝将新罗视为自己忠实藩附,而新罗也作为唐朝臣下始终效忠于唐。"使去传风教,人来习典谟",此两句亦表示两国使者往来及学术交流非常频繁。

⑤ 石晓军《从对外遣使看唐王朝的东北亚诸国观》,《中日韩三国关系与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舄大学环日本海研究会出版,1997年。此论文的考察结果,在唐一代唐王朝向日本派遣的使节仅达八次,其八次遣日本使中,以宣谕为名者一次,通好为名者两次,送使为名者两次,其余三次不明。而且,能够明确肯定为唐中央政府遣使者只有贞观五年(631)以宣谕为名,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一次,其余则大都出于唐朝驻朝鲜半岛镇将的遣使。

⑥ 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汉城三知院,1990年,290—305页。

⑦《续日本纪》庆云元年七月甲申朔条,21页。702年日本国使到唐国后,向当地人提问,说:"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此记载表明第八次遣唐使不知道唐高宗死后"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的唐朝政局动态的变化。白村江之战后的669年以河内鲸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出使唐朝"贺平高丽"之后,大约三一年间日本不再向唐朝派遣使节。《旧唐书·日本国传》与《新唐书·日本传》里有以河内鲸为大使的遣唐使赴长安向唐朝"贺平高丽"时的记载。《新唐书》载"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旧唐书》里又载"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看此记载,唐朝似乎有一点怀疑日本的外交行动。当时唐帝可能问日本使者一些白村江之战后有关日本国内的政情或对外政策等,但使者就不以实对。看"又妄夸其国……"、"多自矜大"的记载,日本使者谒见皇帝时也许与平时不同。对唐方来说,也可能看出来他们自夸傲慢的色彩。无论如何从此时到701年的三十三年间日本没有向唐朝派出正式的使节。因此当时日本虽然与新罗之间一直保持十分频繁的使节往来,以企图通过与新罗的交流来引进唐文化,但日本统治阶级并不真正了解唐朝中国的政局。关于"日

本"国号究竟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学者经常引用上述《新唐书·日本传》而认为首次奏请倭国改称日本的应是以河内鲸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但这恐怕不对。《唐会要·倭国传》中记载"咸亨元年三月，遣使贺平高丽，尔后继来朝贡。则天时，自言其国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国"，这一记载表明首次奏请日本国号的日本使节应该是701年武则天执政时期赴唐的粟田真人一行（第八次遣唐使），而不是669年的河内鲸一行（第七次遣唐使）。日本这一国号大概到武则天执政时期终为中国所承认。白村江之战以来，日唐关系相当紧张，考虑到这一因素，河内鲸一行向唐奏请"日本"国号的可能性更小。701年粟田真人赴唐时，唐人谓日本使曰"大倭国……云云"的记载也表明直至八世纪初倭国这一国号仍然被唐人使用。《新唐书·日本传》中也载"后稍习夏音"，此语表明河内鲸遣使贺平高丽和奏请更改国号是两回事（参古畑彻《自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新罗、唐关系——新罗外交史的一试论》，《朝鲜学报》107号）。两条记事之间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这里记载的似乎不是同一时期的事件。

⑧《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

⑨《东大寺要录》卷一所引《延历僧录》，转引自东野治之《遣唐使与正仓院》，岩波书店，1992年，69页。

⑩《旧唐书·日本传》有载"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由此可见粟田真人使唐期间获得唐朝好评。《新唐书·日本传》里也有同样的记载。

⑪（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中华书局，1961年，219页。

⑫ 参石原道博《中国邻好日本观的展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二》，1952年。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年等。

⑬ 但在上述有关日罗两国评价的记载当中，《旧唐书》的"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那一段是唐帝本人所说的话，而且出自中国的官修史书（《旧唐书》），其可靠性是不可怀疑的。而《续日本纪》庆云元年七月条中大宝元年日本遣唐使报告中所载的对日本的好评（"唐人谓我使曰"以下的内容）不是唐帝给的，而可能是楚州盐城县界的当地人所给的。其实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区别。

⑭《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11页。

⑮《后汉书·东夷传》，2807页，2822—2823页。

⑯ 汤浅幸孙《遣唐使考辨二则》，《日本历史》464页，1987年。森公章《古代日本对唐观的研究》，《古代日本对外认识与通交》，吉川弘文馆，1998年；注②古畑论文等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⑰《续日本纪》，219页。

⑱《东大寺要录》卷一《延历僧录》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唐僧思托撰，转引自石井正敏《关于大伴古麻吕奏言——虚构说的介绍与问题》，《法政史学》，第35号。

⑲《旧唐书·突厥传》下，5191页。

⑳ 安鼎福《东史纲目》第五下·唐乾宁四年丁巳（公元897年，同于新罗孝恭王元年）秋

七月条。转引自滨田耕策《唐朝的渤海与新罗争长事件》,《古代东亚史论集》下卷,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记念会编,吉川弘文馆,1978年,343页。参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韩国古代史资料集》,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年,204页。

㉑ 卞麟锡《唐代外国使争长的研究》,《亚细亚研究》28,1985年;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汉城三知院,1990年,331页;沈仁安《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等。沈仁安在《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中认为大伴古麻吕自称"大日本国"口气狂妄,但《续日本纪》里原来没有这个"大"字的记载,我想沈先生引用的应该是《日本纪略》(平安时代后期写成的)里的记载,《纪略》云"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殆久矣"。(参《国史大系(普及版)日本纪略》,吉川弘文馆,1982年,210页)《纪略》中"日本国"前面的"大"字是后人加写的,因此并不能解释为古麻吕口气狂妄。古麻吕所提出的"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的确是历史事实。

㉒ 坂元義种《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古代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吉川弘文馆,1978年。

㉓ 参见石母田正《关于日本古代的国际意识》,《天皇与诸藩》,《日本古代国家论一》,岩波书店,1973年(收在《石母田正著作集》第四卷);铃木靖民《奈良时代的对外意识——〈续日本纪〉朝鲜关系记事的检讨》,《古代对外关系时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酒寄雅志《古代东亚诸国的国际意识》,《历史学研究》别册,1983年。本文第一章第三节至第五节。

㉔ 西岛定生《六—八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卷"古代2",岩波书店,1962年。西岛《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第二篇第二章,45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㉕ 注㉒坂元论文;注㉓铃木论文,197—201页。

㉖《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四年六月条,214页。

㉗ 李成市《正仓院所藏新罗毡贴布记的研究——关于新罗、日本间交易性格》,《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岩波书店,1998年。

㉘ 任鸿章、马一虹《渤日关系论》,《日本研究》1995年第2期。

㉙ 前揭注⑳滨田耕策论文,341页。

㉚ 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55—171页。

㉛ 李成市《新罗兵制中的浿江镇典》,《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第二编第十章,岩波书店,1998年,271页;津田左右吉《新罗北境考》,《津田左右吉全集十一》,岩波书店,1964年,206页。

㉜ 注㉚王小甫论文。

㉝ 铃木靖民《对新罗关系与遣唐使——关于森克己氏的说法》,《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231页。

㉞ 宾礼是五礼(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之一。《新唐书·礼乐志》载"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

㉟ 沈仁安《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中)曾引用此记载。

㊱ 参注⑪王维诗。

㊲《三国史记》,247页。

㊳ "三月辛巳,以从五位下小野朝臣田守为遣新罗大使"(《续日本纪·天平胜宝五年》217页)。"王子泰廉入朝之日,申云,每事遵古迹将供奉,其后遣小野田守时,彼国缺礼,故田守不行使事而归还"(《续日本纪》天平宝字

四年九月癸卯条）上述记载表示小野被朝廷任命为遣新罗使，虽到达了新罗但并未能谒见新罗王，未完成其出使任务。关于田守出使任务失败的记载，日韩两国的史料内容(《三国史记》与《续日本纪》)完全一致。

㊴ 禹硕基《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日本研究》1995年第2期。

㊵ 前揭沈仁安、王小甫论文等。

㊶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324—325页。关于吴怀实将军到底有无调换席次的权力等问题也曾有有利的考证，参照石井正敏《关于唐将军吴怀实》，《日本历史》402，1981年。

㊷ 以下论文中另两次争长事件[(二)与(三)]之研究，我曾受到前揭注⑳滨田论文的启迪。

㊸ 前揭注⑳滨田论文。

㊹ 当时在新罗连续发生了地方豪族的叛乱，892年甄萱占领武珍州，900年建都于完山州，自称"后百济王"，901年弓裔于松岳(开城)称王建立"后高句丽"，这一时期史称后三国时代。

㊺《新唐书·北狄·渤海》，6182页。

㊻《新唐书·百官志》鸿胪寺条，1257—1258页。

㊼《唐六典·鸿胪寺》典客令条。

㊽ 同上。

㊾《新唐书·百官志》礼部主客郎中条，1195—1196页。

㊿ 关于唐代"蕃望"规定，参照注㊶黎虎书第八章《唐代外交专职机构》，310—354页。

51《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10355页。

52 据《唐六典》卷二十四《诸卫·左右领军卫条》有"翊府中郎将各一人，正四品下"。

53《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请求》，11722页。

54 642年百济向新罗开始采取大规模的侵略政策，《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二年条》云"(义慈王)二年(642)秋七月，王亲帅兵侵新罗猕猴等四十余城。八月遣将军允忠领兵一万，攻新罗大耶城。城主品释与妻子出降。允忠尽杀之，斩其首，传之王都，生获男女一千余人，分居国西州县，留兵守其城。王赏允忠功，马二十匹，穀一千石……"。《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三年条》云"(义慈王)三年冬十一月，王与高句丽和亲，谋欲取新罗党项城，以塞入朝之路遂发兵攻之。罗王德曼遣使，请救于唐，王闻之罢兵"。将642年定位于朝鲜半岛形势转折点的另一个理由是，此年十月高句丽国内发生了一次政变，西部大人盖苏文弑荣留王(建武王)夺取政权。高句丽王朝内的一部分贵族与荣留王联手图谋诛杀盖苏文，但其谋略泄漏，图谋诛杀苏文的一百多名贵族在宴会席上为苏文所杀，后来苏文驰入王宫杀建武。这次政变之后苏文立宝藏王继位，自立为"莫离支"，自专国政。日本学者鬼头清明在其著作《白村江》(教育社出版，1981年，35—40页)中认为这次政变后高句丽贵族分权色彩浓厚，旧体制被消灭而建立了以盖苏文为首的专制体制，以致高句丽国家体制的空前强化。但同时这次弑国王的政变正好给唐朝提供了征伐高句丽的一个极好借口，其实唐征伐高句丽的强硬路线在盖苏文政变之前早已存在的(参李成市《关于高句丽泉盖苏文的政变》，《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岩波书店，1998年，113—129页)此事

件给太宗提供了讨伐的极好名分。无论如何，这次政变成了唐丽战争的起点。由此观之，642年的确是东北亚政治的国际性转折点，不仅是朝鲜三国之间的冲突，而且整个东北亚各国都被卷入以642年为起点的围绕朝鲜三国形势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包括642年义慈王所发动的对新罗战争，645年、648年、660年、668年唐朝连续发动的对高句丽战争，660年百济灭亡，663年白村江之战，668年高句丽灭亡，670年至676年间发生的唐罗战争等。这些国际事件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关联性。

55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善德王十一年条，104页。

56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善德王十二年条，104页。

57 同上。《新唐书·高丽传》6188页《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外臣部》11639页也有相同记载。

58 井上秀雄《古代朝鲜》，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206页。三池贤一《金春秋的王位继承》，《法政史学》第二十号等。

59 这次叛乱是毗昙、廉宗等以"女王不能善理"的名义针对善德王发起的叛乱。善德王似乎在这次叛乱中死于非命。叛乱仅仅半个月就被真德王及其属下镇压，三十余名贵族被诛杀。从此记载来看，可想而知这些叛乱给新罗政局带来的动摇和混乱正如《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中所记载的那样，是非常巨大的。"毗昙之乱"可以说是支持善德王维持现状的一派和主张废除善德王拥戴唐太宗指派的新王的一派两派间的政治斗争。以毗昙为首的庆州豪族以"女王不能善理"为由逼迫善德王退位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井上秀雄在《新罗政治体制的变迁过程》（《新罗史基础研究》，1974年所收）中认为毗昙之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贵族向中央贵族的夺权斗争，一方是以毗昙为首的中央贵族，另一方是以拥护善德王为名夺权的金春秋、金庾信等地方贵族。但武田幸男在《新罗毗昙之乱的一视角》（《三上次男博士喜寿记念论文集历史编》，吉川弘文馆，1985年）中认为把春秋、庾信视为地方贵族或中小贵族是不适当的，这次斗争主要是源于外交政策上的对立观点，毗昙、廉宗等亲唐依存派遵从唐朝要求推进对唐外交，与他们相反的春秋、庾信等亲唐自立派也依赖唐朝的援助，在这一点上两派没有什么不同，但春秋等人同时还要求保持本国王权的自主性，这是两派之间根本的分歧所在。

60 注59武田论文；铃木靖民《东亚的国家形成》，《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三卷古代二，67页；石母田正《日本古代国家》，30—31页。

61 参注54李成市《关于高句丽泉盖苏文的政变》。

62 《资治通鉴》贞观十五年八月条，6169页。

63 同上，6169—6170页。

64 《新唐书·高丽传》，6187页。

65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德王二年条，105页。

66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真德王二年（648），春秋向太宗"又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于是，内出珍服，赐春秋及其从者"；三年"春正月始服中朝衣冠"，四年"是岁，始行中国永徽年号"。

67 注60铃木论文，66—67页。

68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武烈王元年五月条，107页。但新罗一直到后代都没有制定被体系化了的律令法典，这点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参见北村秀人《朝鲜律令制的变质》，《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七。

69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武烈王七年秋

七月九日条，108页。

(70)《旧唐书·百济传》，5331页。

(71)《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三年夏四月条，124页。

(72)《旧唐书·高丽传》，5327页。

(7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6359页。《旧唐书·高宗纪》总章二年五月庚子条有更详细的记载："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

(74)《三国史记》，147页。

(75)《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五年条，151页。《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也有"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76)《资治通鉴》卷二百二，6378页。

(77) 西岛定生《六—八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二，岩波书店，1962年。

(78) 池内宏《高句丽灭亡后的遗民叛乱及唐与新罗的关系》，《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与东亚》，校仓书房，1976年，139页。

(79) 参见注⑦古畑彻《自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新罗、唐关系——新罗外交史的一试论》，《朝鲜学报》107号。

(80)《资治通鉴》卷二百二，6385页。

(81)《旧唐书·张文瓘传》，2815—2816页。

(82) 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三知院，1990年，44—46页。他主张新罗统一半岛并不是依靠外部势力(唐)的他律性统一过程。他强调新罗利用外势(唐)侵灭丽济两国后，从半岛主动逐出唐朝势力实现统一的自律性统一过程的一面，实际上七世纪新罗统一半岛过程中，670—676年的七年间发生的唐罗战争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意义极为重要。新罗依靠自身的力量，同时利用高句丽故土豪族的反唐运动及反唐意识追逐唐军势力，实现了半岛的统一(参注58井上《古代朝鲜》，208页)。不过同时他也举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二所载的"张文瓘劝阻高宗伐新罗"的记载，强调西域吐蕃势力边患成为唐朝的军事威胁，结果唐朝的西边危机使它回避与新罗的最终对决。

(83) 参《唐会要》卷九十七《吐蕃传》仪凤三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册2052页。

(84) 栗原益男《唐的衰亡》，《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七卷，学生社，1982年。

(85) 金子修一《从中国看渤海国》，《しにか》，1998年。

(86)《旧唐书·德宗纪》上大历十四年闰五月丙子条，320页。

(87)《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八。

(88) 注30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89) 注88栗原论文。

(90) 金子修一《关于唐代周边民族的郡王号》，《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36号，1981年。

(91) 参注89金子论文。直至八世纪初，唐授予新罗王的"乐浪郡王"这一封号到孝成王(737—741年在位)时期就消失了。唐对罗渤两国授予封号情况的差异就是唐朝国际意识的一种反应。

(92) 参铃木靖民《奈良时代的对外意识》，



收在《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201页。

⑬ 参森公章《古代日本对唐观的研究》，《古代日本对外认识与通交》，吉川弘文馆，1998年。

⑭《续日本纪·宝龟十年夏四月条》，448页。

⑮ 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日本学》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页。

⑯ 从此可以看出朝鲜古代史的一大特征。即朝鲜史上始终存在来自中原王朝的无形的政治压抑感。换言之，它始终有被吸收到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一元性政治秩序中的可能性。如何自居中原王朝忠实藩附，并长期保持良好的宗藩关系，同时又如何维护本国政治权威和统治秩序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这是每一代半岛王朝共同的政治课题。这种局面不仅是新罗时代的特征，而且贯穿于整个朝鲜古代史。后来，高丽王朝、朝鲜王朝时代也的确存在同样的政治课题。

⑰ 参石母田正《天皇与诸蕃》，《古代国家论 一》，岩波书店，1973年。

⑱ 参北村秀人《朝鲜律令的变质》，《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七；铃木靖民《东亚的国家形成》，《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三卷古代二，岩波书店，1994年，67页。

⑲ 森公章《古代耽罗历史与日本——以七世纪后半期为中心》，《古代日本对外认识与通交》，吉川弘文馆，1998年。

⑳《三国史记》，123、151、210页。

㉑《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年条，127—128页。

㉒《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四年条，151页。

㉓ 参村上四男《新罗与小高句丽国》，《古代朝鲜》，学生社，1974年。

㉔ 参注①酒寄论文；井上秀雄《古代朝鲜》，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210页。

㉕《续日本后纪》承和三年十二月丁酉（三日）条，59页。

㉖ 石上英一《古代国家与对外关系》，《讲座日本历史》古代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252—254页。

㉗ 注⑪石母田正论文；铃木靖民《奈良时代的对外意识》，收在《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西岛定生《六—八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二，岩波书店，1962年。

㉘《隋书·倭国传》，1828页。

㉙ 其实，此后日本人对朝鲜的认识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形态，即一方面尊敬先进于自己的朝鲜文化，另一方面对朝鲜总是抱有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甚至蔑视感。这种对朝鲜半岛政治认识与文化认识之间的差距、矛盾一直贯穿于整个古代日韩关系史当中。

“黑貂之路”质疑

——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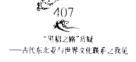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全球范围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随着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地区合作趋势的加强，以及全球化问题的产生，东亚各国学界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致力于民族史的构想，从而将历史限定为民族国家形成史”①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现在，我们应该而且可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从地区乃至世界的广度来观察和研究相关历史，也应该而且可以从地区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反观本国历史的演变，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世纪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即希图藉近年俄国学者提出的所谓“黑貂之路”问题作一个案，就古代中国在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中的地位略做讨论。错谬之处恐难免，还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

经由朝鲜半岛南部连通日本九州地方的交通路线，历来被认为是古代大陆文化传往日本的大动脉。近年来，随着学术的发展和视野的开阔，另外一条路线，即包括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北部和俄国滨海州的广大地域与日本列岛间在古代以日本海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开始越来越引起历史学界的注意②。“黑貂之路”就是部分俄国学者对这一交通道路的一种



描述。

俄国学者所谓“黑貂之路”主要是指：连接渤海、女真等东北亚古代民族与中亚的、有别于传统的丝绸之路而经由北亚的贸易道路。他们认为，中国东北的貂皮贸易早在东汉时代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当时称之为“挹娄貂”。降至唐代，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民族向外国市场贩卖的黑貂毛皮大受欢迎。通过与这些民族进行直接交易的粟特人（今塔吉克人的祖先）的传播，“挹娄貂”在中亚伊朗系族人中也变得广为人知。既然粟特人是在这种情况下开辟的贸易路线，那么这条道路当时就有可能被称作黑貂之路。那时这条贸易道路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粟特人从当地民族获取极为贵重的黑貂皮等商品然后带回（中亚）本国的通路③。

这条黑貂之路的大致走向是：从七河地区（Semirechye，指中亚巴尔喀什湖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出发，经过阿尔泰山区、南西伯利亚、蒙古西部，到达色楞格河流域；从这里看来是经集尔浑河（疑当为楚库河 Chikoj，色楞格河支流，其汇合处正在清代的买卖城/恰克图附近）上游，前往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上游；沿着这些河流，水路可以通达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从而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乃至进入东北亚内陆④。粟特人在所到之处建立移居地，以作为游牧民袭来时进行防卫的避难所，或者为商业驼队、船队提供必要的替补工具，以及对获取的商品进行选择、分类、打包启运等等。对这些移居地遗迹的追溯是探索古代交通径路的重要手段。俄国学者也试图以此来推测判定所谓“黑貂之路”及其走向。近年提出的有关这条道路存在的主要论据是：

（一）伯力州发现的中亚银币，现藏伯力州立博物馆。该银币为卑路斯以及瓦弗兰五世时代萨珊银币仿制品，七至十二世纪在中亚实际上作为流通货币使用⑤。

（二）赤塔市立博物馆所收藏的一面中亚铜镜，出土于赤塔州普里阿尔贡（Priargun）地区库赤村，其地适处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的汇流地带。铜镜的背面图案是一个骑乘者，刻有粟特语或伊朗语似的文字⑥。

（三）与上述同样的铜镜在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也有发现。

（四）滨海州哈桑（Khasan）地区克拉斯基诺（Kraskino）村土城遗址出土的工艺品，经研究认为，即使不是中亚原产，也是中亚产品的仿制品⑦。同遗址发掘到的还有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该土城据认为就是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所属盐州龙河郡的州治遗址，克拉斯基诺一地清代有汉语名称颜楚、眼春，近代叫烟秋，看来均为盐州一名之音讹。克拉斯基诺土城面对波谢特（Posyet）湾，土城前通海岸（港湾）的道路仍依稀可辨，出海湾即是日本海。《新唐书·北狄渤海传》记载："龙原东南濒海，日本道也。"所以日本学者认为，克拉斯基诺土城就是古代渤海国与日本海路交通、贸易的出发地。⑧俄国学者则说："靺鞨国家渤海形成以后，黑貂之路的海路部分就被称作了'日本道'。"⑨

（五）1995 年 10 月俄国学者还在滨海州阿尔瑟尼耶夫（Arsenyev）市收集到一枚黑衣大食时代的中亚银币。该银币发现于乌苏里江支流阿尔瑟尼耶夫卡河流域的诺沃果尔杰耶夫卡（Novogordeevka）村附近，这一带为中世纪城寨村落遗迹的集中之地，因而观光客经常光临此处。这枚银币直径 26 毫米，下半部残缺，细部与中亚古城片吉肯特（Pjandzhikent）遗址所出银币类似，为古代中亚安国（Bukhara，今属乌兹别克斯坦）银币德拉赫木（Darahim）图案的仿制品。银币表面用点线铸出王的正面胸像，王冠上部可见半月与星的形状，王冠左边铸有阿拉伯文 al-Mahdi，王脸的右边铸有安国语文，专家的意见认为其意为"安国王"⑩。因此，这枚银币很可能是黑衣大食呼罗珊总督穆罕默德·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758—768）在任时所铸⑪。

俄国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这些考古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应该说是无可怀疑的。然而，材料的真实并不表明论点的真实。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中亚器物更可能经由哪条道路到达东北亚地域？



二

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上到处经商，沿途建立他们的移居地，这在学界早有研究，而且可谓成果累累[12]。这些研究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知识领域，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古代世界沟通东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认识。实际上，由于国际学术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已扩大为对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外延已由旧有的绿洲道扩大到草原道、南海道甚至海东道——通往美洲的“白银之路”；“丝绸之路”研究的对象已不仅仅是道路，而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各种途径。然而，这些途径中最重要的、资料最丰富，从而研究成果也是最多的，无疑仍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由古代中国及其附近地区的交通道路。换言之，古代东亚交通网络的中心是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一观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的交通状况还是考古发现的产品流布，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13]。

近年来，随着考古文物的出土，文书、碑志新资料的刊布，有关粟特人在中原活动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粟特人在中国传统文献史料中被称作“昭武九姓”，有康（Samarkand）、安（Bukhara）、石（Tashkent）、曹（Kaputana）、米（Maymurgh）、何（Kushanik）、史（Kishsh）等著姓[14]，国内学者已有利用新资料对流寓中国的安氏家族、史氏家族分别进行系统研究[15]；全面研究粟特人在中原迁徙分布状况的新成果亦于近期刊布问世[16]。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古代粟特人在中国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北方[17]，而东北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则是他们聚居活动的一个中心。史料记载，盛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18]，据研究，两人实际都是流寓该地的粟特部酋[19]。

营州即十六国诸燕所据龙城，又称柳城、和龙、黄龙。其地位于辽西走廊，东通渤海，北接契丹，西邻突厥，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无论是就古代东、西交通还是就中原与东北的交通而言，以营州为中心的

辽西走廊在历史上均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发现较早的反映东、西交流的文物，有罗马风格的玻璃器。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在北票县(适在朝阳东北)西官营子村发掘北燕贵族冯素弗(死于415年)墓，出土了五件玻璃器。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玻璃的基本成分与罗马玻璃相似。其中一件淡绿色透明的鸭形注，器形与公元一至二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相似[20]。韩国庆州博物馆展品中也有类似的器物[21]。中国学者认为："慕容鲜卑-三燕文化墓地骑马遗物及金花步摇冠、玻璃器等成系列发现，为其东传朝鲜、日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考古学实物见证。"[22]日本学者将其称之为"玻璃之路"[23]。

至于中原地区经营州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交通更是早就发展起来了。先秦史籍已有"肃慎氏贡楛矢石砮"的记载[24]，中国民族史学者认为，肃慎即汉晋挹娄、北朝勿吉、隋唐靺鞨，后代"女真"为其音转[25]。提出"黑貂之路"的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本人也说："在中国东汉时代，被称为'挹娄貂'的毛皮很受欢迎，当时中国人从挹娄民族(其居地在今中国东北和俄国滨海州一带)那里大量输入这种毛皮，所以我曾以'黑貂之路'一名称呼这样一条贸易路线。"[26]《魏书·勿吉传》略云："去延兴(471—476)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477—499)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乙力支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汎达其国。"这是有关交通道路的明确记载。难河即今松花江及其上游嫩江，太沵河即嫩江支流洮儿河，洛孤水即今西拉木伦河[27]。降至唐代，史籍明确记载渤海国对外交通道路有五条，即日本道、新罗道、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28]，很明显，后三条道路都通向中原内地。贞元(785—805)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历数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七条，首述营州入安东道，记载了从营州经安东都护府至平壤、至渤海王城、至黑水靺鞨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



城镇[29]。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关系，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言。我们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为《续日本纪》等史料所证实，渤海国与日本间的直接海路实际上是中原内地通往东北道路的延续，日本遣唐使所谓"渤海路"的两条路线，一条即上述营州道，一条即上述朝贡道[30]。

第二，如前所述，俄国滨海州哈桑地区的克拉斯基诺土城被认为是渤海通日本道起点东京龙原府所属盐州龙河郡的州治遗址，就在这里，与仿制中亚工艺品同时出土的还有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在滨海州和伯力州还都发现过北宋钱币、描花瓷器，甚至蚕茧[31]。即使是上述那枚黑衣大食时代仿制的中亚安国银币，也带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据发表者说，该钱币正面"王冠上部可见到半月与星的模样"[32]，这是唐钱开元通宝最典型的标记，俗称背月纹，传说是蜡制钱样造好后送到宫里被杨贵妃掐了一下留下的痕迹；还有背面所谓"直角的椊（方框）"[33]，其实就是中国古钱方穿的残存。

显然，古代交通和遗物都证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中原地区有着传统悠久的联系。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既然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的重要路段之一，它当然也会为粟特商胡所利用。

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34]。实际上，杂胡或杂种胡之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35]。曹魏时已有"西域杂胡"之名[36]。尽管魏晋时代杂胡或杂种胡之名习指与匈奴有关的各部族，但晋人常常以其中的羯胡作为杂胡的泛称，而羯胡如石羯（= Tashkent）显然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37]。据研究，羯胡中还有许多西域姓氏，他们有的早就到了东北地区：《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云："降胡粟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与（石）祗"；石勒初起十八骑中之西域姓尚有夔安，《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脂韵夔氏条云："石虎有太保夔安，自天竺徙辽东，玄孙逸，姚秦司空，腾仕后燕"。《魏书》卷三十《安同传》云："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

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唐长孺先生认为：安世高是汉末高僧，既是僧人，就不大可能有后系，“所以安同世系一定出于伪托，但辽东之有西域胡却由此证明”[38]。吴玉贵则明确指出：“安同的身分显然是负有外交使命的商胡。可见安同的父亲虽然做过小官，但他的家族最初仍然是以商胡的面貌出现的。”[39]唐先生说：“只是夔安为石勒十八骑之一，似不能从天竺（直接）迁居辽东，我想夔氏之迁居应在石赵灭后。”[40]受此启发，我以为昭武九姓（粟特商胡）入居东北最早可能也与石赵的兴亡活动有关。石氏前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东北相当近便。冉闵灭羯，“胡羯去者填门”，“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41]，这更逼得他们逃往塞外避难。直到唐初，营州石氏还有很大势力。武德四年（621）六月，“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42]。突地稽为内附的粟末靺鞨首领[43]，该部留居旧地者后来成了渤海国的主体。

据研究，粟特人还深入到靺鞨居地建立了聚居地。汉文史料记载，辽金时代在松花江下游住有五国部。俄国学者认为，五国部民族在语言、服饰、居室、农耕等方面与其南边的女真族都有所不同，《契丹国志》记载五国部人自由地与北方蛮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因而很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粟特商胡。尤其是其头部首领居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位于牡丹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又名五国头城，很可能就是粟特语城名片吉肯特（Pjandzhikent，意为五城）的汉译。片吉肯特是中古中亚的一座著名城镇，粟特人以此来命名自己在东北亚的一个大移居地，很可能是出于对故乡的怀念。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学家又把这个城镇的汉译名称记录了下来[44]。粟特城镇及其移民聚落多有五城、新城（Nowkat）之名，这个问题值得专门研究。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东北民族城镇有汉译名称，且为中国史家所记载，这本身不就说明了当时东北与中原内地间传播交流的方向和路线问题吗？



显然，粟特商胡入居东北仍然主要操持旧业，即东、西往来兴贩。我们注意到营州石氏和粟末靺鞨的特殊关系，其实粟特商胡也一直与自己在中亚的故国保持着密切联系。1906年，英籍探险家斯坦因(M.A.Stein，1862—1943)在敦煌以西的TXIIa号古烽燧下发现九封"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四世纪初年，其中数封内容为粟特人从姑臧(凉州，今武威)或敦煌向在中亚的康国(Samarkand)和安国(Bukhara)汇报经商的情况和困难[45]。太延五年(439)北魏破姑臧灭北凉，在凉土贩货的粟特商胡悉数被掳往当时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经粟特王遣使请求，这些俘虏才被允许赎出。研究者认为，粟特王向北魏提出赎还商胡，说明聚居凉州的粟特人一直与祖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46]。

近年在中国北方广泛发现的有关中西交通的遗迹遗物，证实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开展各种交流，内容丰富而活跃[47]。"从文献记载和丝绸之路上的某些文化遗址来看，他们不仅在发展东、西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传播文化、促进多国之间的政治往来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48]例如，经过这条道路从西域传到新罗的除了上述玻璃器之外，还有各种香料、瑟瑟、玉石器、氍氀㲪㲣、罽、孔雀尾、翡翠毛、苜蓿、花树对禽纹金具、立树双鸟纹刻石、嵌玉金饰短剑乃至挂陵和兴德王陵前的胡人翁仲等等，此外，西域的许多乐器、杂技、工艺技法也都传到了新罗[49]。中日文化交流史方面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日本与新罗积怨甚深，日本朝廷时有征伐新罗之议，因而渤海立国以后，尤其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大钦茂嗣立转而密切与唐帝国的关系，为日本朝廷保持与唐帝国的联系提供了一座无可替代的桥梁[50]。日本学者曾经研究过火祆教传入日本及其在日本的影响问题[51]，学界公认，这种波斯宗教在东亚的流传多半与昭武九姓胡即粟特人的活动有关[52]，近年人们在渤海国赴日使团的名单中发现了出身史国的粟特胡人史都蒙以及出身安国的粟特胡人安贵宝的名字[53]，更为祆教东传日本及其途径添一佐证。

当然，上述文化交流的成就未必都是粟特人的功劳，唐朝商人、渤海

商人、新罗使者、日本使者等都曾积极参与其间[54]，甚至在中亚古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的壁画上也都出现了朝鲜人使者的形象[55]。无论如何，这条传播交流的路线主要是传统丝路的东向延伸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三

其实，俄国学者最初也是承认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欧亚大陆，包括东北亚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的。如前所述，"黑貂之路"一名最初就曾被夏富库诺夫本人用来称呼东汉时代挹娄貂输入中原内地的贸易路线。然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认为：从六世纪初到十四世纪末，除了直接从当地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等极为贵重的商品之外，"粟特人不得不在丝绸之路以外另辟一条通向东北亚的贸易道路的理由是，丝绸之路经由许多国家的领土，而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平的，对于贸易商队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黑貂之路的大部分在政治关系上是平稳的，通行是安全的，能够维持不间断的运转"[56]。问题在于，丝路沿途的政局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交通贸易？同时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就一定平稳吗？

先谈第一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时代，由于中国南北政治对立，丝绸之路的走向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变化，主要是河西走廊与经由青海的"河南道"的更替。

早在汉代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着河西走廊的匈奴，就曾"并南山欲从羌中归"[57]，说明当时在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之间，已有一条辗转连接的交通路线。晋、南北朝时期，从辽西徙居的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黄河以南地区，受南朝封为河南王。由于南北对立，东晋南朝经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河南



道”[58]。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定一些，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也走这条道。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内发现大约五世纪末埋藏的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后来收集到七十六枚，都是萨珊波斯国王卑路斯（Pirus，459—484）时代所铸[59]，可以看作是五、六世纪时河南道上东、西交流繁盛的证据。

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阳，更是当时中外人士汇聚、文化交流的最大中心。据当时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水、洛水之间，御道两旁尽是安置四方来客居住的宾馆和住宅小区。道东有四馆：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龟兹馆；道西有四里：归正里、归德里、慕化里、慕义里。东方来客安置在扶桑馆，赐给慕化里的住宅；西方来客安置在龟兹馆，赐给慕义里的住宅。“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但却反映了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据说当时在洛阳，外国人因为喜欢中国风土民情，留下居住的不可胜数，因而产生了一万多家归化侨民。他们居住的地方街巷整洁，住宅整齐，人烟稠密，绿树成荫。更重要的是，天下难得的贵重货物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为此，在洛水以南专门设置了一个“四通市”，顾名思义，就是沟通天下四方的市场[60]。

分立时期尚且如此，隋唐中国统一，交通安全有了保证，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出现空前盛况自不待言。

再谈第二个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是漠北蒙古高原、阿尔泰山区和南西伯利亚。

北方广阔的欧亚草原（Eurasia）是古代游牧民族藉以立国的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往来，并在世界历史上几度引起民族大迁徙浪潮的通道[61]。自北匈奴西迁以后，东胡鲜卑族移居匈奴旧地，逐渐强盛起来。魏晋时期，北方草原上活动的主要是鲜卑各部。西伯利亚（Siberia）一名的产生可能就与鲜卑当年的活动有关。鲜卑拓跋部南迁建北魏，东胡柔然的势力崛起于北方草原。四、五世纪之交，柔然首领社仑北侵高车，兼并诸部，扩张势力，同时与北魏形成对立。北魏曾多次派大军远袭柔然，

造成柔然不断有部落西徙。由于柔然扩张，迫使匈奴余种哌哒(Ephthalites)自阿尔泰山南迁和阗以西的葱岭(帕米尔)地区，并于五世纪中叶攻灭后期贵霜，在大夏故地建国。高车本来在大漠南北(今内、外蒙古)与柔然杂处，双方经常发生战争。486年，高车分裂，副伏罗部阿伏至罗率十余万落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自立为王，高昌亦脱离柔然控制而依附高车。高昌西北本是悦般人分布的地区，悦般自448年遣使北魏后不再见于史籍，可能是并入高车了[62]。

六世纪中叶，原服属柔然的突厥(Turk)部落兴起于阿尔泰山南麓。546年突厥灭高车。552年突厥破柔然，从而建立起强大的突厥汗国。567年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哌哒。从此，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达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都落入了突厥汗国的控制之下。

然而，诚如《中世纪欧亚草原》的编者所指出："整个突厥汗国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和内乱"[63]。581年突厥他钵可汗病死，突厥汗国出现了五可汗并立的局面，经过几年混战，到583年正式分裂为北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此后双方挐斗不已，北突厥南下投靠隋朝，西突厥由于内乱也向隋朝表示臣服，阿尔泰山区和蒙古高原则为反叛的铁勒诸部所据有。隋末唐初，突厥一度强盛，但恢复了元气的唐朝很快便联合漠北薛延陀于630年消灭了北突厥汗国；646年，唐朝又出兵漠北，在九姓铁勒的配合下消灭了薛延陀汗国；650年，唐朝追兵至阿尔泰山，消灭了北突厥的残余势力。西突厥十姓部落连年内战[64]，汗国终于在657年也被唐朝消灭。但事情并不止于此，吐蕃(629—846)势力接踵而至，在西域与西突厥余部通谋连兵，使唐朝的安西四镇几经弃置。七世纪末西突厥诸部势力重组，突骑施从中兴起。东边受唐朝安置的突厥降部也于682年重新起事，征服了漠北九姓，并于711年左右一度吞并了突骑施汗国[65]。只是好景不长，716年默啜可汗在镇压漠北九姓的叛乱中遇刺身亡，东突厥从此一蹶不振。734年毗伽可汗被毒死，汗国陷入长期内战，经历几个短命的可汗



之后，九姓回纥联合拔悉蜜、葛逻禄于744年另起炉灶，并于次年最终消灭了东突厥[66]。

回纥（后改称回鹘）汗国从来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阿尔泰山以西的三姓葛逻禄一开始便自立叶护，与回纥争强，于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征服突骑施，南迁七河地区。据有南西伯利亚的黠戛斯则一直与回纥为敌，《新唐书·回鹘传附坚昆》：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结果是回鹘在与黠戛斯争斗二十年以后，竟于840年被后者扫灭，赶出了蒙古高原。

回鹘汗国的崩溃为锡尔河流域的乌古斯（Oguz）部落联盟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寄蔑（Kimak）部落联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寄蔑原居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九世纪末，其势力向南扩展到了七河东北和准噶尔-阿拉套地区，同时在游牧于咸海一带的乌古斯东北边出现了钦察人（Kipchak）。到十一世纪初，寄蔑的政治权威把钦察人也囊括了进来，这一寄蔑-钦察部落联盟占据了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沿岸的大部分草原。[67]东边的蒙古高原则于十世纪就落入了契丹人所建辽朝（916—1125）的治下。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并不比传统丝绸之路所经的南部绿洲更平稳。

其实，粟特人未必会从中亚直接到东北民族手里获取黑貂皮，更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沿途经商，转贩贸易。在蒙古高原北部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中亚器物也可以经由其他途径到达那里，例如《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收贾耽《皇华四达记》佚文所列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就详细记载了从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南）经乌德鞬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回鹘衙帐至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北岸富贵城、再北至骨利干（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又西至都播（今俄罗斯图瓦自治共和国）、再北至坚昆（今南西伯利亚）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地点、驿站[68]。而回纥汗国的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在其纪功碑（即古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中说："我于鸡年（757）让粟特

人、汉人在仙娥河畔建造了富贵城。”显然，粟特人更可能是从中原到这里来的。

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还说，粟特胡人安禄山叛乱时，丝绸之路大部分在唐朝朝廷控制之下，他能同装备充实的唐朝大军作战，其武器装备、军需物资甚至兵员补充只有通过黑貂之路才能从中亚得到[69]。然而据研究，“安禄山在起兵之前，派遣粟特商胡往各地兴贩贸易，并招各地商胡来输运外国珍奇财货。《事迹》记安禄山多次进贡给玄宗金银器皿等物，玄宗回赐品价值也不可轻估。这些商业兴贩所聚之财和进贡回赐所得之物，都构成安史叛乱的经济基础。”[70]而安史叛乱时，所谓“黑貂之路”所经之地大部分控制在回纥人手里。众所周知，回纥人曾两次出兵并最终帮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说安史经回纥运兵纯属信口开河。

四

所以，本文的结论是：

（一）“黑貂之路”就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提供了一种说法，但目前尚难令人首肯，更不能取代前人已有的说法；

（二）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

（三）《旧唐书·西戎康国传》说粟特人“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71]广袤富饶的中华大地为古代东北亚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最佳途径，它并未因绿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变动而被取代[72]。



注释：

① 古畑彻《李成市著〈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书评），载《唐代史研究》第2号，日本唐代史研究会，1999年，84页。

② 参李成市《古代东北亚诸民族之对日本通交——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载《东亚的古代文化》，大和书房，1998夏·96号，88页。

③ 见E.V.夏富库诺夫《东北亚民族历史上的粟特人与黑貂之路》，同上引《东亚的古代文化》96号，139—140页。

④ 同上文，140页。

⑤ 参夏富库诺夫、V. M. 瓦西里耶夫《黑龙江流域的珀库罗夫文化：断代与族属诸问题》，收在《有关远东与贝加尔地方中世纪考古学资料》，海参崴，1989年。

⑥ 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1页。

⑦ 同上文，139、144页。并请参同作者《渤海人及女真文化中的粟特－伊朗要素》，收在《西伯利亚古代文化问题》（学术论文集），新西伯利亚，1985年；《有关十二世纪及十三世纪初叶黑貂之路（Sable Road）沿线中亚、滨海州地区人民通商活动的新资料》，收在《一九九一年度：北方历史·文化交流研究事业：中间报告》，北海道开拓纪念馆，1992年。

⑧ 参铃木靖民《渤海国家的构造与特质——首领、生产、交易》，载《朝鲜学报》第170辑，日本奈良：朝鲜学会（天理大学内），1999年，9页。

⑨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3—144页。

⑩ 参O.I.斯米尔诺娃《片吉肯特城址出土钱币目录》（1949—1956年发掘调查），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部，1963年。

⑪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

⑫ 如我国学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论文集，三联书店，1979年，1—116页；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收入其《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25—35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2页以下；唐长孺《魏晋杂胡考·羯胡》，收在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78年，414—427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86年第2期；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63页，等。日人有桑原骘藏《论隋唐时代来住中国之西域人》，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68年，314—344页；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收入氏著《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67页，等。

⑬ 参前引铃木靖民文第六节《远距离贸易与承担者——粟特商人、唐商人、渤海商人》，18—26页。

⑭ 参（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72—98页。

⑮ 如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95—338页；罗丰《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35—278页；荣新江《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说》，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⑯ 参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27—86 页。

⑰ 同上,并请参姜伯勤《介休袄神楼与宋元明代山西的袄教》,载《东洋学报》第 80 卷第 4 号,1999 年 3 月,1—28 页。

⑱ 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1、42 页。

⑲ 同前引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31 页。并请参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收在《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1997 年,235 页以下。

⑳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冯素弗墓"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128 页。

㉑ 参《追索东方之光——丝绸之路与韩国文化》(画册),庆州世界文化博览会组委会,2000 年,95—97 页,图版 138—142。

㉒ 孙守道《游牧骑马民族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记马具、带饰、金花冠、玻璃器、罗马金币在辽宁的出土》(提要),《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通讯》第 6 期,1995 年,17 页。

㉓ 如由水常雄《玻璃传来之路》(上),载《东亚的古代文化》1988 秋·57 号,89—117 页;同文(下),载同刊 1989 冬·58 号,202—228 页。并请参同作者《关于古新罗古坟出土的罗马玻璃》,载《朝鲜学报》第 80 辑,1976 年 7 月,37—71 页),其中探讨古新罗古坟出土罗马玻璃十八件,断代为五世纪至六世纪初。作者由较多的西方文物出土而认为,"这显示古新罗吸收了与中国系的高句丽、百济文化不同的希腊罗马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异质文化的能量蓄积,应该就是弱小孤立的新罗依靠与中国的联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的原动力";"新罗统一半岛以后,对中国文化的摄取盛行起来,希腊罗马文化的输入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透过中国文化过滤的西方波斯文化"(38 页),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讨论的价值。有关玻璃器传播的最新介绍,见谷一尚《西方系凸雕玻璃容器的系统与传播》,译文收入《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 年,41—49 页。

㉔《国语》卷五《鲁语》下,上海书店"国学基本丛书选印"本,1987 年,73 页。

㉕ 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177—178、408—409、466—467 页。

㉖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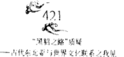
㉗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 年,1758—1760 页。

㉘ 见《新唐书》卷二百十九,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正史均为此本),1975 年,6182 页。

㉙ 同上书卷四十三下,1146—1147 页。

㉚ 见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载《日本学》第 7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16—17 页。

㉛ 见 V.I. 鲍勒金等《远东人民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工作》,载《1986 年的



考古发现》(Arkheologicheskie otkrytiya 1986 goda),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223—224页。

㉜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

㉝ 同上。

㉞ 氏撰《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2页。

㉟ 参前引唐长孺《魏晋杂胡考》,382页以下。唐先生引《后汉书》卷一百六《循吏任延传》:"拜武威太守……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居要害",指出:"这是光武帝(公元25—57年)时事"(383页)。

㊱ 见《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仓慈传》,参前引吴玉贵文,302—303页。

㊲ 参前引唐长孺文,382及414页以下。

㊳ 同上,425—426页。最近有关安同的研究参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31页;前引吴玉贵文第三节《安兴贵家族与安同》,308—315页。

㊴ 同上引吴玉贵文,310页。

㊵ 同前引唐长孺文,426页。

㊶《晋书》卷一百七,2791—2792页。

㊷《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中华书局标点本,5920页。参前引吴玉贵文,297页。

㊸ 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5358—5359页;《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族俗考》。

㊹ 见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141页。

㊺ 参前引张广达文,80页注②。

㊻ 见前引吴玉贵文,305页。

㊼ 参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载《考古》1978年第2期;宿白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及"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条,676—681页;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173—190页;齐东方、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切子装饰玻璃器》,载《创大亚洲研究》第16号,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1995年,53—61页。

㊽ 同前引张广达文,71页。

㊾ 参穆罕默德·坎苏《新罗、西域交流史》第IV章第3、4节,汉城檀国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236—284页。

㊿ 参前引宋成有文,13—16页。

(51) 见伊藤义教《火祆教之传来》,载《东亚的古代文化》1987春·51号,142—161页;木村千惠子《试释天武天皇的挽歌"燃烧的火"》,同前刊同号,162—180页;伊藤义教《有关法隆寺传来的香木铭》,同前刊1988冬·54号,96—105页;同作者《我之"从西域到日本"》,同前刊1988秋·57号,67—79页,等等。参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3页。

(52) 见前引张广达文,77页。参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蔡鸿生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1页。

(53) 见前引铃木靖民文,19页。

(54) 同注⑭。并请参田边胜美《粟特美术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乘狮子娜娜女神像的文化交流史分析》,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0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年,213—277页。

(55) 参穴泽和光、马目顺一《关于康国都城遗址(Afrasiab)出土壁画所见之朝鲜人

使者》,载《朝鲜学报》第80辑,1976年,1—35页。

㊺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0页。俄国学者论证和断代的根据还有诸如"室韦"一名为塔吉克语沼泽之意,黑水靺鞨首领称号"莫拂"一词为古伊兰民族称呼东方皇帝即天子用语,等等。这些需要专门考证,本人拟另撰文讨论。

㊼《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3159页。

㊽ 参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68—195页。

㊾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收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66页。

㊿ 参(北魏)杨衒之原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60—161页。

61 见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收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261页。

62 参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100—103页。

63 见V.A.马基里尼科夫等编《中世纪欧亚草原》(Stepi Evraziiv épohu srednevekhov'ya)第一部第2章《6—10世纪西伯利亚古迹》,莫斯科"科学"出版部,1981年,29页。本书为前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十年代策划的巨著"二十卷本苏联考古学"之一,该书不分卷次,编好一卷出一卷,到八十年代末仅出了九卷,看来以后就夭折了,洵为学界重大损失。

64 详细的研究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8—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75页以下。

65 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46页;拙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第五章第一、二节,华夏出版社,1997年,118—125页。

66 参拙著《唐朝对突厥的战争》第四章第四节,112—115页。

67 参前引《中世纪欧亚草原》,30—31页。

68《新唐书》卷四十三下,1148页。

69 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6页。

70 同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41页。

7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5310页。

72 参前引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后论,264—272页。



第四编　田野考古

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

——2000年7月赴河北、内蒙古、辽宁田野考察的初步报告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00年7月12日至28日，本人偕研究助理人员一行四人从北京到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毗连地带（自然地理所谓的燕北地区）①进行学术考察，考察地域主要是滦河、西辽河、大凌河上游流域和大兴安岭南段。这次考察是本人所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五代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史研究"以及北京大学"盛唐工程"子课题"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计划工作的一部分。研究计划曾提出："为了破除长期形成并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的一些学术成见，也为了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整理史料，还有必要深入实地进行若干考察。课题负责人近年曾两次去韩国讲学和研究考察，又因工作之便考察过蒙古国和俄国西伯利亚，因此拟在本课题实施期间进行两次国内考察。"②此次考察即其中之一，主要目的是考察契丹故地，以及契丹、奚、高句丽、靺鞨、突厥等部族与文化在这一带的地域分野和交叉分布情况，希望在认识唐王朝乃至中古时期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方面有所突破。因为计划要研究的是东北亚地区政治关系，就希望把涉及的地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再扩大一些，多增加一些参考因素。我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地区史研究，这样来看所谓的"政治关系"可能会更有意义。

这一带在上世纪不断有人来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我现在看到最早的调查成果就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传教士闵宣化（J.Mullie）的《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③，比日本人还要早，上京临潢府、祖州祖陵、

怀州怀陵、庆州庆陵的遗址好像都是他最先考察确定下来的。我另一个参考得比较多的就是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后半部分(河北道通塞外的部分)。所以,我们的考察主要就是到当地看一看,希望使书面知识能够生动一些,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以便对有关历史作稍微具体的观察。当然,也希望能在实地场景下激发一点灵感,从而引出更具理解力的见识。现将本次考察内容与初步结果报告如下:

一、考察见闻④

在野外考察已经结束两年多的今天,当我坐在电脑终端前撰写有关这次考察的书面报告时,那流火七月炎夏酷暑中奔行于穷乡僻壤之间、跋涉在荒原野岭之上的种种情景,仍然像图画般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萦绕脑际,令人久久难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为我们考察提供了各种帮助的当地教育、宣传、文博、文管等部门工作的人士,没有他们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我们在当地简直可以说是寸步难行、一筹莫展,所谓考察也只可能是一无所获。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啊!这次考察活动最终能取得成功,我在这份报告的开头至少必须要对以下这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内蒙古赤峰民族师专北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田广林教授,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薛志强副研究员,巴林右旗(大板)博物馆乌兰馆员,巴林右旗辽庆陵文管所周所长,巴林左旗(林东)辽上京博物馆唐彩兰馆长,克什克腾旗(经棚)博物馆刘志一馆长,敖汉旗(新惠)博物馆邵国田馆长,宁城大明镇辽中京博物馆李义馆长;辽宁省博物馆田立坤馆长、省博物馆资料室姚义田,朝阳市博物馆尚晓波馆长、李副馆长,北票市文管所赵辉所长,锦州市义县文管所张连义副所长。

我们出去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承德。承德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多种经济文化汇聚的地方。



坐火车从北京去承德，铁路经过明长城墙子岭关附近，看到那像巨龙一样起伏盘桓在陡峭山脊上的长城城墙，和那像长剑指天矗立在一座座山峰上的敌楼楼台，令人想起盛唐天象学家僧一行的“山河两戒”之说：“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坻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秽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⑤。不由得对古人当时就人文地理所做的总体考察和宏观把握，感到由衷钦佩。可是到了承德，这就算塞外了，一看不然。我们到了外八庙之一的普宁寺，该寺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之后，为庆祝西蒙古四卫拉特部众归附所建。因西蒙古奉藏传佛教，故该寺建筑布局全仿西藏扎囊桑鸢寺，整个寺院成一密教坛城(曼荼罗)结构。该寺现在是承德市佛教协会所在，住持为一喇嘛教活佛，颂经者为蒙古喇嘛，所颂经文为木刻藏文版，进香者却主要是汉族民众，这种现象挺发人深省，值得深思。

其实，最早的农牧分界并不在燕山山脉，塞垣也不是今天所见的明长城。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过著名的红山文化，连同当地更早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及稍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看来都属于农耕文化(当时可能还没有发生农、牧社会大分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燕、秦长城也都修到了赤峰附近(秦长城经过赤峰北的英金河北岸)。盛唐的一行和尚说“北戒所以限戎狄”，只能是就当时的民族文化状况来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即将发生变化的一种预感：众所周知，后来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这条界限就被打破了，中原失去了长城边防，而农耕也在塞外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今天登上承德外八庙之一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站在“慈航普渡”亭前放眼东望，承德一带的山川形势和塞外景观尽收眼底。据说自康熙二十年(1681)开辟皇家猎苑——木兰围场，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皇帝几乎每年都要率领数以万计的人马兵丁到坝上行围肆武，宴赏会晤蒙古各部王公首领。适应皇帝大规模出口外行围活动的需要，康熙四十七年(1708)初步建成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后来成为清朝的第二政治

中心[6]。而乾隆时建普陀宗乘之庙之所以要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也是为了招徕抚绥信奉喇嘛教的蒙、藏部众。实际上，坝上东北部为历史上有名的“平地松林”西南缘，辽、金、元三代帝王都曾到此避暑狩猎。古代不同经济文化的部族在这一带发生关系，并不单纯是政治的原因，还有更长时段上起作用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冀北山地正是一个适应不同经济生活方式（游牧、渔猎和农耕）的自然环境边缘地带或过渡区[7]。我想这是决定东北亚地区各部族地域分野的重要因素。

不过，像2000年那样持续高温干旱，到承德也避不了暑的。流经承德的滦河支流武烈河已经完全断流。其实，我们这次考察所经地区的所有河流（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几乎全都断流了，赤峰市翁牛特旗一带自春播后就没能出苗，用赤地千里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据说当年的特大干旱是由于太阳黑子大爆发所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据美国地理学者汉廷顿的气候曲线来解释自己的“游牧民族活动和静止周期表”，其根据之一就是太阳活动的强弱有一定的周期，届时黑子大爆发，引起地球上气候剧烈变化。草原上长期持久干旱，游牧民族追逐水草，自然要发生大规模的迁徙。我过去对此持怀疑态度[8]。以这次燕北考察所见，考虑到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我感到汤因比们的说法很可能是对的。当然现在有国家的救济，农牧民基本上还是安定的，但所遭受的经济、财产损失都是巨大和罕见的。

我们考察的第二站就是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就是过去的昭乌达盟。在赤峰民族师专北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田广林教授、赤峰市北方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薛志强副研究员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去过了除阿鲁科尔沁旗（契丹始祖发源地木叶山可能在其境内）和喀喇沁旗以外的赤峰地区所有县旗，先后到过的主要古迹和遗址有巴林桥（旧说即古代的潢水石桥）、庆州庆陵、金界濠、罕山（契丹大黑山）、怀州怀陵、上京临潢府、祖州祖陵、达里湖应昌路、饶州临河县、红山、武安州白塔子、中京大定府等



处。这些地方除了饶州城可能是唐前期饶乐都督府所在地，大明城（中京大定府）一般认为即开元以后饶乐都督府所在地，其他都属于辽代及辽以后的遗迹，但对于研究环境史还是很有意义的。几个有问题的地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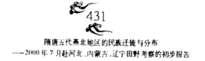
（一）潢水石桥与饶州。一般认为，清代的巴林桥即辽代的潢水石桥。但是有个问题，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薛映出使契丹，曾明确记载："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今渤海人居之"[9]。但如闵宣化考察后所指出的，巴林桥两岸至少二十里以内皆无建城的遗迹[10]。闵宣化曾推测巴林桥西六十里潢水北岸西樱桃沟古城：其"西城疑即唐之松漠府，东城疑为辽时所建之临河县"[11]。我们这次考察去了这座古城，西城较小，而且只有一个南门向城外，很可能属于一个子城即主要的衙署所在。据严耕望研究，唐前期于契丹置松漠府，地在营州北四百余里即今哲里木盟库仑旗一带，开元年间契丹强盛，夺居奚王牙帐即饶乐府故地，遂有两府迁转之事发生[12]。所以，林西县西樱桃沟古城应当就是唐饶乐府、辽饶州城，临河县是饶州的郭下县。那么，潢水石桥就不应该是巴林桥，而应该是该古城南门所对的陈家营子桥。因为州县城就在河边，所以县名临河，而薛映才说"潢水石桥旁有饶州"。西拉木伦河流沙淤积，适于建桥的地方不多，陈家营子桥就特别值得重视。

（二）永安山与金界濠。永安山即辽庆陵所在之山，属于大兴安岭南段。庆陵包括东、中、西三陵，分别是辽圣宗、兴宗和道宗及其皇后们的陵寝，位于巴林右旗庆州古城遗址北三十里左右的王坟谷。从庆州遗址去庆陵中途要经过金界濠。令人奇怪的是，金界濠作为一种防卫设施，只是沿着山麓延伸。而大家知道，同样作为防卫设施的长城却总是直接修上山顶。我想，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金界濠主要是利用当地原有的部落来守卫，界濠所经就是原有的部落和部族分界。据闵宣化引沈括《梦溪笔谈》："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辽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惟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鞑靼接境。"黑水即今发源于巴林右旗北部的查干沐沦（蒙古语义为"白

江”，传为清中叶班禅至此颂经时所改），所以闵宣化认为：“庆陵所在之山为种族分界之山等记载，非亲历者不得知之”[13]。又据傅乐焕先生研究，契丹君主四时捺钵的主要地点：夏捺钵是在永安山避暑、障鹰、议政，秋捺钵则是在庆州伏虎林射鹿[14]。如上所述，庆州距永安山不过三十里左右，然而分为夏、秋两处捺钵，可见自然物候在这一带差别较大，从而成为不同部族的分界线。

其实不仅在庆州，整个金界濠所经可能都是利用了不同部落和部族的分界。比如，金界濠沿线很可能也是古代契丹与其西边的突厥部族的活动分界，因为我们见到金界濠正从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经过，那里有元代的应昌府路，由大都（今北京）通往漠北的大路经过这里，现在仍为赤峰市与锡林郭勒盟的分界之地。我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里突厥汗国的东部边界与金界濠对照了一下，发现两者的走向几乎是重合的。

（三）关于上京临潢府的名称。《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称临潢府，治临潢县，因“县临潢水，故以名”。但上京城（遗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距西拉木伦河有二百多里，怎么能说是“县临潢水”呢？严耕望的解释是：“阿保机以前之契丹衙帐即奚人衙帐，在石桥旁，南临潢水，其置县宜有临潢之名；阿保机徙帐于潢水之北二百里，建置上都，乃因仍旧名为临潢，此地名迁徙之一例耳。”[15]这全都是严先生的猜测！实际上潢水边的旧契丹衙帐并没有临潢一名，阿保机的首都也不是从旧契丹衙帐迁来的。《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明确记载：“上京，太祖创业之地”，“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苇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神册三年（918）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元年（926）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天显十三年，（太宗）更名上京，府曰临潢”。赤峰师专的田广林老师告诉我，临潢府一名应该就来自流经其南边的那条沙里河，该河现在改道，由西向东就从遗址中部皇城与汉城之间横穿而过。“沙里”和“西拉”一样，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不同音译。《辽史》卷三



十七《地理志一》说:“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闵宣化“以为史志之‘西北南流’疑为‘西南北流’之误。”[16]显然,涞流河即今沙里河,而且很可能也是后者的误译。

值得一提的是,上京城遗址破坏很严重,沙里河经常发洪水,漫灌之后,很多建筑遗址都被厚厚的淤沙掩埋了。又有人开车去挖取河沙,地层全破坏了。还有一条大公路穿城而过,路两边还种起了林带,车辆往来繁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加大遗址的保护力度。

(四)祖山和木叶山。大家知道,木叶山是契丹始祖的发源地,据《辽史·地理志》“永州”条下记载,其地当在潢水与土河的合流处。祖山则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陵墓祖陵所在之山,地在上京西南约六十里。今哈达英格乡(应当就是宋代薛映所记长泰馆)西面二十里的石房子,就是祖陵的奉陵邑祖州所在。据《辽史·地理志》“祖州”条记载:“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如闵宣化所说:“祖山在城之西,其形如盆。惟一入山之口,距祖州不远。”这个山口朝南,就是当年的黑龙门,门阙破坏严重,但仍然可见建筑残迹。近年有人提出黑龙门所对南面之山就是木叶山,其主要理由是该山在秋天艳阳照射下色彩极为斑斓,很像树叶颜色的变化,给人印象很深刻。此外,祖山南边的小河《辽史·地理志》记为“南沙河”,为沙里河的一条支流,所以也可以说是潢水。另外,祖山这个名字也很能迷惑人,误以为和契丹始祖有关。

其实,祖山得名于祖陵,即祖陵所在之山。这个祖是指辽太祖,并不是契丹始祖。即使是《辽史》营卫志中、世表所记的拥立遥辇可汗的辽太祖的始祖涅里,时间也已是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如前所述,当时契丹的衙帐已经西迁到饶乐府故地,离契丹始祖的诞生地已经很远了。况且,《辽史·太祖纪》说太祖是感日而孕,与“青牛白马”相遇诞祖完全是两回事。还有,即使把南沙河认作潢水,这里也没有与之相会的土河!所以,祖山与木叶山有别,木叶山不可能在祖山附近。

我们考察的第三站是辽西地区，即唐代的营州。在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田立坤、朝阳市博物馆馆长尚晓波（还有一位姓李的副馆长一直陪同我们考察，却忘了问他的名字）的协助和直接帮助下，我们考察了北票喇嘛洞鲜卑墓葬遗址、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以及努鲁尔虎山的大黑山山口（作为奚、契丹分界松陉岭应即在这一带）；在朝阳市区，承尚馆长的好意，我们参观了尚未整理的博物馆库房和考古队库房，还参观了辽代北塔，观察了著名的和龙山形势。此外，还去了现属锦州地区的义县（隋辽西郡、唐初燕州，后州内迁，地为燕郡守捉），参观了辽奉国寺和北魏开凿的万佛堂石窟。最后乘车经阜新去沈阳，这一路绕过了医巫闾山北端。在沈阳参观了省博物馆，藏品很丰富，又承田馆长好意，看了新出土（收集到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墓志》及其子《石延煦墓志》两份拓片。

辽西考察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古迹文物极为丰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每年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好像有两年都评上了辽西的项目。其实唐代东北的营州也同西北的敦煌一样，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汇聚，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值得大力开展研究。但考察过程中了解到，近年盗墓成风，呈量多面广之势，且盗者颇有经验，盗掘准确迅速。相对而言，我们的文保力量太薄弱了，既缺人，也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甚至连交通车辆也没有，面对几千年文明在辽阔地域留下的丰富文物，只好事后堵截收购而已。

二、几 点 观 感

（一）关于西辽河流域鲜卑和早期契丹遗迹的问题

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在赤峰市（旧昭乌达盟）各地几乎很少发现魏晋隋唐的文物古迹，考古发现都是从两汉一下子就跳到了辽代。而与之相邻的辽西朝阳地区却以鲜卑、契丹墓葬的重大发现闻名，隋唐墓葬也不

少[17]。这当然与古代中原王朝的经营状况有关，相比之下，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可能还是反映了古代北方部族历史活动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演进。换言之，鲜卑、契丹诸族在南下进入辽西之前本身社会还很不发达，经济、文化都很落后。

史书里记载东胡民族（乌桓、鲜卑、奚、契丹）差不多都有一个从大漠深处向边郡塞外，然后是沿边州郡，最后进入内地或入主中原的空间活动过程，这当然也应当是他们追求文明进步的一个过程，考古现状应当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

（二）中原经营东北与营州杂胡问题

具体内容见本书总论及所收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是唐代羁縻州分为内外蕃，营州地域内的属于内蕃，此外归营州管领的（如两蕃四府）为外蕃；二是营州地域内的社会结构可能很像西域安西四镇，除了州县城之外，广大地域内分布的全是其他民族。而当地属于隋唐时代的这些民族的考古成果还不多。

（三）契丹崛兴及其发展方向问题

契丹故地主要在今内蒙古赤峰市（旧昭乌达盟），这一带是北方地区不同民族活动与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这一带从自然地理上看主要是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诸河谷构成的独特地域：它的东边是山林沼泽密布的东北地区，古代主要为渔猎民族（靺鞨、女真等）的活动之地；它北边的大兴安岭虽然不高，但自然物候与河谷地带迥然有异，文献记载这一带曾是乌桓与鲜卑，以及契丹与黑车子室韦等民族的交界之处，我们看到金界濠修到了大兴安岭山麓却不修上山顶，显然就是利用了旧有的部族分界；同样我们也不难把契丹故地与其东南边隔努鲁尔虎山相邻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域区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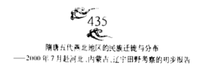
我们注意到，在赤峰和朝阳地区都有许多中古时期中西交通遗物的发现。契丹的勃兴本身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比如，契丹始祖有“青

牛白马说"，可建国的耶律阿保机却有其母"感日而孕"的传说（高句丽始祖同此）；早期契丹还有天葬习俗，《古今图书集成》卷一百二十九《边裔典》记载契丹初建国，"以车载尸入山，以尸置于山树之上"；契丹以东为上，等等。有人说这些可能是受回鹘人的影响，但据说研究契丹文字的专家认为，靠蒙古语知识并不能完全解读契丹语文，人们甚至不知道差异为何物。回鹘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当不应有这样大的差别。所以可以想像，契丹语一定还掺杂了大量非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成分，比如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粟特语之类，这是在草原上活跃的文化发达的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昭武九姓商胡）的语言。我想，或许探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推动是介入契丹勃兴问题的一个有利视角。当然，这样做对于我所承担的课题，甚至对于我们今日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是大有裨益和启发意义的。

其实，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契丹是第一个把东北地域纳入自己直接统治之下的草原游牧民族，这很可能与契丹兴起于辽泽有关[18]。阿保机兴起以后，先东向灭了渤海国；而且辽国的统治中心不是跟其他东胡民族一样向南，而是向潢水以北移动；辽国还在契丹故地和渤海故地间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见《辽史·地理志》一至三，上、东、中京道），这些我以为都是契丹以东向为主要进取方向的表现。契丹几次改名辽国可能也与此有关。当然，移民也改进了契丹社会的经济构成，遏制了游牧社会南进的需要。正是由于契丹东进，打破了传统的地域保守，才拉动了东北诸族的发展方向，使其脱离了前此的地域保守倾向（如高句丽、渤海所为），转而以参与更大地域的发展为进取方向，这就是东北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金、清两朝。我以为这就是从地区史角度可见的契丹建国的划时代意义。

（四）燕北地区文化汇聚线移动的思考

我们前面提到过，最早的农牧分界并不在燕山山脉。在内蒙古赤峰



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连同当地更早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及稍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看来都属于农耕文化。而燕、秦长城也都修到了赤峰附近（秦长城经过赤峰北的英金河北岸）。由此我就想到，北方所发现的较为发达的古代文明遗迹，包括红山文化，很可能都是从先进的地区扩散出去或传播而来的。只是后来发生社会大分工，才出现了农、牧不同经济文化的分界问题。显然，历史上这样一条界线由于多种原因发生过不同方向的推移。

例如，奚和契丹显然属于同一种族的不同部落群。今天的河北承德一带，在隋唐时代已属于奚族居地。当时奚是一个操持游牧、狩猎、农耕等多种营生的部族。由于唐宋之际契丹崛兴，奚人活动中心已从潢水上游南移至冀北坝缘山地，同时经济活动重心也由游牧转向了定居农耕，伐木造车成为其有特点的手工业。由于到实地观察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可以明显看出奚族活动的历史空间转变，从而发现奚、契丹的分布界线基本上就是燕北地区的农牧分界，进而理解北方民族的南下动因。当契丹最终征服奚族将其纳入治下时，契丹本土也已发展起了农耕（投下军州）。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农业显然是比游牧业能容纳更多人口的营生，当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更严重。

今天在承德、隆化间甚至更北的一些较为宽阔的河谷盆地，不仅有农耕，有时还能见到绿油油的水稻田，使人偶尔产生所谓“塞上江南”的美感。当然这肯定已经不是当年奚人所经营的农作。据我的观察，燕北地区虽然能发展一些灌溉农业，但大部分地方更为合适的恐怕还是畜牧业甚至仅仅是林果业。近代由于人口激增发展起来的旱作农业，在2000年那样的大旱之年，更加凸显出其经济上得不偿失、对环境有害无益的严重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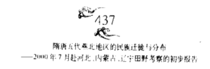
我们传统的思想一提到发展经济总是想到直接生产，所谓改造自然，向大自然索取。这在过去那种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形势下也是不得已的事。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下，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在自然条件不适于发展生产的地方弃耕还草，弃牧还林，保护环境，发展旅游，同国内

乃至世界上适于发展生产的地方开展异质文化交流，实现经济补偿。他们开工厂、农场，我们建花园、洋房，不也挺好的吗？我甚至想，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思路呢？只是，我们的旅游业要搞好，软件、硬件都还差的远呢！

其实，冀北坝上可说是我们此次考察所见环境条件最好的自然景观区。列车从四合永折向东北，一离开滦河流域进入西辽河流域，立刻就让我们见到了内陆亚洲干旱荒漠的景色。那砾石荒滩上偶然泛出的绿色，那生长在白垩土上的一排排白杨，很容易让我想起我所熟悉的新疆。我有时候想，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一批又一批前仆后继地奔向南部农耕地区的边缘地带，很可能并不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也不是由于受到政治排挤，而只是想要寻求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条件。“逐水草而居”是游牧民族迁徙活动的根本动因。当然，南部炎热的气候和农耕定居民族的抵抗对游牧部族南侵形成阻力，所以历史上不同经济文化汇聚线（如长城）的移动和不同经济文化部族迁徙分布的原因很值得研究。这里要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战争，更多的还是社会生活、生存条件、经济营生、文化取向等问题。

由是我就想到，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是也可以像法国布罗代尔《地中海史》那样研究环境的作用，选取特定时代的一个地区做一项“人与环境的关系史”研究，这可能是更具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会更具学术意义。因为做好了它可以为其他中时段（社会时间）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环境条件和历史背景，比如中国文明的特殊连续性和中原文化的惰性问题，比如统治人群升降和唐宋社会转型的问题，比如北方主流与所谓“南朝化”的关系问题，等等。

（部分考察场景见本书后附本次考察图集）



注释:

① 参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载侯仁之等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五辑,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24页。此一地区大致就是口外旧热河行省的范围。

② 请参考所呈交之课题申请书并经费预算表。

③ 冯承钧译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647—753页。

④ 本节以下所记据本人考察日记并参考随行研究助理郑有华、张玲所做考察日志。

⑤ 见《新唐书》卷三十一《天文》一,中华书局标点本,817—818页。参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收在《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72—275页。详论见后。

⑥ 参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迁》,同上引《环境变迁研究》第五辑,12—13页。

⑦ 参上引《环境变迁研究》第五辑,16—17、24—26、168、173、183等页。

⑧ 见拙文《论古代游牧部族入侵农耕地区问题》,收入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89—290页。

⑨《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442—443。

⑩ 同前引闵宣化文,662—663页。

⑪ 同前引文,727页。

⑫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1737—1744页。

⑬ 同前引闵宣化文,701页。

⑭ 氏撰《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88页。

⑮《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1739页。

⑯ 同上引闵宣化文,687页。

⑰ 参本书所收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

⑱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册1757页引《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契丹传》:"契丹本鲜卑之种也,居辽泽之中,潢水之南。辽泽去榆关一千一百二十里,榆关去幽州七百一十四里。其地东南接海,东际辽河,西北包冷陉,北界松陉,山川东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泽饶蒲草。"不过我怀疑这里讲的是五代时契丹所据辽西的情况。

2001年秋季华北考察简报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01年9月29日至10月7日，我与硕士课程班几位同学驾车经河北张家口去内蒙古中部、陕西东北及山西西北部一带考察，考察地域主要是阴山南北、河套及黄河大曲沿岸，主要目的是考察中古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在这一带的交流、汇融与共存的情况，实地观察农牧会聚线的分布、迁徙与推移，希望在认识传统文化发育、发展的地理文化环境方面有所裨益。这次考察或到过的古代遗迹主要有：

（一）河北：经过明长城马市口（今怀安县境，河北、内蒙古、陕西三省区交界处）。

（二）内蒙古：参观了呼和浩特著名的席力图召、大召、金刚宝座塔，呼市近郊的万部华严经塔、乌素图召；考察了和林格尔汉代定襄郡成乐县遗址（今多以为即北魏盛乐城，但考古未见北魏地层）、唐单于都护府遗址，战国秦汉云中郡遗址（今托克托县古城乡）、准噶尔旗十二连城（汉沙南县、隋唐胜州、明东胜右卫）、美岱召（明俺答汗家庙，三娘子陵在焉）、唐中受降城遗址（今包头南奥陶窑）、汉五原郡稒阳县遗址、梅力更召（附近有赵长城遗迹）、北魏沃野镇（今乌拉特前旗三间房遗址）、唐天德军（在乌梁素海渔场附近，已被水淹）、赛胡同汉代屯田城址、五当召（唐牛头朝那山）、北魏怀朔镇（今固阳县一带）、突厥铁山（白云鄂博北端）、百灵庙、敖伦苏木古城（唐诺真水汉、元德宁路赵王府，曾有大量景教文物出土）、希拉穆仁召（其建筑有西域式回廊），经过武川、白道城（呼



和浩特北坝口村)等。

(三)山西:偏关、华林堡明长城、河曲县岱岳殿(一名岱岳庙)、河曲旧县海潮庵、静乐县静居寺等。

(四)陕西:府谷县真武庙(孤山七星庙)。

我们的考察没有什么发掘或发现古迹文物的意图,主要就是到当地看一看,希望使书面知识能够生动一些,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以便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对有关历史进行更为具体的观察。当然,也希望能在实地场景下激发一点灵感。现在看来,考察达到了预期目的。比如,结合历史背景和实地调查,我认为,内蒙古、山西、陕西一带的民间宗教,就是一个值得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角度开展综合性研究,既有重大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科研课题。

附《简报》初稿(英文):

I came back from my field investigation in the evening of October 7. In all the tour, a friend drove her car to send us(my students and me) everywhere. So we traveled through Zhangjiakou, Jining to Huhehaote by a new highway in the midway of which is the Gate of Horse Market(Ma-shi-kou) of the Great Wall.

In Huhehaote we visited the famous temples such as Xilitu-zhao, Da4-zhao1, Wu2ta2si4 and Wan4bu4hua2yan2jing1ta2(the Pagoda of Ten Thousant Sutras). Then, we drove to the county Holinger to visit the sites of the commandery Dingxiang(Han dynasty) and the protectorate Chanyu(Tang dynasty). But the local archeologists told us they have not found any layer of the city so-called Sheng4le4(North Wei dynasty) though the excavation was done for three years. Other news is that they found a lot of

ancient tombs eastward from the cites recently of which the date i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hrough Tang dynasty.

From Holinger we drove to the county Tokto. The way was muddy for being built and raining, so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move. But we got a unexpected gain in detour: In the village Da4ja2la1(big Jala, jala means chief in Manchurian) we found a few of aboriginal peasant who look very like foreigner physically, especially of their faces, eyes and noses. My students couldn't help to shout: Aliens! Nearby Tokto, we drove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by a pontoon.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famous site Shi'er-lian-cheng(a series of twelve castles, the canton Sheng in Tang dynasty). As you know, the location of this site was confused with another site on the east bank where was setup a canton named Dongsheng(eastern Sheng) by Liao dynasty.

After t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antique sites or passed by some possible sites in this tour as follows:

1) Yun2zhong1jun4(the commandery Cloud Interior in Han dynasty), located at the village Gucheng(it means ancient city) in north Tokto;

2) Zhong1shou4xiang2cheng2(the Middle Castle of Accepting Surrender in Tang dynast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Baotou,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3) Wu3yuan2jun4(the commandery Five Fields in Han dynasty), located in the town Machi(it means hemp pool) of South Baotou;



4) Wo4ye3zhen4 (the Garrison of Fertile Field in North Wei),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outy Urad-qian-qi, there is a big site of the North Wei about the village San1jian1fang2 (it means three houses) where the highway goes by;

5) Tian1de2jun1 (the Military Prefecture Heaven Virtue in Tang dynasty), it should be located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lake Ulansuhai-Nur, nearby the fishery, but they said it had been submerged. We investigated another small site northward from the fishery, it seems a ruin of Han dynasty for state farms, I guess by the scattered relics(almost all are black pottery pieces).

6) Huai2shuo4zhen4 (the Garrison of Cherishing North in North Wei), it would be located about the county town Gu4yang2 by which we drove to Bayan-Obo;

7) Tie3shan1 (the iron mount of Turks), i.e. the mine Bayan-Obo now. You know, there was the battlefield in which the Jieli Khan of North Turks was defeated by Tang's army;

8) Zhao4wang2cheng2 (the site of the Prince Zhao in Yuan dynasty), located in Arunsum northeastward from the couty Darhan Muminggan Lian-he-qi(Bai3ling2miao4, it means the temple of larks). As you know, the Prince Zhao was the chief of Onggu who believed the Nestorians of Christianism. There is so much of relics in the site, but we didn't find any symbol of cross, so pity.

Then, we went nearby Wu3chuan1, over the Mount Yin1shan1 by the Pass Bai2dao4(white way), through the city

Huhehaote southward, drove to the province Shan1xi1 in which our tour was mainly done along the Yellow River.

Maybe my narrating is too dryly, but I think the following news should be interesting for you: in Shanxi, it seems still possible to find some remains of exotic religions. For example, we visited a few of wilful temple such as Dai4yue4dian4(the temple of the Mount Tai4shan1), Hai3chao2an1(the temple of Buddhisava), Zhen1wu3miao4(the temple of the North Deity), etc. There, we saw palaces named Guang1ming2ru2lai2(Buddha of Light), Ri4gong1(Palace of Sun) and Yue4gong1(Palace of Moon), the words on the old steles over wood door respectively are Xi1yu4(Central Asia), Tian1yao4(Fires of Heaven) and Tian1guang1(Light of Heaven).

Some images of the chapiters were engraved as head of elephant with long ivories and trunk, or griffin with two wings, etc. Inside, all of the palaces were built as arch-roof and full of fresco, such as seeing sunrise and sunset, fire phenix, fire as decoration of back-light, foreign monks discussing sutra, etc. I got some pictures of those things, I'd like to scan them when I get free time. That is my simple report of the exploration. Please tell me what is your opinion.

(请参本书后附本次考察图集)



附录一：
朝鲜为“来朝之韩”说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996 年我得到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奖励进行有关“新罗、百济与三韩历史关系”的研究。半年多来，尤其是利用 1997 年 3 月至 6 月在高丽大学东洋史学科讲学的机会，我收集了大量有关史料，诸如金富轼《三国史记》（李丙焘译注，汉城：乙酉文化社，1995 年）、僧一然《三国遗事》（崔南善编，附索引古文献十三种，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 年）、《韩国古代史料集》（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 年）以及汉文正史《东夷传》（彭久松、金在善编著，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 年）和《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一卷（孙进己、郭守信主编，辽沈书社，1989 年）等等，参考了中外学者尤其是韩国学者的许多论著，诸如李丙焘《韩国史大观》（许宇成译，台北：正中书局，1961 年）、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高岱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等，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客观、公正、科学地研究。已经获得的初步成果：1.朝鲜为“来朝之韩”说；2.韩秽考；3.“夫余即秽”论；4.三韩分化概述。第一部分已撰写完毕并呈交韩国基金会，现在此报告如下，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

研究本课题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三韩的起源问题。中国正史《史记》、《汉书》里只有朝鲜传而无韩国传。最早为古韩国立传的正史是《三国志》（《后汉书》虽有韩传，但纂修时间晚于《三国志》）。《三国志》卷三十记载，汉代初年，箕子的后裔朝鲜侯准被燕人卫满击败南逃，建立政权，自称韩

王，其地"在带方(今朝鲜黄海道)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大致也就是今天大韩民国所在的地方。但据史料记载，这一带地方在侯准称王之前是叫辰国。那么，朝鲜侯准为什么要称韩王呢？我认为，这一国名完全来自准故国的国名，就是说，朝鲜本来就叫韩；鲜就是韩，朝鲜是一个加了汉语限定词的国名，意为"来(中原)朝会之鲜(韩)"。

韩国学者早已把朝鲜一名解释为"东表日出之地"[①]，也就是说，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偏正词组。而且，据李丙焘的说法，其中的"朝"字就是汉字意译。我完全同意韩国学者的这种分析，但是不同意他们对字义的解释。因为，李丙焘说朝鲜一词是古韩国语"阿斯达"的意译，然而对勘《三国遗事》卷一朝鲜条的有关记载，"阿斯达"一语之意显然是平壤(敞亮之地)而非朝鲜。而且，"鲜"字在哪一种语言里有"地"的意思也没有得到说明。

现存有关古朝鲜的资料说早在上古的檀君时代(据金贞培的说法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国名就叫朝鲜，那显然属于后人的追记，不足为凭。那么，古朝鲜以前最早的族称或地名是什么呢？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韩，也就是鲜，鲜、韩不过是一音之转。

《三国遗事》卷一古朝鲜条记载了桓雄天王与熊女相交而生檀(坛)君王俭的传说。韩国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初民社会对守护神(图腾)关系的认识，"亦即祭、政不分的神权社会的一种形态"；而且，檀君是祭政合一时代的祭司兼君长；王俭是祭、政分离以后的君长[②]。令人感兴趣的是，李丙焘说："熊女一词，韩语为 Amkom(雌熊)；从前有一种族称为 koma(盖马，朝鲜北部高原名。李丙焘以为秽貊一名即其音译)，字义和代表地神之'熊'相一致。因此，笔者认为熊女即为 koma(即熊图腾族)女儿的意思"[③]。今韩国语仍称熊为 kom。又"据自山安廓氏之说，'桓'与'解慕'(解慕漱，传说为夫余族的始祖神之一)均为 kam(即 kom)之音写；'雄'之训读，则为 sut，'漱'即为 su 之音读，而表示男性；实同为一人的名字"[④]。又"考李承休的《帝王韵记》及《世宗实录地理志》等书所载的檀君故事，



将神坛树的‘坛’字与桓雄天王的‘桓’字，以及将《三国遗事》之坛君的‘坛’字，均书为‘檀’字，以致此后所出的书，亦均书成‘檀树、檀君’”[5]。这就是说，韩民族始祖传说中的桓、檀、坛、盖马这些字眼都来自kom>kam即熊这个词。

“又根据六堂崔南善先生之说，檀君实是‘巫者’的另一韩名Tang kul的写音；且是马韩诸国‘神邑’之长的‘天君’，此说亦可寻味。那么，所谓‘檀君王俭’之王俭，是否可认为固有名词？崔南善解为王俭（韩音wang kem），恐系engk'eum或Amkam、Alkam之音译，而具有‘大人’、‘神圣人’等意义”[6]。也就是说，王俭的“俭”字也来自熊（kom>kam）这个词，而且有巫师、祭师的意义，这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约1182—1252）在他的行纪里曾提到所谓鞑靼（蒙古）之神ltoga，“该神叫做ltoga，而库蛮人称为Kam”[7]。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杰出学者道尔吉·班扎罗夫（Dorji Banzarai，1822—1855）在其名作《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中根据柏朗嘉宾的上述对比提法，认为kam/ham（柏朗嘉宾常常将这个词与Khan“可汗”搞混）就是突厥语的shaman（音译为萨满，意译巫师）；而Itoga则是蒙古语udagan或idogan之讹，其意为女巫[8]。在现代图瓦语里，萨满仍作xam/ham[9]。

巫师、祭司为什么被称为萨满（shaman=xam/ham，kam<kom）呢？现在看来，显然是和古代北亚部族中广泛存在的熊崇拜有关。在金贞培先生书后所附《新石器时代东西伯利亚部族的熊崇拜》（原文译自《苏联考古学志》十四卷）一文中我们看到：“就熊而言，它和黄教的木槌魂，也就是同萨满教和萨满有着这种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合法性可以在与为了一方面要表示熊，一方面要表示先祖精神而使用的术语相一致方面找到。……其后，正是满基（熊），即化成熊形的祖先在艾贝思神话中被说成是萨满教和萨满的保护者，这就不是令人惊讶的事了。同时，艾贝思文化的主人公，是抗神者，是熊和最初的熊萨满”[10]；“熊”在这里意味着天，要么说得准确一点，意味着是使用了它的动物形象的化身。……（阿尔克）这个

词汇对于艾贝克人来说不仅意味着熊，还意味着神，即上天世界的主人⑪；“后因人的妖术歌中说熊是在天上诞生的。根据 L.S.Poliakov 的说法，奥斯佳克人（汗待人）不承认熊是父亲的意思，而称之为离开了上天的上天之子”⑫；“同时，我们知道，在北美洲有同熊头形状完全相同的杵，最后被看作这个监护人的灵魂，即作动物状的先祖的图腾像”⑬。很明显，在把熊称作 kom（> kam/xam/shaman）的民族那里，巫师、祭司因为主持熊崇拜，因而被赋予了熊的名称。

金贞培认为：“现在我们感到，对于要把古亚细亚族和熊崇拜同韩国的檀君神话连接起来没有犹豫的必要”⑭，“从史料上看，熊崇拜是檀君朝鲜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种现象也是古亚细亚族第一位的特征。与以往的见解不同，作者认为从檀君朝鲜划线，以所谓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和所谓古亚细亚族的住民来肯定韩半岛的先住民和住文化，这是对韩国民族文化起源的新的解释”⑮。尽管我对金先生把檀君时代的韩半岛住民比定为所谓古亚细亚族仍存怀疑⑯，我还是愿意同意他把檀君神话同熊崇拜连接起来的观点，并且认为“韩（鲜）”这个族称最早就来自本民族的熊（kom）图腾。

二

前面讲过，李丙焘先生说从前有一种族称为 koma 或 kaima（盖马），李先生认为即秽貊，其实不然。秽之名即夫余，秽与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犹如后来的辰与（三）韩，详见本报告第三节“夫余即秽”论。

koma 就是 kom>kam，就是韩或鲜。我们先来看汉字的读音。上古汉语韩字属匣母元部，可拟测为 ɣan⑰，鲜字属心母元部，可拟测为 sian⑱。由此可见，韩、鲜两字韵部相同；鲜字有三等介音（齐齿呼），两字读音声母的不同很可能就是由此造成的。我们认为上古汉语韩、鲜两字



的读音有可能相通的根据是:

(一)声训。声训是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证据之一[19]。《尔雅·释诂》:“鲜,罕也。”《礼记·中庸》:“民鲜能久矣。”注:“鲜,罕也。”《表记》:“民鲜克举之。”注:“鲜,罕也。”《大学》:“天下鲜矣。”注:“鲜,罕也。”[20]罕字上古属晓母元部[21],晓、匣旁纽[22],可能发生音转。也就是说,单就读音而言,以罕训鲜无异于以韩训鲜。

(二)近现代汉语演变的例证。王力先生说:上古汉语里没有声母j、q、x(原文为国际音标,我们为书写方便改成了相应的汉语拼音)……近代精系z、c、s和见系g、k、h转化的条件是齐撮呼。各地方言的情况不一样,例如北京话精见两系齐撮字都变j、q、x(原注:和北京话情况相同者,有济南、西安、太原、汉口、扬州等处方言)”[23];“现代北京话的j、q、x有两个来源:(甲)来自齐撮呼的g、k、h;(乙)来自齐撮呼的z、c、s。舌根破裂、舌根摩擦、舌尖破裂摩擦、舌尖摩擦都由于受舌面前元音i的影响,而变为舌面前辅音j、q、x。这是语音学上所谓同化作用”[24]。就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而言,作为族名的韩之所以被说成鲜,很可能就是在某种方言里有些见系元韵字产生了韵头i(齐齿呼)造成的[25]。

(三)韩国语里的汉字读音。如前所述,韩民族始祖传说中的桓、檀、坛、盖马这些字眼都来自kom>kam即熊这个词,王俭的俭字也来自熊(kom>kam)这个词。王俭,中国古代史料均作王险[26]。上古汉语桓字属匣母元部,可拟测为ɣuan[27];俭字属群母谈部,可拟测为giam[28];险字属晓母谈部,可拟测为xiam[29]。上古汉语匣、群、晓母同属牙音(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旁纽[30],元、谈两部主元音相同通转[31],所以桓、俭、险这几个汉字能表达同一个韩国语音kam<kom。而桓与韩(匣母元部)同音;险与鲜(心母元部)声母同位置(发音方法相同),韵部主元音相同,不仅在古代具备音转的条件,到近代完全成了同音字。

(四)突厥语同义词读音旁证。突厥语族诸语言与韩国语同属阿尔泰语系[32]。如前所述,萨满一词在中国突厥语族诸语言中均作shaman/saman(哈萨克语),惟独在图瓦语里作xam[33],两种读法显然与韩国语

里的 kam<kom 出自同源。一个同源词分化出 xam/ham 和 saman 两种不同的读法，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发生音转的条件。韩国语里韩字读 han，鲜字读 seon，两字的语音关系正如突厥语里 xam/ham 和 saman 的关系，完全可能发生音转。上古汉语韩字读 γan，鲜字读 sian，其语音关系正与此类似。

古韩国人用本民族的图腾作为自己的族称，可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如李丙焘先生所说，其意可以是地神族或国神族[34]。因此，其首领或君长的称号也必然带上这一名称，如桓雄、檀君、王俭、韩(鲜)王等。

还有一个例子恐怕对理解这一问题也是不无裨益的：与韩国人把自己称为韩民族或韩族一样，朝鲜族或朝鲜人也经常自称为鲜族，他称也是如此，很少称为朝族的。这也说明族称本来是一个单音节词，而不是一个词组。也就是说，最早的族称并不是朝鲜。由此可见，以朝鲜一语为“阿斯达”的对译而意为“光明之地”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朝鲜一名的由来必须另求他解。

顺便说说，李丙焘曾提出一种所谓“韩氏朝鲜”的说法来取代箕子朝鲜，即所谓并无箕子东来之事，当时不过是“因阿斯达社会本身内部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韩氏朝鲜[35]。金贞培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36]。如上所述，我们当然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史料中记载朝鲜侯准亡国南徙后自号韩王，以及“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等情况，只能表明他们要将自己同被卫满篡夺的朝鲜区别开来的愿望，即所谓不共戴天。所以《魏略》曰：“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历史上以国名为姓氏的很多(如高句丽王室的高姓)，还很少有以君主姓氏为国名的。

三

那么，韩族或鲜族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而有了朝鲜这一名称



的呢?我认为就是从箕子朝鲜开始的。中、韩两国地域密迩,很早就发生了各种关系,箕子朝鲜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这是任何人无论怎样也抹杀不了的。金贞培以"南满洲和韩半岛一般没有发现什么殷商遗物"[37]来否定箕子朝鲜也是徒劳的。没有发现并不等于没有。何况所谓箕子朝鲜反映的是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中原统治者向周边地区册封诸侯建立关系,并不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从而引起巨大的文化变革。这一点从现今汉民族与韩民族间的民族文化差别也可以得到证明。箕子作为殷商遗民受封,即使能够被当地人民接受,也不可能带去多少文物,更大的可能还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甚至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38]之类的统治。

问题是箕子受封于韩(鲜)为什么要以朝鲜为国名呢?据史书记载,箕子本是殷纣王的亲戚[39]。《史记·殷本纪》略云:"纣愈淫不止,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遂率诸侯伐纣,斩纣头,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40]。《周本纪》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41]《宋微子世家》略云:"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42]。这些记载不无问题:武王克殷二年向箕子问道后乃封之,那么这两年间箕子何在,他与周王朝是什么关系?箕子既然是受武王册封才去的朝鲜,怎么可能不臣呢?显然,《史记》对箕子事迹的记载有所失真。

《太平广记·四夷部》一,朝鲜条的记载与此不同:"《尚书大传》曰:'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原主:禄父,纣之子也。),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43]。《封建部》四,尊贤继绝封条所引《尚书大传》更简单明了:"武王胜殷,箕子走之朝鲜,因以封之。"[44]很明显,实际上在武王灭殷以后,箕子就逃亡了。所以,《汉书·地理志》甚至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45]。由于箕子是有名的贤者,到周初大分封时,就把他逃亡栖身之地封给了他。箕子本来是一个逃亡的难民,结果凭藉周王朝的威势成了一方诸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自然只好改事新朝,来中原朝见

周天子，尽管拖延了十二年之久！可见箕子朝鲜成立的关键在于受封，尤其是来朝。

现存史料都说箕子所逃向之地当时就叫朝鲜，其实不然。现存史料均属后人追记自不待言。即使关于朝鲜一名本身，史料中也留下疑问。《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句下《索隐》曰："潮仙二音。地因水为名也。"[46]同书《朝鲜传》题下《集解》："张晏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索隐》："案：朝音潮，直骄反。鲜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讪。"《正义》："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骊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险城，又古云朝鲜地也。'"既然地因水为名，为什么地名为鲜而非汕？既然地因水为名，其地有三水，且合为洌水，为什么地名为鲜而非洌？既然地因水为名，朝仙两音，潮音（朝字）从何而来？所以，实际上这些史料并没有解决朝鲜一名的由来问题。惟一有意义的是，这些史料再次表明，朝鲜一词由两部分组成，后一部分是原有地名的读音。

朝鲜一名的前一部分即朝字从何而来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武王克殷，箕子逃亡到韩（鲜）族聚居之地栖身。当时韩族聚居之地尚未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联系。通过箕子受册封，他所在的地区开始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参与朝会这样的关系。然而箕子所统治的只是最接近中原王朝的那一部分韩族聚居地（相当与汉代的乐浪郡，即以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地区），因而被称为朝鲜，意即"参与朝会之韩（鲜）"，以区别于其他尚未来中原朝会的韩族（如后来的真番、辰国等）。

随着朝会关系的建立，朝贡关系也发生了。朝贡一词的本义应该是朝见并进贡，朝见是朝会的一种形式，没有朝会关系自然无从进贡。然而随着后来的发展，朝贡渐渐成了进贡的同义词，即变成了一种单纯经济关系的表达。不过，在古代中国，人们始终把这种经济关系视为政治关系的反映。如，《管子·揆度篇》略云："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



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发、朝鲜之文皮，一荚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47]玉币即礼品或贡品。同书《轻重甲篇》略云："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曰：'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以为币乎？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48]可见无论是什么形式表达，朝与不朝，关系大不相同。当时只有来朝之韩（鲜），才称为朝鲜。

还有一个例子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汉书·朝鲜传》：汉初，燕人卫满篡夺朝鲜，"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淤弗通"[49]。真番、辰国亦为韩族所建[50]，可见朝鲜与韩族他国确有区别，这就是能来中原朝见。而且我们看到，能否入见对于韩族各国十分重要，以至于朝鲜想要垄断这一关系渠道，即只有它能入朝，其他韩族也只有通过它才能入朝。毋庸讳言，这方面也有地理的原因。尽管其他韩族国家得名的原因尚待考证，但朝鲜不朝或不能来朝就只好称韩，这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朝鲜侯准南逃建国时的情况。

所以，我研究的结论是：韩是最早的族名，它来自本民族原始的熊（kom>kam）崇拜，鲜、韩为一音之转；朝鲜一名始自箕子受封来朝，其意为"来朝之韩（鲜）"；随着历史的发展，韩也被直接用作国名，以区别于朝鲜。

注释：

① （韩国）李丙焘著，许宇成译《韩国史大观》，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23页；（韩国）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37页。

② 参上引《韩国史大观》，19—20页；《韩国民族的文化起源》，141页以下及207—208、214页。

③ 同上引《韩国史大观》，21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引《韩国史大观》，20—21页。

⑥ 同上引 22 页。

⑦ 参《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汉译本),中华书局,1985 年,35 页。

⑧ 参《道尔吉·班札罗夫文集》(Dorzhi Banzarov, Sobranie sochineniy),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5 年,65—66 页。

⑨ 陈宗振等编著《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1990 年,312—313 页。

⑩ 同前引《韩国民族的文化起源》,207 页。

⑪ 同上引书,208 页。

⑫ 同上。

⑬ 同上引书,214 页。

⑭ 同上引书,145 页。

⑮ 同上引书,175 页。

⑯ 金贞培显然是片面、过分地强调了传播的作用(参该书 48 页),而忽视了在人类文化的原始时期可能更为重要的社会进化作用。而且,如果所谓古亚细亚族分布的地区并不仅仅是西伯利亚而已到了韩半岛,那代之而起的阿尔泰系住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金先生将所谓韩半岛相应的民族、文化更替的时间比定如南西伯利亚,"在从安德罗诺沃向卡拉苏克过度的过程中"(152 页),但他忽视了空间问题。据俄国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意见(108—109 页),卡拉苏克人是来自中国北方的丁零即阿尔泰族,而韩半岛正在该族分布范围之内,离西伯利亚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倘若没有这样一个民族分布空间的距离,也就没有卡拉苏克人的迁徙问题了。更何况,今收集到的把祭司叫做 xam/kam/shaman 的民族同韩国人一样,全部都是所谓阿尔泰系住民。因此,说这一习俗传自所谓古亚细亚族纯属臆测。换言之,韩民族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所谓与古亚细亚民族的更替问题。

⑰ 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186 页。

⑱ 同上书,208 页。

⑲ 参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 年,65 页。

⑳ 引文均见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年,579 页。

㉑ 同前引《汉字古音手册》,186 页。

㉒ 参前引《同源字典》,79—80 页。

㉓ 见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605—606 页。

㉔ 见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22 页。

㉕ 参《汉语史稿》上册,124 页;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年,247—256 页。

㉖ 见《史记》卷一百十五《朝鲜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引正史均据此本),1982 年,2985 页。

㉗ 同前引《汉字古音手册》,216—217 页。

㉘ 同上引书,203 页。

㉙ 同上引书,208 页。

㉚ 同前注㉒。

㉛ 同前引《同源字典》,78—79 页。

㉜ 也有人认为韩国语系属未定或为独立语种,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34



页。

㉝ 同前注⑨。

㉞ 参前引《韩国史大观》,20—21 页。

㉟ 参上引书,24—25 页。

㊱ 参前引《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64 页。然而金先生主要是想用另一种外来民族、文化的更替(所谓阿尔泰系住民代替古亚细亚人)来取代箕子朝鲜说。如前所述,我们也不同意他的说法。韩国学者多把箕子朝鲜视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更替,这与中国学者的理解以及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史实有很大不同。详见本文以下论述。

㊲ 《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153 页。

㊳ 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定公四年,中华书局,1990 年,1538—1539 页。

㊴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箕子者,纣亲戚也。"《索隐》:"箕,国;子,爵也。司马彪曰:'箕子名胥余'。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父。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杜预云:'梁国蒙县有箕子冢'。"(1609—1610 页)

㊵ 《史记》卷三,108 页。《史记》卷四《周本纪》的有关记载是:"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释箕子"句下原注《集解》:"徐广曰:'释,一作原。'"以"原"与下句的"释"对举,似乎有"免予刑事处分"或"不予起诉"的意思,与"无罪释放"有所不同。这一区别恐怕对理解后来箕子与周王朝关系的变化还是有些意义的。

㊶ 《史记》卷四,131 页。

㊷ 《史记》卷三十八,1611、1620 页。

㊸ 《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 年,3456 页上栏。

㊹ 同上引《太平御览》卷二百一,968 页下栏。

㊺ 《汉书》卷二十八下,1658 页。我们并不同意这种意见。唐人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就已指出:"《史记》云'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与此不同。"(1658 页注 2)何况《史记·宋微子世家》明确说"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 。'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1609 页)

㊻ 《史记》卷三十八,1620 页。

㊼ 《管子》卷二十三揆度第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二子》本,1990 年,184 页上栏。

㊽ 同上引《管子》卷二十三轻重甲第八十,187 页上栏。

㊾ 同前引《汉书》卷九十五,3864 页。

㊿ 真番、辰国建国时间俟考,但在朝鲜之后恐怕是可以肯定的,因为现存有关韩国史料提到最早建立的国家就是朝鲜。

附录二：
近二十年国内外靺鞨史研究评述

（附论著目录）

范恩实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靺鞨是我国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之一，靺鞨以及由其衍生的女真、满族，对中国，特别是东北亚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历来学者都非常重视对靺鞨的研究。在国内，较早利用近代方法对靺鞨加以研究的是丁谦①、金毓黻②等先生。此外，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较早的如津田左右吉③、池内宏④等人。建国以来，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一方面国外学者（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日、俄、朝、韩四国学者）继续关注，一方面随着研究环境不断改善，国内学者也在不断探索。这一切使靺鞨史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产生了一批相关问题的专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继往开来，进一步推动靺鞨史的研究，本文拟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⑤作一个评述，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作必要的准备，也为更多的热心于靺鞨史研究的同仁作一个铺垫工作。

一、靺 鞨 族 源

根据汉文史书的记载，靺鞨族是肃慎系民族的后裔，是由肃慎—挹娄—勿吉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靺鞨一名的出现，应该追溯到《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时作“靺羯”。至《北史》卷九十四《勿吉传》始改作“靺



鞨”，并成为其后的统一用法。靺鞨民族的这一发展脉络是基本清楚的，但由于文献记载中一些具体细节的差异，使得这个本来清晰的问题变得复杂化，在学术界中呈现一种众说纷纭的状况。

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一书，基本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学界主流观点。即：靺鞨是隋唐时期居住、活动于黑龙江流域东部和长白山地区的古代民族，系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发展而来的；同时，作者认为肃慎、挹娄、勿吉一脉相承，挹娄是肃慎境内的氏族部落，后肃慎渐弱，挹娄自擅⑥，因此挹娄不等同于肃慎，但属于同一族系。而勿吉与挹娄虽属不同时代，但居住地域相同，而且勿吉物质文化及其与挹娄物质文化的序列也已基本搞清，因此，他们属于同一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吕光天、古清尧《魏晋南北朝时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北方论丛》1985 年 第5 期；此文收入吕光天、古清尧编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一文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勘，认为无论从地域、语言和生活资料、衣食住行等看，特别是石镞和毒矢等都与汉代的挹娄相同，五至六世纪的勿吉就是二至三世纪的挹娄，即为肃慎族的一部分，因此日人池内宏的勿吉是夫余系统的民族之说有误（详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卷十五）。冯继钦《靺鞨族共同体类型及其特征初探》（《北方文物》1986 年 第2 期）一文则将肃慎—靺鞨的发展过程与这一民族的居住地域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肃慎主要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松花江中上游和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汉魏西晋又称挹娄。到南北朝时称勿吉，主要分布在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即东至日本海，西至高句丽的广大地区。隋时既称勿吉，又称靺鞨，唐时称靺鞨。靺鞨族大体上以松花江流域为中心，东至日本海，西接突厥，南接高句丽，北连室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加深入。方衍《黑龙江族系、族源研究概述》（《北方论丛》1992 年第6 期）一文，回顾了从二十世纪初到八十年代末国内学者关于

黑龙江古代民族的族系、族源问题的研究。其中关于靺鞨族属问题,作者作了这样的叙述:早期金毓黻先生将之归入肃慎族,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1987 年 1 月有的作者主张肃慎系为通古斯族,并将通古斯分南北两系,南通古斯在辽河流域,北通古斯在叶尼塞河、列拉河(勒拿河)、黑龙江一带;同年 5 月,又有学者主张肃慎、挹娄、勿吉三族不同。当然,该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即未列出所引观点的作者、出处,所作的概述也有很多遗漏。实际上,主张肃慎、挹娄、勿吉三族不是一个民族的代表论著是魏国忠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该书第四章"关于勿吉族的几个问题"一节就提出这三个民族显然不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民族,而是大体上存在于同一个地区的各有源流的不同部落或部落群;同时,这些部落之间由于地域毗连和人种、习俗及经济形态的接近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关系毕竟是极其亲密的,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渐呈融合、统一的趋势,况且在语言方面基本上属于同一语族,所以,把他们作为一个族系对待大体不误。孙玉良、赵鸣岐著《中国东北史》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对这一观点加以批驳,认为史书中在同一历史时期靺鞨、肃慎与勿吉互见,是史书体例不一,各有不同称法而已,实为同一族系,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异称。张博泉著《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提出族源系统说,即是指肃慎系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源头及其发展变化而形成的系统。肃慎系民族从属于肃慎、挹娄、勿吉的氏族部落血缘集团发展为靺鞨七部具有地缘性质的部族集团,而再发展进入渤海、女真和满洲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不同时期。李德山著《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一书,则一反传统研究视角,认为靺鞨并不是完全由肃慎系民族发展而来,只有号室、黑水、拂涅三部的主体民族是肃慎人;同时,作者根据对靺鞨名称的拆解,认为构成靺鞨的主体人群,来自东夷族系的貊族和羊族。



董万仑《白山靺鞨五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一文单独探讨了靺鞨七部中白山部的族源问题，认为白山靺鞨是肃慎民族的后裔，但因为长期劳动生息在半岛东北部，已不是单一的民族血统，而是肃慎语族与秽貊语族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其语言、生活习俗皆具有两大语族的共同特点(当然肃慎语族的特点较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白山靺鞨称作靺鞨之别种，亦可谓高句丽之别种。

在早期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对靺鞨族源问题也是非常关心的，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池内宏等人。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已很少关注这个问题。当然，一些学者所作的总结性论述，仍然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学者 E.H.杰烈维扬科所著《黑龙江沿岸的部落》(林树山、姚凤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年)⑦一书。书中首先回顾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鸟居龙藏、小川弘人、三上次男、津田左右吉、江上波夫、和田清、池内宏等人对靺鞨族源问题的研究：如白鸟库吉从语源学的角度反对把东胡人同通古斯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混为一谈，但同时认为他们的远祖可能是一个；三上次男则认为所谓东夷人(肃慎、挹娄、靺鞨)不属于通古斯族，而认为他们在民族上接近于古亚细亚人。同时，该书作者通过考古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和历史资料的相互比勘，认为靺鞨是通古斯系民族。中国学者姚凤《苏联学者对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部落的研究》(《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一文则是对苏联学者的相关研究的很好的总结。文章提到：关于靺鞨人的族称问题，丘涅尔博士早已指出，靺鞨是许多部落的总称，现今苏联学术界亦普遍认为靺鞨是一群部落(如黑水靺鞨、室韦靺鞨、粟末靺鞨等)的总称。许多学者认为靺鞨是一个以通古斯人为主的民族复杂的政治综合体，其中有通古斯人部落(如黑水靺鞨部)，蒙古人部落(如室韦靺鞨部)，突厥人部落(铁利靺鞨部)，古亚细亚人部落(如粟末靺鞨部)。由于通古斯人的不断强大，这些异族部落在接受了他们的民族名称之后，又逐渐地接受了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以某一强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命名，乃是中央亚细亚和东亚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靺鞨在这

一问题上亦不例外。因此，C.M.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曾经写道：靺鞨统治下的许多部落同以该称命名的本来部落，起初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足为怪的(详见《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在日本学者中，菊池彻夫是较有创见的一位，他的《靺鞨与鄂霍茨克文化》(原文见《三上次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赵晓丽、马秀红译，《北方文物》1992 年 第2 期)一文依文化要素列出挹娄、勿吉、靺鞨、黑水靺鞨各文化对照表，指出其相互间共同存在着极富特征性的文化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开天井，由出烟孔道搭梯子以供出入，深且大的半地穴式居室；利用人尿的习俗；使用毒箭的习俗。至于其差异，也许和资料的误差、编者的兴趣有关，而且民俗、文化自身因时间的更易也会引起较大的变化。日野开三郎则是与史籍记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在《东北亚民族史(上)》([日]三一书房 1988 年)一书中将靺鞨民族的不同部落归为不同来源，如粟末部来自夫余族，白山部来自沃沮族，拂涅部来自挹娄族，安车骨、伯咄来自勿吉族。

关于靺鞨与女真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传统女真源于黑水靺鞨的观点提出质疑。如蒋秀松《女真与靺鞨》(《民族研究》1992 年第3 期)一文，认为女真与靺鞨有直接渊源关系，但反对传统上的女真源于靺鞨黑水部的观点，主张其是源于渤海统治下的靺鞨部落。赵振绩《女真族系源流考异》(《历史研究》1995 年第5 期)一文则针对女真族系源流的三种不同观点即东夷族系说、通古斯族系说、东胡族系说，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传统的靺鞨—女真的发展脉络提出质疑。认为：女真属东夷民族说，为孙进己所主张，即女真源于东夷系肃慎之号室部，勿吉之拂涅部、安车骨(按出虎)部；女真属通古斯族系，为法国东洋学者罗姆塞(Abel Romusat)，德国人克拉普鲁斯(Klaproth)所附和，而日人白鸟库吉断定女真族为通古斯族，现有很多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而女真属东胡民族说，为李学智所主张，认为女真应是如者(女真)室韦(鲜卑)，然其说只是



举例而已，并未找出理论系统的根据。我认为，女真应源于奴真，奴真为水之义，是靠水生活的民族，俗称鱼皮鞑子。

二、靺鞨族称考释

从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靺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毋庸置疑的，但靺鞨族称的出现却较晚。这期间的变化史无确载，因此就靺鞨族称的出现及其内涵之考释就成了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版本同前引）一书提出，关于靺鞨族名的用字及读音，《隋书》、两《唐书》、《册府元龟》、两《五代史》、《太平寰宇记》引《北蕃风俗记》以及《三国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均作“靺鞨”，这是多数。仅有开元二年（714）旅顺黄金山麓井栏崔忻题名石刻作“靺羯”。疑“鞨”、“羯”当时通用，不宜作相互排斥的理解。“鞨”读何葛切，亦读作食列切、士列切、莫辖切。“靺鞨”词义有三解，一者指其物产，二者为其装束，三者是其居处，可互为补充。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一书认为，靺鞨称号始见于史书在 563 年（北齐河清二年），但最初靺鞨之“鞨”写作“羯”，至 565 年（北齐天统元年）史书中开始出现“靺鞨”，但直到唐、宋、元三朝的史料中，有时还出现将靺鞨写作靺羯。而勿吉与靺鞨虽出现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并非族称的改换，而是同一语词在不同时期的异译。因为今读 he 之“鞨”，不见于《说文解字》；羯，《说文解字》作“居谒切”，即读 ji，与“吉”音同，以今读音而论，靺羯（mo jie）与勿吉（wu ji）音近也。可见，靺鞨与勿吉只是同音对译，用字不同，靺鞨是靺羯的改写。魏国忠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二）》（版本同前引）进一步指出，“靺鞨”一词只能读为“靺羯”即末杰（mo jie），至于我国古代文献中所出现的这两个不同的译名，则是不同时代，不同的翻译人士的异译所造成的。其根据有四：其一，中外学者们大都认为隋唐时代的靺鞨系由南北朝时期的勿吉族发展而来的；其二，唐人留下的文物史籍证明，当时中原人士对“靺鞨”一词的读音是非常接近“勿吉”

的；其三，直到五代、辽、宋之际，中原人士仍旧把“靺鞨”读作“末杰”的相似音；其四，《通志》一书对“靺鞨”一词的注音，即“勿吉、靺鞨，其音相近”。孙玉良、赵鸣岐著《中国东北史》(版本同前引)对这一研究成果作了很好的总结：靺鞨在南北朝始出现时作(靺)羯，读作 wei jie。唐人李延寿纂修的《北史·勿吉传》称勿吉“一作(靺)鞨”。勿吉读作 wu ji，与靺鞨(mo he)既不同声，又不同韵，而与(靺)羯则声同音近，可视作(靺)羯为勿吉的音转。而不能直接称靺鞨为勿吉的音转，并可视(靺)羯为勿吉的同音异体。至于(靺)羯改作靺鞨，似为形近而误，并在读音上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又当是清末民初以来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现代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刊行后，皆(靺)作靺，遂将靺鞨彻底取代了(靺)羯。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7 年第 2 期)一文对目前学界流行的认为靺鞨一称最早出现于《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北齐书》的这部分内容是后人据《北史》整理的，而《北史》则是抄录自《隋书》的相关记载。至于《隋书》有关靺鞨的内容则是来自《北蕃风俗记》，因此后者才是最早记载靺鞨名称的文献。同时，作者也认为靺鞨一称最初当写作靺羯，而靺羯是勿吉的音转。

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与传统“靺鞨是勿吉的转音”这一观点不同的主张，如李德山著《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版本同前引)一书即提出：靺鞨，靺即 mei，亦即昧，其音读则由“貊”字转出，鞨同“羯”，其本由“羯”字转出。又如张博泉著《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版本同前引)一书，则从另外的角度论述了勿吉、靺鞨、渤海都是一音之转：勿吉的“勿”字应读“没”，与靺声同。吉与羯声近，故唐时勿吉亦作靺羯。依北方族读音 m 与 b、p、f 互通，j、g 互通，得读如 k、h，例如水称没(木伦)，亦转为必(必剌)，故靺鞨可转为渤海。勿吉、靺鞨、渤海是单义词语还是双义词语，尚无定说。以勿吉、靺鞨、渤海为满语窝集者，认为其语义为“森林”；认为靺鞨为木克之音转者，以为即满语汉译为“水”。勿吉是北朝时



鲜卑人对其称呼，并通过其语传到中原。勿读如没，靺从末声，渤是其转音。鲜卑语称为没、没里，后来东胡系族，水言木、沐，或沐涟、木伦。史载勿吉“居山水”，故其部皆以山水名之。吉、羯、鞨为一音之转，即j、g互转的字，转读如k、h，其义疑即“人”。例如东胡的“胡”，在蒙古、达斡尔语中是“人”的意思。史书林胡亦称“林人”。吉、羯与鞨当是j与k、h的互转关系。发声为j的字可与“真”互转，如赫金、赫斤、赫锦，亦作赫真、赫哲。鲜卑语“真”即人。勿吉、靺鞨系指在水边居住的人，即江人、江民，是北魏鲜卑人对其称谓，到元犹称水鞑靼，明称江夷。

三、靺鞨民族发展史研究

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有关靺鞨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展开。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靺鞨诸部的地理分布

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版本同前引）主张：粟末部分布在吉林市以下的松花江北流段两岸；白山部约当今吉林省延边地区；伯咄部在今吉林省榆树、夫余和黑龙江省双城、五常境；安车骨部应在阿什河流域；拂涅部当在今张广才岭迤东及牡丹江流域；号室部在绥芬河流域；黑水部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地区；思慕部在精奇里江和牛满河上游地区；郡利部在英肯河源和雅玛岭一带；莫曳皆部在库页岛南部和锡霍特山一带；窟说部在库页岛和黑龙江口一带；虞娄部在今依兰一带；铁利部在前苏联犹太自治州境；流鬼在堪察加半岛。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所列七部地域略有不同：粟末部主要分布在今日松花江中上游；伯咄部主要以今日夫余市为中心；安车骨分布于今日阿什河流域一带；拂涅部当在今东宁县以东，俄罗斯滨海地区北部一带；黑水部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松花江下游一带；白山部主要分布在长白山一带。孙进己、冯永谦著《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根据文献记载将靺鞨部落分成几个区域加以考察，即松花江和牡丹江地区的靺鞨部落，包括粟末部(位于今松花江北流段两岸)，伯咄部(在今榆树、德惠间地)，安车骨(在今阿什河流域)，拂涅部(今拉林河流域五常等地)，肃慎部即《隋书》之号室部(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白山部(在今敦化至延吉一带)，虞娄部(在安车骨与黑水部之间)，铁利部(位于今松花江东流段以北之地，约当今呼兰河以西地)；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部，包括黑水部(今黑龙江下游)，思慕部(今布列亚河及结雅河一带)，郡利部(在黑龙江下游北岸，俄罗斯共青城附近)，窟说部(在黑龙江下游右岸)，莫曳皆部(在俄罗斯土姆宁河一带)，流鬼部(在俄罗斯堪察加半岛)；松花江以西的靺鞨诸部，包括浮渝靺鞨(今长春、农安等地)，越喜部(在今辽宁省北部及吉林省南部)；高句丽境内的靺鞨诸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地区的靺鞨诸部。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版本同前引)所列靺鞨七部地理位置为：粟末部最南，抵长白山而居，约在以今吉林省吉林市为中心的第二松花江地区；伯咄部在今拉林河流域；安车骨部在今五常、阿城至哈尔滨一带；拂涅部在今牡丹江下游以东至兴凯湖一带；号室部在今绥芬河流域；黑水部分布在今松花江注入黑龙江处附近下至博朗湖一带的黑龙江南北地区；白山部约当今牡丹江上游及其以东的延边地区。而孙玉良、赵鸣岐著《中国东北史》(版本同前引)所叙靺鞨七部地理又与此略有不同：粟末部在今北流松花江段，约当今安图、敦化、蛟河、桦甸、吉林等市县境内；伯咄部约当今夫余、榆树市至双城县一带；安车骨约当今五常、阿城至哈尔滨市一带；拂涅部约当今牡丹江下游两岸一带；号室部约当今乌苏里江中游地区；黑水部依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以居；白山部约当今延吉、图们市一带。

杨保隆《黑水部和黑水靺鞨地域考》(《北方论丛》1984年第3期)一



文专就靺鞨黑水部的分布地域加以探讨，文中介绍了有关黑水部地域的传统十说。同时通过确定安车骨部在今依兰县治以东和以南，进而考订黑水部只应在今同江县附近及由此而东至奇集湖一带的黑龙江南北地。而黑水靺鞨与黑水部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称号，其地域大小不一。黑水靺鞨区域为东临日本海，北达鄂霍茨克海，西以嫩江和精奇里江附近与室韦为邻，南以嫩江下游和松花江以北地，沿松花江至依兰再折而东北至海与渤海国相邻。黑水府治所不在海兰泡和开原，应在同江以东的黑龙江南岸附近。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一文则认为黑水靺鞨的居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作者首先指出，众多学者之所以一直误把黑水部推测到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一，没有将史料和文献放在黑水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去分析和探讨；其二，没有认识到古代的黑水与今天的黑龙江是根本不同的两条水；其三，没有认识到渤海国的德里府与德里镇不是一地，而德里府、定理府则是同一地名的同音异写。因此所推出的黑水部与渤海国的接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作者认为，黑水部是因居黑水而得名的，勿吉七部时期黑水部的地域应在今阿什河西北松花江左岸的肇源、肇东、四站一带，即嫩江下游左岸及松花江东流段的上游左岸一带。唐灭高句丽以后，黑水部占据了松花江下游及今黑龙江下游两岸，分为十六部，即指今第一松花江自哈尔滨以东地域的两岸，包括今佳木斯、友谊县、富锦以及俄罗斯的黑龙江下游流域。渤海强盛时期，黑水靺鞨部则占有北至鄂霍茨克海，东达鞑靼海峡，南北约二千里，东西约一千里的地方。总之，作为古代部落集团的黑水部，其居住区域和活动范围是随着势力的增强和减弱而发生变化的，但是变化大致没有离开今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流域，即古代的黑水流域。

(二)渤海族源⑧

关于渤海族属问题，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主张：一为大祚荣是“高丽别种人”；二为大祚荣是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三为大祚荣是高丽族人。崔

绍熹《渤海族的兴起和消亡》(《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对这三种说法分别加以剖析,以为建立渤海国的大氏应该是属于靺鞨族系的渤海靺鞨,而这种靺鞨人已不同于原来的粟末靺鞨人,而是粟末靺鞨人被高丽所役属,经长期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群体。当然,也绝不等同于高丽人。姜守鹏《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援引与渤海国同时的《通典》、《崔致远集补》、《类聚国史》等中外古籍的记载及公元714年《崔忻井栏题记》的石刻,论证了渤海族属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靺鞨族。朱国忱、张泰湘等著《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一文,利用考古资料论证渤海文化是由勿吉——靺鞨文化即同仁文化类型演变来的,渤海是由靺鞨人为主体而建立的国家。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则利用金石、音韵、语言、民族学等方面的材料,得出了与朱文相同的结论。王国成《试论唐代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通过对国家与民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认为渤海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当然也包括靺鞨其他各部及高丽遗民在内。孙秀仁、干志耿《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认为渤海族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吸收靺鞨其余诸部,并挹娄、夫余、秽貊、沃沮故地原住民以及部分高句丽遗民等成分,经长久岁月而最后形成的,是以汉化了的靺鞨族为主体的新的牢固的族的共同体。而孙进己、艾生武、庄严的《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则提出了与上述诸文不同的见解,即在承认渤海族的主源是靺鞨的同时,又在鸟山喜一、金毓黻等人的靺鞨或指秽貊说的基础上⑨,论证渤海的粟末靺鞨不是勿吉——女真系统,而是秽貊,即应属肃慎以西的秽貊族,而渤海与夫余、高丽一样,都是附属于我国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权。然而,民族研究恐怕不能仅据文献资料做排比,因为现存有关的文献史料毕竟十分有限(数量有限,质量也有限),因此还必须



同时兼顾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此后，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朱国忱、魏国忠《再论渤海王国的族属问题》(《北方论丛》1983 年第 1 期)在利用文献直接记载的同时，又利用对有关渤海人口构成的研究，论证渤海政权的主体民族应为靺鞨。同时，该文又对长期争论的“高丽别种”、“北国”、“天孙”以及渤海人“溯祖追宗”等问题作了考订，认为他们均不能成为渤海出自高丽说的依据。张博泉《“别种”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4 期)一文则专门针对长期影响学界对渤海族属探讨的“别种”问题加以研究，认为：第一，凡云“别种”者，说明他们原不属于同一种族；第二，“别种”和“别部”都是指他们在政治上曾有过相统属关系。而凡被称为“别种”的，其与所依附的族的关系，从发展的后果看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在相统属后已融合在一起，虽称“别种”，实已成为一族；另一种情况，即相统属的“别种”后又从中分离出自立，此后即不视其为所曾臣属的族，而按其最初的种类称呼了。渤海即属于后一种情况。王成国《渤海王族大氏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 年第 3 期)专就渤海王室族姓“大氏”的来源问题加以研究，认为“大氏”应起源于渤海先民靺鞨部族渠帅的名称“大莫弗瞒咄”，后因为乞乞仲象等靺鞨贵族崇慕华风，将其子取汉名曰“祚荣”，袭“大莫弗瞒咄”——以大为姓。同时又据应劭《风俗通》“大氏，大唐氏之后——《礼记》曰：‘大连，东夷之子’”，认为“大”也可能来自于东夷族，但缺乏进一步的论证。1983 年 8 月 10 日至14 日，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召开的渤海史学术讨论会上，对渤海史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方生《渤海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学习与探索》1983 年第 6 期)对讨论情况作了介绍，其中有关渤海国的族属问题，会议认为国内学者意见趋于一致，即渤海人的主源是靺鞨，渤海族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吸收靺鞨其余诸部，并挹娄、夫余、秽貊、沃沮等原住民及部分高句丽遗民等成分，经长久岁月而最后形成的。此说基本概括了国内此前一阶段渤海族属问题研究的成果。

进入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学者们在总结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

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问题。金香在1989年、1990年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所谓渤海时期形成渤海靺鞨族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1989年发表的《关于渤海国的若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认为这一国家最初是以靺鞨为号的，只是在接受了唐玄宗册封以后，"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而渤海这一名称只是作为国家名存在，决非民族名。同时对有关渤海族属三说——靺鞨说、高句丽说、渤海民族说加以分别探讨，以为靺鞨说最能使人信服，具体讲渤海王族大氏是属于粟末靺鞨族。1990年又发表《渤海国时期形成过渤海族吗?》(《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一文，从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出发，结合史料，进一步论证渤海国历史上并未形成一个具有民族基本特征的所谓渤海族。而"渤海人"这一概念，应有广义(外延)和狭义(内涵)两个含义，广义渤海人是指渤海国内各民族的人，狭义渤海人是专指粟末靺鞨人。但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渤海人当指的是"渤海国人"或"粟末靺鞨人"，而非"渤海族人"。与金香意见相对立，陈显昌《渤海靺鞨考》(《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则认为历史上确有所谓"渤海靺鞨，即大祚荣系靺鞨人的称谓，所谓大祚荣系靺鞨人，是指属于大祚荣系统的那部分靺鞨人。属于大祚荣系统的那部分靺鞨人，实际上就是乞乞仲象、大祚荣粟末靺鞨家族统领的那部分靺鞨人。同时认为"渤海靺鞨"一名的产生具有深度的历史背景，是在受唐玄宗册封去靺鞨号专用渤海以后，为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它反映了靺鞨族的发展变化。以后随着渤海国势力的不断发展，"渤海"一称的广泛传播以及文化上的融合吸纳，"渤海"一称正式确定下来，"渤海靺鞨"则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姚玉成《"别种"探微》(《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一文进一步探讨了困扰学界的"别种"问题，认为依附或同种分出皆可称为"别种"，而称大氏为高丽"别种"，则体现了大氏依附高丽后又分出的历史事实，表明了大氏与高丽的密切联系，但这些并不影响大氏为粟末靺鞨这一事实。李健才《唐代渤海王国的



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一文则一改以往大氏出自粟末靺鞨部的观点,认为附高丽的只能是白山部,进而推断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但其观点缺乏直接的证据,对史实的推断如以为粟末部从未附于高丽亦不准确。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还有提出渤海族出自东夷的观点,如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何光岳《渤海大氏的来源和迁徙》(《求索》1990年第2期),李德山《渤海王国渊源丛考》(《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碧波《渤海大氏考》(《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等。傅朗云《渤海"土人"新释》(《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针对国外史学界经常引用的一条史料即日本古籍《类聚国史》引"在唐学问僧永忠的见闻"云:"渤海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加以探讨,认为所谓"土人"应指"发人"的后裔,即勿吉族群和靺鞨族群中的伯咄部,而其先世则为东夷族的"女魃"族,在商周以前沿今渤海北岸来到东北地区。其建国前乞乞仲象等伯咄人(发人直系)逃至契丹地,契丹自称"大蕃(发)",共同起兵反唐(唐尧之后),大祚荣改国号为渤海,是蕃(发)的缓读,且以"大"为姓。这些观点尽管很有新意,但猜测的成分过多,直接的证据过少,而且单从语音的训读上推测也很难让人信服,有待进一步探讨。

此外,1979年9月在西安交通大学院内出土了三件套装在一起的唐代银盒,最外层是六瓣喇叭形高圈足银盒,盒身呈六瓣形,盖面隆起,以边呈隆起的六个角,卵型规范,正中呈六角形,连同周围的卵形六个区划,共分为七个部分。正中区域刻有"都管七个国"字样。另外,在七个部分中各錾有人物图像及题榜,其意指七个国家,其中包括高丽国。而从银盒的制作形制、纹饰等方面考察,银盒当属晚唐时作品。这就与高丽国的兴亡时间相冲突。国外一些学者以此为论据认定在当时人眼中渤海国就是原来的高句丽,渤海族是高句丽的后裔。就此问题,中国学者也有探讨,如周伟洲《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三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即指出：高丽与吐蕃一样，虽已灭亡，但其土地、人民俱在，也可“都管”；其次，银盒上的“都管七个国”并非当时实际都管的，而是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不一定都十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

九十年代中叶以后，国内研究界出现了几部总结性的研究著作，对二十世纪的研究成果作了概括：禹硕基等主编《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是一部论文集，但其中的观点较有概括性。其中孙进已《粟末靺鞨的汉化及建立渤海国》一文，认为渤海国是由附高丽的粟末靺鞨部建立的，当然也有非主源的高句丽人参加。同时对国外的一些史籍记载的谬误加以辨析，认为用它们作为确定族别的依据是不可靠的。其另一篇《渤海国的民族构成》则具体识别渤海包括靺鞨种和高丽国的哪些民族，即由粟末靺鞨人、白山靺鞨人、高句丽人、汉人、肃慎人等五个部族构成。张博泉、魏存成主编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版本同前引）一书认同渤海国是以靺鞨形成的部族为基础融合周边的一些民族建立的，批驳了所谓的渤海、新罗“南北朝论”，认为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对渤海称“狄国”、“北国”，不过是两《唐书》将渤海列入北狄传之“北狄国”的省称，而渤海从不称新罗为南朝。同时对日本《类聚国史》所谓“土人”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类聚国史》记载中的“百姓”包括“土人”和靺鞨人，靺鞨“百姓”为首领，土人“百姓”为村长，可知“百姓”指“百官族姓”。“土人”当是士人之误，指属于统治民族地位的渤海人，亦即指渤海人中的入仕并有品级的贵族集团。首领是指靺鞨的氏族长、部落长，而都督、刺史是由士人组成的位于首领之上的地方长官。孙玉良、赵鸣岐著《中国东北史》第二卷（版本同前引）一书认为渤海王国是以唐代靺鞨人为主体，吸收周围各族参加，共同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并得到了唐朝的确认与支持，始终为唐朝版图的一角。有关大氏的族属，《新唐书》的相关记载更准确，即“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同时辨析了朝、日的相关记载，认为其主流也承认渤海的靺鞨族属，其差异



是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此外，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年）也是一部较好的阶段性总结著作。王先生早在 1984 年就出版了《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新书是在前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书中亦认同渤海建国者大祚荣及其集团是粟末靺鞨人，渤海是粟末靺鞨联合部分高句丽遗民建立的民族政权，渤海国还包括汉、夫余等民族，是个多民族国家。书中对国外相关史料逐一辨析，批驳了国外一些学者的不符合事实的观点，如有关前述“土人”问题，书中认为“土人”是指当地靺鞨人以外的徙居户，他们文化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所以任“村长”，这批人是以粟末靺鞨为主的，当然也包括附属于渤海统治阶层的高句丽人和汉人等。同时，又从考古学、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靺鞨——渤海的继承性。

日本学者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比较多，其中酒寄雅志《渤海国家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日]《朝鲜史研究论文集》16，1979 年）把渤海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并赞成“南北国时代”的观点。驹井和爱《中国都城·渤海研究》（1979 年日本雄山阁版）认为渤海国是由占据松花江流域的粟末靺鞨统治者大祚荣吞并了附近各部之后宣告成立的。森安孝夫《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民族译丛》1982 年第 4 期；海兰译自[日]《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7，1982 年版）认为渤海的建国是通古斯系民族国家的建设。换言之，即企图使高句丽国再兴，其中心并成为日后统治阶层的则是以王族大氏为代表的归化乃至同化于高句丽的靺鞨人与以高氏为代表的高句丽人。考虑到其建国的主要角色乞四比羽是纯粹的靺鞨人，大舍利乞乞仲象与大祚荣是受高句丽强烈影响的靺鞨人，再从其初期的根据地是历来靺鞨（勿吉）人所居住的地方来看的话，成为其基础的民族应为靺鞨人。中村嘉男著，王承礼译《苏联滨海边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学术研究丛刊》1985 年第 1 期）通过对苏联滨海地区考古发现的比较研究，认为滨海地区最初的封建国家渤海国，是由高句丽灭亡后出现的朝鲜各族、靺鞨族团的满族系各族、挹娄系各族、一部分黑水靺鞨系各族等构成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单一的族体。参加

渤海建国的主力，是原高句丽系各族和靺鞨系各族。李成市《古代东北亚民族的对日交通——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日]《东亚古代文化》96号，1998年)承认渤海统治阶层的核心是粟末靺鞨，但进一步认为其前身应为附于高句丽的秽族集团。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基本接受渤海是高句丽后继国的观点，但所引用的材料仍限于日、朝若干古代文献的记载，也包括前面提到的西安出土的“六瓣银盒”。铃木靖民《渤海国家的结构和特征——首领·生产·贸易》([日]“Sinica”1998年9月号)对渤海族属问题的论断，是目前日本学界的代表观点，即一方面承认乞乞仲象等人为粟末靺鞨；一方面又认为《类聚国史》所记“土人”即高句丽遗民，渤海社会是由各种靺鞨及高句丽遗民构成的，而高句丽遗民则处于主导地位。

朝鲜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十分关注渤海史研究，进入八十年代，在主体思想牢固树立的同时，继承性的主张进一步的强化。孙永钟《关于渤海的西边》1、2([朝]《历史科学》1980年第1、2期)认为还在建国时期渤海就已占领了辽东地方，同时下结论说：正因为那样，渤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在领域和居民结构上，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高句丽的继承者。朴荣海、张相烈等人亦主此观点。蔡熙国《关于渤海的贞惠公主墓和贞孝公主墓》([朝]《朝鲜考古研究》1988年第2期)通过对两个墓葬的探讨，阐发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关系。玄明浩《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朝]《历史科学》1991年第1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第1期)通过对渤海历史上两位王太子(大武艺、大都利行)有过“桂娄郡王”称号这一史实的讨论，认为桂娄部本是高句丽国王出身的部落名称，多作象征高句丽使用，因此，封太子为桂娄王，就是在宣布作为继承高句丽国家的渤海国的性质。另外，唐朝之所以册封第二代王的太子大都利行“桂娄郡王”的称号，实际上是不得不承认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关系，进而强行将之降格为郡王。同时，渤海国王以“大”为氏，“大”与高句丽王族的“高”其意相通，这两个字都与传为高句丽始

祖东明王之父“解慕漱”的“解”字相通，足见两者的继承性。张国钟《渤海本土的居民构成》([朝]《历史科学》1991年第2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3年1、2合订本)一文，通过对渤海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遗迹、遗物的分布，灭国后其遗民的反契丹斗争规模等的探讨，认为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其主要居民为高句丽遗民。但文中问题甚多，其所以认为史料记载中的渤海人为高句丽人，是基于一种玄虚的猜测，即渤海时期靺鞨族尚未达到定居和进行农耕生活的阶段，是一个束缚于强固的共同体纽带中的野蛮人，因此没有可能统治一个国家。随后，他又发表了《靺鞨人在渤海本土的分布状况》([朝]《历史科学》，1991年第4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年第2期)一文，对渤海建国前高句丽境内靺鞨族分布情况，建国后国内靺鞨族分布情况，灭国后靺鞨族的情况进行分析，进而认为在高句丽和渤海国境内的靺鞨族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因此渤海是由高句丽遗民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的强大主权国家，其境内散居着一部分靺鞨人，但数量很少，在居民构成中不能占主体地位。但该文主要论据值得商榷，如仅根据靺鞨从事捕捞和狩猎而认为其从事副业，人口必定不如从事农业的高句丽人多；又毫无根据地称渤海时期靺鞨人数量“无时不在大幅度地减少”，比高句丽时代人数更少；而渤海灭亡后史载靺鞨及其后裔女真人数量很多的情况是因为过去在渤海人压迫下的靺鞨人急速繁殖，以及许多靺鞨族居民从其他地方迁到渤海国土。总之，朝鲜的研究是呈一边倒倾向，即强认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尽管发表了许多论文，但在内容上不免乏味单调。

韩国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国立汉城大学的宋基豪教授为代表，他出版了有关渤海国的专著多部。东国大学文理学院东方史教授李龙范的《渤海国历史之谜》([韩]《新东亚》1981年；沈仪琳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一文，主张渤海是高句丽遗民所建立的高句丽的复兴国。但是，他对把渤海史纳入朝鲜史范畴的“南北国时代论”是持保留态度的。

前苏联的渤海族属研究，更多的是致力于说明渤海史可以纳入苏联史或俄国史的体系中去。如沙夫库诺夫《渤海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林树山译，《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一文承认渤海是靺鞨人政权，但同时认为苏联境内的现代埃文基(鄂温克的异译)人和来自鲜卑的古代靺鞨人有共同的祖先，其目的是将渤海史同现代苏联少数民族如埃文基人联系起来，纳入苏联史或俄国史中去。他的重要论点为："靺鞨人的震国后来改称渤海，它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宣称，自己写书的任务，在于"证明渤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揭穿某些外国史学家关于渤海历代国王似乎都臣属于日本或中国皇帝的断言是站不住的"。而其这样说的证据不外是渤海有自己的对内政策和自己的年号，但这些根据又都未必充足。

(三)政治文化史

这一时期，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靺鞨史的学者并不多，成果也不明显，包括前述《中国民族史》、《中国东北史》在内的著作，在这一问题上都没有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当然，有些学者对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魏国忠《唐与黑水靺鞨之战》(收入《东北民族史研究(二)》，版本同前引)一文根据《新唐书·李多祚传》的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按指中原)，……至多祚，骁勇善射，以军功累迁右鹰扬大将军，讨黑水靺鞨，诱其渠长，置酒高会，因醉斩之，击破其众"。对唐与黑水靺鞨关系史及黑水州都督府建立前唐朝对今黑龙江地区的经略加以探讨，认为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唐廷与黑水靺鞨之间在原高句丽故地北境逐渐形成对抗、冲突的局面，并在691年至692年之间演化成一场大规模军事对抗，遏制了黑水靺鞨人南进扩张的势头，同时客观上为粟末靺鞨人回归故地，建立震国——渤海政权铺平了道路。宋玉祥《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北方文物》1995年第4期)



认为所谓渤海与契丹间的“世仇”，来源于万岁通天元年(698)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时，作为盟友的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乞四比羽没有支持李尽忠到底，率部取道东奔，走上了自谋发展的道路，致使李尽忠兵单势孤，屡战屡败。

由于有考古发掘资料的有力佐证，这一时期有关靺鞨文化史的研究基本确立了靺鞨文化的本质特征。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版本同前引)一书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考察靺鞨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艺术。在生活习俗上认为食猪肉是勿吉—靺鞨人的重要习俗，而牛羊肉还不多见，捕鱼、狩猎仍然是勿吉—靺鞨人的重要谋生手段；其居住情况主要为筑城穴居，但也有不筑城的村落；其婚姻状况则表明，靺鞨人已进入父权制阶段，但保留着一部分母权制的遗风；葬俗方面，根据已发掘的墓葬中的代表，萝北县团结砖厂的墓群显示，当时已经产生了初步的阶级分化，男女分工已经非常明显，同时二次葬，分葬死者颅躯，杀所乘马于身前设祭等习俗还大量存在；服饰与发式方面，其用以织布的原料大概是野麻，男子穿猪皮衣，头插虎豹尾，并有了大量用于装饰的小饰件，其发式则属于传统的通古斯—满族的发辫；尚武与骑射，在靺鞨墓葬中多随葬有兵器，一般常见的有铁矛、铁刀、铁镞、铁甲片等，同时在墓葬中往往葬有马头与马具，在特罗伊茨墓的墓群中陪葬的马骨超过了猪骨；宗教信仰——萨满教，其主要崇拜对象是熊；艺术方面主要论述了靺鞨舞，制陶艺术以及金属、石、骨等饰品的生产。卢勋、李根蟠著《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文化出版社1991年)一书重点论述了靺鞨人的养马、养猪历史。特别是马的发展，指出肃慎系民族本来不善于养马，但到靺鞨族时该地养马业发展很快，五代时的黑水靺鞨已向中原地区输出马匹了。

日本学者对靺鞨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东北亚地区的角度将它与鄂霍茨克文化联系起来。森川哲雄著《1979年日本史学界有关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概况》(刘世哲、邢玉林译，《民族译丛》1980年第6期)介绍了日本史学界有关鄂霍茨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文中提

到：菊池俊彦的《鄂霍茨克文化的起源和周围诸文化的关系》(《北方文化研究》12)一文根据仅能在鄂霍茨克沿岸发现的鄂霍茨克文化遗迹推断，产生此民族生活方式的自然条件与其他地区不一样，并且根据出土的各种文物说明了鄂霍茨克文化和大陆的靺鞨、女真文化的交流，进一步认为吉里亚克是鄂霍茨克文化的创造者。大井晴男《鄂霍茨克文化的竖穴居住址》(《三上次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一文，根据鄂霍茨克文化的竖穴居住址的设计说明了它和古代吉里亚克文化的关系，并论述了这两种文化的形成与居住在沿海州、黑龙江流域的挹娄—勿吉—黑水靺鞨文化的关系。与此相反，菊池彻夫《靺鞨和鄂霍茨克文化》(同上)在鄂霍茨克文化和靺鞨文化关系上是比较慎重的。文章提出，见于中国史料的挹娄、勿吉、靺鞨的文化特征和鄂霍茨克的文化特征大不相同，其最大差异就是前者缺乏后者所具有的农耕，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动物的礼仪。作者认为，据中国史料，鄂霍茨克文化的祖先在古代中国的东北部，就是在《日本书纪》中也见到的肃慎氏。中国史料和《日本书纪》之所以都有肃慎一词，可能是《日本书纪》的作者熟悉中国的史料并且也知道肃慎一词。因此，把靺鞨文化和鄂霍茨克文化混淆起来了，这样是不妥的。

俄国学者从黑龙江流域考古发现出发，对靺鞨文化作了比较具体化的阐述，其代表作就是E.N.杰烈维扬科所著《黑龙江沿岸的部落》(版本同前引)，书中大量利用考古成果，并很好地结合了民俗学的知识，全面地论述了靺鞨族的经济形式、住房、军事、社会制度、精神文化及毗邻关系。尽管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所用材料未能全面囊括已发现的靺鞨遗迹，而且仍未摆脱传统俄国学者的带有政治目的的研究偏见，但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内容全面的靺鞨史专著。

(四)考古发现及其研究

在文献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考古材料对相关研究的辅助作用就



显得非常重要了。事实上，建国以来，东北亚各国在靺鞨考古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吕光天、古清尧编著《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版本同前引)，书中较详细地列举了有关靺鞨的考古发现：即在今黑龙江省呼玛县的江湾农场，爱辉县长发屯、小乌斯力，东宁县绥芬河上游，绥宾同仁乡同仁村，哈尔滨市东郊阿什河下游，宾县克头山，吉林省永吉县乌拉乡，今俄罗斯犹太自治州纳依费尔德、阿穆尔省诺维彼得罗夫卡附近的杜乃依卡河口，结雅河(即精奇里江)支流别拉雅河(即毕拉尔河)上的特罗伊茨科耶，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帝尔(特林)，爱辉河口的加利马村，北库页岛亚港附近，南库页岛西拉奴西城等地，都发现了靺鞨或与靺鞨文化相联系的古城、墓葬等遗迹。同时，书中还具体论述了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的发展历程，表明黑水靺鞨与隋唐两朝都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其中黑水部给中原王朝的贡物主要有鱼牙绸、朝霞绸、综布、貂鼠皮、牛黄、金、银等，唐回赐的主要是帛。孙进己著《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一书对目前所发现各遗址作了民族归类，认为同仁文化类型是勿吉族的考古文化；杨屯二期文化是粟末部的考古文化；今延边地区的团结文化晚期是白山部考古文化；九台上河湾文化为伯咄部考古文化；松花江北流段东至拉林河流域，特别是吉林北杨屯大海猛遗址，为拂涅部的考古文化；阿什河下游黄家崴子、黄山南北山城子、墨里街、高台子等地的考古遗址是安车骨部的考古文化；今牡丹江上游宁安东康遗址为号室部的考古文化；今依兰至同江一带的绥宾县复兴乡发现的同仁遗址为虞娄部的考古文化；黑龙江中游伯力一带的考古遗迹为黑水部的考古文化；俄罗斯结雅河支流别拉雅河上特罗茨考文化遗址是思慕部的考古文化；此外尚包括黑龙江省的呼玛县江湾，瑷辉县长发屯，小乌斯力等地的遗存；俄罗斯滨海地区奥西诺夫卡遗址及绥芬河上游东宁遗址都属于率宾人的考古文化。佟柱臣著《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 1991 年)一书叙述了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发现了一些可能属于靺鞨的遗存，进而认为这些遗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

完全达到了国家出现以前的物质文化水平，这样，渤海国家的出现，就有了历史必然性的基础。同时，文中特别提到在俄罗斯奥西那维耶居住址发现了两枚开元通宝，说明靺鞨晚期仍属唐王朝的货币流通区。此外，这一时期就具体靺鞨考古遗址进行研究的论著也很多，如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 1987 年）一书就详细介绍了吉林省榆树县大坡乡老河深村发现的靺鞨遗址。该遗址分上、中、下三层，其文化类型变化较大。作者认为，其上层墓葬，盛行二次葬，所见死者的葬式，均无完整的支骨，均无定位，零乱地置于棺内中间；同时这里发现六座墓葬有明显火烧的痕迹，火葬方法不是置死者入棺后火焚，而是在二次葬基础上进行的，这种习俗大致同于《北史·勿吉传》中的记载，“其俗与靺鞨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其墓葬简陋，属狩猎和畜牧业经济，未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年代大约为公元 780 年。因此，从地望、时间及文化特征看，应属靺鞨的一支，具体一点说是粟末靺鞨。魏存成《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靺鞨、渤海墓葬》（《北方文物》1998 年第 1 期）一文对第二松花江中游，即第二松花江之松花湖以下的一个流段所流经的地区出土的几处重要的靺鞨—渤海墓群进行研究，认为其中的永吉杨屯墓群、榆树老河深墓群、永吉查里巴墓群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其上限可到北朝后期，下限可到渤海初。从墓葬形制结构的葬式、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综合分析可看出，三处墓葬包含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即靺鞨本民族自东北方带来的，本地区原夫余族的和南方高句丽影响的三种文化因素，当然为主的还是第一种。这种情况，正好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民族间的变迁、交往相吻合。

随着靺鞨遗存的不断发现，对靺鞨器物的研究也取得了深入的进展，在个别方面，如陶器已经基本确定了其谱系特征，这对探索靺鞨文化乃至靺鞨民族史都是极有裨益的。谭英杰、赵虹光《靺鞨故地上的探索——

讨论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物质文化的区别》(《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已知靺鞨考古遗存的比勘,认为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的物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首先表现在陶器上。1. 黑水靺鞨早期的陶器,基本以手制为主,以夹砂陶居多,器形有盘口罐,斜颈折腹壶,而粟末靺鞨的陶器也以手制夹砂陶为主,但此时已使用轮制泥质陶,器形有重唇折肩罐,泥质大口鼓腹罐;2. 到了黑水靺鞨晚期和渤海时期,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不同,以及接受先进文化和所受影响程度不同等原因,在陶器形态上两者有明显区分;3. 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晚期的陶器由于黑水靺鞨处在边远地区,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较少,因此,在陶器变化上,早晚两段变化不明显。而处在与先进文化区域相近和各种不同的先进文化影响之中的粟末靺鞨后裔的渤海文化,变化则相当显著。

其次,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遗址中发现的兵器、带饰、马具、头饰等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如黑水靺鞨遗存中的刀、短剑、长剑、铜铃等以及粟末靺鞨遗存中的腰带上装饰用的铜牌。

第三,黑水靺鞨部、粟末靺鞨部的葬俗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如粟末—渤海民族中的多人合葬不见于黑水靺鞨族。文章最后还简略探讨了造成双方文化内涵上的区别的原因。胡秀杰、刘晓东《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入手,探讨渤海陶器的类型特点,专门论及渤海陶器传承渊源问题。作者认为,在渤海建国前至渤海建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主要是重唇筒形罐和敞口(或称盘口)鼓腹罐。前者无疑是粟末靺鞨的典型器物,后者无疑是黑水靺鞨系的典型器物。尤其是重唇筒形罐贯穿于渤海建国后的各个时期。这一点是对渤海是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国家的观点的有力支持。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将靺鞨的陶器遗存分作四期。即前期:团结甲组,团结乙组,老河深甲组(以上为同仁一期),杨屯甲、乙组,老河深乙组;早期:杨屯丙组,老河深丙组,黄鱼圈二层(西石岗),石场沟墓地;中期:北站M3,龙海墓葬,黄鱼圈H1,查里

巴 M2,大城子墓群;晚期:二道河子墓群,北大墓地。王培新《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一文通过对靺鞨—女真系铜带饰进行类型学、年代学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的性质为萨满教的法器,随葬铜带饰表明死者的身分应是萨满。靺鞨—女真铜带饰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萨满教在靺鞨—女真社会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通过对靺鞨系出土文物的不断深入研究,探讨靺鞨文化问题,逐渐为学者所重视,并提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观点。于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北方文物》1985 年第 1 期)一文根据对靺鞨考古遗存的研究,认为靺鞨文化具有如下特征:城址的发生,独特的靺鞨式陶器,铁器的普遍使用,石器使用的残留,大量马骨、猪骨和其他动物骨骼的并存等。同时,作者认为靺鞨物质文化与室韦物质文化具有同一性。日本学者菊池俊彦著《黑龙江省萝北县的靺鞨遗存》(于建华、丰收译,《北方文物》1992 年第 2 期)一文提出靺鞨=同仁文化的概念,并回顾了同仁文化的发掘、研究史,认为靺鞨=同仁文化的起源是在阿穆尔(黑龙江)中游地区,罐形陶器的分布区域已到松花江中游地区。同时,作者又提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靺鞨=同仁文化的最初起源地和时间。李陈奇《靺鞨—渤海考古学的新进展》(《北方文物》1999 年第 1 期)是对此前一时期靺鞨—渤海考古发现及研究的简单回顾和总结。文章介绍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靺鞨—渤海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包括墓葬、居住址、大型建筑址、窑址、边墙、城址等方面,并藉此回顾了靺鞨文化研究的历程: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苏联考古学界正式提出靺鞨文化的概念,以此泛指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部分铁器时代遗迹。以后,随着中、俄两国境内相当一批靺鞨时期遗址的发现,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但长期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最易于准确反映靺鞨考古学文化遗存发展过程中阶段性变化的陶器的分期作业,却一直没能较好的解决。当然,作者也认



为，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很显著的，如乔梁《靺鞨陶器分期初探》（见前）一文，对靺鞨遗存的分期是可靠的。关于萝北团结墓葬和同仁下层文化遗存，作者认为乃是靺鞨族之一部——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同时，作者指出，与同仁下层文化时代相同但文化特征有别的其他靺鞨遗存在黑龙江南部以至吉林地区已有诸多发现，这与史书中靺鞨分为诸多不同的部落的记载大体吻合。

四、靺鞨史研究的展望

回首靺鞨史研究，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进展，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一个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对中国历史、东北亚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民族，其历史面貌仍是相当模糊的，可以说，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仍争论不休，迄无定论。与其他中国史上重要的民族如匈奴、东胡、突厥相比，靺鞨史的研究工作远未系统展开。这一方面与存世史料过少且记载缺乏完整性、统一性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重视不够，研究方法单一所造成的。二战以前，日、俄学者的关注相对较多，但其侵略意图明显，主观偏见充斥整个学界，不可能真正客观地揭示靺鞨史的本来面貌。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和平环境所带来的史学研究的繁荣，靺鞨史研究却反而走向了衰落，一方面日、俄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关注的兴趣，另一方面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文献记载比较详尽的靺鞨后裔渤海、女真史的研究，只是在不可避免时才对靺鞨约略提及[10]。特别是近二十年，如果不是考古工作者的贡献，可以说整个研究都会有原地踏步之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迄今为止连一本能够为学术界所称道的“靺鞨史”都难以寻觅的原因。当然，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沉寂终究是暂时的，随着各方面辅助性工作如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靺鞨史研究终将获得突破和重大进展。

下面，是我个人对今后靺鞨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供史学界同仁考虑斟酌。

其一，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和不完整，单纯从文献上考察靺鞨民族的发展脉络已很难有所突破。当然，在文献的使用上仍存在一些误区，如国家地域偏见。一些研究者把古代文献记载的地域范围人为地限制在今天的国家地域范围内，人为地缩小了研究视野。

其二，新方法的应用有待突破和规范化。二战以来的和平环境使考古工作取得长足的进步，有关靺鞨的考古发现也不断涌现，如何正确地应用这些难得的宝贵资料，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只有“二重证据法”的应用，才是靺鞨史研究取得突破的保证。同时，在追求新方法、新角度时，一定要规范应用，不能随意发挥，否则误人误己。如对音方法的引入，曾给靺鞨族称演变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但有时不能规范使用，反而将正常的研究引入歧途。

其三，必须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在当前的环境下，闭门造车是绝对行不通的。靺鞨民族立足于东北亚，关涉整个东北亚古代史的发展，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中国的汉文史料、考古发现，俄、朝境内的考古发现，朝（韩）、日两国的古代文献都是必不可少的。各国学者在利用本国文献上的优势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综合，是靺鞨史研究新世纪到来的有力保证。

附：近二十年靺鞨史研究论著目录

著作：

（日）驹井和爱《中国都城·渤海研究》，日本雄山阁 1979 年。

奥克拉德尼科夫著、莫润仙等译《滨海边区遥远的过去》，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干志耿等《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日）日野开三郎《东北亚民族史（上）》，三一书房 1988 年。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吕光天、古清尧《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



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傅仁义等《东北古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

魏国忠《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禹硕基等《渤海国与东亚细亚》,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张博泉《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孙玉良、赵鸣岐《中国东北史》第二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日)滨田耕策《渤海国兴亡史》,东京吉川弘文馆 2000 年。

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年。

论文:

王承礼《靺鞨的发展和渤海王国的建立》,《吉林师大学报》1979 年第 3 期。

(日)酒寄雅志《渤海国家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朝鲜史研究论文集》16,1979 年。

崔绍熹《渤海族的兴起和消亡》,《辽宁师院学报》1979 年第 4 期。

(日)菊地彻夫《靺鞨与鄂霍次克文化》,《三上次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考古学论集》1979 年。

(日)河上洋《渤海的靺鞨统治策略》,《东洋史研究》39:2,1980 年。

(韩)权五重《试论靺鞨的种族系统》,《震檀学报》49,1980 年。

(朝)孙永钟《关于渤海的西边》1、2,《历史科学》1980 年第 1 、2 期。

姜守鹏《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求是学刊》1980 年第 3 期。

陈连开《唐朝渤海黑水两都督府述略》,《历史教学》1980 年第 3 期。

朱国忱、张泰湘等《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学习与探索》1980 年第 5 期。

(日)森川哲雄《1979 年日本史学界对有关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概况》,《民族译丛》1980 年第 6 期。

朱国忱《"靺鞨"究竟应该怎样称呼》,《学习与探索》1981 年第 2 期。

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1 年第 3 期。

《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新资料》,《北方文物》1982 年第 1 期。

王国成《试论唐代渤海国的族属问题》,《沈阳师院学报》1982 年第 1 期。

(俄)沙夫库诺夫撰,林树山译《渤海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 年第 1 期。

孙进己等《勿吉和渤海的物质文化》,《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动态》1982 年第 2 期。

《靺鞨、室韦及其文化》,《北方文物》1982 年第 3 期。

陈显昌《肃慎的发展和渤海国的建立》,《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4 期。

孙秀仁、干志耿《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4 期。

(俄)杰列维扬科著,林树山译《靺鞨、室

韦及其文化》,《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

沈仪琳译《渤海国历史之谜》,《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孙进己《我国古代北方各族的葬俗试析》,《吉林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孙进己、艾生武、庄严《渤海的族源》,《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5期。

《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农业》,《黑河学刊》1983年第1期。

朱国忱、魏国忠《再论渤海王国的族属问题》,《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

刘忠义《靺鞨族及"渤海国"》,《民族文化》1983年第1期。

游寿《靺鞨命名与歌舞服色—渤海前期文物论丛之一》,《哈尔滨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韩)李龙范《渤海史之谜》,《民族译丛》1983年第2期。

傅朗云《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源流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王成国《渤海王族大氏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

张博泉《"别种"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方生《渤海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6期。

严圣钦《靺鞨与渤海》,《文史知识》1983年第11期。

杨保隆《关于肃慎两个基本问题的辨析》,《吉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黑水部和黑水靺鞨地域考》,《北方论丛》1984年第3期。

孙正甲《铁利概论》,《龙江史苑》1985年第1期。

干志耿《靺鞨族及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林树山译《苏联远东的靺鞨渤海女真遗存及其出土陶器的地理分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5年第1期。

(日)中村嘉男著,王承礼译《苏联滨海边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林树山《苏联对靺鞨—渤海—女真陶器的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干志耿《靺鞨族与黑龙江流域的靺鞨遗存》,《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贾伟明《东北地区的石镞》,《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苏联对靺鞨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上),《黑河学刊》1985年第2期。

《苏联对靺鞨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下),《黑河学刊》1985年第3期。

魏国忠《唐与黑水靺鞨之战》,《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

《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的经济和社会性质》,《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

董万仑《白山靺鞨五考》,《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冯继钦《靺鞨族共同体类型及其特征初探》,《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朝)蔡熙国《关于渤海的贞惠公主墓和贞孝公主墓》,《朝鲜考古研究》1988年第



2 期。
董万仑《关于粟末靺鞨几个问题的探讨—兼于靺鞨新说商榷》,《黑河学刊》1989 年第 1 期。
金香《关于渤海国的若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 年第 1 期。
《苏联学者对黑龙江沿岸中世纪部落的研究》1990 年第 1 期。
谭英杰、赵虹光《靺鞨故地上的探索—试论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物质文化上的区别》,《北方文物》1990 年第 2 期。
张高《靺鞨人国家产生的形成》,《蒲峪学刊》1990 年第 2 期。
何光岳《渤海大氏的来源和迁徙》,《求索》1990 年第 2 期。
金香《渤海国时期形成过渤海族吗?》,《北方文物》1990 年第 4 期。
(朝)玄明浩《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历史科学》1991 年第 1 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 年第 1 期。
(朝)张国钟《渤海本土的居民构成》,《历史科学》1991 年第 2 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3 年 1、2 合订本。
(朝)张国钟《靺鞨人在渤海本土的分布状况》,《历史科学》1991 年第 4 期;文一介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2 年第 2 期。
《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方文物》1992 年第 2 期。
《黑龙江萝北县的靺鞨遗迹》,《北方文物》1992 年第 2 期。
(日)菊池彻夫《靺鞨与鄂霍茨克文化》,《北方文物》1992 年第 2 期。
蒋秀松《女真与靺鞨》,《民族研究》1992 年第 3 期。
《黑龙江族系、族源研究概述》,《北方论丛》1992 年第 6 期。
李德山《渤海王国渊源丛考》,《民族研究》1993 年第 1 期。
陈显昌《渤海靺鞨考》,《学习与探索》1993 年第 2 期。
《渤海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北方文物》1994 年第 2 期。
《靺鞨陶器分期初探》,《北方文物》1994 年第 2 期。
王可宾《再议女真称谓》,《黑龙江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
傅朗云《东北民族源流及其活动地区索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 年第 2 期。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源于东夷论》,《东北师大学报》1995 年第 4 期。
宋玉祥《渤海与契丹世仇之浅见》,《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
《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世纪考古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北方文物》1995 年第 4 期。
赵振绩《女真族系源流考异》,《历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文物》1995 年第 9 期。
周伟洲《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王禹浪《靺鞨黑水部地理分布初探》,《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
《靺鞨—女真系铜带饰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
李玲、东青《也谈靺鞨名称之始见》,《北

方文物》1997年第2期。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靺鞨、渤海墓葬》,《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

张碧波《渤海大氏考》,《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

(日)李成市《古代东北亚民族的对日交通—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东亚古代文化》96号,1998年。

(日)铃木靖民《渤海国家的结构和特征—首领·生产·贸易》,"Sinica"1998年9月号。

李陈奇《靺鞨—渤海考古学的新进展》,《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傅朗云《渤海"土人"新释》,《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姚玉成《"别种"探微》,《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李建才《唐代渤海王国的创建者大祚荣是白山靺鞨人》,《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魏国忠《关于渤日交聘中的"高丽国"问题》,《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

魏国忠《论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姜守鹏《再谈渤海国的族属》,《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3期。

张碧波《渤海大氏续考》,《北方文物》2001年第3期。

胡秀杰、刘晓东《渤海陶器类型学传承渊源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

程妮娜《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张碧波《重审渤海建国史——兼评"依附"说、"白山"说、"叛乱"说》,《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

马一虹《8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文史哲》2001年第6期。

王成国《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吗?》,《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

注释:

① 详见《"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1915年。

② 详见《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

③ 详见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

④ 详见池内宏《勿吉考》收入《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一册》,吉川弘文馆,1933年。

⑤ 本处所指之研究,是以靺鞨族称为基础的,包括靺鞨向渤海、靺鞨向女真的过渡,但不包括针对渤海、女真的具体研究。

⑥ 此为丁谦先生的观点,详见丁谦著《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

⑦ 原著发表于1981年。

⑧ 本部分内容详见拙文《百年渤海族属问题研究综述》,未刊稿。



⑨ 金先生早期有此说，以后基本放弃，专主靺鞨源于肃慎、挹娄、勿吉系统说。

⑩ 当然，像前文提到的俄国学者 E.H.杰烈维扬科所著《黑龙江沿岸的部落》这样的好的著作也还是有的，只是数量十分有限。

附录三：

隋唐五代东北亚关系史大事年表[1]

起隋开皇元年(581)，迄后周显德六年(959)[2]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皇元年(581)	隋授高丽王汤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突厥阿波、沙钵略遣使朝贡;沙钵略与高保宁南下。靺鞨酋长遣使朝贡。高丽、百济遣使入隋朝贡。	本期史料所见高丽即高句丽，下同。
开皇二年(582)	突厥兵数十万分道南下。正月，高丽、百济入隋朝贡;十一月，高丽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	突厥分道南下，长孙晟与阿波说和，沙钵略大败于白道;遣使朝贡;内战爆发。正月，高丽朝贡;五月，高丽靺鞨并贡方物;十一月，高丽又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	契丹率诸莫贺弗遣使请降。突厥沙钵略败于阿波，南逃寄居白道川。靺鞨贡方物。高丽入隋朝贡。百济入陈朝贡。	
开皇五年(585)	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高丽入陈朝贡。	
开皇六年(586)	高丽迁都长安城。百济入陈朝贡。	
开皇九年(589)	百济遣使贺隋平陈。	
开皇十年(590)	契丹遣使朝贡。	
开皇十一年(591)	靺鞨遣使贡方物。正月、五月，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十二年(592)	契丹遣使贡方物。靺鞨遣使贡方物。高丽贡方物。	
开皇十三年(593)	契丹遣使朝隋。靺鞨遣使贡方物。奚、室韦遣使朝贡。	
开皇十四年(594)	隋册新罗王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开皇十六年(596)	新罗入隋朝贡。	



续表

年代	事件	备注
开皇十七年(597)	隋赐玺书责高丽王汤不臣。高丽治兵积谷拒隋;王汤死,子元嗣立,请封王,隋许之,册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	
开皇十八年(598)	二月,高丽王元率靺鞨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之。六月,隋黜高丽王元官爵;水陆三十万伐高丽,出兵不利,遇疫死者十之八九;因高丽谢罪,罢兵。百济王昌欲助隋,与高丽交恶。	
开皇二十年(600)	东突厥国乱,诸部离散。高丽入隋朝贡。	
仁寿二年(602)	新罗入隋朝贡。	
仁寿三年(603)	高丽与新罗战于汉山城。	
仁寿四年(604)	新罗入隋朝贡。	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不与马韩同。
大业元年(605)	隋以韦云起将突厥兵两万大败契丹。契丹八月寇营州。靺鞨厥稽部渠长突地稽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夫余城北举部向关内附,处之柳城。	靺鞨来降,《旧唐书》谓在隋末;《隋书》谓在炀帝初;《北蕃风俗记》谓在开皇中。
大业三年(607)	高丽袭百济。百济入隋朝贡。倭国遣小野妹子使隋。	
大业四年(608)	隋文林郎裴清奉使倭国。高丽袭新罗。百济入隋朝贡。	
大业五年(609)	高丽遣使朝贡。	
大业六年(610)	隋养兵积谷,谋伐高丽。室韦贡方物。	
大业七年(611)	隋诏以高丽王元献失藩礼,将讨之。百济遣使朝贡。	
大业八年(612)	隋为降附靺鞨突地稽部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以统之;出兵百万分两路伐高丽,败,还至辽东,才二千七百人;惟置辽东郡及通定镇。高丽抗隋。百济持两端。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大业九年(613)	隋两伐高丽,帝度辽,与高丽战于新城、辽东,不克;会杨玄感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叛投高丽,帝乃还军。	
大业十年(614)	隋三征高丽,来护儿占卑沙城,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悦,召护儿还。百济贡方物。倭使来朝。	
大业十一年(615)	契丹遣使朝贡。靺鞨遣使朝贡。新罗遣使朝贡。	
大业十二年(616)	罗艺自称幽州总管。	
大业十四年(618)	新罗乞隋伐高丽。	是年隋亡唐兴。
武德元年(618)	突厥始毕可汗遣骨咄禄特勤朝唐。	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
武德二年(619)	唐封罗艺为燕王,赐姓李;营州总管邓暠击高开道,败之。靺鞨酋帅突地稽遣使朝贡。高丽遣使朝唐。	
武德三年(620)	突厥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靺鞨等入自幽州。靺鞨酋长突地稽请内附,以其地为燕州,以其为燕州总管。	
武德四年(621)	六月,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突地稽为王。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请内附。新罗、高丽入朝。百济王遣使献果下马。	
武德五年(622)	突厥颉利可汗遣使朝贡;由幽州、代州、原州三路南下攻唐,为唐瓦解。靺鞨渠帅阿固郎来朝。高丽遣使朝贡。	
武德六年(623)	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击却之。突厥遣使朝唐。契丹酋帅孙敖曹来朝。新罗、高丽遣使朝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武德七年(624)	唐封高丽王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夫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高丽遣使内附,受正朔,请班历,许之;十二月,朝唐。契丹遣使朝唐。靺鞨渠帅阿固郎来朝。百济二月、七月俱遣使朝贡;十二月,遣使献广明甲。	
武德八年(625)	高丽遣人入唐学道、佛法,诏许之。新罗、百济并遣使朝唐。	
武德九年(626)	新罗、百济讼高丽阻其入朝,唐遣朱子奢往谕旨,三国皆上表谢罪。突厥入唐朝贡。靺鞨遣使朝唐。新罗、高丽、百济朝贡。	
贞观元年(627)	太宗赐百济王玺书。新罗两次入朝。	玺书原文见《旧唐书·百济传》。
贞观二年(628)	唐破突厥颉利可汗。契丹首领大贺摩会率其部来降。靺鞨内属。高丽遣使朝唐贺破突厥,并献封域图。	
贞观三年(629)	唐册薛延陀可汗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十一月,李靖分道出兵击突厥。突厥突利可汗降唐。契丹渠帅两次朝唐;赐其鼓、纛。靺鞨别部并遣使朝贡。高丽、百济、新罗并遣使朝贡;新罗将军金庾信侵高丽东边,破娘臂城。奚渠帅来朝。室韦遣使贡丰豹,自此朝贡不绝。	
贞观四年(630)	唐擒突厥大可汗颉利;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倭国第一次遣唐使犬上御田锹来朝。室韦朝贡。	日本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其中两次未能成行,一次专为迎接遣唐使归国,三次陪送唐赴日使节归国,余为正式出使。
贞观五年(631)	唐遣使毁高丽所立京观,收隋人骸骨。契丹渠帅来朝。黑水靺鞨遣使朝贡。百济朝贡。奚渠帅来朝。室韦朝贡。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贞观六年(632)	契丹渠帅两次来朝。靺鞨朝贡。百济、新罗并遣使朝贡。奚、室韦朝贡。	
贞观七年(633)	契丹渠帅入朝。奚渠帅入朝。	
贞观八年(634)	靺鞨渠帅入朝。室韦渠帅入朝。	
贞观九年(635)	唐册命金善德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百济入朝。室韦遣使入朝。	
贞观十年(636)	百济入朝。	
贞观十一年(637)	百济太子隆入朝,并献铁甲、雕斧。	
贞观十二年(638)	高丽侵新罗北边七重城,新罗将军阏川逆击,胜。	
贞观十三年(639)	高丽、新罗、百济朝贡。	
贞观十四年(640)	流鬼国遣使余志重三译朝贡。高丽遣太子桓权入朝。	
贞观十五年(641)	唐诏立夫余义慈为带方郡王;遣陈大德使高丽,大德游历高丽无所不至。百济王夫余璋卒。薛延陀率同罗、仆骨、回纥、靺鞨、奚等击突厥思摩之部,唐发兵护突厥。	
贞观十六年(642)	高丽盖苏文弑其君高武,立高藏为王。唐太宗为高丽王高武举哀于苑中,遣使持节往吊祭焉;亳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不许。百济发兵攻新罗,与高丽通好,欲绝新罗入朝之路。百济、高丽并朝唐;新罗两次朝唐。	
贞观十七年(643)	唐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不许;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相里玄奘持玺书往册命,并谕高丽停攻新罗,苏文竟不从。新罗王上言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乞偏师救助。高丽请道教于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贞观十八年(644)	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自杀其主,又发兵击新罗,新罗尽礼以事国家,数遣使稽颡请援,乃遣高丽解兵,不从,出兵伐高丽。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并献方物。	
贞观十九年(645)	太宗亲统六军发洛阳;破盖牟城、辽东城、白崖城;与高丽战安市城,不克,班师。契丹贡方物。高丽使靺鞨求助于薛延陀,不成。安市之战唐坑靺鞨三千三百人。百济太子夫余康信来贺。新罗来朝。奚贡方物。	
贞观二十年(646)	太宗下诏责让高丽;高丽遣使谢罪。唐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靺鞨,遇薛延陀,法帅靺鞨兵击破之;漠北回纥等铁勒诸部攻灭薛延陀,唐遣使招抚,铁勒诸部来归。	
贞观二十一年(647)	春正月,唐以漠北回纥等部置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遣牛进达、李世勣伐高丽;诏赎隋末陷蕃人口并室韦、乌罗护、靺鞨为薛延陀所掠者。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金真德。高丽使第二子莫离支高任武朝贺,因谢罪,帝许纳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	唐以新罗金春秋为特进,其子为左武卫将军;正月,诏授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裴行方为副,自莱州泛海击高丽,大胜;四月,乌胡镇将石神感浮海击高丽,大胜;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契丹辱纥主曲据率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曲据为刺史,隶营州;契丹帅窟哥率部内附,以其部为松漠都督府,窟哥为都督。新罗遣其相伊赞干金春秋等入朝。高丽朝贡。百济攻新罗,破其十三城。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其部为饶乐都督府,可度者为都督。	
永徽元年(650)	新罗大破百济之众,遣使以闻。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永徽二年(651)	百济入朝。	
永徽三年(652)	高丽、新罗、百济并朝唐。	
永徽四年(653)	新罗献金总布。倭国以吉士长丹等为第二次遣唐使。	
永徽五年(654)	新罗王真德卒，立金春秋。唐使太常丞张友收持节吊祭新罗王。高丽率靺鞨兵侵契丹。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大破高丽于新城，以其尸筑京观，遣使告捷。倭以高向玄理等为第三次遣唐使。	
永徽六年(655)	高丽、百济、靺鞨侵新罗北境，金春秋向唐求救。唐营州都督程名振破高丽于贵端水。	
显庆元年(656)	新罗王遣子文王来朝；新罗大败百济，遣使告捷。高丽遣使贺册皇太子。	
显庆三年(658)	唐程名振、薛仁贵攻高丽之众烽镇，大胜。	
显庆四年(659)	唐遣契苾何力经略辽东。虾夷国遣使入朝，其使须长四尺。倭以坂合部石布等为第四次遣唐使。	
显庆五年(660)	百济数侵新罗，新罗上表求救。唐遣神丘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伐百济，克之，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阿史德枢宾、延陀枪真、李合浦并为冷硎道行军总管，各领本蕃兵讨叛奚，奚降；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擒送之东都；十二月，以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分道发兵，以讨高丽。	
显庆六年(661)	唐命契苾何力、苏定方、任雅相伐高丽。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龙朔元年(661)	新罗王春秋卒,立其子金法敏。唐遣使持节吊祭金春秋;以萧嗣业为夫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蕃兵赴平壤,讨高丽;三月,刘仁轨大破百济余众于熊津之北;是年会诸军讨高丽,八月苏定方破高丽之众于浿江。	
龙朔二年(662)	唐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蛇水上,败亡;苏定方破高丽于苇岛;进攻平壤不克;刘仁轨、刘仁愿及新罗兵破百济余众于熊津之东。倭天智天皇以一百七十艘军船护送百济王子丰璋归国。百济复国。	
龙朔三年(663)	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来降;百济君臣内讧,新罗乘机进攻;百济求救于倭。倭三月派二万七千人支援百济,八月加派万余人。八月,唐、罗联军与倭、济联军战于白江口,大败倭军,灭百济。	
麟德元年(664)	倭恐唐、罗联军进攻本土,筑四道防线。	
麟德二年(665)	高丽王藏遣其子福男入朝。倭以守大石等为第五次遣唐使。	
乾封元年(666)	高丽遣太子福男入唐,侍祠泰山;盖苏文死,诸子乱,长子男生降唐。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伐高丽。	
乾封二年(667)	李勣拔高丽新城,引兵进,破十六城;薛仁贵拔南苏、木底、苍崖三城,与泉男生军合。	
总章元年(668)	唐以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薛仁贵破高丽夫余城,夫余川中四十余城皆请服;李勣破高丽,拔平壤,擒高藏等;以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与华人参理之,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镇抚之。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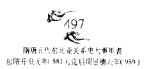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总章二年(669)	唐徙高丽民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安置。倭以河内鲸等为第六次遣唐使。	
总章三年(670)	唐列辽东地为州县。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一般认为,倭国改日本在本年。
咸亨三年(672)	唐高侃大败新罗之众于横水。	
咸亨四年(673)	唐李谨行破高丽叛党于瓠卢河之西。高丽平壤余众遁入新罗。	
咸亨五年(674)	新罗既纳高丽叛亡之众,又侵百济故地。唐以新罗不法,下诏削夺法敏官爵;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新罗。	
上元二年(675)	刘仁轨破新罗于七重城,又以靺鞨浮海略新罗南境;仁轨中道还,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前后三战,大破新罗。新罗遣使入朝,伏罪并献方物,前后相属,帝许之,复其王官爵。	
上元三年(676)	唐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并移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	
仪凤二年(677)	唐授高藏辽东都督、朝鲜郡王,夫余隆熊津州都督、带方郡王,各往安抚本族。高藏至辽东潜与靺鞨通,谋叛,事觉诏还,配流邛州。唐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高藏叛,徙其人散于河南、陇右诸州,贫弱者留安东城旁安置。	
开耀元年(681)	新罗金法敏卒,子政明袭位。	
垂拱二年(686)	新罗入朝,求唐礼。	
天授三年(692)	新罗王政明卒,则天为举哀,子理洪立。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万岁通天元年(696)	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反,攻陷营州。辽西靺鞨乘机东归。武周发兵会奚人讨契丹。突厥默啜请还河西降户,为国攻契丹,许之。	
万岁通天二年(697)	周以武懿宗为神兵道总管,讨契丹;清边道总管王孝杰与契丹战,死之;复数战灭孙万荣。契丹李尽忠死。突厥默啜袭契丹新城,克之。	此新城系契丹所筑,在柳城西北。
圣历元年(698)	粟末靺鞨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遣使通突厥。	
圣历二年(699)	新罗贡方物。	
久视元年(700)	契丹将李楷固、骆务整降唐,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讨契丹余党,悉平之。	
长安二年(702)	新罗王理洪卒,则天为举哀,子兴光立。日以粟田真人等为第七次遣唐使。	
长安三年(703)	新罗朝唐。	
神龙元年(705)	唐遣张行岌招慰渤海。渤海遣大门艺入侍。新罗两次来朝。	
神龙二年(706)	新罗三次来朝。	
景龙元年(707)	新罗朝贡。室韦朝贡。	
景龙三年(709)	新罗朝贡。日右大臣藤原单独见新罗使金福信,明确表示欲结两国之好。室韦朝贡。	白江战后,日试图修复与唐、罗两国的关系,积极与新罗往来,从687—707年间新罗使日九次,日使新罗七次。
景龙四年(710)	奚、霫犯塞,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新罗、高丽入朝。奚朝贡。	
景云二年(711)	突厥默啜灭突骑施娑葛,遂役属契丹、奚。渤海遣使献方物。新罗献方物。室韦献方物。	突厥役属契丹、奚,《新唐书》但言在景云中。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延和元年(712)	唐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战于冷陉,全军覆没。突厥朝贡。新罗朝贡。	
开元元年(713)	唐遣崔忻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渤海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渤海王子入朝,请就市交易,入寺礼拜,许之;大门艺自唐归国。新罗两次入朝。室韦入朝。	
开元二年(714)	唐薛讷率军讨奚、契丹,为敌所败;赐丹书、铁券于奚都督乌褐颉利发、契丹伊健啜。二月,拂涅部首领失异蒙,越喜部大首领乌施可蒙,铁利部大首领闼许离等朝唐;十二月,拂涅部大首领朝唐。新罗遣使级湌朴裕来贺正;二月,王子金守忠朝唐,留宿卫。奚王李大酺朝唐。	
开元三年(715)	突厥默啜虐用其下,部众离散。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陆啜、右厢五弩失毕俟斤及高丽王莫离支高文简等各率众来降。唐封高文简辽西郡王、行左卫大将军,高丽大首领拱毅左领军卫将军员外置,兼刺史,封平城郡开国公。	
开元四年(716)	突厥默啜遇刺身亡。奚使乞于寺观礼拜及向两市贸易,许之。契丹李失活以所部来降。拂涅部大首领朝唐,赐物三十段。新罗遣使金枫厚来贺正。奚李大酺以所部来降。	
开元五年(717)	唐复于柳城置营州都督府,自李尽忠之乱,营州内迁,至是得复。契丹首领李失活入朝,娶永乐公主。渤海遣使朝唐。三月,拂涅靺鞨遣使献方物;五月,靺鞨献方物。新罗两次入朝献方物。日以多治比县守等为第八次遣唐使。奚王李大酺朝唐,封饶乐郡王,娶固安公主。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元六年(718)	契丹王李失活卒,以其弟娑固代之;遣使入朝;孙骨纳等十八人内属,并授游击将军,留宿卫;娑固为其臣可突于所攻奔营州。渤海大祚荣遣其子述艺朝唐,授怀化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员外置,留宿卫。铁利、拂涅两部俱遣使朝唐,各授守中郎将;靺鞨朝唐。新罗遣使入朝。	
开元七年(719)	唐置平卢节度使,治所在营州。契丹遣使献马十匹;松漠郡王李娑固与永乐公主朝唐。渤海大祚荣死,赠特进,子武艺嗣立,唐遣吴思谦摄鸿胪卿,持节吊祭之,册立大武艺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正月,拂涅、铁利、越喜三部俱遣使朝唐;二月,拂涅部遣使献方物于唐;八月,拂涅部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于唐。新罗遣使贺正。正月,奚遣使贺正;二月,献方物。	
开元八年(720)	唐遣郎将张越册渤海王子大都利行为桂娄郡王,约共讨奚、契丹;唐军与奚王李大酺并娑固讨可突于,不利;娑固、大酺临阵被杀。契丹遣蕃中郎将张少免俱等朝唐。	
开元九年(721)	契丹蕃郎入朝,拜折冲。渤海遣大首领朝唐,拜折冲。拂涅、铁利两部大首领朝唐,并拜折冲。	
开元十年(722)	契丹首领李郁于受封松漠郡王,娶燕郡主;遣大首领楷落朝唐,授郎将。渤海遣味勃计朝唐并献鹰,与黑水靺鞨共请突厥吐屯。闰五月,黑水部酋长倪属利稽来朝,授勃利州刺史;九月拂涅部首领如价、铁利部大首领买取利等六十八人朝唐,并授折冲;十月,越喜部首领茂利蒙朝唐,献方物;铁利部遣可娄计朝唐,授郎将;十二月,黑水部大酋长倪属利稽等十人朝唐,并授中郎将。新罗遣大柰麻金仁壹贺正,并献方物。奚首领李鲁苏受封饶乐郡王,娶东光公主;遣其兄奴默俱及声银高朝唐,授将军,留宿卫。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元十一年(723)	契丹松漠郡王李鬱于入朝,仍请婚。越喜部勃施计、拂涅部朱施蒙,铁利部倪处梨俱来朝,并授郎将。新罗遣使献果下马一匹,及牛黄、人参、头发、朝霞绸、鱼牙绸、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奚首领李日越朝唐,授员外折冲,留宿卫。	
开元十二年(724)	唐遣使以绢八万段分赐奚及契丹。契丹二月遣使涅里来贺正;三月、五月两次来朝。渤海遣贺祚庆贺唐正旦。二月铁利部朝唐;越喜部奴布利等朝唐,并授郎将;黑水部大首领屋作箇朝唐,授折冲;拂涅部大首领鱼可蒙朝唐,授郎将;五月,铁利部遣使朝唐;十二月,越喜部破支蒙朝唐贺正,并献方物。新罗遣金武勋贺正。奚遣大首领李奚奴等十人贺正;五月,遣使献麝香。	
开元十三年(725)	唐于黑水部内置黑水军,续更以最大部落为黑水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及诸部刺史,唐置长史监领之。正月,契丹遣使贺正旦;遣可突于朝贡;王邵固朝唐,从封东岳,授左羽林大将军,改封广化郡王。渤海遣乌借芝蒙贺唐正旦;遣首领谒德朝唐;王弟大昌勃价朝唐。正月,黑水部遣其将五郎子朝唐贺正,并献方物,授将军,赐紫袍、金带、鱼袋;三月,铁利部大首领封阿利等十七人朝唐;越喜部苾利施、黑水部大首领乌素可蒙、拂涅部薛利蒙俱来朝唐,并授折冲;四月,黑水部诺箇蒙朝唐,授果毅;五月,黑水部落职纥蒙等两人朝唐,授中郎将,赐紫袍、银带、金鱼袋。室韦遣使朝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元十四年(726)	唐封宗室女为公主,妻契丹与奚;以黑水靺鞨地为黑水州,置长史。渤海大都利行朝唐,留宿卫;王子义信入朝,献方物;遣大门艺、任雅相发兵攻黑水靺鞨,门艺逃唐,以大壹夏代之;遣使马文轨、葱勿雅请诛门艺,唐不许。契丹松漠郡王李邵固受封广化王;七月,契丹部落刺史出利县令苏固多及将军颙哥皆朝唐献戎捷。新罗遣使金忠正来贺正;五月,遣王弟金钦质朝唐。奚饶乐郡王李鲁苏受封奉诚王。	
开元十五年(727)	契丹遣首领诺括来送质子,并献方物。渤海遣李尽彦、大宝方朝唐;遣高仁聘于日本;高仁等十六人并被虾夷杀害,首领高斋德等八人免死朝日。二月,铁利部米象朝唐,授郎将;十月,靺鞨遣使来朝;十一月,铁利部首领失伊蒙朝唐,授果毅。新罗遣使贺正。	
开元十六年(728)	唐授黑水部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契丹李邵固遣其子诺括朝唐,授大将军。渤海大都利行卒于唐,护丧归国;首领菸夫须计朝唐;高斋德与日本遣使归国。靺鞨遣使入朝。新罗遣使贡方物;王从弟金嗣宗朝唐。日授高斋德等八人并正六位上;以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遣渤海使。奚大首领特设于朝唐,授中郎将。	
开元十七年(729)	渤海遣使入唐献鹰、鲻鱼;王弟大胡雅、大琳朝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元十八年(730)	契丹遣使朝贡,唐不礼焉;衙官可突于杀其主李邵固,率部降于突厥。奚遣使朝贡;部众随契丹叛降突厥,王李鲁苏奔唐。唐制幽州刺史赵含章率兵讨契丹、奚;六月,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帅十八总管讨契丹、奚。渤海王弟大郎雅、智蒙、乌那利达朝唐;九月,遣使朝贡。正月拂涅部兀异朝唐,献马四十匹,授左武卫折冲,留宿卫;五月,黑水部遣阿布思科朝唐,献方物;六月,黑水部大首领倪属利稽等朝唐,并授中郎将。正月新罗遣使贺正;九月,遣使朝贡。	
开元十九年(731)	渤海遣使入唐贺正;大姓取珍等百二十人朝唐。新罗遣使贺正。室韦二月遣使贺正,十月西室韦朝唐。	
开元二十年(732)	唐以信安郡王祎为河东、河北两道行军副大总管知节度事,率兵讨契丹,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擒其酋长,余党窜入山谷;九月,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渤海遣将张文休浮海攻登州,杀刺史韦俊,又发兵至马都山,唐平卢先锋乌承玼御之。新罗遣使朝唐贺正。日以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奚遣使贺正;遣首领细苏等朝唐;首领锁都朝唐。室韦大首领薛勃海恍朝唐。	
开元二十一年(733)	唐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讨武艺;命金思兰使新罗,约攻渤海;幽州副总管郭英杰讨契丹,败。渤海遣人刺大门艺,未中;遣大诚庆朝唐,上表悔过,玄宗许之,赦大郎雅等罪,放还;突厥使来会攻契丹,却之。新罗王遣侄金志廉朝唐谢恩。日以多治比广成等为第九次遣唐使。奚首领属鹘留朝唐。	

续表

年代	事件	备注
开元二十二年(734)	唐改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幽州长史张守珪发兵讨契丹,斩其王屈烈及大臣可突于。新罗遣使金端竭丹贺正。唐授新罗王弟金志廉鸿胪少卿员外置。	
开元二十三年(735)	契丹知兵马事李过折来献捷,唐以李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唐与新罗划浿水为界。突厥引兵侵奚、契丹,为契丹、奚所破。契丹遣使渴胡等朝唐,授果毅,留宿卫;涅礼杀契丹王李过折,唐赦其罪,以涅礼为松漠都督。渤海王子大蕃朝唐。铁利、拂涅、越喜俱遣使朝唐献方物。正月,新罗遣使金义忠贺正;十二月,遣使献方物;遣王从弟大阿飡金相朝唐,死于路。	
开元二十四年(736)	唐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轻进遇败,张九龄欲杀之,玄宗赦其罪。渤海遣首领聿弃计、木智蒙朝唐。越喜靺鞨遣使献方物。新罗遣使贺献。	
开元二十五年(737)	唐册立金承庆新罗王;张守珪破契丹余众于捺禄山。正月,渤海大首领木智蒙朝唐;遣公伯计、大首领多蒙固朝唐;王大武艺死,子大钦茂嗣立。拂涅部首领兀异朝唐,授中郎将。二月,新罗遣使沙飡金抱质贺正;王金兴光死,子承庆嗣立;十二月,金承庆遣使献方物。	
开元二十六年(738)	唐遣使段守简吊祭大武艺并册立大钦茂为渤海郡王,嗣父职。渤海遣使随唐册使入朝,请写《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遣使献貂鼠皮一千张,乾文鱼一百条。新罗遣使金元玄贺正。	《旧唐书》系武艺死于开元二十六年,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谓武艺卒于开元二十五年。
开元二十七年(739)	渤海遣使献鹰;王弟大勖进朝唐,遣臣受福子朝唐;遣胥要德、已珍蒙等聘于日本。拂涅部遣使朝唐,献方物。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开元二十八年(740)	唐册新罗王金承庆妻金氏为新罗王妃;以王斛斯为平卢军节度加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处置使。渤海遣使朝唐,献貂鼠皮、昆布;已珍蒙等与日本朝聘使来。越喜部遣臣野古利,铁利部遣臣绵度户朝唐,献方物。日藤原广嗣之乱。	
开元二十九年(741)	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渤海遣失阿利朝唐;四月,遣使进鹰及鹘。二月,越喜部遣部酋乌舍利朝唐贺正,黑水部遣臣阿布利稽朝唐贺正,皆授郎将;三月,拂涅部首领那弃勃朝唐贺正,并献方物。	
天宝元年(742)	唐分平卢别为节度,以安禄山为节度使;以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治幽州;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两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两州之境,治营州。新罗遣使朝唐。	
天宝二年(743)	契丹刺史匐从之等八十人并朝唐。渤海王弟大蕃朝唐。新罗王承庆卒,弟宪英立。奚刺史等一百八十人朝唐。	
天宝三载(744)	是年新罗三次朝唐。回纥汗国(744—840)建立。	
天宝四载(745)	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契丹、奚,契丹及奚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回纥灭突厥,斥地愈广,东室韦,西金山,南大漠;怀仁可汗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新罗朝贺。黄头室韦献方物。	
天宝五载(746)	渤海遣使朝唐贺正。新罗朝唐贺正。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天宝六载(747)	渤海遣使朝唐贺正。黑水部遣使朝唐贺正,并献方物。新罗朝唐贺正。黄头室韦贺正;十二月,室韦献马六十匹。	
天宝七载(748)	正月黑水部遣使贡于唐;三月,黑水部遣使献金银及方物于唐。黄头、和解、如者、赂丹室韦皆两次朝唐。	
天宝八载(749)	渤海遣使献鹰于唐。奚遣使贺正。	
天宝九载(750)	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前后数四。契丹遣使朝唐。渤海遣使献鹰。黑水部朝唐贺正。黄头室韦贺正。	
天宝十载(751)	安禄山出兵六万讨契丹,兵大败;契丹围师州,禄山使史思明击却之。	
天宝十一载(752)	唐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渤海遣慕施蒙聘于日本。黑水部遣使朝唐。日以藤原清河等为第十次遣唐使。	
天宝十二载(753)	渤海遣使朝唐贺正。	
天宝十三载(754)	渤海遣使朝唐贺正。	
天宝十四载(755)	安禄山奏破奚、契丹;安史之乱爆发。渤海徙都上京龙泉府;唐加王特进。新罗遣使朝唐贺正。	
至德元载(756)	唐以刘正臣为押渤海府经略使;平卢留后徐归道遣判官张元涧往渤海征兵马,不应。	
至德二载(757)	唐平卢节度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聘渤海。契丹首领捺括朝唐。奚首领白越朝唐。	
乾元元年(758)	二月,唐以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使;十二月王玄志卒,军士推立侯希逸,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日遣小野朝臣田守等聘渤海;渤海遣杨承庆、杨泰师等报聘。新罗遣使朝唐。	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乾元二年(759)	渤海杨承庆与日本入唐使高元度一同归国;渤海遣杨方庆同高元度入唐;遣高南申使日本。日权臣惠美押胜欲吞并新罗,不果行。	
乾元三年(760)	奚遣大首领上阶将军土门等朝唐。	
上元元年(760)	渤海高南申与日本答聘使阳侯玲璆归国。	
上元二年(761)	唐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相攻连年,又为奚所侵,乃悉举其军袭李怀仙,破之,因引兵而南;设平卢淄青节度使驻青州。日遣唐使高元度归国;以武藏介从五位下高丽朝臣大山为遣渤海使。新罗王金嶷入唐,请留宿卫。	
宝应元年(762)	唐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王新福聘日本;唐诏以渤海为国,进封渤海王,加检校太尉。新罗遣使朝贡。日遣渤海副使伊吉连益麻吕归国。奚遣使朝贡。	
宝应二年(763)	唐安史之乱结束;以李怀仙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节度使。回纥助唐平乱军北归。日以板振镰束为渤海答聘使。唐使韩朝彩同日本僧人戒融入渤海。	当年改元广德,韩朝彩入渤海事在广德元年。
广德二年(764)	仆固怀恩反,引吐蕃、回纥军攻唐。渤海遣王诞朝唐。新罗遣使大奈麻金才伯等聘日。日藤原仲麻吕之乱。	
永泰元年(765)	平州置柳城。	
永泰二年(766)	新罗遣使朝贡。	
大历元年(766)	唐加渤海王大钦茂司空兼太尉。	册渤海事《旧唐书》谓在大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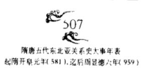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大历二年(767)	回纥遣使朝唐。契丹两次遣使朝唐。自此至大历十年，渤海频遣使入朝。靺鞨遣使朝唐。新罗遣使金隐居奉表朝唐，贡方物；王宪英卒，子乾运立。室韦两次遣使朝唐。	
大历三年(768)	回纥遣使朝贡。新罗遣使朝贡。	
大历四年(769)	渤海两次朝唐。室韦朝唐。	
大历六年(771)	契丹遣使朝唐。渤海遣壹万福聘日。奚朝唐。	
大历七年(772)	回纥入唐朝贡。契丹入唐朝贡。渤海入唐朝贡。靺鞨入唐朝贡。新罗遣使金标石贺正。日责渤海使以王表无礼；以武生连乌守为送渤海使。奚、室韦入唐朝贡。	
大历八年(773)	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使朝唐，献方物；是年入唐六次。新罗遣使贺正，献方物。日以国书非礼却渤海使乌须弗。奚、室韦入唐朝贡。	新罗自此至大历十二年(777)比岁来朝。
大历九年(774)	渤海两次来朝。唐送渤海质子大英俊还蕃。契丹遣使朝唐。靺鞨遣使朝唐。新罗两次遣使朝唐。奚、室韦遣使朝唐。	
大历十年(775)	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反；以李正己为押渤海使。契丹两次朝唐。是年渤海四来朝唐。靺鞨两次朝唐。奚、室韦遣使朝唐。	
大历十一年(776)	渤海遣史都蒙聘日本。新罗两次遣使朝唐。	
大历十二年(777)	契丹两次入唐朝贡。渤海正月遣使贺正并献日本舞女十一人；二月，遣使献鹰；四月、十二月，献方物；史都蒙同日本聘使来。日以大学少允正六位上高丽朝臣殿嗣为送渤海使，并吊渤海王后丧；以佐伯今毛人等为第十一次遣唐使。靺鞨朝贡献方物。新罗遣使朝贡。奚、室韦分别两次朝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大历十三年(778)	渤海遣张仙寿送日本聘使还国。日以正六位上大纲公广道为送渤海使。	
大历十四年(779)	唐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渤海遣高泮弼聘于日本。渤海及铁利使朝日，留出羽国；以渤海国书无礼，勿令进。	
建中元年(780)	渤海遣使朝唐。	
建中三年(782)	渤海遣使朝唐。新罗遣使朝唐。	
建中四年(783)	新罗王乾运卒，其相金良相为王。	
贞元元年(785)	渤海迁都东京龙原府。	按《新唐书》只言贞元中徙都。
贞元二年(786)	渤海遣李元泰聘日本。	
贞元七年(791)	契丹遣使朝唐。渤海遣大常靖、大贞干朝唐，请备宿卫。	
贞元八年(792)	渤海遣杨吉福等朝唐。靺鞨入唐朝贡。室韦都督和解热素朝唐。	
贞元九年(793)	室韦大都督阿朱等三十人朝唐。	
贞元十年(794)	契丹遣使朝唐。渤海遣大清允朝唐；王薨，族弟元义嗣立，国人杀之，立文王孙华玙，是为成王，还都上京；冬，成王薨，嵩璘嗣立。	
贞元十一年(795)	唐遣殷志瞻册大嵩璘为忽汗州都督、渤海王；幽州刘济大破奚。契丹大首领热苏等二十五人朝唐。渤海遣吕定琳聘日，都督密阿古朝唐。	
贞元十二年(796)	日以上野介御长广岳、式部大录桑原秋成为送渤海使；告渤海以六年为聘问间隔。	
贞元十四年(798)	唐册渤海郡王为国王。日遣内藏贺茂聘渤海。渤海遣大能信、茹富仇朝唐；遣大昌泰聘日本。	
贞元十五年(799)	日以滋野宿祢船白为送渤海使。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贞元十六年(800)	新罗王敬则卒，金俊邕立。唐以金俊邕袭开府、检校太尉、鸡林州都督、新罗国王。	
贞元十七年(801)	契丹遣乌鬼朝唐。奚梅落索低朝唐。	
贞元十八年(802)	虞娄、越喜两部朝唐。	
贞元二十年(804)	渤海遣使朝唐。新罗遣使朝唐。日以藤原葛野磨等为第十二次遣唐使；派最澄、空海、永忠等入唐。	
贞元二十一年(805)	唐以新罗王金重熙兼宁海军使，其母为太妃，妻为妃；进渤海王大嵩璘检校司徒。渤海遣使朝唐。	
元和元年(806)	奚王海落可入唐朝贡。唐授入朝奚王海落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饶乐郡王；放宿卫新罗质子金献忠归本国。契丹遣使朝唐。渤海入唐朝贡。新罗入唐朝贡。	
元和二年(807)	回纥入唐朝贡。契丹入唐朝贡。渤海入唐朝贡。奚入唐朝贡。	
元和三年(808)	唐授奚首领索位威卫将军同正，仍赐姓李氏。新罗遣使金力奇朝唐。	
元和四年(809)	渤海遣使朝唐；遣高南容聘于日本；康王嵩璘薨，子元瑜立。唐命中官元文政往渤海充吊祭册立使，册大元瑜为渤海国王；以投来奚王没辱孤为右领军卫将军员外同正，充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平林游奕兵马使，仍赐李姓。	
元和五年(810)	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使高才南等朝唐；王子大延真献方物；遣高南容聘日。新罗遣其子献金银佛像及佛经幡等，并贡方物。奚遣使朝贡。	
元和七年(812)	渤海遣使朝唐；王大元瑜薨，大言义立。新罗贺正兼告哀使全昌男等五十四人朝唐。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元和八年(813)	唐命内侍李重旻充渤海册立宣慰使，册大言义为渤海国王，授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遣王子及辛文德等朝唐；释贞素与日本留唐学问僧灵仙于长安相会。契丹达干可葛等二十九人朝唐。	
元和九年(814)	渤海正月遣高礼进等朝唐，献佛像；十一月，遣使献鹰鹘；十二月，遣大孝真朝唐；遣王孝廉聘日本。	
元和十年(815)	契丹入唐朝贡。渤海遣卯贞寿、大昌庆、大庭俊等先后朝唐。黑水部酋长十一人朝贡于唐。新罗入唐朝贡。奚入唐朝贡。	
元和十一年(816)	唐禁以新罗人为生口。回纥入唐朝贡。契丹入唐朝贡。渤海遣高宿满、大诚慎朝唐，前后三次。靺鞨入唐朝贡。奚入唐朝贡献名马；此后奚朝贡每岁不绝。	
元和十二年(817)	契丹首领介落等朝唐。渤海王薨，弟明忠嗣立，遣使朝唐。新罗遣使朝贡。	
元和十三年(818)	渤海王薨，从父大仁秀嗣立；遣李继常朝唐；遣慕感德聘日。唐册大仁秀为渤海国王。回纥入唐朝贡。契丹入唐朝贡。奚入唐朝贡。	
元和十四年(819)	渤海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土宇；遣李承英聘日。	
元和十五年(820)	唐平卢军新加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加渤海王检校司空。渤海遣使先后朝唐两次。新罗遣使朝贡。	按《新唐书》谓宪宗之世，渤海凡十六朝贡。
长庆元年(821)	唐禁略卖新罗人口。渤海遣大公则朝唐；王文矩聘日。	
长庆二年(822)	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使朝唐。新罗遣使朝贡。奚遣使朝贡。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长庆三年(823)	唐敕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渤海遣大多英朝唐;高贞泰聘日。	
长庆四年(824)	回纥入唐朝贡。契丹入唐朝贡。渤海送备宿卫大聪叡五十人入朝。奚入唐朝贡。	
宝历元年(825)	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使朝唐;遣高承祖聘日本。新罗遣使朝贡;请先在太学生崔利贞等四人放还蕃,新赴朝贡金允夫等十二人请留宿卫。奚遣使朝贡。	
宝历二年(826)	唐中使自新罗取鹰鹞回。渤海遣使朝唐。日告渤海十二年通聘一次,亦不答聘。室韦遣使朝贡。	
太和元年(827)	渤海遣使朝唐;以受日本留唐高僧灵仙大师之托为由遣王文矩聘日。	
太和二年(828)	渤海遣使朝唐。	
太和三年(829)	契丹遣使朝贡。渤海遣使朝贡。新罗遣使朝贡。室韦遣使朝贡。	
太和四年(830)	唐以投来奚王茹羯为右骁卫将军;幽州节度使李载义上言发兵入奚界,杀五千余人。契丹遣使朝贡。渤海王薨,大彝震立;遣使赴唐告哀。新罗遣使朝贡。奚遣使朝贡。	
太和五年(831)	唐以大彝震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渤海国王。渤海遣使朝贡。二月,新罗王子金能儒并僧九人朝唐;十一月,新罗遣使朝贡;新罗王金彦升薨。	
太和六年(832)	唐内养王崇禹使渤海回,言渤海置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一百二十司,画图以进。渤海遣大明俊等朝唐;遣司宾卿贺守谦聘幽州府。	
太和七年(833)	唐放渤海学生李居正等三人归国。渤海遣高宝英来谢策命;遣大光晟朝唐;遣学士解楚卿等三人入太学。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太和九年(835)	唐幽州节度、行军司马张建章使渤海。契丹大首领介落等朝唐。奚大首领匿郎等朝唐。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朝唐。	
开成元年(836)	渤海遣使朝唐,运熟铜至唐交易。唐淄青节度使奏:"新罗、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是月,京兆府奏请不与诸蕃互市。新罗遣使朝贡;遣王子义琮来谢恩,兼宿卫。日以小野篁为遣唐使赴唐。室韦大都督阿朱等朝唐。	
开成二年(837)	唐遣新罗质子金义琮归国。契丹入唐朝贡。渤海遣大明俊朝唐贺正;学生六人入唐都留学。室韦遣使朝贡。	
开成三年(838)	渤海遣使朝唐。日以藤原常嗣等为第十三次遣唐使。	
开成四年(839)	契丹首领萨葛朝贡。渤海遣王子大延广朝唐。奚大首领温讷骨朝贡。室韦都督大秩虫等朝贡。	
开成五年(840)	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攻灭,部众散奔,逃离漠北。	
会昌元年(841)	渤海遣使朝唐贡玛瑙柜、紫瓷盆;遣贺福延聘日本。	
会昌二年(842)	室韦首领都督热论等十五人入朝。	
会昌三年(843)	唐诏黠戛斯出兵攻回鹘乌介可汗;刘沔奏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张仲武破回鹘赤心宰相一族。回鹘乌介可汗中箭,走投黑车子室韦。契丹杀回鹘监护使。奚杀回鹘监护使。	
会昌六年(846)	契丹入唐朝贡。渤海遣使朝唐;王子大之萼入朝。新罗使金国连入朝。室韦入唐朝贡。	
大中元年(847)	幽州大破奚众。	

续表

年代	事件	备注
大中二年(848)	渤海遣王文矩聘日。	
大中十一年(857)	唐遣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阻,不至而还。渤海王彝震,大虔晃立;遣使赴唐告哀。	
大中十二年(858)	唐以大虔晃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忽汗州都督,册为渤海国王。渤海遣乌孝慎聘日。日藤原良房摄政。	
咸通元年(860)	渤海遣李居正聘日本;传梵本尊圣咒于日本。室韦入唐朝贡。咸通末,契丹王曰习而之累贡方物。	
咸通十二年(871)	渤海遣杨承规等聘日;王虔晃、孙玄锡嗣立。	
咸通十三年(872)	渤海遣崔宗佐、大陈润朝唐;杨承规等在日互市。	
咸通十四年(873)	渤海遣门孙宰、崔宗佐、大陈润等朝唐,海中遇风,漂着日本。	
乾符三年(876)	渤海遣杨中远聘日。	
广明元年(880)	沙陀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达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于阴山。	
中和二年(882)	渤海遣裴颋聘日。	
光启二年(886)	新罗北镇奏:狄国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其木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	
大顺二年(891)	唐以王师范为押渤海使。渤海遣王龟谋聘日。	889年以崔安潜为押渤海使。
景福二年(893)	渤海王虔晃,玮瑎嗣立,遣使告哀于唐。	
乾宁元年(894)	唐册封渤海王大玮瑎。渤海遣裴颋复聘日本。日本停派遣唐使。	
乾宁二年(895)	刘仁恭据卢龙。	
天祐二年(905)	契丹阿保机与李克用盟。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天祐三年(906)	渤海遣乌炤度朝唐,其子同来应宾贡试进士及第;王薨,大諲譔嗣立。	
开平元年(907)	后梁建立。契丹遣袍笏梅老入朝;阿保机即皇帝位;讨黑车子室韦,破之。渤海遣大昭顺朝梁,贡海东物产;遣裴璆聘日本。	即唐天祐四年,朱温篡唐,建后梁,改元开平。
开平二年(908)	契丹遣使入朝;诏撒剌讨乌丸、黑车子室韦;遣轻兵取吐谷浑叛入室韦者。渤海遣崔礼光朝梁。	
开平三年(909)	契丹遣使入朝;讨黑车子室韦。渤海遣大诚谔朝梁。	
开平四年(910)	契丹讨西、东部奚,平之。	
乾化元年(911)	渤海遣使朝梁。	
乾化二年(912)	渤海遣大光赞朝梁。	
贞明元年(915)	契丹入蔚州。契丹辖底及其两子来奔渤海,未几逸去。	
贞明二年(916)	新州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引契丹寇新州,周德威与战失利,契丹乘胜入幽州,李嗣源进兵击退之。契丹建国。	
贞明三年(917)	后梁以右千牛卫大将军刘璩充契丹宣谕使。	
贞明四年(918)	后梁以朱理为押渤海使。渤海遣使贡于契丹。王建都于开城,建后高丽国。	
贞明五年(919)	契丹略渤海人实辽阳。渤海遣裴璆聘日本。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投高丽。	
贞明六年(920)	后梁以供奉官郎公远充契丹欢好使。王郁诱契丹阿保机寇幽州,陷涿州、定州。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龙德元年(921)	后唐庄宗击契丹,乘胜至幽州。二月,黑水靺鞨酋长高子罗率百七十人投高丽;靺鞨达姑众来寇新罗北边,高丽太祖发兵击之,大破之;新罗王遣使谢高丽;四月,黑水阿于闲率二百人投高丽。	
龙德二年(922)	契丹遣使遗高丽橐驼马及毡。	
同光元年(923)	高丽福府卿尹质使梁还,献五百罗汉画像;吴越国文士朴严来投。	是年为后梁龙德三年,后唐灭梁,改元同光。
同光二年(924)	后唐以黑水国朝贡使兀儿为归化中郎将。契丹寇幽州,营于州东南;寇易、定、蔚诸州。女真、回鹘、黄头室韦合势击契丹。渤海遣大禹谟、大元谦先后朝唐;攻契丹,杀其辽州刺史张秀实,并略其民;契丹兵来攻,旋引去;吴越国王钱镠遣使来册封。九月黑水部遣使朝贡于唐。奚王李绍威进马。	
同光三年(925)	契丹寇幽州。渤海遣裴璆朝唐;遣使聘于新罗;契丹兵围夫余府。黑水国朝贡于唐;女真朝贡。日本遣使朝贡。	契丹去年从碛北归帐,达靼因相掩击,首领于越以部族欲降后唐。
天成元年(926)	契丹寇边,以齐州防御使安审通御之;契丹平州守将伪署幽州节度使卢文进率户口归明。契丹灭渤海,改渤海为东丹国,以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迁渤海王于临潢府;击女真;朝唐献良马;阿保机卒,遣使后唐告哀。高丽遣使张彬朝唐。奚遣使贡马。	东丹国建中台省,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
天成二年(927)	后唐遣使赐物于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遣使梅老没骨已下朝贡。东丹王留契丹上京;右次相耶律羽之表请迁渤海民于辽阳。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天成三年(928)	后唐遣指挥使奔托山押国信赐契丹王妻;幽、定、易频与契丹战,多胜;契丹平州刺史张希崇上表归顺。契丹攻陷平州;遣使秃讷悲梅老等朝贡;遣使求乐器。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辽阳,并徙其民;东丹王寻归国。新罗僧洪度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高丽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	
天成四年(929)	后唐以东丹使高正祠为太子洗马;收复定州,生擒契丹秃馁等两千余人;契丹使来称取秃馁等骸骨,并斩之。契丹太宗奉太后如东丹国,与东丹王同归;寇云州;遣使捺括梅里朝贡。东丹王朝于契丹;遣高正祠朝唐;遣裴璆聘于日本。黑水国遣使骨至朝贡于唐,授归德司戈。	
长兴元年(930)	唐遣使跨海密召东丹王,王浮海奔唐,赐姓东丹,名慕华,拜官,复赐姓李,名赞华,授怀化军节度使。东丹国人王宪等自唐归;裴璆至日本,不得命而还;王妃萧氏主国事。黑水首领兀儿遣使贡于唐。	
长兴二年(931)	契丹遣使邪姑儿入朝。东丹使文成角入朝。铁骊贡于辽。	以后铁骊(利)凡数见,黑水则不复见。
长兴三年(932)	李赞华进契丹地图,后唐以其为滑州节度使;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回纥遣使入朝。契丹遣使拽骨人朝;三月,遣使朝贡,求归则剌、惕隐等。东丹遣使入朝。	
长兴四年(933)	后唐以李赞华遥领虔州节度使;遣王琼、杨昭业册高丽王。契丹遣使述骨卿朝贡。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应顺元年(934)	后唐李从珂弑其主从厚,自立;清泰元年契丹寇云、应州,诏石敬瑭屯代州。契丹遣使没辣于朝贡;耶律倍密报太宗后唐乱事,请讨之。	是年改元清泰。
清泰二年(935)	契丹寇新州、振武、应州。东丹遣列周道、乌济显入唐贡方物。高丽遣礼宾卿邢顺朝唐。新罗敬顺王降高丽,国灭。	
清泰三年(936)	后唐以列周道为检校工部尚书,乌济显试光禄卿;十一月,石敬瑭命桑维翰诣契丹求助,即以契丹兵攻唐;太原行营副招讨使杨光远杀张敬达降契丹。契丹遣使梅里朝唐;以兵入寇;十一月丁卯,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称帝,割燕云十六州与辽,岁输币三十万;诏封李赞华为燕王。奚王李素姑谋叛入契丹,达剌干杀之,遣通事介老入奏。	是年后晋建国,改元天福。
天福二年(937)	故契丹人皇王归葬;后晋遣宰相赵莹使契丹。契丹改幽州为南京;皇太子解里入晋;遣使夷离毕聘晋。高丽遣王规、邢顺等入朝。	
天福三年(938)	后晋以左仆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左散骑常侍韦勋副之;给事中卢重为契丹皇太后册礼使;差乐官六十七人往契丹;以右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契丹十月遣使以宝册上晋帝徽号曰英武明义皇帝。东丹国遣使同契丹使聘于南唐。高丽始行后晋年号。	
天福四年(939)	后晋遣国子博士谢攀册高丽王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余如故。契丹遣使粘木孤聘晋。	
天福五年(940)	后晋遣宣徽使杨彦询使于契丹;归高丽质子王仁翟。契丹使舍利聘晋,致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天福六年(941)	后晋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执契丹使拽剌,遣轻骑略幽州,驰书天下,将与决战,帝发所谕而止之;遣杨彦询使于契丹。高丽遣大相王申一朝晋,献方物。	
天福七年(942)	后晋遣朱光邺、张言使于契丹;遣朱崇节等持国信物使于契丹。契丹是年数度遣使聘晋。契丹遣使高丽遗橐驼五十匹,高丽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联合,忽生疑贰,背盟殄灭,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	
天福八年(943)	后晋遣太府卿孟承诲使契丹;十二月,遣边光范、郭彦威使契丹,因契丹来犯,不达使命而回。后唐庄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入晋贡马。	
开运元年(944)	青州杨光远招契丹,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引五万骑入寇,耶律德光领全军入晋境。契丹大入寇,陷贝州,丁亥至黎阳,陷德州,前锋至邢州,河北诸州告急;晋以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十二月,杜重威等以全军降于契丹。高丽遣广评侍郎韩玄珪、礼宾卿金廉朝晋,告嗣位。	
开运二年(945)	后晋遣范匡政、张季凝册高丽王。	
开运三年(946)	后晋相州节度使张彦泽受契丹命,引之入京;癸酉,帝奉表请降。	
天福十二年(947)	契丹主入东京城,晋朝臣僚一切仍旧,降晋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黄龙府安置。二月,契丹主具汉法服,御崇元殿受朝,改晋国为大辽国,号会同十年。刘知远于太原宫受册,即皇帝位。三月,契丹自东京还本国;耶律德光卒,永康王兀欲矫诏自立。八月,复镇州、邢州,以契丹退,失地渐复。	是年后汉建国,制改开运四年为天福十二年。

续表

年　代	事　件	备　注
乾祐元年(948)	自此至三年，契丹频入寇，河北诸州苦之。东女真大匡苏无盖等遣使高丽献马七百匹及方物。高丽始行后汉年号。	
广顺元年(951)	后周遣千牛卫将军朱宪充入契丹使，送契丹使归蕃，并致书叙革命之由；二月，以田敏充契丹国信使；五月，遣姚汉英等使于契丹；八月，契丹遣曹继筠归故晋中书令赵莹之丧。契丹遣使与汉隐帝书；二月，遣使后周献良马一匹，贺登极；又遣使舞姑报命；永康王兀欲为部下所杀。高丽始行后周年号。	后周建国。
广顺二年(952)	高丽遣广评侍郎徐逢朝周献方物。	
广顺三年(953)	后周遣薛文遇册高丽王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仍令百官衣冠从华制。	
显德五年(958)	后周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尚辇奉御金彦英赍帛数千匹往高丽市铜。	
显德六年(959)	自后周显德元年以来，契丹频入寇，至是年破契丹于瓦桥关北，攻下固安县；春遣左骁卫大将军戴交使高丽；冬遣侍御双哲使高丽。高丽春遣左丞王兢、左尹皇甫魏光朝周献方物；秋遣使朝周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雄图三卷；冬遣使朝周献铜五万斤及紫白水晶各两千颗。女真国遣使后周贡献。	至七年，世宗亲率军北征，不克捷而薨。赵匡胤乘机以宋代周，五代结束。

注释:

① 本表编制主要参考《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渤海国志长编》、《续日本纪》、《日本后纪》、《东北古史资料丛编》(孙进己等主编,辽沈书社 1990 年)、《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金渭显编著,台北食货出版社 1983 年)。

② 本表登录内容主要包括中原王朝、突厥、回纥(鹘)、契丹、奚、渤海、靺鞨、室韦、韩半岛三国、日本等相关大事,国家、民族间以句号隔开,事件之间以分号隔开。因涉及契丹事较多,故有关契丹建国以后事仅选要事登录;突厥、回纥(鹘)则只记与东北亚相关之事件。所录未免挂一漏万,仅供阅读本书参考。

附图一：

2000年暑期考察资料图片集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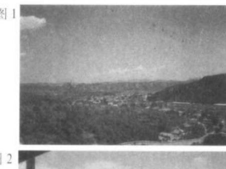


图 2

图 1　由承德普陀宗乘之寺东望形胜

图 2　承德北奚故地今见稻田

图 3　清代巴林桥残余桥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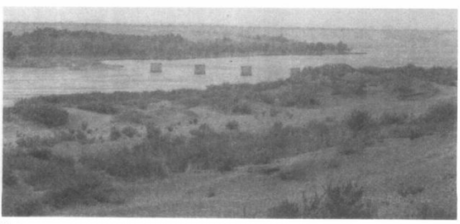


图 3



图 4



图 5

图 4　西樱桃沟古城：唐饶乐府、辽饶州城

图 5　辽庆州城址内

图 6　辽庆州白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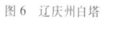




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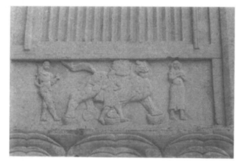

图 7


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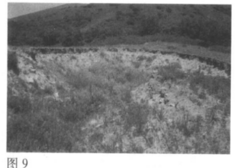

图 9


图 10

图 7　庆州白塔浮雕：胡人牵狮
图 8　庆州白塔浮雕：胡人驱象
图 9　庆西陵（辽道宗陵）主墓室（已回填）
图 10　庆西陵（辽道宗陵）享殿遗址


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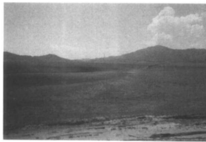

图 12


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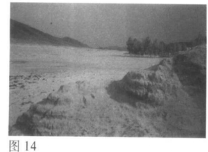

图 14

图 11 辽庆陵所在之王坟谷
图 12 大兴安岭山麓的金界濠
图 13 罕山-大黑山：契丹人灵魂归处
图 14 辽怀州城北墙东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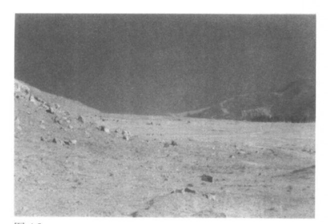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5　辽怀陵（太宗陵）附近

图 16　辽上京城西太祖龙眉宫遗址

图 17　辽上京城西墙


图 18


图 19

图 18　辽祖州石房子
图 19　远望祖陵石门阙
图 20　祖陵石门阙东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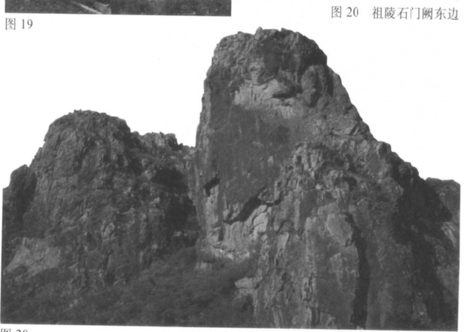

图 20




图 21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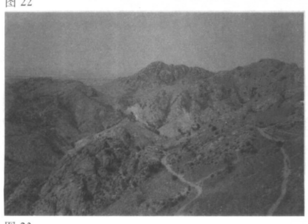

图 23

图 21　达里湖边的元应昌路宫殿遗址
图 22　元应昌路遗址石狮残件
图 23　赤峰红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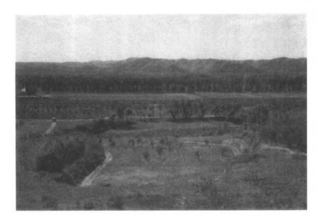
图 24　辽武安州遗址(敖汉旗白塔子)
图 25　辽中京城内大明塔
图 26　辽宁朝阳北塔塔基隋代浮雕
图 27　辽宁朝阳石棺浮雕:妇人启门

图 24

图 26

图 27

图 25


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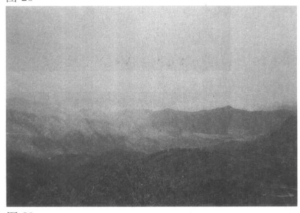

图 29


图 30

图 28　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墓地
图 29　努鲁尔虎山-松陉岭：古代农牧渔猎交汇处
图 30　努鲁尔虎山-松陉岭山脊

附图二：

2001年秋季考察资料图片集

王小甫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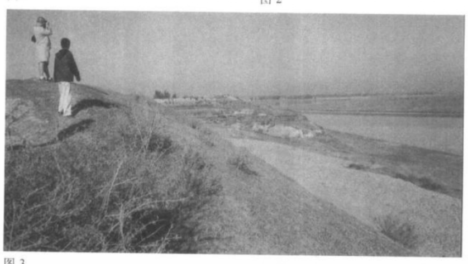


图 3

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唐单于都护府遗址

图 2　托克托县大甲喇镇旧戏台

图 3　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隋唐胜州榆林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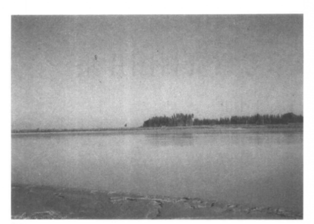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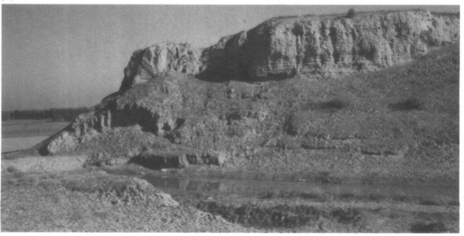

图 5


图 6

图 4　十二连城北墙夯土层
图 5　由十二连城看黄河北岸
图 6　由十二连城汉沙南县东墙南望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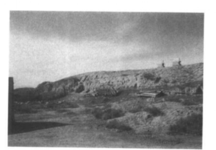

图 7


图 8


图 9


图 10

图 7　汉五原郡固阳县遗址南墙(包头南麻池)

图 8　由乌梁素海东岸遥望狼山:唐天德军遗址附近

图 9　乌梁素海落日余辉

图 10　由乌梁素海东岸赛胡同汉城遗址北望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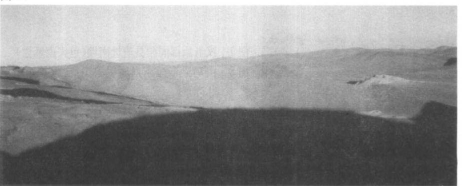



图 11


图 13


图 14

图 11　大青山脚下的美岱召：俺达汗家庙
图 12　铁山残月（突厥遗迹，白云鄂博北）
图 13　百灵庙
图 14　敖伦苏木古城（元代赵王城）景教遗物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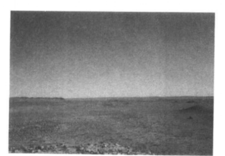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图 15　由赵王城内北望碛口

图 16　达茂旗希拉穆仁召：西域式柱廊

图 17　黄河岸边的垛墙（山西偏关桦林堡附近）

图 18　黄河崖畔上的祠庙和戏台（桦林堡附近）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19　长牙象（山西河曲岱岳殿柱头）

图 20　山西河曲岱岳殿金代壁画

图 21　乘狮子女神（河曲岱岳殿壁画）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2　河曲岱岳殿之日月宫
图 23　岱岳殿日月宫中间门额“西域”
图 24　岱岳殿日月宫中间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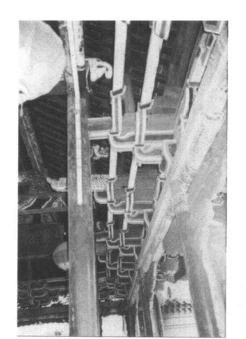


图 25

图 25　长鼻象：河曲旧县海潮庵柱头

图 26　陕西府谷真武庙房檐下的双翼神兽



图 26